

刊創日四十月三年六十三國民

世界文庫

本訂合

冊壹第

一期二十第至號刊創自一

立國
館書圖京南



南京

時與文合訂本第一冊總目錄 (自創刊號至第十二期)

標

一 國際政治經濟

題

作者 期別

- 論莫斯科會議 張明養 一
- 莫斯科會議一夕談 程程 二
- 當前國際形勢 石嘯冲 三
- 武力解決抑和平變更 湯德明 六
- 美國外交的新動向 官鄉 二
- 從馬歇爾演說看美國動向 官鄉 九
- 日本政黨的新分合 林煥平 六
- 今日的捷克 殷懷遠 二
- 賴馬迪內閣的危機 沈鍊之 一
- 法國經濟的蛻變 費正 〇
- 英美在香港的市場鬥爭 余初僑 九

二 國內政治

- 近五十年來中國之政治 周谷城 一
- 現階段中國之政治與教育 周谷城 六
- 中間派的政治路線 施復亮 五
- 中間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 施復亮 八
- 中間路線與挽救危局 施復亮 八
- 民主路線與中間路線 伍丹戈 三
- 和平何以會死了 張東蓀 一
- 看國民黨的三中全会 程程 五
- 從民主政治的條件說到來日和談 程程 七
- 政府改組後之施政方針 馬綬倫 七
- 政府儼然改組了 程程 七
- 今後的八九個月 程程 七
- 和平呼籲與國民參政會 程程 九

三 經濟

標

題

作者 期別

- 中國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 王亞南 四
- 徵借國外存款之商榷 趙鳳喈 六
- 經濟前途還能樂觀嗎？ 張西超 九
- 經濟崩潰與經濟政策 伍丹戈 一
- 簡論當前經濟政策 周伯棟 一
- 論貨幣的二重政策 郭大力 〇
- 法幣將往何處去 漆琪生 三
- 黃金政策之過去與今後 周伯棟 二
- 內戰財政的幻術 甘祠森 五
- 從物價狂漲看經濟崩潰 龍成志 八
- 新財政與舊財政 伍丹戈 七
- 中國民族工業的國內市場問題 李紫翔 七

四 軍事·科學

- 原子彈戰爭是可能的麼？ 蔡鴻幹 一
- 最近戰局鳥瞰 葉辛 一
- 精神分析的物質基礎 董秋斯 九

五 哲學·歷史·社會·文化·教育

- 哲學是甚麼？哲學家應該做甚麼？ 張東蓀 五
- 張東蓀先生的思想 林布 二
- 先秦的輿論力量和民主作風 錢健夫 四
- 從歷史看民變 胡里 九
- 中西文化的衝突與匯合 馮契 二
- 戰時的昆明勞工 陳達 六
- 略論娼妓 汪靜遠 一
- 關「法利賽人」對於「五四」的曲解與蒙混 夏康農 一
- 關於男女分校 施克 七
- 關於高中畢業會考的討論 伯迦 一
- 胡適的昨日與今日 伯迦 〇

目前的學生運動
學生運動是季世現象嗎？
學潮壓制得了嗎？
大學潮與真民意

六 通訊

台北二周記
南京見聞
大局逆轉以後的昆明
塞上五日行
今日張家口
傅作義治下的察哈爾
美軍是這樣撤出中國的！
北平瑣記

「五四」在北平
華北人民的苦難
烽火中的東北
記成都搶米風潮
英國人與緬甸
周炳琳講「南行所見」
張東蓀談華萊士和平運動
張東蓀講「最近時局」

七 文學·藝術

文藝的功用
藝術形式的變革
何為美
小說中的「光」與「熱」
笛福和他的「魯濱遜漂流記」
木刻藝術的前途
電影批評的真實性與人情味

八 人物評介

呼吸英雄的氣息
聞一多的一生
羅曼羅蘭的道路

向曉	馮契	周天行	蔡尙思	胡帝	柳逢仙	俞仲	胡笛	胡笛	胡笛	辛揚火	冶秋	辛揚火	陳際雲	上官北斗	陳納	蕭草	辛揚火	胡笛	辛揚火	林煥平	陳曙風	周繼善	林海	楊晦	李樺	洪深	陳石銘	吳晗	楊晦	
四	八	一	二	三	四	四	六	七	八	八	九	〇	二	二	一	一	九	二	二	四	二	七	五	二	一	〇	五	六	六	五

九 散文·雜感·隨筆·詩歌

英雄的夢	幫忙與扯淡	儒術途窮	一種可貴的精神	叔孫通之流的業績	試論英雄	過河小卒和殺盡芸香	悲哀	董·吉訶德哲學	「三一八」的重演	沙汀樓雜文	近事雜感	大時代的小感觸	是誰破壞了社會秩序	寓言二題	夜讀散記	民歌的一刺	歌唱起來	踏進毛房去拉屎	控訴	我好像到了一個鬼世界	願雨點快些灑下	新小上坎	無錫二日遊	「這是美國」	四季如春的加州	舊金山	張文元、米谷、洪荒、尼龍、穆企、曾景初、葉苗、沈同	衡、所亞、許志家、白木、甘草	李樺、納維、阿揚、黃永玉、朱鳴岡、立熹、樹之、甫登、漾兮	
鳳子	流金	于冰	以羣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歐陽牧堂
四	四	五	五	六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對峙

創刊號

近五十年來中國之政治……周谷城

中間派的政治路線……施復亮

經濟崩潰與經濟政策……伍丹戈

原子彈戰爭是可能的麼……蔡鴻幹

1

論莫斯科會議……張明養

看國民黨的三中全會……程程

歌唱起來……臧克家

踏進毛房去拉屎（詩二首）……馬凡陀

漫畫（三幅）……張文元·米谷

木刻（二幅）……李樺



行銀豐怡

務業切一行銀業商營經

實扶
業助

社服
會務

號二衙府二路生民慶重 行總

號七六四路西江海上 行分
號一〇一〇二話電

單被隆天



方大觀美 惠實濟經

品出版織染隆天

號一一路西大 廠造製 室五二三號一五路東廣 所行發
五六六三二話電 五五四一話電

目價告廣

插	封底內	封底	封內	地位篇幅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
五十萬	六十萬	九十萬	六十萬		卅五萬	二十萬	
卅五萬	卅五萬	五十萬	卅五萬		二十萬	十萬	
十五萬	二十萬	三十萬	二十萬		十萬	五萬	

時與文週刊

發行人 程博洪
編輯者 時與文週刊社編輯部
經理部 上海粘嶺路三十四號
電話 九〇二一九

本刊稿約

- 一 本刊為綜合性質，凡有關政治、經濟、社會、哲學、文學、藝術等類論文以及散文、雜感、通訊、漫畫、木刻、照片、人物評述、書報評介、文化動態各項稿件，均所歡迎。譯稿請附寄原文，或詳註原文出處。原文除有直譯價值者外，最好摘要譯述。
- 二 來稿以有創造性，建設性，能深入淺出，較具體現實者為最所歡迎。
- 三 來稿請用稿紙繕寫清楚，并加標點符號。請勿兩面及用鉛筆書寫，以免排字錯誤。
- 四 來稿請勿過長，最好在五千字以內，以便一次登完。
- 五 尊稿如已先在他處發表，請勿再投本刊。
- 六 稿末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住址，以便通訊。發表時署名聽便。
- 七 來稿如決定採用，不俟發表，立即從優致酬。
- 八 來稿登出時，即將登載該稿之本刊寄贈一份。
- 九 來稿請寄上海粘嶺路三十四號本刊收，寄遞時并請用快信或航掛，以期迅速穩妥。

近五十年來中國之政治

自前清光緒二十四年，亦即公元一八九八年，所謂「戊戌維新」以來，直到今日，整整五十年了。這五十年內，中國的政治，無論失敗或成功，都能給我們一種教訓。

(一)

戊戌維新，是當時的進步勢力促成的。當時的進步勢力，凡包括較為重要的三個方面。一是滿清貴族中的進步分子，如光緒帝本人，即是唯一的代表人物。二是進步的官吏，如湖南巡撫陳寶箴，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及其子翰林院編修徐仁鑄與徐仁鏡，吏部主事陳三立，內閣學士張百熙，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齡等，都是很有名的。三是書生，這以康有為，梁啟超，康廣人，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等為代表；這些人在維新時期，雖都各有一個官兒，但畢竟以排入書生一列為是。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戊戌政變記說政變之原因，即強調書生勢力曰：「康有為既上書求變法於上，復思開會振士氣於下，於是與……等開粵學會，與楊銳等開蜀學會，與林旭等開閩學會，與楊深秀……等開陝學會。京師士夫頗相應和。於是會黨期近，公車雲集；御史李盛鐸乃就康謀，欲集各省公車開一大會，康然之，是為保國會議之初起。……自明世徐華亭集士大夫數千人，講學於靈濟宮，至今三百餘年，未有聚大眾於輦轂為大會者；此會實繼之。守舊之士，頗駭其非常。」

路，與農學，設農工商總局等，都是屬於經濟方面的新政。裁撤多餘的機關，如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祿太僕鴻臚諸寺，以及擢拔維新人物等，都是屬於政治方面的新政。練洋操，水師，設製造槍礮廠等，都是軍事方面的新政。不過維新派開始施行新政之日，即舊派加緊反對之時。舊派以慈禧太后為中心；有直隸總督榮祿統率董福祥之甘軍，聶士成之武毅軍，袁世凱之新建軍，駐在畿輔為之保鏢；其餘反對維新之舊勢力，滿朝皆是。結果舊勢力一時抬頭，維新派失敗。

(二)

不過舊勢力的抬頭，維新派的失敗，并不是定局。隨着維新派失敗之後的，便有辛亥革命。前清宣統三年，即公元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這個成功，得力於較為重要的六種勢力。一是進步的文武官吏；革命爆發之時，各省文武大員，多通電響應。二是國外留學生；這相當於戊戌維新時公車上書的書生；不過書生是舊式讀書人，留學生則是到國外學習西政西藝，吸收新知識的新人物。三是華僑；這中間會黨也有，帶着小本出國經商的也有，最大多數為以出賣勞力起家的人。四是會黨；會黨是明清之際傳下來的老革命黨；其中工商農學各界都有，而以失業的工農為最多。五是新士兵；會黨中人與新士兵性質頗為相近，且常互通聲氣；鄭士良常受孫中山先生之命，結納會黨，聯絡營防一，廖仲愷等更常受命聯絡新兵，以為革命之助。六是新萌芽的資產階級；川粵湘鄂幾省的保路同志會會員，屬於這一個範圍。

辛亥革命，富有民主意味；其臨時約法關於人民之自由及權利等，明白規定云：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搜查、或處罰；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搜查；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人民有書信秘密之自由；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依臨時約法做下去，中國有走上民主政治之路的可能。但創造民國之活動初告成功，而毀壞民國之活動隨着發展。初有袁世凱之帝制自為；袁在滿清政府中是軍首領，當革命爆發之後，即以這個資格操縱於清廷與民國之間，終於騙到中華民國的臨時總統職位。自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鎮壓二次革命以後，直到四五年間（一九一五—一六年），乃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自稱皇帝。自此以後，繼起的軍閥中有張勳，於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擁清廢帝宣統復辟；復辟一幕過去之後，南北完全分裂，軍閥勢力幾於瀰漫全國。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以後至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八年）時代，軍閥實為中國之最高統治者；他們勾結帝國主義，蹂躪民國；孫中山先生所手創的中華民國，就完全毀滅於他們之手。

(三)

不過軍閥的橫行，民國的失敗，也非定局。當軍閥勾結帝國主義蹂躪民國之時，反帝國主義與打倒軍閥的運動也正在發展。這一發展，到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的前後，呈突飛猛進之狀。首先有國民黨的改組；黨改組了，紀律嚴明了，黨的領導作用更能充分發揮。其次國民黨採行了聯俄聯共的政策。革命成功後的蘇俄，首先以平等原則對待中國，故聯俄一事，於反帝國主義及軍閥很有幫助。至於共產黨，係以領導農大衆為職志的，能與國民黨共同從事於反帝國主義及軍閥，新興勢力，突見增大。又其次國民黨與



共產黨合作，共同採取了直接領導農工的政策。聯俄聯共及領導農工，名曰三大政策。且農工大衆參加反帝國主義及軍閥的運動，這是與辛亥革命後革命運動特別不同的一點。辛亥前後參加革命運動的諸種分子，在民十三（一九二四年）以後的反帝國主義及軍閥的運動中，固然一樣活躍；但民十三以後參加反帝國主義的工農，在辛亥前後的革命運動中却不多見。

反抗運動的分子增加了，反抗運動的目標也隨着擴大。民十三以前反抗的目標，偏重對付軍閥；民十三以後反抗的目標，則並重對付帝國主義及軍閥。關於這一點，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云：「吾人所指為中國生路者，其一，對外當打倒帝國主義。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聯合世界之先進國，二曰聯合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三曰聯合帝國主義者本國內大多數被壓迫之人民。其二，對內當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之工具；首為軍閥，次則官僚士豪買辦階級。其必要之手段，一曰造成人民的軍隊，二曰造成廉潔的政府，三曰提倡保護國內新興工業，四曰保障農工團體，扶助其發展。凡此對內對外之手段，約而言之，即總理遺囑所謂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也。此於中國之現狀，為對症發藥之救治。」這目標是極正確的。依此目標，國共合作奮鬥，再加外有蘇俄的幫助，內有工農的興起；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運動本應澈底成功，富強康樂之中國本應早已實現。不料當民十六（一九二七年）北伐尚未告成之時，內部糾紛即已發作。向來不贊成聯俄聯共及領導農工等三大政策的人站在一邊，往南京走；繼續堅持這三大政策的人站在一邊，仍留武漢；於是有所謂寧漢分裂。北伐工作，雖於民十七（一九二八年）勉強做到東三省易幟，算作成功，寧漢兩方，後來雖也宣告合作，然而擁護三大政策的，與反對三大政策的，却澈底分裂了；且隨着便是剿共十年。國家的元氣，在剿共十年中，不知損了多少。

。直前西安事變發生，局勢才為之一變。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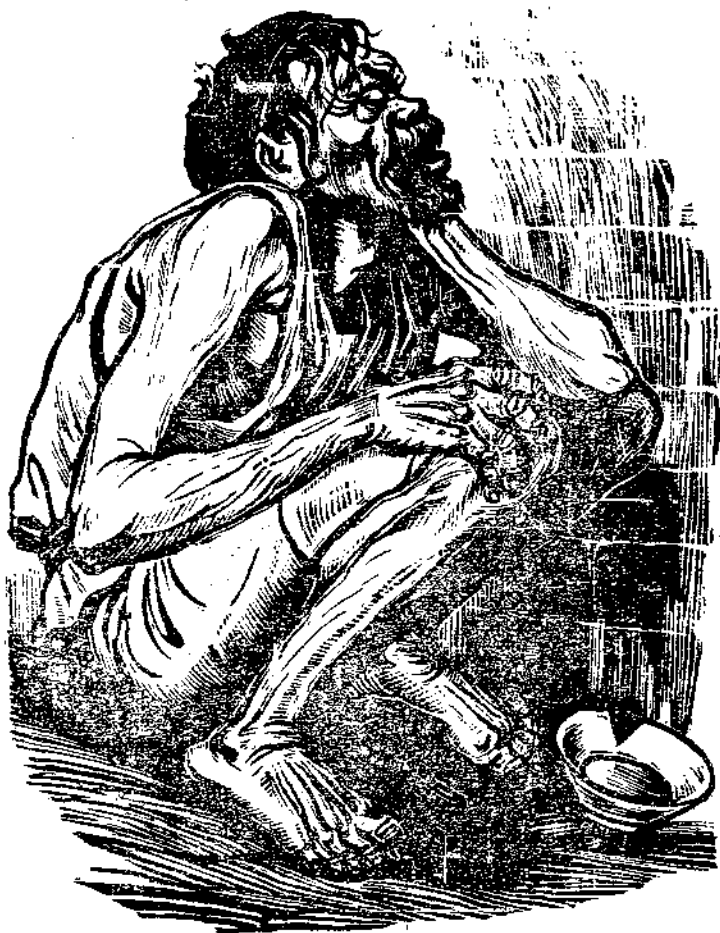
自日人發動對華侵略以後，中經西安事變，至蘆溝橋戰事爆發，可以說是抗日聯合陣線的創造時代。自蘆溝橋戰事以後，國共便是併肩作戰的。八年抗戰，終告成功。大望以為在抗日戰爭之中能够併肩作戰的國共，在抗日成功之後定能共同建國。誰知日人投降之日，國共兩黨之間，因受降問題，又發生糾紛。幸而彌縫得早，中共領袖毛澤東飛到重慶與蔣主席會談，結果頗好；不久之後，便有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政治協商會議之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凡包括五方面：一是國民黨，二是共產黨，三是民主同盟，四是青年黨，五是社會賢達。就社會階級言，代表社會各階級的都有；至於政治主張，由極左到極右的都有。

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五大決議案：一是關於政府組織的，二是關於施政綱領的，三是關於軍事問題的，四是關於國民大會的，五是關於憲法草案的。以意見極不易一致的會議，解決了內容極複雜的許多問題，終於製出關於創造和平民主與團結統一的許多決議案；其成功之大，可以說是空前的。但政協成功之日，就是政協破壞之時；政協決議案之實行，并非易事。自國民黨單獨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以來，政協精神便已遭受破壞。

和平民主團結統一部未實現；截至今日為止，政協精神能有幾分實現，尚在未定之天！

(五)

五十年來政治變遷之大勢，約略如上；其中失敗與成功，幾乎結了不解之緣；成功之後，緊接着的就是失敗。戊戌維新成功剛四個月，慈禧所領導的反動勢力便接着起來；反動的統治，一連便達十餘年。辛亥革命成功一年以後，接着便是袁世凱及袁以下的軍閥統治；軍閥統治也達十餘年。北伐勝利尚未完全獲得之時，北伐勢力之內部便釀出寧漢的分裂；後來寧漢雖然合作，北伐雖然成功，而國民黨與共產黨却澈底分裂，接着便是剿共十年。自抗日戰爭發動以後，國共又復合作，併肩作戰，以抗強敵。日人投降之時，



生的苦惱(木刻)

李樺作

國共兩黨雖因受降問題發生衝突；然纏綿得早，終於有政治協商會議之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開成，而且得有具體的協議；宜乎祇有成功，不會失敗；然而不然：不僅沒有成功，而且內戰呈空前劇烈之狀。

在這樣成功與失敗交替的五十年中，國人所要解決的兩個最大的問題，無法解決。所謂兩個最大的問題，即中國現代化之完成，與中國民主政治之建立是也。中國之現代化，自會國藩李鴻章等於同治初年（一八六〇—一七〇年）上疏主張利用外國機器時，即已開始。戊戌（一八九八年）維新運動之時，滿清政府會明令要築鐵路，要設路礦學堂以培植築路採礦的人材，要於京師設農工商總局；也都觸及了現代化之重要工作。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自著建國方略，力言希望各國投資開發中國產業，并主張平均地權，發

苦笑(木刻)



李樺作

展國營實業，及築鐵路一萬二千里；也無非是謀中國之現代化。然而時至今日，中國並沒有現代化，中國的產業革命並沒有完成；現代中國之最大特徵，幾乎就是「不現代」，或「沒有現代化」。

至於民主政治的主張，早在戊戌維新時代，即已萌芽。康有為雖不懂得什麼叫民主，但他却曉得政事不能由皇帝專斷，故主張設制度局以爲議政機關。辛亥革命時，臨時約法裏更明白規定「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有書信秘密之自由；有居住遷徙之自由；有信教之自由」。這更是民主的具體規定。後經北伐前後反帝國主義及反軍閥的激進，民主的要求更見高漲。直到最近過去的政治協商會議，人民的權利，又復詳細規定一番。政協決議和平建國綱領草案二項便曰：「確保人民享有身體，思想，宗教，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遷徙，通訊之自由。現行法令有與以上原則抵觸者，應分別予以修正或廢止之。嚴禁司法及警察以外任何機關或個人有拘捕審訊及處罰人民之行為，犯者應予懲處。政府已公布之提審法，應迅速明令施行。保證婦女在政治上，社會上，教育上，經濟上地位之平等」。民主的要求雖然迫切，民主的主張雖然鮮明，民主的規定雖然完備；然五十年來，國人所得者，一無所有；民主政治並沒有影子！

(六)

不過失敗之中，常醞釀着成功的因素。舉其要者，共有三項。一曰進步勢力之擴大。戊戌維新時，進步勢力，限於少數官吏，及出身於地主階級的舊式書生。辛亥革命時，範圍擴大了，除這兩種人仍有參加者外，增添了華僑與會黨兩種重要份子；新軍士兵，也有參加的；至於留學生，更是主力。直到北伐時代，因國共兩黨合作，採行農工政策，有組織的農工大衆，參加北伐；進步勢力一時突增。幾十年來，進步勢力，由極少數的官吏與地主階級中之幾個進步份子，擴充至於極大多數的農工大衆，不可謂不是成功。二曰革命目標之顯明。戊戌維新時，新派所要去掉的，除譚嗣同要去掉所謂老頑固慈禧太后外，幾乎沒有其他的目標了；整個滿清統治階級，並不是他們所要去掉的。辛亥革命運動便不同了，革命運動的本身，甚至於被稱爲排滿的革命，所要打倒之目標較維新運動顯明多了。然而也祇限於排滿；如章太炎輩，幾乎即以滿清退位爲革命成功。到北伐時代，革命目標，更爲顯明。對外爲打倒帝國主義；對內爲打倒帝國主義之工具，首爲軍閥，次則官僚土豪買辦階級。以軍閥及帝國主義爲革命的目標，同時又把這兩者的關係弄得清清楚楚，確認軍閥爲帝國主義之工具，這是幾十年來政治運動空前未有之大成功。三曰人民大衆決定作用之發揮。在戊戌維新時代，新派人物的活動，限於幾個領袖自身。辛亥革命時代，發生決定作用的，最重要者，爲留學生之宣傳，會黨之拚命，華僑之捐款。北伐時代，農工羣衆，在國共兩黨合作領導之下，對於北伐的進行，頗能發生作用，如勞軍，如引路，如供給糧食等等，成績都好。抗日戰爭時代，出充壯丁，供給軍糧的，固然是大衆；而淪陷區內，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農民，與敵偽作戰，更發揮了大衆的決定作用。直至今日，中國政治應該如何，頗非舞台上幾個巨頭所能決；真正發揮決定作用的，仍爲多

中間派的政路線

——亮復施——

政協的路線，雖然曾經為各黨派所一致同意，符合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但在本質上，却是一種中間性的或中間派的政治路線。因為在今天中國的客觀條件之下，只有中間派的政治路線，在客觀上才足以代表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整個國家的真實利益；所以中間派的政治路線，是今天中國最可能為多數人民所擁護的政治路線。

何以見得政協的路線在本質上是中間派的政治路線呢？根本上是因為政協的路線是一條企圖用和平合作的方式來實現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經濟工業化的政治路線，完全跟中間派所代表的中間階層的歷史任務相符合，而且跟中間派的政治鬥爭的方法和態度相一致。中國中間階層的歷史任務，是要建設一種新資本主義的經濟（我過去曾經稱它為民生主義的第一階段）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而其鬥爭的方法和態度又是和平的、漸進的，在本質上而且是改良的。政協所通過的五項決議，完全符合中間階層的歷史要求；政協所採取的方式，更是中間階層和中間派所最歡迎的方式。所以我們說政協路線在本質上是中間派的政治路線。

正因為這樣，那個代表官僚買辦資本家和大地主利益的統治集團，才會堅決地反對政協路線，撕毀政協決議，繼續進行內戰，企圖以武力征服「異己」，保持既得的利益和權力。另一個代表工人和貧農利益的革命集團，也就隨同拋開政協路線，以武力對抗武力，企圖以武力擊敗它的反對者。這就是今天國共兩黨一致拋開和平合作的政協路線，繼續利用武力從事政爭的客觀原因。一則因為國共兩黨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根本衝突，二則因為國共雙方都擁有強大的武力，所以才有這種違反全國民意（特別違反中間階層的意志）的殘酷無比的武裝的政爭——內戰。在這內戰猛烈進行的時候，只有中間派及其代表的中間階層，才是真正擁護政協路線的人，希望國共雙方立即停止內戰，依舊根據政協的精神，原則和方式來解決當前一切政治問題。政協路線的本質，在內戰中已經很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倘使內戰長期繼續下去，中國問題只有依靠武力來解決，那末中間階層和中間派在中國政治上都不會有重要的地位，也不會起什麼獨立的作用。在內戰繼續進行的期間，中間階層的絕大部份，勢必要被迫參加這一邊或那一邊去進行違反自己意志的內戰，被迫喪失自己的中間階層的地位，甚至被迫犧牲自己的生命和財產。中間派的民主人士，在這種時候也很可能向左右兩端分化，有的投靠國民黨去求取「一官半職」，有的追隨共產黨去從事暴力革命，有的心灰意冷不問政治；只有極少數人纔能保持原來的中間派的政治立場。所以內戰對於中間階層和中間派，有百害

數人民。即如美國軍人要在中國助長內戰，助長至如何程度，亦必以中國人民反抗至如何程度而定。幾十年來的政治鬥爭，頗培植了廣大的人民羣衆的政治覺悟；廣大人民羣衆的向背，成了最後的政治決定力。今人論政，常言奪取羣衆。羣衆而值得奪取，這是失敗的政治運動中的成功。

（七）

至於今日所要解決的問題，仍是五十年來所未解決的兩個老問題：一曰現代化之完成，二曰民主制之確立。這兩者是互為因果的。中國之現代化，亦即產業革命，如果澈底成功；則民主政治，至少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必然出現。反之，在現階段中，民主政治，却成了完成現代化之最基本的條件；建立不起民主政治，休想談中國之現代化。中國之現代化，祇能在民主的政治環境之下進行。今日的中國，不但沒有民主的政治環境，根本沒有政治環境。所有的祇是內戰，祇是獨裁，祇是對立。在這種環境之下，人力物力，盡毀於戰爭。糧食是養命的，養活一條命，又把這條命拖到戰場上去送死！勞動本是生產的，戰爭的進行，却要把牠從生產過程中拖到戰場上去毀滅！人力物力，是中國現代化之要素；兩者都毀滅了，還有什麼現代化可言。

去年政治協商會議開成，作成五項決議，對於和平民主團結，有具體的規定。倘一一付諸實行，則中國現代化所必需的民主的政治環境，可以造成；中國之現代化可以暢快發展。不幸政協決議未能付諸實行，和平民主團結的政治環境，終未出現；整個中國之現代化或產業革命，無法進行了，眼看着中國人的生存機會，日縮日小。今後國人不想生存則已；如想繼續生存，則努力的方向，仍祇有一個，曰造成和平民主團結的環境是也。

而無一利；站在中間派的立場，在任何情形之下都非反對內戰不可。反戰是中間派的基本態度。只有在內戰停止，和平恢復之後，中間派的政治路線才有實現的可能。

國民黨統治集團目前所執行的政治路線，顯然是堅持一黨獨裁的反政協的反民主的政治路線。這一政治路線至少有下列幾個特點：第一，在階級關係上說，只代表官僚買辦資本家和封建地主（特別是大官僚資本家和大地主）的利益；第二，越頑固越反動的集團和份子，在黨內越佔有勢力，越能控制黨政軍的大權；第三，以武力維持政權，並企圖以武力消滅「異己」（主要是中共）；第四，在國際和國內的民主高潮之下，企圖拉攏幾個既無羣衆基礎又無政治操守的小黨派和「社會賢達」來改組政府，偽裝民主，藉以欺騙國內外少數不明真相的人士；第五，堅持一黨法統及其所制定的「憲法」，強迫全國人民及一切民主黨派接受，企圖根據這一法統和「憲法」來實行它所能控制的「憲政」，依舊保持一黨專政的實質；第六，在對外關係上，完全依賴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一切「唯美是賴」，「唯美是從」，甚至不惜把中國逐漸變成美國的保護國或殖民地。這樣的政治路線，無疑地是違反整個國家利益和絕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政治路線，也是違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革命傳統的反動的政治路線，無論如何是走不通的。假使國民黨統治集團始終要堅持這種反動的政治路線，那就勢必要逼迫共產黨採取革命的政治路線（因為今天中國還只有共產黨是唯一有力的革命的政黨），並且會逼迫中間階層的羣衆逐漸走向革命的政治路線。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反動的統治，都不可能長久支持下去；結果不是自己崩潰，就是促成革命。在今天中國具體的條件之下，假使國民黨統治集團越要執行違反民意的反動政策，其結果只有越發促成中共革命勢力的發展和中共革命的成功。

詩二首

馬凡陀

踏進毛房去拉屎

踏進毛房去拉屎，
忽然忘記帶草紙。
袋裏摸出百元鈔，
擦擦屁股蠻合式。

你叫我

你叫我如此如此，
你叫我這般這般，
你叫我東就東，
你叫我西就西。
如今你害得我好苦，
可還是不把錢給我，
啊喲喲，這種日子呀，
叫我怎麼過！

所以在中共方面，決不害怕國民黨統治集團採取反動的政治路線。從理論上說，中共是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政黨，以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為其歷史的任務。原來中國無產階級，無論從數量上看或從質量上看，都還不是一個強大的政治力量，不可能有這樣強大的共產黨。可是中國共產黨居然強大到足與國民黨分庭抗禮的程度，一半固然由於他們自己的艱苦奮鬥，一半也是靠着國民黨統治集團的不斷幫忙。國民黨政府不能完成反帝國主義和反對建勢力的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特別是不能實行土地改革這一歷史任務，以及動輒以「紅帽子」套在別人頭上的愚蠢作風，是促成中共勢力不斷擴大的重要原因。中共知道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當前政治上和經濟上最重要的工作是組織農民和土地改革；所以它就用全力來從事這兩項工作，以致有今天這樣強大的力量。今天的中共，實際上已成了一個以農民為中心的政黨，至少在解放區已經獲得大部份農民的支持。中共今天之所以不主張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願意支持政協的路線，固然由於它的領導者對於中國歷史的發展具有正確的認識，但也有一半由於它的這種羣衆基礎。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羣衆基礎是無產階級的產業工人（即近代工廠工人），決不是小資產階級的或小生產制下的農民。中共能夠同意政協路線的客觀原因，就在這裏。中間派能夠與中共合作的社會基礎，也在這裏。但若國民黨統治集團一定要用武力去消滅它，不許它的力量存在和發展，那就要逼得它走向暴力革命的道路，逼得它使用任何手段來保衛自己，打擊對方。萬一內戰長期繼續下去，它所採取的政策也很可能逐漸左傾，以穩定自己的基本羣衆。如果在內戰中最後由它獲得決定的勝利（這個可能性是有的），那就可能建立一種以它為中心的政權，可能實行種種更進步更澈底的政策來改革原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比起政協路線，不僅有量的不同，可能有質的不同。不過這一前途，據我看來，至少在十年或

十數年以內還是不可能的，而其犧牲破壞之慘重，更非我們所能想像。中間派及其代表的中間階層，實在不願有這樣的前途。

現在和平的門已經完全關閉，空前殘酷的內戰勢必要加緊地進行。國民黨統治集團似乎已有「孤注一擲」的決心，企圖於一年內用優勢的武力去達到「消滅中共」的目的。在中共方面，也似乎已經放棄和平的希望，決然「以武力對抗武力」，企圖以自己的武力去擊潰對方的武力。在這種劇烈的武裝鬥爭的情勢之下，好像只有兩個武裝的政黨才能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一較短長，非武裝的中間派是無能為力似的。甚至有些一向反對內戰的中間派人士，看見目前內戰無法停止，竟憤而發出絕望的呼聲，主張索性痛痛快快地打一下，趕快分出一個勝負高低來。這是中間派的苦悶，同時也是中國人民的不幸。

的確，假使內戰能够在短期內分出一個勝負高低，無論由哪一方面擊潰另一方面，其結果也都能恢復和平，建立秩序，獲得暫時的或長期的安定。這是一種既不問歷史發展的規律，也不問多數人民的要求的，無原則的絕望的想法。可憐這種想法，在今天也是不能實現的。當前中國的內戰，由於國際國內的具體複雜的條件，如果不能在短期內因國際民主的壓力和國內人民的反抗而停止，便很有可能長期化，決不可能在短期內分出真正的勝負高低來。國共兩黨的地位，都各有其優點和弱點；這些優點和弱點，大體可以互相抵消而獲得平衡的地位。為求更進一步的了解起見，我們且把雙方的情形作一簡單的分析。

首先，我們說一說國民黨方面所佔的優點。第一，它在國內是處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它擁有整個中央政權和大部份地方政權，它所控制的區域是城市和較富庶的省份，它有二十年的統治經驗和龐大的統治機構，它享有政治上、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和 cultural 上的種種特權，它自命為今日中國唯一合法的執政黨和唯一合法的政府。第二，它在國際上被認為今日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有權代表國家參加各種國際會議，跟各國發生外交關係，獲得外國特別是美國的軍事的財政的和經濟的援助。第三，它的軍隊不僅數量超過中共，而且裝備和補充也遠非中共所能比擬，運輸軍隊的新式交通工具更非中共所能獲得，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飛機、軍艦和龐大的特務組織。但是它有一個最大的致命的弱點，由於它二十年來腐敗無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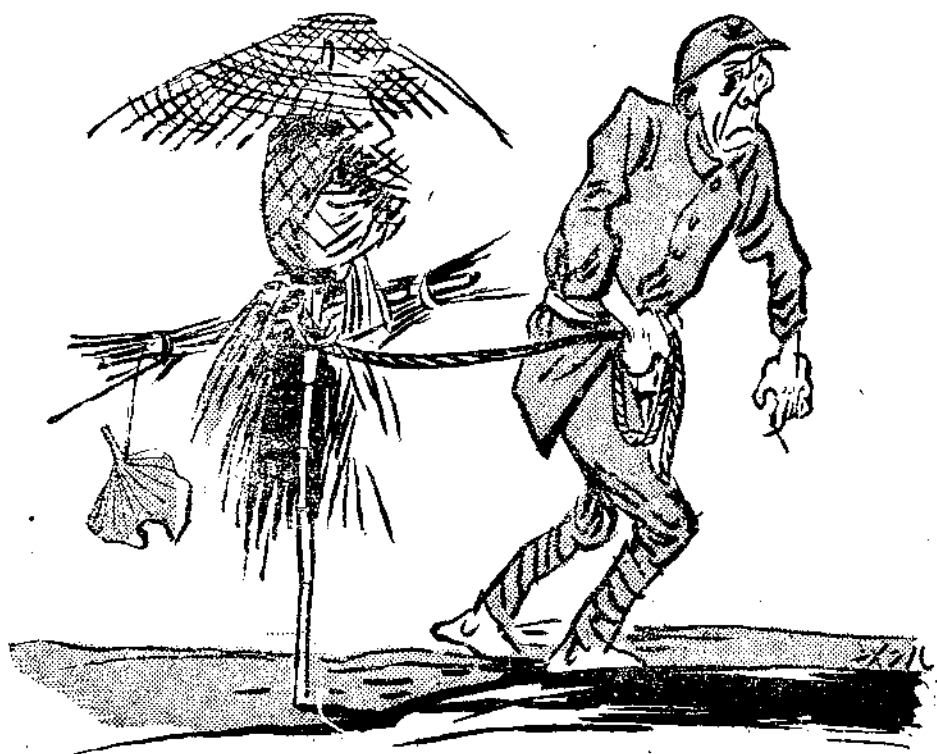
的統治，特別是由於一年多來內戰獨裁的政策和種種壓榨人民的行動，幾乎已經失盡了民心，使絕大部份人民都對它失望，不滿和怨恨。這一個弱點，可能抵消上述三個優點。我們知道：無論國內或國際所承認的合法政府，都可能由於失掉民心而變成不合法的政府，何況國民黨政府的所謂「合法」根本只是「合」它自己一黨的「法」，並沒有任何民主的基礎。其次，我們還知道：失掉民心的政府，必然會產生失掉軍心的軍隊，雖有優良的裝備和補充也不能發揮其應有的效果。因此，內戰如果長期繼續下去，對於國民黨政府絕無利益可言。

反轉來說，中共的優點和弱點，剛剛跟國民黨的相反。中共之所以能够在種種不利的物質條件之下不斷擴大它的力量，甚至能够不斷消滅國民黨的武力，其根本的原因是在於它能够獲得當地廣大人民（主要是農民）的支持及其士氣的旺盛。因為中共是一個革命的政黨，跟革命的羣眾結成一氣，所以能够克服種種不利的物質條件，從艱苦萬分的環境中生長起來，壯大起來。一個革命的政黨，只要它能够真正代表多數人民的利益，獲得多數人民的支持，最後必然能够使自己從不合法的地位轉變為合法的地位，不僅能够獲得國內人民的承認，而且能够獲得各國政府的承認。各國革命的歷史，都證明這一點；國民黨過去革命的歷史，也證明這一點。今後中共革命的歷史，也可能證明這一點。創造歷史的是人民，創造法律的也是人民。問題不在於今天中共是否合法，而在於它的政策和行動是否符合今天中國多數人民的利益。在這裏，有一點我們是可以斷言的，就是倘若內戰繼續下去，對於中共是比較有利的，至少在目前的客觀條件下可以這樣說。歷史的發展，儘管走着迂迴曲折的道路，但是最後總是走向進步的方向的。代表進步力量的政治集團，一定會有它的光明的政治前途。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下一斷語：如果拋開人民的痛苦和國家的地位不談，內戰倘若長期繼續下去，有利於共產黨的成份可能多於有利於國民黨的成份。為着減輕人民的痛苦和保持國家的地位，固然應該立即停止內戰；就是為着保持國民黨的利益和地位，也應當立刻停止內戰。中共不是不願意停止內戰，只是要求國民黨接受它所提出的兩個先決條件——即恢復一月十三日停戰協定生效時的軍事位置和取消違反政協的憲法。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既然是國共兩黨過去所一致同意共同簽字的文件，

也是雙方妥協合作的共同基礎，自然應為雙方所共同遵守。如今中共的要求，只是要恢復這兩個協定原有的效力，自然不能說它過份。倘使國民黨當局不想始終破壞政協路線，不想讓自己走到絕路上去，我相信總有一天會用一種適當的方式去接受中共上述的兩個條件的。中國的內戰雖有長期化的可能，但同時也有於一年半載內停止的可能，而且後一個可能性是更大的，因為國際和國內都有不少促使內戰停止的因素存在。

先就國際情勢來說，實不可能讓中國內戰長期繼續下去。因為中國內戰倘使長期繼續下去，勢必要危害整個世界的和平，損害各國在華的利益（特別是美國的商業利益）；列強為着世界的和平和自己的利益，必然要出來勸告、調解甚至干涉。最近國際情勢已見好轉，美蘇矛盾已見緩和，全世界人民均厭惡戰爭，渴望和平，可能由於國際的和平民主的壓力而促成中國內戰的早日停止，和平民主的早日建立。三月十日莫斯科所舉行的四國外長會議，可能正式或非正式地討論中國問題，勸告中國停止內戰，恢復和平，建立包括全國各民主黨派的統一的聯合政府；並相約撤退一切在華的外國軍隊，停止一切足以助長中國內戰的片面援助。一年多來的中國內戰，美國帝國主義的片面援助實為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只要一切外國一律停止任何片面的援助，中國人民必能以自己的力量迫使國共雙方於最短期內停止內戰。即使這次莫斯科會議不能具有具體的合理的決定，我們也可以預測，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有具體的合理的決定。今後國際形勢的發展，至少不會朝向助長中國內戰的方向。



有人捉夜吏？

張文元作

再就國內情勢來說，也不容許內戰長期繼續下去。第一，國內絕大多數人民特別是中間階層的人民，絕對厭惡、反對內戰。經過八年抗戰痛苦的中國人民，不但不願意再進行毫無意義的自相殘殺的內戰，就是具有進步意義的革命的內戰也難鼓舞起多數人民的熱情。不僅國民黨統治區域如此，就是中共統治區域恐怕也只有程度的差別。雙方從事內戰的，被犧牲受痛苦的，直接間接的都是人民。人民忍受痛苦也有一個限度。到了大多數人民都活不下去的時候，必然會以行動來反抗內戰。第二，根據各種直接間接的報導，一致證明國民黨軍隊一般士氣都很差，甚至某些上級軍官對於戰爭前途也已失了信心。九十多名將級軍官和大批軍隊的被俘，就是最現實的證據。這種情形，今後不但很少改善的可能，而且還有日益惡化的趨勢。第三，在政治上，國民黨政府已無任何有意義有內容的政治口號或政治綱領足資號召，誰也不知道國民黨政府究竟為什麼一定要繼續進行這一無意義無前途的內戰。在北伐時期，國民黨能以少數劣勢的軍隊戰勝北洋軍閥多數優勢的軍隊，主要是由於政治上的原因，因為當時的國民黨，政治上還站在進步的和人民的方面。今天國民黨以多數優勢的軍隊不能戰勝中共少數劣勢的軍隊，主要也是由於政治上的原因，因為今天的國民黨，政治上已經站在反動的和反人民的方面。從表面上說，是軍事決定政治，從實質上說，還是政治決定軍事。第四，目前財政經濟的危機，已經日益嚴重化，深刻化，將要踏上總崩潰的境地。國民黨政府對於這種危機不能採取有效的辦法，已經從這次頒佈「經濟緊急

原因，因為今天的國民黨，政治上已經站在反動的和反人民的方面。從表面上說，是軍事決定政治，從實質上說，還是政治決定軍事。第四，目前財政經濟的危機，已經日益嚴重化，深刻化，將要踏上總崩潰的境地。國民黨政府對於這種危機不能採取有效的辦法，已經從這次頒佈「經濟緊急

措施方案」的行動中充分暴露出來了。處理經濟危機的最後的法寶都已經拿出來了，以後還會有什麼好辦法！但在事實上，倘使內戰不停，不僅這套法寶會馬上失了效驗，縱令美國的五億借款成了功，聯總的救濟物資和日本的賠償物資都能拿來利用，也決無法真正解救當前的經濟危機。據我個人的觀察，少則二三個月，多則五六個月，可能爆發出比這次更嚴重更普遍的經濟大危機、大崩潰，逼得廣大無數的人民都不能生活！到了那個時候，經濟的危機必然要加重政治的危機和軍事的危機，好戰份子即使再要繼續內戰也無法繼續下去了！第五，今天中共的力量還不能根本推翻國民黨的政權，而國內和國際的客觀條件也還不許它完全取而代之。倘使國民黨肯回到政協路線，它也決沒有堅持內戰的必要和可能。這也是內戰可以在短期內停止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樣看來，假使國內和國際的情勢沒有其他特殊的變化，我們的內戰還是可能在短期內（半年或一年）停止下來的。我們要加速停止內戰，第一，必須反對任何外國對於內戰的任何一方給予任何片面的援助；第二，必須加緊團結一切反對內戰的人民特別是中間階層的人民，繼續從事反戰的和平運動，要以廣大人民的力量，特別要以中間階層的力量去壓迫國共雙方接受人民的要求，儘速停止內戰，恢復和平，回到過去雙方所同意的政協路線。政協的精神、原則和方式，依然是解決中國當前政治問題的唯一可能的共同基礎。比這個更左，國民黨不願意；比這個更右，共產黨也不願意。在目前的具體的客觀條件之下，要解決中國問題還只有這一條正確而且可能的道路。

政協的五項決議，並不完全正確；尤其是關於國大問題的決議，已有事實證明它犯着嚴重的錯誤。將來人民的力量強大起來，自然應當根據多數人民的要求加以若干必要的修正。但是我們要知道：這條路線並沒有錯誤，它的精神、方式和基本原則也沒有錯誤。尤其是我們中間派和中間階層，特別要擁護這條路線；我們要依舊堅決地主張根據政協的精神、方式和基本原則來解決全部政治問題。

不過政協路線雖然是中間派的政治路線，但它僅僅是一個起點，並不會指出中間派的政治路線的全部過程。自然，我在這裏也無法詳盡地說明這一路線的全部過程。這裏我只想指出三點：第一，中間派所要建設的新

民主主義的政治，在形式上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決不許它成爲少數特權階級所獨佔的民主政治，必須把它變成爲多數平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進一步且須變成爲全體人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第二，中間派所要建設的新資本主義的經濟，在發展生產力方面，主張儘量利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各種優點以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迅速工業化，在調整生產關係方面，主張儘量革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各種弊端，採用進步的社會政策以保障勞動大眾的職業和生活。同時，爲着提高農業的生產力和農民的購買力，主張立即實施進步的土地改革。第三，在階級關係上，主張跟工人貧農合作，共同反抗官僚買辦資本家和大地主的壓迫；在黨派關係上，主張跟左翼黨派合作，共同制止右翼黨派的反動政策，但須保持自己的獨立的政治立場，不可無原則地附和左翼黨派的主張。中間派的整個政治路線和全部政治主張，都應當根據這三個基本原則來決定。只要中間派能夠始終堅持這三個基本原則，我相信中間派的政治路線一定能夠獲得廣大人民的支持，成爲當前中國唯一正確的政治路線。

但要實現這樣的政治路線，必須全國的中間階層在政治上形成一個強大的中間的政治力量，能够在國民黨統治集團與共產黨之間造成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只有這個力量，才能促成國共兩黨重新回到政協路線，才能保證政協決議的徹底施行和民主政治的真正實現。

三十六年三月六日。

本刊即將刊登

張東蓀：政協何以失敗
華羅庚：旅蘇觀感
吳清友：論殖民地工業化問題
蔡鴻幹：托爾斯泰眼中的拿破崙
馮契：中西文化的匯合與衝突
楊晦：笛福和他的「魯濱遜漂流記」
臧克家：民歌的「刺」

經濟崩潰與經濟政策

伍丹戈

當前的經濟崩潰狀態，一般都叫它做「經濟危機」，其實，這是錯誤的。因為，所謂經濟危機，是經濟制度本身產生的，也是商品經濟擴大之後的必然結果，每一個社會要在資本主義經濟發達之後，纔會產生經濟危機，它是一個歷史的範疇。至於那些由於政治原因產生的經濟惡化，民不聊生狀態，却決不是經濟危機，程度輕一點的可以叫做「經濟凋弊」，重一點的就是「經濟崩潰」。尤其是當前中國的經濟情形，我們更必須認定它是經濟崩潰，不是經濟危機（註一）。

當前經濟崩潰狀態，具體點說，是當局一貫的錯誤的，違反人民利益的經濟政策的必然結果。造成這種政策的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爲了維護少數特權階級的利益，不惜犧牲全體平民的利益；第二，爲了供應戰爭的需要，不惜消耗全國人民的經濟力量，使國民經濟到達最窮困、最枯竭的境界。

因此，我們第一步需要了解的

是中國的統治階級究竟爲那些階級服務？它的經濟政策又怎樣的受到外國帝國主義者的支配？怎樣的滿足它代表的某些階級的要求？又怎樣的犧牲其他階級的利益？

北伐以後的國民黨，無論在階級構成上和政治傾向上都和過去不同，都有了澈底的改變。過去它所認爲革命對象的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買辦，土豪，劣紳，和流氓，地痞，從這時期起，都認爲同志。它從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勢力，變爲服從他們，爲他們服務。過去的政綱政策，祇在形式上保留着，實際上却完全拋棄改變了。過去帝國主義者所享有的種種特權和特殊的經濟利益完全保留，並且更進一步的依賴他們；例如，向美國舉借有名的棉麥貸款，出售白銀，使美國從中國取得更豐厚的經濟利益；實行政幣政策，使中國加入英鎊集團，鞏固了英國在華的經濟地位。

國內財政經濟政策的轉變，更是顯著。

財政方面，是大量的發行公債

，使金融資產階級可以從中套取豐厚的利潤；是擴大關、鹽、統三種消費稅及其他種種地方附加稅，使全國的財政負擔的絕大部分都落在貧苦的人民大眾身上。

經濟方面是放棄過去所提倡的保護工農政策，最顯著的是停止實施二五減租辦法。代替它的却是征工築路，以及其他對於人民並沒有必要祇有利於少數特權階級的經濟建設，如建築塘江大橋以及官衙之類。此外，並成立了一四行兩局，打定了官僚資本的金融基礎。

另一方面，卻進行着劇烈的「剿共」戰爭。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破壞了農業生產。

在這種政治經濟局面下，對於國民經濟的損害，是很深刻的。最顯著的是階級分化過程的加速進行；平民大眾日趨貧困，農村凋弊，大量失業以及小資產階級破產；另一方面，財富集中過程也在加速進行。從這時起，開始發展了官僚資本，它又和買辦資本，金融資本，及地主勢力聯合起來，形成了佔有全國大部分財富，操縱全國金融工

商農業的剝削集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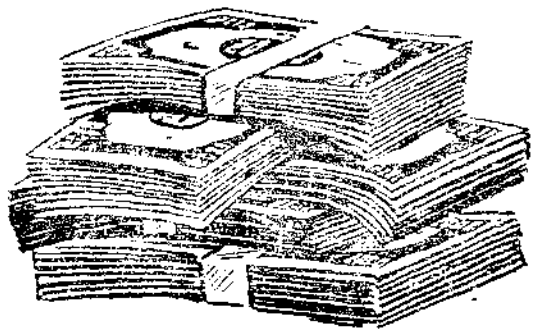
不過在這時候，內戰雖然劇烈，但還是局部的，而且在性質上還祇是軍事戰，沒有經濟戰，因此，國民經濟雖然受到相當的損害，但並沒有崩潰，這祇是經濟凋弊。

真正的經濟崩潰過程是在全面抗戰之後開始的，經過八年來長時間的、大規模的破壞，以及有系統的、有組織的經濟剝削與侵蝕，使國民經濟達到了經濟崩潰的境界，而在勝利以後，接着又開始了空前規模的、全面的、動員全國人力物力的內戰，這纔爆發了極顯著，極嚴重，極深刻的經濟崩潰現象。因此要了解當前經濟崩潰現象，必須從戰後的經濟政策及經濟措施的分析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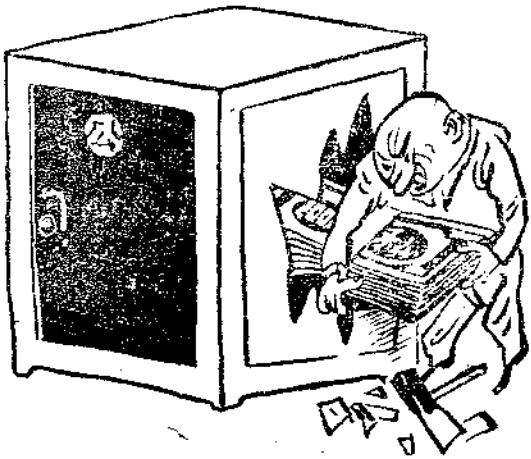
二

假定不是抗戰和內戰，經濟崩潰現象是不至於這樣快就產生的，慢性的經濟凋弊，結局雖然也可以使經濟崩潰，然而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是大規模的戰爭，纔加速了經濟崩潰的行程。

(一) 法幣



(二) 法幣



，要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要籌措大量的戰費，而且是對於生產，物資，人力的大量的，大規模的破壞，所以單是戰爭本身，就是促使國民經濟崩潰的一個重大因素；再加上中國政權的性質，它不但不能使它所代表的階級吃到戰爭的虧，還要借戰爭，從中漁利。這就使中國的人民大眾受着雙重的剝削，而且，因為統治階級祇顧本身利益，不惜破壞經濟組織和農民生產，這對於國民經濟的損失，雖然是無形的，然而却是最嚴重的。

從事戰爭，必須籌措大量的戰費，所以我們首先要說的是戰時財政政策。

戰爭開始之後，當局雖然提出了一「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口號，但這個口號始終沒有實行，實行的是有錢的不出錢，反而要借此撈錢，有力的除了出力之外，還要傾其所有的出錢。

一般籌措戰費的方法，總不外乎三種；舉債，增稅和發行通貨。當局雖然在戰爭之中也是三種並用，但主要的是發行通貨，因為增稅，舉債，雖然能够直接間接轉嫁給平民負擔，但也可能損害到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且，在實施上又有許

便利最有的籌錢方法就是增加發行，它在無形中將薪工階級的收入，都征收了去，而不會遇到一點反抗。

戰事發生以前，發行國內公債是剝削平民的一個間接的但有效的方法。政府用極大的折扣向金融資產階級借債，而向人民征收極大的捐稅還債。但戰時就不同了，所有的捐稅，供應戰費還不夠，這就喪失了債信，這在金融資產階級當然是不願意的。所以抗戰初期雖然一度發行過救國公債，但因為與過去辦法不同，發行發生了困難，不久就停發了。此後在戰爭之中，也發行過幾次攤派性質的公債，但這種發行，雖說大部分是落在中小農民身上，終究對於大地主，大銀行家也是不利的，因此，這些公債並沒有發行多少。

就增稅說，戰前的關、鹽、統三稅是銳減了，而且無法增加。於是，在稅課方面是開辦了直接稅，舉辦了田賦征實，但這兩種稅對於大資本家和大地主都是不利的，因此，前者採取了攤派方式，使捐稅負擔大部分落在正當的工商業身上，後者在初期的實際賦率比戰前還低，（註二）而且大地主們可以不納捐稅，或者將捐稅轉嫁給佃農負擔。

然而戰時却產生了最使農民痛苦的一種捐稅，這就是「地方攤派」。當局將國防工程和軍隊供應的一部份差使地方負擔，地方當局

窮戶各種名目的方式向農民剝削。但這種攤派大地主和土豪劣紳是不負擔的，他們祇有從中漁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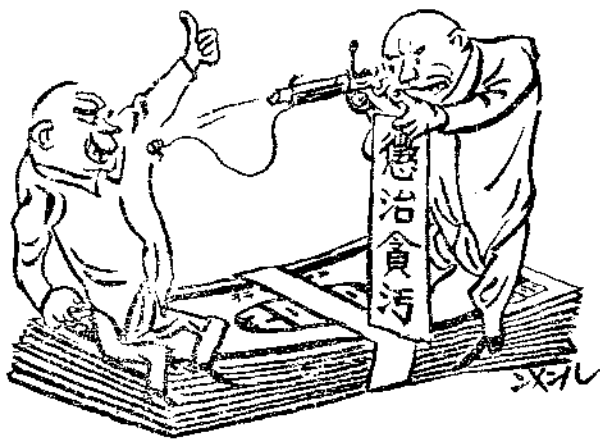
舉債、增稅，對於戰時財政並沒有多大的貢獻，但對於一般正當的中小工商業和中小農民却有極嚴重的影響。而大量的通貨膨脹，更使平民大眾赤貧化，使經濟組織，經濟生活完全紊亂，工業生產無法繼續，正當商業也無法經營了。

這種通貨膨脹，物資缺乏的情形，對於統治階級也是一個威脅，因此，就產生了擴展國營事業政策，和管制經濟政策。但前者是發展了官僚資本集團的力量，使官僚資本從金融而擴展到工業與商業；後者是扼殺了許多正當的工商業，並使貪官污吏與奸商巨賈勾結起來，發了國難財，擴大了官僚資本的聲勢與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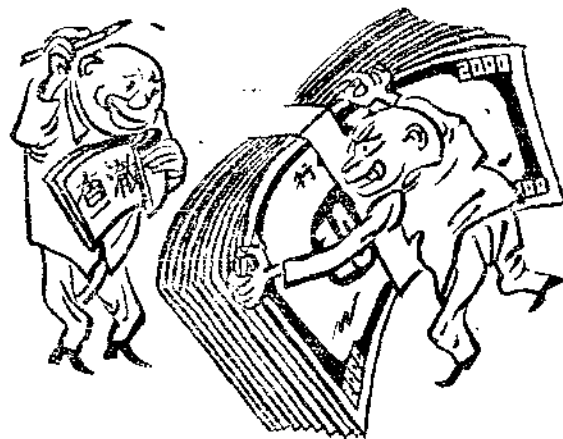
同時，在戰時經濟已經趨於枯竭的時候，美國參加了戰事，供給中國黃金借款，這就產生了黃金政策。

在通貨繼續膨脹之下，這種黃金政策，對於戰時財政上的貢獻，遠不及它對於國民經濟損失的嚴重。因為用低廉的代價拋售黃金，祇有使那些傍徨中的遊資找到一條出路，使那些焦急着法幣貶值擁有大量資財的戰時暴發戶，得到保持財富，增加財富的機會。

所以在八年抗戰之中，戰爭消費了破壞了大部分的人力物力，使國民經濟枯竭窮困，而在財政經濟政策上，又採取了一些祇有利於統



(四) 法幣



(三) 法幣

治階級但違反人民利益的設施，使正當經濟生活完全紊亂；它的唯一結果是：階級分化更其顯著，使極少數貪污官僚，投機商人，富裕地主，更加富裕，形成了一個互相勾結，頑固反動的一既得利益集團。並且統治階級的成份也更加緊縮，它把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工商業者都排除出去了。

從這時起，經濟崩潰現象是展開了！

三

假定在抗戰結束之後，真已實行民主，停止內戰，經濟財政政策澈底改變，那麼，當前極其嚴重的經濟崩潰現象還是不至於發生的。但不幸的是當局要從事全面的，空前的，比起抗戰還劇烈規模還巨大的內戰。而且，內戰的費用和損失，還要全部責令平民大眾負擔。既得利益集團和抗戰時候一樣，他們祇有從內戰之中，從反動的財政經濟政策之中，增加他們的財富。

這在一年多來的財政經濟政策上，表現得極其顯明。

因為內戰的費用比較抗戰更大，通貨膨脹就更要加速度進行。但是戰時後期物價是加速上漲的，假定通貨再膨脹下去，物價加速上漲的程度，一定更快，更高。這樣經濟立刻就要總崩潰，社會立刻就要大混亂。

當局當然也看到這一點，於是就產生了所謂「爭取物資」政策。希望用它來壓低物價上漲的速度，

抵消通貨膨脹的加速度。但是所謂爭取物資政策，並不是增加國內的工農生產，它有兩種辦法；第一，向美國舉借大筆債款，作為購取美貨基金，一面訂定低廉的匯價，吸收大量的低價的進口美貨，一面購取美國大批軍用剩餘物資，用低價拋售，增加市場的美貨供給；第二，用「劫收」方式，取得敵偽產業和敵偽物資（其中有許多應該歸還人民），將這些物資拋售一部分來增加政府收入，平衡物價。

低匯價政策雖然可以使低價的進口貨壓低本國的物價，但它却是用增加本國外債和扼殺本國生產做代價的。它的唯一好處；是養肥了有特殊關係的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

接收敵偽產業拋售物資政策，除了使淪陷區原有的生產停頓，平民財富大部分被剝奪外，它的收入並不能抵補內戰費用的百分之一。它祇是便宜了從事「劫收」的貪官污吏！

在稅課政策上，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雖然通過了舉辦財產稅和遺產稅的提案，但因為這是不利既得利益集團的，所以它祇是一種遮人眼目的口惠。實際上注重的仍是剝削平民大眾的兩種消費稅：關稅和貨物稅。

黃金政策也和戰時的黃金政策在本質上完全一樣，最初還想不惜犧牲和遊資鬥爭，但結果却完全失敗，不得不取消了。

另一方面，當局財政支出却在

無限制地膨脹，通貨也無限制地膨脹，到現在，前述的物資爭取政策，完全失效，再也壓不住物價的狂漲了。

因此，就又放棄了這種政策，產生了一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但這仍舊是抄襲過去在戰時完全失敗的統制經濟手段的老套，它祇有加深經濟崩潰的速度和程度，却決沒有挽救的作用。

所以當前的經濟崩潰再繼續下去，結果是整個社會的大混亂。現在各地發生的民變和社會的騷動，就是社會大混亂開始的信號！

四

經濟崩潰有沒有辦法挽救呢？辦法當然是有的，但有一個前提，就是它不但在內戰繼續的局面之下，沒有辦法，而且在反民主政權存在之下，也絕對沒有辦法。因為它並不是由於中國經濟制度本身的規律或是內在的缺點產生的，所以解救這種經濟崩潰狀態，不能依賴經濟制度本身的規律來解決，像普通週期性經濟危機一樣；也不能單純的用經濟方法來解決。它所需要的是政治方向和政治設施的徹底的改變，這樣纔能產生符合人民利益的新經濟政策，也纔有挽救經濟崩潰的方法。

(註一) 關於經濟危機與經濟崩潰，擬另撰文說明。這一點在當前理論研究上也是需要的。

(註二) 見四川省田賦徵實研究及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做各種四川農村研究。

一 戰爭的本質變了

廣島和長崎挨了原子彈的爆發，事實上不過是這次戰爭結束時一段輝煌的插曲，牠並不是決定戰局的主要因素。考察那時戰局的形勢，日本海軍已經毀滅，空軍抬不起頭來，其最精銳的關東軍望風而潰，美國祇要稍為持重一下，則 V-J Day 也會不出一九四五年九月而到來。原子彈之亟亟於一試的原因，不過說明戰爭演進到末期，美國作戰的首腦部心理上已經陷於瘋狂狀態罷了。

戰爭的目的，從古至今，不外

原子彈戰爭是可能的麼？

蔡鴻幹

以上的威力，那末未來戰爭一動手就不免意味到全體性的毀滅，請問這種戰爭的結果和戰爭發生的本質可能有什麼關聯嗎？古代戰爭爲了滿足征服的慾望，現代戰爭爲了滿足經濟的需要；可是如果戰爭的結果乃是失敗者的毀滅，那末戰爭的目的不是跟着化爲烏有嗎？除非未來戰爭另有一種目的，否則用原子彈來進行戰爭似乎是不可想像的。

以上是說戰爭之爲戰爭因爲是有目的；目的不存，戰爭安在？現在我們還可以說戰爭之爲戰爭因爲是有勝負之數可指。如果將來戰爭是由高速度而無遠不屈的火箭裝載

立者都勝利，那末誰願意作戰呢？

二 攻防完全改觀了

根據以往的經驗，凡屬武器遲早總有防禦之道，所以原子彈也不能例外。這樣說來，也許會有一天，人類因適應原子彈時代而放棄城市生活，而未來的軍備也可以不需要集中的供應而可以遂行。到那時戰爭的結果不復是同歸於盡，却有勝負之數可稽，那末戰爭的本質依然不變，戰爭仍然不失其爲政治的延續。原子彈既然不能盡敵方之寸土尺地而悉毀之，牠的用途多少會被約制於戰場及戰區，以求其經濟

的在於佔領。不能集中的兵力，既不能戰鬥，又不能佔領。因此，我們不可以說，在原子彈戰爭時代，由於集中之不可能，於是進攻的力量大大地被削弱了。又由於攻方集中之不可能，於是防禦的力量便大大地被增強了。原子彈之使用愈普遍，則進攻的力量愈被削弱，而以不可能進攻爲極限。原子彈之使用愈普遍，則防禦的力量愈增強，而以不可能被進攻爲極限。到了這個地步，戰爭的主動，便成爲沒有意義。沒有主動的戰爭，便不成其爲戰爭。戰爭成爲永久的膠着性，誰也不敢前進一步，戰爭本身既無目的

要屈敵從我，以達成政治上的要求。所以戰爭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譬如兩個人打架，原爲爭論不決，迫而訴諸武力，雙方的初意都只在要對手認輸，但却絕不想把對手打死。因爲對手一打死，事情反而弄糟了。然而失手打死人的事情却也在多有，大體總是打得難分難解一時火氣上衝，不擇手段而且也忘記了目的時方才發生，那時的心理是變態的，所以也就沒有預期的結果可言了。原子彈的發明，正是戰爭後期，只求制勝，不恤其他的瘋狂心理的表現。現在大家公認爲戰爭已經進入原子彈時代，在發展中的原子彈又是比投諸廣島的具有千倍

原子彈來進行，則火箭互射之頃，交戰雙方均歸毀滅，不特無戰果可尋，抑且無勝負可指，防禦進攻，同歸於盡。在防禦一方面，還可以說志切報復，無所顧慮，而進攻的一方，却又何以自解呢？假如戰爭發動之初，是人控制着武器，戰爭既動之後，人便失却自制而受制於武器；那末原子彈發明於戰爭既動之後，用以互屠，情有可原，現在於和平期間大家都握原子武器，試問誰肯嘗試這既無戰果，又無勝負的玩意呢？

於是我們可以這樣設想：未來戰爭，勝負的意義，可能和以往不同，那便是凡作戰者都失敗，凡中

與效用。現在我們在這樣的假設之下，來研究牠對於未來戰略的影響。

戰略這個東西自古迄今不能違背集中的原則。戰略的運用，千言萬語不外是集中我方的優勢的兵力於預定的時地，以擊滅敵方之主力，從而取得決定的勝利。所以集中的意義是兼指主動而言。

現在讓我們想想看，在原子彈戰爭中，集中是不是可能的。無論何種兵力，一集中就等於目標被發現，目標一被發現，就是招致自身的毀滅，無論集中的空間是在陸上，在天空或在海上。但兵力若不能集中，實際上就等於沒有作用。兵力的使用，其任務在於戰鬥，其目

，亦無作用。如果人類觀念中有一天實證了防禦是最有利者的時候，又有誰甘爲戎首呢？

三 新的馬其諾防線

我以為馬其諾防線在第二次大戰中雖然成爲廢物，而在第三次戰爭中（如果還有話）却必須重新加以估價。不過我之所謂未來的馬其諾防線僅僅在原理上與過去的有共通之點，而在形式上則完全兩樣。未來的馬其諾防線是活動的，而於必要時以原子彈造成之。這個又可以分做幾方面加以說明。第一在大陸國境上，凡便於敵

論莫斯科會議

張明養

莫斯科會議已定本月十日開幕。這次會議的結果如何，對於世界和平的前途，將發生決定性的影響。美國前任國務卿威爾斯於二日發表演說，會謂：「四強在莫斯科會議中，倘不能就德國問題成立協定，則美國境內之德國同情者，將有機會勸誘輿論給予德國人另一機會。德國問題倘不能解決，則聯合國將遭遇歐洲之另一次戰爭。」威爾斯這一警告，實含有很大的真理。

莫斯科會議所討論的主題，是對德和約問題，對於戰敗的德國如何處置，都將在這一會議中決定。德國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如果在這次會議中四強國不能商妥一個對德處置的妥善辦法，那末德國很可能又成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自從德國投降以來，由於五強國對德管制政策的不同，已有一種相當顯著的跡象，表明國際間正有一種勢力，企圖使德國成爲另一次世界大戰的火種。這次莫斯科會議中如果不能將這火種加以澈底的撲滅，那末世界和平的前途實在是可悲觀的。所以莫斯科會議的成敗，實在關係着全世界人類的命運。

一

這一關係人類未來命運之重要會議的前途究竟怎樣呢？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首需檢討這次會議中各國的主要爭執是什麼，然後再看這些爭執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能否獲得妥協的解決。

當前四大強國關於對德問題的主要爭執，約可指出四個。第一是德國的未來政制問題。美英法三國都主張德國應成爲一個聯邦政府，各邦保有很大的權力，而聯邦政府的權力則加以限制。這種聯邦政制的成立，在這些國家看來，就可以防止德國的再度破壞世界和平。而在蘇聯方面，則認爲此種聯邦制度，實是分割德國的代名詞。蘇聯主張德國應成立一個中央集權政府，並由這一中央政府來澈底根除全境的納粹殘餘勢力。目前在英美佔領區內的各邦，納粹份子非但沒有澈底剷除，而且還担任民政上的重要職務，如果由這些納粹仍佔優勢的各邦來

人進攻的地點，必要時均可以原子彈造成一種真空的地帶，有時且可以令其縱深到合於需要的程度。在這種形勢下，敵人如果硬要進攻，除非他願意聽從我方的意志，經由我方替他預定的路線，也就是被殲滅的陣地。由於上節所述的理由，敵人對於任何一點都不可能施行集中的突破，於是被殲滅便成爲必然的運命。這便是陸上戰爭中進攻的一方絕無主動可能的原因。沒有主動的進攻，便無異於自投陷阱，誰肯來？

第二，在海岸上，如果進攻者先用原子彈去破壞登陸的地點，那就等於自己放棄登陸的企圖。如果他逕行登陸，等他一集中就成爲原子彈攻擊的目標。不集中而登陸，或登陸而不集中，那反正不能戰鬥，更無論佔領，左右都是死路一條。所以整個海岸凡可登陸之處，隨時都可以變成馬其諾防線。

自然有人會說，未來戰爭中，戰鬥和佔領都是運用空運部隊。這句話就等於承認海陸兩方隨處都有牢不可攻的馬其諾防線了。然而空運部隊無論要降落到那裏，都不能不經集中，才能發揮戰鬥和佔領的效用。防禦方面儘可以逸待勞，或俟其集結而以原子彈擊之，或乘其分散而各個殲滅之。於是整個國境，隨處都有馬其諾防線的存在。這樣看來，原子彈運用得愈普遍，則進攻之力量將被削弱至於極限，即不能攻；反之則防禦之力量將增強至於極限，即不能被攻。戰爭的發展如果到攻無不敗，防無不

固的地步，戰爭必被廢棄爲實現政治目的的手段了。

四 小小的推論

也許有人要問，那末爲什麼最先握有原子武器的美國却偏偏如此亟亟於加強海陸空軍備呢？對於這問題，如果我是什麼發言人，那我便不妨回答說「請問美國當局」。不過這裏是研究理論，我還應該做一點推論。我記得美國海軍戰略權威馬罕提督於研究後備艦艇問題時，說道：「當交戰雙方的主力艦隊同歸於盡的時候，那末誰擁有最多的後備艦艇的，誰便是戰場的主宰者」。在原子彈的威力日益發展的途中，海陸空武器，實際上都退處後備的地位。美國人也許以爲假定有一天大家的原子彈都用完的時候，那末那些具有第二線作戰威力的最強者，便仍然將爲世界上的霸王。因此我們不妨設想，美國不但想做世界上最強和最多的原子彈的擁有者，而且還要成爲最強和最多的後備軍力的擁有者。這完全是錢人的想法，既有銀行存款，又有家裏保險櫃，還要廣置地產，多買股票做成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地位。不過世界已然發展到原子彈時代，則原子彈將不是唯一威力的代表，還有宇宙光，還有許多被 H. G. Wells 帶到棺材裏去的未來世界的預言。但這些東西通通使世界走向另一方向，那便是：牠們將使未來的戰爭成爲沒有意義和沒有代價的東西。

一九四七，二，廿二。

組成德國聯邦政府，那末波茨坦會議所決定之根絕納粹勢力的原則就被破壞，而同盟國萬千人士的血也就白流了。

第二個爭執是關於經濟與賠償問題。波茨坦協定規明同盟國要澈底根絕德國的軍需工業，剷除卡脫爾、托萊斯等獨占勢力，並視德國為一統一的經濟單位。但在這一年半的佔領期間內，英美佔領區內的重工業並未加以澈底的拆毀，相反的，美國的獨佔資本勢力却已與德國的獨佔勢力勾結起來。至於視德國為統一的經濟單位一點，更沒有做到。在四個佔領區間並沒有經濟上的交流，各區的產品多不互相交換。這一政策推行的結果，使各區的經濟都發生很大的困難（蘇聯佔領區除外），尤其是英國佔領區內更發生嚴重的糧荒，而不得不與美國佔領區謀經濟上的合併。

關於賠償問題，各國間的爭執也極嚴重。蘇聯因受損失最大，要求德國巨額的賠償，這種賠償原則在波茨坦會議中已有決定，但具體的賠償數字，則並未規定。英美說蘇聯已從其佔領區內取得足夠的實物賠償，因之不肯依照波茨坦協定的規定，將其佔領區內的工業設備拆運蘇聯。這一問題自將在會議中引起重大的爭執。

第三是關於領土問題。在波茨坦會議中，英美答允在對德和平會議中，支持蘇波對德的領土要求。據波茨坦協定的規定，蘇聯可取得東普魯士的東北部，波蘭則取得奧得河以東的德國領土。但是貝爾納斯在去年對德問題的演說中，却聲明美國對於此問題將重新考慮其態度。要是美國仍在會議中堅持此種態度，那必然會引起對蘇的極大衝突。

最後是關於軍事方面怎樣肅清德國軍國主義的思想，以及德國可保有

多少的軍隊與何種的武器，也將成為與會各國嚴重爭論的焦點。

三

上述數點將為莫斯科會議中的主要爭執問題，此外雖尚有若干問題勢將引起參加各國的爭論，但與上述數問題比較，則重要性相差甚遠。這些嚴重的爭執是不是能在這次莫斯科會議中獲得圓滿的解決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單從問題本身去考察，而須從目前整個世界形勢的發展中去求答案。

自從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國際形勢顯得非常的惡化，尤其美蘇間的嚴重衝突，更使世界和平的前途黯淡無光。而同盟國間對於處置德國問題意見之紛歧，也全係各強國的世界政策不同所引起。

美國為了要保持其在戰爭中所獲得的世界優勢地位，以便稱霸世界，對於蘇聯勢力之發展，處處予以防止。而兩次對蘇作戰的德國，實是防蘇反蘇的一支強大力量。因此在美蘇整個關係沒有好轉之前，美國的獨佔勢力很想重新扶植德國，使其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防蘇的前哨基地。由於美國這一世界政策的採行，於是就在德國採取了前段所述的各種步驟，如不澈底肅清納粹的殘餘勢力，繼續扶植德國的獨佔企業等等。英國也追隨美國之後，採取類似的政策。這樣就形成英美對蘇的對立與衝突，範圍廣及全世界，不僅限於對德問題。

但是到了莫斯科會議的前夕，國際形勢是否有了轉變呢？英美蘇的關係是否有轉好的跡象呢？我們現在可以肯定的說，目前的國際形勢已不同於半年前的形勢，英美蘇的關係也較去年大為改善。國際形勢轉好的主要關鍵，是去年聯合國大會中蘇聯提出了裁軍提案，而獲得一致的通過。這一裁軍決議案雖然還祇是一種空洞的原則，並且對於原提案還加以相當的



修正，但這一決議案的成立，對於混亂的國際情勢實有重大的澄清作用。在聯合國大會同時，四國外長會議又最後商妥對五國的和約草案，於本年初正式簽字。

在整個國際形勢好轉的局面下，美蘇關係也大為改善。尤其是在莫斯科會議的前半個月間，蘇聯突然聲明，承認美國有權接管太平洋上日本委任統治地。蘇聯這一舉動自然可祛除美國對蘇聯的猜疑，因而也可換得美國在歐洲問題對蘇聯的讓步。這對莫斯科會議中爭執問題的解決，將有很大的幫助。

位也與以前不同。英國過去的外交向來是隨美而後，形成對蘇的對立形勢。但自去年工黨一叛黨後，他已感覺到一味追隨美國的外交路線，對蘇聯前途並無好處，因即改採獨立的外交路線，一面改善對蘇的關係，如改採獨立的外交路線，一面與英法蘇盟約的修改；這方面則加強對蘇的關係，於本月四日簽訂英法美三國同盟。英國外交路線的改變，與蘇聯的修好關係，顯然是出於二個國家的利益。在國際舞台上，蘇聯與英法美三國同盟的出現，這不僅是英法美三國利益，也是蘇聯利益。蘇聯與英法美三國同盟的出現，這不僅是英法美三國利益，也是蘇聯利益。蘇聯與英法美三國同盟的出現，這不僅是英法美三國利益，也是蘇聯利益。

但莫斯科學會議的主題雖然為討論對德的和約，但其他許多問題，亦必將有所商談。馬歇爾與貝文都已在這會中提出重大問題，中國在無可避題，而在此會中，亦必將有所商談。馬歇爾與貝文都已在這會中提出重大問題，中國在無可避免地，而在此會中，亦必將有所商談。馬歇爾與貝文都已在這會中提出重大問題，中國在無可避內，而在此會中，亦必將有所商談。馬歇爾與貝文都已在這會中提出重大問題，中國在無可避當，而在此會中，亦必將有所商談。馬歇爾與貝文都已在這會中提出重大問題，中國在無可避呢？這是一問題。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應當追問並須求來得

看國民黨的三中全会

程 程

三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將在南京揭幕。

國民黨歷來喜歡開會；中央全會只是規模比較盛大的一種，每兩年總也要舉行三次光景。一黨治一之下，全會的討論範圍漫無限制；然而國民黨已是一個老大的統治集團，它的興趣，它的看法、作法、乃至作風，都漸漸成了定型，刻板得有些僵化了，所以我們不難摸清它的究竟。要略言之，召開中央全會的意義與作用可以歸納為下述幾種。

第一，說門面話。每次全會的文獻，包括宣言、開會詞、閉幕詞、以及有關黨務或國計民生的一大堆議決案，多半是些煌言譎論，至理名言，而且往往遠跳在時代之前，陳義甚高。但有一點令人惋惜的，這些文獻多半緊隨着大會的閉幕而歸檔，直到下次會議，再行提出「檢討」；縱或實施，也很少認真澈底，人民因而逐步積累了經驗，羣以官樣文章目之。

第二，統治者的集會和相互觀摩。近年的國民黨在閻中委膨脹，中委多得不可收拾。閒散的中委畢竟有限，絕大多數皆有一官半職。當中委的，在中央可以小到一個司長，在地方可以小到一個省委。文武官吏平日散處各地，都有專責，對於全國性的或別人份內的事兒無暇旁顧，賴有全會這樣一種東西，可把他們集合攏來，互通消息，交相切磋。這就全面統治的維持和鞏固來講，也許是有幫助的。

第三，上下的溝通。全會的一聲召集令，猶之乎操場上的「向中看齊」，地方向中央看齊，百僚向領袖看齊。這「看齊」是不可或缺的，地方必須善察中央的政策，百僚更要明辨領袖的意旨。譬如說，在政治協商會議的開會期內以及閉會之後不久，莫說友邦與中國一般老百姓，就是國民黨內不明底細的人士，又何嘗料到，接着政府還都，便有連串不斷再接再厲的殺伐呢？我們記得很清楚，漠視政協是從二中全会否決政協有關憲章原則的決議而開始的。不借全會來溝通上下，意志便不易集中，力量也就不易集中。其次，領袖雖然勇於任事，巨細躬親，但是局面太大，事情太繁，斷乎不能面面週到；而且下情上達又是為政所必需，他不能不借全會來廣事諮詢，通察內外，以期胸有成竹，隨機應變。

第四，黨內權位重分配。國民黨內有小組織的存在，而且彼此傾軋排擠，已是耳熟能詳，洗刷不了的事。全會是它們一個互相辯互相攻的便利場所。派系分立，確有其妙用，既合乎一制衡之道，又可利用它們來做內外不利輿論的擋箭牌。甲派當權受了攻擊，暫被擱開一邊，讓乙系問事；乙系策畫失當，咎有應得，又代以甲派。酒瓶儘管調換，酒却不變。抗戰期內在重慶召開的一串全會，全鬧的是這套把戲；各院部會人事更張的流言，不脛而走，傳遍街頭巷尾。

仔細想來，無怪老百姓不很重視全會，無怪報紙所載全會的官樣文章永遠缺乏讀者。全會對外舞文弄墨，大家只顧邀寵承歡，競遞名片，攻守予奪。會議不容中央社和中央日報之外的新聞記者列席旁聽，其故豈即在此？

自有國共磨擦以來，享有統治權的國民黨，其最為關切之問題，無疑是如何對付威脅這種特權的中共。

三中全会雖是閉門開會，不許外人朝裏窺視，但對周遭無情的形勢，以及中樞處置之道，是無法不予理睬的。它不得不閉門面對着國民政府所處的國際環境和國民黨所處的國內環境。關於前者，它得注意國際間的態度和行動；關於後者，它得注意反對黨派的力量與社會一般情狀。同時，它又必須照顧到中樞已在推行的內外政策。

國民黨今日所處的國內環境是怎樣的？曰：和談破裂，戰爭擴大，以及由此而起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動亂。
國民政府今日所處的國際環境又是怎樣的？曰：莫斯科有四強外長的集議，他們多半要談談中國問題。

今日中國，一切毛病種因於內戰，然而偏偏訴諸內戰。「經濟緊急措置方案」算是最後一張牌，而其有效實施，却寄託於一項渺茫的假設，那便是：在一個特定期內消滅中共武裝。因此，北方幾個軍事重鎮與首都之間，將星們此去彼來，指揮機構重新有了調整，兵員武器也在積極部署。政府忙着商議改組，企圖推進二三小黨，以期一新內外視聽。輿論起開麼？請走宋子文。凡屬反戰的人，都是一形跡可疑的，於是出動特務，大事連提。這就是在加緊前方攻勢的前提下，政府目前採行的對內政策與措置。

馬歇爾離華之後，美國正式退出了調停地位，美軍也部份撤走了；美國方面不論軍事或經濟的援助，至少暫時沒有多大希望。現在連一向置身局外的英國，也在議會裏大談其國共糾紛。蘇聯更是北方之虎，聞之色變。在如此形勢下，偏偏有莫斯科四強會議的召開。不論其方式如何，提出中國問題來檢討檢討，看來是難以避免的。於是政府先發制人，以五強之一的姿態，來了一個聲明：非得中國同意，請莫討論德奧和約之外的問題。這就是在加緊前方攻勢的前提下，政府所採的對外措置。

三

有兩樁事，一樁是三中全會必會做的，那就是，空口表示，希望早日恢復和平；一樁是三中全會或許不計實效如何，姑妄一做的，那就是，否定蘇京會議涉及中國內政。

一以政治手段解決中共問題，簡直成了國民黨的門面話，再也不能引起新鮮之感。三中全會必把一切破壞和談造成戰禍的責任，加諸中共。它所真正考慮的，不是應否用兵的問題，而是能否用兵的問題，不是用兵對不對的問題，而是用兵成不成功的問題。我們不能希望將星們把軍事並無把握的真話報告全會（誰知道他們做的什麼夢）；我們也不能希望冀地方首長，除申述徵兵徵糧的困難之外，除描寫經濟紊亂社會動亂的情形之外

，更會把這些病象的基本原因一語道破（誰知道他們不在混水摸魚）。統治者集攏一處，彼此商討的，向上建議的，想必是些治標的辦法，隔靴搔癢的方案。他們勢必強調：目下的事情壞在人謀不臧。在重彈「政治手段」的老調和譴責中共之後，他們又必大談其革新黨務，剷除貪污，改進行政效率等等。國民黨內部看到問題真正的癥結的人，未嘗沒有，而且未嘗缺少，不幸他們或則不敢明言，或則說話無力。黨內略微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角色，多半是閒散無權的，起不了作用。

說到「人謀不臧」，便可直接帶到中委們一向最為關切的課題，即前文所說的黨內權位重分配。提起這節，不禁使人惋惜，這回的三中全會真要大大減色了。政府勢須拉攏民青兩黨分奪權位，那不必說；宋子文已先一步下臺，某些派系失掉一個質詢攻擊的對象，而且繼起的人選似早已定，不由分說，此其二；馬歇爾敗事有餘，臨走罵了一陣「反動份子」，堵住了若干人物的出路，迫使他們祇得躲在幕後活動，跳不到前臺來露臉，此其三。有此三因，全會的戲便不能唱得精彩了。

最近安排的改組政府的這回事，是用來對內而且對外的。第一步是擴大政府，延攬別黨，第二步是行憲，「還政於民」。不過，當內戰加緊進行，在野黨派受盡歧視之際，這些措置是否真向民主政治推進了一步，英美蘇三國外長的眼睛是跟中國人民一般雪亮的。美蘇關係如果繼續好轉，國際「干涉」或「不干涉」（意謂美蘇兩方對中國內戰兩方嚴守中立）遲早必定來到。

但是，可能發生的國際「干涉」或「不干涉」，短期內却未必就能阻止中國的內戰，國民黨一面畏懼國際地位降落，一面畏懼統治發生動搖，在這兩害之間，它似乎寧取前者。倘若愛惜國際地位，何至於造成今日之破爛局面，受盡洋人的奚落？祇有在國際環境逼得不能支持戰爭的時會，它才會考慮到停戰議和。有一個原則是不變的：黨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

四

由此看來，三中全會恐怕解決不了什麼重要問題。在最近的將來，內戰還要繼續下去，並且愈打愈兇。因此，農民和法幣兩俱遭殃。農民的生命猶如法幣一般不值錢，法幣的前途正像農民一般不太平。比如下象棋，三中全會想在士相被人吃光以前，先以車馬炮卒取得勝利，其目的不外保存將軍的無上權威。究竟這局棋要多久才能結束，怎樣結束呢？那是戰場上的問題，本文不贅。倘就老百姓的利益說，我們自然希望趕快下成和棋。

三月十日脫稿。

抗戰剛爆發，詩歌運動曾經澎湃澎湃了一個不短的時期，以朗誦詩，街頭詩的方式把詩歌對象推廣到士兵，農工和知識份子的大羣裏去。詩集和詩雜誌的銷路也開得很寬，很寬。爲了配合這個偉大的戰爭形勢和需要，詩歌的形式也起了很大的變化。追究所以如此的原因，說來也很簡單：詩人們被迫或自動的從狹小的天地裏走了出來，他們的宇宙頓然闊大了，活生生的現實代替他們灰白的想像。他們——詩人們，被一個大希望領導着，被

！來起唱歌

家克臧

一股熱情鼓盪着，放開了喉嚨歌唱了起來。歌唱着戰爭，歌唱着祖國的新生和大衆的解放，歌唱得那麼天真，快樂，自信，堅強，甚至有點喉嚨嘶啞，聲音粗大也在所不惜，也無暇去惜了。那時候，廣義的說，每一個人就是一個詩人。

那個時期過後，雖由於政治沈悶而冷却了詩人們的熱情，雖由於黑暗的壓力扼死了金色的希望，使詩人們不得已而轉向抒情小詩和敘事長詩裏去抒發和溶造，但詩人還是詩人這一點是沒有變的，不但沒有變，他們越來越沉寂，越來越清楚，越來越憤慨了。被壓抑的情感像暗流，終於在抗戰末期匯成諷刺詩的激浪而汎溢了。

最近，詩歌又活躍了起來，大有和抗戰初期遙遙映照的樣子。這可以從詩集（詩創作和詩論）的銷路上得到消息，這可以從作者與讀者的興旺上取得明證。

但是，今日的詩歌已經不同了，因爲今日的政治的嚴冬，便是詩歌的春天。

沒有一個時期需要詩需要得像目前這麼緊急！

沒有一個地方需要詩需要得像目前中國這麼厲害！

沒有一個人比現在更接近詩，沒有一個人比現在更像一個詩人的了。

睜開眼睛看一看：比一個多產的女人更容易懷孕的沃土千里，上面長着的是什麼呀？光的，光光的，因爲想念鋤頭和種子而憔悴，而枯死了。上面就沒有有一點東西嗎？有的，那是一叢一叢的荒草在自生自滅。

再看：一個一個村落裏，殘瓦頹垣，房屋露着天，吹烟像垂死人的呼吸一樣，這曾經是一家一，而且，想要把它再重造的「一家」呵。人民那裏去了？

人民在流落，在呻吟，在飢餓，在死亡。都會也是一樣，不要立在遠處望那摩天的

大煙囪，不要站在門外從玻璃窗裏去看大公司，不要置身路旁去看那電車，汽車和人流的熙熙攘攘。走進去，走進去的你同走出來的你，怕不會再是一個人了。

聳起耳朵來聽一聽：嗚嗚震耳的是什麼？是內戰的炮聲呵。

踏得大地咚咚響，叫着，呼喊着口號的是什麼？

是學生遊行示威的怒吼呵！

聽吧：工廠倒閉聲，商店關門聲，鈔票機加緊轉動聲，美國船鳴鳴的進口聲……

而最響的也最動人的是：叫苦聲，怨恨聲，憤怒聲，「不得了！不得了！」從人心裏送出來的最後的呼聲。

軍事在慘烈進行中，政治在紛亂未已中，經濟在崩潰過程中，人心在悲痛怨望中！這就是我們的時代！瘋狂的時代！

這就是我們的中國，動亂的中國！

瘋狂，動亂中的人的情感在激盪着。

這正是狂歌當哭的時代。

這正是用詩舒憤，進攻的時代。

這正是人的新生和死亡，也就是詩的新生和死亡的時代呵！

我們一齊向那些千夫所指的東西們擲出詩的匕首去，讓它們早日倒下去吧！

我們一齊向那些大家所希望的，來一個催生大合唱吧！

我們向那些唱昨日之歌的纖弱者，神經病患者祝福吧，祝福他們未死的「在天之靈」。

我們向風花雪月，顧影自憐者祝福吧，祝福他們的麻木與無恥。

我們要振奮。我們敢看，敢聽，我們的心是這麼亢進。

我們要前進。把渣子撒在身後，向着一個呼聲，一個希望前進。

我們決不羞恥於我們的詩句裏含着眼淚，只要這眼淚是爲了飢寒，困苦而流下來的。只要這眼淚是個人的也是千千萬萬人的。

我們決不自慚於我們的詩句裏充滿了憤怒和諷刺，這憤怒是這個時代每一個健強的人所必有的，而諷刺是我們的權利，客觀事實神聖的一個付托。

我們決不怕遺笑於古典藝術家們，我們要把我們的詩句寫得人人能念懂，我們要把我們的詩句寫得像憤怒，像憤恨，像希望，甚至不怕不像詩。

在這頂頂需要詩的時候，詩人們，歌唱起來吧。

三六年一月廿七日於滬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京字第四一八號

三北輪埠股份有限公司

航行： 南北洋綫
長江綫
堆棧： 各處均有設備

總公司——上海廣東路九三號 電話一二九五〇

分公司——·天津·青島·福州·寧波·香港
·南京·九江·漢口·宜昌·重慶
·蕪湖·安慶·

宏豐企業公司

總公司上海廣東路五十一號

電話一一四五三一五

承

辦

進

出

口

業

務

分公司漢口聯保里五號

重慶林森路一二七號

新時代

第二期

藝術形式的變革

陳曙風

中西文化的衝突與匯合

馮契

黃金政策之過去與今後

周伯棣

美國外交的新動向

宦鄉

莫斯科會議一夕談

程程

2

控訴(詩)

任鈞

民歌的「刺」

臧克家

笛福和他的「魯濱孫飄流記」

楊晦

漫畫

洪荒·尼龍·張文元



國營招商局

預定客貨艙位
 代客報關裝貨
 代理水火保險
 辦理倉儲堆棧

總局：上海廣東路二〇號
 電話：一九六〇〇轉接各處室

目價告廣

插頁	封底內	封底	封內	每幅	
				全頁	半頁
五十萬	六十萬	九十萬	六十萬	全頁	半頁
卅萬	卅五萬	五十萬	卅五萬	半頁	四分之一
十五萬	二十萬	三十萬	二十萬	四分之一	

發行人
 編輯者
 經理部

時與文週刊

程博洪
 時與文週刊社編輯部
 上海崑崙路三十四號
 電話 九〇二一九

天隆被單



經濟實惠 美觀大方

天隆染織廠出品

上海南京路一〇五號
 電話 五六一三

藝術形式的變革

陳曙風

藝術形式的解放是思想解放的表現，常常是像原子爆裂般的一連串的爆裂起來。繪畫、詩、音樂、雕塑……通通變形。

一個 ism (主義) 在繪畫部門發生，很快這個 ism 便到了詩，到了音樂，到了戲劇，到了舞蹈。在中古，一個風氣可以佔據幾個世紀；佛教思想的繪畫可以浸潤整個唐代；宋明的理學，使兩代的詩和繪畫也理智化起來。文藝復興更跨過了幾個世紀，由喬托 (Giotto) 奇馬布 (Cimabue) 到達文西 (從舊譯)，拉飛耳、密啓則則羅，歷時三百多年。然而越是近代，變動越快。以爲塞尚 (Cézanne) 是怪的人，怎知道有後來的表現派、立體派、幾何派……，通通是在八十多年來發生的事體，一百年還不到。大約剛踏入一八〇〇年的門檻，三十年代的樣子，便出了羅丹、塞尚、馬內 (Manet)，和整個傳統的形式作對。這些叛徒們總是向前代技巧的高峯反叛；而且不同於米勒的只改變題材而不改變形式，後來的表現派、立體派、構成派、同存主義、新原始主義……簡直連形式也改變。牠們的材料擴大了，材料不限於石、音階、色彩、線條，牠們的材料是歷史、空間、現實界和現實界以外的理想。前代的人所要表現的只是胸次，那可以寄存於筆致和詩句中之音節——那個時候最高的東西，恐怕就只有胸次，而依據的形象總是現世所有事物的形象：蘭、竹、山石、或是聖母與其子。如果在故事，

就是相愛戀的男女、君王、幸臣、大將等作爲材料。那個時候，人好像不懂得有一個自由，就是隨意所欲，將古代近代的故事，交叉重疊起來。人可以創造出許多科學上的器具，在藝術上爲什麼不可以？爲什麼不可以用線與面另外做一些新形象？爲什麼一定依存於三分損益法的自然律所求出來的第三四音半音與第七八音半音的音階？爲什麼不可以做通通是全音，沒有半音的全音音階？那個時候，人沒有改變形式來製作藝術品，或者是爲了人沒有這個需要。把風月、花鳥、山川復現於藝術品中，人已經很滿足了。把現實界所有的東西翻版一次——像印假鈔票一樣——翻印得很像，人已經能滿足他的創造慾了，最多是在自然界所有的事物中，加入一點所謂「創作者的人格」或「精神」，豪放的或酒脫的，已經很够，說是使創作品「有生命」了。

那個時候，思想好像是哲學的事，思想不大會跑入藝術的領域。但近代人要把一切素材來再創造，造自己所要的形象。人發現了有這個自由，可以改變空間，改變時間，將古代的事和現代的事透過藝人的理解力，溶成一塊新金屬。人可以改變元素，爲什麼不能改變線條的位置，做成新空間？爲什麼不能再造一個藝術家心靈中的時間，他故事中的時間，他提煉過的歷史？這是文藝復興以來人類再一次的覺醒：用人的

創作心意可以支配一切素材，使之合乎自己的表現意志。

浮士德暗示了十九世紀的追求宇宙祕奧的力。——那個時候是追求而已，現在是改變。

不要輕看了這個開端。

這改變一切形式的開端，是又一個時代的開始。

x x x x x

思想到了近代人生活的水準，就一定不能滿足舊形式的表現。沒有某種需要，就沒有某些形式的改變。比如在古代，即使有變體，最多也只是由唐詩變成宋詩，由古典主義變到浪漫主義，由海登變到悲多汶，由米爾頓變到拜倫、雪萊。糟糕的就是時代和意識的衝突。時代分明是沒有一天子」的現代，一點沒有造夢，然而在詩的趣味中常常縈繞著金粉六朝，一提起律絕詩，就好像有點「朝罷香煙滿袖」的氛圍。一卿相」的夢在詩的幻境中暗暗露出來。

但是來叩門的時代畢竟太大了，分明是經過一個戰爭，分明是有轟炸機飛過我們的頭上。於是詩和畫也不能不裂出一個小縫，放了一個飛機進來，或是放進一輛摩托。這是在古松古山石的山水畫之上填上隻把飛機；在古木橋之上開進了摩托；在律詩絕詩之中用上了個把「摩托」、「原子」之類的字眼。這些新字眼常常是近代古詩家最得意的字眼，表示他胆子大，敢於用新名詞。

於是這些東西便如一塊新補疤補在一幅古畫或一首古詩上。

還有一種蝌蚪式的似變非變的，就是「文明戲」。這種東西現在已經不重要，但因為這個有尾的蝌蚪還有趣，正可以代表某些典型，不妨順帶一說。這是以舊戲中小丑插科打諢的作風為骨幹，而加上現社會的衣服，盡量大聲說話，要使台下聽見，另外加上佈景，加上分幕。真好像一塊大補疤！

變革，不是在舊衣服上補上一塊補疤的。在一千九百多年前，耶穌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沒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塊來補在舊衣服上，若是這樣，就把新的撕破了，並且撕下來的那塊新的，和舊的也不相稱。」補疤不能做成一個新文明。把舊的那根線延伸下去，也不能做成新文明。新詩的形式不是由詞曲演變而來，「嘗試集」裏的「兩個黃胡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把五古來加上了幾個白話字眼，結果反而落在古詩的後頭了。這叫做「想上前一步，怎知落後兩步」。

變革是另外起過一根線。

里特(Herbert Read)論近代繪畫，說近代畫變到那樣子，幾乎有人不承認它可以叫做「畫」。畫，就傳統的觀念說來，總是對着一件東西來抄取他的形貌，抄得像；而近代畫有時寫着的，却不是眼前所見的任何事物，連事物形像之簡化都不是。於是里特氏就說，近代畫是另外一根線生出來的，而不是接上前代繪畫的那根線；近代畫有些是寫思想，而不是寫東西。

在舊東西之上加上個把飛機，或是改造粵劇、平劇之類，我以為是將舊的一根線來延伸，這永不能長出新芽來的。在此，並不是說舊的東西

一定不好，而是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產物。不拿西洋旋律來攙水攙到平劇詞曲上，那麼各有各的好，但如果攙壞了，那就難聽極了。平劇是永遠不能改造的，由作曲到演唱技巧，牠有牠們自成的體系，不要夢想有一天平劇會如意大利歌劇一般被唱出來。兩根線的起點是絕對不同的。清唱曲「河梁話別」便是吃了想把西洋音樂與中國詞曲來混同的虧。

藝人的理解力，是決定所創作出來的藝術品是否會成爲「怪胎」的要素。

沒有比要決定一個形式的時候的判斷力更爲重要了。

在歷史上，每一件大作品出現，都因爲他自己帶來了一套獨創的形式，如屈原的騷體，但丁的新生和神曲，歌德的不準備上演的浮士德，屠格涅夫的散文詩，羅丹的雕刻。只有這些形式，才能將那內容盛載得恰如其量。

形式與內容是同時產生出來的。當一個人的理解力到了那裏，他便覺得非如此表現不可，其實何嘗有形式與內容之分？他的形式就是他的內容，他的內容就是他的形式。

羅丹的塑像起了稜的筋肉，是他的形式也是他的內容。

不過，這需要勇往的探索，自己作爲讀者之一的批判力，自信，不勉強修削最初的動機，是那樣子就那樣子，如是坦白地將這件藝術品產生出來。

那時真可說是生下了一个新新生命了。在形象貧弱而琢磨推敲的小技巧豐富的中國生長的我們，希望能向此方向試試，造成更豐富的形式。

須知雕琢推敲，縱然最精，還是小技巧；如果在畫與雕塑，那簡直是匠工。思想要向更大的形式去探索，才是歷史進化的軌道，每一回的進步都否定了舊代的形式，而自己定出新形式來。(完)

控訴 任鈞

在灰黯的天空下，

灰黯的天空下：

有好些婦人在悲哀哭泣！

在悲哀哭泣！

她們怎能不哭泣呢？——

她們的兒子，她們的丈夫

一直打了八年的國仗，

總算僥倖還剩下老命一條；

可是，貪婪的內戰的血盆大口

却一口氣吞噬了他們，

永遠地，永遠地不會回到家裏來了！

在荒涼的田野裏，

荒涼的田野裏：

有好些農人在長吁短嘆！

在長吁短嘆！

他們怎能不嘆息呢？——

整整八個年頭呀！

大家眼巴巴地盼望天亮，

盼望勝利；

可是，勝利帶來了什麼？

還不是一連串殘酷的內戰炮火！

於是，他們的糧食給掠奪，

（痛心呵，竟完全和鬼子的作風一樣！）

房屋被炸毀，

麥田和菜園子都變成了

中西文化的衝突與匯合

— 馮 契 —

問題是老的。遠在清朝末葉，海禁一開，國人就感到中西文化的嚴重衝突了。一方面，中國文化自成一套，孔孟哲學以至用筷子的習慣，都有了數千年的傳統。傳統是力量，我們不但不易拋棄，而且應該繼承。另一方面，西洋文化也自成一套，輪船火車以至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思想，改變了，甚至征服了地面的各角落。這真同潮水一般，所向無敵，所以通常稱為潮流。潮流也是力量，我們或者自動地投入，或者被迫地接受。但這兩套文化是如此的不同，這兩種力量簡直若水火不相容，要想把它們調和，匯合，決非易事。於是我們的文化工作者，很多感到苦悶，也有很多走入了歧途。

在最初，傳統的力量遠勝於自海外沖來的潮流。很自然的，產生了一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說法。這說法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因為那時候大部分中國人，還把西洋看作夷狄之邦。「西學為用」，意思是要建新軍，開工廠，築鐵路，更激烈點，那就是要變法維新。但「中學為體」，却是說中國的傳統仍應作骨幹。體是基本的，主要的；用是次要的，從屬的。所以這一種說法，只是在不改變中國傳統的前提下，學一點西洋文化的皮毛而已。

「中學為體」之說，發展到後來，有了各種的面貌：當軸者提倡讀經，以孫中山先生上繼孔孟的道統，學院裏就發出了「中國本位文化論」的宣言。而朝野又一致提出了發展實科與工業化這類口號，也彷彿是「西學為用」的變相。當然，時至今日，這一套理論的成績已很顯然。工業化到什麼程度，大家都明白。喊喊中國本位之類，無非贏得幾個御用文人的頭銜罷了。

與中學為體或中國本位之論相對立，有所謂「全盤西化」的說法。在西洋文化更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之後，這也是一種必然會產生的理論。照此理論，我們應該把中國傳統一腳踢開，全盤接受西洋的東西。不但英美的政治制度與科學思想應該學習，而且英美人的生活習慣也要仿效。這是頗有點俄羅斯彼得大帝的優勁的。穿西裝，用刀叉，跳交際舞，連着杜威的實驗主義，一起搬進來。雖然此派祖師本人言行不符，早已在弄考據之學，而且據說成爲過河卒子了。但此派徒弟徒孫，發展到現在已稱爲唯一美一主義者的，却還保有着一點迴光反照時期的尊張。

對於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中國本位與全盤西化，可說是兩種主要的偏向。這兩種偏向的詳細內容，和他們之間會熱鬧過一陣的筆戰，我們不必談。因爲無論中

一塊塊赤裸裸的光地！

（痛心呵，竟比鬼子還要來得徹底！）

在襤褸的鄉鎮上，

襤褸的鄉鎮上；

有好些兒童在到處流浪！

在到處流浪！

他們怎能不流浪呢？——

八年來，在鬼子的殘虐統治下：

謝謝天，他們總算還給剩下

一個寒槍破敗的家；

可是，如今，他們的家在那裏？

他們的父母兄弟在那裏？

你去問那些盲目的砲彈吧！

你去問那些無情的刺刀吧！

祖國呵！

難道你真的不知道嗎？——

他們都是你的良善而淳樸的子民呀！

他們深深地愛着你，

正如愛着他們的爸媽；

他們也會長期間默默地為你流汗，流血，

從沒說過半句抱怨的話；

可是，如今，他們受到怎樣悲慘的遭遇呢？

唉，難道這就是你所給與的恩惠，

這就是他們應得的報酬嗎？

祖國呵，請你回答他們吧！

請你回答他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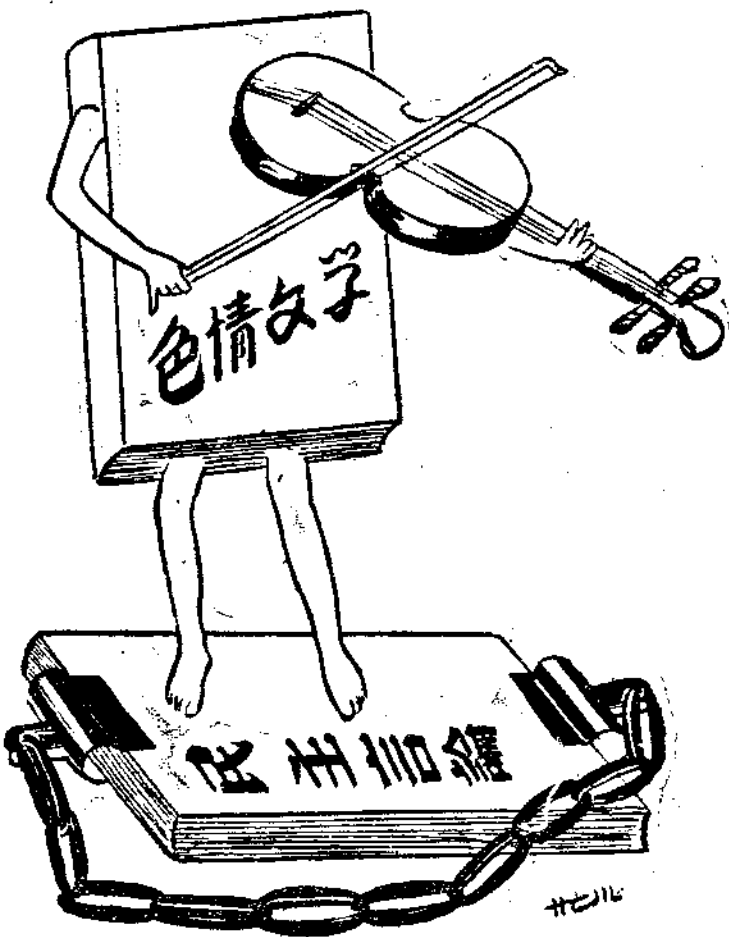
國本位，無論全盤西化，在今天，都已失去時代意義，不能作為指導現實的原則了。事實上，中國新文化所走的道路，和這兩派所想像的全然不同。俗語說，「不打不成相識」。經過了一時期衝突之後，中國人不但逐漸的認識了西洋文化的真面目，而且也慢慢的發現中國傳統的眞精神了。中西文化由衝突而匯合，在今天看來，是很可能的。

一一

中西文化有衝突，誰也不能否認。拿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西洋現代的文化比較，的確各自成一套，各有其顯著的特色。但是所謂文化的特色，却有時代性與地域性的分別。而且二者之中，時代性是基本的，地域性只佔次要的地位。

中西文化的不同，從一方面說，實在只是人類歷史上兩個特定階段的的不同。近代西洋，已經發展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階段了，而中國過去，一直停滯在封建的時代。所以中西之差異，在基本上，是和西洋的中世紀與近代之差異相似的。中國沒有工業化，缺乏民主與科學，西洋的中世紀又何嘗有呢？

若拿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洋中世紀比較，我們正可以舉出許多相同點來。就文學說，都盛行詩歌，而且富於田園風味。就哲學說，像程朱說太極「沖膜無朕，萬像森然已具」，和湯麥斯(St. Thomas of Aquin)說「事物沒有存在以前，其理念存於上帝心中」，簡直就一般無二。湯麥斯這樣的哲學，到休謨，康德，就全被揚棄了。而文學的領域，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就讓小說稱霸，且內容多富於都市氣息。巴爾扎克和福樓拜的小說，休謨和康德的哲學，是中國過去所缺乏的，却也正是西洋中世紀所不能產生的。



但是單就時代性來解釋中西文化的差異，是不夠的。中西文化生長於不同的地域，活動於地域上而作為文化創造者的人，又屬於不同的民族。這就使中西文化各具時代性以外的特色。這種地域性或民族性的特色，也許不易用一兩句話表達清楚。但是只要總括地看一下：在西洋，文學上有荷馬，但丁，歌德的史詩；藝術上有米開蘭基羅的大壁畫和悲多汶的交響樂；哲學的著作，自柏拉圖至康德，黑格爾，都著重體系的完整與分析的細密。把這些放在一起，我們就可以感到一種共同的風格，莊嚴而偉大，却不免氣勢迫人。而反過來看我們中國的，如詩經，九歌和陶淵明的詩篇；如唐宋以來的山水畫和今日民間流行的山歌；又如孔孟老莊以至王陽明的哲學著作，缺乏體系的形制，也不講求分析，然而片言隻語，那末富於暗示力。這中間，我們也極易感到有一種共同的風格，高明而自然，在中國人看來，又是極親切的。

今日文化

在這裏有一點必須申明：所謂地域性的特色或民族風格，決不只是形式方面的問題而已。普通講到中國氣派，常只提到民族形式。其實，形式和內容決不能分成兩截，而風格正存於內容與形式的統一。

洪荒作

假使一篇文藝作品够得上說中國氣派，那不但說它的形式是民族形式，而且它的内容也必定取自中國的現實。假使要求一個政治行動在中國土地上成功，那不但需要在作法(形式)方面投合中國人民的胃口，而且行動的實際內容，也必須是中國人民所迫切期待的。

如上所說，既然中西文化各有成套的特色，當然免不了發生衝突。但是這衝突，在基本上是時代性的。因地域和民族不同而產生的特色，大可以並行而不相悖。我們用筷子，吃米飯或饅頭，就不見得和用刀叉，吃麵包有大衝突。要強迫全國人都改用刀叉，吃麵包，也決定是不可能的事。

全盤西化論的荒謬，非常顯然。而中國本位或中學為體之說，却更行不通。因為西洋現代的文化，在時代上既已前進了一個以至兩個階段，中國傳統的封建文化，當然無法抵抗。此所以到了現在，各色各樣的中國本位論者，都已尸居餘氣，連招架之功都沒有了。

三

上文說文化的時代性是基本的，其實就蘊涵着文化是被經濟政治決定的意思。這裏所謂時代，指歷史的若干特定階段。而人類歷史的階段，是按照經濟政治的質的改變來劃分的。

中國正在進行一個經濟與政治的大革命。這革命的基本特點有三：對內說，它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是反封建的。對外說，它是半殖民地解放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而這個民主革命或解放運動，發生於人民世紀，成了人民世紀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就又必然地是人民本位的。此三特點中，前二者又依存於第三者。因為在今天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必須依靠人民的力量，而今天的人民，也正有這力量了。

與這經濟政治的革命相應，我們的文化也正在進行一個大革命。這文化革命的基本特點也有三：首先，它是人民本位的，至少是要求人民本位的，因此它反對以帝王或上帝為中心的封建文化，也反對以個人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文化。在人民本位這一立場上，文化工作者為了要完成反帝國主義的任務，就得講求民族風格或中國氣派；為了要和封建勢力鬥爭，就又提倡民主與科學。這由文化工作者結成一條戰線，是整個中國革命的一部分。它為經濟與政治的革命要求所決定，但又反過來推進經濟與政治的發展。這樣，經過了一個鬥爭的過程，當新的時代到來，在有了新的基礎與新的條件之後，嶄新的中國文化必然會建立起來。——這是我們對文化應有的根本看法。也只有用這樣的看法，中西文化的衝突與匯合問題，才能得到正確的解答。

但是在這裏，另有兩種偏向，值得提出來討論一下。有人以為文化是決定政治經濟的，因為廣義的文化包括政治與經濟。於是進而忽略文化的時代性，強調中西文化的地域性或民族性的差異，硬說這是兩套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統（中國本位論和全盤西化論，其實都是根據於這一套文化觀的）。這種說法的廣義的文化，似乎就等於生活。生活的確包括政治與經濟

。但是在生活或廣義的文化裏面，總還可分析（並不是分離）為經濟政治與其他文化各部門。試問這中間，那一方面比較基本呢？人是社會的動物，而構成社會的基本的條件在於經濟與政治的關係。原始人的社會，可能沒有哲學，科學，藝術等，但總有一種生產關係和維持這生產關係的制度（原始人的宗教，基本上也是一種制度）。要是連這一點關係和制度都沒有，就無所謂社會，而和禽獸無分別了。可見經濟和政治的生活，實在是最基本的。而哲學，科學和藝術等，却必須在一定的政治經濟的條件下，才能產生。於是進而必須講文化有時代性，對於中西文化的問題，也就決不會持中國本位或全盤西化的觀點了。

另有一種偏向，也以為經濟政治決定文化，但是把這決定關係看作太機械，太簡單了。於是認為政治經濟問題一解決，文化就毫無問題地建立了。這就忽略了文化本身的特殊性，至少忽略了上面所說的地域性。文化雖以經濟政治為根據而有時代性的差別，却也因地域與民族等條件不同，而各具傳統。為什麼蘇聯的小說特別發達，而詩和戲劇比較少成就？這就只能用俄羅斯民族的文學傳統來解釋。我們要建立中國新文化，在除了配合政治經濟一問題外，就以如何利用和發展民族傳統為最主要了。

四

引用上述根本看法於中西文化的問題，在積極方面，我們可以得到一正確的答案，在消極方面，中國本位論與全盤西化論的謬誤，也就更清楚。最根本的是立場，人類說話，總是有一定的立場的。中國本位論者想使孔孟重生，四書五經復活，雖然有時隱蔽得很巧妙，談談工業化之類，可是根本立場總是封建的。全盤西化論者的「西」，我們必須指出，只是資本主義的西方，可見他們的立場是資產階級的。

我們的立場完全不同，上文已講過人民本位。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我們所要建立的新文化，就一定是新時代與新中國的。是新中國的，所以我們反對全盤西化，因為那是等於在文化上受人奴役。是新時代的，所以我們也反對中國本位，因為若無條件地接受舊傳統，就等於向封建勢力投降。更進一步說，也只有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以中國人民為原動力，新時代的中國文化才可能建立起來。封建勢力已近沒落的階段，資產階級若不甘向帝國主義投降，也就只有和人民大眾結合，才有出路。這在政治經濟上是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此所以中國本位論與全盤西化論，到今天都到了日暮途窮的地步了。

黃金政策之過去與今後

周伯棣

一、黃金不可無政策

黃金之爲物，聲色優美，成分純一，且產量無多，價值高昂，故遂爲人們的審美觀念所器重，成爲高尚的裝飾品；成爲普遍的價值之尺度。黃金在目前，還是國際的支付工具，易言之，黃金是一種國際貨幣。黃金雖有如許的用途，然而它究竟是一種不可食寒不可衣的商品，人們之所以要獲得黃金，除它的使用價值（作裝飾）外，主要的還是爲了他的交換價值（作國際貨幣）。認清了這樣一個作用，各國適應着各自的經濟環境，遂有不同的黃金政策。黃金政策爲經濟政策乃至金融政策之一部份。一國不可無經濟政策，也不可無金融政策，「黃金可以無政策」，筆者實不敢苟同。

英國是產金最多的國家，南非洲每年產金一千萬盎司，於是英倫成爲世界黃金之集散市場，英國需要黃金之自由買賣，從這買賣中，英國獲得了利益，所以英國有英國的黃金政策。美國是擁金最多的國家，美國存金二百八十餘萬萬美元（以三十五美元合一盎司，合爲八萬萬盎司），約占世界存金之半數。美國存金過多，如悉數與通貨發生關係，則勢將造成通貨膨脹，故美國對於黃金，向採着閹金政策（Gold Sterilisation Policy），就是黃金收歸國有，其收購超過某限度之數，始得售予聯銀，以爲發鈔準備，同時得大量售與外國，流出海外，使之對於本國貨幣，不發生不良的影響。所以我國以三十五美元一盎司之價購運美國黃金，固爲我國黃金政策得一表現。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對於黃金，並不重視其有對內的價值，故列寧曾謂在將來的社會黃金無價值，儘可把黃金建造爲廁所；然而在目前，四週的國家還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各國對於黃金，既承認其有價值，於是在現在蘇聯還重視黃金的保有。蘇聯每年產金在一萬二千萬盎司之譜，產量極爲豐富；蘇聯究竟有多少存金，殊無可攷之統計，但要之蘇聯之存金量占着一個鉅大的數字，却爲不可否認之事實。此外任何國家對於黃金，實各有其特殊之政策。

綜上所述，可知黃金本身，不是黃金政策之目的；通過黃金政策的運用謀國民經濟的穩定或繁榮，却爲黃金政策共同之目標。黃金政策爲此項目標而實施，遂亦爲必然之歸宿。黃金政策如離開了這個目標，那便成爲黃金政策的失敗。

二、我國黃金政策的過去

我國的黃金政策始於民國三十五年三月。根據民國二十五年中美貨幣協定的規定，中國可按美國的官價，無限制購買黃金，美國官價係每盎司三十五美元；我政府向美借款，其中一部分購運黃金五百萬兩。此運來之黃金爲每條四百兩之金磚，原由造幣廠分化，後因熔金設備不夠乃由同豐餘分配與大豐恒、宏豐永、生源永、久成永、楊慶和、裕發、永祥和等以九九純份成色，分化爲金條（分化各金號銀樓，央行給每條三分之火耗），並以明配暗售之方法，交由同豐餘、太康潤、大豐恒三金號及方九霞昌記、楊慶和發記兩銀樓負責購領（明配）或拋售（暗售）。我國黃金政策之目

中西文化的矛盾，惟有人民本位的文化工作者才能解決。一方面，我們並不無條件地接受傳統，可是因此就能繼承傳統了。另一方面，我們並不主張全盤西化，可是因此就能接受西洋了。這兩句話似乎都自相矛盾，却其實是一個統一的態度。

新文化工作者無疑的要揚棄中國舊傳統，但揚棄却包含否定，保存與提高三重意義。和所有的文化遺產一樣，中國的文化遺產也有革命的與反革命的。反革命的必須否定。革命的，儘管在現在人看起來並不澈底，可是今日的革命者正是上承這個傳統的。而在對於這個革命傳統（包括民間的與保存在典籍中的）的學習過程中，新文化工作者就會養成所謂中國氣派或民族風格。這樣，新文化不但將爲中國老百姓所喜愛，而且也盡了反帝的任務。所以反帝正在於繼承傳統。

可是另一方面，反封建也在於學習西洋。中國的新文化工作者，無疑的也要揚棄純西洋式的文化。不但西洋的古典的文化，而且最新的社會主義，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國來，是決不能生長發育的。但是西洋的革命傳統，特別是這傳統的結晶——社會主義的潮流，在中國化的前提下，我們却非接受不可。我們實際上正在接受，而且已經投進去了，成了整個世界革命潮流的一部分，還起了積極推進的作用。正因爲如此，我們的新文化工作者乃能推毀，而且已將完全推毀，中國反動的封建文化。

推毀而又繼承中國的傳統，否定而又接受西洋的潮流，二者相互爲用，新文化工作者就能替革命與人民服務。而在這服務的過程中，新文化也就會得到飛速的發展，嶄新的中國文化必會建立起來。這新文化，是中西文化的匯合，可是有了質的提高。它異於中國的傳統，主要在於時代性的差異。它異於西洋的潮流，主要在於地域性的不同。——前人（如中國本位論者和全盤西化論者）認爲——「魚與熊掌兩者不可得兼」的問題，在我們有新的立場和看法之後，是不難迎刃而解的。

的，原為以黃金吸收法幣，使通貨膨脹之勢得以稍殺。無奈通貨繼續膨脹，黃金繼續拋售，一方面造成貨幣的飢饉，他方面造成黃金的泛濫，於是游資與風作浪，終至引起金潮，益發刺激了物價。我國的黃金政策以吸收法幣壓低物價始，而却以引起投機刺激物價終。我國形式上的黃金政策，遂於本年二月十七日宣告停頓。

三、我國黃金政策的今後

目前黃金雖停止拋售，却不能說我國黃金便可以沒有政策。質言之，目前的禁止黃金買賣，也不外為黃金政策之一表現。但停止買賣不過是消極的黃金政策，而積極的黃金政策則應另有所在。那便是黃金國有。

緣黃金國有政策的實行，有對外與對內的兩重意義，對內所以謀幣值的安定，對外所以謀支付的便利。一國黃金過多，能影響於幣值的降低，此時須收黃金為國有，庶可隔離黃金對幣值之影響；反之，一國黃金過少，能影響於匯價的穩定，此時須收黃金為國有，庶可調節外匯頭寸的豐富。黃金在國際金融上可以起緩衝的作用，黃金國有，用於外匯，好比是海港口築一個防波堤，使國民經濟，不受海外經濟之過份的衝擊。

我國是黃金太少的國家，黃金理應國有，就是將僅少的黃金，集中力量，使之對外，不必把它用來對內。現代的鈔票發行，發行準備之需用黃金，已日漸減少其重要性，黃金多的時候，黃金準備率可以提得高些，黃金少的时候，黃金準備率不妨定得低些。德國第二次大戰前的金本位制，黃金準備最低的時候，只及發鈔額的百分之一，但仍不失其為金本位，又各國的金本位，多由法律規定，在必要的時候，可以降低準備率。所以黃金作為發鈔準備的意義，已不見重要。黃金之主要的意義，是用以對外，我國的黃金政策，也正宜如此運用。

黃金用以對外，則黃金必須國有。但在目前，要實行黃金國有，却不無種種的困難。因為黃

金散布在民間，乃代表人民之貯蓄與財產，我們不能予以沒收或徵發；收歸國有的辦法，不外有下列幾種：

(1) 收買法——由政府公定價格，任意收買或強制收買黃金。如任意收買，則政府有價，人民有貨，是否必須成交，均聽人民自願。在此種情形下，人民保有黃金可以無罪，攜運黃金，亦屬自由。但在強制收買的情形下，則政府有價，人民有貨，二者限期成交，過期即可沒收。故保有黃金可以有罪，攜運黃金，亦屬違法。為了黃金國有，強制收買自然勝似任意收買。但在通貨膨脹的今日，實行強制收買，必須增發大量通貨，則更將促進物價的飛漲，此為事理上所不許。我國目前央行以四八〇・〇〇〇元之價收兌黃金，亦仍為任意收買，決非強制收買。此項官價，如以一二・〇〇〇元之匯價相折合，每盎司僅值三十三美元強（即480,000元÷12,000元×12=33,333.33美元），比之於美國的官價三十五美元一盎司，還低着一元六角七分（美元），這樣的低價人民自不願將黃金賣與央行。如有週轉不靈，不能不出賣的小戶，便只好忍痛吃虧，這也是不公平的一件事。

(2) 徵稅法——對於黃金的保有，徵課一種個別財產稅(Special Property Tax)，不過起稅點應儘量提得高，庶稅負着落於富有者，而不由貧民去負擔，且也避免了苛擾。為實行黃金徵稅，家籍戶察，過於麻煩，勢不可行，一方面行申報登記，一方面行攜帶檢查，却易於事半功倍，凡保有黃金超過某一數量，須行申報與登記，然後課之以比例稅或累進稅。攜帶的時候如無納稅之證明，便須加倍補稅，或處罰。黃金徵稅，可與黃金收買相並行，因其保有此項財產年年納稅，不如把它賣與政府。收買價格却不應定得太低，至少必須與黃金的國際價格相差不多才算合理，庶人民不至於吃雙重的虧。

黃金徵稅能收縮通貨，黃金收買能膨脹通貨

，二者在金融政策上，適相矛盾，將如何濟其窮？此可有公債的搭銷法，以緩和其矛盾。就是收買黃金，在某有限額之上，除付現款，須搭交若干成之公債。這樣，黃金因收買而國有，通貨却不因收買而膨脹。

不過這樣的辦法，我們不能期望之於內戰未停之前，也不能期望之於民主未實現之政府。因內戰未停，如得以搭銷法收買黃金，則所收回之黃金，一轉為外匯，再轉為軍火，而內戰之焰更烈。如期望之於民主未實現之政府，則發行公債，亦不過消耗於不生產之經費，對於文化教育與建設諸事業，仍不能有較大之支出率。

黃金停止買賣與黃金收歸國有是兩件事，在將來之中國，黃金不但應停止買賣，且應收歸國有。但在目前却不能做到黃金國有之程度，能做到的黃金停止買賣的程度，也就够了，黃金停止買賣，固然也可產生黑市，但這黑市的勢力，究竟不至於象目前昭彰刺激物價。我們目前只希望有消極的黃金政策，不希望有積極的黃金政策。

不過另一方面，黃金雖不收歸國有，却不宜讓黃金外流。既在法律規定「禁止攜帶黃金條塊出國境，旅客攜帶金飾出國，每人不得超過國秤二兩以上」，這是值得予以嚴格執行的。其次，國內飾金的買賣，固須予以管制，但亦不必予以禁絕。因國內的小額的買賣，仍無損於異日的黃金國有，而小額買賣，也不至於鼓動金潮，擾亂金融，刺激物價。升斗小民，在此通貨膨脹的時候，欲通過金飾，以保存汗血收入之幣值，亦情有可原，似不必懲美吹齋，并飾金的買賣亦一并禁絕。

四、尾語

黃金不可無政策，黃金政策的運用，更不可無健全之機構，否則良好的政策，非但達不到美滿的結果，却反而引起極大的弊害。我國未來的健全政策，還須經過不少過程，在此項過程中若無健全之機構，與清明的政治，仍會發生種種的弊病。健全之機構，與清明的政治，仍會發生種種的弊病。

美國外交的新動向

官 鄉

美國杜魯門總統本月十二日向國會發表的「請撥款四億美元分別援助土爾其（一億五千元）和希臘（二億五千元）」，以制止世界共產主義的前進」的演說，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歷史意義的；因為它反映着戰後國際局勢的新變化，也反映着美國外交的新動向。

首先，就國際局勢來說，統治資本主義世界垂二百年的大英帝國，今天真正沒落了：她已被迫放棄了對資本主義世界的領導權。自這次大戰結束之後，英國即一步一步地向後撤退，一點一點地把她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所担负的傳統國際任務逐漸放鬆；到了現在，連一向被她視為禁錮的東地中海和中東，她也只好讓美國插進一支腳來。據英國人自己的說明，在過去兩年當中，單在巴勒斯坦和希臘兩地，英國已經化了一億六千九百萬鎊，折合美元為六億五千萬美元，約當美國對英州七億五千萬美元的六分之一；單在這兩個地方，英國駐軍已達三十萬人以上。僅僅兩地已經如此，如果再加上埃及、印度、整個中東、印度尼西亞以及遠東各地，則英國的負担之重，不言而喻。在過去英帝國全盛的時代，英國還可勉強支撐過去。然而今天的英國却是走着下坡的帝國，她的國力已無法挑起這樣沉重的負担；反之，她本身的成敗興衰却取決於她能否把所有的財力和人力全部集中起來，用之於恢復本身的國力。在「生存第一」的原則之下，她只得忍痛犧牲，把過去的禁錮地帶一個一個地開放，要美國來共同負責保障其安全了。而美國呢，凡英國所已經或正準備讓出來的地方，她都有意全部加以接收，因為她正決心代替英國來担負起「維持資本主義世界一般安全」的傳統國際任務。杜魯門演說的第一個值得重視之點就是：這篇演說是資本主義世界領導權確實由英國轉移到美國手中的最顯著的證據。這轉移的趨勢與過程自第一次大戰結束以來就已經存在，已經開始了，但在今天纔不折不扣地宣告完成。

爬上了資本主義世界領導者的寶座的美國，爲了完成其傳統任務，已自行揭破了一切「民主、自由」的假面具，不僅繼承了大英帝國在土、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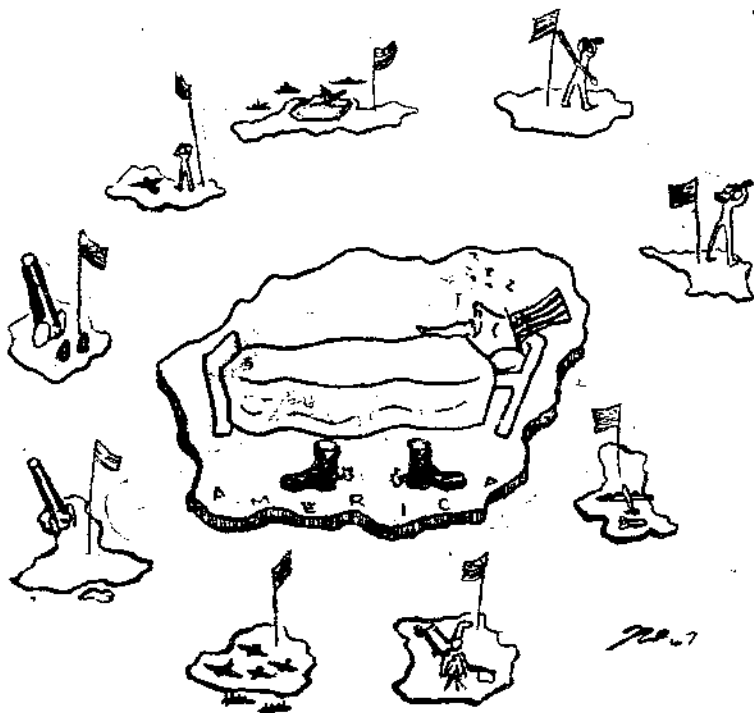
兩國經濟政治權益，而且還繼承了大英帝國「維持資本主義世界一般安全」的那套權力政治的老法寶——即與全世界最反動最陳腐的勢力勾結起來，通過它們去鎮壓較新興的革命力量。近兩年來，美國國內輿論對於美國政府外交政策上支持各國反動勢力的趨勢幾乎一致攻擊，認爲美國既不應該援助極右陣營，也不應該援助極左陣營，而應當鼓勵「中間的、自由主義的份子」獲得各國政治領導權。這種看法是如此之強有力，使得馬歇爾今年一月七日的「對中國局勢申明」都受了影響，而提出在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中找出「中間的、自由主義的份子」，鼓勵他們在蔣主席領導下整頓中國的辦法。由這，我們可以看出，不論美國外交家的內心如何想法，至少在表面上，在兩個月之前，他們還不敢公開用語言或文字來支持極右反動力量的。可是，今天的杜魯門演說却大胆地拋棄了所謂「鼓勵各國中間派自由主義份子」的外交政策，赤裸裸地表示出準備用金錢和軍備來接濟極右反動政權的決心和意向。譬如，以希臘的現政權來說，美英輿論幾乎無一不是確認其爲腐化、貪污、反動、殘酷的，甚至連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們過去也會一再如此評論過；然而這次杜魯門演說却竭力讚揚它的代表性，同時把目前希臘慘景象的一切責任，全推在革命勢力身上，竟敢公然抹煞事實，說「政治紊亂以及經濟不安，全爲該國武裝極端份子稱兵作亂之結果」，而要求美國國會立即以經濟及其他援助支持希臘現政府。其實，杜魯門今天所要求於美國國會的，正是過去兩年當中英國在希臘所實際推行的東西。所以我們說，這次杜魯門演說象徵着美國外交政策的實際公開大轉變的開始。

不僅如此，杜魯門演說還象徵着美國外交政策的另一個極重大轉變：她已經毅然決然地拋棄了她自己所竭力倡導竭力支持的聯合國機構（包括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以及聯合國憲章所代表的一切政治原則了。如所周知，希臘問題目前正在聯合國機構的調查中，美國爲參加調查的一員。照理在聯合國機構未宣佈其調查結果並決定處理辦法之前，美國是不應該單獨行動的；即令想有所行動，也應該提請聯合國考慮，以聯合國的名義行動。可是，今天杜魯門演說竟然把聯合國丟在腦後了；他說：「局勢迫切

，需要立即行動，此在聯合國及其有關之各機構則未能予（希臘）以必需之援助。由這一句話，我們已可看出，美國對於聯合國是如何地沒有信心！按自一九四五年六月廿六日舊金山會議通過聯合國憲章以來，美國外交政策即以「支持聯合國」為其重要基本立場之一。今天美國超越聯合國對土希直接援助的舉動，首次向世界證明，美國今後的外交將不以「支持聯合國」為基礎，而積極傾向於權力政治的運用了。這一點，對於「聯合國機構」的打擊，自然是無比嚴重的。如果我們說美國這樣做法等於替聯合國敲了第一聲喪鐘，恐怕也不為過吧。至於於聯合國憲章所代表的政治原則，如「尊重各國主權完整」，「不干涉各國內政」之類，那更是拋在腦後了。美國準備借一筆鉅款給希臘和土耳其，但是却以兩國政府聘用美國文官及軍人協助建設，並監視貸款用途為交換條件。換句話說，為了迅速撲滅希臘內部的革命勢力，美國將派武官到希臘來主持作戰，派文官來主持內戰經濟。同時，為了把土爾其造成反蘇軍事基地，美國將派文官吏帶錢帶軍火來作實地佈署。在這種情形之下，土希兩國——尤其希臘——的主權和獨立，還有不受到犧牲的嗎？土希兩國的內政，還有不受到最嚴厲的干涉的嗎？

二

美國外交政策的這些新動向，雖然是針對着蘇聯的；可是蘇聯並不會在眼前就感受到威脅。首先是因為迄今為止，蘇聯的全盤外交政策是守勢的，其南方軍路形勢並未起任何決定性的變化。以希臘而論，蘇聯從未企圖支持過希臘的「人民解放軍」，雖然蘇聯一貫寄予他們以道義上的同情。這也就是說，蘇聯始終相信革命不是可以輸出的，她並不想幫助希臘的革命，也並不想把勢力擴充到愛琴海來。因此，她可以不必過問希臘的內戰。今天美國援希之舉，雖然把美國的勢力帶到了希臘國內，可是在今天以前的希臘不也是一直在英國的魔掌之下嗎？美國的加入，與英國共同統治希臘，並沒有改變希臘對蘇的形勢；甚至就是美國完全排斥了英國，單獨統治了希臘，也不見得就能改變這基本形勢。英美這種走馬換將的玩意，不過是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調整與矛盾



• 龍 尼 • 了成完策政全安

而已，一時還不致成爲蘇聯的威脅。至於土爾其對蘇的影響也許比希臘來得大，可是土蘇關係目前的焦點在海峽問題。在這一點上，一年多來蘇聯一直是採取守勢態度；她對海峽的基本立場是一定要明白地提出來的，她明知道土國在英美支持之下，一時決不會讓步，所以她目前政策的最大限度也不過只是反覆說明其立場而已，她始終沒有比這更進一步的行動。在美國公開積極地援土以後，土爾其頂多也不過是更強硬一點罷了，要說她願意充當美英的馬前卒，主動對蘇挑戰，把本國變成美英與蘇聯作戰的戰場，那是絕對沒有可能的事情。這在蘇聯方面，縱令海峽問題始終不得解決，也不過黑海出口不大自由而已，蘇聯也絕對無意要以武力來迫使土爾其就範。既然土蘇兩國都絕對不會主動地相互挑戰，那美國加緊援土又如何能在眼前威脅到蘇聯的生存權利或基本利益呢？既然杜魯門新外交一時還不致成爲蘇聯的威脅，那蘇聯在莫斯科會議中是決不會改變其對德奧遠東等問題的基本立場，犧牲原則來求取對美英的妥協的。外電所傳蘇聯因杜魯門演說而一改採異常妥協態度——之說，顯然無可信之理。假如杜魯門演說的目的是在莫斯科會議期間發動一種神經攻勢的話，那這攻勢一定像像潮濕的爆竹一樣落空；假如他的目的是在造成一個軍路形勢的均衡，以便維持一個相當時期的武裝和平的話（我個人認爲這不是外交攻勢，而是美英企圖維持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間的武裝和平的具體步驟），那我們相信，蘇聯亦無所懼。

事實上，最倒霉的不是蘇聯，而是土希人民和英國。土希主權已被蹂躪，這我們已在前面說過了。土希反動政權因美國政治經濟軍事援助的撐腰，勢將愈趨反動保守，愈趨殘酷鎮壓；今後土希人民可能過着相當長期的更黑暗更艱苦更受迫害的生活，自在意中。但最滑稽的是，蘇聯還沒有打着，恐怕美國這一着倒先會把自己的老伴英國打痛了；英國在土希的權益勢非受到嚴重犧牲不可。如所週知，英國國民經濟如須復興，照英國政府的說法，非把她的輸出貿易大加擴張，增加到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七十五不可。但美國貨價廉物美，目前正以極大的速度，在全世界市場上排斥英國貨的銷路

。一般估計，美國經濟恐慌勢難避免，並且可能在一九四八年就會來臨。萬一恐慌真的到來的話，美貨將會更尖銳地尋找市場，那時英國就更不得了。英國現在是以政治控制來達成經濟上擴大本國貿易、限制美國貿易的企圖。譬如，到今天為止，美國船隻要到希臘港埠停靠，事先必須得到英國駐軍當局的許可。倘若這種政治控制失去了，英國貨物被迫與美國貨物自由競爭的話，那前者必定失敗無疑。然而今天的英國却是經不起些微失敗的，否則她的國民經濟就無復興的可能。維持政治控制吧，則駐兵要錢要人，把有用之錢之人投在希臘，對國民經濟有極大損害；撤去政治控制把錢和人調回來投進國民經濟部門中去吧，又怕美國貨乘虛而入，奪去了英國的市場，也對英國的國民經濟有極大損害。這真是大英帝國的極度苦悶。最理想的辦法是，美國出錢出人，把希臘的反動政權維持住，把希臘的革命勢力鎮壓下來，同時美國貨還是不到希臘去，讓英國貨繼續佔有希臘的天下。可是，這一點辦得到嗎？美國會這麼客氣嗎？一句話總結起來可以說，美國之插入土希，表面上雖說是反蘇防蘇，實際上却盡了替自己擴張市場擴張政治影響的任務；反蘇防蘇之效未見，而大英帝國的利益已先被排擠，同時土希各國人民的福祉也被犧牲。

但杜魯門新外交却將產生一個嚴重的後果，那就是把世界從此真的分為兩個。再對和平有信心些的人，看了美國這種做法，恐怕也不能不準備武力週旋了。如果說，第三次世界大戰，以前並毫無可能的條件的話，那今天由於美國外交政策的轉變，不僅使大戰的危機存在，而且使戰爭比較近了。爲什麼我們只說「近了」，而不說「立刻就有爆發的可能」呢？因爲在美英兩國，沒有人願意作戰，無論好戰者怎樣熱烈地煽動對蘇作戰，在一個不熱心打仗的人羣中是挑不起戰爭的。拿第一次大戰之後的對蘇武裝干涉爲例，儘管各國反蘇份子發動了干涉，可是各國人民却並不予以支持，結果使干涉不得不停止。這次戰後，情形完全是同樣的。所以，雖然美英的好戰份子有一邊打蘇聯，不如趁現在美國獨佔原子彈祕密的時候早打一戰的號召，然而戰爭還是一下子打不起來的。只要戰爭不是馬上打得起來的話，那也許人類的智慧可以終於把已經存在了的戰爭危機消滅掉，也未可知。

三

很自然的，在地球這一邊，人們所最關心的問題是，杜魯門新政策會推行到遠東來嗎？

我們的答覆是，在某些國家，美國正準備推行。以朝鮮而論，美國軍政

府在朝鮮所化的錢，恐怕不止十萬萬美元吧。以日本而論，美國佔領軍所耗費的金錢，每年恐怕至少在六七萬萬美元左右吧。現在美國已籌備設立南朝鮮政府，並貸以大批款項。至於日本，則美國既然不預備解散日本的財閥，那美國就得準備向日本工業投資。所以，今後我們將會看到美國在日韓兩國推行與對土希同樣的金圓外交，是無可置疑的。

但在中國，美國早就推行了與對土希同樣的金元外交，不過現在被迫暫時停止了。據美國權威方面的統計，自戰爭結束以來，美國給予中國政府的經濟援助，包括金錢與物資等，已超過了美國對英借款三十七億五千萬元的金額；展望今後，假如還要繼續這種援助的話，那平均每年美國得供給中國至少十萬萬美元以上的援助，說不定可能達到廿萬萬元。這些錢幾乎全部用於內戰，而由於內戰的擴大，生產就越加減少；最後中國政府的內戰財政勢非完全由美國來負擔不可。儘管美國在過去兩年中這樣拼命幫忙，用美國人自己的話來說，「美國之對待中國，不僅不薄於對英，甚而厚於對英」，但中國人民力量的強大，却使中國問題仍然解決無望。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感覺到厭倦、絕望了。他們的輿論界於是湧起了兩種論調：第一、美國的經濟能力是否無底地替中國政府担負起籌劃內戰財政的任務？因爲美國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領導者，美國不能盡其所有來支助中國政府打內戰，資本主義世界還有其他的地方需要美國的幫助。第二、美國這樣做法，究竟對於美國商品與資本的市場的擴張有無確切幫助？什麼時候纔有確切的幫助？正是因爲追究這個問題，所以美國反對繼續支持中國內戰的論調，不僅是來自左翼自由份子的陣營，而且就連銀行、工商各界也都一致參加了。

由此可知中國與希臘之間有一個最顯著的不同之點，就是中國人民力量的強大，遠超過於希臘之上。除非美國決心無限制地拿出金錢和武裝軍隊來鎮壓，否則是有法子把中國人民的民主要求壓殺的。然而美國能這樣做嗎？我們估計，除非中國內戰發生絕對有利於政府的變化，否則美國恢復對中國政府的援助便還得審慎考慮。

此外，在美國考慮恢復對中國政府援助的時候，她還得考慮對蘇的關係。因爲在過去兩年中，儘管美國這樣拚命干涉中國事情，蘇聯却一直是袖手旁觀的。美國是不希望蘇聯放棄其旁觀政策呢？這一點對於杜魯門新政策是否準備在中國執行，也有決定性的影響。

莫斯科會議一夕談

程程

有客來訪，談到時事，一發而不可收拾，費去了整整一個黃昏。及客離去，擲錄閒聊中不算廢話的部份，以饜讀者。

這一响的局勢真叫人苦悶。看各方面的情形，內戰還一時結束不了。莫斯科會議恐怕也會不歡而散。中國談和，的確比「紙上談兵」還要困難。但是蘇京會議却未必失敗。本來會議才一開幕，便現出不祥之兆。莫洛托夫提出中國問題，一面爲了替羅馬歇爾；一面也想從側面探究美國對中東一隅的意向，因爲在會議開幕之前，英美接觸已很頻繁，英軍早作撤離希臘的打算。果然，杜魯門發表了援助希土現政府的演說。這完全是挑釁的姿態。蘇聯逼迫美國攤牌，美國又翻手逼迫蘇聯攤牌，兩方外交都在爭取主動，不怕世界多事。

杜魯門簡直存心不讓梅特涅專美於前。若把希特勒比作拿破崙，杜魯門便是「神聖同盟」時代的梅特涅。一個要阻止十九世紀的民主狂潮，一個要挽回資本主義的頹勢。美蘇關係的逆轉，必然妨礙蘇京會議。那是不是不錯的，但是你要注意，會議的本題還是德奧和約。關於中國問題，蘇聯的原意，是與英美正式交換「意見」，現在充其量是交換書面「情報」。不過，這是指會議本身來說。至於會外三外長之間的商談，或史達林與馬歇爾之間的商談，依然可能舉行。而且，以先後來說，這問題勢必要拖到會商德奧和約

之後去談，多半要受德奧和約的影響，而不影響德奧和約。至少在目前，蘇聯認爲遠東問題的比重是遠遜於歐洲問題的。倒是美國聲明支持希土兩國，這一陣鎗法着實要得厲害。蘇聯照架之功不外二途，第一個辦法是暫時不談，讓整個希臘問題繼續由聯合國去調查，去處理，而準備將來在安全理事會中再算賬；對土耳其，則可能放棄蘇土直接商談海峽問題的方式，而接受土方意見，召集蒙特惠會議簽字國，來共同商討修約問題。另一個辦法是以強硬態度對付強硬者，週旋到底。但是，我個人認爲前一辦法的可能性較大；截至今日爲止，蘇聯對各鄰國的共產黨并無實際提攜，而祇有精神上的聲援。她對希土兩國局勢，恐怕寧願讓它拖着再說。你這種講法失之鴉雀無聲，彷彿世界是割裂的，彷彿各個問題之間毫無關聯。現在杜魯門放的一砲，硬是把門羅主義擴充到歐亞兩洲了，硬是企圖問鼎世界了，你却還是這樣盲目樂觀。

不，我決不小視美國最近的擴張政策，這的確是威脅世界和平，反遠聯合國憲章的精神的。現在，美蘇之間的猜忌和敵視，無疑又加深了一層。但是除非美蘇兩國對於和平已經確實絕望，否則他們還是要作繼續的嘗試的。眼前便是有關德奧問題的爭議的纏綿。這工作本身就極艱巨，美蘇之間的距離很遠。當然，

主要的還是德國問題，對奧便簡單得多。這就夠人頭痛了。疆界、賠償、肅清納粹、統一經濟，樹立中央政府……啊，嗚呼！別忙，我們要看問題的根柢，莫看問題的枝節。德國問題是根本，而德國的疆界和政制兩項更是根本中的根本。我不是說其他問題不重要。須知這兩項一旦解決，其他也就迎刃而解，這兩項若不能解決，那末其他縱令獲得協議，仍然簽不了和約。

疆界是重要的，我很同意。政制不過是個形式問題。美蘇是聯邦國家，英法是單一國家，大家都可以民主，大家都可以獨裁，聯邦可與單一國爲友，聯邦與聯邦又可爲敵。你聽我說，疆界決定現狀，固然極其重要，政制決定將來，所以也同樣重要，德波疆界是有過臨時協議的，早已成爲「現狀」，現狀是不易推翻的，美國偏偏要來反對，恐怕她的真意倒在藉此換取蘇聯在其他方面的讓步。我想波蘭決不致於被迫吐出已經嚥下口的東西。反對國際共管魯爾萊茵兩區的，也以美國爲首；她唯恐東歐繼續閉關鐵幕，而西歐却伸進蘇聯的鐵腕。將來疆界問題必費周章，但彷彿也有解決之途：爭執兩方，各有所求，大家達到目的，天下太平。反正東西兩個陣營的輪廓早已存在，事實上祇可追認，不能否決；吃虧的還是德國。那末，她真戰罪，沒有話說說來倒是容易，那末德國中央政府的問題呢？

法國竭力主張聯邦制，想防止德國產生強大的新中央。這是英美全意的，又爲蘇聯所反對。倘若成立聯邦制的德國，各邦便保有很大的權力；而在經濟方面，德國西部各邦本是工業繁盛區，遠佔了東部農業區的上風，再加上西部納粹殘餘勢力曾受英美的寬容，便可能通過各邦而操縱聯邦政府，使整個德國右傾。蘇聯所懼，其實在此，倒不是中央集權才算統一民主，地方分權必會分裂獨裁。其實任何聯邦政府，實際上總還握有國防、外交、對外貿易和調節國際貿易的幾項權力。此後德國諒無軍備，祇剩下外交和經濟。若是德國的聯邦政府也採取聯合政府的形式，保證對外左右親善，而不是左右騎牆，且在全境經濟統一的局面下，適當調劑東西兩部的農業，那末蘇聯便可安心了。關於這一層，首先還需要美國放棄她的獨佔資本，其次是莫再一味扶植舊時納粹。

真是笑話！對杜魯門還講什麼「聯合政府」，「左右親善」，「放棄獨佔資本」！還有英法哩！英法的現政府總不致於一味偏袒美國吧？她們慢慢變成國際間的「第三方面」了。不過，我總覺得你所說的，總還是你本人的幻想。我不過提出些兼顧爭執雙方的辦法，將來事實究竟如何，那怎麼能預測得了？你說到「幻想」，其實人類近作了一劇在美國上演，名叫「送水的人」(The Iceman Cometh)。照他的講法，人的「幻想」一旦毀滅，人也就不活了，人如此，世界亦復如此。

三月十八日書成。

三月十八日書成。

我個人是很喜歡民歌的。生長于窮鄉，從小就加入了割草的，放牛的野孩子隊，唱別人編的歌子，或者自己也七講八扯上幾句什麼：

「天老爺，不公平，」

人家坐車我步行。」

那時候，正是「狗肉將軍」張宗昌「坐」山東的時候，招兵買馬，大打天下，於是，就產生了：

「老鄉見老鄉，

兩眼淚汪汪，

你就跟着張作霖，

我就跟着張宗昌，

你就沒有錢，

我就沒有槍。」

今天，重讀這首民歌，不但童年時期拍着屁股在草地上放浪的那種生活野趣再現眼前，張宗昌時代的贖武和民怨也活栩栩的像一幅畫圖了。

二十三年，在臨清中學教書，聽到了當地許多民歌，覺得很可愛，因而起了一個「宏願」，想從事搜集一下，並且曾經計劃把周作人在「北大」出版的民間歌謠集找來讀讀，另外發徵求信到各地去徵求，但，這些「宏願」終於成了泡影。臨清，早婚成俗，新婦早已長年，而新郎却往往是十歲左右的一個孩子，何以見得？有諷刺民歌為

證：

「十八的大姐九歲郎，

抱了上牀抱下牀，

說他郎來郎還小，

說他兒子不叫娘。」

民歌是一個汪洋的大海，它包涵得實在太豐富了。如果把這海面比做鏡面的話，那，每一個時代的影子，人民的悲憤和希望全都可以清清楚楚的照出來。如果，一橫一縱的把它採集起來，分門別類加以研究，一定可發現無數的珍寶，足供欣賞，學習的。可是，我這篇小

民歌的「刺」

臧克家

文儘是關於諷刺的一點點，既不是研究，又不深不廣，漫談而已。

最古的民歌總集——詩經，我們雖不能隨乎溜乎的逐著一般古儒和腐儒「美，刺」的說法，但裏邊有許多諷刺詩篇却是不能否認的，例如：

「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廩兮，

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貍兮」……

注解上雖然沒有注這是一「刺」，其實照我看，這些句子既怨憤而又

帶「刺」的。

「左傳」上載記著一個故事：宋國的「華元」被鄭國俘虜了去，宋國用兵車和文馬把他贖了回來，守城的看了他來了，毫不客氣的就著他那副「尊容」來了一首諷刺詩：

「睥其目，

蹙其腹，

棄甲而復！

子思子思，

棄甲而來！」

每一個時代有它的黑暗和弱點，每一個時代有它的諷刺民歌（文

人的詩不算在內）。

「爛羊頭，

關內侯，

灶下養，

中郎將。」

請讀讀幾千年前的古歌，再就眼前給它對證吧。

「一斗米

尚可春，

兄弟二人

不相容。」

請讀讀幾千年前的古歌，再想想我們「閱牆」的內戰吧。抗戰期間，產了大量的諷刺民

歌，有一首是關於汽車的，雖可笑，然而却太逼真了：

「一去二三里，

拋鏢四五回，

下車六七次，

八九十人推。」

戰事結束了，人家勝利，我們也借光勝利了。四萬萬人的一個共有的大希望一下子破了，隨着勝利而來的却是千災百難。老百姓用自己的口唱出了自己的心，那麼痛苦，而又那麼辛辣！這樣的歌謠真成了今日的「國風」，吹遍了二十幾省，已經另有朋友把它們採集在一起了。

其實，也不必是成串的歌，三幾個字也可以不朽了：

「重慶人」——這三個字比千萬句歌謠更有力，更豐富，更含蓄，也更狠毒了。

「五子登科」（金子，房子，館子，戲子，女子）——這四個字已經畫出了圖形，說盡一切了。

我希望對民歌有興趣的朋友們，多多努力，把這個動亂大時代裏產生出來的民歌採集齊全，給後代留下一面鏡子，這不但是功德無量，而且還可以使詩歌工作者們從中汲取一些滋養。

民歌，是一位老人，也是一個孩子。 三六年三月九日

笛福和他的魯濱孫飄流記

楊晦

「魯濱孫飄流記」這部小說，在中國很流行是很廣的。最早在三十年前，林琴南和會業採取直譯相助法就用文言譯出來了；至於語體文的譯本，後來出版的就不止一種；英漢對照的本子，有幾家書局都印行過；而且，中學或是大學裏，採用它的英文原本作教科書的，更不知有多少。這似乎沒有再來介紹的必要。

然而，這部書對於讀者的影響，好像並不大，或者說是並沒有發生它應該發生的影響。這，因為被採用做了教科書，減低了讀者的興趣，當然是一個原因；同時，一本教科書不能如期教完，就丟開了，學生因為它是做過教科書，很少再肯把那剩下的部分自己去讀完，那情形也很普遍。而且，這個故事雖然能喚起一些青年讀者的夢想，却不能使中國現代的許多青年讀者滿足；因為，要求面對社會，正視現實的青年，不滿足於它的面對自然，好像遠離開人間的一樣；那些富於感情與想像的，又覺得它沒有一點羅曼諦克味道，不夠勁，也是難免的。

免的。

於是，這部小說的價值和意義，在中國的讀者面前，反倒模糊起來。而且，就跟「吉訶德先生傳」在中國的情形有些相像，我們只知道吉訶德先生，却忘記了那位偉大的作家，塞文提斯；我們對於「魯濱孫飄流記」的作者，但尼爾·笛福也是一樣地生疏，而且隔膜幾乎到了忘記有他存在的程度。其實，笛福的一生，是真正的一幕悲劇。假使有人把他的生平介紹過來，對於讀者，那種感動和教訓的意義，恐怕就比他的小說還要大，也難說。

X X X X X
法國的盧梭，在他的教育小說「愛彌兒」裏，曾經推薦「魯濱孫飄流記」是愛彌兒應該讀的第一部書。他是以自然教育的觀點，來這樣推重「魯濱孫飄流記」的，跟我們的看法，當然不盡相同；但是我們一樣要推薦這是一部應該讀，而且真正值得讀的作品，雖然不能說是第一部。

順便我可以說，我們的青年讀

者，倒無妨把「西遊記」、「魯濱孫飄流記」和高爾基的「母親」這三部小說，做一種比較的研究，順次地讀上兩遍三遍，以至於許多遍，都不會算是冤枉。關於高爾基的「母親」，我曾經介紹過，就是「西遊記」，也以後另寫一篇文章，先不多說了。「西遊記」是中國封建專制時代的產品；「魯濱孫飄流記」產生在十八世紀，正是英國資產階級社會的上升時期；至於「母親」却是二十世紀初，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正在興起。對小說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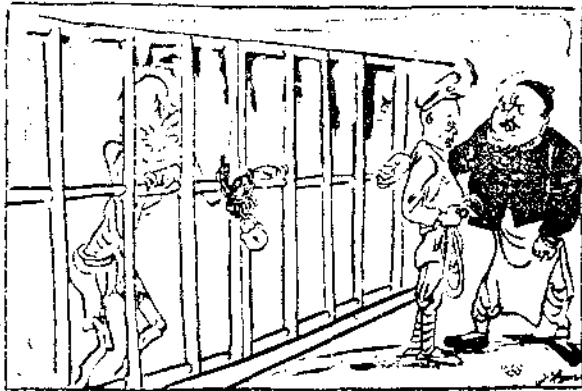
個人物，產生在三個不同的時代，然而，却有着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在走他們要走的或者說是應該走的道路，都是有着堅定的信心，堅強的意志，使出了他們全部力量，不怕艱難，不怕困苦，不灰心，不退縮地去實現他們的志願。我們這個時代的青年，因為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質，就站在這三個人物的三個時代的邊沿；我相信，這三部小說，對於我們的青年讀者，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義，值得推

薦。

X X X X X
「魯濱孫飄流記」是一七一九年出版的，那時候，作者笛福已經快滿六十歲的老人了。

笛福是多產的一位作家，正跟他是多方面活動的情形極相似。他做過襪子商人，經營過磚瓦廠，擔任過會計員，編過雜誌和報紙，坐過監，參加過反抗詹姆士第二的叛變，幹過政治工作；至於反對國教更是他一生裏始終都堅持的一種活動，有時用文字，有時用行動。在他年輕的時候，大概還跑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去混過幾年。

在英國，當時的情形，無論是宗教，政治，以及社會各方面都充滿了衝突和矛盾。在宗教上，有所謂國教派，又有所謂反國教派，站在反對的方面。政治上，有保守黨和自由黨的對立；大概保守黨多是國教教徒，自由黨多是反國教派教徒。這種種鬥爭是非常激烈的，曾經造成了多年內戰的局面。後來，內戰雖然停止了，而政治宗教的鬥爭却依然繼續；笛福在他的



就非常發達。像「魯濱孫飄流記」不過是其中最成功的一部吧了。而且，當時的確有過一個蘇格蘭水手名叫塞而其克的，曾經被丟在一個荒島上，過了四年零四個月月的荒島生活，又被人救了回來。這個故事曾經轟動一時，魯濱孫的故事，箇福是從這里取材的，大概不成什麼問題。

魯濱孫生長在一個中產的家庭，「他的腦袋裏從小便充滿了漫遊的思想」。雖然他的父親要他學法律，「他却一心一意地想航海。」

這種心情，我們是很能了解的。在我們這個社會裏，當封建勢力瀰漫在社會上面，而反動的劍俠神怪的小說以及小人書等類的落後迷信的思想，在支配人心的時候，不是我們的知識分子都有許多在那裏吃齋念佛，扶乩看相；有些小孩子會棄家出走，要到峨嵋山去學道的嗎？不是到了某一個時期，受另外一種力量的感召，又有許多青年，會冒險萬險，衝出這種封建反動的封鎖與包圍，奔赴另外一種境地的嗎？在航海風氣那麼盛的當時，那麼盛的英國，一個小孩子，「一心一意地想航海」，反倒非常之自然。

這正跟尋常所說的「校風」「班風」之類差不多，每一個時代，

每一個社會圈裏，都由於事實的要求，造成了一種風氣，成功一種氣氛，形成一種好像是在冥冥中的力量，在那裏召喚着，支配着人的心情，指示着人們活動的方向。這種召喚，在形成的時期，幾乎是不可抗地成爲一種趨勢，往往更形成一種運動。

魯濱孫就在一種海外冒險的氣氛裏，受了召喚，不但「充滿了漫遊的思想」，並且，不管他父親的怎樣勸阻，母親的怎樣傷心，終於在「一個不祥的時辰裏，走上了一個到倫敦去的船隻」，開始了他的海外冒險。這時候，他是十九歲。我們當然不會像他父親那樣，說是出於「小孩脾氣」，是他的「自尋苦惱」。然而，他的這次出發，却是有一點不祥的，可以說，因爲他這第一次的航行，就在途中遭了風浪，沉了船，不得已，改由陸路到了倫敦。然而，「他的惡運却固執地逼着他往前走」，好像我們常說的「鬼使神差」的一般，有一種不可抗的力量，使他往前走，使他就是「死到眼前還要一直闖上去」；於是，惡運跟着惡運，災難接着災難，中間有幾次可以安靜或者安定下來了，他却盲目地「放縱他的飄泊的志願」，像放縱一匹野馬，使

他終於飄泊到一個荒島上去，「受盡人類的不幸」，一過就是二十八年，這才回到了他的故國。

× × × × ×

魯濱孫在第二次到非洲去的時候，遇見了土耳其的盜船，被擄到摩洛哥西岸的沙利城，做了奴隸。過了兩年奴隸的生活，坐着小船逃了出來，在非洲沿岸飄流了許多天，被一個葡萄牙商船的船主救到了巴西。

在巴西，魯濱孫經營起藤田來，「事業非常昌隆」。假使這樣下去，他是可以跟他的父親一樣，過着安靜的「中產之家」的生活，「可以幸福無窮」的了。然而，他却接受了管貨員的職務，又一度地到海上去碰他的運氣，往吉尼亞海岸去買黑奴。於是，在海上遇上了暴風，把他們的船，一直「刮出人類貿易的區界之外」。全船的人都遭了難，只剩下魯濱孫九死一生地殘留在這沒有人煙的荒島上面。

就這樣，開始了他荒島的生活。這是，正如魯濱孫所說的，「返於絕對的自然的階段的」生活。人類社會裏所有的一切，都要從頭來，要重新開始。

不過，我們要知道，魯濱孫是英國十七世紀末的航海商人，又會

上海駁運公司

油駁 鐵駁 木駁

經濟迅速
設備完善

為顧客承辦上海
本地一切駁運業務

歡迎賜顧

地點：上海四川中路125弄20號

電話：一三二二四

經濟部登記

中國衡量公司

「公正」標準

業務：

為輪船公司與客貨
間辦理過磅量尺等

地址上海四川中路125弄20號

電話一三五六五

南榮記報關行

地址上海廣東路一二二號
電話一〇四一八

營業要目

專為各地客商辦理報關

歡迎賜顧

和記報關行

業務↑

↓專門代客辦理

南北洋
長江綫

各地客貨報關

歡迎賜顧

地址：上海廣東路一二二號

電話一〇四一八號

三北輪埠股份有限公司

航行：南北洋綫
長江綫

堆棧：各處均有設備

總公司——上海廣東路九三號 電話一二九五〇

分公司——天津·青島·福州·寧波·香港
·南京·九江·漢口·宜昌·重慶
·蕪湖·安慶·

宏豐企業公司

總公司 上海廣東路五十一號
電話 一一四三三—五

承辦進出口業務

分公司 漢口聯保里五號
重慶林森路一二七號

行銀豐怡

務業切一行銀業商營經

實扶
業助

社服
會務

號二衙府二路生民慶重 行總

號七六四路西江海上 行分

號一〇一〇二話電

附刊

第三期

和平何以會死了.....張東蓀

法幣將往何處去.....漆琪生

當前國際形勢.....石嘯冲

台北二周記.....胡帝

3

夜讀散記.....雍蒲尼

我好像到了一個鬼世界(詩).....穆木天

寓言二題.....畫室

漫畫.....穆企·張文元·尼龍·曾景初

木刻.....李樺



南榮記報關行

地址 上海廣東路一二二號
電話 一〇四一八

營業要目

專為各地客商辦理報關

歡迎賜顧

和記報關行

業務↑

專門代客辦理 南北洋 各地客貨報關
長江綫

歡迎賜顧

地址：上海廣東路一二二號
電話一〇四一八號

上海駁運公司

木駁 鐵駁 油駁

經濟迅速
設備完善

為顧客承辦上海
本地一切駁運業務

歡迎賜顧

地點：上海四川中路125弄20號
電話：一三二二四

本刊園地公開，

歡迎投稿，

歡迎批評，

歡迎定閱，

歡迎介紹！

時與文週刊

發行人 程博洪

編輯者 時與文週刊編輯部

經理部 上海牯嶺路三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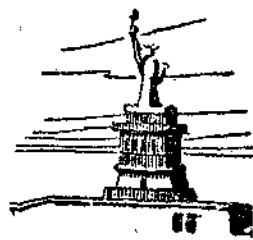
電話九〇二一九

本刊經理部啟事

本刊創刊伊始，承蒙 各圖書館、各機關及文化團體，紛紛函請贈閱，盛情可感，原應遵寄，惟以目前印刷、紙價高漲，成本昂貴，為免過重賠累，決自第四期起，概停贈送。如荷 訂閱，均接七折優待。區區苦衷，敬希 鑒諒是幸！此啟。

和平何以會死了

張東蓀



軍調部結束了以後，繼以各地共產黨人員的撤退，和平之門到此可謂已完全關閉了。

從今天來說，和譚最後失敗不是一件奇事。而在去年一月十日居然能開政治協商會議，反倒可算是一個奇跡。我是參加該會議的一人，當時忙於開會，疲勞太甚，不暇細想；今天回想起來，却宛如一夢。不過這個夢却是預先有人在暗中安排着的；只是我們居心太忠厚了，所以當時雖有懷疑而總是自己打消這個猜慮的念頭。到了今天，一切大白：協商的失敗是邏輯的；成功倒反變為奇蹟了。

當時我所最不能了解的，是何以政協會必須急急忙忙的閉會。雖有第一次延長兩天，第二次延長一天，但許多的問題並沒有議完，換言之，即沒有得到解決。對於這些未得解決的問題，只要當時能再延長二三天，我相信都可以全部解決了。舉例言之，如國府委員名額的分配，行政院各部的分配，以及憲法草案上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的具體方法與地方均權的具體內容等等，都是被遺留在外，沒有得最後的決定。可以說關於政協五項決議，只除了和平建國綱領一項以外，其他四項每項都留有一些「未完」作尾巴。於是政協決議遂變為一個本身有漏洞的東西，因此便有做曲解的可能性。

到了今天，更證明這樣的做法是根據於有一

個事實背後。請恕我用一套新名詞來說明這個事實。大家都知道近代國家之所以成為近代國家，即在於其政府是人民的工具，爲了人民的需要而始設立政府，我名之曰「職司政權」(Functional Government)。而古代政府不然。古代都是帝王制，以土地與人民以及國家全視爲他一人之私產。此即所謂「家天下」，我名此爲「絕對政權」(absolute government)。職司政權恰如一架機器，人事更動不致把機器完全變化了；古代性的政府則建築於自然人之上，其人的性格與脾氣尤有決定力。由絕對政權而改爲職司政權，這是一件最難的事。所以李公樸先生在慶祝政協的大會上高呼「不流血的革命」。倘政協竟得成功，這確是可稱爲不流血的革命。如果政府的實質未有改變而政協猶能成立，這倒是政協的不幸。政協的失敗是政協的幸運，因此方能證明這個問題的核心實在甚難地方。

須知絕對政權是不可分割的；只有職司政權可以分配而得聯合。由此便知國民黨的現政府對於讓出政府中一部分的問題，無論如何是有限度的。超過了其限度，便是把他的絕對政權分割了。古代式的政府一經分割，立即倒坍。所以國民黨認爲聯合政府是他們的生死關頭。無論如何不承認聯合政府，而以承認擴大國民政府基礎，就是爲此。國民黨有要維持其不可分割的絕對政權的苦衷，而又不能出之於口，於是有種種的花樣，但花樣雖多而百變不離其宗，此即國民黨的「以不變應萬變」與「以萬變保不變」是也。

大公報的王芸生先生說中國有三條路：一爲十月革命，一爲南北朝，一爲政協。據我觀察，現政府於國大閉幕以後已決心不走政協的路了，甯願劃若干地方給共產黨。當然在形勢上不類南北朝，然而亦有一些具體而微。因此我們便知國民黨的考慮是甯願南北朝而不願聯合政府。

關於國民黨方面，我們可以這樣說：有些人往往來問我，政府對於和談究竟有無誠意；我爲與其問政府對於和談的態度，毋甯問國民黨對於政府性質的改變有無決心。使我發笑的是：青民兩黨居然要求實行責任內閣制。共產黨以數省土地，數十萬軍隊，想換取這個都不可得。所以不拘青民兩黨說得如何天花亂墜，而國民黨所肯讓與的總是在他的絕對政權所容許的限度以內的。

其次我們要說到共產黨。我們從來沒有以爲共產黨有百是而無一非。不僅此也，即著者所隸籍的民主同盟，在這個演劇中亦不能說沒有失着的地方。但我以爲共產黨在協商上有一個障礙，就是他們的心理。我於此又起一個怪名詞，曰 Soviet mentality。須知蘇聯自革命以後，經過常年的封鎖，遂視外界全似敵人。共產黨經過十八年的顛沛流離，其情形亦復相同。所以他們的心理都不免於失常，總是疑心人家要來謀我，對任何人很難辦到完全相信到底。著者每次與共產黨人談話，總會有一個印象：就是他們的猜疑往往超過所應顧慮的程度。所不幸的是：自政協以後，件件事務都反而加強他們的猜疑。他們愈得事實的證明，於是其猜疑遂愈牢不可破了。他們的疑心病一深了，遂以爲一切皆不可靠；唯一的可靠者只是武力。所以使共產黨走上唯武力是信

的路上去，乃是環境逼迫而成。政協的可貴處，就在於那個時候能將共產黨拉回來。政協的失敗，在這一方面可以說是中國國運上的頂大的損失。

老實說，為國家前途計，必須把共產黨這種心理設法使之淡褪。因為民主主義的社會必是一個異質的結合，必須各個異質共存而互讓，隨時代的要求各有所遷就，互有伸縮，卒致調和，以無斷於統一。彼此思想不同，地位不同，利益不同，方面不同，而能辦到互信，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恐怕要經過訓練。我對於政協在當時本不以為一勞可以永逸，亦只是認為可以作為一個訓練的開始而已。

雙方互不相信而要締結一個契約，則必須有中人保人夾在中間。彼此雖不相信而對於中間的保人却是相信的。具有這樣中人保人的資格，自然是在國際聯盟中，在國內為第三者。最理想的辦法是：(一)國際的中保與國內的中保完全配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力量；(二)國際的中保亦不限於一國，凡能為國共雙方所信任的都可邀約；(三)國內的中保即第三者又務必儘量把國共以外的各方面都包括在內。這個理想却因為國際間不能大公無私，國內交際諸公沒有遠見，以致未能實現。幸而退一步的辦法居然一度嘗試了。這就是美國的調停。在其初，設立軍調部好像是認真的幹一下，却不料一着不慎，致留了火種。這星星之火後來竟致燎原。這個火種就是民主同盟二中全会政治報告上所說的那個禍根，質言之，亦就是停戰協定上的一東北除外。對於這一點，可有三個說法：一說是馬歇爾出於一時的疏忽；一說是馬氏上了中國人的當；一說是美國人於此確具有私心。我們不必多加揣測，但僅就事實來論，這確是美國自己把其中人保人的資格弄丟了的開始。自此以後一步不如一步，美國的

中人保人的資望與信用乃漸消失。這不僅是美國的不幸，而實在是中國的大大不幸。但中國國運的悲劇還不僅這一方面。國內在國共以外的第三者人羣中，不論政團或個人，很少真正了解這個神聖使命的。他們雖都樂於在這「一和談」的舞台上現身，却始終不知應該扮演何種角色。所以荒腔走板，一直演到觀眾不耐再看了。始作俑者當然是青年黨另要政協代表五名在民主同盟以外。到了今天，姑不論青民兩黨對於民主是否另抱有與眾不同的特別解釋，



家面前，現在我亦不用多述。民主同盟雖自始即在那裏辛苦支撐，但亦自始不斷為外界所壓迫。壓迫的目的在推恐民盟不偏左。須知在國共的中間，倘使有個勢力，十分強大，完全獨立，這却與和平很有決定的作用。凡處心積慮務使中間勢力化為左右兩分，不使其存在，便是好戰與反和平的確實證據。著者在政協會中除為人民爭自由外很少發言，後來亦非萬不得已不說話，不外乎總想不要因為個人言論而致民盟在國共間橋樑的地位受影響。

重 金 禮 聘 一 企 移

可見和平的失敗，論起責任來，恐怕第三者一類中有些人是不能逃避的。總之，今天和平失敗了，分析其中各因素頗為複雜。國民黨要維持其實質上的絕對政權，一也；共產黨因其疑猜心理，要求過分擔保，二也；美國人自毀其調人資格，三也；第三者中多數不了解中國國運所降下的神聖使命，四也。有這樣的四種不慮不危情形，則這個七巧圖絕對拚合不成，乃是當然的了。

本文寫至此，忽見報載莫斯科外長會議將要討論中國問題。於是我們便可以這樣說：和譚是死了，但尚未入殮。必定俟莫斯科會議後再看情形如何。不過據我個人猜想，蘇聯之意只注重在反對美國以軍火與借款援華，故其提議毋需為對美攻勢。苟美國忍痛接受，則可成爲三國相約絕對不干涉中國。預料共產黨對於這個情形是歡迎的。所以苟有三國共同調停，亦必是由美或英來發起。現在國民黨大發動一擁擠一運動，不知預備是對美呢還是對英。在我們看，美國有何舉動，都不會與國民黨不利。所以天下滑稽的事無過於此了。

三月十六日寫完。

法幣將往何處去

漆琪生

(一) 走近崩潰的危險關頭

法幣將往何處去？凡是認識當前中國經濟的危機，與憂慮法幣的前途底人們，都是對於這個問題異常關切，疑惑不解。尤其是此次黃金風潮之後，物價倍漲，幣價倍跌，更加增大人們對於未來法幣前途的惶恐與就心。法幣究竟將往何處去？這是現時中外上下，各界人士時刻在念與討論的最重要的問題。

誠然，法幣在今天確實走近了快將完全崩潰的危險關頭，我們無論從法幣膨脹的數字，與幣價跌落的程度，任何方面都可看出法幣很難長久維持下去，必將招致覆沒廢棄的結果，試先從法幣發行的膨脹情形而言。

人所周知，法幣的發行到了今天，已經膨脹成天文數字，非常龐大，不勝計算了。可是這個發行數字確有幾何呢？雖然財政當局迄今諱莫如深，不肯公佈，無從明瞭，然而我們可以由許多方面，從旁推測，亦可以探尋得出一個大概數字。

戰前法幣的發行總數，共計十四億元，抗戰期中逐年增發，直到勝利到臨時，一般的估計已經達到了四千億元，至三十四年底則增至一萬億元，三十五年上半年六月為止，再增至二萬一千億元，到八月又增至二萬五千億元，此後則每月皆以印發五百元與一千元大票為主，發行數量每月少則二千億元，多則五千億元，平均一月以三千億元的速度，增發到去年年底，竟達四萬五千億元的赫然鉅數。今年一月以後，二百五十元與五百元的關金大券問世，繼續五千元的大票亦跟着發行，發鈔比率突增五倍，此後便以每月一萬五千億元之膨脹率，增加法幣的流通數量，依照現時的比率進展下去，迨至今年歲末，法幣的發行總數，形將膨脹到二十萬億元以上，比較戰前要大一萬四千餘倍，比之去年年底亦要大五倍有餘，這真是一個天文學上的數字！

上列發行數字，再從財政預算上面來推量，今年年底是否有無膨脹到

如此地步的必要？今年度的財政預算，歲出共計九萬三千二百億元，歲入七萬億元，赤字預算似乎只有二萬三千二百億元。但是這個預算的編製，是根據去年十月間的物價作標準，事實上十月以後的物價步步上漲，等到今年年底不知將漲若干倍，所以這個預算數字是不敷支用到年終的，最多用到半年，便將用罄，所差之數，就要靠增加發行來彌補，年終實際支出的決算數字，必定比較預算數字超出數倍。按照往年的情形，支出預算與決算相差三倍，如斯則今年年末的歲出決算數字，將達二十八萬億元。歲入的決算數字，經常皆是不足預算的數字，即以二者相等而論，到年底財政實際上收支相抵後的赤字差數，將達二十一萬億元。這恰與目前的發鈔能率相符合，如是則到年底法幣發行將膨脹到二十萬億元以上的可能性，愈加確實了。

其次從法幣價值的跌落程度而言。法幣價值的跌落，表現在對內的物價，與對外的匯價兩方面上。年來物價的飛漲，異常猛烈，到去年年底，全國平均物價指數，比戰前上漲了九千八百倍，今年一月則增加到一萬一千五百倍，二月以後漲風益烈，一則由於舊曆年關後的季節性的上漲，再則由於黃金風潮所刺戟的投機性的跳漲，遂致在旬日之間，一切貨價，暴漲一倍至兩倍，最低限度現時的物價指數，總在一萬五千倍至一萬八千倍。等到年底物價上漲的程度，根據法幣膨脹比率與物價上漲比率的關係來推算，去年年底法幣膨脹的比率，為戰前三千二百餘倍，但物價便漲高至九千八百倍，後者約為前者的三倍。換句話說，法幣膨脹一倍，物價便將跳漲三倍。依此類推，今年年底法幣膨脹比之去年將增加五倍以上，那末物價在年底便將上漲十五倍了，物價指數就會上跳到十五萬倍，相反的即是法幣的對內價值，將會跌落十五萬倍。

至於法幣的外匯價值，雖然沒有對內價值下跌之劇，可是亦較戰前低落了三千六百多倍。戰前法幣對美金的匯價，美金一元合法幣三元三角三分，現在美匯的官價，則漲至美金一元折合法幣一萬二千元。由於政府極

力的管制外匯，匯價纔未至跌落到物價上漲的倍數，否則也是不堪設想的。

如上所述，法幣發行的膨脹，既然成爲那樣龐大的不勝計算的天文數字，法幣價值的跌落，既已達到那樣慘厲的不可挽救的一落萬丈，自然不能成爲衡量商品價值的標準，不便充作計算價格的單位，信用搖動，人心喪失，勢難維持長久，一天一天地逼近到體制崩潰的危險關頭，宜乎近來改革幣制的呼聲，轟然塵上。

(二) 徘徊存廢的十字路口

法幣之必須改革，現今已是毋容隱諱無可避免的當然趨勢，人人贊同，無何反對的；不過，究竟應在何時來改？如何去改？那就人各一見，大不一致。

關於改革法幣制度的時間問題，計有兩大不同的主張；一派主張即刻便改，愈快愈好；其他一派主張現非其時，稍待機會。這兩派的爭論，過去曾經喧嚷一時，旋復沉寂。此次國民黨三中全會開會，又有人提出現在就將馬上改革法幣制度，實行金本位制的議案，將來是否通過實行，尙難判斷，惟因此又將這個問題重新提起，喚起人們特別的注意。法幣是否應該即刻改革呢？現在確是一個爭論方殷的難決問題。

主張現時立即廢止法幣的論者，所持的理由，主要計有五端：(1) 法幣信用已失，存之無用，反而有害，早改革則早便利；(2) 法幣如不早廢除，則物價難穩定，預算難平衡，財政危機難於避免；(3) 法幣存在一日，則物價跳漲一日，人民生活益加困苦，金融波動益加劇烈，工商百業益加凋敝，社會秩序益加紊亂，不若趁早改制，恢復常軌；(4) 法幣不早改革，則匯價不能安定，不僅國際貿易不能好轉，並且阻礙國際貨幣會議協定之推行，與外資之投入，借款之獲致等等；(5) 早改法幣，可以早日結束內戰。

此種即時改制論的理由，是不正確的，何則？因爲現時對於改革幣制的各種條件，皆不具備，徒勞無功，甚而刺戟過甚，反將惹起經濟社會的軒然大波，加重人民的損害，弄巧反拙。第一，目前正在談判破裂，和平絕望，內戰擴大，政局混亂的時候，軍費政費，支出浩繁，財政決難平衡

上海灘(塢)！



張文元作

，通貨積極膨脹，維持法幣固如此，改用新幣也如此，改而等於不改，何必多此一舉，使新幣的信用也喪失呢？第二，政府現時百廢待舉，應付不遑，改幣準備，絲毫未有，黃金準備的來源，金幣鑄造的材料，一切空空，從何談起？第三，八年抗戰，國體民疲，創痍滿目，哀鴻遍野，百業凋零，元氣喪盡，當今之急，安養生息，諸般措施，切戒刺擾，遽然改革幣制，對於經濟秩序與人民生活計震動太大，洵非現時之國運民力所堪勝任，反將惡化爲騷亂之種因。第四，現時輕率改變幣制，反將爲貪污份子，製造敲詐勒索之機會，替好戰之徒，開闢擴大內戰之門徑。第五，目前既無整個的安定全般經濟秩序與從事經濟建設之妥善方案，單純的改革幣制，則勢微力弱，不易奏效。第六，在最近期間內，我國的對外貿易尙無順調之希望，尙難期待建立一種基礎堅固幣價不變之貨幣制度，急於改革，徒供人操縱而已。

基此種種理由，現今尙不是改革幣制的時候，必須等待到內戰停息，政治澄清，和平民主積極實現，經濟秩序上了軌道，人民元氣漸次回復的

時候，改革幣制的前提條件次第具備，實施新幣的準備工作大體完成之後，始可從事廢止法幣。目前僅能致力於法幣價值之安定，與爭取將來改革幣制之預備條件而已。

如斯，則現時不應立即改革幣制之理由甚明，凡是能從國家前途人民利益之立場設想者，對於從緩廢除法幣的意見，類皆完全贊同，毫無疑義。然而始終還有不少的人們，眩惑於友邦借款與國際投資的誘惑，迫切於戰費與政費之急需，不顧一切之力倡即時改革法幣的議論。這兩派必將有一番熱烈的爭辯，法幣存耶廢耶？現在是莫決之天，徘徊於十字路口，彷徨不知所適。

(三) 暫時過渡的途徑

既是法幣制度不能立即改革，可是法幣危機却又日臻嚴重，處在這樣進退維谷的局勢之中，法幣畢竟有無道路可走呢？筆者的意思，認為有一條暫時過渡的途徑，可以步武。

然則這條暫時過渡的途徑為何呢？即是根據當前的客觀情勢，對於法幣制度雖然不能進行澈底的根本改革，但是可以將現行的通貨政策略加改正，亦可以減輕一部份的通貨膨脹之危機，而且還可為將來實行改制安排有利的準備條件。這個過渡辦法的內容，乃是將法幣的對內價值問題，與對外價值問題，分別處理，而將法幣形態，截離為二，用原來的舊法幣代表對內價值，在國內市場上流通，另行規定一種新的貨幣，代表法幣的對外價值，專作外匯支付與結算之用，平常在國內不能流通。這種貨幣政策，恰似德國過去改革馬克時，施行「登記馬克」(Registered Mark)政策相同。在太平洋戰事爆發的時候，敵寇曾經利用法幣外匯價值的弱點，大量的套却外匯基金，影響法幣匯價突起激變，當時筆者曾經提出這一個政策，來防救危急。現在雖然局勢與前不同，可是作用則所差無幾，故爾再行提出這種意見來。

因為法幣的對內價值，在短暫的期間內是無法使之完全穩定的，物價決難希望在最近的將來可以低落和平靜，強制的猛壓物價，不僅不能成功，並且還將有害，所以法幣的對內價值，現時只能讓它在現行體制之下，極力的限制發行的膨脹，收縮通貨的籌碼，逐漸的提高幣值，而無須進行

徹底的更改。

至於法幣的對外價值，則情形不同。一方面法幣的匯價，比較物價易於管理，調整有方，只要將它和對內價值隔離開來，不受物價的牽制，便可獨自穩定；他方面我國貨幣不能長此沒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匯價，致使對外經濟關係永遠的處於動盪不利的地位，例如此次國際貨幣會議協定之施行，我國不能長此因為匯價不定而被擯斥於協定之外，貽人笑柄；同時匯價如不能穩定，物價亦更難於平抑，游資不是愈將在金融市場上作祟，便將大量的逃避外流，近來鉅額資金之集中香港，厥原於此。穩定法幣的匯價，匪特可能，且而必要。不過，法幣的匯價問題，如始終與物價問題，連繫一起，則牽連過廣，無法同時解決，惟有首先解決匯價問題，然後再謀物價的平抑，庶乎事半功倍，易於收效。倘若最近美國五億元美金的借款成功，這正是一個調整法幣外匯問題的良好機會，幸勿錯過。

這種過渡政策實施之後，法幣的體制必將變更為如下的形式：

(1) 原有的舊法幣，僅能代表法幣的對內價值，限於在國內市場上流通。

(2) 法幣的對外價值，則另外規定一種新的貨幣形態來代表，專充對外支付，與結兌外匯之用。

(3) 新的外匯貨幣之價值，或是規定一定數量的黃金含量，或是訂着於某種外幣的一定比價，力求穩定不變，如果必須訂着於外幣比價之上時，則應以採取與我國關係最密接的兩個國家之外幣，平行比價為妥善，例如過去法幣匯價之與美圓英鎊二者平行比價，不受一個國家幣價變動之影響，較富彈性。

(4) 新的外匯貨幣與舊的法幣之比價，應參酌物價指數，與金價標準而決定，不必固定於一點，隨時調整，由政府核定公佈。

(5) 新的外匯貨幣之形態，不必開鑄金屬硬幣，只是一種票券，或單據，如像德國的「登記馬克」，甚而成爲一張匯劃賬單，國人於需用外匯時，即按照公佈官價，用舊法幣向指定的經營外匯銀行，購兌此種外匯貨幣，經審查合格後，即簽給外匯單據，在指定地方，清算支付，不能直接的購買外幣與使用外幣，

這種新外匯貨幣的單位，依然保持法幣「圓」的名目，惟價值與用途有別。

(6) 新外匯貨幣之準備，即以將來之友邦借款，與收購國內黃金充之。作為外匯的平準基金。

(7) 由外國收進的各項外匯，則須交由經營外匯的國家銀行，先兌換為此種外匯貨幣，然後再在國內兌換舊法幣，在國內使用，不能直接兌換舊法幣，以免套匯與投機。

(8) 新外匯貨幣施行時，完全禁止外國貨幣在國內流通，與直接的同舊法幣相兌換。

(9) 推行此種新外匯政策時，必須實施貿易清算連鎖政策，以相配合。

(10) 斯種新外匯貨幣，可以命名為「登記法幣」(Registered legal tender)；或名「清算法幣」(Clearing legal tender)。

上列各端，即為這個暫時的過渡途徑之梗概，詳細情形，容後再專文討論。

(四) 最後必然的歸宿

暫時的過渡政策，只能緩和法幣危機於一時，決非治本之道，法幣最終的運命，始終不能免於澈底改制之一途，僅是時間遲早有別耳。

關於將來法幣制度之改革，應當何種制度始屬妥善，也有種種不同的意見：有主張改為金幣本位者，有主張改回銀本位者，甚至有主張改成管理通貨的紙幣本位者，各成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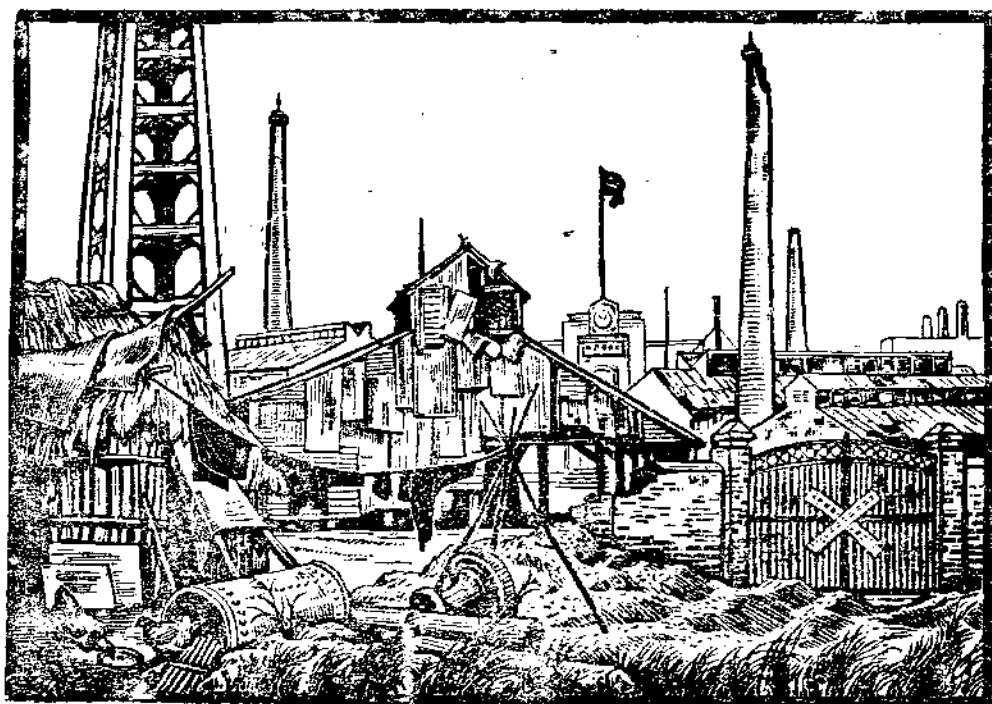
我認爲金幣本位在中國是不能施行的，一則我國沒有大量鑄造金幣的黃金，本國既不產金，又無購進大宗黃金的財力，金幣從何可以鑄造出來；二則金幣本位並非良好幣制，幣值呆滯，缺乏彈性，不易適應未來經濟局勢之演變；歐美各國皆已相率放棄此種制度，我國不能再去拾人遺棄之廢物。

銀本位制更不是一種美滿的幣制，第一，我國現時缺乏鉅額的白銀，不能恢復銀元的鑄造；第二，用銀之後，幣價常受白銀價格變動之牽動，不能穩定，過去我國所受的痛苦至深，損失頗大，不能重蹈覆轍；第三，

銀元也是一種呆滯不靈的貨幣，因此我國不能再行恢復此種制度。

至於施行管理通貨的純粹紙幣本位，更是不切實際的空想，如果這種幣制能夠在我國生效，則現行法幣便不會招致崩潰，改革的結果，法幣既然不能維持長久，那末起而代之的新貨幣制度，很顯明的不能再是與同類的紙幣本位了。

然則將來法幣改制究以那種本位能行得通呢？簡單的說一句，應改行匯兌虛金本位制。因為這種制度是以黃金充作發行準備與外匯基金，故可以不必鑄造金幣，而使價值穩定，具有一般金幣本位制與管理通貨制之優點，而無其缺陷，既能符合國人重金之心理，又能適應世界幣制之趨勢，推行之際，阻礙甚少，成效易見，將來法幣理想的最後之歸宿，必然的是改行這種匯兌虛金本位制。



「收切」後的工廠

李樺作

三月廿四日晚稿

當前國際形勢

石嘯冲

莫斯科會議在進行中，四國外長對德奧和約問題正在辯論。關於德國經濟統一問題，美蘇之間大體獲得了協議，關於德國政體問題，至今還停留在各種意見的紛歧點上——美英主張採美式的聯邦組織，法國認為權力應該分散，蘇聯主張要設立堅強的中央政府，就中美蘇的意見，還在對立着。

另外，從杜魯門總統三月十二日發表的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的聲明，投下了反蘇的暗影。「芝加哥論壇報」憂鬱的指出：杜魯門的聲明，不啻是對蘇聯宣戰的演說，其結果將不免引起未來的戰爭。「美國進步公民組織」對杜魯門抗議，指摘他的行動是違背聯合國的宗旨。日本輿論反映，杜魯門的聲明，是美國準備領導全世界對共產主義作戰，同時，日本高級官吏認為日本可請求美國給予反共貸款，而吉田首相則表示日本願充反蘇先鋒。

因此，法西斯殘餘和對國際形勢悲觀之徒，便又嚷着第三次世界大戰，並對莫斯科會議不表樂觀了。那末，我們對當前的國際局面怎樣看呢？

首先，應該指出：第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後的國際政治鬥爭中，是以英美集團與蘇聯集團做中心，這兩大集團代表戰後世界的兩種力量——民主力量 and 反民主力量，這兩大力量量的骨幹，是美國與蘇聯，因此，一切國際鬥爭就環繞於美蘇兩大之間，美蘇關係之發展，大致可以決定世界的趨勢。這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和平時代」，完全不同；不同的原因是：在那個時代，英法美等國的反動勢力，時時刻刻想摧毀新生的蘇聯，它們所共同致力的是消滅布爾塞維克主義。英國政論家杜德說：

「它們爲了這個目的，創設了東歐各小國，擴大了羅馬尼亞，從波羅的海到黑海形成一道反布爾塞維克的「衛星走廊」，西歐帝國主義資助並且武装了白黨的各種軍隊舉起內戰的旗幟，以反抗蘇維埃的統治。英、法、日、美的軍隊從四面八方侵入蘇聯的領土。倫敦和巴黎的高級機關主持着各種恐怖、暗殺、怠工和造謠；英法等國的軍事教官資助波蘭，使之攻入蘇聯，但沒有成功，而紅軍却抵達了華沙門外。當時的蘇聯，是要對抗帝國主義所發動的廿三條戰線的戰爭。」（見杜德：「世界政治」）

那時統治世界的是以英法等國為主體的。然而，這次戰爭變更了一切，首先是蘇聯變成了強大的國家——它是世界三強之一，今後任何世界問題，沒有蘇聯參加，是不可能獲得解決的。明眼人知道，妄想摧毀蘇聯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其次，美國在這次世界大戰中，獲得了巨大的戰爭利益，它的財富，它的生產力，它的資源，它的一切一切，都壓倒了所有資本主義國家，

成爲戰後的第一個強國——它是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巨擘，因此，美國的金融巨頭摩根、杜邦與洛克斐勒等，都自傲於美國的強大，物資流通全球各地，船艦駛遍世界海洋，飛機航遍寰宇，戰士足跡遍天下，金元流通各個國家，這足以表徵美國經濟力量、財政力量以及軍事力量之大，堪稱首屈一指！這樣，美國的影響，不待說，要在戰後的世界起決定的作用了。

美國的獨占金融巨頭知道自己的力量，他們也迫切要求擴大自己的力量，因而企圖建立世界霸權，統治全球。我們聽見了孤立派亨利·魯斯一流人叫囂：「今後是『美國的世紀』；福爾布萊特說：『美國要負領導世界的責任』；穆致米克上校要求美國吞併澳洲、加拿大和紐西蘭；民主黨參議員羅塞爾要求合併英倫三島；而某些帝國主義分子要把太平洋變成美國的內湖；助理國務卿艾契遜主張把「防共」政策推行到歐亞各國；並且那些好戰份子要準備一個「不可避免的」反蘇戰爭。美蘇關係僵持着，反蘇運動一時成爲國際間洶湧奔騰的逆流了。

誰也記得，一九四六年三月到九月，英美反動派積極推動這股反蘇逆流，而美國反動派則以反蘇的統帥自居，英國的邱吉爾則幫腔做勢，他們聲嘶力竭的叫囂：世界已到了新十字路口，美蘇即將發生戰爭。在此期間，所舉行的國際會議，一無結果，而所談的問題，都在僵持和論爭，這，顯然不是象徵聯合國的團結合作，而是標誌兩大集團的對立鬥爭，並且這種鬥爭已到了白熱化。

然而，兩大集團儘管在鬥爭，可是世界和平主流並沒有被壓倒，而支持這個和平主流的就是蘇聯。當巴黎和會之後，蘇聯在國際間的威信，

逐漸的樹立起來，它的地位也隨着威信的樹立而提高，同時，對世界和平力量不斷的增大，英美之間的矛盾是日益加深，而英蘇的關係逐漸的好轉，加以美國人民與進步的資產階級反對反蘇政策，因此，美蘇間的對立關係鬆弛，隨之走向改善的途徑。

當一九四六年底，聯合國大會與四國外長會議相繼舉行，在兩個會議中，美蘇兩國對許多難題都在妥協互讓下獲得了解決。在聯合國大會中通過了裁軍方案，在四國外長會議中審定了五國和約，以及解決了其他重要問題，於是國際政局明朗化了。這樣，它給這次莫斯科會議鋪平了一條合作的道路，給世界和平民主事業奠立一塊基石。

但是，在莫斯科會議揭幕的第三天，杜魯門就發表了援助希土的聲明，這個聲明反映美國決心要「負起維護資本主義世界普遍的安全」，重彈反蘇的舊調。美國「維護世界安全」的意義何在呢？「紐約時報」評述者公開指出，杜魯門總統以十分誇張的字句宣布「美國維護世界安全」的時代來臨，可是這不過是美國金融巨頭獨佔世界的表白，與進行擴張政策的一種煙幕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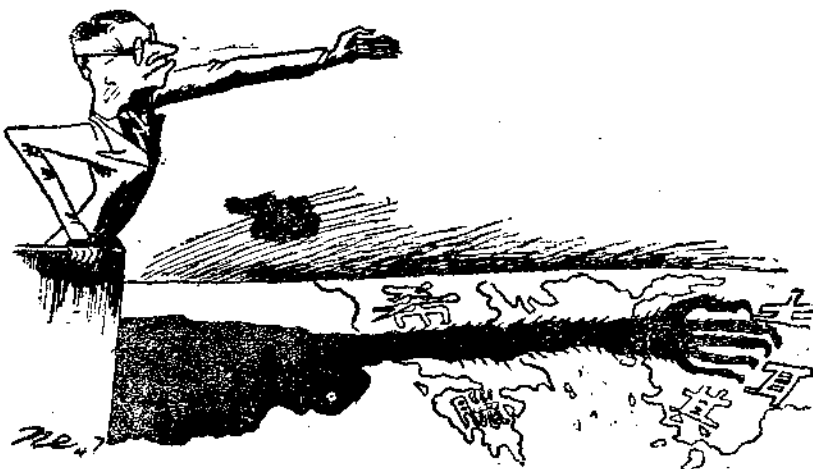
之外，國際觀察家指出杜魯門這種聲明顯然拋棄了羅斯福總統的理想，違反了聯合國的精神。在國際形勢好轉，聯合國需要祥和，美蘇需要解決德國問題的現階段，杜魯門為甚麼對蘇聯發動神經戰？揭穿了說，這是美國對蘇聯的一種外交攻勢。我們知道，莫斯科會議討論的主題是以德國問題為中心，美國金融巨頭為了要佔便宜，企圖用這種攻勢爭取外交上的主動，壓倒蘇聯。

但是，這種外交攻勢太危險了，美國國會一旦通過這次聲明中的建議，不但聯合國的威望和效用，遭受重大打擊，而今後的世界局面勢被劃分為二，而導向第三次世界大戰。

難怪華萊士批評杜魯門的聲明，足以招致美國的危機，蘇聯「真理報」抨擊杜魯門所宣布的

政策，除了破壞世界和平，毫無其他意義，它指出：「在目前情況下，企圖實行獨霸世界的任何計劃，都必然要失敗的。」

為甚麼呢？根據戰後世界新形勢發展的規律，世界既獲得了反法西斯的戰爭勝利，必然要贏得普遍的民主和平。我們從世界政治發展的總方向看，國際間的民主和平運動逐漸的展開和壯大。



這一個姿態對人類並不疏

龍尼

就歐洲說，爭取民主和平的人民，創造了歷史，發揮了強大的民主力量；南斯拉夫人民具有這種力量，反抗了美國的壓迫；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人民具有這種力量，反對了英美對它們的干涉；法國人民具有這種力量，推開了外國干預他們的政治壓力；捷克斯拉夫人民具有這種力量，便未遭受「金元勢力」的壓迫。由於歐洲新生國家本

身的民主和平力量的壯大，機能使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勢力打不進來。

再看，全世界弱小民族都已站立起來爭取解放，沸騰着民族獨立運動了。它們現在爭取解放的鬥爭，比任何一個時期都來得有力量，如：印度的反英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使得英國統治者寢食不安，迫使它不能不運用兩面政策——一面使回教聯盟的反動大地主堅持「巴基斯坦」，與國民大會黨對立；一面准許由印度民族資產階層組織「獨立」的政府。再如埃及人民要求埃及獨立，展開了反英鬥爭，英國殖民者不能不拿出撤退英軍的條件，作為拖延對埃及統治的「新」形式。之外，如：越南、印度尼西亞的人民解放鬥爭，正在堅韌的展開爭取「百分之百的獨立」的戰鬥還有加無已。

從這些例證中，我們在說明舊的帝國主義的統治基礎已經動搖了，那末新的帝國主義要想實施獨霸世界的計劃，無疑的是要失敗的。

美帝國主義今天恢復強權和金元政策，實施公開的干涉主義，把門羅主義普及到全世界，以戰爭相威脅，以反蘇做口號，來追求帝國主義利益的美夢，一定要破碎的，因為目前的國際形勢，不同於一九一八年——一九三九年呵，張伯倫死了，希特勒死了，各國反蘇反共的法西斯殘餘雖沒有死，但是，反蘇反共的政權可能建立嗎？明眼人不會忽視蘇聯已成爲全世界一座堅強的民主和平的堡壘，和世界各國民主力量發揚壯大的事實吧！這是今天世界的基本形勢。

當前儘管法西斯殘餘和帝國主義份子叫囂戰爭，但戰爭的危機並不存在，世界必然要走向和平民主的軌道，我們瞻望莫斯科會議，縱然對德國問題要經過若干的爭論，但最後還須協議解決，而協議解決的方式就是運用民主原則。這個原則可以說是戰後國際形勢發展的客觀規律，誰不遵守這個規律，看吧，誰就會失敗的！

台北二週記

胡帝

二月廿八日 星期五

晨起，天氣晴朗，公司裏的交通車準時到萬華（註一）第一職員宿舍來接我們去辦公。由萬華到南門不消十分鐘就到了，一路風光依然和往日一樣幽靜美好，想不到數小時後，這一帶地方竟變成了恐怖的地方。

辦公廳裏有人在講：「昨天下午專賣局查緝私煙的職員和警察，爲了查緝私煙，在太平町延平北路附近槍殺了一個小販和一個路人，引起市民的公憤。聽說在今天十時前後要包圍專賣局，警察局、和長官公署。」不一會，當天的新生報送來，上面也載有這條新聞，但沒有提到市民要包圍這幾個機關的事。

九點半後，跑到大門口去一看，對面專賣局週圍果真有幾個警察在放哨，其他並沒有甚麼動靜。又過了半小時，一大堆散亂的市民由愛國西路擁過來了，爲首的，手中拿着一面旗似的白旗，後面五六個人抬着一個大鼓，邊跑邊走，到

專賣局門口停下。人愈聚愈多，鼓噪的聲音愈來愈大。專賣局的雙門緊閉，所有職員都從後門跑走了。直到正午開飯時，這場面依然沒有甚麼變化。

一個懂得台灣話的女同事對我說：「方才才幾個台灣人在對着公司大門內喊道：本省人出來，留外省人在裏面，一會兒把他們都打死。」聽了這話，心中不免有些忐忑不安，由於過去本地人和外來者在言語、服飾、風習……各方面的不同，雙方不能建立一種很好的關係，因隔膜而起的疑忌與誤會，越積越深，加之台灣人民在戰後的生活的確很苦，這樣，一旦有事，那種無識的本地人毆擊外省人的行動，是很可能發生的。

飯後，和小王走到重慶南路口，遇見公司裏的下女雪葉從對面走來。她氣急慌忙地對我們說：「不要前去，他們在打外省人。公司裏的龐先生、王先生、朱先生都被打了。龐先生被打得滿面是血，可怖得很，快不要前去！」一聽

這話，我們不敢再往前走，祇好由海濱路轉到羅斯福路張主任秘書家裏去探問一下，再作打算；誰知到了那裏，他也聞到風聲，早跑往一位住在泉州路的台灣同事家中去了。

我們在從羅斯福路到泉州路的途中，看見許多本地人在圍毆一個外省人。一個面目凶狠的漢人高舉鐵棒，在擊毀那個人所丟下的單車。我們心中惴惴，趕忙把眼光收回，低下頭，迅速折向小巷中走。我們平時不覺得與台灣人有甚分別，一到那時，從頭到腳，顯然和他們處處不同，真有走頭無路之感。

晚上我們想回宿舍去。張主任秘書和那位姓李的台灣同事都說萬華漢人太多，路上非常危險，不如在道裏住了一晚，到明天探問明白了再去。這樣，我們祇好就在他家中住下，心中想起宿舍裏那十多個伙伴的遭遇不知如何，一個輾轉，無法入寐。

（註一）萬華是台北三區中之一區，所有妓院酒館遊

藝場都集中那裏，和廣西的「特察里」相似。

三月一日 星期六

昨天市民包圍長官公署，被擊斃數人，事態更形嚴重起來。專賣局台北分局被他們衝入搗毀，外省籍職員幾乎全部被毆，四人當場慘死，其中一個姓王的總務課長前兩天還到公司來過，不幸這個性情爽直，身材瘦長的北平青年，竟無辜地犧牲於這次事變中。

據李從公司回來說：「萬華宿舍被劫，全部職員都不在裏面，不知跑到那裏去了。」聽了這話，「憂心如焚」，恨不得立刻回去看看，但今天外面打得更凶，附近植物園中也發現有幾具外省人的屍體，又不敢冒險前往，道又恨又急的滋味真難受。

李告知我們說：「專賣局台北分局的家就在後面，聽說他們要到附近一帶人家來搜尋他，一旦發現有外省人在這裏，大家不方便，不如今夜伴送你們到張主任秘書家暫避風頭。」他既這樣講，自然我們

沒法再耽下去。

黃昏後，細雨濛濛，擊着傘走在街上，好像多一層保障。夜宿張家，依舊合不上眼。

二日 星期日

再也悶不住了，換上向李借來的台灣服裝，乘雨中冒險到萬華宿舍去一探究竟。路上行人稀少，景象淒涼，到達宿舍，上樓遇見林管理員。他對我攤開雙手說：「什麼都完了。」真的，每個人的房門都打開了，零星雜物紙張拋得滿地。我也無心痛惜失物，急忙問他「人呢？」他說：「朱、符和史先生一家躲在後面下女家中，鄭、王、沈三人聽說在一個由打彈子而認識的台灣朋友家中。你的弟弟同其他幾個人都不知跑到那裏去了。」不多時，朱、符二人由後門進來，大家低聲互道經歷，並設法脫離此險境。正在說話間，突然一陣沉重的脚步声，跑進幾個漢人，不問情由，乒乓兵兵把所有的玻璃門窗完全擊毀。我們躲在壁櫥後，一聲不響。當他們跑上樓去時，下女走來叫

我們由後門逃到她家裏去。第一次沒有聽懂她講的意思，不敢出來，第二次才決然脫身，幸好沒有被他們發現；否則，事後據林說，這幾個暴徒都帶有手槍，要是看見了，準定破他們殺死。

下女家欄樓板上積有寸許厚的塵埃。我們也毫不考慮地躺下，自中午吃了一碗飯直到夜半，沒有進一杯水一點食物，也不覺得饑渴。因為下女被他們查問過幾次，她也着慌了，不敢久留我們，所以我們心中只在打算如何逃出虎穴，不再顧到其他，好容易挨到兩點鐘過，我們蹣跚足下來，出門轉到桂林街。那時夜深人靜，街燈很亮，尤其是警察分局的大門洞開（註二），光亮異常，我們不敢直接通過，改由對面荒地上匍匐前進。還沒有爬到二十步路，我抬頭瞥見分局樓上第四個窗口有一個人影兀立在那裏，注視這邊，我們算是幸運，沒有給他看到，要不然槍聲一響，我們就完了。我連忙通知後面的符和朱不要動，三人伏在瓦礫堆中。約一刻鐘光景遠遠聽到鷄鳴。一想不到天亮後我們更無法行動，不如退回原路，改從龍山寺前走

到羅斯福路去，不料走到一半，快要越過鐵路時，對面黑暗的轉角裏一聲口令，嚇得我們手足無措，呆立下來。兩個穿警察制服的人持槍上前，向我們查問，原來他們是前面警察第一大隊的步哨，經我們說明原因，他們便領我們到隊部門房裏暫息。一會，天已大明了，回想起來，這一夜的經歷是最驚險緊張而有味的。

（註二）「二、二八」事件一發生，所有警察分局與派出所均被台人佔據。

三日 星期一

意外地遇到宿舍中的沈、趙、竺、楊、史五人和徐主任一家，也都在大隊部裏。想見之下，大家又驚又喜。他們中間祇有綽號叫 Long fellow 的沈，在二十八日被毆四次，略受輕傷，其餘各人都安然無恙。

聽事務課長胡講，四弟這兩天躲在公司裏，穿上工人的服裝，睡在門房隔壁那間屋內，不愁食宿，倒很安全。午後冒雨到公司去，同他一起回隊部。

當晚，所有寄宿舍在警察第一大隊的同事又決意搬回徐主任家中。因為這次事件發生，

市民最痛恨警察，前兩天曾企圖圍攻隊部兩次，結果都被擊退。現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仍提出要求立即撤消警察大隊，所以不如遷離那裏，反較安全。

為提高警覺起見，大家同意分班輪值守夜，派定兩人一班，每班兩小時，全夜分五班。當值班時，各人都提心吊膽，凝神注聽，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感。

四日 星期二

傳說這次事件的主持者分政客、學生、浪人三派。他們的意見和要求既不一致，而行動更紛歧互異。在報紙上所載的公開組織，除處理委員會外，還有民主聯盟、憲政促進會、忠勇服務隊、警政革新同盟、台灣自治青年同盟……等等，一時風起雲湧，異常熱鬧。

陳長官連日在無線電台廣播，對於台灣人民所提出的要求。（一）即行取消長官制度改省府制，各處局、省行、法院首長應任用本省人；（二）省級、縣市級參議員選重民意重行普選；（三）准予人民有思想、言論、宗教集會、結社、居住、出版之自由；（四）經濟、財政及日產皆請中央

准本省政府全權處理；（五）取消專賣局、貿易局、交通管理處，其他公營事業工廠礦業應移交人民經營……（共九條）幾全部應允，有人猜測這是緩兵之計。

必信營造廠的老闆（台北人）來慰問我們，我們各人都托他代打電報給家中，免得家人掛念。

五日 星期三

整日下雨，十多個人聚在屋子裏。有的埋頭寫家信，寫情書和日記，有的圍在一堆輪流走五子棋，這樣又渡過了緊張的一天。

六日 星期四

自三號起取消戒嚴令，市內秩序暫由學生會同憲兵共同維持。火車已照常通行，打人的事也很少發生，台北表面上已平靜無事，但報載新竹、宜蘭、台中、彰義高雄、花蓮港等地，為響應「二、二八」事件，又先後發生騷動。

有人講，一號那天住在北投草山（註三）旅館裏的外省人，都被拖出毆打，死傷大半。

胡來說他可能設法搭到一艘一二百噸的小輪開往廈門。那個願意去的，可以簽名參

加。我們一聽這消息，立刻分成兩派：一派是認為大局正在醞釀發展中，所們的處境仍異常危險，不如「三十六着，走為上着」；另一派是認為局面發展到現在，已由混亂而逐漸澄清，此時此地不宜輕舉妄動，自招新的禍害。我和四弟都堅決主張暫時不走。

這幾天來，物價漲得很利害，而且大一些的鋪子家家關上大門，很難買到東西，尤其是米價竟漲到六七十元一斤。一般人都叫苦連天，希望大局迅速安定下來。

（註三）北投草山離台北十餘公里，是溫泉著名的風景區。

七日 星期五

今天連得兩個不好的消息：一是說當地人民聽說中央要派軍隊來台鎮壓，他們準備先包圍軍營，奪取槍械，再從事抵抗；二是說他們在調查登記二十歲到四十歲的男子，預備召徵後予以武裝，以備應戰。聽到這話，大家的情緒又立刻緊張起來。

昨晚天氣很冷，一條棉被還不足禦寒。午夜，有人想起被褥的衣服被褥而在嘆氣，有人在怪怨天公和他作對。我獨

自在推究這次事件的遠因，近因、和將來可能的演變，想寫篇東西，紀錄下來，向內地親友作個報導。

外面謠傳自來水中有人放毒，不能作為飲料，其實並沒有這回事。

八日 星期六

由上海開來的中興輪，在五號抵達基隆，停泊港外，不敢進來。有很多急欲歸去的外省人紛紛雇了划子，冒著風浪上去。今天鄭和二沈聽說接洽小輪的事一時尚無眉目而中興輪還沒開走，想到基隆去一試；不料收拾好行李，雇定汽車，開到松山附近，對面開來的車中人說，今天午後基隆情勢不穩，許多車輛都折回了。他們也祇好悵然而返，放棄了這條念頭。

夜晚十時睡下沒多久，突然聽到遠處一陣槍聲，接着又是幾陣機關槍聲和後面警察大隊的緊急集合號聲。大家都嚇得慌忙穿起衣服，準備應變。隨後「洞、洞、洞……」的重機關槍聲，「拍、拍、拍……」的輕機關槍聲，「拍」「拍」「拍」的步槍聲，「撲」「撲」「撲」的手槍聲，時疏時密，時遠時近，交織成一支「

恐怖交響曲」，到底真象如何，一時無法知道。

九日 星期日

警備司令部宣佈自今日起重行實施戒嚴，理由是「自從解嚴以後，叛軍軍械及其他不法事件繼續發生，且省人公然煽動叛亂；八日夜十一時暴徒竟進攻軍事機關，企圖佔領」，如此行動「其目的在叛亂而非普通政治要求，已極顯著；為弭平反叛清除亂黨以保障人民安寧，維護國家法紀起見，台北市自三月九日六時起重行戒嚴。」事實上，昨夜國軍趕到，開始搜捕擁有武器的市民，停滯了數天的台北形勢又為之一變。

槍聲東響西應，終日不絕，不論台灣人或外省人都不敢出外行走，開了四天的火車重復停止馳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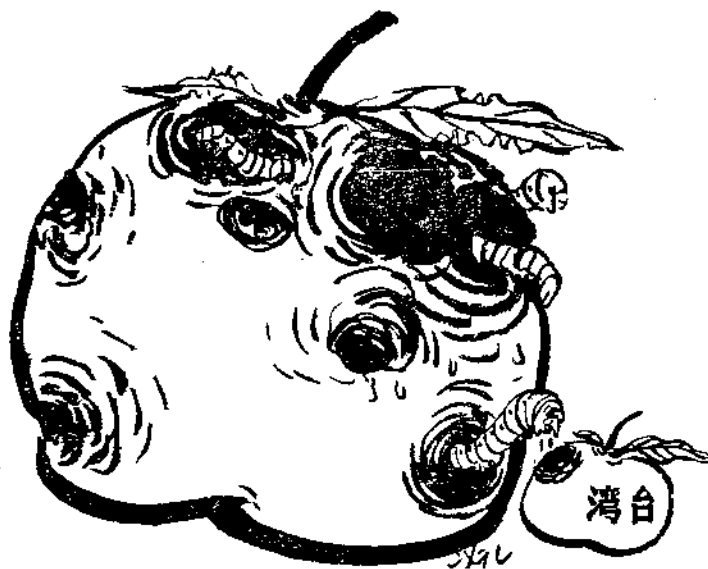
自一號黃昏起，雨一直沒有停止過。到今日午後開始放晴，心胸為之一暢，要不是外面戒嚴，每個人都想到郊外去走動走動。

十日 星期一

上午十時，陳長官向市民廣播，大意是「昨天再宣佈臨時戒嚴，完全為了保護守法的同胞，對付絕少數的亂黨叛徒

，他們公然發表叛國言論，用挑撥離間欺騙恐嚇的方法以實行其叛亂的陰謀；十天以來，善良人民生活都很感痛苦，這種痛苦都是亂黨叛徒所造成，政府為解除各位的痛苦，不得不宣布戒嚴，以肅清為害同胞的亂黨叛徒」。果不出人們所

發昨天陳長官的廣播詞。一般旅台外省人，對這次事件的感想，大部份認為戰後一年來台灣人民的生活的確異常困苦，失業的人員日增，他們要求起來革新政治、肅清貪污、改善生活，是極正大而合理的。可憾的是，他們不但



張文元作

勝利之「果」

料，來上這一記「反累司」。據傳過去一日夜開槍的結果，死了不少被稱為暴徒的台灣人。在徐家西邊鐵路左側，也躺著一具屍體，面目模糊，血流滿地，樣子很慘。

不爭取外省人的援助與支持？反任少數不良份子，對外省人不問是非，一律攻擊，這顯然是失策的。同時有人認為台灣人民都非常野蠻，不可理喻，非用武力征服他們不可。具有這種想法的人，也隨時可以遇到。

十一日 星期二
上午有一架飛機在市空散

十二日 星期三

三天恐怖的日子過去，局面又逐漸安定下來，街上已有人走動。午後騎單車到東門町去訪問一位在營建局工作的老同學鄭，他全家很安好，沒有誰被毆打，僅局中有五人被擊而受傷。

過榮町，看到這次被毀路的新台公司中和實業公司（註四），門只留有一大堆燒殘的灰燼，重慶南路中橫着三輛被毀的汽車殘骸，專賣局台北分局門口有一輛，台北火車站西邊有二輛；舊總督府後面延平路邊有一大堆新鮮的血漬。

（註四）新台公司為台北最大一家百貨公司，與中和實業公司同被認為最大的官僚資本的機構。

十三日 星期四

榮町一帶，每家理髮店都滿坑滿谷，生意興隆，非守候兩三小時不會輪到。這是事變後的特殊現象之一。

九號以後，除新生報，和平日報照常發行外，其餘如人民導報、民報、重建日報、中外日報、大明報五家俱被當局封閉。

自上月二十八號到現在，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二十八號到三號，是爆發時期，四號到八號是談判時期，九號以後則是武力時期。表面上風景雖已逐漸消歇，可是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我想台灣人民的前途該是和全國人民的前途連繫在一起而獲得新生的。



現實無限地複雜多變，使過去的歷史在人心上分外容易淡忘。我們這國家，自掛起民

國的招牌來，至今不過三十五年，但問起民國是如何建立的，我們大家多半都已不甚了然了。假如說到辛亥革命前反對滿清的志士仁人如何犧牲奮鬥，恐怕在我們的腦子裏也只剩下「拋頭顱，洒熱血」這一類的空洞的字眼而已。

寒夜讀書，讀了幾篇辛亥革命前被滿清統治者拘捕下獄的革命者的親筆文字，在這裏我讀到了三十五年前的專制統治者的黑暗殘暴，同時也從這些受難的革命者的文字中讀到了如魯迅先生所說的「中國歷史上的脊梁」。假如三十五年前的革命者用他們的生命做代價只不過換得了一個民國的空招牌，那並不是他們的過錯；假如我們因此而從歷史上抹煞了這些在最黑暗的時代中的先驅者的名字，那無論如何是不公道的。

我所讀到的有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冬在武昌下獄的殷子衡的獄中日記。殷氏為吳貢三之甥。吳貢三是當時一老革命者。據張

難先的「湖北革命知之錄」中載「吳貢三」傳云：

「吾鄂清季之老書生，列膠庠而談革命者。在天門有李長齡，在黃岡有吳貢三。貢三少習舉子業，聰穎冠儔輩。入泮後，設帳教鄉裏子弟，分經學、史學、地理、時務四科。講經至君之視臣為犬馬，及民為貴兩段，則聲震屋瓦，目贊盡裂。故其及門弟子若吳崑、殷子衡輩咸感動，獻身革命。」

夜讀散記

雍蒲足

殷子衡從小受吳貢三的影響，後與吳貢三同參加武昌的革命組織——日知會。「湖北革命知之錄」中亦載有殷子衡略傳，中有云：

「（子衡）熱情激發，常於渡口茶肆，演說革命大義。一日，散發革命宣傳品於鄂城、大冶，隨地演講專制之毒。一素識者咋舌曰：「汝要頭乎？」不願。」

武昌的日知會是一個危險的革命組織，立即逮捕會中主要人物下獄。

日知會領袖劉靜庵及吳貢三、殷子衡等九人同時被捕。其中劉靜庵、朱子龍死於獄中，而吳、殷均至辛亥革命發動後始能出獄。吳貢三卒於民國四年；殷子衡氏，據「湖北革命知之錄」說，在抗戰初年，已有七十高齡，居於恩施，但自民初以後即因不滿現實政治，而歸依宗教，「視政治生活如惡臭，從此一心向道，絕不過問」。我從曹亞伯

著「武昌革命真史」中讀到殷氏在獄中的日記，那的確是令人感動的真誠文字。

殷氏是在黃岡與他的舅父吳貢三同被捕押解到武昌。日記中記他初抵武昌候審時之心境說：

「……俄而提入堂內，靜候廓下良久。不覺紅日西墜，人影在地，呼喊之聲不絕。予自忖度，以予病後珊珊病骨，何能抵擋彼之酷刑。為予一身

計，寧可死於刀下。若為漢族計，予不得不於萬一之中而求一生。孔子云，死生有命。耶穌云，殺身體不能殺靈魂。於是生大無畏心。前後縈思，當今之世，捨革命莫由改造。我輩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不過順天以救人耳。語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予之氣壯而胆益雄。」

日記中敘受刑的情形甚真切。所謂「上夾棍」是對付盜匪，也是對付革命者的最普通的刑罰。日記中記武昌巡警道馮啓鈞用「彌子刑具」逼供的情形說：

「……馮即喚皂役抬彌子刑具來：「他不直供，只好將他彌起，看他如何？」於是左右將予扛至彌上，以予髮辮繫於橫木之孔，兩手栓於兩旁木柱中，折予雙膝，跪於鐵鏈，復以長棍壓於兩脚之頸，用兩人以力上抬，痛不可耐。……予忍痛不語，約四五分鐘之久，始將予解下。予伸足坐地，脚脛痛，雙膝痛，兩膀痛，頭痛，骨肉皆痛，心中焦灼，如火中燒，悲憤交集，遂不欲生。……」

但這樣的用刑，並不能逼出所要的

供詞。

「予憤怒不能自禁，乃大聲曰：『你們想把別人的血，染紅自己的頂子，那是不能的！』」

更進一步的刑逼來了：

「……於是將予衣服脫盡，只留單褲在身，依然綁起。隸卒左右環伺，束細竹枝爲鞭，二壯士用力怒擊予背數百，血流如注，痛入肝脾。王思位（知縣）及雙壽、馮啓鈞三人先後笑謂予曰：『你照直說，免再受刑』。予終不忍說出同黨之一，更何忍說劉敬安是匪首。伊等見予堅忍，用刑愈毒。予背肉橫飛，血流濕褲，額上冷汗，溼溼然滴與淚合，氣息奄奄，四肢百體均失作用。」

滿清官僚的殘忍與革命志士的堅強都從這文字中透露出來了。後來，殷子衡與其他同案被拘者又押至武昌府署內審訊。日記中也記有候審前之一段感想：

「予舉頭見廳前木柱上有聯云：『看階前草綠苔青，無非生意；聽牆外鳥啼雀噪，恐有冤魂』。予腹誹之。滿人入關，殘戮我國民，霸佔我國土，二百六十年來，冤孽載道，鬼哭神號，爾等猶未之聞耶？爾等之眼光僅及於階前牆外，無怪乎爾等之自戕愛國志士，向異族邀功也！」

其實這些滿清官僚何嘗看到什麼「階前」和「牆外」，他們的目光所及，除了主子的恩賞以外，還有什麼？

在武昌府署中主審的官是梁鼎芬。是日「因杯酒酬酢」到得很遲，故至晚上八時才開審。府署夜審革命黨的一幕也值得一讀：

「午後八時，始將予等提審，惟劉靜庵受刑極重，死而復活者數次。……鞭背及骨，撲面青腫，卒無所得。餘則按次刑訊，尙無大傷。審張難先時，張索紙筆直供千餘言，大意謂：『吾不革命誰革命，吾不革命，不僅負吾筆墨，吾且負天下人也』。投筆厲聲曰，斬便斬，索供何爲？……審梁鍾漢時，鍾漢笑罵官場曰：『幹天下事，我輩天職也，豈有畏死之革命黨乎？』李亞東則手書一卷，鬪堂大笑，氣壓斗牛。……朱子龍厲聲曰：『革命黨遍天下，殺之難，殺盡尤難。不殺不多，不多不速，不速則革命不成，革命黨之血即灌溉漢人自由之肥料也，固求之不得』。仲頭大呼曰：『殺殺殺』。審過午夜十二時猶未退堂。當鐘鳴四點，上座梁鼎芬忽腹瀉滿座，衣冠俱臭。會審者相對不言，梁鼎芬提褲下堂，會審者俱散。予等則分別入監。」

請想想，革命者們視死如歸，慷慨陳詞之時，主審的大老爺却因爲昨晚吃得太多，忽然高坐堂上瀉肚，弄得提褲下堂，狼狽收場，這簡直是一幅描畫不出來的官場現形圖。

府署中審訊後不久，諸人都被判長期監禁。殷氏日記中也記得有獄中慘狀，可見晚清統治者對待革命者的殘酷。初入江夏縣，獄中情形是：

「禁卒拆予辮繩，脫予衣襟，摸予襪履，搜予全身畢，然後開一號房門鎖，將予推入內，又用大鍊一端鎖予頭，一端繫於便桶。鍊長不過三尺，站立不能，睡眠亦不得。獄房縱橫才六尺，內住九人。……予欲就桶邊之地而坐，然四周盡濕，其腥膻燥臭之氣，撲鼻

而來，不可擲過。」

然而更可怕的是日記中所記初至夏口監獄中情形：

「差役二人導予入獄。經一長巷，至一獄室，室中黑闇無光，地則潮濕如泥。予飢渴甚，不得飲食。入夜更於鎖上加封，置予雙足於札板中。其製乃破厚木板爲二，脊縫中鑿洞如滿月式。開板之一端，插雙足於洞內，復合之，鎖以鐵鎗，於是脚不得出，全身臥地，脚手鏽鏽，依然如故。少頃，蚊蟲臭蟲排陣而來，吮血吸膏，飽而不去，自頂至踵，任其擇食，手揮不得，體曲不伸，奇痛奇癢，心爲之裂！」

「武昌革命真史」中又記湖南革命者禹之謨死難事。禹氏在長沙辦學校，辦工場，亦以從事革命運動而在光緒三十二年被滿清官僚所逮捕，移禁於靖州，爲靖州牧金蓉鏡用酷刑逼供，凡十餘日，最後處絞刑而死。禹氏在靖州獄中有遺書多封，其中有一封述逼供情形，尤其令人感憤。

「二鼓後，金牧提訊，至二堂，梆子已具。金牧即呼上

椰子，裸吾體，而加用大椒末，薰口鼻。金牧親持線香一大把，燒吾背，約二時之久，無所供。」

這所謂「上椰子」，亦即殷氏日記中所說「彌起」，也就是所謂上來棍。「椰子」既無效，金牧也者又另用別的方法：

「抬至戲廳。吊吾右大指及大脚指，懸高八尺，數刻繩斷，大指已經破爛，尋亦斷。又換繫左大指懸之。再用香火灼吾背及膊，徧體無完膚。」

在這樣酷刑下逼供的情形，禹氏遺書中描寫得歷歷如繪：

「所訊無非是要供稱孫文。又曰：『爾昨天所講認得這個譚心休，究竟是孫文使來的否？』余曰：『我只知伊爲中國公學回湘籌款。』金牧曰：『你誓不供，分明他是孫文的黨羽，你爲何不說？』又用香火亂燒。余曰：『既說他是他的黨羽，即是他的黨羽，我不得清楚。』金牧曰：『譚心休是幾時來通約你們的？』余曰：『是四月籌款時會過的。』金牧曰：『我聽說他有個什麼票據？』余曰不知。金牧曰：『

昨天你認說是孫文的黨羽，爲何不知他的憑據口號？』又拿火來燒。余祇得認供有口號。金牧曰：『是何口號，從實供來。』余曰：『記不得清楚了。』言未了，即用火亂燒。余即認供曰：『口號叫做中國人。』金牧曰：『不止此一號，尙有何號？』我見他勢又執香火近前，余又認供曰：『以手加額爲相見之禮。』金牧曰：『楊懷三你倒底認得否？』余曰認不得。金牧曰：『他說你在湖南是個頭目，究竟你是何等頭目？你之下還有些夥計，是些甚麼人？』我說無。金牧曰：『總有些。你不說，我又要上你火坑。』我見其勢凶猛，曰：『同志即是夥計。』金牧曰：『你同志有多少？』我說不計其數。金牧曰：『是何姓名？』我說無姓。『內有孫文，叫你們做什麼事情的？』我說救國保種。金牧曰：『如何救法？』我說是殺人放火。金牧曰：『你要殺那一個？』余曰應殺者即殺。金牧曰：『你們幾日起事？』余曰：『我不知期。』金牧又來燒。余信口曰：『十月間。』然則在何處

起事？』余曰：『在上海相會。』金牧曰：『何必要到上海，我想即是湖南。你不見瀏陽醴陵之事乎？你關在禁裏，不然你也是一個。』又曰：『你與孫文同黨，有何好處？』余曰：『好處就是革命。』金牧曰：『民報是你發行否？』余曰：『我不會發行。』然則是誰發行？』答曰：『不曉得。』金牧曰：『你會看見民報乎？』我說看見一本。金牧曰：『報上說的是甚麼道理？』我說：『無非中國被外國欺侮，政府不能保護。總要百姓曉得救國。』金牧曰：『尙有何言？』余曰一時記不起來。我求他釋放下來，徐徐講出。金牧曰：『放下來不講，再上火坑。衆役放下，不知有無四體，時俯臥在地，氣息奄奄。金牧催說曰：『我曉得放下來就不講了。』他說『就要把你打死』，我即述說一些救國的話。時已五鼓，金牧即標牌收押，兵役抬下，不省人事，遺尿在床，至今二十一早七時始蘇。』

這一段逼供的記述活畫出滿清官員的殘忍與昏庸，但是同時從這

裏也可以看到，當時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運動雖然距成功尙遠，但已經使滿清統治者嚇得手忙腳亂了。

禹氏寫這信時，自己已不能動筆，自知必死，所以這遺書的最後是說：

「求友書此，普告同胞。要知政府雖下詔立憲，但專制的凶暴政治，有加無已。將來四億的同胞其苦慘可想而知。我死矣，哀哉同胞！」

禹氏死難時，正值滿清當局下詔預備立憲之年，所以遺書中如此說。固然禹氏死後，四億同胞的苦慘生活仍長期繼續，但是殺戮革命者的滿清統治者，雖以立憲之美名也挽救不了牠自己的生命。不過五年以後，辛亥革命就爆發了。滿清專制者和牠的奴才們都跌倒了下來了。禹之謨和其他千萬革命者的血究竟不是白流的了。不管他們的血是怎樣地被人所糟蹋和抹煞，但在中國人民的心上，一切先驅者爲反專制暴政而流的血總永遠是鮮明奪目的！

我好像到了一個鬼世界

穆木天

我好像到了一個鬼世界，
我好像在鬼門中間來往。

我的周圍到處都是鬼：

大頭鬼，二頭鬼，

尖頭鬼，癩頭鬼，

矮子鬼，長子鬼，

君子鬼，小人鬼，

七十二種鬼，

青臉紅髮，

豬嘴獠牙，

個個都向我示威，

個個都向我伸巴掌，

一羣一羣地逼近來包圍我。

爲什麼我竟來到了一個這樣的世界？

我覺得渾身很沉重，

我口袋里裝着大把的錢，

壓着我喘不過氣來！

（無怪說，有錢人進天國比駱駝進針眼還要難！）

我一隻手拉着口袋的帶子，

一隻手拿錢直散！

我是一百萬富豪了！

我好像連路都走不開。

我看見好些朋友都夾在鬼中間，

周旋過來，周旋過去。

這是光明世界的前奏麼？

還是勝利的國度里應該這樣？

X X X

爲什麼我一下子像鬼一樣了？

我進到一個小飯館里。

我覺得我的錢口袋沒處擺：

放在棹子上把桌子全佔滿了，

放在地上不放心，

背着呢，再背不動了。

付飯錢的票子堆起來，

比一盤炒飯還要高。

我覺得好像把一把票子硬塞進肚子里。

結果還是餓，

我又只得把大口袋背起來走。

X X X

夜里我要睡覺，

可是到哪裏去好呢？

好多房子看去都在空着，

可是門鎖着，進不去。

混來混去

找不到住處，

又只得背着口袋到朋友家里去。

地舖睡得很舒服！

（以後再有床都怕不曉得睡了！）

那是我最早安樂的時候了！

夜里誰想到

又接二連三地作惡夢。

可是第二天一早晨

又得背着口袋滿街跑。

而且，大把的鈔票眼看着就光了。

肚子越來越飢餓，

一個個幽靈圍着我，越圍越緊了。

X X X

我在鬼的包圍中擠着：

餓死鬼，弔死鬼，

屈死鬼，脹死鬼，

硬頭鬼，軟頭鬼，

勝利鬼，接收鬼，

七十二種鬼，

有的向我哭，

有的向我笑，

有的向我瞪眼睛，

有的向我歪鼻子，

好像說打就要打，

說罵就要罵。

我被他們重重地包圍住了。

個個都向我示威，

個個都向我張牙舞爪。

最後，我一下子衝出去了

好像鬼也無影無踪了。

X X X

我是在勝利的國度里麼？

還是在逃着勝利難？

爲什麼大錢口袋都背不動，

一下子又會癢癢的。

難道我眞是在幽靈的國度里麼？

我真不知道

我的周圍是夢還是現實。（完）

作者自註：這是我的一個短時期的精神狀態。是個窮鬼的心里的幻想罷？記下來也許好玩。

寓言二題

畫室

戰神·和平之神及鷹與蛇



戰
神穿得
破破爛
爛，又

。他們把我幽禁在這裏，我不願被風化掉，却願意僵死在這兒。」

「這總得有個交代……」戰神又誘惑地說

疲乏，又沮喪，跑到一座高山頂上一個石窟裏去，那是和平之神的住室。

「無需啦。由於我自己的錯誤，我活該受

「老祖宗，我委實有些不成啦。論年齡，我還不算老，可是腰酸骨疼，確實不堪奔命了。還是您起來，讓我躺一會兒罷。」

「不能罷，老大哥，我倆總是在一起的。起來，下去走走散散心如何？」戰神很覺憐憫起來，就給以安慰和鼓勵。

「冒失鬼，快把門帶上！風……」和平之神的聲音，聽來雖還有點響亮，但好容易纔能看見他在黑漆漆的角落裏躺着，瘦得薄皮包簇骨，只是在顫抖。

「我可確實是老啦

且是相依為命的，甚至

我經常做了你的幕布和假面。……不過，這也不用說啦，我自己頂大的錯誤，是從幼養成了一副花花公子的性格，徒尚漂亮，專愛遊玩，只在小孩子、老人家和婦女們面前贏得了幾聲讚許，而對一切都不會用情，只是旁觀旁觀，信奉玩世主義，弄得到今天我還是一個單身漢，也沒有一個知己朋友。唔，的確，我也並不那麼滿意我自己的。……

「不要緊，我依然是一個花花公子呢，對世界並不那麼留戀。至於你，老弟，有的是時間，雖然我不能再幫你啦，可是有人會替你出力的。」

「還有誰呀，我將

像一頭驢子似地被鞭着打轉，休想有休息了。」

「不要嘆氣。你下去，在山腰就能看見兩樣東西。」

「那是什麼？」

「鷹和毒蛇！那黑蛇就是你的老朋友。」

「那麼，我知道了，他就是死神！可是，鷹是你的——？」

「不，她並非我的什麼。不過，她是那麼強健，美麗，尊貴。原是我自己預定為合於理想的愛人，求婚的唯一

對象的，只是她看看我，簡直把我的骨頭都秤了一秤似的，說這樣一個輕浮子，休就誤了她

一生罷，婚事就沒有說成。我呢，事後想想，似乎也無所謂。告訴你

罷，她就是生之神，也有人叫她做革命女神的

，這怕就是她的奶名罷。你立即就會看見的，可是當心一點，她纔是你的真正的敵人呢。唔

，唉，對於她，只怪我的履歷不能吸引她，我現在只做到不去為累她

戰神至此似乎已恢復了精神，就告別了和平之神走了。到得山腰，他就看見一隻巨大的

蒼色的老鷹正猛啄一條黑色的瀕死的大蛇，血流滿地。馬上戰神不見了，於是那瀕死的黑蛇

突然有了生力，他立即勇武非常，向蒼色的巨

鷹反攻，幾乎把她纏住了。而蒼色的巨鷹也能

够迅速飛脫了出來，並再猛撲黑蛇，用力地啄擊着。

真正生與死的搏鬥在繼續。

父親哭什麼？

會景初作



人道主義·暴徒·大麻袋

人道主義把自己化身爲一位很威嚴的老翁，急急奔到一羣暴徒的跟前，因爲暴徒們正在兇毆並且準備殘殺一批可憐無辜的人們。

「放手！」老翁大聲喝道。

暴徒們沒有聽見。

「放手！」他更大聲地喝道。

暴徒們稍微聽到了，一點，然而他們毆打得更兇。

「放手!!!」老翁力竭嘶嘶地喝道。

暴徒們完全聽得清楚了，而他們馬上就要屠殺那些可憐人了。

老翁氣得口流白沫，他來到一隻大麻袋的跟前。

那是一隻很巨大的麻袋，他的本名力量，他隨即明白了這老人的處境。

「走，老爺爺，帶我去看看！」

他倆走到屠場的近旁，大麻袋就對老翁說：「您且大聲喊吧，老爺爺，情形也許有點不同啦。」

「放手!!!」老翁喝道。

隨着聲音，暴徒們都把兩手直垂了。

「命令我罷，應當怎麼辦！」大麻袋請示老翁。

「把這些混蛋，一古腦兒都裝進口袋裏去！」老翁怒吼道。

「遵命！那麼，老爺爺，您請先進來呀。」

大麻袋張開了口子道：「幹麼要我？」老翁嚇得兩頰發青。

「省得您過一會兒又要替混蛋們說情。而且，我收了他們以後，您也自然要消滅。」

「哦，呵，不！我還不算太年老。而他們到底也是人類呢，何況已經放下了屠刀。」老翁吞吞吐吐地說。

大麻袋頭也不回地自己走到可憐人那邊去，他們是剛從屠刀下面卸免下來的，然而立即有了勇氣和決心，向暴徒們反撲過去了。

「停止!!!」老翁竭力向反撲者喝道。

那些可憐人聽是聽見的，但他們也沒有停止反撲。

漸漸地，這老翁覺得自己是一個可厭的東西，因爲在暴徒面前他是叫不響的卑怯者，在可憐人面前也彷彿被蔑視似的。

★ ★ ★

！閱訂接直請，刊本讀愛如君

天隆被單



經濟實惠 美觀大方

天隆染織廠出品

發行所：廣東路一三五號 室
製造廠：大西路一號
電話：一四一五 電話：二六六五

「公正」「標準」

中國衡量公司

經濟部登記

業務：
爲輪船公司與客貨
間辦理過磅量尺等

電話一三五六五
地址上海四川中路125弄20號

內政部特許登記證京警滬字第四一八號

三北輪埠股份有限公司

航行：南北洋綫
長江綫
堆棧：各處均有設備

總公司——上海廣東路九三號 電話一二九五〇

分公司——天津·青島·福州·寧波·香港
·南京·九江·漢口·宜昌·重慶
·蕪湖·安慶·

宏豐企業公司

承辦進出口業務
總公司 上海廣東路五十一號
電話 一一四五三一五
分公司 漢口聯保里五號
重慶林森路一二七號

行銀豐怡

經營商業一切業務

實業扶助 社會服務

總行 重慶民生路二府衙二號
分行 上海江西路四六七號
電話 二〇二一

附刊

中國官僚資本
與國家資本

王亞南

目前的學生運動

向曉

先秦的輿論力量和民主作風

錢健夫

文藝的功用

林煥平

英雄的夢

鳳子

4

幫忙與扯淡

流金

南京見聞

柳達仙

大局逆轉以後的昆明

俞仲

漫畫

葉笛·沈同衡·穆金

第一屆木刻展覽會佳作選輯



南榮記報關行

地址 上海廣東路一二二號
電話 一〇四一八

營業要目

專為各地客商辦理報關

歡迎賜顧

和記報關行

業務↑

專門代客辦理

南北洋
長江綫

各地客貨報關

歡迎賜顧

地址：上海廣東路一二二號
電話一〇四一八號

上海駁運公司

木駁 鐵駁 油駁

經濟迅速
設備完善

為顧客承辦上海
本地一切駁運業務

歡迎賜顧

地點：上海四川中路125弄20號
電話：一三二二四

本刊園地公開，

歡迎投稿，

歡迎批評，

歡迎定閱，

歡迎介紹！

時與文週刊

發行人 程博洪

編輯者 時與文週刊編輯部

經理部 上海怡嶺路三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本刊經理部啓事

本刊創刊伊始，辱承 各圖書館、各機關及文化團體，紛紛函請贈閱，盛情可感，原應遵寄，惟以目前印刷、紙價高漲，成本昂貴，為免過重賠累，決自第四期起，概停贈送。如荷 訂閱，均按七折優待。區區苦衷，敬希 鑒諒是幸！此啓。

中國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

王亞南

在中國目前，正存在着非常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官僚資本儘管被大家，被朝野上下罵不絕口；另一方面，官僚資本本身，卻還在繼續膨

大中，而不少放言官僚資本誤國殃民的人，自己像行所無事的唯恐不得變為官僚資本家，並多方設法擠進官僚資本家陣營裏。自然，官僚資本如其不是這樣猖獗，這樣變成誘惑競爭之的，大家也許不致如此的注意和詛咒。但仔細予以考察，似乎造成這種矛盾現象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對於官僚資本本身，它的性質與範圍，一般人都

的社會，大體是表現為兩個不同的現實形態。那種不同，不是由於資本的種類，不是由於資本的自然屬性，而是由於資本的社會屬性。換言之，在不同的生產關係下，同一國家資本，是會具有不同的社會性質的。

比如，在今日蘇聯這種社會經濟形態下，私人的財產，或限於私人自用的財產，雖然還被允許存在，但私人資本，即私人利用來剝削他人勞動的生產手段的私有，却是絕對被禁止的。因此，在蘇聯的經濟學中，「資本」這一名詞，已經具有極其不同的概念。我們儘可比較含混一點，把它全社會用以維持並擴大再生產的資財，稱為較嚴格意義的「社會資本」（那是完全屬於社會全體人民共有的社會資本，與我們通常把存在於社會中的個別私人資本，混稱為「社會上的資本」的意義不同）；還可因它這所謂「社會資本」的局限性（只被視為蘇聯社會的社會資本），即在蘇聯與其他國家相並存立的關係上，把它全社會或全國的資本，稱之為「國家資本」。我們由此可以看出，在蘇聯那種社會生產關係下，國家資本是絕對的，它是資本一般，是資本全體，即除了這種資本形態之外，再沒有其他任何資本形態存在。既然是不允許任何其他資本形態存在，掌握政治權力的人，運用權勢來假公濟私，來擴大其個人經濟權益的可能性也自無從存在。

可是，在另一社會生產關係下，即在資本主

義社會關係下，就大不相同了。我們知道，許多尊重私有財產的現代國家，都有某種程度的國家財產或國家資本存在。因此，許多國家的財政預算中，經常就有一項國家事業特別收入列在裏面。我們這裏且不必進一步去分析這種國家與政治經濟權勢者的本質關係。就量上講，在這種國家的國家資本，顯然僅僅只是存在於私人資本的孔隙中；那有時是當作私人資本社會的一點綴品一看，而一般則是當作私人資本社會的一「便利品」看，因為根據私經濟或私人資本的權威發言者亞丹斯密所說，如像交通土木公事一類社會事業，對於私人資本活動，極為必要，但由私人經營，暫時不一定有利，或者足量資本額數的籌集，不易期之於私人的場合，則由國家承擔起來，結局，這種性質的國家資本，就從資本主義經濟發軔的當時，即為了便利或配合一般私人資本的發展，而與私人資本並存着。從這裏，我們顯然可以看到，這種形態的國家資本，與蘇聯的國家資本比較來看，那不過是表演着一種附屬的陪襯的作用。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私人資本，即使不是資本一般，却無疑是資本主體。從而，在私人資本與國家資本之間，便存在着「一個可以「相通」，可以「轉化」，或者可以「假公濟私」的可能的空隙。不過，這種「空隙」，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是有着極其不同的限度的。

在資本主義的幼年期，即在私人資本開始形

國家資本 (State Capital) 一詞，在現代西歐

二

成的期間，政治上還是表現為專制主義的，官僚主義的，封建主義的混合的形態。因而，「奪取寺產，欺詐讓渡國有地，盜掠共有地，掠奪封建所有地氏族所有地，把它在無所顧忌的恐怖主義下，轉化為近代私有財產」，就可行所無事的照着意向作去了。而在動產方面，「以國民名義為裝飾的大銀行，在出生之始，即不外是一個私人投機者的公司，它站在政府方面，藉着政府給予它的特權，而取得以貨幣貸與政府的地位」，而它由此又是國債的債權者了。「國債的債權者，實際並不會拿出什麼，因為它所貸與的金額，轉化為容易轉移的公債券了。這種公債券在它的手中，和同額硬券有相同的作用。由是產生了一個無所事事食利者階級」(以上均見郭王譯「資本論」原始蓄積章)。再往前去，私人資本逐漸在社會取得了優勢，私人資本所有者階級，早已為了保障他們既經取得了的資本權，強烈要求一種更適合他們權益的政治形態；他們儘管是利用政治特權胡亂取來的，却不願他人亦利用政治特權再胡亂奪去。「侯之門，仁義存」，明辨權利義務，明辨羣己權界的法治精神被強調和被遵守了。

資本主義經濟在適合它的政治制度的保育下，得到發育發展之後，國家的全部權力，都被當作全體資本家階級共同享有，共同運用的東西。當私人資本發展的前途顯得非常光明，其機會又非常之多的時候，一方面，在國家名義下從事的經營，已經會相對的變得極不重要，或極為有限；另一方面，政治權勢者利用職權來擴大其私人資本，不但漸成爲不可能，且漸成爲不必要了。

所以，在典型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官僚政治」這一用語，即使不時有人還用以攻擊政府，但其初期形態比較起來，幾乎是另一意義的東西，也就因此之故，「官僚資本」在資本主義經濟這



永不變化的「定理」！ 葉苗作

漸對經濟的發言權支配權增大了，但從另一方面看來，却又表示是經濟上的人物，逐漸對政治的發言權和支配權增大了。

簡單的 analysis 這內情，即是：適應自由經濟的政治形態，就是所謂議會政治或者政黨政治。因為這種政治形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又因為資本主義在它最初發生的過程中，就已經包含有內在矛盾，包含有對立物——勞動者階級在裏面，它向前發展，這對立物也跟着發展，從而，本來是便利資本主義經濟的議會政治，就因為勞動階級勢力增大，勞動者階級在議會中的勢力增大，而變成了不適於或妨害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東西。結局，與勞動者階級立在對立地位的資本家階級，就要求修正或根本否定這原來爲他們在前一發展階段所多方促其實現的政治形態。至若爲什麼有的國家根本否定這種政治形態，有的國家却又以修正這種政治形態爲滿足呢？那實無關於它們政治經濟勢力者的態度，是激烈還是和緩的問題，而根本是關係影響或左右他們那種態度的不同經濟條件的問題。大約後起資本國家在產業組織上，一開始，就必需而且可能採行比較集中，比較高度有機化的形態。其所以必需，乃因非如此，不足以在商品市場上與先進資本國家相競爭；其所以可能，乃因它得利用先進資本國家的經驗和技術條件。可是照應着這種產業組織，它們的銀行資本，也很快的採取與產業結合並支配着產業的金融資本形態。金融資本的寡頭支配局面一經建立起來，這個時期的國家干涉，就與初期國家干涉有了不同的性質和內容；國家或政府，必得變爲直接執行金融資本家的意志和命令的

一階段，幾乎是不大有人談到的名詞。可是，當這典型的自由——個人主義經濟發展到轉形階段，國家逐漸伸展其干涉統制的行動了。這在一方面看來，彷彿是政治上的人物，逐

機構；包含有各種社會階級勢力的議會政治，到這場合，便變成了妨礙獨占金融資本家自由表現意志的障礙物，這已隱伏着議會政治自我揚棄的危機。而加速這危機爆發的有力因素，就是，當後進國家產業組織一開始就採用比較集中的形態的時候，它的勞動者階級的社會組織，亦很早很快就表現得聲勢浩大，就表現為資本家階級的直接威脅，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資本主義具有先天脆弱性的德意諸國，就相率出現否定議會制的法西斯政治形態，它們就都不約而同的在「國家社會主義」的名義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措施。大資本家的利益就是國家的利益。國家在對外表現為國家主義經濟實行的主體，在對內表現為國家社會政策施行的主體，無非是在貫徹大資本家們的利益的要求。所以，我們由此知道，政治上的人物對經濟的發言權支配權的增大，只是在經濟上的人物對政治的發言權支配權增大的場合，才有實現的可能。

我們在這裏所要知道的，是在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下，所謂「國家資本」，究竟具有怎樣一種新的內容。這是需要從長說明的。

二二

許多人以為在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下，「國家資本」當然會發達起來，這是一種望文生義的說法。而其認識不清的根本原因，也許是由於大家對於國家資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一直就不大弄得清楚。

假借國家名義，來施行資本主義獨裁，那是國家資本主義的簡括解釋（蘇聯在開始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會使用「國家資本主義」這個誘惑性的口號，在我的理解上，那是富有戰略性的號召，與希特拉用國家社會主義名義來施行的國家資

本主義，絕不相同——其詳見即將發表的拙作「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形態與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形態」。資本主義經濟是一個矛盾體。把勞動階級勢力拋開不說，個別資本家的利益，與整個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往往是極度衝突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事實上就在設法緩和資本家階級內部的衝突，緩和個別資本家利益無限擴展所造出的不利於整個資本家階級存在的危機，布哈林的「組織的資本主義」的「大理論」，是從這裏發現出來的。可是每個資本主義國家，都藉「國家」或政府或政治上的大人物來担当這「緩和」的任務，在另一方面，就無異加強加深了各國國家主義經濟主體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所以，國家資本主義就不但是國家主義經濟體系，同時還是備戰經濟體系。

這種局面一步一步的造成，為了維持整個資本階級的存在，許多個別資本家，特別是那些中下級資本家，就不免要在某些場合某種程度失其存在；為了完成或充實備戰經濟體系，就是大資本家階級，亦不得已為了要保持其資本的所有權，而不得不在某些場合某種程度放棄其資本的直接使用權，芒克(Mark)的使用權革命的「大理論」（見氏所著「武力經濟學」），就是從這裏發現出來的。銀行、大工廠、以及其他一切大的經營，就被重新改編過；德國在戰時包括有一百萬勞動者規模的戈林工廠，就是如此改編過來的。經過了改編的一切產業，儘管資本家還保持其所有權，並依據所有權取得純粹經濟法令規定的利得，但那些產業，那些資本，都帶上了一個「國家」的帽子。事實上，國家，或政府，或政治上的握權者，都在這種意義上，變成了資本家產業的「經理者」，儘管如上述芒克所說，若干大資本家都「憎惡」這種資本形態，但這是他們資本

主義社會經濟條件所命定了要採行的可能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正因為國家更明顯的變成大資本家所有，同時，全社會的資本，也更表現得成為國家所有。

如其我們不妨稱這種資本為「國家資本」，那麼，這種國家資本，就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最高階級的特殊形態。

四

依上面的說明，我們已見到兩個本質絕對不同的「國家資本」形態了：

其一是蘇聯型的國家資本，又其一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資本。任何一個萬能的精神抄襲者，恐怕他也不好意思說：我們今日成爲問題的官僚資本，正好是蘇聯型的國家資本，那麼，我們待考慮的，就是看我們的官僚資本，究竟與資本主義發展各階段的那一種的形態相類似；或除表象的類似以外，還有何種特質。

無論從那一方面說，資本主義極盛時，自由主義經濟，配合着議會政治的那一場合的「國家資本」，我們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爲我們不獨沒有那種經濟條件，也沒有那種政治條件，尤其是從政者不得任意侵漁公私產業，混領公私資本，那與我們所謂官僚資本，根本無何等類似點。

如其我們還承認中國未完全脫却初期的過渡的社會形態，如其我們還無法否認中國私人資本尚在開始形成的期間，中國政治上還是表現爲專斷主義、官僚主義、封建主義的混合的形態，那我們在土地方面，在流動資本方面，乃至在其他現代性產業方面，凡以公家名義從事的經營，甚至最大一部分以私人名義從事的經營，都不免與官的特權發生關係；我曾在其他場合（見拙作「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的分析」）把中國官僚資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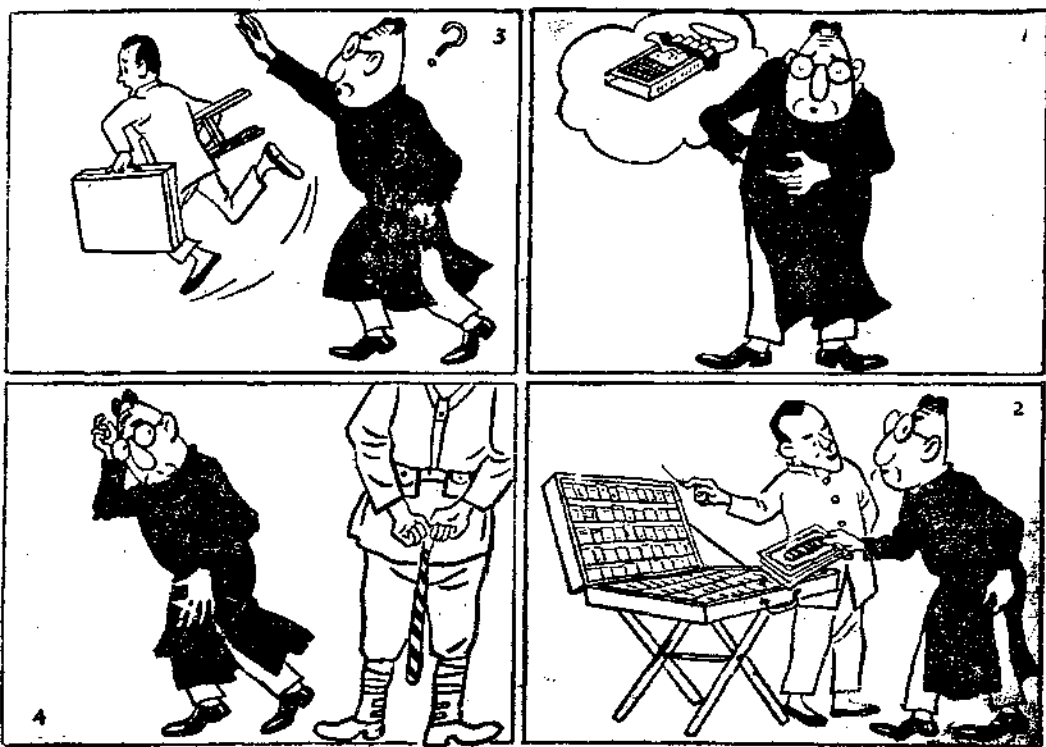
解為三個形態：官自己主要藉官權取得的所有資本形態，官依職權直接運用的資本形態，官由運用公家資本，而由是使其私人企業直接間接受其支配的資本形態。在這三者中，由官僚運用的那一形態的資本，才算是官僚口頭上所宣揚的「國家資本」。這以國家名義裝飾的資本，在當前這種政治形態下，顯然是並將是官僚所有資本形態的大源泉。

然而，現實總是比理論豐富得多的。就把中國傳統的歷史諸條件丟開不講，我們也不能說，我們的官僚資本，與一般近代初期的國家資本，有同一的性質和內容。我們自己的社會，是處在一個過渡階段，而世界大多數國家，却是處在另一種過渡階段；當作中國的中國，我們是在資本主義初期，而當作世界的中國，我們同時又不能避免資本主義末期的一切政治的經濟的影響。我們曾在戰時嘗試的作過國營農場國營貿易一類蘇聯型的國家經營，我們又會繼續努力從事國家資本主義下的產業編成。穿着拿破崙的服裝，雖然不能就變成拿破崙，但却顯然會使穿著者改變一些形相。而由是增加我們認識上的困難。

在我們還允許，並且在某種條件下，還鼓勵私人資本的場合，如其中國官僚資本活動，能成為中國資本主義形成的一個推動力，我們倒用不着對於官僚資本表示過分的嫌忌或怨恨，因為這正是大家都會經歷過來的歷史道路，並且接着還會帶來一個光明的前途。然而我們引為遺憾的是，我們的官僚資本，決不肯也不能為我們成就這種歷史任務。如我在「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的分解」那一論文中所指出的，我們官僚資本的作用，會依獨占資本化，政治資本化，買辦資本化的現實邏輯程序，使我們的民族資本，迅速的趨於枯萎和沒落。

總之，我在本文中所要說明的
是：（一）我們今日以國家名義，或以國民名義裝飾着的一切官僚資本，它不但與蘇聯的「國家資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也絕不可能是發達了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下的「國家資本」，雖然在本質上，與近代初期英法諸國會經有過的政治權勢者所支配的地權和業權相類似，但由於我們傳統歷史條件的特殊，和周遭國際資本關係的作祟，它的內容，它的表象形態，將成為今後歷史學家的新的亞細亞生產方法的一個重要課題；（二）我相信，任何稍有民族觀念現代思想的人，都希望中國今日為大眾詛罵的官僚資本，特別是其中以公家或國家名義經營的那一部分資本，能如實的成為「國家資本」，但依據我們上面的分析，國家資本不是存在於真空中的東西，它必定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我們希望它成為蘇聯式的，勢須我們的社會生產關係已經是蘇聯式的；我們希望它成為典型資本主義式的，勢須我們的社會生產關係已經是典型資本主義式的。我們把自己的社會生產關係，苦苦的「維持在資本初期階段，却「要求」我們的國營事業乃至私營事業不官僚資本化，那是可能的麼？因此，（三）對於目前政府把許多公營事業零碎拍賣給私人經營，儘管那是國內新舊經濟學者所一致主張的，但我却無條件的贊許。假使我們落後的社會生產關係，能相當的予以變革，假使今日存在於經濟上的專斷主義，官僚主義與封建主義，能相當的受到

限制，則任何形態的社會化國有的事業，倒毋寧是可以鼓勵的。
歸結一句話：允許官僚資本發達的社會生產組織，斷乎不能同時又允許國家資本的發達。在一種社會經濟體制下，國家資本可以轉化為官僚資本，在另一種社會經濟體制下，官僚資本也可以轉化為國家資本。
經濟科學這樣告訴我們的：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不能並存。



沈同衡

老張的事故

目的學的運動

向 曉

近年來，中國到處都爆發了廣大的學生運動。這不是通常的學潮，而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社會運動。其廣泛，其猛烈，深入與堅定，真是史無前例。——這不僅僅使學校當局窮於應付，即政府、在朝黨、甚至軍隊把他當作了假想敵，也不能弭平。故無論你同情與反對，都得注意牠的內容與發展。

假如肯冷靜的考慮的話，我們誠然承認學生運動是「一世」的現象，在一個向上走有希望的「盛世」是不會發生的；因為青年們有希望有前途，方努力於自己的學業與工作之不暇，何至於從事此種奔走呼號甚至流血亡命的悲慘舉動。但在民族遭到危險，人民遭到迫害，政治沒有希望，青年沒有前途的時候，則往往迫使他們不得不有所呼籲，有所行動了。例如「桓靈之際，主荒政謬，國命委於奄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一遂形成了東漢的黨錮之禍；太學生雖誅戮殆盡，但炎劉的政權也就不久。靖康年間，女真入寇，宋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的壯舉，尚延續了一個偏安的小朝廷，等到南宋的太學生運動被迫害與收買所平息後，也就是趙宋天下的結束。民國八年以後，以「五四」為始的一串反帝國主義反封建軍閥的運動，雖遭到大批的拘捕與屠殺，但轉瞬即是北洋軍閥統治的崩潰。——這都是冷森森的鐵證。聰明人該不會忘記。

本來，在中國抗戰期內的前幾年，是很少學潮的一個平靜的時期。當然，這時期在實際上可分為二個階段：大約從「七七」至廿八年為一段。中國青年所要求的抗戰既已實現，全國的政治團結為民國以來所未有，政治經濟各方面尚未顯著惡化，思想與文化政策也比戰前稍見開明。當然，大家都正為着抗戰而努力，自不致發生學潮。到二十九年以後，國內團結漸見分裂，由摩擦漸形為火併，政治上漸見貪污腐化，經濟上也為官僚資本所擾亂，軍事上每有無代價的敗退，然而仍是青年們一個比較沉默的時期。——因此，甚至引起學者們的驚異，例如民國三十年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師範學院院長黃子堅先生在「青年的志氣與思想」廣播稿中，竟認為青年太小氣、老成、世故、沒有思想，不敢鬧風潮，因而

引為可慮。繼而有潘光旦等教授作文附和。當時筆者在「我為青年們說話」一文中，指出這種錯誤。在後方的大都會裏，誠然有不少青年，被腐爛的社會風氣所影響，而老成，世故，不敢作，不敢想。但却有一部分好青年，根本已離開學校，投入戰爭行列裏，正從事政治或軍事工作。至於大部分青年，都在「為抗戰而隱忍」，他們尚希望局勢好轉，希望戰後有所改革，所以是「相忍為國」，是不願因小忿而亂大謀，他們是更深刻，更沉着，絕不是麻木，可惜這種心情不為學者們所理解。同時，我更指出青年這種隱忍是有限度的，過了某種限度則將猛烈的爆發。果然到民國三十三年軍事上大潰退以後，政治上一切醜惡與無能都全面的暴露了，接着遂有浙江大學與西南聯大先後爆發的大運動。

一一

除非是淺見或盲目，對近年來的學生運動才會認為青年的盲動或出風頭；除非是有意詆毀或栽贓，才會說是少數人的鼓動和操縱。假如肯冷靜的加以分析，當不難知道這運動實由國際政治惡化與國內政治惡化所釀成。國際方面，過去盟國皆以「為打倒法西斯而戰」相號召。特別是美國，羅斯福當國期間所標榜的民主與和平，幾成為人類共同的期望。戰爭終於一九四五年結束，美國贏得了空前的戰爭的掠奪。這種戰爭的超額利潤更養肥了少數獨佔財閥，軍火商，如原子彈製造商杜邦公司等。同時勝利也助長了新興軍閥的地位與氣燄。美國獨佔財閥既經空前膨脹，資本主義的生產迫使他們只有走向最後的救策，進行另一戰爭，以獨佔世界的資源與市場，獲取無盡藏的營養而繼續繁榮。——在這企圖下，政客和元帥們便是最好的幫手，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右派在國會選舉中獲得了勝利。在幕天遮地的佈置下，美國行動會便成了太上政府，以將軍們組成的元老政治家會議(A Conference of Elder Statesmen)便成了內閣，中央情報局便代替了人民的呼聲。白宮只是經理室，元帥特使只是捐客，如當年德日的獨裁一樣，也用反共防蘇與安全當做向外擴展的口號，對內增加軍事預算，加緊國民軍訓，擴充原子彈及秘密武器的製造，壓制罷工及人民的抗議；對外，則遍擾太平洋以及其他各洲的基地(我們的青島也算在內)，協同英荷鎮壓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在援助與恢復秩序的名義下，扶持各國的反動政府，再利用這些政府來壓制人民對解放與民主的要求。其作風，比之希特勒無不相肖，而咄咄逼人的氣燄更盛。

當然，美國反動勢力並不孤獨，華萊士早經指出新武士邱吉爾也正想號召一支新十字軍。今日英國雖在工黨的執政下，但對於反蘇、壓制殖民地的獨立、扶助小國的反動政府以摧殘其人民力量，而保持其帝國的傳統

利益，其政策亦不例外。

民主與和平，在青年心目中成了夢幻。世界上去了德國日本，却來了美國。菲律賓政府得美國協助屠殺農民軍，荷蘭得英國協助屠殺印尼，英美先後援助希臘腐敗的政府壓制人民的武裝，法國在越南也進行着討伐。這種對弱小民族的屠殺，對人民武力的鎮壓，加上美國的備戰熱，以及原子戰即將屆臨的言論，表示世界上又充滿了危機。中國青年儘管不解國際局勢的內幕，但至少對和平已感到幻滅，對戰爭已感到威脅。在擾攘的國際舞台上，中國豈能獨立解放與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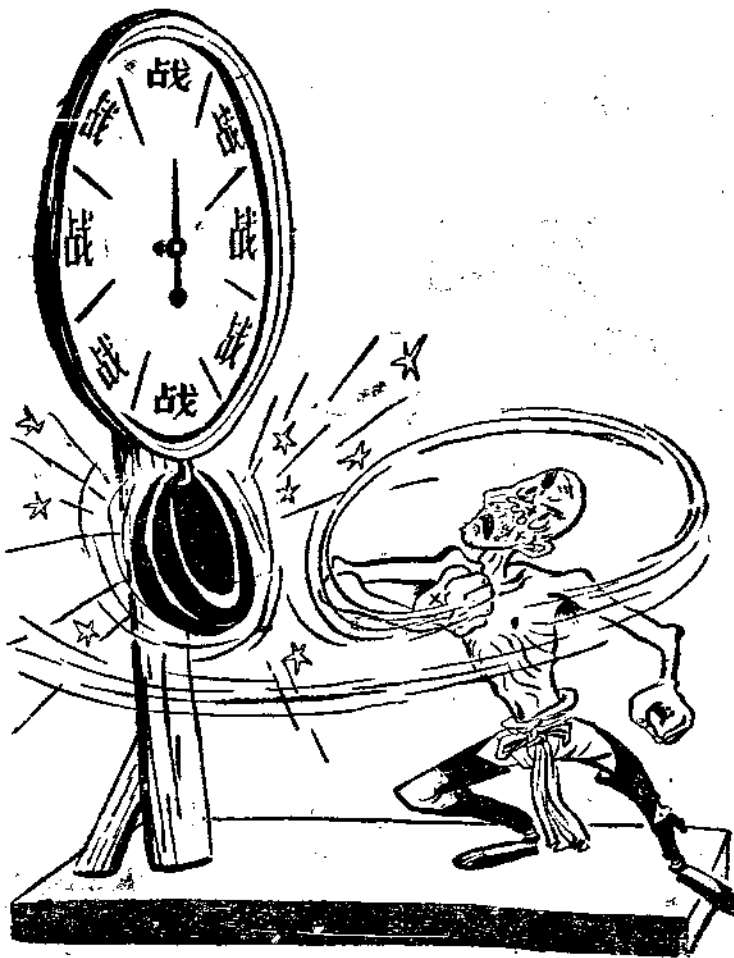
國內情形尤慘。過去大家都期望着的戰後的和平，一開始便因接收問題發生的衝突而破滅，第一次給青年的希望塗抹了陰影。後來馬歇爾裝做調人，政治協商會議召開，重給青年以希望，故大家高呼「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然而，接連便演成滄白堂與校場口兩齣打戲。等到國民黨二中全会開幕，政協決議便成了老橋。蘇北東北到處重以兵戎相見，人民的停止內戰的呼籲也成了罪過，致李公樸聞一多都被謀殺。這又是第二次給青年更大的失望。以後是邊拖邊談，國軍在蘇北、東北、冀中、山西大舉進攻；十一月國民黨召開國民大會，馬歇爾假調停真右袒的任務告一段落，乾脆一走，中國內戰遂悍然不顧一切的展開了。至此，更給青年以絕望。——伴隨戰爭而來的是征兵征購征實，工業不能復員，百業凋敝，通貨繼續膨脹；思想與教育壓制之深入，學生之拘捕與教授之暗殺，成串而來，叫青年那能忍耐！

「中國之命運」

三、反對違反民主與人權的暴行，如北平之反對無理的大批逮捕的恐怖行爲。

四、反對學校當局的學潮，如武漢大學、中正大學的學潮。不論是那種運動，青年們的動機都出於合理而自然。青年絕不盲目，他憑自己的良知良能，會看，會聽，也會想。近年來一切的惡兆與暴行，並不是高深的玄學或機密的消息，而是他們都親眼看到親身受到的痛苦的刺激，不過他們尚不能世故老成到泯滅良心，尚不能安心認命，甘做奴才而自暴自棄。即就上列四項來說：

——穆企作——



一、反對美國目前的對華政策。這種政策是助長中國內戰，犧牲中國前途的政策。十幾年前，學生反日，因為日帝國主義在防共反蘇的標榜下，駐軍危害中國的主權，走私危害中國的經濟，進而欲以中國為反蘇的戰場，以中國人民為炮灰。美國在過去對中國的抗日會予以援助，中國青年自然對她敬愛，認為是盟邦。然而近一兩年來，美國却同樣也在中國駐軍，同樣以大量貨物在中國傾銷，打擊得微弱的工業不得復員，同樣也有更不平等的中美商約想吞嚥中國的富力，同樣以援助的名義助長中國的內戰，又同樣採取防共反蘇的政策，希望將中國變成她反蘇的基地，假手於中國政權驅使人民作反蘇的炮灰。此外，在中國的大都會，美軍又在上海屠殺威大子，在北平強姦女大學生沈崇，最近又鎗殺小學生，現在的日軍也少有。在中國學生心目中，反對日本，又何不反美呢？不管青年的思想如何，至少他們不願美國阻礙中國工商業的發展，至少不願美國助長中國的內戰，至少不願中國成為反蘇基地，至少不願意受美軍的侮辱。

二、反對內戰。民國以來，中國人民受够了內戰的痛苦；抗戰期中，人民一致熱望戰後的和平。然而一兩年來，北自東北，南至長江，無處

就近年來的學生運動的口號來說，其行動可分為四種：

- 一、反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如目前全國的抗暴運動。
- 二、反對內戰——各地學校關於停止內戰之遊行與呼籲。

三

不在嘆血。範圍之廣，戰線之長，為歷代內戰所未有。動員之廣，殺伐之烈，又更為抗戰時所無。內戰毀了學生們的故鄉，殺害了他們的父兄親戚，毀滅了他們的財產。試想：假如他是農家子弟，則徵實徵購搶去了他家的糧食；假如他是工商業人家的子弟，則內戰使他的工廠不能復員，商業受通貨膨脹的影響而失利。假如是公務人員的子弟，則他父兄的收入根本不足以糊口。學生們不僅無錢讀書，且多受到了飢寒的威脅。

三、反對違反民主與人權的暴行。民主原則與人民基本自由，在約法憲法上早經確定，在黨政軍首長的口頭屢經宣布，在書本上，在先生們的講述裏，重複敘述。然而中國却存在着一個強固的半孕育於封建勢力半寄存於帝國主義的政權，使中國人民的自由根本沒有保障。事實上，連學生開會，出壁報也受干涉，即如上海學生因沒錢讀書而興起的助學運動，也受到惡罵與非難。若對政治有所評議，更受到開除、拘捕甚至失蹤的威脅。這都是學生親眼看到親身受過的迫害。青年人愛自由，愛民主，焉能忍耐！

四、反對學校當局的行政。這種風潮規模比較小，但亦有其根源。內戰使教育經費拮据，以致學校無法聘請好教師，無法增購圖書，不能滿足學生的求知慾，每引起學潮。此外，有些學校當局根本是黨棍政客出身，絕不懂教育，貪污，無能，不顧學生的學業，壓制學生的思想。也有低能教授們，結幫口，引同鄉，明爭暗鬥，引起學生的不滿。這都是學潮的根源。

就上列四項說，都直接釀成了學潮。然學生又有何罪？

四

近年來的學運與過去的迥然不同。第一，範圍極廣。北自東北，南至廣州昆明，東自上海，西至成都，無處不爆發着，蔓延着。第二，更深入社會。學生不僅影響了教師，也影響了社會各界，而成為社會運動的一環。目前的現象，有四點特別值得注意：

第一，不滿現狀的學生日增。學生本多是純潔的青年，當然其中有國民黨員和三青團員；不用諱言，也可能有其他黨派的黨員。但他們人數必然極少。而極大部分是沒有什麼政治色彩的，故不能硬把學生們一體指為「左派」或「右派」。事實上只有一不滿現狀派和「擁護現狀派」，及大半的「中間分子」，——誠如徐炳超老先生在一「垂涕以道」一文（大公報星期論文）中所說，今日，不滿國民黨的人幾百人而百，——當然，學生也不例外。近年來有一特別的現象：即讀書用功品學兼優的學生往往是不滿現狀的激進派。其擁護現狀的往往是品學不佳或世故較深的份子；他們念書既不高明，又染上腐敗的世故，不得不討好學校，或暗通黨政軍當局，以為日後做飯或求一官半職的準備（這種現象，只有教師們知之最

深，而每為之惋惜）。中間份子則比較同情品學兼優的激進派，對那些低能的奴才則恥與為伍（這種情形多基於心理，而不一定基於思想）。加上黨政軍及學校當局對學生運動處處不公平，不光明，致激進派受到迫害，則更使中間份子同情他們。迫害與陰謀無形中教育了中間份子，——在這種循環下，不滿現狀的份子日增，優秀學生日見投入激進的隊伍中，使學生運動更增加新力量。

第二，壓制愈凶則反抗愈烈。學生運動所遭到的壓制愈凶，則反抗愈烈。因為有熱情有正義感的學生往往因此而同情被迫害者，而對迫害者便由憎惡而仇視。倘再予以嚴酷的處置，則學生的行動愈堅決，愈高明，例如以前昆明西南聯大雖遭到刺刀與手榴彈，死傷多人，而其運動愈見蓬勃。最近北平與上海也正如此。同時，更有一特點應指出的，即是優秀的學校其行動亦最熱烈，最堅定。這因為優秀學校所招考的學生較優秀，故對國家大事也更敏感，更深知利害。如南方的浙江大學、北方的清華、北大、燕京，都是最優秀的大學，學運也最熱烈。

第三，教師與家長的同情。以前學潮每為教師及家長所反對。但年來教授們已多不能生活，沒有供研究的設備與環境，使他們也得體念可怕的現實，終對學生漸漸予以了解的同情。例如聞一多教授，以及平滬許多著名的老教授，都對學生同情，甚至援救。至於學生的家長，也因為近來種種的惡象危迫到他身上，致同情諒解他們子弟痛苦的心情。

第四，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相配合。今日學生運動已深入到社會的裏層。同時學運的要求也正吻合一般人民的要求，如反美暴行運動，在工商業則亦有提倡國貨抵制美貨的運動，而反對內戰，則為全國各界普遍的要求；至於反對違反民主與自由的暴行的行動，也與教育界、文化界、出版界以及各種團體的呼籲相同。故學生運動已絕不孤立，而與社會運動相呼應相配合，成為社會運動中最有組織最靈活，正確而持久的主力軍了。到今天，學生運動如此頻繁而熱烈，政府固然不安，而最感到痛苦的，却是教育工作者。溫和而善良的教師往往自以為也有過青年時代，也做過學生，以己度人，來同情憐憫，來勸阻學運，但實際上是無效。這不是學生的無情或無理，而是今日學生所遭遇的痛苦，已非當年的青年所能了解。同情與憐憫皆屬無用，學生要求的是超過同情與憐憫的東西。學生運動的前途，可能有二。一即自然的平息下去。但除非是激成這運動的條件消滅，即美國改變對華政策，內戰停止，民主政治實現；否則，那是不可可能的。另一可能是學運的繼續擴大與深入。——當然，這種發展不會是直線的進行，反動者的迫害可能變成一恐怖，表面上可能使這運動低落，但優秀的青年必然被迫轉向地下工作，從事更危險更艱苦的抗鬥。在那種情形下，學運已變成了革命。寫到這裏，作者默念到歷代興亡的契機，乃黯然擲筆。

第一屆全國木刻展覽會佳作選輯



禮祥辦

李博

介紹第一屆全國木展

木刻是一種新興藝術，具有十五年的歷史，因為它有強烈的畫面，動人的感染力，而且創作簡單，容易流布，所以很適合目前中國的環境，在它發展的生命歷程中，已留下了很好的成績了。中華全國木刻協會是抗戰以後組織的領導全國木刻運動的唯一團體，在戰時已經有了不少貢獻，去年復員以後，曾於「九一八」紀念日在上海舉行了一次回顧性的「抗戰八年木刻展覽會」，並編印了一本「抗戰八年木刻選集」，甚博好評，現在該會自四月四日至十三日又在上海大新公司畫廊舉行復員後的「第一屆全國木刻展覽會」了。在這選特從二百餘幅新作中，精選出未經發表的佳作，介紹給讀者，在這邊木刻裏，我們可以看到這新興藝術現在又有了——一個進步的方向，就是年青的木刻家們正在從木刻民族式中創造出一種以



刻維訥

動騷的隊販工



黑線像和單純畫面爲主的中國風格。這種進步將使中國木刻藝術有更大的成就，可無疑義。而木刻運動在藝術上所走的路子也在這些作品中表現得很正確，每張畫都描寫着一些新鮮活潑的現實。木刻家們正視着種種現實，不單作消極的反映，而且更積極作有力的啓示。所以每張木刻畫都能給觀者一個深刻的印象，使大家從藝術的欣賞裏看到了許多有意義的問題。



傾聽新聞 宋鳴岡

苗民的辭神舞



黃永玉



水車 立新作

先秦的輿論力量 and 民主作風

錢健夫

滿腦袋「洋道理」的人，每每舉出「天下有道則庶民不議」這句話，而反證中國是天生的專制政治。可是，好爲「古董」辯護之士，則常引「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一類的成語，以爲這即是最早的民權思想。其實，兩者都是偏見，都是要不得的。

我國自有政治歷史以來，的確都是專制政體，直到辛亥革命的前夕。不過儘管政體是專制的，而且無論任何朝代都有一個代表專制政體的帝王，但却也有一個奇妙的現象，便是都相當尊重民意。每個帝王的興起，差不多首先要「收拾」的便是「人心」。歷史上似乎還沒有有一個完全背叛民意的暴君，能够安然享受天下的。儘管是「道路側目」，結果還是讓他跨台。

這是一個很好的邏輯，即是完全背叛民意的暴君，結果必爲人民的力量摧毀。而能得人心的賢君良相，必有一段清明政治，壞的受人民阻咒，好的受人民歌頌，打開歷史就有數不完的故事。

大約我國文化政治的歷史，最熱鬧者莫古於先秦。人家對於先秦的崇拜，總偏重於學術思想，我却認爲當時的「輿論」，甚有可觀。

民主的風氣，民意的重視，由毫無顧忌的批評到干涉政治放逐暴君的實際行動，實爲先秦時代的特色。

最使人豔稱的，當數子產不毀鄉校的故事。子產初從政，老百姓還看不出他的作風，如是詛之云：「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不但是這樣的編着歌兒，而且還經常的聚在「鄉校」以批評時政。當時然明便沉不住氣，勸子產毀鄉校以絕弊端。不料想子產却說：

「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講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這是一種如何偉大開明的見解！又是一個如何偉大開明的大政治家的風度！所謂鄉校，以現代語說來便是當時的「輿論機關」，也即是當時的「民意機關」。子產以一個封建時代的「官僚」，對輿論不但不能摧殘，對民意不但不能壓制，或者是設法收買，竟採取放任主義，鄉

校豈不即是鄭國的「參議會」或「國會」？所以鄭國之興，真有他處道理。

當時這種批判的精神，和民主的伸張，原是造成了風氣的。故晉厲公將殺卻氏，卻錡欲攻公，卻至曰：「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欒武子請伐楚，韓獻子以爲不必，曰：「民將叛之，無民孰戰！」晉與鄭盟，辭甚要挾，知武子曰：「我之不德，民將棄我」。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這些都是「貴民」的故事。周厲王監謗，召穆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沈尹成曰：「仁者不殺人以掩謗」。范文子曰：「古之言王政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之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監戒之術也」。這更是極力發揚民主的精神，并以提高輿論的警覺。

當時的輿論不但有機關，并且還構成一種政治上的制度。衛人出其君，師曠對晉侯曰：「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替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諫，士傳言，庶人謗」。可見得「庶人謗」是和「大夫規諫」等同爲「補察其政」的合法手段；厲王欲監謗，在當時自爲一種

違法的舉動，所以召穆公要加以諫阻。「庶人謗」既是必要的，而且還有一「士傳言」，則所謂「士傳言」也者無異即爲近代民主國家的上議院，「庶人謗」自然就等於下議院。當時的帝王就是國家，所以，他們的監督（諷諫）的對象即爲整個的政府。這種尊重民意的制度，較後世還似要細密。

別以爲這都是一些騙人的記載，當時確曾收到很大的效果。譬如子產在鄭國，最初便是一個挨罵的傢伙，甚至當時的輿論說「孰殺子產，吾其與之」，簡直人民要殺掉這個「混賬行子」！可是，子產的既定國策偏不動搖；而最重要的還是博採輿論，扶植輿論，而輿論也確能發揮很大的力量。這是子產的苦心，也是一個開明的政治家所採取的步驟，果然，鄭國的老百姓一方面覺得他們的意見已全部都被採納，一方面覺得子產的「新政」確實爲的鄭國大眾，所以經過短短的三年，由詛咒竟變成歌頌：「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由這簡短的民歌裏，至少子產的「教育政策」與「經濟政策」是已完全成功的。

由於先秦民主思想的發達，我們還可以推想到這種思想發達的根源。譬如周官小司寇就說過：「掌

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日詢國危，二日詢國遷，三日詢立君。周官是偽書，有些人祇承認它是戰國時代的思想，有些人以為應成於西漢，復謂為西漢時代的思想。這些屬於放蕩，姑置不論。不過打開歷史，這三種「謀及庶人」的民主作風，實在不乏其例。

第一、是詢國危。左傳定公八年就有過這種事實：「衛靈公將叛晉，公朝國人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我猶可以能戰。曰：然則如叛之？」又哀公元年傳：「吳之入楚也，陳懷公朝國人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衛靈公的詢國危，因為作戰需要民力團結，倘能同德一心，自可獲得勝利，至於陳懷公的詢問，簡直是一種「投票選舉」的方式，自較衛國更為進步。「國人」而可以「一朝」，則民意不但是有組織的表現，而且必有施行民意的適當地點。

第二、是詢國遷。這種例子比較更早。譬如盤庚將遷殷，「命衆悉至於庭」，則是遷國之前，還須召開一次全民會議，徵取全國大眾的意見。而孟子記太公將遷岐，也會「屬其耆老而告之」。告於耆老，自然也是為着尊重「國民代表」的意思。

第三、是詢立君。立君本來是皇室的大權，可是古代也相當尊重民意。譬如左傳十五年傳：「晉惠公為俘於秦，使呂飴甥朝國人，告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圍

也。衆皆哭」。又昭公二十四年傳：「周王子朝之難，晉侯使士景伯蒞周問故。士伯立於乾祭而問於介衆」。這種精神，直留到後代，不過參加的不是全民，而是幾位王公大臣。許多正色立朝的直士，常為「建儲」問題死諫，實在是因為帝

王就是國家，人選不能不特別慎重，現在看來未免笨得可笑，當時却有一番道理。由這些事實來考察，可見得周官小司寇的話多少有其根據，并不是完全出於理想。而當時許多民主作風，雖未構成真正的民主政治，

但是輿論的力量之偉大，却可以顯倒現在的咱們！歷史就是一塊最光亮的鏡子，我們不妨平心靜氣的來多照幾回。這比徒羨人家或空罵自己，以及洋洋灑灑的高談理論，多少要有點好處。

宋院長下台以前，傅孟真先生發表了幾篇洋洋灑灑的文章，報紙雜誌，競相轉載。有些人大為鼓掌，有些人却不禁默然。傅先生的文章，我因有幸來到上海，得以拜讀，一如他過去的政論，充滿了霸氣。宋院長的私生活，我無傅先生學術上政治上的地位，不得而知；至於那填鴨式的請客方式，更無由瞻仰，當然不敢妄論。但自他主政以來，一切設施，因忝為中國小民之一，加在我身上的分量是也會感到，而也頗為深惡痛絕的；但我沒有傅先生那樣的胆量，能做出那樣充滿了嬉笑怒罵的文章，來加以攻擊的。當然，我也沒有傅先生在政治上的縱橫捭闔之術和政治的靠山作為我言論的後盾。

宋院長之

幫忙與扯淡

流金

道貫古今，學

該罵，凡中國人都有同感。但像傅先生那樣的罵法，我却不敢苟同。第一，傅先生似乎是指桑罵槐，宋子文固被他罵得狗血淋頭，中國共產黨也被他罵得體無完膚。宋子文之當院長，照傅先生的說法，似乎是共黨希望的；但如衆所週知，共產黨所希望的還多，爲什麼偏偏只實現了這一種；何況宋之被選任爲院長，其權並不操在共黨手裏，南京袁袁諸公，並非個個木偶，豈容隨便任共黨作弄？宋之選任不當，罪在何人？倘傅先生神經還屬健全，能不知道？但傅先生却大裝其伴，筆下扭扭捏捏的寫些什麼親痛仇快的話，一力揭穿共黨面目，豈不近於扯淡！也許傅先生是別有用

感吧。

備中外，術雜王霸，比起那些官僚資本家來，那點兒不如！學優則仕，乃古之明訓；學優而不得仕，實共黨的陰謀。君是聖賢之君，臣亦聖賢之臣。君臣一旦相得，郵治之世，不是可立而待嗎？我們也希望傅先生一旦身居廊廟，爲我帶來幸福！

但傅先生的「仗義執言」，已歷有年所，不過中國依然距傅先生的理想還遠，傅先生也依然是抱着那塊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招牌，於「治學」之餘，「幫忙」扯淡一通而已。我非先生的朋友門徒，不知他情懷何似。但遙想他身居帝城，近來也不免有寂寞之感吧。

三月廿八日

英雄的夢 鳳子

勝利給他帶來一申美麗的理想的生活藍圖。很偶然的一個機會，他脫掉了僅有的一套破西裝，換上黃色制服和一副武裝帶。聰明，機智，加上時運更武裝了他的精神。當盟國的飛機把他從西載向東，他參加了受降典禮，他分担了接收工作，地方秩序需要他參與維持，敵偽遺留下來的種種糾紛，也得靠他處決，因此，他在老百姓面前，給自己塑成了一尊偶像。他精明而果斷，得到他好處的人，會頌揚他公平，而廁身在一羣向無人接收的交際花之流的婦女們面前，他自然的變成了令人仰慕的英雄了。

二

英雄，應該有許多業績的。

參加了許多地方會議之外，他得夜以繼日地被包圍在少不了女人的筵席上。香水與酒精都容易使人興奮。加上音樂一樣的音調，那比音樂更其悅耳的頌詞，酒還未進口，就先醉了。

「將軍，我代表全地方的婦女敬你一杯！」

「祝您健康，我先乾了，將軍！」

打了八年戰，跑了不少地方，却從未面臨過這樣的陣式。他的過小的眼睛早已變成了一條縫；別小看這一條縫樣的眼睛，他却吞食着諸種色相。豬八戒遊盤絲洞也沒有他這時的心亂，好在究竟是個將軍，儘管他的官階還不過是上校。管他呢，女人們給他加贈了封號，他明白他的職權可以超升一些沉溺到水裏去了的人，這封號也受之無愧了。

何況筵席永遠爲他張羅着，山珍海味永遠地陳獻着，伴着山珍海味洋酒美人的，是一串無價的珍寶。各式洋樓他都參觀過了，只要是中意的，順手就是一張封條。接收大員兼負安撫地方的

——作品好像一面鏡子，欣賞者在它裏面照見他自己，也照見整個人生；

——作品好像一座燈塔，它照耀着黑夜裏的善和惡，又把人羣指引向明天。

魯迅先生在日本留學，原本是研究醫藥的。

在他的直覺，以爲中國人太不講衛生，體格太壞了，要用醫學來療治中國人的病弱的身體。但是有一次，他混在日本同學中間看關於日俄戰爭的電影，片中有一段表現着日本軍隊槍斃一個被目爲做俄國間諜的中國人，而站在旁邊看熱鬧的，也盡是中國人。魯迅先生在異國看到這種影片，感觸特別多。他覺得中國人的靈魂有缺陷，也是缺少了教育。因之他認定：救中國人的肉體固然要緊，但救中國人的靈魂更爲要緊。假如靈魂有疾患，則不論身體如何健康，都無用處。而醫療中國人的靈魂的最好學科，莫過於文學。於是他便改了行，從事文學。他回國以後，寫「狂人日記」，寫「阿Q正傳」，創造了我國新文學上最著名的典型人物，也不外是像用X光線去照人體一樣，挖掘了中國人共有的劣根性，把中國人通有的病態暴露出來，「催人留心，加以治療」。

現出來了。所以他成爲了俄國革命的鏡子。

同樣的意義，魯迅先生也可以說是中國革命的鏡子。從他的「吶喊」、「彷徨」一直到晚年的雜文，都是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革命過程中的各種生靈，很真實地表現出來。這面鏡子照出了各種各樣的臉譜。

我們中國人在魯迅先生的作品裏，發見自己，發見人生，發見社會的病根，換句話說，就是發見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和民族的靈魂的缺陷。他爲什麼這樣寫呢？是爲的「夾雜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治療的願望。」

——在這一箇範疇以內，作品便是鏡子。

但是，光光照出病根來，把膿血腐臭的爛肉剝出來擺在讀者之前，而不指出敷什麼膏藥，使它消毒生肌，恢復健康，還是沒有用處的。因此，「爲達到這願望起見，是必須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我於是遵着將令，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干亮色。」（「自選集」序）。這「亮色」給讀者照射出前路。在這一箇範疇以內，作品便是燈塔。

實質地看來，這兩者的不可分的結合，就是新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結合。

二

哲學的任務，並非僅僅用各種方法去說明世界，更重要的，是該如何去改造世界。文藝的任務也是這樣。

「藝術的使命是在乎站在比現實更高的地方，從新人類之父的人羣的莊偉目的的高度，去觀察今日的事情。它不致把人從現實切開，而應將

文藝的 林 煥

俄國文豪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他把帝俄貴族地主階級的專制和腐爛潰敗，把農民羣衆的生活的黑暗悲慘及其向上的求解放的願望，換句話說，就是把俄國革命的客觀條件，具體地表

責任，英雄的業績自然要超過預算了。

三

幾乎是情不可却地，他給自已安置了幾處行轅式的公館。只有他的隨身副官才弄得清楚那所公館裏住着第幾位夫人。幸福太多的人也免不了煩惱，偏偏不知趣的黃臉婆也復員到上海，太太之上還有老太太，做丈夫可以永遠失蹤，做兒子却不能不回到家裏來。何況太太同他是天生的一對，精明而且厲害。

對敵作戰的戰場，可以臨陣脫逃，可惜戰場的經驗一點也幫助不了他；土地的失去，敵我懸殊，自己先就原諒了自己，但在羣雌粥粥的陣式裏，他却陷進進退不得的包圍中。

偏偏不幸一齊來。逆產的調查，隱匿轉讓終於也被人密告了。他被長官叫了去。姑念抗戰有功，接收了的全被沒收，鴛鴦燕燕的女人，也鴛燕一般地四散飛掉。他不再是女人羣中的英雄，他到底成了太太的俘虜。

四

短短一年半的時間，他却做了一個不短的夢

這是一個美麗的噩夢。

他活在大海裏，像一朵浪花，瞬間就消逝了

可是人海的浪花却不斷地湧着，某一個時期，人們似乎把他忘記了，可是，相當的機緣，他可能又飄浮在人海的面。當社會還充滿了腐朽的氣息，渣滓還沒有沉底的時候，自然會激出更多的浪花來，儘管這些浪花是沒有生命的。

無需乎追問他姓甚名誰，英雄的夢中的主人，有的是勝利的偶像够人欣賞。這短短的速寫也，不過是脫胎於生活中的習見一具浮雕而已。

用功平

他抬高到現實以上的地方去。——（高爾基：「論戲曲」）

「我們的作家是處理着『實際上的人』，即是處理着『極端地混淆着這樣那樣的，非常複雜而充滿了矛盾的人物』。我們的任務，不是在乎這些人物的單純化，而是在乎將其自身的姿態給與他自身看，藉此援助他自己的再教育。」在想給與表現的各個人物中，除開其階層共通的特徵而外，我們還應當發見其最特徵的，而在極端上決定其社會行動的那種個人的特性。我們不應該像現在我國所通行的那樣，把階層牌子從外部去貼到人的身上。

「藝術上的個別的東西與一般的東西，具體的東西與典型的東西的關係——是一種複雜的關係。藝術家愈將具體的素材，即愈將鬥爭着、動搖着、苦惱着、或歡喜着的人們的具體的諸形象，作愈深刻的，熱情的研究、把握、理解、感覺，又，藝術家愈真摯地突進生活的真實的密林，而將其能把現實諸過程和其方向等的真實表現給與我們的那種人物、現象、事件、特徵等，愈注意地從此密林中選擇出來，則此藝術家之典型的藝術的概括，也就愈成爲燦爛的東西。藝術家處理着具體的諸形象，可是却使我們能理解一般的東西。」（約翰·亞里托曼：「文學上的真實」，據起予譯文）。

文學上的這種典型性的表現，必須作家具備着頂純熟，頂高明的活用語言的創作技術。「作家一面從事着工作，便一面把工作變化爲語言，

同時也把語言變化爲工作。」（「論戲曲」）。「要使文學作品够得上藝術之名，應當在該作品上賦與完全的語言形式。將此形式賦與故事或小說者，是樸素的、正確的、明徹的、簡潔的語言。」（「論創作技術」）

藝術家在他的創作過程中，若「僅祇從『今日』這個概念去理解現實，而不在于其中去看出『明日』，那祇不過庸俗地理解着現實罷了。沒有『明日』的『今日』，前途的漆黑的。沒有『今日』便也沒有『明日』，因爲那不過是空虛的妄想。」（「文學上的真實」）。

具備了這些一切的藝術條件，才是成功的文藝作品。祇有這樣的成功的文藝作品，才具備着「鏡子」與「燈塔」的性能，而在讀者欣賞過它以後，起「靈魂技師」的作用。

三

我們的古聖人孔老夫子會說：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他對文藝欣賞的理想是多麼的高！

我們的讀者，在欣賞古典作品的時候，需要從那鏡子似的作品裏，照出那個時代的人生，那個時代的社會及其趨勢，以提高自己的教育。

我們的讀者，在欣賞當今的作品的時候，須要從那鏡子似的作品裏，照出今日的人生真實，照出今日的社會及其明日的趨勢，增益自己，豐富自己，使自已盡最大限度的力量，參加掃除與改造舊的罪惡的東西，發揚與創造新的合理的世界。

鏡子照着真實，使你自省。

燈塔照着前路，教你前進。
來吧，朋友們，和藝術女神擁抱！

南京見聞

柳逢仙

(一) 官與民

剛下火車，在下關車站的月臺上巧遇小錢。他也是乘臥車從上海來的，同行的還有一位司長，經小錢介紹，我倆也抱了一把手。我們有意同僱一輛汽車進城去。

迎面來了個兜汽車生意的。小錢講明了目的地，問他要多少錢。却不料：

「先生，你們做官的味！」——原來小錢穿着中山裝，而司長雖是一身西服，手裏却還提裝得厚厚的一隻公事皮包。

這兜生意的，一望而知是個司機的「下手」。他那「刮辣鬆脆」的一句話，使我們三個一齊怔了，半響應不出聲來。我想，話裏粗中有細，彷彿是帶着骨頭的。硬骨頭，軟骨頭，兩者或居其一。說硬的：南京是個官兒城，你們來去慣了，難道不知價錢，照着給我就是，何必多此一問呢；說軟的：爺們難道還較量這幾文車資，隨您客氣就得，小的不敢囉嗦。估大勢，恐怕是根軟骨頭，「你們做官的味！」

我們照例論了一陣價，成了交。坐進車去，我便又提起方才那件事來。小錢也認爲「下手」的那句話侮辱了我們，雖則他心裏絕不致對我們三個含有什麼惡意，也許還是敬重的味兒居多，也很難說；至於動機，那無非想嚇混過去，多得幾文車資而已。可是司長聽我們這樣一說，却沉不住氣了，向那坐在前面的一下手「喝道：

「混帳東西，你還想敲我們竹槓嗎？」
「做官的竹槓是你敲得的？等一會車子停了，我叫兩個兵把你押起。」

我明白了，這就莫怪：「你們做官的味……」

到南京後的第三天下午，匆匆忙忙趕到下關車站。我想乘對號入座的凱旋號回上海去。不料售票處早掛了紙牌子：「車票售完」。萬分懊喪中，不期碰上一位臨時發生變故不能抽身離京的乘客，願意把車票轉讓給我。

方慶幸間，猛然有人擊我一下背，原來是方君。別離多年，他也穿起戎裝來了。他身後跟來一個「紅帽子」，背上和手裏各有一口大箱子。看情形，他似乎還不會買票子。

「車票統統賣光了，方先生，你得碰運氣。」

「我自己並不走，是來送客的。我送的是X X先生，一位中央委員。他要到上海觀光觀光，倒不必事先買票，可以免費坐餐車的。這是特權，沒得問題。」

我一連串想到三中全会、結束黨治、黨政分離、黨費自籌、以黨養黨等等大問題；然後，念頭又一下跳回來，老榮迴在這個渺不足道的「特權」上。這的確是樁小事，唉，我太想開了，然而又太想不開了。

(二) 「南朝」天下的小疙瘩

在鼓樓一個親戚的家裏，遇見一位來京述職的湖南省政府的高級官吏。他們寒暄一陣以後，話題很快就轉到湖南的共產黨。我照錄他倆的對話如下：

親戚：聽說湖南也鬧共產黨了，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就說「南北朝」吧，也至少要長江爲界呀！廣東東江和海南島的共軍雖然至今還

存留一部份，但是孤立無援，作用尙小；此外，像江南的共軍，早就自動撤往蘇北；王震統轄的一部份新四軍，在日本屈膝的前後，原在湘東湖南流竄，後來也因力量孤單，不得不渡江到湖北去，與李先念合流。可見共黨最初的確還不敢把長江南岸打進算盤裏去。去年又聽說李先念的一股全都潰散了；要潰散，總該向北向西，怎麼又讓它渡江到了湖南呢？

官吏：這個問題麼……可以這樣說：李先念的部隊原是集結一處的，如今也的確潰散了；可是潰散就在，妙就妙在「散」的部份不「潰」，形成一股小力量，而「潰」的部份不「散」，又佔住一個小天地。如果說共產黨敗了，那是一種不垮之敗；如果說國軍勝了，那是一種不能休兵的勝。

親戚：現在政府把大軍調集到東北，津浦平漢兩線和晉陝一帶，也就是說，都跑去遠征「北朝」，照說，後方防務總不免要鬆弛一點的，是嗎？

官吏：湖南的共軍一部集結沅陵，一部集結常德，兵力是不大的，每處不過幾百千人來人。親戚：那末你們總算還好，應付得過去。南朝依然可以歌舞昇平了。

官吏：好名辭：「歌舞昇平」！你剛才不是說，大軍北上，後方防務不免要鬆弛下來？親戚：聽說長沙原有一旅駐防，已開拔到沅陵常德一帶去了。以一旅之衆——

官吏：老兄，一旅之名，一營之實。親戚：那也不要緊的，共軍究竟是烏合之衆。官吏：我方的軍隊還不是衆之烏合，何況這一營

二月底新華日報館昆明分館被封；三月一開頭，消息傳來，中共的合法地位被推翻。一個月來的昆明雖沒有驚人的大事件發生，但零零碎碎的一些小波動是有的。從這些小波動裏不僅反映出昆明的近貌，也正透射出大局的陰影。

在精神的攻勢 昆明曾經是民主堡搏鬥中，民主戰士此仆彼起，雖然經過李聞慘案時的恐怖，今年二月初的抗暴大遊行依然有三萬學生的壯大行列，以之與不久之前奉令舉行的慶祝憲法提燈會那渺小的行列一對照，更使某些人莫明其妙。他們不能了解學生的愛國情緒，總以為有人在背後操縱。所以當勒令中共撤回延安的消息到了昆明以後，治安當局就舉行會議，議決了一套處治潛伏境內的中共份子的辦法，並在報端發表，限三月十五日以前自行離去或聲明態度；對於認為有中共嫌疑的份子，則要求履行下列三個條件：（一）請名人三人證明，（二）正式登報聲明，（三）寫悔過書。隨後有好些中學校裏光臨了據稱奉治安當局之命來校調查的特殊人物，要學校當局檢舉教員學生中的中共份子。有的則強令開出國文和音樂教員的姓名，據說國文和音樂教員都是共產黨。有的則乾脆抄去全體教員的名單，有的則強

令開出教員中活動份子的姓名。有的在學校當局婉言拒絕之下弄得沒有結果，就說：「好啦好啦，你隨便寫幾個名字給我吧。」這很使各校負責人苦惱了一番。

所謂黑名單的傳說證實了，並不秘密，甚至公然給人看，於是乎張王李趙百多人的名字赫然紙上。省市立中學的教員早在寒假期間奉密令解聘了一批。各私立中學於此時也接到主管官署的命令，對於有中共嫌疑的教員必須解聘，學生則勒令退學。私中校長聯席會議商討

共產黨。此外有位中學校長，有位中學主任也登了聲明，但其內容在於澄清外界對他們的誤會。據傳說這個所謂「外界」對這位校長的威脅很重，很久，而根本原因也不過是意在攫奪其位置而已。其次是在雲大。雲大師生列入黑名單者，據知已有二十餘位。首先是學生，有十七位接得校方通知，要他們履行條件，否則斥退。這十七位中有兩位，大家確知他們不是，絕無嫌疑，因為他們是三青團員，刻已發揮領導作用，登報聲明了。另有一位

大局逆轉以後的昆明

俞仲

的結果，除了有一位校長作不平之鳴外，沒有人敢說個不字。決議案是：確有中共嫌疑的教員解聘，學生斥退。因此，今日之昆明任何公立學校的員生，只要被人加上一頂紅帽子，職位學業全無保障。這種精神攻勢做得很徹底，也極普及，效果如何，我們在下一節裏就可看到。

有不論是非的校長 昆明究有若干有激濁揚清的師生 中共份子，筆者無從調查。從報上聲明啓事中所看到的是有位要人的小姐聲明說離

女生，她得悉也有她的名字，對人涕泣而道：「我連哈哈合唱團都不敢加入，今天的黑名單上竟然有我！」這一事件在雲大學生方面引起極大的不安和很深的憤懣。學生代表正式向熊校長據理交涉，各壁報亦一致抗議，要求保障學業安全。學生代表會向熊校長追問黑名單的來源，熊說一部分是治安機關送來的，一部分是校內開來的。學生追問校內是誰開的，熊無詞以對，改用好言安慰學生，並表示不斥退上述學生，要他們照常上課。可是事

隔一週，幾天前熊校長又正式佈告要這些學生照條件辦，否則開除。同時對於助教也開始進行這一手。有一位教大一國文的助教接到熊校長有要事面談的信，跑去一談，才知道黑名單上也有他。熊校長說：「我很關切你，很了解你，只要你登報聲明一下，一切有我，自無問題。」不意出乎校長意料之外，這位助教很迂，他說：「我教的是國文，研究的是歷史，不能因為名字被寫在黑名單上，不把是非弄清楚就胡塗塗登報。」熊說：「現在不是講是非的時候！」「我是你的學生，也是你聘的教員，你還知道什麼面目去教學生！」說完佛然而出。校長先生面子和內心裏當然很不好過，嘴上還硬說「我全是為你好。」而助教的腦子裏卻閃現了一句古聖先賢的名言：「君子愛人以德。」的確，時代是變了，某些岸然道貌的前輩，平日儘管義理道德的在嘴上吹，名位已經把他磨得沒有一點稜角了。真正重視貞節，篤信而力行的倒是後輩。這實在發人深省！

昆明近於無聲 自李聞慘案以後，三進民多疾苦 民盟在昆明出版的民主週刊停刊了。二月中一度復刊的學生報，僅出兩期便被悶死。而二月底，擁有雲南廣大讀者的新華日報也封掉了。以後昆明人所能讀的，只有上海來的進步刊物。回憶勝利前後昆明出版物之如雨後春筍，真令人有不勝今昔之感。今日

昆明成了近於無聲的昆明。雖然近於無聲，人們並不肯馴服的被牽近鼻子走。三八節省婦女會以為是到了她們領袖羣雕的時候，可是在省黨部的集會是冷寞得很。另一方面在雲大由婦女聯誼會、雲大女同學會、及各女校學生團體主持的紀念會卻有千餘人，得到廣大女青年的支持。至於最近官方發動的所謂「愛國護權運動」，在昆明不見有人羣在動，只有報上發表的官辦民意的電報在動了幾動。而全省省立中學教職員的通電，那只能說是王政代表，離省遠點的省中到今天還無可能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談到昆明以外的州縣，不論遼東遼西遼南，人民的疾苦在這內戰的局面下真是如水日深，如火益熱。徵兵徵糧的重荷與苛擾不去說它，徵稅方面已經連房捐都已推行到窮鄉僻壤了。去冬民廳發善心救黑籍子民，製發戒煙藥，交給各縣縣長推銷，省城是一千二百元一包，還打折扣，有一位縣長分發給鄉鎮長時說：「只收成本費每包一千五百元，於是鄉長派給保長，保長派給人民。我在一村聽說人民拿到手是五千元一包，不吸的也得買。這只是一個小例子。陰曆年前我在一縣作客，那裏的谷價是五千元一市石，人民上糧，政府因交通不便要折價收歛。鄉長們預備按七千元一石折價，縣長說恐怕上峯不答應。從這些事實裏我們可以懂得人民為什麼活不下去，吃鹽巴也當作「打牙祭」。同時我們也就懂得為什麼匪

多。這樣下去，誰也不敢相信前途會無大問題。

越南野心家招兵買馬 在越南被越南政府防慮未然而南人民趕出來的阮海澄，不久之前在雲南進行招兵買馬；以「大道生」布發財的周潤蒼——被昆明三青團捧起的紅人，像支持「民主自由大同盟」那樣熱心的拿錢支持越南國民黨阮海澄在滇境進行收買土匪組織軍隊。這正說明這些野心家把三迤當作他們冒險的樂園！現在容我把三月廿六日昆明報紙登的一條消息剪附於次：

（雲南社訊）越南國民黨前在滇省境內招募自願兵一節，頃悉，國防部電示雲南省政府：（一）凡軍官總隊之官長隊員，未經政府明令退役者，概不能自行參加越國民黨行動；（二）嚴禁任何人假借協助越南革命名義，在我國境內組織軍隊，招募土匪，至越南國民黨在雲南境內招募自願兵，亦應取締；（三）越南國民黨之一切組織措施，應在越境以內云。

越南國民黨和阮海澄的背景，人們是太清楚了，他和周潤蒼之流勾結起來在雲南幹這一套，對於雲南人的和平生活的威脅是太大了。省當局對此事的周密處置，除禍患於未然，是值得為雲南地方慶幸的！

卅六年三月廿六日

致作者

編者

時與文周刊已出到了第四期，我們覺得有幾件事要告訴各位寫稿的朋友：
一、來稿希望有一般性現實性，如果學術性太重或者與時代隔離太遠，雖然有內容有份量，我們也不歡迎。
二、來稿請不要過長，最好在四千字以內；長稿即使內容好，也很難登出。短稿却可以儘先發表，而且稿酬較豐。
三、小說、劇本、繙譯以及序跋一類的文稿，暫不需要。
四、來稿請逕寄上海姑蘇路三十四號本刊收，勿托人轉遞，以免延誤。
五、來稿收到後，一經決定採用，不待發表，立刻致送稿酬；如果文章發表後還沒有收到稿費的，請即來函查詢。又各位收到稿費後，務請將稿費收據投郵寄下，以清手續，且便查對。至於不合用的稿件，我們也願意早日退還，但是務請各位在稿未註明通訊處，並且事先聲明，方能照辦。

天隆隆



經濟實惠 美觀大方

天隆隆染織廠出品

廠址：廣東省城西一號路
電話：五五四一

！閱訂接直請，刊本讀愛如君

內政部備案登記證京警滬字第四一八號
 陸軍部備案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四號

三北輪埠股份有限公司

航行： 南北洋綫
 長江綫
 堆棧： 各處均有設備

總公司—上海廣東路九三號 電話一二九五〇

分公司— ·天津·青島·福州·寧波·香港
 ·南京·九江·漢口·宜昌·重慶
 ·蕪湖·安慶·

宏豐企業公司

分公司 漢口聯保里五號
 重慶林森路一二七號

承辦進出口業務
 總公司 上海廣東路五十一號
 電話 一一四五三一五

行銀豐怡

務業切一行銀業商營經

實扶
 業助

社服
 會務

號二衙府二路生民慶重 行總

號七六四路西江海上 行分
 號〇二〇二一話電

新書

中間派在政治上的

地位和作用

施復亮

從民主政治的條件

說到來日和談

程 程

內戰財政的幻術

甘祠森

呼吸英雄的氣息

陳石銘

5

哲學是甚麼？

哲學家應該做甚麼？

張東蓀

小說中的「光」與「熱」

林 海

無錫二日遊

潘子農

儒術途窮

于 冰

一種可貴的精神

以 羣

漫畫

米谷、所亞

木刻

訥雄、李樺



南榮記報關行

地址 上海廣東路一二二號
電話 一〇四一八

營業要目

專為各地客商辦理報關

歡迎賜顧

和記報關行

業務↑

專門代客辦理
長江綫 南北洋 各地客貨報關

歡迎賜顧

地址：上海廣東路一二二號
電話一〇四一八號

目要期四、三第刊本

時與文週刊

和平何以會死了.....	張東蓀
法幣將往何處去.....	漆琪生
當前國際形勢.....	石嘯冲
台北二周記.....	胡一帝
夜讀散記.....	雍蒲足
我好緣到了一個鬼世界.....	穆木天
中國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	王亞南
目前的學生運動.....	向曉
文藝的功用.....	林煥平
英雄的夢.....	鳳子
南京見聞.....	柳逢仙
第一屆全國木刻展覽會佳作選輯	

發行人 程博洪
編輯者 時與文週刊編輯部
經理部 上海牯嶺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天隆被單



方大觀美 惠實濟經

出品廠織染隆天

號一一路西大 廠造製 室五三號一五路東南 行行發
五六六三二話電 五五四一話電

為減輕讀者負擔，

請直接訂閱本刊。

辦法

請惠寄國幣二萬元至上海牯嶺路卅四號

本社，當即按期寄奉，各期按照上海定價八折計算，郵資照實加收，如款用罄，另函通知。

(請將此紙剪下連同訂費寄下。)

時與文週刊		訂閱單		姓名	地址	付款	起寄期數	寄遞方法
時與文週刊社		此致 上海牯嶺路三十四號				貳萬元正	自 期起	平寄·掛號·航空
啓								

中間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

施復亮



張東蓀先生在他的「和平何以會死了」一篇文章裏（見「時與文」第三期），強調中間派在促進和平的工作中的重要性，說過這樣的話：「須知在國共的中間，倘使有個勢力，十分強大，完全獨立，這却與和平很有決定的作用」。我認

爲這是一種極重要的極正確的意見，亦可以說是「一年多來和平運動中所獲得的一個極可寶貴的教訓」。我向來認爲：中間派在政治上的強大獨立的地位，不僅對於促進和平可能「有決定的作用」，甚至對於實現民主也可能「有決定的作用」。因此，國民黨統治集團與共產黨以外的一切民主黨派（包括國民黨民主派）和民主人士，在目前應當趕緊團結起來，形成一個強大獨立的中間派的政治力量，以便及早促進和平，實現民主。

全國絕大多數人民都厭惡內戰，反對內戰，爲什麼內戰還在繼續進行？中國人民多半希望對美蘇兩國採取同樣友善的政策，不願做美蘇衝突的犧牲品，爲什麼今天有一部份人硬要走向親美反蘇的道路，另一部份人也要被逼走向親蘇反美的道路？一年多來的內戰，至少也已經直接間接地犧牲了幾百萬人甚至上千萬人的生命，毀滅了無法計算的生產的和消費的物資，如果長期繼續下去，甚至因此引起美蘇二國的直接參與和直接戰爭，那還不知道要犧牲多少寶貴的生命和寶貴

的物資，也許會帶來全國性的毀滅！這是中國人民所親身受的已經到來的而且可能擴大和延長的大悲劇！只有強大獨立的中間派的政治力量能夠形成，才能阻止這種大悲劇的演出和繼續演出！

中間派根本反對當前的內戰，而且還要反對到底！可是中間派對於內戰的雙方，却知道誰站在人民的立場，誰站在反人民的立場；誰採取進步的政策，誰採取反動的政策；誰從事進攻，誰從事防禦；誰要消滅對方，誰只圖自己的生存。因此，中間派在反內戰的運動中，決不應盲目地

同樣反對內戰的雙方，而要特別反對那發動內戰的罪魁禍首！我們承認：當進步的人民的政治力量受到反人民的反動派進攻的時候，絕對有自己自己的力量防衛自己的權利！在這一點，儲安平先生也說：「就事論事，共產黨的不肯放下槍桿，也未嘗不能使人同情，因爲在國民黨這種政治作風下，沒有槍，簡直沒有發言權，甚至沒有生存的保障」。《見「觀察」第二卷第二期「中國的政局」》但我們決不因此放棄我們反戰的立場。

國民黨統治集團主張內戰的唯一像樣的理由，就是說共產黨企圖割據，破壞統一，或者說它企圖以武力奪取政權。這在君主專制時代，的確是一個重要的理由，單憑這個理由便可以下令討伐；但在「中華民國」便不成爲理由，因爲國民黨過去也曾經「割據」過廣東和西南，「破壞」

過段祺瑞和吳佩孚的「統一」，而現在的「統一」局面又不是建築在民主的基礎上的。國民黨倘若實備共產黨企圖以武力奪取政權，共產黨也可以反唇相譏，指出國民黨的政權就是靠武力奪來的，而且還靠着武力獨霸了二十年。國民黨絕對沒有理由可以說：「只准我用武力奪取並獨霸政權，不許別人用武力奪取政權；或者只准我革別人的命，不准別人革我的命。只有全國大多數人民，才有資格要求國共兩黨一律把政權交還人民（不是左手交給右手），把軍隊交還國家（不是「黨國」，而是「民國」）。換句話說，只有真正做到了「還政於民」，才能真正做到「還軍於國」。在整個國家的政權緊緊地被掌握在國民黨統治集團手裏的時候，不僅談「還政於民」是一齣騙人的把戲，就連談「還軍於國」也是一幕滑稽的笑劇。所以國民黨當局是沒有理由要求共產黨繳械投降的。自然，共產黨如果肯繳械投降，國民黨就可以用「政治方法」達到「和平統一」的目的。不然，國民黨便不惜採用內戰方法來企圖達到「武力統一」的目的。然而正如錢端升先生所說：「內戰解決不了國共的問題，也決產生不了統一的中國」。《見「觀察」第二卷第四期「唯和平可以統一論」》國民黨當局的內戰政策，最後一定難免失敗，絕難達到「武力統一」的目的。

國民黨既不能用武力統一，那末共產黨能

能用武力統一呢？就最後的結果說，我們不能否認有這種可能；但一則決不在最近的將來，二則那時共產黨所統一的也是一個糜爛不堪的中國。我們要知道：第一，共產黨尤其是共區的人民也是跟我們一樣的人，在長期的戰爭生活中也會感覺疲倦，希望早日恢復和平，雖然他們是一種新生的進步的力量；第二，國民黨統治集團雖不能在內戰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但也決不會在最短期間便根本喪失作戰的能力（除非其內部發生重大的事變），至少也可以阻止共產黨的「武力統一」；第三，在美國進步的民主派起來掌握美國政權以前，代表美國獨佔資本利益的美國政府，決不會坐視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力量整個崩潰而讓共產黨取而代之。所以內戰倘若不能因國內外的壓力而早日停止，便很有長期化的可能。

目前的政局是：國民黨既不能用武力消滅共產黨，共產黨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國民黨；而國際形勢也不許可有一個完全右傾的國民黨政權或完全左傾的共產黨政權。在這種客觀情勢之下，惟一可能的正確的道路，就是恢復中間性的政治路線，由國共兩黨及其它民主黨派共同組織民主的聯合政府，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的種種改革。但要走回這條道路，首先必須造成一個強大的中間派，獨立於國民黨統治集團與共產黨之間，取得一種舉足輕重的地位。

張東蓀先生認為「第三者中多數不了解中國國運所降下的神聖使命」是和平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見「和平何以會死了」）。錢端升先生也認為「政協的缺點不在其方案的欠佳，而在政協本身之未能充分表示國共以外大眾人民的力量。因為大眾人民沒有代表參加政協，所以政協決議被破壞時，只見到國共間的互爭互証，而見不到大眾人民對破壞者之爭，或是大眾人民加於破壞

者的責備。政協會員三十八人，雖國共只有十五人，然而其餘二十三人多半是國共的附庸，而極少真能代表國共以外的力量。此為政協決議不能實現的最大原因。所以如果今後的和平仍須循政協之路，則政協的參加者，國共而外，須有大量可以代表非國共非附國亦不附共的中立份子」（見「唯和平可以統一論」）。強大獨立的中間派在解決當前時局中地位的重要，責任的重大，單看張錢二位先生上面的說明，也已經完全可以明瞭。假使我們認定政治糾紛必須用政治方法來解決，只有和平才能達到統一，實現民主，那就不能否認中間派在當前政治上的獨立地位和決定作用。

有人只承認中間派在政治上有一相對獨立的地位，只能做「人民的傳力機與作業機」而不能做發動機，並根本否認它應有自己獨立的政治路線。我認為這種主張，其動機雖然要加強民主運動的力量，其結果恐怕是「適得其反」。

先從理論上來說明。第一，如果說任何黨派在實際政治中都不能「獨行其是」，都要跟其它黨派妥協，那就不止中間派，可以說任何黨派都只有一相對獨立的位置，沒有絕對獨立的位置。在這意義上說，假使國共兩黨都要保持其絕對獨立的位置，不肯跟對方妥協，那就根本不會有政治協商會議，也永遠不會回到政協路線。像這樣絕對獨立的位置，我以為不但中間派不應該有，就是國共兩黨也不應該有。第二，倘若其它黨派可以做人民的發動機，那中間派也可以而且應當做人民的發動機，不僅應當發動中間階層的人民來參加和平民主運動，而且應當發動一切可能發動的人民來參加和平民主運動。我絕對不相信：像中國這樣衆多複雜的人民，一架發動機便可以以把全部或大部份人民發動得起來。否認中間派

可以做發動機的结果，必然要削弱整個民主運動的力量。「許多一面憎惡右傾一面懼怕左傾的份份子」，只有中間派才能把他們發動起來，領導他們參加和平奮鬥的民主運動，而這樣的份子在今天中國決不在少數。第三，政協路線在本質上既非右翼路線，亦非左翼路線，而是一種中間性的改良路線，應為中間階層及中間派所特擁護。倘使這種路線不能為國共雙方所接受，那就不會再有為它們雙方所能接受的路線。希望「國共雙方放棄自己的路線，來接受或者遷就中間路線」，假使「近於空想」，那我們更可以說，希望它們任何一方接受對方的路線，更是空想的空想。同樣，在此時希望中間派和中間階層完全自願地來接受左翼或右翼路線，也同樣是一種空想。在「此時此地」的中國，否定「中間路線」決不可能加強整個民主運動的力量。

再就事實來說明。據儲安平先生的觀察，「國民黨的霸道作風，使自由思想份子深惡痛絕。……今日全中國人民，對於現政府就是「左傾」心，個個厭惡。……假如不滿政府就是「左傾」，那末老實說，在二十年來國民黨這種統治作風下，假如還不「左傾」，那這個人即使不是奴才，也是個大大的糊塗蟲。……今日國民黨腦子裏所想的是如何消滅共產黨，然而他兩隻手所做的却無一不是在培植共產黨，替共產黨製造有利於共產黨的政治形勢」。（見「中國的政局」）照這樣說來，共產黨應該可以取而代之的了，然而不能，據儲先生說，「因為大家怕共產黨」。今日絕大多數的人，既不滿意國，也未必歡迎共。絕大多數的人都希望國共之外能產生一種新的力量，以穩定今日中國的政局。儲先生的意見雖然未必全部正確，但他的意見，至少代表今日「絕大部份的知識份子」（「自由思想份子」）

的意見。我們對於這種具有代表性的意見，不能不給它以相當的重視。無論如何，這里總指出一件事實：就是今日「絕大部份的知識份子」，儘管對於「國民黨的霸道作風」表示「深惡痛絕」，也決不可能追隨左翼黨派的政治路線。這一部分知識份子，在今天無論如何都不能不承認他們是一種進步的民主份子，在當前爭取和平民主的運動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也可能發生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將來和平恢復以後進行建設的時候）。此外，工商業界和農民中，也有同樣的情形。我們要認清：一切不滿現狀的比較落後的羣衆，都是我們從事和平民主運動的時候應當努力爭取的對象。我們的社會遺落後得很，在今天的現實條件之下，決不可能使多數羣衆突然飛躍地前進起來。

所以我們主張團結中間派，希望中間派在政治上保持獨立的地位，發揮決定的作用，並希望實現中間性的改良路線，不但有理論的根據，而且有事實的根據。在這里，我應當順便聲明幾點：第一，我雖然強調中間派在和平民主運動中的獨立地位和決定作用，但決不否認左翼的革命勢力在這一運動中的重要地位和推動作用，尤其不能不佩服他們二十年來的艱苦卓絕的奮鬥精神。第二，在爭取和平民主的工作中，我希望中間派跟左翼黨派能夠結成鞏固的民主陣線，協力制止右翼黨派的反動路線，但決不參加左翼黨派的軍事鬥爭，也不希望他們有超時代的過左的政策和行動。第三，我堅決地反對右翼黨派的反動路線，堅決地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堅持內戰的政策，但同時也很誠懇地希望國民黨內一切開明進步的民主份子自動地起來糾正黨的錯誤路線、錯誤政策和錯誤行動。第四，我雖然熱烈地希望實現中間性的改良路線，但也決不根本反對左翼黨派的革命路線；因為我認定，如果右翼黨派堅持它的反動路線，我們便沒有理由反對左翼黨派堅持它的革命路線。

內戰對於中間派最爲不利，如果長期繼續下去，可能使中間派歸於瓦解。但要制止內戰，尤其要在最短期內制止內戰，倘若若有強大獨立的中間派，便可能發生決定的作用。在和平恢復以後，推行民主政治的時候，中間派更是一個重要的力量。我們竟可以這樣說：假使今後沒有強大獨立的中間派，不但中國的民主政治無法實現，即使求政治的安定也不可得。兩個武裝政黨從事武裝鬥爭達二十年，要想從武裝鬥爭變成和平競爭，倘若沒有第三個調和的緩衝的中間力量，無論如何是不能想像的。但是中間派只應作有原則的調和，決不可作無原則的妥協。中間派調和國共衝突的基本原則，就是堅決站在人民的立場，根據多數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採用民主的方式來解決。中間派決不可拋棄人民的立場，對於國共紛爭作分贖式的調解。例如過去國共兩黨軍隊規定五與一的比例，就是一種不合理的分贖式的調解，將來應當加以糾正。總之，中間派只應當根據人民利益來調解黨派利益，決不可爲遷就黨派利益而犧牲人民利益。這樣，中間派才能督促國共兩黨逐漸走向和平民主的道路。

有人說，中間階層內容複雜，不可能形成一個強大獨立的中間派。我以為這種說法也是似是而非的。第一，今天國共兩黨所代表的階級也不是單純的；只要在和平民主的條件之下，中間階層形成強大獨立的中間派，其發展的可能性決不會少於國共兩黨。第二，一個國家內部包含着許多的階級和階層，但仍不妨礙它可能成爲一個強大獨立的國家。同樣，一個黨派內部包含着幾個利益相近的階層，也決不會妨礙它成爲一個強大獨立的黨派。倘使中間階層內部的利益尙且不能調和，如何還能調和全體人民或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倘使這種理由能够成立，如何還能實行包含着各階級各黨派的聯合政府？

張東蓀先生說：「民主主義的社會必是一個異質的結合，必須各個異質共存而互讓，隨時代

的要求各有所遷就，互有伸縮，卒致調和，以無虧於統一」。見「和平何以會死了」，如今國共兩黨不肯「互讓」，不肯「遷就」，不肯「伸縮」，以致不能「調和」，不能「統一」。目前只有加強獨立的中間力量，迫使它們不能不「互讓」，不能不「各有所遷就」，互有伸縮，才能獲致「調和」，達到「統一」，建立「民主主義



刻維納 議抗的高最是默沉

的社會」。但是先決問題，必須聯合一切民主的力量，動員一切反對內戰的人民，迫使國民黨當局不能放棄「武力統一」的政策，不能不改變政府的基礎和性質。內戰一天不停止，政府的基礎和性質一天不改變，獨立的中間派決不應一天改變反對的態度。只有這樣，中間派才會強大起來，才能擔任「中國運所降下的神聖使命」。

從民主政治的條件說到來日和談

程 程

共產國際解散以還，蘇聯以外各國的共產黨才正式調換了活動方式，由武力革命轉變為和平競爭，寧願在民主憲法的軌道以內過問政治。這後一種的活動方式，由一個正統的馬克斯主義者看來，本是不科學的，視為「客廳社會主義」(Drawing-room Socialism)或「小布爾喬亞社會主義」所揭舉的策略，現在却是共產黨忠實奉行的了；在西歐民主國度裏，牠或是與其他黨派攜手合組了聯合政府，或則站在反對黨地位，假手議會來監視政府。把共產黨逼上梁山，以鎗桿來懲報政府的，祇限於特別落後特別不成才的幾個國家。我們中國不幸而為其中之一。

就以五強之一來比照五強之一吧，法國的共黨便與社會黨人民共和黨合組了政府，協作得很像樣子。若干人因此歸咎中共，說它不若法共之就範，說它特別懷有篡奪政權的野心；可是人們也可反轉來責問政府，你又何嘗具有法國社會黨與人民共和黨的雅量和氣度？你不是明明地死死地霸住腐化的政權，不肯稍許放鬆嗎？要追究法國不會發生內戰的原因，我們可以歸功於法國的民主傳統。人民的選舉票決定了議會中的議席，議會又來決定國政。政府便依議會中各黨力量的強弱(即席數之多少)而組織起來，可能是一黨執政，別黨督政；也可能是一黨控制不了國會，便出現了多黨混合的政府。至於軍隊和文官，都不是黨派所得私有，作為黨爭的工具的。於是人人得了一個結論：中國的毛病出在獨裁政治，出在軍隊黨有。政治之道，便有兩大口號：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

政治協商會議便是在這兩大口號的吹唱之下而召開，並作成五項協議的。然而政協空開一場，內戰打了起來。內戰之所以打得起來，仍然由於軍隊之黨有。可是平心靜氣來說，共黨今日之有軍隊，却是中國一不幸中之大幸，「却是一種必要的缺陷」(Necessary evil)，乃至一種「缺陷美」。我們這樣說法，實在不存絲毫戀棧內戰的意思，我祇是要點明人看透了的一個事實：共黨有力量，由於其軍隊；輕輕易易放棄了軍隊，牠便無由生存；共黨不存，則現政府的獨裁腐敗更要橫行無忌，而「民主」二字也永遠編不進中國人民的字典中去。

軍隊黨有，乃是政治不能民主的結果，因而內戰才打得起來。可是民主政治不能呼之即來。民主政治須有民主政治的條件。

近代的民主政治，歸根結蒂，都靠運用政黨這種組織。人民通過了政黨，才把握得住政府，用來推行國政。政黨是有社會性的，此黨之異於彼黨，由於各個政黨代表不同的社會階層。各個代表不同社會階層的政黨，

所以還能獲致容忍(Tolerance)，互相尊重，互相退讓，最後得到妥協(Compromise)，却又得力於一個前提，是即各階層雖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見，却在幾個舉世大端的基本國策上扯得攏去，能够訂立幾項共守的信條，視為「立國精神」之所寄，大家信守不渝。這些舉世大端的基本國策便是整個社會所由建立的基礎，各階層各政黨一齊懸為鵠的，求其實現。在實現的方法上，牠們容或意見參差，但是那僅是「大同」中的「小異」，只要大家懷着互相尊重互相退讓的態度，無有不能覓致「妥協」的。如果一個國家在處理政事方面達到了這種境界，她實際上便已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一個「大同」社會了。在一個具有階級差異的社會裏，而欲推行民主政治，這一種起碼程度的「大同」是不可或缺的，否則各階層各黨派的協作便失其依據，而要無所適從。拉斯基教授就把這類民主國家中的共守信條稱為「根本目標」(Fundamental objects)。

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有自由黨和保守黨輪番執政，替英國打穩了兩黨制的基礎，蔚成民主政治的燦爛傳統。如其名稱所示，自由黨大體是一輩信奉自由主義者的結合，代表社會間新興的中產階級；保守黨則是較為偏向貴族地主利益的，更富於維持現狀的色彩。但是當時的英國正處於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時期，整個社會的欣欣向榮替各階層舖上一條康莊大道，大家正可齊頭並進，無所用其傾軋磨擦。舉凡一切改革，只要不妨礙現狀的安定，貴族地主毋須堅決反對；政治或經濟上的措施，雖常是迂緩的，可是但求帶有與革的意味，自由黨也就忍受了。當時兩黨的「根本目標」實不外乎(一)私產制的維護，(二)自由經濟(國際和國內的)的發展。因此，拉斯基便認為，就嚴格的意義而言，那實在不能稱為兩個政黨，而僅是一黨的兩翼。其次我們又看一今日之英國。自由黨早在政壇上喪失舊日的光輝；工黨與保守黨在主張上確有極大的距離，但是工黨年來對內推行的國營政策，並非把一些重要的「生產工具」無抵償的「充公」，而是有代價的「收買」，對外只在慢慢順應普遍的民族主義潮流，而不為大英帝國作急遽的清算(即邱吉爾所謂「Liquidation」)。這雖仍為保守黨所不喜，究還是它能將就「容忍」的。準此而論，傳統的兩黨制仍然活在英國的國會裏，其「根本目標」是：(一)溫和的社會改革，(二)不完全忘掉英國對弱小民族的「責任」。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黨派協作斷非無條件的，首先需要擬訂「共同目標」，這可以是成文的，也可以是默許的；次之，「共同目標」之中

必須容許「和平變更」(Peaceful Change)，否則左翼政黨必不甘休。

掉頭再看我們的國共同問題吧。這兩個「打」得早已「相識」的政黨若合作的，最後還得依仗一紙「和平建國綱領」。張東蓀先生會說，政協關於五項決議，「只除了和平建國綱領以外，其他每項都留有些『未完』作尾巴。於是政協決議遂變為一個本身有漏洞的東西，因此便有做曲解的可能性」。張先生「和平何以會死了」一文，見時與文第三期。其實細細推敲起來，「和平建設」應是各黨各派的「根本目標」，其他如「聯合政府」、「軍事問題」、「國民大會」及「憲法草案」等等，則可算達成目標的手段和保證。但在政協開會之時，偏偏「目的」大家同意，而「手段」不能得出完滿的協議。再看「和平建國綱領」的內容，對國民黨來說，那都是高調，對共產黨來說，都是不能再低的低調。惟其共產黨唱的是低調，我們相信，至少在當時，它是有信守的誠意的。至于國民黨呢，它又一次以革命姿態說上一串門面話，而其實際措措却背道而馳。國民黨這樣玩忽「目的」，一味「耍弄」手段，可見政協之「夢」，確是它「預先」暗中安排「起來，送給」居心太厚「的人的。居心忠厚的人，由此得一教訓：今後不再舉行和談則已，否則決不可把容易得着協議的視為無足輕重。須知說慣了門面話的人，牠的一搖頭雖然是真的，牠的一點頭却未必也是真的。

張東蓀先生認為國民黨的現政府是古代式的「絕對政權」，這話說得着實痛快，已把國民黨的面目摸清了。我們還不妨再透視一下它的骨子。大家都知道，從北伐到現在，國民黨的本質不斷依着一條直線在起變化，在打倒北洋軍閥的時期，它還唱過「扶助農工」的口號，後來却扭轉身子優容了土劣，自己也學會軍閥的作風。起先它也嚷着排除帝國主義，稍後它却製造起買辦來。經過這多年的抗戰，官僚資本是特別發達了，加以一般中產階級的沒落，今日國民黨所代表的社會階級乃是極少數的權貴和極少數的巨富。以這樣一個階級來單獨推行「憲政」，我們可以預想，那些在「選舉」裏跳進跳出的，必然盡是官僚和地主，此外無他。孔宋雖然垮台，千萬不要誤會這是象徵官僚資本的挫敗，官僚資本先天就有一套遁隱法和煙幕術，且在經濟戰鬥上（其實即是在經濟壓榨上），無論陣地戰或游擊戰，化整為零或化零為整，無不熟習精通。總之國民黨十餘年來所走的道路，是愈來愈狹隘，因此在社會利益的衝突上，馴至處處與全國平民結為讎敵。這一種尾大不掉的局面，進一步又使國民黨對世間一切的看法、作法和作風統統僵化起來，只知一直綫的朝着壞路上走，所謂「黨政革新」云云，適足說明為一套駝鳥的想法。須知除非外界帶來刺激，它是無法「轉變」的了。我們可以說，今日國民黨所以要竭力維護它的「絕對政權」，就因為它骨子裏想要維護絕對財權。

國民黨一日不放棄絕對財權，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標」便一日不能成立，而政協的「和平建國綱領」也自始至終成爲一張廢紙。同樣的，共產黨倘對停戰議和促成民主果有誠意，它也就應該痛痛快快放棄武力革命的方法，準備將來在民主憲法的常軌下，從事溫和的社會經濟的變革。必如此，國民黨的建國高調和共產黨的建國低調才能拍而和諧，進而獲致容忍，互相尊重退讓，最後得到妥協。必如此，中國始能在和平中得到進步，在變革中得到安定。

然而無情莫過於現實，內戰打得此什麼都兇。比照作戰兩方的實力，我們敢說互見優劣，旗鼓相當。人民担負不了長期內戰的重壓，是不消說的。要以內戰拖垮國民黨，從而消除「絕對政權」和官僚資本，這由我們窮極苦透的人民看來，乃是一種奢侈。我們暫時既然無法希冀國民黨自求革新，那末，除了留意國際局勢的演變之外，祇能期待國內其他方面人士的努力，使有助於和平的恢復與民主的建立。

中間階層的「政治路線」，成爲時下熱烈討論的一個題目，是一點也不古怪的。停止內戰，是中間階層迫切的需要；回往政協，亦是中間階層所夢寐以求的。中間階層停戰和呼籲，此刻雖然不爲掌握「中國之命運」的人物所重視，可是到了內戰打得雙方精疲力竭的時際，仍將發生重大的作用。再往後看，共產黨所提出的和談兩條件畢竟只能算作和談的基礎，而和談的本體則還是前文所說的「根本目標」以及達成這些目標所必要的保證。試想國共猜忌若是之深，沒有一個中間人從事拉攏，兩方意見南轅北轍，又怎麼碰得了頭？總之，世間決無不和之戰，不是屈敵而和，便是妥協而和；在屈敵而和的局面下，勝方的意志貫徹到底，別人無話可說，但在妥協而和之情況下，中間階層却大有一番事業可做。要創立民主政治，擬訂「共同目標」，中間階層首先就在先天上佔了優勢，不是它去遷就左右兩方，而是左右各改調門，使「高調」和「低調」一拍而和諧，走中庸之途，來順從它的主張。目前國共兩黨磨拳擦掌，糾打一團，中間派人士插足不進，祇怕中了一「流彈」；可是到了和平時期，大家又做起君子來，動口不動手，那末，這仲裁人的首席真是要一虛位以待「中間派」的！所幸中間派對此也的確力能勝任，因它少的是手，多的恰好是口。所以在當前這漆黑時期，中間黨派（真正的而不是冒牌的）沉寂下來，固屬勢所必至，情有可原，但是絕對不能因此氣餒，小視它未來的神聖使命，而目前這時機，也就應該力事團結，擴大基礎，加強準備工作。法國社會黨儘管在抗德時期少有貢獻，此刻在制憲會議中的席數也遠落左方共產黨和右方人民共和黨之後，可是三黨聯合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却遵循着社會黨的「中間路線」，而國務的重任也就落在社會黨的肩上。這是值得我們體會

內戰財政的幻術

甘祠森

試論美金債券發行的意義與前途

(一)

十七世紀的柯爾貝(Colbert)會爲路易十四的揮霍無度，國庫支絀，竟至憂憤而亡。現在中國正進行着一種更浪費的事業，而現代的柯爾貝主義者(Colbertist)(註)，他們知道濫用政治的權力創造統治的資本一如往古，兩世紀以來的經濟制度並授給他們一些廉價的江湖幻術；因此，他們胸懷寬大，一個下台了，悠游林泉以抒失意的孤憤；一個上台了，賣弄玄虛以展得意的雄才。總之，此時此地，大約是可以不必就心有所謂孤臣孽子一憂憤以終一底事情發生的。

(二)

中國的內戰財政，到了需要使「一點紙成金」的幻術的時際。照年初所傳，本年度的預算歲出爲九萬四千億元，歲入爲七萬餘億，不敷二萬餘億。歲出入預算的差額，將因物價上漲與緊急需要增加而不斷放長，按照往年比例，歲出預算擴增三倍乃至四倍當爲意料中事。

問題不在於決算數字及其新赤

字的龐大，那本屬「意料中事」；問題乃在於如何措集緊急需要，以講求印鈔機的「經濟」。因爲「未來九月是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而現在正踏上了這個緊急的開端。九個月的緊急開支與九個月經濟暫時穩定的要求似乎是一個不可解的矛盾。這矛盾必須尋找解決的途徑。

於是便想起了以延期債務(Delayed Liabilities)措集緊急需要的方法。

這本來是一個陳腐不堪，而效率却十分優良的方法。但是這個方面的實踐必須具有兩個前提：相當的國民儲蓄與健全的政府債信。

(三)

如果中國財政具備着這樣的條件，似乎不必等到今天纔來使用這個方法。事實上，這個方法業已使用而且業已失敗過了。爲什麼今天還要來舊事重提呢？

這便是「幻術」。

美金庫券三億元，其發行特徵如次：
1. 以法幣折合中央銀行掛牌美匯價發售與還本付息。

2. 期限三年，利息二分。自發行日起每六個月付息一次並還本六分之一。

3. 以國營生產事業及接收敵偽產業爲擔保。

4. 基金監理委員會，邀請全國商聯，銀聯，錢聯等人民團體代表參加。

這些特徵至少包含有兩個意義：

第一，庫券利率之高，還本付息期限之短，與乎以美金爲號召，均可見內戰財政需款的一「情急」。

第二，似乎政府也明知本身債信的薄弱，除了指定確實的擔保品而外，組織基金監理委員會，還邀請了人民團體的代表來參加。

(四)

十年炮火耗盡了所有的國民儲蓄，透支了未來的國民所得，並且這個負擔還將留給我們的子孫後代。但是十年炮火也打出了一個「既得利益集團」。

這個「既得利益集團」，便是所謂美金庫券發行的理論根據。借用這個集團以法幣形式存在的資本（照一般說法便是所謂「遊

資」），而應內戰財政緊急的需要，是這次發行美金短期庫券的基本企圖。

遞延債務使用的前提，決定於政府債信與國民儲蓄之有無。由於上面的說明，對於後者，已勿庸懷疑它的存在，不過這種儲蓄資本已轉換爲變動不居的投機資本罷了。對於前者，則是目前政府必須竭力爭取的。政府舊債價格在這次新債發行消息透露後一致高揚，便是這種投機心理的表現。

(五)

用遞延債務的方法憑空創造的這筆財政收入，只是一種信用的創造。庫券票面的「美金」二字，僅不過作爲一種計算的單位，很有點像那些一本正經的「經濟學者」所提倡的「物價指數存款」的性質，這便是我們所說的「幻術」。

中國的戰時財政，無論在對外或對內戰爭的時期，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區別。增稅，徵糧，或增發紙幣，都得由全國人民，尤其是貧苦人民來負擔。

美金短期庫券只是法幣版式的換新，在「遞延」的意義上，也許

可以緩和一時財政與經濟的危機；而債務的清償，仍須增加發行，全國人民所承受的負擔，與直接增發紙幣並無分別，不過時間略有先後或緩急而已。

這是假定以出售這項庫券的收入用於內戰而言，因為大砲的煙火並不能創造新的財富。但是誰能否認這項收入不是用於戰爭呢？

(六)

據說國人美金存款可藉者有三億美元，政府出售黃金約五百餘萬兩（以政府向美採購數字售幣計算），約合美金二億元。而政府發行以外幣或黃金購買的美金公債只是一億元。

這件事實說明了兩種情況：

1. 政府需要外匯頭寸的殷切。
2. 雖然政府加強了進口管制，禁止了黃金外幣的買賣，而政府對於收回民間外匯頭寸與存款並無自信。更不要說一般大吹大擂的所謂強制借用人民在外國的存款了。

(七)

四億美金債券發行的結果，可能會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第一，認為此次美金債券發行於經濟緊急措施實行之後，商業淡月開始之前，市場遊資充斥，利息低落，認購必極踴躍。即使人民對於政府疑慮未除，信心未堅，但加

上對於主持者「人」的幻覺，人民心理必大異於前，故無大礙。此屬於樂觀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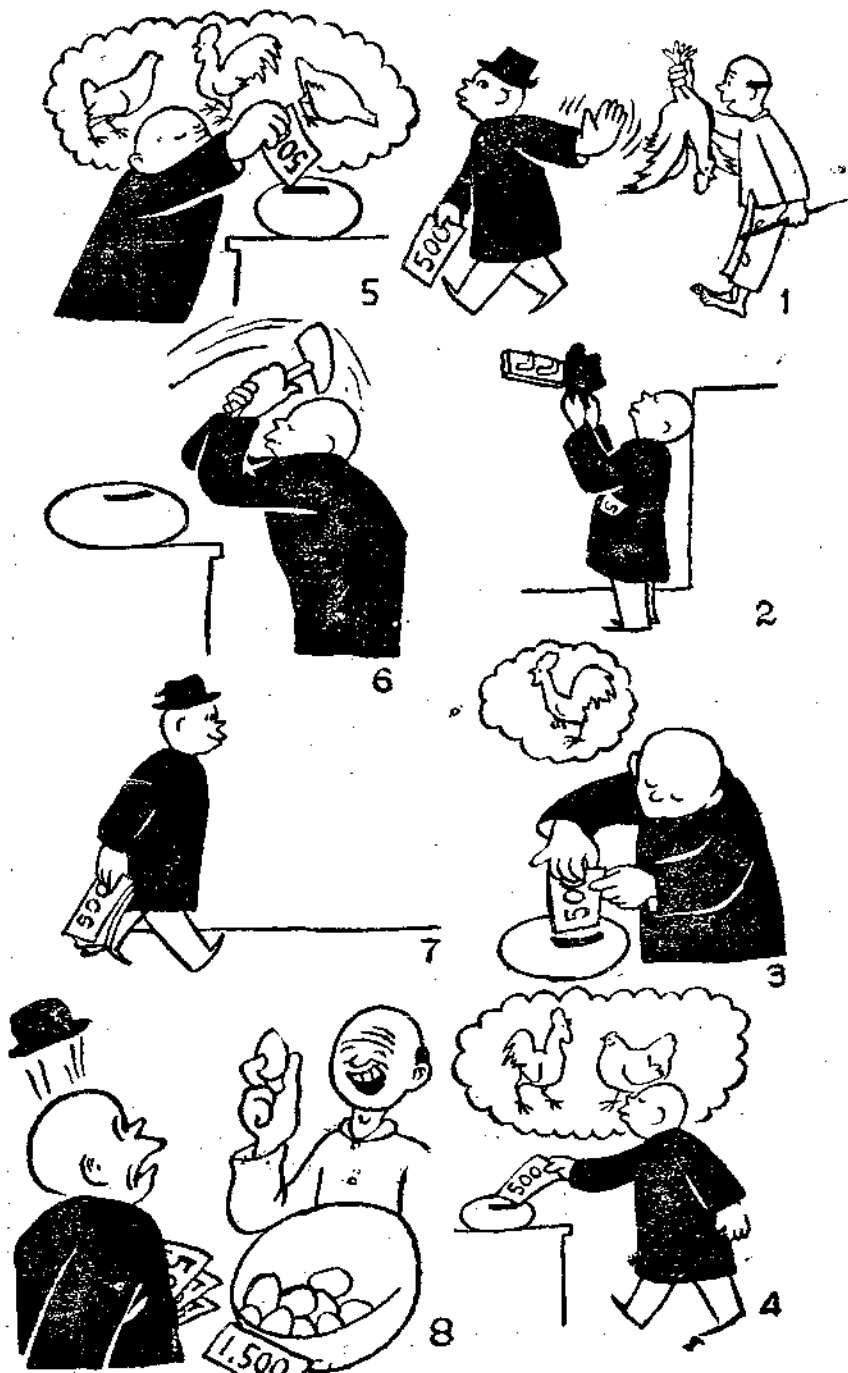
第二，認為黃金捐獻四賍之創痛猶新，到期美金儲蓄與公債券不能支付外匯之事依然未了，即使市場一時遊資充斥，亦必係另待良機，對於政府的號召未必發生興趣。而時局未靖，海外僑胞亦未必對投資國內發生興趣。且兩種債券折合國幣約值四萬八千億元，遠在國內

人民消化能力之上，故發行前途殊難樂觀。此屬於悲觀派。

無論發行的多寡，這項債券投入市場必為增加一項新的投機籌碼；投機市場對於國幣價值的抑揚又將表現於此項債券價格的波瀾之上，則可斷言。其及於物價的影響，我們看不出與金鈔市場存在時有何區別。發行成功後的最大收穫，當不過稍稍延緩紙幣增發的速度。至今後中央銀行外匯牌價的釐定，所

應考慮之因素更多，即使能够更加保證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而與一般平民仍屬無關。因為這項凌空創造的財富是全國人民將來的負擔，而這項「財富」必將隨着炮火的青煙迅速消逝。

註：柯爾貝 (Colbert) 為厲行重商主義政策的法國首相，故世人對於重商主義又有柯爾貝主義 (Colbertism) 之稱。



米谷

雞變蛋 (儲蓄者) 的 (事故)

呼吸英雄的气

——紀念羅福斯總統逝世二週年——

陳石銘

一九〇三年頃，法國文豪羅曼羅蘭寫貝多芬傳，書的開首就說：「我們週圍的空氣多沉重。老大的歐羅巴在重濁與腐敗的氣氛中昏迷不醒……社會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空息以死，人類喘不過氣來——打開窗子罷！讓自由的空氣進來，呼吸一下英雄們的氣息。」

這裏就想借羅曼羅蘭的一句話，用來紀念美國故總統羅福斯先生的二週年忌辰。

無疑的，羅斯福總統是一個英雄。要估計英雄在歷史上所佔的地位，我們現代人，只要不是故意漠視科學的歷史發展的規律，當不致和卡萊爾(Carlyle)一樣，給予他們以過度的重視，致貽歪曲歷史之譏。但是我們並不就此抹殺羅福斯在歷史上所佔的重要地位。作為中國人，我們尤不能不以感動的心情，在這悲傷的一天，來紀念這一位英雄，並且看看他以及他的死給予這世界的影響，是何等重大。

我們這個時代的第一個特徵，就是人民的覺醒。這時徵是重要的，一切觀念或意識，莫不受其影響而引起新的變化，「英雄」一語，也不例外。歷史家房龍(Van Loon)先生寫了一本「人類的故事」，當提及拿破崙的時候，他說：「我現在坐在一張桌子面前，桌上堆滿了書籍，嘴裏告訴你們拿破崙的為人怎樣不足取，但是我若抬頭一望，假使說看見窗外大街之

上，車馬忽然停止，耳邊一片鼓響，短小精幹的拿破崙穿着破舊藍色軍衣，騎着白馬而來，那我就不能自主了，恐怕我也要拋了我的書籍，離開我的家庭，遺棄一切東西，跟着他就跑，隨他領我到什麼地方都可以，我的祖父就是這樣跟着他跑了的。」

人類癡懷往日，對於一切歷史陳跡，每懷一種浪漫詩克情緒，在中國人，就是所謂「發思古之幽情」。房龍先生的文章是出色的，把那位「英雄」拿破崙襯托得很美，但是也祇能在筆下如此云云而已。實在說來，二十世紀的今日，我們活着的現實世界，而絕對不能出現拿破崙式的人，而我們還稱之為「英雄」的。要不然，希特勒就是英雄，墨索里尼也是英雄，但他們不是，他們是暴徒，暴徒。我說「暴徒」，並不含有譴責的意義，只不過是拿破崙時代「英雄」的同義語罷了。準此而論，邱吉爾先生也算得半個暴徒，英國人民充分認識他們的暴徒式的「英雄」，所以戰爭一結束，就請了他下台，而拿破崙却於東征西討之後，終做成了皇帝。我們與其想跟拿破崙跑，不如想一想英國人為何不跟邱吉爾跑，歷史前後不同如此，值得吾人深思。因此我們知道，所謂「英雄」，在人類的意識中，已有了新的含蘊。

二十世紀的英雄，必定是人民的英雄，即是那些以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為本位，而終生奮鬥不息的人。羅斯福總統就是這樣一位英雄。他一方面承繼了自華盛頓、林肯、傑斐遜、威爾遜以來他的祖國的民主傳統，一方面體認了世界潮流。他是資產階級的逆子，保守勢力的叛徒。十多年金元王國的總統，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他的豐功偉績，對於美國人民，全世界人民的莫大供獻，彰彰在目。我們中國人，當更不會忘記在那萬分艱辛的歲月裏，他的友情的手，是怎樣給予了我們以勇氣和信心。中美兩大國家的友誼，是在那個時候才生根在人民心裏。我們穿的衣服叫「羅斯福布」，這是一個光輝而親暱的名字。一切不像現在，現在的中美友誼變了質，是已經很顯然的了。我們深深惋惜，惋惜一個英雄的偉大業績，是怎樣被他的後來者輕輕毀棄。

羅斯福總統的死，是當代歷史上的一個重大關鍵。英國哲人羅素先生在他的「自由與組織」一書中，論述十九世紀歷史的動因，以為除了經濟技術、政治理論、重要人物三者而外，偶然的機緣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他說：「所謂機緣，便是各種具有重大影響的細小事變」。因此他把十九世紀的歷史事件，提出許多奇怪的推論。例如：「工業主義由於近代科學

近代科學由於加利略，加利略由於哥白尼，哥白尼由於文藝復興，文藝復興由於君士坦丁堡之陷落，君士坦丁堡之陷落由於土耳其人之移植，土耳其人之移植由於中亞細亞之乾旱。是故探索歷史因果的基本工作，還得從水路學着手。

和這相類似的，是有些西方歷史家，認為一八一二年拿破崙的攻俄失敗，乃由於他在保羅既諾戰役之前數日患了傷風的緣故。（見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

這些說法雖然近乎荒誕不經，但是假如我們以極審慎的態度來考察一下這所謂「機緣」問題，那末不可否認，羅斯福的死，誠然是一個「具有重大影響的細小事變」。他死在德國投降前二十天，日本投降前四個月，舊金山會議前十三天。我們假想，倘他早死兩年，則英美或已中途妥協，請參看他兒子所寫的「見聞錄」，不難窺見其中消息。因為是他，才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無條件投降」，而且堅持到底。又倘他晚死數年，則當前的世界，定有另番氣象，決不同於今日者。因為是他，才首先喊出了「四大自由」，擊斃了聯合國組織，為世界和平繪出了美麗遠景。

但是他死了，死得那樣突然，好像歷史栽了筋斗，全人類都摔了一跤。我們的英雄啊，死神帶給這世界的損失，真大得可怕。

從此反動的逆流高漲，到今天，「四大自由」早被扔進了毛坑；佛朗哥之流的納粹殘餘，倒成了時代的寵兒，並且新的佛朗哥還不斷出現；聯合國組織又將蹈「國聯」覆轍，變成野心家的傀儡劇場了；而在美國，羅斯福的伙伴一個個跟着下台，一九四六年國會改選，民主黨遭到十餘年來的第一次慘敗。「清算羅斯福新政」，成為美國內政的口號，金元與原子彈，則代替了基於國際民主合作原則的和平外交。「在世界各處兜售民主，自命為最民主的國家，而在它的國會中，「新政」是個罪名。」（三月十七日大公報美國通信）。這是對於我們英雄的無比的侮辱，同時也諷刺了那虛偽的所謂「西方的民主」。

世人常是這樣：英雄們倒下了，於是把他供上神龕，給他建一座雕像，送他上博物館，完了，英雄上了天，一切盡於此，讚美詩剛剛唱完，他們又拾起屠刀來搗毀英雄們的業績了。這樣的悲劇有的是：廿餘年前的孫中山，兩年前的羅斯福！而中國人民受難了，而世界人民受難了，這是何等可悲的歷史。

然而我們並不絕望。我們說過，人民的覺醒，是這個時代的第一特徵

。美國人民雖然喪失了他們的偉大導師，一時顯得軟弱無力，任逆流沉淪，不可遏止；但是「石在，火種不會滅的」。只要他們覺醒，總有一天他們就會行動。一九四六年民主黨的失敗，並不就表示美國人民忘記了羅斯福。事實是：羅斯福以他崇高的理想及其雄才大略，獲得了自由主義者和美國工人的支持，因此並支持了民主黨。拉斯基教授說得好：「自由思想的美國人支持民主黨，僅因為羅斯福總統以特質給了民主黨。羅斯福能使民主黨人作為勝利的代價，而接受不是由黨內提出的政策，使他的黨暫時保有真實的選擇性」（H. J. 拉斯基：美國政黨的破產）。羅斯福一死，他所賦予民主黨的「特質」隨即失去。我們知道：美國的兩大黨，同是保守勢力的代言人。「民主」「共和」，原是一丘之貉。以美國資本主義的極度成熟，階級分化之極端尖銳，而至今還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代表勞工的政黨，未免可怪。說到這裏，假如不犯穿鑿附會之謬，我們願取近五十年來英國政黨的興衰史實作一借鏡。我們以為：當前的美國兩大黨，其情形正和第一次大戰後英國的保守自由兩黨相似，一九四六年民主黨的失敗，也正相當於三十年代自由黨的沒落。雖然在目前，美國民主份子仍將竭力利用民主黨，以便到一九四八年的大選時，迫使其接受重新恢復羅斯福傳統的責任，但拉斯基教授已預言「他們必將失敗」。因此想使羅斯福傳統復活，只有屬望於美國第三大黨的興起。這雖尚渺茫，但決非虛幻。美國進步人士，近年所作的種種努力，已透露此中端倪。一九三三年，英人賈克遜寫一歐戰後十五年史一書，提及英國第一次工黨政



美國——新戰爭之濼源者

所亞作

哲學是甚麼？

哲學家應該做甚麼？

張東蓀講

——四月五日在北京大學講演

我是學哲學的，今天要把自己所專學的同大家談談。我的題目是「哲學是甚麼，哲學家應該做甚麼」。我希望第二句話是別人不會說過的。哲學是一種苦澀乾燥的學問，但它雖然苦澀乾燥，却與人生關係密切，也是與我們很接近的學問。今天在座的諸位雖不都是學哲學的，也許對哲學發生興趣。哲學是西方的文化，在中國學術中找不出那一種學問是與它完全相同的。文化是一個整體，就像人體一樣，頭部手足都互相配合；至于馬的軀體，配合就與人不同。西方人的文化也是一個整體，哲學是整體中的一部；在中國，也有過「哲學」這個名稱，譬如貴校校長胡適之先生和馮友蘭先生都寫過「中國哲學史」。從這名稱上看，中國似乎也有哲學，但其實這是很勉強的，我們看這裏面所談的問題與西方人所談的問題並不相同。西方的哲學是在兩個事物的矛盾中產生的，一個是宗教，一個是科學。西方人的思想，自近世科學興起後，與宗教思想發生衝突，這時候才有哲學來起作用。我這樣說，一定會有人駁我，說：那麼希臘就沒有哲學了嗎？但並不然，希臘的哲學倒像中國的哲學，內容無所不包，並且別無哲學以外之物，所以希臘雖有偉大思想，仍非近世的哲學。近世哲學是科學，宗教，歷史以外的哲學；近世哲學之興起，全由於科學之興起。科學自古有天文地理物理等，至十六

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科學勃興，有大科學家如伽利略，牛頓。科學產生後，就有了宇宙觀，對物質有了一個看法，遂與中世紀耶教聖經上的說法起了大衝突，西洋文化本身因此有了矛盾，整個文化變得不調和，於是而有了思想上的煩悶，影響到生活上也有了煩悶，於是產生了思想家，即近世哲學家。哲學家在他們的思想系統中增加了新的素質，對新興的科學潮流加以吸收，而不是迎頭痛擊。同時對於過去一直賴宗教以維持的社會秩序與道德觀念加以種種解釋，西洋文化因而起了劇大變化。

我是學哲學的，在抗戰前感到極大苦悶，時要問學哲學究竟有甚麼用？有一次我同金岳霖先生談，我就說我們對現世界沒有一些用處，完全是浪費時間；眼看日本人就要侵略進來，現在最急迫需要的是應當教青年人如何去抵抗，為甚麼還要研究紙片上的東西？九一八以後，我就主張改訂學校課程，把有關抗戰的學問拿來學，不關抗戰的放在後面。我也要問學哲學的人究竟有甚麼供獻，但是並無一人認為我的話值得考慮。抗戰八年中學校課程一點沒有變動，便是明證。我自己仍然一直在懷疑哲學家的供獻。現在，世界上人類相爭益烈，越來越不成樣子了。近來我讀到美國某學會的論集，這本書有五寸厚，是一九四四年出版的，討論的是 App each To World

府時，有謂：「當大戰時，若有人示意，謂英國將為工黨所統治，則人必加以訕笑。英國向為紳士 Gentlemen 所統治，兩黨更迭之制，其合乎自然也，殆如四時之運行。吉爾貝特 Gilbert 有詩為證：

「惟士與女，生斯世兮；

自由保守，黨籍必有所麗兮；

自幼已然，何況壯歲兮。」（據商務中譯本）

一九〇〇年，英國議會中僅有兩工黨議員。一九二三年第一次工黨政府時，也僅有工黨議員一九一人。而現在，工黨議員竟多至四百位（英國國會議員共六四〇人）。觀古鑑今，我們對於美國工黨的興起，確具信心。第二次大戰後，英國社會主義的工黨政府之出現，與第一次大戰後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之出現，正是兩件劃時代的大事，而未來美國工黨的興起，將是同樣第三件劃時代的大事。

拉斯基教授會感慨系之地說：「羅斯福時代已經結束了，而且，套一句 T. S. 伊里奧特的名言：『不是在一聲鼓樂聲中結束，而是在一片嗚咽聲中結束的。』」自然，從黑暗到黎明，不免還有一段長遠的距離。期待和焦慮，也不免混着痛苦。對於我們，這同時代的智識份子，尤其有難堪的抑鬱。羅曼羅蘭寫他在為苦難所炙灼不安的時候，就求助於貝多芬的音樂。「在多霧的萊茵河畔，在那潮濕而灰色的四月天，浸淫着他的苦難，他的勇氣，他的歡樂，於是從貝多芬那裏，獲得了新生。

不幸，我們這也是一個「潮濕而灰色的四月天」。英雄羅斯福，就死在兩年前的這個月。從他死了以後，世界就彷彿翻了個身。它的污濁，黑暗、卑鄙、殘酷，今天正以加倍的力量在煎熬着我們。當此黎明來臨之前，打開窗子罷，且讓我們呼吸一下英雄的氣息！

編者按：羅斯福總統逝世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到今天恰為兩周年。

Peace, 裏面講宗教、科學、哲學應如何去供獻和平。可見現在大家的感觸都是相同的。我覺得我們所學的學問如果與人類幸福無關，則其價值都是可疑的。我這樣說，並不是淺薄得不講理論的價值，我是研究知識論的，讀康德(Kant)最多，後來改從社會學去研究知識論，興趣漸漸轉到社會研究上去，而不再專講形而上的奧妙的那一套，於是就變為社會學與知識論的合併，把文化發達與社會學配合起來看。我的這種轉變，一般人很少知道，總還根據我以前寫的書來研究我。知識社會學現在已成爲一種學問，但還幼稚，在歐洲致力於此的也沒有幾個人，最早的人當推卡爾·馬克斯(Karl Marx)，他很開闢了一個新的方面。我們可以從知識社會學來看哲學是甚麼。我在一本書上曾經寫過了，現在只簡單說一說。人是有知識的生物，知識沒有無用的知識，可分爲三大系統：第一是常識系統，主要是爲了便利，比較專門的我不談了。第二是科學系統，建築在可測量的數量(Quantity)及物的關係上。第三是形而上學的系統，我這裏談的是知識，而不談盲目信仰；形而上學並不要求像科學那樣的分析，而是直接問到最後的本體，宋儒所謂「明心見道」，便是說他可以見到本體了，其實從知識社會學看來，那叫做自己騙自己！玄學所用的方法是 insight，多是神祕的，所用的邏輯也非普通邏輯，譬如黑格爾(Hegel)的邏輯便不是普通邏輯。現在專講第三個系統。它是與社會思想宗教思想同在一個圈子之內的。自古以來，一直存在着一個問題：許多好人死了，壞人却亂翻亂跳的活着，壞人富，好人却窮，於是就有了一個問題：人爲甚麼要做好人呢？好人分明得不到好處，爲甚麼不做壞人去發財呢？所以爲了維持住使人去做好人，就有了一「靈魂不死」的說法，說

好人來世可以上天堂。此中并不能說它有真理或沒有真理，因爲它只是起了一定的社會作用(Social Function)。人到了不得已時，便會信上帝的。我和我的同事十一個人被日本憲兵捕入獄中，在獄中我自己曾經自殺過四次，——我不但懂得哲學的祕密，還懂得自殺的祕密哩！那一次我們先被送到這兒的紅樓，(「就是這兒」，張先生指着身背後的方向，十分感觸地說；他是在北樓講演的)，後來又送到陸軍監獄，十一個人關在一間房裏，十個人都做禱告，我知道其中就有從不做禱告的基督徒。我曾經寫過宋儒，宋儒是講理學的，宋受外族壓迫，讀書人多談政治，像我們一樣的。但是你們知道，中國自古以來的皇帝都是混賬東西；不止古來的皇帝，現在的職權最高的也都不是東西！那些士人想抵抗功名利祿妻子等等，你想如何抵抗得了？所以他們只好提倡氣，講究養氣，梗着頸頸說，你殺就殺好了。所以從社會觀點看，有了文化的需要，就會有理論，理學便是這樣的東西。如果一定要去問這是不是真理，那就麻煩了。真理是相對的，上帝並不像熱水瓶一樣，可以拿出來印證。理論的產生是基於文化要求，社會要求，時代一變，要求一變，真理也就跟着變了，以前的真理便不再是現在的真理。我對於莊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相對論」並不同意。他這是一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如果公婆都有理，豈不沒有是非了？相對不能是 Relativist，而應該是 Relativism，就是說在這一環境中是有效的，在另一個環境中就沒有效了。理論是不能實驗的，科學才是能實驗的。我們可以根據這個來看哲學是甚麼與科學家應當做甚麼。近世西洋科學家都是夾在宗教與科學的矛盾中間的，大體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要調和這個矛盾，維持社會秩序使不破裂，可名爲維持派；一類則完全站在破壞一面，對舊的宗教、社會、道德一體推翻，這在希臘已有，那些「詭辯家」(Sophists)就因持無神論

而與世俗相反，可名爲革命派。所以文化本身起了裂痕時，總是新的想要壓倒舊的，如果做不到則要設法彌縫，生活才能相安，精神上和知識上才能得到安慰。新哲學都是應運而生。如果有一個人跳出圈子去說我憑空創造了一個新東西，那是絕對的不可能。所以我說哲學家應當做甚麼，而不是說他們已經做成了甚麼。現階段中國文化是否需要這樣的人呢？想做哲學家的人又應當怎麼做呢？我認爲：世界第二次大戰後，全人類，包括中國在內，必定要走向一個新方向，否則結局必極慘慘。中國有句古語說：「窮則變，變則通」，中國現在已走到窮途，文化也走到了窮途，世界也走到窮途了；再這樣下去，世界就沒有新力量了。身上挖掉一塊肉，可以再生，叫做新生，如果生不出來就是沒有了新力量。如果沒有了新力量則將是世界的末日。所以今天如果有哲學，必定不是傳統哲學，現在不是僅僅唸一點古典就能行的，時代要逼迫着走向新的方向去。在兩類哲學家中間，我們需要那一類呢？我們必須要看清文化趨勢，如果看不清了，那麼德國和義大利也會有過哲學，那是御用的哲學，這樣的哲學家是笑話，笑話，笑話。現在我們要說：哲學家所依據的創造工具，第一是時代潮流的要求，第二是他本人可以看到時代的進步。這不是汽車坐坐，飛機飛飛就可以來得的。近世的大哲學家都是做甚麼呢？他們並不一定和現實有太多接觸，但實際却是領導着現實。所以哲學家應該做的是：文化到了不能不變時，就要出來做思想領導。這需要冷靜的研究，不是應酬應酬，吃吃酒席，開開會就能創造出來的。在中國已經窮了的時候，這樣的人是需要的，學哲學的人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希望北大哲學系能產生哲學家來領導思想，大家不要只去鑽中西典籍，而是要產生新的哲學家。完了。(辛揚火筆記，本文未經講演者寓目，如有錯誤，當由記者負責)



在文學的四大部

門(詩、戲劇、小說、散文)中，小說的出現可算最晚。因為它來得晚，它的性質，直到現在，還沒有

確定，它的可能性也似乎正在無窮盡地發展下去。但這只是就形式和寫作的技巧方面來說，若論它的內容，則仍不外兩種：「光」和「熱」。小說跟其他藝術一樣，其對象總不脫人生。一本小說中涉及批評(包括解釋)人生的部分，便是它的「光」；涉及表現人生的部分，便是它的「熱」。

「光」和「熱」是任何小說中必不可少的兩個因素，只有「光」而無「熱」，或只有「熱」而無「光」的小說，大抵不會有，所爭只在分量上的多寡。可是，歷來讀小說的人總只注意「熱」的部分，彷彿講故事(最好是熱鬧的)是小說家唯一的任務。爲了加強這些人對於小說中「光」的部分的認識，我們無妨把小說嚴格地分作「光」的和「熱」的兩種來研究；自然，我們所著重的只是前者。

所謂「光」的小說，便是批評成分多過於表現成分的小說。這種小說的作者，目的多半不在於講故事，而在於利用故事做外衣，來包裹他們哲學的軀殼。他們所講的故事，有時乾脆就是寓言，並非人間世所能當真發生的事實。這種小說大約可分下列三派：

(一)諷刺派 這派的始祖，據孤陋所知，是希臘人盧先(Lucian A. D. 125—200)。這人是個大諷刺家，天生

一副機警靈活的頭腦，又握着一枝輕靈

如意的妙筆，消除愚昧和揭破虛偽是他全力貫注的事業。他的著作不少，重要的有「靠得住的故事」(A true Story)、「神的對話」(The Dialogues of the Gods)、和「鬼的對話」(The Dialogues of the Dead)三種。「靠得住

的故事」是一篇很靠不住的故事，作者在序言中交代得明白。他祇是借這來諷刺當時非常流行的一種漫遊奇境式的幻想小說，中間包括月宮遊記和太陽遊記等，荒誕不經，真可壓倒一切同類的作品。「神的對話」刻畫神的醜態以破除迷信，「鬼的對話」則借著死人來挖苦

知道的，不用介紹。

這派小說的好處是能指出時代一社會的病態，作者都是些眼光極銳利的人，學問既淵博，筆下又尖刻，凡是經過他們攻擊的東西，遲早總要消滅。但它們本身也有一個極大的弱點，便是消極。作爲難能「破邪」，却不能「顯正」，因爲自己根本無「正」可顯。他們所持以爲批評的根據的，祇是一些常識和籠統模糊的是非觀念。因此，他們儘管愛好真理，却拿不出真理來詔示別人。其實，他們並不相信世間有所謂真理。憎恨虛偽是他們惟一的德性，他們的好處在此，他們的能事也就止於此。

小說中的「光」與「熱」

林海

活人，這兩種尤爲活潑爽快。

這派小說家著名的有刺伯雷(Rabalais)，西萬提司(Cervantes)，福爾特爾(Voltaire)，和斯威夫特(Swift)。刺伯雷的「怪父子」(Gargantua and Pantagruel)，本意是用以諷刺中世紀的俠義故事的，結果却無所不攻擊，範圍之廣幾乎涉及當時的全部文化。福爾特爾的「第德」(Candide)敘述一對師弟的遭遇，以顯示十八世紀極流行的「皇天不負苦心人」的樂觀學說的無稽。西萬提司的「吉訶德先生傳」和斯威夫特的「格里佛遊記」，這些是人人

的態度，也可算得諷刺派小說中的傑作

(二)改革派 這派和諷刺派有個共同之點，便是都發源於不滿現狀。但諷刺派祇是把現狀攻擊一頓了事，這派却提出補救的辦法，在精神上更進一步的。這派的老祖宗該推柏拉圖，他那部「共和國」給後代的理想家不少的啓示。繼起的有譚爾(Sir Thomas More)、盧梭、雨果、和新近逝世的威爾斯(H. G. Wells)。譚爾的「烏托邦」是一部著名的暢談社會改革的小說；盧梭的「愛彌兒」則專就兒童教育方面來建議種種新的方案。雨果本是一個非常會講故事的人，他的名著「悲慘世界」更包含着許多血淚，照理應歸入「熱」

的小說裏去。然而，這書的故事雖然動人，却嫌太造作，人物更不似日常生活中裏找得到的。可見作者並無多大興趣來忠實地表現自己所見的人生，而是要借這些故事和人物去發揮他個人對於社會和政治的見解。事實上，這書便是小說和哲學的混合物，哲學的分量至少不會在小說的分量之下。威爾斯是這派小說最徹底的作家，他在早年也曾認真地寫過幾部像樣的小說，到了晚年，却專以這來作宣傳他個人政治哲學的工具。他的政治哲學始終脫不掉他那「一輩子唱不完」的「世界新秩序」的老調。他的作品實在祇是偽裝的政治論文，算不得小說。

這派小說的好處，前面已暗示過，是比較積極。但這種「積極」往往祇是基於空想，對於實際不會有什麼裨益。這些小說家雖然不滿現狀，却多半不肯用心去研究這現狀所以叫人不滿的真正原因，換句話說，他們對於社會病根並沒有確切的認識。於是，他們開出的方案，常常犯着不切實際的毛病。從這一點看來，這派小說實在還比不上諷刺派

爲了上述原因，諷刺派小說的地位並不太高；但也有例外，西萬提司的「吉訶德先生傳」便是一種。這部小說所以能成爲第一流作品，是由於它所諷刺的對象與普通的不同。普通被諷刺的大概都是些毫無價值的人物或事件，西萬提司筆下的吉訶德先生却不同，他是個理想主義者，有着救世的熱情，這一點無論如何值得欽佩。因此，作者雖然儘量取笑這人的頭腦，却無法不佩服他的精神。這書笑中有淚，與其說是一部笑劇，毋寧說是一部悲劇。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中的主人翁雖遠比不上吉訶德先生，作者對於他也一樣取的是同情

小說。讀過刺派小說，至少還可使你感覺痛快；讀過派小說，則恰似看一篇滿紙廢話的宣言，使你硬不下頭皮！世界上能有耐心讀完威爾斯晚年小說的人，大概不會太多的吧？我想。

(三) 清談派 這派小說家對於人生中的悲劇和喜劇都不大關心，對於社會問題更沒有熱情；他們有的是操腸塞肚的雜著和非常高明的說俏皮話的本領，於是寫起小說來，便自成一派。這派的始祖仍要推柏拉圖，他那幾十篇「對話」便是絕好的清談派小說。繼起的有伊拉斯莫斯(Erasmus)、斯騰(Laurence Sterne)、裴各京(Thomas Lave Peacock)、以及近人陶格拉拉斯(Norman Douglas)、赫齊黎(Aldous Huxley)等。伊拉斯莫斯的「會話集」(Colloquies)是十六世紀智識階級的寫真，從這些對話裏面，我們可看出那時代讀書人的生活、興趣、和思想習慣。斯騰的「托立斯登姆·桑代的生活與意見」(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是一部奇書，作者拿小說的形式做外殼，把他腦子裏所有的東西都倒進去。裴各京、陶格拉拉斯、和赫齊黎他們的小說是一個模型裏倒出來的，故事照例是這樣：幾個活得不耐煩的稀奇古怪的人，聚集在一個海島或鄉下別墅裏過着悠閒的生活，絕大部分的時間是消耗在談話上面。於是，作者借這機會把渾身無處安插的聰明和學問都運用出來。

場，祇落得「曲高和寡」(Caviare to The General)，豈不冤枉？還有，這派作家照例是不肯相信什麼的，他們雖然喜歡搬弄思想，但思想對於他們就是一種玩具，並不是解決問題的利器。這種態度尤其使壓在生活重擔之下求解放的人厭惡。總而言之，這派小說家是十足的有閒階級的代表人物，他們的作品，不論有刺無刺，都是貨真價實的閒文學。

「光」的小說的性質可以從上述三派的作品裏看得清楚。這種小說的作者所欲表現的，不是人生，而是對於人生的見解，他們作品中的人物都只是代他們發言的傀儡。嚴格地說起來，這種小說算不得真正的小說，因為小說的真正作用是紀錄人生中血淋淋的事實，不是發議論，講哲學。所以，充其量這三派作品祇好算小說中的旁枝，充不得主幹。

真正的小說該是「熱」的小說，它的性質，上面已經暗示夠了，用不着明言。但有一點必須提及，這種小說跟「光」的小說有個絕大不同之點，便是後者可以不必求肖人生(Truth to life)，而前者則必須講究似真性(Verisimilitude)。「光」的小說中的情節和人物，有許多是很荒唐的，讀者並不以為怪，因為他們知道這兒所著重的是思想，不是人生。「熱」的小說與此相反，凡是人生中所沒有或不可能的事件和人物，它絕對要避免，否則會使讀者感到幻滅。

「熱」的小說很難分類，因為它的對象是整個人生，大得不可分割。但就

性質來說，想像的成分多的叫做浪漫派，報告的成分多的叫做寫實派。再從範圍來看，可以極廣，也可以極狹。極廣的如巴爾札克的「人曲」(La Comédie Humaine)，這一堆的小說要寫盡十九世紀初葉的全部法國社會；極狹的如笛福的「魯濱孫飄流記」，只寫一個人在荒島上所過的二十八年艱苦的生活。

純粹「熱」的小說，世間不抵沒有，勉強舉出代表來，我想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和愛米利·白侖特的「咆哮山莊」還可充數。這兩部小說，前者描寫青年期的戀愛狂，後者刻畫原始式的復仇心理，都可算得「熱」極了。但其中還不能說沒有意義，意義也就是「光」。從前的小說是「光」和「熱」雜在一起，作者一面講故事，一面却忙著把它的意義指出。這種現身說法的方式，如今已不流行，大多數的作家是把意義放在故事後面，讓讀者自己去領略。這樣的小說，寫得好的，便成傑作。例如紅樓夢，表面述的是一個貴族家庭的盛衰情形，背後却蘊藏着一部人事無常的哲學。又如安諾德·班乃特(Arnold Bennett)的「老太婆的故事」(The Old wives' tale)，表面講的是一對姊妹自幼至死的截然不同的生活史，裏頭的意義却等於蘇東坡的兩句律詩：「等是浮休無得喪，粗分憂樂有閒忙。」說到這裏，「光」和「熱」的含義及作用總可以明白了，「光」是小說中的意義，「熱」是小說中的事實。「光」是靈魂，「熱」是生命。沒有事實，根本不成其為小說；沒有意義，這小說也只等於行尸走肉的優子或瘋子。所以

這兩個確實好比「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

這兒，我得更進一步，去規定一本小說中必須具有的事實和意義。本來寫小說是各人的自由，用不着干涉；然而此時此地却不容我們太注重個人的自由。我們反對專門掉書袋或說俏皮話的清談派小說，便是因為它離開現實太遠。在這火燒眉毛的時代裏面，每個有作為的人都應負起救火的責任，如何可以浪費時間精力去作這不急之務？同樣的，我們也不贊成只能破壞不能建設的諷刺派小說，和迂闊不切實際的改革派小說，因為這些究竟也無補於實際，作者縱有熱情，這熱情是結不出果實來的。我們所渴望的是一部既不離現實又能予人以希望的小說。這樣的小說的作者必須跳到大眾裏去，跟他們一起生活，懂得他們苦難的來由，然後給他們指出一條解放的途徑。所以，這樣的小說中的「熱」，必須是水深火熱的「熱」，必須是被壓迫者身上的血、淚、汗蒸發出來的「熱」；它的「光」，必須是歷史的「光」，必須是人類奮鬥途中從不會滅熄過的「光」。

不久以前，看到現代英國女作家樂莎蒙·雷曼(Rosalind Lehmann)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做「小說的將來」(The Future of The novel)作者在篇末反覆叮嚀地說着下面的話：一個小說家必須能愛人類，他的偉大與否全看這一點；假使一本小說裏沒有一個可愛的人，不管這小說寫得如何俏皮活潑，也免不了是渺小的、枯冷的。這些話自然說得不錯，但僅僅能「愛」是不夠的，愛之外還須能給所愛的指出一條生路，否則這「愛」很容易變為假慈悲的人道主義，十九世紀的偉大小說家便是十有九人犯着這種毛病的。

無錫兩日游

潘子農

三月十八日劇作者

看「麗人行」。

聯誼會席上，因為探討

從去年三月東歸上

劇作的新形式問題，大

海以來，我的心緒一直

家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其

是昏昏沉沉了無生意，

時正由演劇九隊在無錫

幾乎連遊遊馬路都缺少

上演的，田壽昌兄的新

與緻，如此情境，自己

作「麗人行」。這個劇

也覺得應該改變一下纔

本的原稿，我和于伶兄

好。去無錫看戲，當然

同是「捷目」的先觀者

是一種有力的誘惑，何

，當初對於壽昌兄這種

况十里梁溪，風景不殊

一分分場，少用幕」，

，雖說三月江南，依然

甚至採用了近似電影織

春寒凜冽，也未始不可

輯法的大胆嘗試，不免

於瀏覽自然景色之中，

蹣跚於我們目前舞台上

會以後，我便在晚餐時

鮮活潑，而多少有點「

和于伶兄約定翌日動身

難得弄好」之感。可是

。偏巧壽昌兄於聽取朋

此番一聽已經參觀了九

友們的觀感後，從善如

隊演出的朋友們的觀感

流，想到劇中有幾處必

，差不多全是十分滿意

須於演出中略加修改，

，且認為正是今後我們

所以他也願意陪伴我們

劇作走向新形式的一條

同行，再去無錫走一趟

道路。一百開不如一見

。

，就在這個動機下，

十九日上午，于伶

于伶兄約我同到無錫去

兄以電話通知我，準搭

走的。

忽忽添票上車，已

是座無隙地。幸而承路

局裏一位先生的關照，

我們四個人居然都在餐

車裏找到了一難安之位

（因為倘有人來進餐

，必須讓座）。對於夏

先生，不久以前我曾一

度見面而頗訝其貌似迅

翁，但正式和他交談，

還是初次。這位以文藝

理論批評著稱的生物學

家，外貌沉靜，却甚健

談，談吐又是那麼條理

分明，熱情橫溢，真可

謂「剝繭抽絲」，「斬

釘鐵錐」，兩者兼而有

之。所以三個多鐘頭的

旅程，我們大半是忽略

了車窗外飛逝的田野風

光，一直在「無所不談

」地談着，談着。

我們也會涉及目前

因「女人與和平」一劇

而引起的論爭，大體上

，意見都是一致的。壽

昌兄認為由批評引起論

爭，祇要雙方態度誠懇

，總是一種進步的好現

象。問題是這回的論爭

文字，牽涉意氣的份量

未免過多，倘又聽憑兩

方面如此任性發展下去

，那是相當可慮的。語

重心長，自是仁厚長者

的看法，大家均有同感

。

自從「慘勝」後我

們的話劇運動陷入所謂

「低潮」迄今，羣情惶

惑，各方面提出的意見

已經很多，可惜病理的

診斷多過於生理的挽救

，大家似乎太缺少「赤

膊上陣」，打硬仗，打

苦仗的精神。再說對於

藝術和營業不能兼顧的

那種兩元論看法，我始

終不敢認同。就拿「女

人與和平」來說吧，據

我所接觸的十多位觀衆

，包括家庭婦女，店員

和學生在內，凡是劇中

過份「噁頭」，或近於

色情而在藝術上應受批

判之處，他們也一樣地

不喜愛，不滿意，甚至

有表示憤怒的。由此可

知爲了顧及營業來維持

劇團的生存，以致不得

不輕貶藝術這一面的說

法，還是值得考慮的！

退一萬步講：就算「噁

頭」和色情真爲劇場召

來一批「偏愛此道」的

觀衆，但這樣的觀衆，

又豈是我們真正的觀衆

？豈是對於我們劇運低

潮有所援手的觀衆？

孝子爲侍親而行竊

，慈母爲育子而賣淫，

這在人情上自然是值得

同情的，但這樣的辦法

畢竟是非正常的。我們

贊成行孝施慈，可是辦

法必須知所選擇，有所

不爲，更萬萬不能因爲

要在理論上「自圓其說

」，而強調這種當初也

許未必有意如此做的辦

法！

天氣雖好，到無錫

已近落日之際。我們先

去無錫大戲院後台探望

九隊的朋友們，他們的

日戲尚未終場，大家都

在忙着。壽昌兄把須要

改動的幾點分別指示了

各演員，便到前邊公園

裏去喝茶坐憩，遇見徐筱汀兄，知道他們的夏聲劇團全體將於當夜抵錫，繼「麗人行」後在此劇院公演。壽昌兄和筱汀兄是初識，筱汀兄則久已欽敬壽昌兄熱心改革平劇的建樹，相見恨晚，兩人就此長談起來。未幾，先一日來錫看戲的葉以羣，陳鯉庭兩兄，也暢游太湖而歸，就由九隊和夏聲聯合作東，邀我們這羣上海來客去迎賓樓晚餐，飽吃魚蝦，大快朵頤，祇是全整本地作風，菜味過甜一點。

餐後，便去看「麗人行」，以羣和鯉庭則已看過此劇，逛夜市去了。進劇場第一樁使我驚異的是全場已告客滿，據九隊呂復兄告訴我，公演逾十餘日，平均每場售座總在八成以上，觀眾的成份，以學生，工人，公教人員為主，店員和家庭婦女亦佔相當數量。即此可知

道這個並不賣弄「噱頭」而樸實純真的劇本，確是為老百姓所樂見喜聞的了；「即於現實，即於人民」，到底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啊！

這個戲在演出上最初使我們就心「難得弄好」的，第一當然是分場和用景過多。我們也知道風格化的裝置設計是可以相當減少換景技術上的困難的，可是要在二十一場戲裏轉換十三個不同的佈景，即使儘可能地加快換景的速度，至少在觀眾欣賞的情緒方面，必然會感覺到情節的發展被割裂得太多了。

第二，壽昌兄寫這個劇本，是採用了近於寫意畫師的「潑墨」筆觸，粗枝大葉，簡潔樸素，它是有深度的，但並不刻意雕鑿，它是生動的，但並無絢爛的色彩。這樣的劇作必須要求演員用適度洗鍊的演技來表達，纔能與其作風合拍；否則或流於繁瑣的細膩，或流於浮淺的簡略，過尤不及之間，很難把握個準繩的。

可是九隊的朋友們終於用最大的智慧和毅力，百分之八十以上地克服了這些難題。關於第一點，風格化的裝置設計雖然有些線條不夠統一，色彩不夠和諧，但「以最簡單的線條來表現一個典型的環境」這個原則，確是做到了的。換景工作的敏捷，縮短了場與場之間割裂的感覺，而賢明的導演又在這裏施展了技巧的處理手法，他在每次換景的時候插入一段夾敘夾評的幕外報告，拱雲托月，自是神來之筆。不過問題也還有一點，那就是過多的報告，有時難免要使觀眾的情緒游離戲外。所以嚴格而論，這也祇能算是補救目前我們舞台設備之貧困的一種方法而已。

關於第二點，我認為為九隊的演員們雖如洪深兄所說「能剛不能柔」，「能粗不能細」，但他們這種不有意取悅觀眾，不存心攻擊角色，樸實純真，洗盡鉛華的作風，不僅相當適合於「麗人行」這齣戲的要求，並且也是保持了我們三十年來話劇演技一脈優秀的傳統。也許由於我多年參與職業劇團，有點厭倦一般職業演技的傾向之故吧，我總覺得如果把「麗人行」這樣的劇作交給我們職業劇團來上演，演員們一定能把角色的性格動作描摹得更細膩週詳，但失諸繁瑣之弊，怕是難免的了。鯉庭兄會說九隊的演技彷彿「少了點什麼」，我想一定就是洪深兄指出的缺點？可是反過來講，也許正因為我們目前一般的職業演技是「多了點什麼」吧！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看了這次演出而更

儒術途窮

于永

自從統治者尊崇儒術作為穩固其政權的政策以來，孔子的遺言也就被閹割，被改頭換面，終至被扔到臭毛廁裏去，正如一切好的學說被統治者用來作為其「北平王麻子」的老店招牌一樣。趙普曰：「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如果統治者真的按照論語裏的話來「治國平天下」，其政權想必還可不至於二世而斬。譬如，大學的三綱八目，二十年來終算被提倡得不遺餘力了，可是誠意修身的話頭，何嘗被做到一點半點？這且不說。論語上有這麼一句：「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這句話就被衰衰諸公糟塌得不成樣子。台灣的事情，凡是稍微有點良心的報紙雜誌都有過多少少公允的評述和記載，而偏偏「當局者迷」，硬不肯反求諸己，什麼「陰謀」「搗亂」之辭，好像騙小孩子一樣的，企圖掩耳盜鈴。

論語上還有下面一句：「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據說，這是五帝三王的心傳。然而，以繼承五帝三王的道統自任的人們，又偏偏不會繼承了這一個心傳。這在歷來以天下為家的帝王之中，倒還至少有一下假惺惺之態的——九斤老太曰：「一代不如一代」，豈其然乎？

比如說，舊唐書德宗本紀里就有這麼一通罪己詔：

小子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致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味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甲籍馬，人用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

急於想提出來尋求解答的。很久以前，我就感覺到我們的演員對於距離自己的生活愈遠的角色，多半能够把握要點，唯獨對於生活十分接近的文化人之類的角色，却往往不能演得恰到好處。此番一麗人行一中飾演劉大哥，孟南，新羣，玉良等角的幾位演員，都嫌不够莊重沉着，外形也不够典型化。是否因爲忽略了體驗過程呢，還是因爲生活距離太近，反而不容易觀察清楚？這倒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全劇中演得最好的一組戲是屬於工人友生和金妹母女這一家。不過飾友生的演員在雙目失明後始終蒙上一塊紗布，以致掩沒面部表情，實無異解除了演技主要的武器。這一點，大大地損害了這個角色的成就。

戲看完後，呂復兄要我們到後台去和大家談談，我就把上述的觀感說了出來。九隊的朋友們均異常虛心，表示接受，並有幾位提出自己的意見，熱烈討論，



刻樺李 暖取

直到深夜一時許，始歸旅舍就寢。看戲的目的既達，剩下來此行「任務」，便是游山玩景了。徐筱汀兄遇見我們的時候，便約好次日同去龍頭渚。不料二十日一早醒來，天色陰黯，顯然有風雨欲來之兆，等到洗盥畢事，窗外已在飄着雨絲了。我和于伶兄意興索然，計議着如果不回上海，便須作一個在旅舍中消磨整日的打算。可是壽昌兄却豪興倍

增，認爲風雨中游覽景色，別有一番風趣，堅持非去不可。看他那樣難於搖撼的精神，我苦笑着對夏先生說：「我們今天祇好聽天由命了！」

十時許，徐筱汀，郭建英兩兄和夏聲的其餘幾位同事來了。原來他們是帶着全體學生同去的，所以已經向警察局商借了一艘名爲「砲艦」的小汽艇，來拖曳另一隻俗稱「無錫快」的木船。承他們盛

求，我民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井，邑里丘墟，人烟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固然，這不是德宗的親筆，然而這樣的痛罵自己，實也虧他！今之秘書先生們有這種風骨來做代筆麼？

某種風骨是有的，學者如傅斯年之流便是。他曾經一連發表了三篇文章，把宋子文罵得個體無完膚，而贏得國將的彩聲，連合衆社記者都替他發了一則電訊。按之帝王時代，真可謂之風骨峻峭，敢言的孤忠大臣了。然而，他忘記了資治通鑑之所以作。堂堂一個歷史研究所所長，而昧於中國歷史家的家法，真也虧他這麼賣力。中國歷史家的家法，是「直筆」，是「筆則筆，削則削」，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都按照他們的功過善惡，照直筆錄；而通鑑之作，據說就是要將歷代帝王家世之興亡原因，記錄出來，給後來的帝王們照出自己的嘴臉，而知道「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樣庶使一姓一朝得以萬世。傅斯年這位「歷史家」呢？做的却正是孟子所口誅筆伐的「逢君之惡」，他要清算豪門資本，他兢兢於被揭垮之慮，他却忘掉了孔子回答齊景公的話，曰：「君不君，臣不臣，……」。傅斯年是一個中國的名學者，而他所言所行，却違背了中國式的爲臣之道。嗚呼！

其實，說他昧於歷史家家法，還是尊重他的學者頭銜；說他是孤忠大臣，還是我們的怨道。倘按照他的生平行事來說，他這一手三斧頭，正是奴才臉相的適地表現。一方面，他表現了楊太真縱經奴亂棋局的二丑藝術，另一方面，是他和別一種門作山崩鐘應，他之所以博得一些人的彩聲，就靠着他的學者，社會賢達的虎皮，使人們眼

幾天，在無錫看了劇宣九隊演出田漢先生的「麗人行」。劇宣九隊是在抗戰初年的熱潮中所誕生的，抗戰期間，曾經在許多戰區和後方作過演劇宣傳工作。幾年來一直沒有機會看見「劇宣隊」之類的團體的演出，這次，看到了「九隊」的戲，使我又想起了許多抗戰初年的舊事。

那時，我也是曾經參加過「戰地服務團」之類的團體的。而且也和許多類似的團體有過往來，使我永遠難忘的，是參加這種團體的青年們的那種不知艱苦的忘我精神；有些孩子才十三四歲，就從淪陷了的家鄉逃出來，參加在這些團體中。這些團體，是他們的工作場，同時也就是他們的家，他們的學校。他們的身體和精神都是在團體中成長起來的，學習和工作真正地打成一片，只有在這些團體裏才見得到。可惜的是這種象徵着中國的新生的團體的生命太短促了！兩三年後，抗戰的熱潮一過，這些團體就被人看做「危險」的存在，而陸續地消滅在種種的明槍暗箭之下——有些青年們，甚至因此喪失了生命和自由！

一種可貴的精華

能像「劇宣九隊」那樣存在到今日，而且又保持着自身的健康的，差不多是千不得已了！因此，今天能夠看見「九隊」的演出，實在深感到倍可珍惜！就在這個戲的演出裏，也可以看出他們的那種從抗戰時期保留下來的可貴的精華。「麗人行」是一個二十一場，十三景的戲，雖說用的是最素樸的風格化的裝置，可是，如果照一般話劇舞臺的慣例，恐怕換景的時間也得費去二小時以上，而事實上，他們全劇的演出却一共只三個半鐘頭。每一景的變換都只費一分鐘左右，也許大家會以為這是一個設備很完善的舞臺；可是，事實上都只是一個臨時用木板拼搭起來的台，所謂「後台」只是一個用竹席搭起來的棚子。我在看戲時也覺得奇怪，

爲什麼在這樣粗劣的台上，能以那樣的速度換景呢？後來問了他們，才知道換景時差不多每一個隊員都參加了工作，一塊景片，一件道具，都預先分配好了掌管的人，一閉立刻全體動員，一分鐘還不夠擺妥一件東西嗎？這種集體精神就是他們克服困難的祕訣。他們沒有專職的舞臺工人，但是，必要時每一個隊員都可以做舞臺工人。也同樣的，他們沒有專業的劇作家，導演，但每一位隊員在需要時都可以做劇作者，做導演。他們沒有指定的導師，但是，也可以說每一個人都是導師，也都是學生。集體學習，集體研究，就是他們生活的法則。

有一天晚上，前台正在演戲，我們幾個從上海去的朋友坐在化裝棚外的院子裏閒談，一位女隊員突然從化裝間裏走出來，問我們當中的一位當導演的朋友說：「G先生，到底什麼叫做風格化？我找了很多辭典，都找不到這個辭兒。」我們這位導演朋友開始敘述他的解釋，於是旁的隊員們也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疑問和意見，你一言，他一語的，好像開始了一個學習的座談會。這時，我舉目四顧，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周圍已經站成了一個圈，他們都是偷空從化裝間走出來參加這場討論的。他們的智慧，藝術，就是這樣進步起來的。

因此，使我想起了：在抗戰的過程中，固然，成千成萬的生命遭了犧牲，不可勝計的事物受了破壞，可是，却也給青年們培養，鍛煉出了一些可貴的精華——堅韌不屈，忘我獻身，羣策羣力……像今日在「劇宣九隊」裏所見的就是一個例子。現在，抗戰是早已「勝利」了，可是，人民却還在更深的災難中，我覺得向上的知識青年們需要回顧一下，看看在過去了的戰爭中，到底犧牲了一些什麼，又獲得了些什麼？假如有一些可貴的精華收獲，那末，實在應該珍視它，承繼它，使它能對我們來日的生活有所作用。這種精華，不單可承繼在黨文團體中，更可繼承在每一個向上的文化工作者的血液裏！否則，過去所付那麼多不可計量的犧牲，不是白費得太慘了嗎？

花擦亂，看不出他虎皮裏面奴才的奴才的尾巴。現在，宋子文已經得到了其主子的硬撐腰，傅斯年倘真是牽衣折檻的忠臣，這正是他流芳百世的大好時機，否則以前那副整淚俱下的尊容，只有落得當時一部份觀眾說一句：這個花臉倒還不錯。

罪已詔原是騙騙人的玩意兒。典型的例子出在明莊烈愍皇帝身上。崇禎十六年，清兵到了山東，京師震動，烈皇帝素服御中左門，召百官戒諭數百言，深自引咎。次日下詔罪己，曰：

比者災害頻仍，干戈擾攘。輿思禍變，罪在朕躬。勿敢自寬，敬于宮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視事，動感文武諸司等官，有奏事者，赴宏政門報名候召。

有一個名熊開元者，居然應詔直言，結果是：「着錦衣衛拿問」。給事中姜琛疏言，也「命送錦衣衛打問」。這真是個很大的玩笑。言論自由，民主，是我說的，但是，你們，奴才們却真的自由民主起來，那是「必有主使」——崇禎諭金吾賂養性語——的了。這就是一切「孤家寡人」的纏夾道理。

這道罪己詔下了僅僅半年，崇禎就只得髮覆面，白袷藍袍，白袖褲，跣一足，自縊於煤山——即今之北平景山了。袖中書一行曰：「因失江山，無面目冠帶見祖宗於天上，不敢終於正寢」。然而，他終究是個昧於責己的昏君，他說：「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

鑑古可以知今，德宗一詔，唐未因而中興，崇禎一詔，明不旋踵而亡。歷史的必然，即使拿來搪塞人們耳目的區區「儒術」原也濟不了曆數之窮的。說到此，我們對於傅斯年之流的花臉戲，頓覺知著，倒可憐他的窮途之哭了。

三月二十八日

內政部特許登記證京警滬字第四一八號

上海駁運公司

油駁 鐵駁 木駁

經濟迅速
設備完善

為顧客承辦上海
本地一切駁運業務

歡迎賜顧

地點：上海四川中路125弄20號
電話：一三二二四

經濟部登記

「公正」「標準」 中國衡量公司

業務：

為輪船公司與客貨
間辦理過磅量尺等

地址上海四川中路125弄20號
電話一三五六五

宏豐企業公司

分公司漢口聯保里五號
重慶林森路一二七號

承辦進出口業務
總公司上海廣東路五十一號
電話一一四五三一五

行銀豐怡

經營商業一切業務

實業 扶助

社會 服務

總行重慶民生路二府衙二號

分行上海江西路四六七號
電話二〇二〇號

世界新文

現階段中國之

政治與教育

周谷城

武力解決抑和平變更

湯德明

徵借國外存款之商權

趙鳳喈

戰時的昆明勞工

陳達

日本政黨的新分合

林煥平

6

聞一多的一生

吳晗

羅曼羅蘭的道路

楊晦

叔孫通之流的業績

歐陽牧堂

願兩點快些灑下(詩兩首)

浩泓

塞上五日行

胡笛

漫畫

穆金·許志家



現階段中國之政治與教育

周谷城

(一)

現階段中國政治對於教育之惡劣影響，如教育黨化，講學沒有自由，教學用費受到統制，教育經費移作打仗之用，都是很顯明的證據；這是衆所周知的，我這裏不談。我所要談的是各級學校教育沒有達到應有的目的，換言之，即許多教育家所常常慨歎的，近數十年來的教育之完全失敗是也。政治情形如不能好轉，教育還要繼續失敗。可憐的教育工作人員還要繼續作一種失敗的工作！這並不是說教育工作者不能有成績；而是說他們辛辛苦苦創造出來的成績，將在惡劣的政治影響下，完全犧牲。

(二)

自五四運動以來，大學教育所着重之點，凡經過好多變化。五四時代，大家以爲要改造中國，須從思想改造起，於是特別注重文哲。不談文學哲學的人都知道易卜生、莫泊桑、杜威、羅素等的大名。後來風氣變了，由文哲一變而爲社會科學。談新經濟理論的，談社會進化史的，介紹社會科學之理論的，盛極一時。自北伐告成，國民黨一黨政府建立以後，風氣又爲之一變，教育行政當局以爲提倡社會科學太甚，會擾亂治安，於是各大學招收新生時側重理科。不過理科裏面的數理化等純粹科學，學生在這個不幸的時代學了，其無用竟等於文哲；畢業學生除在中學教課而外，不知道數理化究竟有什麼用場。抗戰軍興，大學特別着重土木工程或銀行會計等，頗重實用。最近當局又以爲實用科學固然要緊，而理論科學更不可少。數十年來，由文學哲學而社會科學，由社會科學而純粹理科，由純粹理科而實用科學，由實用科學而理論科學，變化未有已時。其變化無論出自教育工作者人員的主張，或教育行政當局的命令，都祇證明一個事實，即教育所培植的與社會所需要的，不相符合是也。

這個「不相符合」的原因，首先應歸於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國之創辦

大學教育，不是爲着社會事業發達，需要專門人材；而是爲着對外失敗，希望迎頭趕上。經濟先進國的高級教育，是社會事業的需要逼出來；所以人材一出校門，社會便拿去作用。我們創辦大學教育，是爲着對外打了敗仗，想用大學教育來作手段，迎頭趕上各先進國。當創辦大學教育之時，社會如一塊荒土，無所謂事業；農工商各業，依老方法，由農工商人分別經營，並沒有什麼不方便。所以專門人材一出校門，天然是有用處的。倘政治革命成功，廉潔有爲的民主政府早日建立，現代社會所有的新事業，在民主政治的環境中，一天一天的發達；那末初期失業的人材，終必有事可作，斷不致形成供過於求的現象。不幸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擺布之下，我們的政治始終沒有上軌道，政府不但不幫助社會事業之發達的，且至今還是阻礙社會事業之進行的！這樣，專門人材便注定了沒有出路。

出路雖然沒有，而活是不能不活下去的。於是受了大學教育的專門人材，其命運幾乎無一不是很慘的，或則完全閑散，坐食現成，成了家庭社會國家的廢人，成了生產者的一種毫無理由的負擔；或則用非所學，把自己在大學校裏學來的專長完全收起。偶爾找到一個吃飯的機會時，又來重新預備吃飯的本事。我常見有在外國學合作事業，回國在中學教英文的；有在外國學鍊鋼事業，回國在大學當總務長的；有在國立大學經濟系畢業，出來到中學教國文的；有在國立大學商科畢業，出來到政府裏辦等因奉此的。像這樣把專門人材完全錯用了，是何等慘的事情！而站在上層說漂亮話的人動輒說中國沒有人材！其實那裏是中國沒有人材？祇是專門人材沒有出路，沒有繼續在事業中受訓練的機會而已。

有些專門人材富有創造的本領，在這毀滅人材的社會裏，能於千辛萬苦中創造出像樣的生產事業來。這宜若可以稱爲幸運兒。然而不然。且問今日的工商業者，或所謂民族資產階級，所處境遇究竟如何，自己對事業前途有幾多把握。大家對此，無不搖頭歎氣。幸運云乎哉？剩下少數善於活動的專門人材，偶在政府方面謀得一官半職，其悽慘之狀仍不下於工商

界。自己學有專長，擠在政府裏作一些與自己的專長毫不相干的無謂工作，是一種痛苦。眼看着政府腐敗無能，紀律廢弛，自己想要在腐化的空氣之中維持自己的清高純潔，勢有所不能，更是一種痛苦。退一步，將自己的痛苦撇開不談，倘所作所為稍有裨益於國家社會，亦未始不是一種安慰。然而大家心裏又都雪亮，明知所作所為，對社會國家民族，幾乎都是有害而無益的。情形如此，有良心的專門人材，在政府裏，幾乎都成了最壞的好人，或最好的壞人。其悽慘可謂甚矣。

(三)

再看中等教育。現在中等教育之最大問題，厥為中學生之沒有出路。這情形於每年大學招考新生時，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投考大學的中學生，其人數平均總要超過大學所能容納的十五倍左右；意即十五個中學畢業生，祇有一個進入大學，一千五百個中學生，祇有一百個進入大學。情形如此，在大學方面，祇好提高入學考試的程度，或增加報考的限制，總期把超出容量十多倍的中學畢業生淘汰掉，或屏諸大學校門之外就得了。然而每個大學每年辦理入學考試所浪費的人力物力依然不少。在中學畢業生方面，也祇有硬着頭皮，於每年夏季，拚命去考。近幾年來，常聽說有因考而生病的，或因考而致死的！父兄爲着子弟的一筆投考費用，也常感着頭痛。至於考試時期之內，各種舞弊的情形，無論出自招生的大學校，或出自投考的中學生，其破壞教育界的風氣，或摧毀青年的品性，是不言而喻的。至於考大學而失敗的青年，流落在外，成爲無業遊民的，更不知凡幾。

中學畢業生之沒有出路，第一要歸咎於教育行政當局的沒有計畫。辦中學的，都是依據政府頒布的章程而辦理；每一個中學之設立，都經過政府的許可；每個中學畢業生的文憑，都是教育行政當局核發的。那麼，普通中學畢業生之升入大學，是一種權利，何至於要遭到大學的各種限制呢？政府要中學畢業生進大學，並規定普通中學以培植學生升入大學的能力爲目的；同時却又准許大學校把要升學的人屏之於學校外邊！這無論如何，是政府的錯誤，至少是政府沒有計畫。

政府於此，或有話說，以爲中等學校凡有普通，職業，師範等三種，普通中學畢業生，如覺沒有出路，應該進中級的農工商等職業學校，以便出而謀生；於今不此之圖，定由普通中學而擠入大學，其擠不進去，是咎由自取。不過我們要問：有資格受教育的，何以定要進普通中學，而不

肯進農工商等中級職業學校。這裏我們發見兩個原因：一則封建勢力的拘束，二則經濟落後的拘束。經濟落後，社會百般都是幾十年前的老樣子。除了消費一端，學會經濟先進國以外，所有農工商鑛交通運輸各業，均幼稚得可憐。稍有基礎的事業，又時時感受時局不寧，苛政煩擾的種種威脅。未有的事業不易興起，已有的事業不易維持。農工商等職業學校訓練出來的中等人材固然有用，而社會却依然無法消受。情形如此，做父兄的又誰肯打開眼睛，把子弟送到這等背時學校，準備出來失業？其次社會充滿封建殘餘勢力，人人腦子裏藏滿了封建思想；大家以爲讀書就是做讀書人，就是學好古文筆法，唸好論孟學庸，準備爲地方領袖或政府官吏；再不像樣，也得準備一種與土豪劣紳或貪官污吏混得來的本領，以便打入統治集團，或接近統治集團，庶幾在階級鬥爭激烈的社會中，可以有地位，可以保財產，可以壓迫人而不受人壓迫。若農工商等職業學校畢業之後，仍要以農工商等職業爲生，那與這種目的根本不合，誰還肯進職業學校？

或曰，中等師範學校不也是很好的嗎？爲什麼不進師範，就要擠到普通中學一途。不過我們應知：中等師範學校遠不如普通中學之多，而師範畢業生出來當小學教師，其生活既很清苦，其職業又常被社會或家庭所看不起；因之大家不想進師範。就是進了，畢了業，也時時想找一個機會，到大學裏混幾年。這麼一來，師範教育也幾乎成了大學的預備教育，甚至有許多師範生自始就埋怨學校爲何不設英文課程，害得他們不易投考大學！這樣看來，職業學校，因着封建勢力的拘束，因着經濟落後的拘束，根本沒有人想進。師範學校，固然因免費的原故，進的人較多，然學生因抵不住社會或家庭的輕視，抵不住封建勢力的打擊與引誘，一面做了師範生，同時做夢都在想進大學校。於是應做小學教師的青年，應學職業的青年，都成了普通中學生，都要進大學。「誰爲爲之，孰令致之？」政府徹底腐化，一面儘量培植殘餘封建勢力，認定貪污土劣足以砥柱社會中流；一面儘量打擊工商，使生產事業不能發達，使人人所看見的社會活動，祇是黨政軍的活動；使無數青年所希望的前途，祇在黨政軍的前途。像這樣子，要青年成爲受過中等教育的生產人材，其何可能？

(四)

至於小學教育之失敗，亦與中學教育及大學教育之失敗相當。幾十年來的小學教育，始終爲着下面的幾個原因，而沒有活氣。一則應該受小學教育的兒童，爲惡劣的經濟情形所限，不能進學校。例如農村中，因着土

地問題的沒有解決，財產關係的畸形發展，許多農民窮苦不堪。他們爲圖生存起見，祇好加重自己的工作，或延長工作的時間，或擴大附業的經營；自己勞力有限，乃驅使妻子同執勞役。於是農村婦女固然終日忙碌，農村兒童亦終日沒有休閒。農村小學雖然不取費用，或收費不多；然農村兒童却無暇進去。或進去了，然以農忙之故，又不能繼續不斷的讀書。再者小學教育雖然是絕對必要的，却不是即刻生利的。窮苦的農民見到小學教育之不能即刻生利，又因家中生計迫促，工作繁忙，壓根兒就不叫小孩上學。這是小學教育不振的一個原因。

其次封建思想的拘束，使進小學者之目的，與辦小學者之目的，根本相違。中產以上的農家子弟，是可以進小學的。但他們的目的，不在獲得起碼的生活必需之知識及技能；而在進中學，升大學，以造成封建紳士的資格。送子弟入學的，眼看地方紳士之聲勢顯赫，惟恐自家子弟不成紳士。又見大學生之飛黃騰達，唯恐自家子弟不能成爲一個道地的大學生。於是小學遍鄉里，儼然一種好現象；而學生却幾乎都是要離開農村生活的後備軍。他們或以爲讀完六年小學，便可以不再生產，而混入豪紳集團，出入鄉鎮公所，往來縣長衙門；或以爲讀完六年小學，便可以透過中學，考進大學，做頂天立地的偉人。總之，爲着做一個農民而進小學，或讀完小學而仍做一個農民的人，農村社會中便認爲是沒有出息的人，便認爲是倒霉的人。設小學者的用意，本在使鄉村小孩成爲更有用的農民；而進小學者的用意，却時時想拋却農民生活。無怪乎鄉下老頭，常長太息曰：大家都讀書，那個來種田！原來進小學的，就是預備不種田的；要種田的，根本就忽視小學。數十年來，政府祇喊要普及小學教育，而農民並不知小學校是作什麼用的！封建思想深入人心，人人都想與貪污土劣打成一片。提倡小學教育，幾乎是多事，有什麼成績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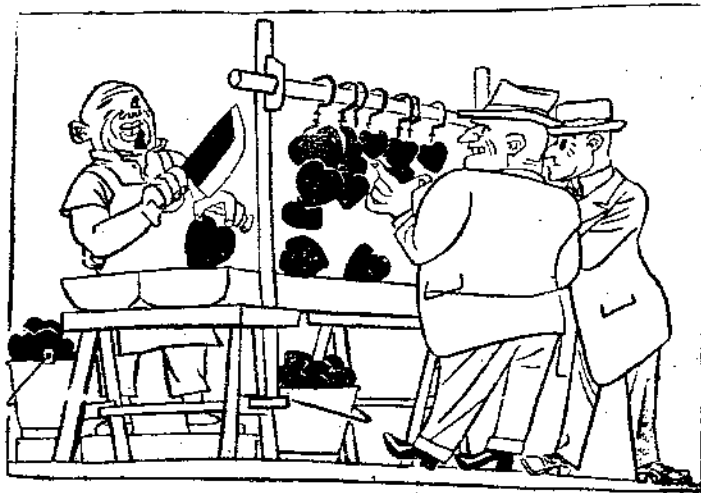
再其次，整個農村經濟崩潰，教育經費無處籌措，更成了小學教育的致命打擊。現在農村小學籌措經費，困難萬分。或剝撥地方的廟產，而主管廟產的人却以爲敬神重於教人，偏偏有方法遁逃，叫人無從剝起。或剝撥祠產祭產，而主管祠產祭產的人以爲祭祀先祖重於教育子孫，也偏偏有方法遁逃，叫人無從剝起。或直接向農民攤派，而農民對攤派二字，聽了就痛恨。軍稅的強徵，鄉鎮公所經常費用的強取，以及其他臨時加在頭上

的「強迫樂捐」，他們受够了。而辦小學又要向他們攤派，他們有子弟上學的，往往揚言，寧願叫子弟不上學，沒有子弟上學的，當然更有拒絕的理由。於是小學因經費困難，百般俱不像樣；以言校舍，往往破爛不堪，溼濁不堪；以言設備，凡教學所必需，幾乎件件都缺乏；以言師資，稱職的沒有幾個，巫醫百工，都充教師。現在農村的小學，大抵都是如此，令人見了歎氣，不知民族幼苗如何才可以培養起來。

(五)

整個農村經濟崩潰，小學辦不好；農村經濟畸形發展，貧農無力送子弟讀書；至於進了小學的，又祇想追封建勢力，離開農村生活。凡是現在小學教育的病徵。生產事業的不發達，中級職業學生無處謀生；普通中學生太多，大學不能容納；封建勢力的拘束，使中學生不願學職工。凡此，是現在中學教育的病徵。

至於大學教育之不能達到應有的目的，更是由於整個中國經濟未能現代化，人不能盡其材；多少有用的專門人材，被迫埋沒在封建官僚黑暗勢力之下。由此看來，封建勢力的拘束，與經濟情形的落後，幾乎是各級教育的致命傷。而這兩者又有因果關係：經濟情形的落後，幾乎是封建勢力存在的唯一原因；有知識技能的人，在經濟活動方面不能有成就，便祇好加入封建集團去胡混。要使封建勢力低頭，使大家不以貪污土劣爲可貴，必須扶植生產事業，使大家用其精力於生產事業之一途。然要壓低封建勢力的氣節，愛護生產事業的萌芽，首先必須有一個廉潔有爲的民主政府。廉潔有爲的民主政府之建立，幾乎是一切進步事業之開端。而教育與政治的關係，在今日，特別顯得密切。今日不談教育則已。一談到教育，政治民主化便是唯一不可或缺的前提。



出賣良心
——穆企——

武力解決抑和平變更

湯德明

一 時代的威脅

戰爭與革命，是我們時代的嚴重威脅。二者都是以暴力手段來改變現狀，並且常常合流着；首次大戰時，蘇聯和中東歐的許多小國家，二次大戰後，中國和亞洲的一些附屬國，便都是以戰爭形態來進行革命的。

現代戰爭，無論是國際戰爭或是國內戰爭，似乎都具有世界性、全體性、長期性和毀滅性。儘管如此，可是人們仍然不珍惜和平，無誠意和談，而寧願訴諸暴力的戰爭和流血的革命。世界經過了兩次的大戰，而第三次大戰又已隱然在望；中國經過了數十年的戰亂，現在還繼續着大規模的內戰：這是爲甚麼呢？

二 觀念壁壘

爲甚麼會有戰爭與革命呢？我們每一個人都在思忖這個大問題，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答案，而且認爲自己的意見總是對的。我們這個世界是一個觀念很多的世界，到處建造着觀念的壁壘，進行着觀念的戰爭。

我們所處的時代雖然相同，但是因爲生活經驗有別，思想、觀念也就迥然相異。人，原就是經驗的囚徒！生活經驗深受利益關係的影響，尤以階級利益爲然。某階級中的個人，有時還可以犧牲自己的利益，但整個階級是決不願也決不會自動犧牲其利益的。特權階級已經習慣於享受特權，統治集團已經習慣於統治，習慣的都是當然的了。特權或統治權如稍有動搖，在他們眼中看來，無異於社會受到重大損害。這裏所謂「特權」，他們只認爲一種「權利」，如果要換一個方式調整私有關係，他們便會認爲這在道德上既然不合，在經濟上也是錯誤。至於非特權階級，却又有着相反的看法。這正如費爾巴哈所說的：「在皇宮裏所想的，和在茅屋裏所想的，完全不同」。對於特權階級和非特權階級，舉凡是非善惡賢愚諸觀念，都有着迥然不同的涵義。這兩個階級的觀念體系，相互激盪，是我們時代恐慌的特徵。比如現時中國的政爭罷，在共產黨的立場，它自認是代表人民，代表佔全國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的農工，當然有權利要求組織聯合

政府，實行民主政治；在國民黨的立場，它自認是合法的政府，曾經領導國民革命與抗日戰爭，應該有權利繼續執政，應該有權利繼續獨裁，如果服從大多數人的意願，就等於接受國家的毀滅。因此，雙方都堅持自己的立場，不願在和談中讓步，結果就只有使用暴力來解決爭端了。

在階級間如此，在國際間也一樣。觀念，從而判斷，既然是依據利益而發，人們表示贊成或反對，隨之發出行動，都離不了各國政府所依法保護的利益。政府的基礎，誠如霍爾姆斯 (J. Holmes) 所說的，是一莫奈伊何一的財產關係。在國際關係中的國家主權，就是此種財產關係所賴以保障的武器。美國的資本家控制着政府，利用國家爲工具，對外輸出商品與資本，擴大世界市場，推行「自由貿易」，在這些資本家的理解中，美國對外經濟擴張，既可以解決國內的失業問題，又可以使國外消費者買到便宜貨物，豈非一舉兩得？但在其對手國家看來，自由貿易會摧毀他們的民族工業，會破壞她們的經濟組織，從而喪失經濟的政治的自主地位，當然是不利的。尤其蘇聯，因爲實行計劃經濟，生產不會過剩，國外貿易根本就不重要，決無「不輸出，即死亡」的危機。於此，兩種經濟體制的優劣顯然可見，但兩者間的衝突（包括觀念衝突在內）也就不可避免地一天比一天尖銳了。

三 財產關係

上面說過，觀念是根據利益關係而產生。利益關係就是財產關係，也就是社會生產關係。我們所處的社會，是一個私有財產制度的社會，而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佔統治地位。我們知道：生產方式決定於社會生產力，生產力決定於生產工具，生產工具決定於生產技術。由於知識、經驗的累積，勞動技能進步，生產工具改良，影響及於社會生產力，從而及於社會生產方式或社會生產關係，以至社會類型。自英國產業革命，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以後，資產階級迫於新興生產力量的要求，起而推翻舊的社會秩序，建立着新的經濟體制，並採取了和這種新經濟相應的議會民主政制。隨着工業有了飛躍的進步，技術有了驚人的發展，資本的技術構成不斷提高，實現着社會性的生產，這和資本主義之個人性的佔有，不能相

容。資本主義經濟是一種商品經濟，生產工具為私人所有，勞動的生產物作為商品而生產，生產只是為了利潤，不是為了消費，只是為了資本家自己，不是為了大眾生活。生產成為無政府狀態，個人勞動不能直接組成社會勞動的一部份，勞動的生產品（即商品）必須藉交易而實現其價值，即必須經過自流性的，無組織的，迂迴曲折的市場而達於消費者。產銷失調，貧富懸殊，發生恐慌，帶來失業。由於失業羣的存在和壯大，由於他們對於麵包和民主的強烈要求，就威脅到擁有特權的資產階級之利益。資本家羣立刻感覺到原有的政治民主制度現在已成爲他們的桎梏，所以有加以改變的必要。隨着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發展到獨佔經濟，由商品輸出發展到資本輸出，隨而發展到帝國主義，不可避免地就要和其他國家發生衝突，經濟的及軍事的。爲加強對內對外的壓力，獨佔資本家又需要某種適於本身需要的國家形式——獨裁政制便是很流行的一個形式。而國內一般勞苦大眾，却深深感覺政治民主還不够，要求把它擴大及於經濟社會諸方面，也就是要求實行經濟民主。特權階級要開倒車，非特權階級要分享權利，彼此爭持，不能讓步，和平改變沒有可能，武力解決便是其邏輯的結果了。

我們中國還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但是受着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侵略者爲了鞏固在中國既得權益，並獲得更多的優惠，所以不惜和開倒車的統治集團勾結起來，用各種方法加以支持，陷害了原有一綫希望的和談，助成今日中國的內戰局面。

當然，今日中國內戰，美國干涉只是諸因素之一。主要原因仍須從財產關係中去尋找。我國工業不發達，工人不多，國民生活的基礎仍在農業，農民佔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三。所以中國共產黨與其說是一個工人的黨，毋寧說是一個農民的黨。我們當前的大問題，實在是農民問題。農民靠土地生活，可是土地分配得十分不平均，加以近數十年來，農村受着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官僚，財閥，軍閥，和大地主的雙重壓榨，加以連年戰爭的無情破壞，已經透不過氣來，而少數特權者在政治上獨裁國家的命運，在經濟上壟斷國民的生計，他們以絕對政權來維持其絕對財權，拒不考慮多數人的要求；和平的路就走到盡頭了。

四 和平變更的可能

戰爭嗎？雷馬克在「西綫無戰事」一書中說得好：「我們這一代的種種都被戰爭所摧殘了！」許多人已經沒有了對今日生活的留戀，和對明日光

明的前瞻。再一次的戰爭，將是人類的末日。但戰爭是不是有方法可以避免呢？人類對於爭端的解決是不是可以使用「戰爭以外的方法」呢？

可以的。戰爭原非生命的一般法則，它只是很稀有生物現象，只是生物學家所謂「同類選擇」中一種頗爲奇特的形態，據英國J. S. 赫胥黎的研究，在有生命的生物中，僅人類和一種收穫蟻是從事戰爭的。侵略者動輒引用達爾文的「物競天擇」之說來附會人類的戰爭狀態，把戰爭和普遍選擇過程混爲一談，且把人和普通生物，把人類社會和普通生物界不加區別，這裏是犯了雙重的錯誤。所謂「戰爭是人類的自然狀態」，「戰爭可以實行人爲的淘汰」等糊說，是不值一駁的。固然現時各種文明都是階級文明，自有階級以後即不斷發生戰爭，但是將來社會沒有了階級，就能沒有戰爭。固然一部世界史就是一部戰爭史，但在有史以前，人類似乎並沒有過有組織的戰爭；即在人類知道築城而居，知道積蓄財富以後，戰爭也並非必然存在。印度紀元前三千年早期文明中，中國的遠古時代，和秘魯的印加文明中，都無戰爭痕跡。這些都可以說明戰爭並非不可避免的。即以革命而論，也不一定採用暴力的方式，今日英國工黨的勝利，便是明證。

不過要實行和平變更，避免使用暴力，我們就必須消除當前社會的病。前文中曾經提及，私有財產制度，尤其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從而兩個階級的對立，必然要引起戰爭和革命。因此，使生產工具爲社會所有，就成爲和平的必要條件。這一步驟，在現實的環境下，也許一時不容易辦到，但我們必須把它當作目標，並朝着這個方向走去。在和平變更中，觀念衝突誠然無法避免，但也可以舍小異而就大同，只消求出一個經濟的公分母，即得到一個公認的經濟基礎，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法律，條約，協定和其他社會秩序來，大家就願意遵守了。前此政協會議所議訂的和平建國綱領，迄今沒有實施，主要原因之一，或許是它對於中國大多數人所最關心的土地問題，沒有給以較多的考慮，得不出一個合理調整財產關係的協議，因而影響及於政協綱領的遵守。國內如此，國際間也一樣，美蘇之間如果對世界經濟問題的看法得不到共同結論，便休想建立持久的世界和平。

總之，我們時代的威脅太嚴重了，我們不能再演流血的悲劇。我們需要以和平變更來代替武力解決。不過特權階級必須早日覺醒：現狀不能維持！而且一兵猶火也，不戰將自焚！

三十六年四月

徵借國外存款之商榷

趙鳳喈

在戰事未勝利前一年，敵人長驅直入湘桂時，國內外人士咸認戰事之失敗，最重要原因在士兵每飯不飽，衣不禦寒，國庫如洗，紙幣無靈，於是愛時愛國之士，多主張徵借國人在外國銀行之存款。參政會在重慶亦討論過這一問題，當時輿論沸騰，有進一步主張沒收國外存款以充戰士之衣食者。不久勝利來臨，國人眼光轉移視線。

流亡之士，作伴回鄉，政府注重統一，在野黨注重民主，因此上下終日忙於協商會議，三人小組，軍事調解等工作，而將經濟危機放在腦後。直到去年年底迄今年一月之間，金潮澎湃，顯示經濟崩潰。五萬萬美元之借款不成，兩萬萬美元之救濟物資，亦不能由政府出售，財政到了山窮水盡境地，大家又想到國人在國外的存款。

討論徵借國外存款問題，筆者願分三層，逐一加以說明。第一所謂國外存款，是否以銀行存款為限？其他一切記名不記名之股票，甚而其他不動產是否在內？如果國人希望所徵借的，僅屬於前者，則須指明在某年月以前，所有國人在國外之存款皆在徵借之列，不然政府討論辦法尚未公布，存款者皆紛紛提取存款，投資他處，企圖規避。也許多財善舞，在抗戰期中，國人有徵借之議時，國外存款皆逃避他途，亦未可知。現已辭職之宋子文氏，在剛上台時，曾到參政會報告稱：國外存款皆係國家銀行之外匯。此話即是說，私人並無若大之存款在外國，然則報紙所載國

外五萬萬或三萬萬之存款，證之宋前院長之詞，苟非傳聞失實，即係逃避一空。所以我們主張國外存款一語，不要以詞害意，應包括國人在國外之一切財產在內。一方防止流動資金之逃避，一方希望徵借之所得多多益善。

第二我們要決定徵借國外存款的原則，即從社會主義立場言，我們對於富有者之財產，尤其對國外有財產者，應該大量徵收為國有；但從民主政治立場言，首在保護人民生命財產之自由，除違法者外，不得沒收。在這兩種衝突原則下，若是向人民借用財產，則不能徵收，要是徵收，就不必美其名曰借用。我們立法院前此建議借用四成，捐獻四成，殆採民主主義之名，而施社會主義之實。蓋發公債而無担保品，則借而不還，等於徵收。捐獻若由人民之自動，則在八年抗戰期內，捐獻的機會特別多，富翁們願捐獻者早將財產獻給國家與社會，其將財產存放國外者，可以說根本即無捐獻與國家之意念。政府迫令其捐獻，何不直截了當，名之曰徵收。所以立法院之徵四借四政策，殆欲於社會與民主主義之間求一調和辦法，但社會主義色彩太濃，雖可博得一般社會人士之同情而政府無力量且亦無方法以執行之。財政部所擬定之辦法，較立法院建議案為溫和，民治色彩為濃厚，避用徵收沒收字樣，可能帶有獎勵儲蓄之意味。但是政府辦法太溫和，雖可利用國外存款一部分，或有助長官僚資本之趨

勢，也有預伏富有者愈富之危機。為目前國民政府着想，欲利用國人在外存款，苦無妥善辦法，就是共產黨主政，也只能驅逐富翁於國外，並無良法將國人在外之財產全部沒收。重要原因，即在國外之財產，中國政府無法將其置於自己掌握之中。（見下段說明）。

第三徵借國外存款，須否假外交方式求援於外國政府。關於這一層，想政府方面及在野人士都想到過。但想之又，外國政府恐不能贊助我國成此義舉。我們徵借國外存款，在手續上可能有三件事，要外國政府幫忙，一件是幫助我們調查我國人民某某等究有若干財產在某國，另一件是至必要時，強迫各該國公私團體，將我國人民之財產移交我國政府接收。這兩件事，如果能辦到，我們對於國外存款，無論是借用，或是徵收，均易如反掌。因為我們政府如能將國外存款，接收放在國庫內，等於一人將物件放在手掌內，很易處理的。如上次黃金儲蓄事，政府把握着黃金，要徵用四成（亦美其名曰捐獻），立刻辦到，即是一例。只可惜外國政府對於調查存款事，可能代辦，但除特殊事件外，無代辦之義務，自不可不辦。至於第二件事，強迫公私團體，將中國人民之財產移交中國政府一節，不但在國際公法上辦不到（除非中國法院判決某某罪犯，應沒收其財產，咨請外國政府協助調查該罪犯在國外之財產，外國政府方可能予以協助）即就各國之國

戰時的昆明勞工

陳達

(一) 戰時國內的遷民運動

當蘆溝橋事變的初期，敵軍的凶鋒不可遏止，我軍雖隨處抵抗，但大勢不利於我，國軍逐漸向後方撤退，大量人民亦遷出淪陷的家鄉，徙入比較安全的區域，遂醞釀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遷民運動。這個運動的主要方向，陸路大致是由北而南，例如由河北山西河南入於武漢三鎮，然後由粵漢鐵路達於廣州。海路則大概由平津遼海而南，或由漢口延長江東下，以上海或香港為暫時駐足的地點。待日寇侵佔的地區愈益推廣，我國的遷民人數也愈益加多。當然有些遷民，一俟家鄉秩序恢復，即行還鄉；但亦有許多人則扶老攜幼，踏上流浪的征途，愈走離家愈遠。或由內地取道廣西貴州抵於雲南，或由香港航海，經海防至昆明。他們以雲南為最終目的地，因為依他們的觀察，雲南是邊陲地帶，戰事不致蔓延，生活比較安全，因此雲南在戰時，吸收了大量的徙民。

抗戰初起的時候，我國各種軍需品及一般的日用品，大致仰給於沿海各商埠。自敵人佔據這些區域之後，後方以軍用物品及人民的生活用品，再不能得到沿海各市的接濟，所以後方自己已有振興製造業的必要。

(二) 昆明湖區現代工業的興起

昆明湖沿岸的市縣，原來是農業區域。自抗戰軍興，各省的徙民即來此居住。徙民當中，有

許多是由工商業區遷出的，他們對於現代工商業有相當的訓練與經驗，例如企業家工程師及技術勞工等。他們認為昆明湖區缺乏現代化的工廠與商店。但當戎馬倥傯之際，軍隊需要武器彈藥與服裝，本地人與徙民需要日用必需品，乃竭力籌設新式工廠，並改良原有的手工製造工場，以增加製造品的生產量。當戰事初起時，昆明市近郊僅有新式工廠一處是合於工廠法的。但戰事起後，每年有新開的工廠，直至抗戰第六年末，離昆明市中心一百五十公里內，新式工廠不下五十處。工業化的進展，實有驚人的速度。

無疑的，最先成立的工廠是於軍需的製造有關的。其次便是日用品的製造，專為供給雲南老百姓及徙民的消費。這些新式的工廠對於當地社會，發生了多方面的影響。第一便是人口的激增：自民國二十六年至民國三十一年，昆明市與昆明縣的人口每年約增百分之八，這是前所未聞的增加率，大部份是由於徙民的人數，因本區域的自然增加（即出生數超過於死亡數）是極小的，每千人每年不過三人。很明顯的，各省的徙民隨着戰爭而來到雲南，以便尋找工作並暫時居住。第二便是人民職業的變更。昆明市的本籍人口，農業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四，製造，商業與交通佔百分之五三。同市內的徙民，農業僅佔總人口的百分之零四，至於製造商業與交通則佔百分之六九。徙民中從事於工商業者，以百分比言，其人數遠超過於本籍人口，而本地人的職業，亦漸由農業轉向於近代工業與商業。

內法言，外國政府亦不能辦理此事，因為在民主國家，保障人民財產之自由，憲法列有明文，中國人民既依外國法在國外為各種之投資，即受各該國法律之保護，民主國政府即不能強代中國政府沒收或徵用中國人民在各該國之財產。若在社會主義國家，人民財產額受限制，中國人在該國之財產若超過限量時，該國政府可為其本國沒收之，自無代中國沒收之機會。所以外國政府對於此事既無能為力，而中國政府必欲取得國外存款而甘心，則有一個正常辦法，與二個極端辦法。所謂正常的辦法，即依法檢舉貪官污吏。貪污罪成立時，即沒收其財產，該罪犯在國內之財產，自可由中國法院查封辦理。至其在國外之財產，可由外交部咨請外國政府，代為調查拍賣，外國政府可能予以協助；因外國法院對於中國法院之判決，大半仍有審核之權。萬一外國法院不承認中國法院之判決，外國政府仍可拒絕中國政府之要求。此事牽涉沒收罪犯財產，非單純之徵借國外存款問題。然無論如何，此為正當辦法，並可藉以威脅一部富翁自動捐獻。除此而外，尚有兩個極端辦法。第一是對此類富翁，加以綁票勒索。快刀斬亂麻，可以大快人心（也許有人在台下說風涼話，高唱保障人權）。不過話又說回來，民主政府若不能依照上項正常方法，沒收貪官之財產，自然更不敢做綁票的違法行為。共產政府未上台時，富翁早已遠走高飛，想綁票而不可能。第二個辦法就是行賄頭政策。政府提出確實擔保品，按照外國銀行存款利率（也許要略高一點），發行金公債，向各富翁攬頭勸募，多少可以借用幾成。最近政府決定發行金庫券及美金公債三億元，就是這種攬頭政策的運用，也就是沒有辦法中的一種辦法。

(三) 美國遠征軍

當昆明湖區正向工業化進行之時，美軍逐漸駐紮於近郊，特別是空軍。軍需與生活用品除由美運來者外，必須仰給於本地，這顯然刺激當地的新式工業，例如機器業、電氣業、酒精業、及食品與服用用品業等。機械的修理，電料與電工器材的補給，往往依賴當地的技術工人。又因汽油的缺乏，酒精的製造在戰時發展甚速。至於飲食與服用品的一部，亦必由昆明工廠來供給。

(四) 物價、工資與津貼

戰爭既斷絕沿海各埠與後方的交通，昆明湖區的物價遂逐漸高漲，至民國三十年九月滇越鐵路禁止通車之後，越南及我國他埠物品的來源俱斷，僅能仰給於本地工廠，另一方面則人口正在繼續增加中，益見供不應求。同年十二月敵人佔據上海租界，次年又封鎖滇緬公路，於是外國貨品無復輸入雲南的可能，而昆明物價遂扶搖直上，終無回落的趨勢。假如以民國二十六年上半年物價作爲一〇〇的話，其增加情形可簡述於下：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下同）增加三倍半，二十九年八倍，三十年二十七倍，三十一年一三七倍，三十二年三八一倍，三十三年一〇九三倍，三十四年四一一〇倍，三十五年五月三，六四三倍。昆明的工資雖亦有增加，但數量與速度俱追不上物價，因此一般的勞工咸感生活難以維持。例如有技工的工資，在民國二十九年五月，每日可得國幣二元四角，至三十年十二月增至每日四元，至三十一年十二月增至每日七元一角五分，至三十二年七月增至每日七元四角五分。二十六個月之間，有技工的工資僅增加三倍。依照同樣情形，無技工的工資亦無與物價相

似的增加：在民國二十九年五月每日僅得七角四分，至三十年十二月，增爲每日一元七角八分，至三十一年十二月，增爲每日二元七角六分，至三十二年七月增爲每日三元。二十六個月之內，僅增加四倍有餘。

在物價狂漲的時期內，昆明的勞工無法專恃微薄的工資，來維持日益低降的生活。爲補救此缺陷，有許多工廠與商店逐漸介紹各種津貼，藉以增加勞工的收入。因爲這些津貼，事先並無精密的籌劃，難免是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臨時辦法，以致津貼的名目繁多，辦法紊亂，既攪亂了平時的工資制度，復增加了戰時對於勞工的糾紛。直至抗戰末期，一般的勞工，大家撇開工資不談，只問收入的數目，所謂收入實以各種津貼佔最重要的部份，例如米食、衣服、醫藥、柴炭、住房各項俱有津貼。若以每月的收入計，有技工人在民國三十年一月可得一百另八元五角，至三十二年十二月增爲二千一百七十三元七角，或於二十四個月內增加二十倍。無技工人於同時期內由每月六十一元四角增至每月一千另八元六角，或於二十四個月內增十六倍有餘。收入的增加雖較速於工資，且以數量言亦遠較工資爲大，但依賴收入，一般的勞工尚不能維持生活，因同時期的物價，業已增加三十三倍。

(五) 技術勞工

在物價不斷上漲的壓力下，昆明的技術勞工成爲特別迫切的問題。戰前的昆明是一個手藝品與農產品的交換場所。鄰近的鄉村運入農作物，與市內的手藝人互換貨品。鄉村的勞工大致是無技的。市內的手工業卻有六十餘行，每行有大師傅二師傅與徒弟，除徒弟無技術外，餘爲技術勞工。但這些手藝人並無精深的技術。且他們的技

術大體上不是現代式工廠所需要的。昆明工業化既已抬頭，但技術勞工的缺乏，使一般企業家感覺棘手。國營事業與民營事業遇着相似的困難，而國營事業尤甚，因其規模較大，需要更迫。由各省的徙民中可以得着一部份技工，這些便是基本隊伍；然後由上海無錫漢口廣州各地招徠各種技術勞工，並鼓勵他們帶眷。以抗戰初年的情形論，他們有較優的待遇，並且因家鄉淪陷，原來的職業已不復存在，家屬亦必須遷出，樂得遷往昆明，既可就業，又暫得安居之樂。機匠、電工、鍋爐工、西式木器製造者等源源而來，使昆明市及附廓，逐漸增設新式工廠，使昆明市於短期內步入現代化之路。同時市內的手藝人與近郊的農工，亦逐漸放棄原有的職業，入工廠練習，以補「下江技工」之不足。下江技工不但數量不大，且旅費甚高，因此昆明的企業家，轉換目標，於可能範圍內訓練當地工人爲技工。有些手工業，因「行道不行時」，業已逐漸衰微，不能再收徒弟，和新興的工廠競爭。但大部份的工人係由鄰近的鄉村得來。至抗戰末期，除技術最精的勞工尚須由徙民及上海等處招募外，二等技工即可由昆明訓練，至於粗工即完全由本地工人充當。

(六) 挖工與跳廠

但技術勞工畢竟是不可多得的，何況新式工廠又在逐漸增設之中。於是國營與民營事業爭先恐後的搶奪技工。據有些勞工的觀察，軍政部各工廠的待遇不如資源委員會、經濟部或雲南省企業局，所以有些勞工有跳廠的行動，大家只向往遇較好的工廠裏謀事。在雇主方面，只要生意旺盛，暗中亦向同行挖取技術勞工，國營與民營的工廠是一樣的。這個問題鬧得十分嚴重，弄得廠方感覺不好管理，工人亦心懷不寧。於是經濟

部爲穩定工業起見，訂立並頒布技工管理條例，勸同一區內的企業家停止或減少挖工的行動，以遏止日趨嚴重的工人流動。

工人流動，在戰時的昆明，造成古今中外所未有的嚴重現象。昆明區的七大工廠，在民國三十年至三十二年，有驚人的工人流動。最低的每月流動率爲百分之六，最高的爲百分之二十一，平均約爲百分之十。易辭言之，每一百個勞工在每月裏必有十個人要離廠。在這種極不穩定的狀態下，工廠不能經營，工人不能管理。工廠勞工大致是技工，技工是要訓練的。一個工人入廠之後，對於工作必須練習，然後效率可以提高。如果廠內的勞工，川流不息的進退，效率必然減低，何況新工人入廠，重新是要練習的。在廠方多費錢，減少生產；在工人，東奔西走，不能安定下來，一心一意的作工。

戰時勞工的跳廠，大致是自動的。他們遇有較好的機會，離開原廠而進入新廠。照這一點看來，與平時不同。平時工人的離廠，尙有其他原因，俱於勞工不利的，即因工廠無工作而離廠，或因有過失而被工廠革除等。

(七) 工廠的紀律

工人流動既如此嚴重，已如前節所述，工廠顯然不能維持紀律，因離廠者純係出於工人自願，並非由於經理部或工程師及領班的命令。一般的工廠埋怨工人浪費原料，毀損工具，嫌生產品量少而質差；不成器的勞工，往往遲到早退，曠工亦是常見的事。領工、領班或工頭，在工作時間內已無約束工人的能力，普通係由工人自己作主。在這種情形下，效率是愈減愈低，雖然工廠還能賺錢，但賺錢的主因是在通貨膨脹，生產品不斷的漲價；並非因工業經營得法及工人增高效

率。

經理部決不能提出效率問題，因工人隨便離廠，有時尙藉口工廠的待遇不佳，或管理人的苛刻。老工人離廠之後，新工人即被介紹入廠，那俱是生手。生手對於所分配的工作，都要經過練習，才能勝任。等到剛剛學會了，偶然聽說他處有較優的待遇，他們又要離廠而他去。

(八) 勞資糾紛

工人流動雖如此普遍，勞資爭議卻極稀少，因勞工們對於廠方如有不滿的情事，不必提出交涉，乾脆離廠就是了。勞工們也不耐煩，不願因交涉而多費時間。廠方對此，便是束手無策。在抗戰期間，昆明各工廠未聞發生勞資爭議。但民國三十四年秋季，和平後一個月之內，由社會處派人調解的糾紛，已有十餘件。因戰事結束，一般人以爲外埠的工業品可以逐漸運到昆明，以致昆明物價普遍下降；且國營工廠的一部及戰時由外埠徙入的工廠，逐漸遷回原地，有許多工商業頗呈不穩之狀，於是縮小營業範圍，裁減工人，並降低工人的待遇。遭遇着惡劣的社會環境，一般的勞工們不能再跳廠了，但求在原廠裏要求維持本來的僱傭條件，反對減少人數或降低待遇。抗戰期內的跳廠，和平以後的勞資爭議，俱是昆明勞工的特殊現象。

(九) 市鎮與鄉村勞工

昆明湖區的工業化，無疑的因戰爭而向前邁進。在戰前，農爲最主要的職業，當戰爭進行時，近代化的工商業逐漸增加。在民國三十一年時，昆明市的職業人口，年在十二歲以上者，有百分之六十七是從事於工商業的。如再加上其餘的市鎮職業，則市鎮人口應佔百分之七十七，而鄉

村人口僅有百分之二十三。昆明市內及近郊，當然增加了大量的市鎮工人。

昆明縣的市鎮化雖較昆明市爲徐緩，但已遠勝於戰前。製造，鑛業，商業與交通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農業尙佔百分之七十九。從事於農業者，大部份尙保存固有的習慣，維持原來的生活；但亦有少數農民，逐漸沾染市鎮化的生活。

(十) 十字街頭的昆明社會

戰爭促進了昆明湖區的工業化，改變人民的職業，引起多方面的社會變遷。但昆明湖區究竟是一個農業社會，經過這次抗戰，應該向工業化加速前進呢？還是恢復農業社會的本色呢？目前的昆明實在是在徘徊歧路了。

戰爭結束以後，有些工業必然留於昆明，或比較時格外發達，特別是能利用當地的天然資源的，例如箇舊的錫、東川的銅、宜良的柴煤、賓川的棉花等。國防事業的一部及本省已有雄厚投資的工業，必定繼續維持。至於利用徙民的資本技術或工人的工商業，大致要於戰後逐漸遷出昆明。事實上戰後的昆明，必有比戰前更多的現代工業與商店，市鎮化的程度亦比以前增高，但工業化的速率或較戰爭期間要轉慢，因資本額已逐漸減少，經理人才與技術勞工亦已陸續離開了昆明。

不過昆明農業社會的特質，不致發生基本的變動，因戰爭的影響是暫時的，敵不過歷史悠久的守舊民風。一俟秩序穩定之後，昆明湖沿岸的居民，想來還是樂於注重農事，過他們幽閒的日子罷。

日本政黨的新分合

林煥平

日本的現有政黨，成立雖然已經一年多了，但還沒有成爲定型。這是因爲日本的內政還在急激變化中，而日本人又最富於「適應性」的緣故。此於進步黨一再改變其政綱，及新黨運動此起彼伏，可以見之。四月底日本將舉行參院、衆院議員及市縣長選舉。這會相當地決定今後三數年內的日本政治形態。這就更使政治鬥爭激烈化，據報載，進步黨已於上月中改組，正式改名爲「日本民主黨」，而進步黨領袖幣原、犬養，自由黨領袖蘆田均都參加云。這是政黨新分合的開端。

自去年六月間，吉田被擁爲自由黨總裁，上台執政以後，一由於政權的爭奪，二由於代表性質的稍異，自由進步二黨之間，始終存在着若斷若續的鬥爭。特別自去年底到今年初，犬養健領導下的進步黨，極力主張成立自由、進步、社會三黨聯合內閣，以達到如次的目的：一、加強統治階級的團結，以應付危機；二、分化社會黨（像在義大利所玩的一樣），削弱它的力量，使它在未來的選舉中失敗；三、加強進步黨的領導力和影響力，以便時機一至，取自由黨的地位而代之。一石三鳥，確是妙策。洋總督麥克阿瑟元帥，不用說很贊成這個策略。仍以典型的官僚鳩山一郎在背後領導的自由黨，則表示頗爲冷淡。因爲吉田內閣雖說是自由進步兩黨的聯合內閣，却仍是自由黨把握着領導權。政權在握的人誰願意放棄它？加以另有二個原因：一、社會黨的基礎力量，完全被把握在左派手中，右翼上層領袖，多是光棍，左派反對參加聯合內閣，免上政敵的大當，右派無可奈何，暫時只好服從黨內的多數；二、日本八百六十萬公教人員和工人，原定二月一日實行全國總罷工，洋總督認爲事態嚴重，除下令禁止外，並着吉田此時此地一動不如一靜，內閣不必辭職，俟總選舉行後，再爲發落；因此，進步黨雖以退出內閣爲要挾，也不能不服從洋總督的「聖旨」，放棄三黨內閣的策動了。

三黨內閣既經放棄，進步黨就不能不另謀出路了。在這裏我們必須指出，進步黨這樣執拗的要求抬頭，也有其客觀的原因。進步黨是戰前民政黨及政友黨中島派的結合，一九三四年以前的數年間，世界不景氣，所以主要是代表輕工業及地主勢力的政友會得勢。一九三四年以後，日本已成「準戰時體制」，重工業抬頭，故民政黨取政友會的地位而代之。政友會的飛機工業家中島派也脫離而與民政黨合作。中日戰爭一開始，民政黨及其所代表的三菱與中島派即和軍閥密切合作，而政友會及其所代表的三井却是在戰爭後期始和軍閥結合。故戰後肅清戰爭嫌疑犯，進步黨所受影響最大。波茨坦協定原來規定澈底消滅日本的軍需工業。若果照這規定執行，進步黨就會喪失了基礎。但麥克阿瑟元帥所執行的是基於本身利益的美國政策，他要保存日本的軍需工業。如最近王芸生先生隨記者團赴日本考察歸來，也指出日本最大海軍港——橫須賀軍港，並未破壞，最大鋼鐵廠之一的神戶鋼鐵廠及其五個分廠，都完好如前。在這樣的政策鼓勵之下，進步黨當然要求抬頭了。

自由黨裏面，也有一部份代表重工業的勢力。他們和代表地主利益的份子，立場意見並不完全一致，這是黑田重武、橋樑勳投奔犬養毅的原因。這也是蘆田均參加「日本民主黨」的原因。（編者按：報載民主黨幹事長石黑武重，總務委員犬養健，及黨務委員橋樑渡均遭「整肅」，此可見保守陣營中民主黨與自由黨自相傾軋之甚。）

日本民主黨的醞釀已很久了。去年夏天，黑田和橋樑就會想把無黨派議員與進步黨合併而未成功。其後新黨運動從未中止過，如今畢竟成立了，這是日本獨佔資本家和美國軍閥的結合。儘管報上宣傳三井三菱要解散，分別成立十個二十個公司，但這是等於父親把財產分給十個二十個兒子，並沒有絲毫改變獨佔資本的性質。

日本民主黨成立以後將會引起日本政黨新的分化。無黨派議員、國民黨、協同民主黨的若干黨員議員，自由黨內反對鳩山、河野「官僚獨善」的少數份子，以及社會黨的右派領袖如西尾末廣，平野力三等，都可能參加日本民主黨，最低限度是和日本民主黨合作，以反對「頑固死硬」、「官僚獨善」的自由黨。總之，凡是願意走買辦路線的份子，今後都將慢慢跑到犬養健的麾下去了。

四月底就將舉行普選。照趨勢看，日本民主黨將會比自由黨略勝一籌。僅說名字，民主黨就較自由黨富於欺騙性，何況自由黨一年來的政權，在日本的確遭到天怨人怨。值得注意的：社會黨的選舉對策到底如何？我們可以斷言：假如在這次普選中，社會黨仍不能爭得第一大黨的地位，而領導政權，則今後資產階級反動政黨日趨鞏固，她大概不會再有取得政權的希望了。故爲社會黨着想，第一要黨內精誠團結；第二要和共產黨成立選舉聯合戰線，免蹈去年四月普選的覆轍。

聞一多的一生

——序「聞一多的道路」

吳 晗

一多先生以身殉民主之後的第九個月，他的學生史靖寫了這本書，標題作「聞一多的道路」。

作者不但是傳主的學生，而且還是同鄉，還沾有一點親戚關係。一多先生住在昆明西倉坡聯大宿舍的幾年，經常來往的客人中，作者是其中之一。昆明每次有一多先生出席的演講會、座談會、討論會，作者無不在場。這本書的寫作材料是可信的，除了作者目擊的許多事實以外，一部份取材於「人民英烈」一書中關於紀念一多先生的專文，另一部份則得之於一多夫人和她的子女，以及家駒先生的口述。

這本書正如書名所提示，刻畫出光輝萬丈的民主戰士的一生。

一多先生的道路是曲折的，青年時代是新月派新詩人，中年時代是舊經典的研究學者，晚年成爲青年所愛戴，昂頭作獅子吼的民主戰士。

就一般庸俗的說法，在日常生活方面，一多先生的一生可以說是沒有遭受到什麼拂逆的境遇，出生於故家，就學於當時貴族化的清華學校，到美國留學，回國後當教授，還兼任過教務長院長

系主任一大堆職務。住的地方是幽雅沉靜的北平，風光明麗的青島，交通中心的武漢，和貴人滿

街的南京，終年是春天的昆明。他講究吃，也講究住，從來不知道有窮困，更不用說飢餓。即使是在昆明這九年吧，前幾年物價未大漲，生活着實過得去，後幾年是拮据了，艱難了，衣服破，鞋子爛，菜裏不見油水，孩子們都營養不良，可是這也是教書人這時期的通常現象，除了別開生徑，會做一點買賣，或者經常飛重慶見大官的一些名流之外，又有誰不是如此過日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家一樣過，雖然從來沒有當作這境况是應該的，合理的，却也沒有憤恨這現象是個別的，特殊的。而且，正當大家日子過得困難的時候，他學會了刻圖章的手藝，還兼着一個中學的課。後來中學不教了，圖章已經出了名，每天刻一個就不愁買錢，平均計算，收入等於大半個教授，假如不是人口衆多，也算過得去了。作者在書中特別指出這一點，說明一多先生最後走上的道路，也就是中國人民所應該走的唯一道路，純是出於思想上的自覺，決不是像一些別有用心份子那樣，誣賴他是從個人的生活出發。

其次，就思想的發展而說，在幼年，家長專制的家庭中，一言一動都被束縛壓制，老年人認爲一切傳統的都是對的，好的，教育子女的方法也不例外，孩子的想法却正好相反，過了二十年，在外國學會的一套，更從理論上得到證明。他不但堅決的反對家長制，從兒女身上來報復，相反地他是最慈愛的父親，最體貼的丈夫。推而廣之，他痛恨教育上社會上政治上的家長作風。舊話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其實，父母往往是

「不是的」。一個肯尊重自己的人，決不會說出「天王聖明」的話。

在清華受教育的時代，他參加了五四運動；正和一些五四英雄相反，他沒有冒充擠入打趙家樓的行列，老實承認那一天留在學校作文書工作。也沒有抵賴說和這一運動無干，坦然自白曾經跑過龍套。從這一身親其事的偉大日子中，他認識了民主與科學，更明白了敵人的醜惡面目。當然，他從來也沒有像一些英雄們那樣，一輩子利用不盡這一日子的資本。

在美國，開頭學的是美術，雖然沒有學到家，却指引他走上愛美的道路，寫新詩講究格律聲韻，住屋子講究光線色彩，到晚年有一次還和我談起幾十年來的書面裝幀，一本本的批評，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很在行中肯。有時還替同院的太太畫龍，作刺繡的圖案，甚至刻圖章也還是當年學畫立的根基，因爲用鉛筆畫圖章底子，和幾個字的位置搭配和結構都得要適合于美的標準。中年從寫新詩轉到研究舊詩，唐詩楚辭的研究是從愛美出發的，從詩文轉到甲骨文文字，而神話而圖騰，也還是一條線索。

和學美術相反，一多先生在晚年最不满意他自己所受的教育；清華學校是美國式的，美國，片面的，壟斷的，閉塞聰明的教育，享樂的，自私的，排它的教育，這十幾年，太寶貴的十幾年，他在懊恨，假如在另一情況之下，在另一國度？他在嘆息，以美國作藍本的中國大學教育，是在教人學會了一些皮毛，更重要的是教人努力隔絕了另外一些，忘記了無說了抹煞了另外一些。沒有選擇，只是填鴨子；他大聲疾呼，指出這

羅曼羅蘭的道路

楊晦

四月五日晚上，交大今天社主辦的羅曼羅蘭文藝晚會，我被邀參加，做了一次簡短的講演，題目就是「羅曼羅蘭的道路」。當時會場情緒非常熱烈，特別朗誦的節目使人非常感奮。會後，他們把懸在會場的一幅羅曼羅蘭畫像送給我，留作紀念；我現在也把當時所講的大致記下來，以酬盛意，並公諸熱愛羅曼羅蘭的青年朋友們。

羅曼羅蘭的偉大，這是誰都承認的。不過，他的偉大到底在什麼地方呢？這是一定要把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先辨認清楚，然後才不至於誤解。這是一件困難的工作，不是這樣短的時間所能做到的；現在只能算作提出這樣一個意見，喚起熱愛羅曼羅蘭的青年朋友們對於這方面的注意吧了。希望由此能增加對於羅曼羅蘭的了解，更進一步的了解；不至於減低了對於羅曼羅蘭的熱愛，不至於破壞了對於羅曼羅蘭崇拜的完整性。

在眼前所熟知的外國偉大作家裏，我們必須要這樣才能真正認識，真正了解的，還有一位俄國的老

托爾斯泰。這因為，在他們的一生裏，都經過一個極大的轉變，轉變到否定了他們自己的過去，要跟過去告別的那樣程度。所不同的，托爾斯泰的轉變，是一種宗教性的，在他的發展上，是一種逆轉，就說是一種反動也不算過分。羅曼羅蘭的，却是一種社會性的轉變，是一種對於自己的革命。而且，在轉變後，他才把一幅新時代的旗幟揹在他的肩膀上，在歐洲大陸，在全世界，領導着文化界作反法西斯的鬥爭，向建立新社會的路途，大踏步地走去。

羅曼羅蘭死的時候，已經是七十九歲的老人。一九三六年，他七十歲的時候，在答謝蘇聯人民熱烈祝賀他的生日的信裏，他曾經說，他的這七十年是「從巴黎走到莫斯科」的長途旅程。這是不錯的，他的旅程的確是够長遠，他確的確由巴黎走到了莫斯科。然而，這所說的是怎樣的一種道路呢？

這可以有兩種解釋。我們可以說，羅曼羅蘭所走的道路，是通到莫斯科的，所以，雖然起點是巴黎

，而終點却是莫斯科。於是，也可以說，是由十九世紀末巴黎公社失敗後的法國，走到了二十世紀初十月革命後的蘇聯；是由知識分子的個人英雄主義走到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共產主義。這自然是要經過漫長的歲月，經過痛苦與掙扎的一條漫長的道路。然而，實際上，我以為，並不然。我認爲，我們應該說，羅曼羅蘭在第一次歐戰前所走的，無妨就說是「巴黎路線」。在這一條路線上，隨着第一次歐戰的爆發到結束，他走到了他的最高峯，也可以說是走到了盡頭。然而，峯迴路轉，這時候，爆發了十月革命，在羅曼羅蘭的眼前，展開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遠景，是另一座高峯跟他的這一高峯遙遙相對着，呼應着，這是一「莫斯科路線」的最高峯。這座高峯的出現在他的眼前，是光華燦爛的，却又煙霧瀰漫；雖爲煙霧所瀰漫，却也遮沒不了它光華的燦爛。於是，使羅曼羅蘭站在他自己

的高峯上，遙望着對面，雖然是透過煙霧望見了光明的前景，却免不了又時時爲煙霧所迷亂；因而，在光

華與煙霧的迷濛裏，陷於探索而未免於彷徨，彷徨却仍在探索的苦悶與掙扎的狀態。然而，羅曼羅蘭終於勝利了；光明也已經衝散了煙霧。他於是由所謂「巴黎路線」的最高峯跨了過去；經過了他的「探索與彷徨」的深淵，跨上了「莫斯科路線」的峯頂。

我認爲，這才是他走的所謂「從巴黎到莫斯科」的道路。

二

什麼是我所說的「巴黎路線」呢？我們無妨就說是「約翰·克利斯朵夫路線」。這是悲多汶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在德國所走的「路線」，被羅曼羅蘭給移植過來，移植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法國，他認爲這是在當時法國的偉大天才，最優秀的知識分子所要走而且也應該走的路線。然而，在悲多汶當時的德國，社會的發展，正是資產階級的上昇時期，我們的偉大天才悲多汶，通過他的藝術，就是他的音樂，所表現的是進步的要求，所代表的是革命的力量，是忍受一

切的困苦與折磨，掙脫一切的枷鎖，完成個人的解放，實現人的所以為人的使命。這跟當時的社會發展，社會變革的要求是一致的。至於約翰·克利斯朵夫，雖然是悲多汶型的人物，是悲多汶的化身，是悲多汶的放大，一移植到羅曼羅蘭時期的法國，情形自然就不同，意義也自然就改變了。這時候，他的個人英雄主義，他資本主義社會所走的日趨反動的路上，已經失掉了悲多汶時代的進步意義，跟當時的社會發展和社會變革的要求已經並不一致。

自然，在一八七〇年以後的法國，由於普法戰爭的戰敗，割地而且賠款，在一般人心上都蒙上了一層被征服的恥辱；由於巴黎公社的被撲滅，在向帝國主義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裏，社會的階級矛盾更加深，而統治階級的壓迫、剝削以及控制也隨之更加強起來，悲觀主義的思想不能不瀰漫在當時的思想界裏。於是，有像莫泊桑那樣的悲觀，絕望的悲觀；有像左拉那樣的揭發現實社會的矛盾衝突，暴露人間生活的陰森醜惡；有像阿那托爾·法朗士那樣的流於懷疑，流於冷嘲；有像都德那樣的以退守而自足；也有更進一步，在無可奈何裏硬要找出一點奈何來安慰自己，欺騙自己，而且沉到神祕的深淵，却罩上一套象徵的外衣，曾經風行一時的

所謂象徵主義運動。像羅曼羅蘭這樣，從過去文化的傳統裏接受理想主義，以資本主義社會初期的個人解放做為這種理想主義的基礎，再從近代的偉大藝術家那裏取來那種為藝術獻身的熱情，不管現實生活是怎樣的艱難困苦，人世間是怎樣的淒慘可怕，却終於完成了他們藝術的偉大，同時，也就完成了他們人格的偉大的，以充實這種理想主義的內容；然後拾出英雄主義，來抵禦那籠罩法國社會的悲觀主義的重壓，這至少可以像松柏那樣，雖然不能使大地早日回春，却足以耐過風雪的寒冬，不至於零落、凋傷，弄得狼狽不堪的樣子，或者乾脆毀滅，以待春光的來臨。

這就是約翰·克利斯朵夫的路線，也就是羅曼羅蘭在轉變前所走的，我們姑且名之為「巴黎路線」。

二

從這樣的「巴黎路線」，是不是一定會走到莫斯科去呢？

這實在是：並不一定。假使就照着這樣的路線走下去，不但不一定，而且，可以說，就不可能走上「莫斯科路線」。因為，這完全是兩條不同的路線，無論出發點還是走法，就都一不一樣。也許有人認為是過分的吧，如果我說：這樣的「巴黎路線」，或「約翰·克利斯朵夫路線」，走上跟「莫斯科路線」

相反的路去的可能性是更大一些。這其實是很明顯的道理；不過，因為這是羅曼羅蘭，是我們所崇拜的反法西斯的戰士，思想界的巨人所走過的路線，為他的光輝所奪，我們就不及細認他過去所走的路線，不願辨認這條路線的真實蹤跡吧了。然而，這却是我們必須辨認清楚的；不然，就難免要誤解羅曼羅蘭，誤解他的生活與思想，不容易正確地估量他的那些作品的價值和影響，以及他的所以偉大的地方了。

在「五四」以後，中國是有過一個對於羅曼羅蘭崇拜的熱狂時期的。那時候，正是第一次歐戰以後，羅曼羅蘭的聲譽，在國際間，正像日午當天的一般。隨着他的國際聲譽，所帶給世人的是他的幾部英雄傳，是他的十卷名著「約翰·克利斯朵夫」，是貫徹在他那些著作裏邊的英雄主義。羅曼羅蘭自己，這時候，却正陷在「探索與徬徨」的苦惱裏邊，正在快要跟他的過去告別了。等到他一跟過去告別，就連留在後面的橋都拆掉，誓不回頭地那麼決然走上新的道路；但是，世人，特別是當時的中國方面，所崇拜的正是他自己告別了的那些過去的思想，過去的生活態度，過去的英雄主義，過去的那些著作。所以，隨着崇拜而介紹過來的，首先是他的「悲多汶傳」，接着是「密萊傳」、「密蓋朗吉羅傳」、「托

爾斯泰傳」、「甘地傳」；他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他的一些劇本；茨外格所作的「羅曼羅蘭評傳」等等。這些都是他要告別的那個過去時期的東西，而「甘地傳」更是他「探索與徬徨」時期的作品，是他英雄主義的退潮現象，退到托爾斯泰的不抵抗主義，轉而崇拜不合作運動者的甘地了。在當時，我們所認識的羅曼羅蘭，也就止於他自己所告別的那個過去的羅曼羅蘭。

一九四四年的年終，羅曼羅蘭與世長辭了。隨着對於這位巨人的哀悼與紀念，在我們的勝利前後，又喚起了我們對於羅曼羅蘭的熱狂，一直到現在還在繼續而且擴大。像「約翰·克利斯朵夫」那樣的巨著，在我們的青年羣裏，都成為極熱愛的讀物。然而，我們的羅曼羅蘭，自從跟他的過去告別以後，所走的已經不是從前的「巴黎路線」，而是新的「莫斯科路線」。他的所以偉大已經不是他過去那種知識分子的個人英雄主義，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共產主義。我們的青年，在這時候，要再崇拜他的英雄主義，誤認為他的集體主義就是他的英雄主義的延續或者發展，不加批評地投在他的「約翰·克利斯朵夫」裏邊，崇拜起約翰·克利斯朵夫那樣的英雄，那樣的天才藝術家來；甚至於津津樂道羅曼羅蘭所告別的

過去的生活態度，對藝術的工作態度，像住到一間巴黎的六層樓上埋頭寫他的大作啦，像他跟一二位朋友辦一個刊物，既不登廣告，也不送到書攤或書店寄售啦，……這實在是認識羅曼羅蘭的一層煙霧，非常容易使人對於羅曼羅蘭發生誤解。就是約翰·克利斯朵夫的那種戰鬥，最後也要撲空的；而且，走到極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的英雄主義，已經是跟尼采的所謂超人相去不遠。這是跟「莫斯科路線」背道而馳的了，可以說。要知道，約翰·克利斯朵夫的跟社會戰鬥，並不是那個社會的變革，而是他在那個社會裏的勝利，換句話說，是他通過他的跟社會鬥爭而完成了他的藝術的偉大，完成了他的人格上的偉大；他要求的是偉大，是終於超越了那個社會，高高地站在那個社會的上面。這就是巴黎的優秀的知識分子，偉大作家們的英雄主義。

自巴黎公社失敗以後，資產階級的政權已經穩固，不再需要無產階級的武裝暴動來幫同爭取勝利，反倒以無產階級為正面的敵人，以剝削工人來加強他們的統治，以壓制工人來穩固他們的政權了。在這種局面下，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已經被壓在地下，這種道路跟約翰·克利斯朵夫那樣英雄的生活與思想已經是各奔前程，不能再同路了。

所以，像約翰·克利斯朵夫所走的那種「巴黎路線」，並不能走到莫斯科去，是非常明顯的事實。

四

然而，羅曼羅蘭為什麼會終於走到莫斯科了呢？

要知道，羅曼羅蘭雖然是理想主義者，在現實的世界裏，却不能那麼理想地生活。他所理想的雖然只是約翰·克利斯朵夫的那種道路，實際上，他所過的却只是跟奧里維相近似的生活。像約翰·克利斯朵夫那樣人物，只是羅曼羅蘭在文藝寫作方面的一件偉大的工作，一個偉大的創作，或者說是一種偉大的嘗試吧了。

在羅曼羅蘭過去的生活裏，最為人所傳誦的，還有他跟老托爾斯泰的通信故事。這次通信，對於他的影響當然是非常重大。假使他不受到他當時那種知識分子的限制，很可以就走上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用不着再經歷那三四十年的長途跋涉了。可惜，托爾斯泰的所謂「為民衆的藝術」，在羅曼羅蘭所能理解的，只是從特權階級，從優秀的知識分子手裏，把藝術放鬆出去；一方面要與市民同樂，一方面為的喚醒市民，於是才開放藝術的特權，如是而已。所以，他要改良戲劇，建立所謂民衆戲劇，是對的；然而，他所說的民衆，不但不能擴

大到無產階級的工人，就連老托爾斯泰心目中的農民都不在羅曼羅蘭的所謂民衆以內。

而且，就是他這樣的「為民衆的藝術」的努力，也不久就被他的英雄傳和他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所打斷了。他後來，因為反對社會上的庸俗，等於就把他的藝術獻給少數的選民，優秀的知識分子的一般；這雖然是對社會庸俗的反感，却把自己造成了藝術的特權階級，藝術的貴族了。

然而，在他從事民衆戲劇的建立時候，是有過突破藝術限制的要求的，而且也會經這努力過。這種要求，這種努力，雖然被他那約翰·克利斯朵夫型的英雄主義所中斷，却也在他的這種英雄主義思想裏埋伏下一股反攻的力量，待機而動。在「約翰·克利斯朵夫」裏，那位奧里維是在一次羣衆運動裏，死在巴黎的街頭了，而真正的奧里維，我們的戰士羅曼羅蘭却在這種英雄主義的支持下，擠住了悲觀主義的重壓，渡過了一探索與徬徨——深淵，終於突破了這種英雄主義，走到無產階級的羣衆裏邊，為「這世界人類的新社會」的建立而努力，為反抗這世界人類的共同敵人法西斯而獻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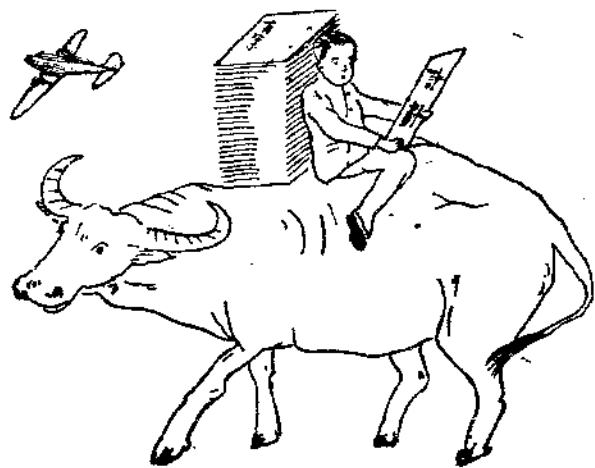
五

羅曼羅蘭死的時候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卅日，只差幾個月的時間，他沒有看見法西斯勢力的崩潰，沒有看見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等惡魔的死亡，沒有看見在法西斯鐵蹄踐踏下的人民解放，沒有看見他的祖國法蘭西的重光，這就跟中國的魯迅先生只差不到一年的時間，沒有看見中國人民的全面抗戰，沒有親自參加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同樣是人世間一種莫大的遺憾；這種遺憾會隨着對於這樣的人類解放的戰士的永遠紀念，永遠留在人世間！

四月八日夜

時代與中國

許志家作



從秦始皇厲行統一新政以來，專門以引經據古爲能事的儒家黨徒就走上了空前的惡運。幸虧陳勝吳廣之徒揭竿而起，天下大亂，他們才好像有了轉機。可惜這時的儒生已經把射御的家傳本領完全拋荒，而且起事的英雄們又已感染了輕視儒生的風氣，更使他們陷入了窘境。尤其是流氓出身的劉邦，他對一切都非常馬虎，贏得各種人的好感，對儒生却特別不給面子。在讓女人洗足時會客，已經是令人不堪；時常當面大罵豎儒，甚至于把客人的儒冠脫下來當作尿壺解手，簡直是無理取鬧有意侮辱了。不過劉邦畢竟聲勢浩大，眼見得天與人歸就要成功的了，所以儒生們仍然硬着頭皮去找他。少數人在挨罵一通之後被錄用了，但仍然坐冷板凳，儒生的一般命運依然是黯淡的。

窮則變，變則通。第一個替儒生打破僵局的是叔孫通。他對當前的遭際雖不樂觀，但他似乎決心要替儒生打開一條路。他楚冠短服，時常和流氓出身的大員們周旋，在劉邦面前，從不流露一點稱說詩書援引私人一類的儒家惡習。他似乎還在等待時機，但是跟着他苦了多年的黨徒們實在沈不住氣了，他們開始訴苦求去。這對於作爲黨魁的叔孫通的確是一個威脅。湊巧劉邦做了皇帝以後，想玩點新花樣，叔孫通抓住這個機會，馬上動員了全班人馬，還另外網羅了一些名角，自編自導的排演了一套朝儀。這本是儒家的老行當，而且又是生死關頭的通力合作，演來當然逼真。劉邦看得高興，叫那些流氓出身的文武大員們加入訓練，結果非

叔孫通之流的業績

歐陽牧堂

常滿意。劉邦快活得說：「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其實儘可知。叔孫通還乘着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破例的向劉邦爲儒生進言。他說：「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一翻成現代口語就是：「儒者不願拚命，却善幫閒。」理論加上實際，劉邦第一次明白了儒生的用處。于是叔孫通和他的黨徒們都做了官，儒生們從此有了出路。

與叔孫通後先呼應，也在劉邦面前露了一手的儒生是陸賈。他與叔孫通用心雖一，所採的戰略則不同。他用的是疲勞攻擊。他不斷的在劉邦面前稱說詩書，笑罵儘他笑罵。結果，劉邦讓步了，出題目要他寫文章。題目是「爲我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前一句明

顯的是要陸賈替他捧場，後一句則是有關詩書，非善于引古證今的儒者莫辦了。據說陸賈每奏一篇，劉邦稱善，跟着左右呼萬歲；并賜名新語，其內容精采可以想見。可惜這部書竟沒有傳下來，否則大可以供時下一般宣傳部長之流作爲頌聖範本的。這次劉邦又明白了詩書也大有用場。陸賈因此更紅了，儒生又有了一條生路。

最後露臉的壓軸戲是商山四皓。這一次是有關皇帝家務，非同小可了。

據說劉邦寵愛戚夫人，晚年想易太子，連叔孫通都勸阻無效。呂后用張良計，卑辭厚禮把劉邦所不能羅致的商山四皓請來陪侍太子。布置已畢，一天叫這四個老頭子跟太子侍宴。劉邦看見

他們一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一頗爲吃驚。他們即席發表了一篇演說，說：「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顙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這篇預先撰就的演說，儘管激昂慷慨，可是這時劉邦早就對儒生另眼看待，說說已經毫無危險了；況且後半段完全是爲太子吹牛，激頭激尾是說謊。事後，劉邦裝做很感傷的樣子，對戚夫人說：「羽翼已成，難動矣！」一下就把易太子的念頭打消了。商山四皓以後也就寂然無聞，大概是任務完成，仍然卑辭厚禮把他們送回去了。一用卑辭厚禮，就肯拚着老命，出山替人發表擬就的演說，可見過去只是家道小康，不願冒險，暫時裝腔做勢，躲進山里去

現在危險期已過，依然不甘寂寞，和叔孫通陸賈仍然是一路貨色。但是，在劉邦眼光里看起來，就大有不同。第一，因爲他們有過亡匿的表示，在老百姓眼光里已經是社會賢達，自然比業經入閣的叔孫通之流，更有左右輿論的力量。第二，四皓陪太子侍宴，儘管口里還囑囑不爲漢臣，事實上已經下水。這對於另外一些躲進山里去的儒生，是一個打擊，也是一個號召。從此不管他們怎樣，劉家的天下坐穩了，只有戚夫人和趙王如意被廢在鼓里，到死還不明白。

從劉邦的口里，豎儒變成了羽翼，儒生也由冷板凳移到了廟堂的中心，再搬進了官廷。從此儒家黨徒不僅在老百姓心目中恢復了從前的光榮，而且獨佔了幫閒要職。這之後，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只好像過河卒子，惟有向前向前了。這就是叔孫通之流的業績。

塞上五日行 胡 笛

(一) 萬愚 節出塞 動身的 前一天，在 西交民巷平 津區鐵路局 營業所買了 一張二等車 票，花費一 萬一千八百 元。聽說平 津區所轄各 路綫從四月 一日起，都 要改點，便 順便打聽了 一下第二天 開車的時間 。我們一向 相信鐵路郵 電是比較守 時刻的，所 以當晚收拾 好行裝，翌 日，太陽還 沒出來，就 從被窩中爬 起，到前門 車站趕車。

已經成了北寧、平漢、平綏以及平津路的總樞紐。我跟着人羣擠進月台，搭上平綏特快車。這是目前平綏綫唯一的一次特快車，只能到張家口，如果是要去綏遠的話，到張家口以後，還要換車到大同，再換車，才能到達包頭。平綏綫在戰前行車，由起點至終點，不過一天一宿的時間，現在却要兩天兩宿。光是平張一段，按照路局的規定，特快車上午八時十分開，下午六時廿分到達。對號入座後，站長走上列車，高喊旅客注意：「先期有座，當日站票，否則可以下車。」乍聽起來，簡直不曉得是什麼意思，等車廂中一陣擾攘過後，才知道卅一日開往張垣的列車開到沙城的時候，因為路釘被拔，當夜十時又折返北平。記者坐的這次列車，正是開出去又折了回來的，爲了座位有限，所以車站來了一個變通的辦法，讓原車的旅客對號入座，持當日車票的人，只好站立，或者下車，等第二天再走。可是人們既已上車，即使是一站票，也無可如何了，只好將就了事。這祇能怪路局沒有計劃，在萬愚節存心拿人開心！

(二) 薄霧迷漫文化城 快車雖然誤點，八時廿分才離開前門車站，可是却準時到達張家口。如果不是苛求的話，遲開十分鐘車，在中國人的時間觀念來說，還算不錯的了。從前門經東便門、朝陽門、東直門、安定門、德勝門、到西直門，環城一週，需時四十四分。這時太陽雖已從東方升起，然而一層濛濛薄霧籠罩着古城頭，陽光在撲朔迷漫中，微弱地透出一點光芒；在重慶住慣了的人們，看到了這層薄霧，並不覺得稀奇，然而，在古城裏，白霧却是罕有，人們在霧氣中，心情總是結着一個結而不能解脫。車過清華園時，新南院教授住宅的亭台樓閣和園中大禮堂的拱形屋頂，凸立在排列整齊的一層層洋房中，從車窗裏，一眼望上去，雖然各式建築有點褪了色，但是戰前清華園的景象，並沒有變樣，依然亭亭玉立，令人讚美仰慕。在清華園車站稍停片刻，繼續向塞上輪轉。四周眼界中一片荒涼，滿目滄桑，不是傾斜的碉堡，就是圍作一堆的鐵絲網。

(三) 南口古蹟 車站上，環視週圍，山峯起伏，長城蜿蜒其上。山間築有許多堡壘，每壘必有鐵絲網盤繞，馳道其間，野草蔓生。哨兵手持衝鋒槍，身穿皮大衣，往來漫步，讓一個懷古的人，從秦築長城想到明修邊牆，舉目再看如今，就彷彿有一幅圖畫懸掛山頭。車站進口處，有一光緒丙午夏季一陳昭常題「南口車站」等字，一個外國人好奇地掏出照像機，攝取了這富有歷史意義的鏡頭。站上，油條燒餅小販的叫賣聲齊起。僅有的水菓是梨，用破舊的草紙，糊成小包，包裝大小五梨，售價二千元。另外還有煮雞蛋，每千元四個。一般物價似乎不比北平便宜，比方包子每個二百元，而北平也不過百五十元，其他類推。車站的對面，牆壁上滿是標語，如：「交通建國」、「一軍民一條心」、「扒路就是土匪」等等。從南口到康莊，向例是

字樣。特快列車有頭二等與飯車，都是日式，尤以飯車更是窗明几淨，桌上有白色台布掩蓋，每合置綠色冬草一盆。從嘈雜與擁擠的客車中，走進飯車，好像是到了另外一個世界。飯車中的膳食，由路局運輸處客車事務所主辦，內分早午兩餐。早餐有麥片湯一盆、煎雞蛋兩個、火腿一片、麵包四塊、紅茶一杯，另附方糖兩塊，計洋三千五百元。午餐兩菜（一葷一素）一湯，米飯管飽吃，計洋四千五百元，還算便宜。另外有茶票，每票五百元，限喝兩杯。在飯車上，聽一位服務生說：平張客車每日共有四次，九與十次特快車每晨對開，行車約十小時許，六十一與六十二次普通客車每晨亦對開，行車約十三小時許，其他就是貨車了。談到行車的效率，在平原上每時可行卅公里，橋樑處僅行五公里，整個平綏綫上原有的鋼骨水泥的橋樑均已破壞，現行的橋樑都是用枕木臨時搭的，每逢開春的時候，山洪爆發，這種枕木搭成的橋樑就被山水沖毀，最近柴溝堡的橋樑沖毀，以致平綏西段不能通車，就是一例。

這個問題，已經引起利用平綫路交通工具的人們的最大隱憂，因為平綫路通車後，雖然不能直達，但是可以分成三段行駛，計有平張段、張同段和同包段。然而在春天到來的時候，山上積雪融化，匯聚成洪水，向原野發發，如果在山水來到之前，沿綫橋樑不能架設完備，一般估計，將來行車，勢將分段通車，而不能直達，如最近西段不能由張垣通到大同，就是一例。不久以前，只有兩端的平張與同綫段通車，今後為了確保全綫通車，路局正在用盡一切力量，架設橋樑，但是在山洪爆發之前，不能確保完成，即使是路局最高負責人員也不敢保證，因為問題的癥結不在交通，而在軍事。

(四) 東園無花菓
東園本來是出產水菓的地方，但是這裏僅留下滿畦的枯枝爛樹。柿子樹上已經沒有花菓，桃花尚在含苞未放，只有低矮的石房中走出了三五鄉童，端着木盤叫賣核桃，每千元廿顆。我伸手買進無花菓，打開堅硬的包皮，才發覺核心發霉，徒呼上當不止。

山谷中尚有積雪。車廂中坐着兩位行總的外籍職員，架起了望遠鏡，高呼：

“SNOW IS SNOW”。其實，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倒不覺得春雪稀奇，祇認為外國人有點少見多怪了！

(五) 居庸關捉迷藏
居庸關是歷史上多麼引人側目的關山要隘。當抗戰初起時，日本爲了完成武力征服中國的迷夢，曾經抽調關東軍的最精銳部隊板垣師團到這裏來，却被譽爲「中國板垣師團」的湯恩伯軍殲滅過，而今，居庸關又成了長城綫上唯一的塞上關口。遠在山腰間僅有的一角平地上，有數十個軍人持槍演習捉迷藏。凝目注視，不禁今昔之感。車行快速，轉眼間從山巒中轉過了另一角，但聞「刷」的一聲，一列榮譽軍人的專車急駛過去。這時，車停在黃土碎石夾雜的路軌上。

(六) 向楊五郎致敬
車頭前面正對着「五桂頭山洞」，左側有一石洞通到小廟，雕樑畫棟，古色古香。廟上看不到煙火繚繞。從車窗望去，只見一座破碎的泥像傾斜在石洞中。對廟停車，表示敬意，已成慣例，在交通規則中並無明文規定。

車停一分鐘，繼續行駛，一位操着下江口音的人還在打聽着相傳已久的古典，但是沒有一個人知道究竟，只是以訛傳訛。這裏除了五郎廟，還有六郎廟，大概與「楊六郎把守山關口」有瓜葛，這個古典只有留在三國演義與封神榜一類書中去找根據，在正史中恐怕還是一篇覆案的文章。

(七) 詹天佑的臉黑了
車到青龍橋，時已十一點廿三分，照例火車頭要在站上加水。乘此空隙，下車眺望，四面環山，長城矗立于羣山險峻的巒隘間；山足下，詹天佑的銅像依然屹立，只是臉比戰前黑了，讓人聯想到也許是煤煙薰染，陽光暴曬，兵連禍結，而有以致之。站在這鐵路史上偉大的中國工程師的銅像前，撫今思昔，不禁爲之黯然！

離開青龍橋不久，即至「石佛寺山洞」。列車從另外一個山洞穿駛，原來石佛寺山洞已成古蹟，日本人又在鄰近地方，重建了現行的山洞。等到穿過最後而且是

近康莊，已是一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八) 到「康莊」分道揚鑣
康莊是一個分界綫。從交通上說：原用兩輛火車頭推行，到此，專門用來行駛南口與康莊間的大火車頭摘下了掛鈎，拉着回程的列車向東進發；出塞的列車則繼續在黃土沙漠中爬行。

從軍政區劃上說：押車的中央憲兵，也跟着大火車頭折向東行，另外換上一批油膩滿身的偵察隊。服式也改變了，憲兵穿的是黃呢軍裝，頭帶鋼盔；偵察隊穿着灰布軍服，手槍出套掛在身邊，隨時都在警戒。乘客重新被檢查一次，看上去好像很認真，其實只要會講幾句綫遠話，一切還是可以通融的。

的綫靖區；康莊以東，原屬十一戰區，現在駐紮的部隊是胡宗南所部九十四軍的防區，隸屬孫連仲的綫靖區。這兩個綫靖區同由北平行轅管轄，但兩個地區裏的作風，因爲首長不同而大相逕庭。比方說：在康莊以東的行政以及經濟系統等等，與內地尚沒有顯著的差別，然而在康莊以西，就完全兩樣，自成一系統。

康莊車站旁的路軌上停放着一列列的鐵甲車，升火待發。鐵甲車背後一堵牆上，塗着幾個煙黑色的大字：「擁護口口領袖蔣主席」。黑字底下有紅邊，並且在「擁護」與「領袖」之間，空着兩個方塊黑印，走近去仔細一看，隱隱約約有一「人民」兩字出現，於是才領會到，在這堵牆上，有人用一種標語塗改了另一種標語。(四月九日寄)

再者，康莊以西，舊屬十二戰區，就是現在傳作義

時與文週刊

發行人 程博洪

編輯者 時與文週刊編輯部

經理部 上海牯嶺路三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內政部備案登記證京警滬字第四一八號

怡豐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實業
扶助

服務
社會

總行 重慶民生路二府衙二號

分行 上海江西路四六七號
電話 二一〇二〇號

宏豐企業公司

總公司 上海廣東路五十一號
電話 一四五三一五

承辦 進出口業務

分公司 漢口聯保里五號
重慶林森路一二七號

上海駁運公司

地點：上海四川中路一二五弄二〇號
電話：一三二二二四

南榮記 報關行

地址：上海廣東路一二二號
電話：一〇四一八號

天隆被單



經濟實惠 美觀大方

天隆染織廠出品

廠址：上海廣東路一二二號
電話：一〇四一八號

附冊大

政府改組後之「施政方針」馬敘倫

政府儼然改組了.....程程

中國民族工業的

國內市場問題.....李紫翔

新財政與舊財政.....伍丹戈

7

關於男女分校.....碧遙

何為美.....周繼善

試論英雄.....臧克家

過河小卒和殺盡芸香.....于冰

悲哀.....魏金枝

今日張家口.....胡笛

漫畫.....葉苗·張文元



政府改組後之「施政方針」

馬敘倫

執政的國民黨，爲了要求自身的民主化，和適合美國應付國際的需要，而改組政府了。這次改組的政府有青年黨、民主社會黨的正式參加，自然可以「昭告」世界，這不是一黨專政或一黨訓政的政府，而是民主的聯合政府了。可是，牠的立法院院長孫科先生卻指明牠是「多黨訓政」；美國紐約時報說牠並不符合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因爲新政府裏並不包含國民黨外兩大政黨——民主同盟和共產黨。

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早經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底下，自然是一風馬牛不相及了；孫先生說是一多黨訓政，怕還是一善頌善禱。因爲，果然是一多黨訓政，該地位平等，不分「主從」的，這次改組的政府，不可諱言的是國民黨爲主，青年黨兩黨爲從。不錯，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前年十二月十五日宣布對華政策裏曾經這樣說過：「美國政府知悉中國現行國民政府係屬「一黨政府」，並相信該政府如能擴大範圍容納其他各黨各派……」那末這是符合社會民主主義的。不過並不包含國民黨外兩大政黨——民主同盟和共產黨。

改組的新政府要出場了，他的前台鑼鼓，是「施政方針」十二條，這十二條「施政方針」，是他們三黨協定的。

「第一、改組後之國民政府以和平建國綱領爲施政之準繩，由參加之各黨派及社會賢達共同負責，完成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我們還記得的，「和平建國綱領」是政協各黨各派共同議定的，現在卻賜開了政協裏面「兩大政黨」，是不是還「符合政協的決定」？查和平建國綱領則第二項：「全國力量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團結一致，建設統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國。」現在，顯然地不符合了。可是，仍舊拿牠來做「施政之準繩」，這好像「子產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有點滑稽。

「第二、以「政治民主化」及「軍隊國家化」之原則爲各黨派合作之基礎，在此共同認識之下，力謀政治上之進步與國家之安定。」查和平建國綱領則第三項：「確認蔣主席所倡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爲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現在，兩個有軍隊的黨正打得熱鬧，如果新政府開幕便來恢復和談停止戰爭，那倒很有意思的，否則，青年黨兩黨是沒有武力的呀！這條是不是青民兩黨要叫國民黨把軍隊交出來共同管理？

「第三、爲促進世界和平，擁護聯合國憲章起見，中國外交政策，應

對各友邦一律平等親善，無所偏倚。——我們曉得現在各友邦中在中國有特殊權利的是美國，如果「一律平等親善，無所偏倚」，那末，不是把美國在中國的特殊權利取消，就要把這種特殊權利再奉送給蘇、英、法……；方才符合這條的規定。取消美國在中國的特殊權利，國民黨願意嗎？青民兩黨辦得到嗎？反過來，再把這種特殊權利送給蘇、英、法……；我們老百姓可不願意。

「第四、中共問題仍以政治解決爲基本方針，只須中共願意和平，鐵路交通完全恢復，政府即以政治方法，謀取和平統一。」對「中共問題」仍以政治解決爲基本方針，我們聽得耳也起繭了，事實上戰場開闢得越廣大了，中共不願意和平，毛澤東不會得上重慶了，一年多來，誰要和平誰不要和平，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現在再講這一套，引不起任何方面的注意吧！至於「鐵路交通完全恢復」，不要說關內關外這樣長的交通綫，就是津浦一段，打上多少時候了，現在怎樣？天曉得將來怎樣？政府可以寫張字據給我們老百姓嗎？照我們在報上看到的，好像潮水來潮水去的戰爭，拖上幾月，決無問題，拖上幾年，也許可能，但是老百姓已經「奄奄一息」了！看報上報告的各地（不是戰地）情形，人民因爲受了十年戰爭的影響，對於戰爭的感覺，可說是一淪肌浹膚了，對於戰爭的情緒，可說是一痛心泣血了，只要隨便抓一個老百姓來問，他會天真而肯定地答復你一句「早一刻停戰好一刻」。我們再看看各地人民激變的情形，如果戰事再延長下去，人民都要變做好戰者的敵人了。不要說我有辦法可以鎮壓的，在高漲的潮頭裏幾卷土，不但見不得功效，還激得他往上冒過來。我們還要看各地社會種種騷動的現象，都是人民心理要找出路的表現，我們不要那些弑父殺兄的，只認爲他們個人的道德問題，不要一切貪官污吏看他們個人的缺德，我們要認識這是社會全面要崩潰的一股兆。換句話說，大亂就要來臨。說得再深刻點，這是革命的「前驅」。

在這樣的情形下面，高談「中共問題仍以政治解決爲基本方針，只須中共願意和平，鐵路交通完全恢復，政府即以政治方法謀取和平統一」，不但「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簡直是「掩耳盜鈴」，自己騙自己。不想國民黨一黨不覺悟，青民兩黨還撲進火線裏去。民社黨領袖張君勳說：蔣主席答應只要津浦、平漢兩路交通恢復就可講和，不要說白紙黑字應該比「諾言」來得強，就從事實方面說，就是津浦、平漢兩路交通如果一年不

得恢復，民青兩黨贊成再打一年嗎？如果兩年不得恢復，民青兩黨贊成再打兩年嗎？假使民青兩黨竟是這樣的見解，那就替老虎生上翼子了。人民對民青兩黨的觀感怎樣，兩黨應該覺得的。

「第五、根據憲法規定之精神，提前試行行政院負責制，行政院應依國府委員會之決策，負執行全責，以符合於有權有責之原則。立法院之職權，應同樣尊重，行政當局遇有提案，應出席立法院說明，以保行政與立法之聯繫。」照修正的國民政府組織法第十五條：「……國民政府主席對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五院院長對國民政府主席負責。」現在雖然把「國民政府主席對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等字刪除，但是主席更不向任何一方負責了！五院院長裏的行政院院長既不向立法院負責，這種「行政院負責制」是什麼意味？

「第六、行憲以前行政院院長之人選，國民政府主席在提出任用時，應先徵求各黨之同意。」這不過一句「冠冕堂皇」的話吧，各黨有否決權嗎？不徵求同意或徵求而不同意，竟提出了，民青兩黨有什麼有效的辦法？退出，捨不得，不退出，除了服從有什麼辦法？

「第七、對於各省行政應求軍民分治與因地制宜之原則，在法制上與人事上均作澈底之檢討與改革，使各省政府能充分發揮其效能。」軍民分治和因地制宜並列為原則，這不是抵消了？在目前戰爭正在開展的情形底下，那一省不可以援用因地制宜的原則？像甘肅、新疆、寧夏等更不消說得。

「第八、凡因調政需要而頒布設立之法制與機關，在國民政府改組後應予廢止或裁撤。」這條算是很合人民要求的，但像保甲制度啦，警管區制啦……是不是會轉移一種理由而保存着？

「第九、澈底整理稅制及財政，簡化稽征手續，減少賦稅種類及附加稅，以減輕人民之負擔。」自然，這也是人民希望的，但在戰爭正開展的情形底下，有無可能？依我們的經驗，不是空心湯糲，就是變更名目；況且財政一項，老實說，不是人民力量抬頭，就沒有改良的希望。我們看了上海有了正式參議會以後，老百姓的負擔減輕了沒有？所以還得有真正的人民力量才行。

「第十、嚴格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嚴禁非法之逮捕與干涉，其因維持社會秩序避免緊急危難，而必須予以限制者，其法律應由國民政府委員會通過之。」這一條和第七條一樣，都是自己已抵消了。因為「維持社會秩序，避免緊急危難」，都可以主觀的觀察而

決定的。拿「二九慘案」來說，分明是某方有意造成的，後來市政府却拿「維持社會秩序」來干涉梁仁達的出殯了。如果政府方面的某一觀點不矯正，在牠眼裏看出來，人民的一切，都可認為「因維持社會秩序避免緊急危難而必須予以限制者」，除了被牠控制的一部分。

在「政治民主化」的號召底下，人民身體、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基本自由不該受限制的。即像集會、結社，頂多限制他要報告一下行政機關，行政機關絕對不該有核准不核准的權。因為這是妨害自由的。我們以為照第八條的意思，應該把關於妨害自由的法令根本取消，像集會、出版、結社要登記而經核准，集會要由警察監視的法令或辦法，沒有繼續存在的理由。想不到改組後之政府施政方針卻先規定這一套。至於「其法律應由國民政府委員會通過之」，請問國民政府委員會裏民青兩黨和所謂「社會賢達」的委員是否多數？如果少數，有否決權嗎？如果既是少數又無否決權，有什麼辦法阻止他通過？

「第十一、今後所有舉辦之外債，應指定專為穩定並且改善人民生活及生產建設之用。」據報上說，「穩定」兩個字是國民黨方面加的，那末就大有意思了。「穩定」寫在「並改善人民生活及生產建設之用」上面，這「穩定」兩個字的作用便另有著落了。我們不是常見「穩定金融」這樣的一個詞兒？那末，「穩定金融」也是「穩定」「人民生活」的呀！這樣新政府成立了，美國就可以借款「五億美元」，或更可以再借「十億美元」，那末，打仗又不愁沒錢了，民青兩黨的幫忙這點真可感謝哩。因為不但可以借款，借款用途也可以合法化了。

「第十二、各省市縣之參議會或臨時參議會，儘量由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共同參加，各省地方政府亦應本惟才惟賢之旨，由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參加。」這裏的各黨派，中共自然不消說沒有這個資格了；就是民主同盟也該除外，因為他曾經聲明不承認憲法。那末，一切民主團體，也都該除外，同一理由呀。這樣，便剩了中心的三黨了。「無黨派」三個字是陪襯陪襯吧了，因為無黨無派的是不是針對大多數的老百姓？他們有權利當選嗎？

我們以為如果政協決議的「和平建國綱領」還有效的話，局面就不是這樣的了。就在這樣的新局面裏，只要遵守政協決議的「和平建國綱領」，改組後政府施政之方針就不須再要這十二條了。現在這一套，實際點說，不過民青兩黨自己障目的扇子，然而老百姓厭惡戰爭，厭惡現在的一切，我們且看他們做來，是不是不出我們所料的一切一切。

政府儼然改組了

程 程

一

此番政府改組之先，正當拉拉扯扯極其緊張而微妙的時際，曾經流傳過一段佳話，至今猶值得我們欣賞。北平的梁秋水張東蓀兩位先生聽說民社黨的國府委員名單中，列有伍憲子先生和海門先生，因念與他倆「有舊」，便聯名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提出兩類問題，探究他們下海之後的態度。這兩類問題，其一是關於立刻停戰恢復和平的，另一是關於保障人權的（見四月十一日上海各報）。後據大公報記者轉述海門先生的表示，是：「絕不作任何答覆，免傷大家感情」（十二日該報）。從這句話來研究胡先生的為人，可知他倒還是一個忠厚長者。要知道梁張兩氏既提那些不知趣的問題，他們早就不把私人感情，即所謂「有舊」之一「舊」，留在腦際了；然而胡先生偏又如此念舊，不正是俗話所說的「以德報怨」麼？我們試一體貼胡先生的處境：堅持和平和人權吧，那便只能斷然拒絕任官，安心做個「布衣」；不再堅持下去吧，又與「平素言行不甚一貫」（梁張原函用語），還不得不編造些理由，為自己的行徑辯釋，豈不難透難透？於是成了一位以德報怨的忠厚長者。

胡先生這段佳話，比起數月前青年黨的李璜先生自動失蹤逃避國大一舉，前後輝映，不分軒輊，同等的壯烈，同等的偉大。一個是忍辱吞聲而踏進國府，一個是銷聲歛跡而迴避國大，走的雖是兩條路，畢竟在終點上碰了頭，而且是一樣犧牲過私情或個人名位的，成全了黨，成全了一憲政。兩公受祿，的確可以無愧了。

答，那末我們就不妨越俎代庖，代勞一次。而且是赤裸裸的。

先說和平。新政府的「施政方針」對中共問題規定得曲折其辭，「仍以政治解決為基本方針」，可是要在「鐵路交通完全恢復」，而「中共願意和平」的時節才能實行。這是以戰爭求和平的講法，也就是以軍事手段招致「政治解決」的講法。這類講法，本不新奇，歷來盛行於國際間，稱為「以戰止戰」。但是這照例祇該出之於被逼而抵禦的一方，如果掛在攻擊者的口邊，旁人聽來，總覺得不甚順暢。報載青年黨又吸收了將級校級軍官多少多少，要求參加軍事機構，然則新政府成立之後，豈不搞成聯黨伐吳了麼？還說什麼立刻停戰呢？

內戰既繼續下去，人權便是中國人民的奢侈品。大江以北，人民的生命尚且朝不保夕，怎有閒情高談這個自由那個自由？須知「自由」究竟是附屬於生命的，第一步是保命，第二步是安命，第三步才能說到自由。再看後方，四項諾言早已成為四項謊言。「施政方針」的第十條雖又提到「嚴格保障」人民的自由，「嚴禁非法之逮捕與干涉」；但在凡百施政都向前綫看齊之際，聯黨伐吳的新政府仍得根據「維持社會秩序，避免緊急危機」的但書，限制人民的自由，化非法為合法的。在同一條文裏，「嚴格保障……」的下文，立刻出現「必須予以限制」的字樣，可見三黨壓根兒不把「自由」看在眼里，祇是急于簽字，匆匆登場，連門面都不及粉刷了。

門面的草率修飾還不止「自由」之一端，最

二

發噤的，莫過於有關國府主席向誰負責的爭執。這一項爭執不前不後，恰好發生在政府宣佈改組的後一日，真叫我們捧腹不置。訓政依然是訓政，這一層不多爭執；其次，國民政府新組織法是由國民黨中常會修正通過的，這也無可爭論；國家元首是第一字號的「選任一官」，也依然要從國民黨裏「選」出，必如此，「法統」才算有個着落；國民黨既產生國府主席，那末國府主席就向國民黨負責，這不是很合邏輯很合事理的嗎？然而民青兩黨偏不承認這最後一點，然則它們不妨另有兩種講法。第一種，主席向三黨負責，因為新政府是三黨政府；但是我們要問，是否要憑空再創造一個類似三黨聯席會議的機構呢？如果是的，牠的法律基礎又到那裏去找，難道真是黨權神授（Divine Right）？若是神授，那就不必講法律了。那種講法，民青兩黨也明知其講不通，因為那是類似姨太太索取結婚證書的講法，總算還有自知之明，不會脫出口來。第二種，乾脆不提主席負責一節，把原有條文刪却了事；這倒是省事易辦的，好比姨太太請求莫再提她丫頭出身的來歷。所以歸究起來，民青兩黨所爭的法律問題，也只是個面子問題，況且並非胆大妄為積極地要求漂亮面子，僅是有分有寸消極地要求起碼面子，不是要搽粉，只是要去垢，可以原諒，可以考慮，甚而可以批准。

大公報對政局懷着一種「消極的看法」，總覺得政府應該有一變，一變或許比不變好些；甚且慨嘆訓政失敗的緣因，竟說「訓政者與被訓政者都不無關係」；進一步又想駁翻法統權威孫院長的一多黨訓政一論，說：「若說這改組的變動乃是多黨訓政，與擴大民主基礎不相干，只是

又給人民多請來幾位拿教鞭的師傅，這不但在人民的心緒上要有不同的感覺，恐怕準備參加政府的幾位先生也不見得就心安理得吧？（見該報四月十四社論：「是多黨訓政嗎？」）

訓政一說是辯駁不倒的了，就連大公報本身（四月十九日社論：「國民政府宣布改組」）後來也都承認「政府的根基仍然是訓政」。剩下來的問題祇是：改組的變動究與「擴大民主基礎」相干或不相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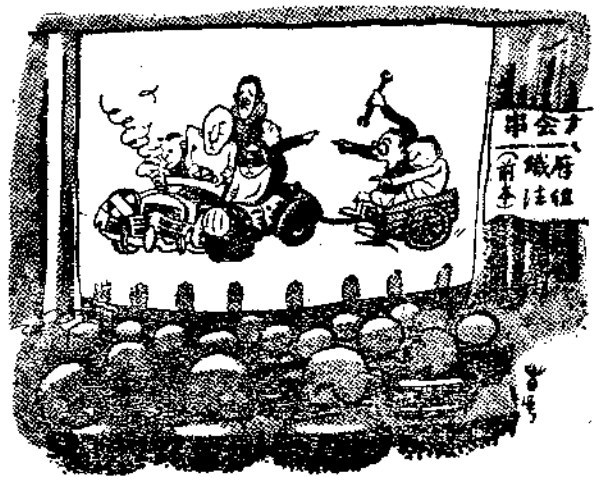
我說：恐怕不相干。依我對民主政治一點粗淺的瞭解，「民主基礎的擴大」總須針對三個方向，一是人權的擴大，二是民權的擴大，即民意機構的加強，亦即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假若上述兩點都不能辦到，至少也得要求些微反獨裁的影子投射到政府裏去，這也就是說：新政府裏的新份子須對舊份子發生一點起碼的箝制作用。上說三點，全都做到一些，固可說是「民主基礎的擴大」，即三者之中有一項獲有寸進，我也還肯承認那是「走向民主」的。這顯然是無可再低的民主低調，低得可悲極了。

在聯黨伐異之下，人權之受蹂躪，乃是必然的。這一點，上文已經說清楚了。這裏還想補充一點。我們看中國，不能專看上海或京滬區。比起其他地方來，這裏真是地獄裏的天堂，好似蘇州的名勝某一漆黑山洞中的「一綫天」，只有在這裏還透出一綫微弱的光亮，呼吸到一絲自由氣息。歸究此中原因，我們實托庇于國際觀瞻或地方環境的複雜性，才逼使政府不便輕舉妄動。然而縱以上海而論，人權之受蹂躪，也就够慘的了。上海發生重大事情，例可跑往南京交涉，中樞也例難置之不理；若是別處，則把全部責任盡向地方政府推諉。最近民主同盟因有會員三人在西安瀋陽被捕，特派人到南京去交涉釋放，但中樞却拒不討論，一切推卸給地方政府（法國新聞社南京四月十七日電）。這是現成的一例。退而求其次，看看政治組織。大家都知道我

們壓根兒沒有民意機構（至于國民參政會，論其組織、職權、過去發生的效果，都與真正民意機關截然不同），遑論民意機構的擴大？我們的政治，也至今沒有制度化，所以更談不上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這是清清楚楚的事情，毋庸多加說明。

於是祇得再退一步。民青兩黨參加政府之後，是否可能對老大的國民黨發生些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作用呢？如果是的，人民也的確可望在三黨的對峙和相互監視的夾縫里，多少討得一點好處，或免掉一些壞處。然而這就不能缺乏一個前提：民青兩黨必須站在人民的立場，為人民的利益多說幾句逆耳的話，也就是對老大的統治集團多說幾句逆耳的話。我們姑且不談新政府的議決和投票程序是否給了兩小黨足夠的發言力量，首先只要研究一下它們參加政府的動機，就不免要寒心起來。從一年來片斷却又連續的新聞裏，我們看到兩黨大部份人士對權位的極度飢渴，飢渴得那般坦率，那般毫不虛偽。前一陣周濟道先生在青年黨裏發動的分裂運動和最近民社黨裏的搶官運動，無獨有偶，都把兩黨自己的陰私反映得淋漓盡致，點滴不漏。兩小黨所亟需者為權位，而國民黨所擁有者也就是權位。前者已臨飢不擇食的境地，後者正可施以小惠而換取豐厚的酬價。況且現在人民最感受威脅的，是內戰直接或間接所加的禍害（傷亡與經濟困迫），可是按照上文的說明，兩小黨參加政府時，已簽字承諾內戰的存在和繼續，那末，要牠們為人民的利益多說幾句幫忙的話，對先進的統治集團多說幾句逆耳的話，豈不等於要牠們自掘耳光？總之，兩小黨的攜手同進，委實是天作之合，活生生一對學生兄弟，牠們嚮望擠進統治集團之不暇，還會「開倒車」，向人民願盼一眼嗎？未必吧，未必。

人權的束縛，民權的束縛，使積極意義的民主政治無由存在，於是寄一綫希望於消極意義的民主，祇求民青兩黨發揮少許制衡的力量，壓低



精采演出 葉苗作

獨裁者的氣餒，讓人民檢拾少許便宜；然而近景如此清楚，我們實不敢稍存幻想。孫中山先生會說中國是個「次殖民地」。如今中國弱小子民的頭頂上，除原有的老大頑強的統治集團外，又添了兩批投機新貴，也可稱得「次子民」了。參加政府的幾位新貴是否因而「心安理得」，我們無從探悉。若論「次子民」的「心情」，那實在一點也「變好」不了；不好便不好，強說不好為好，豈不成了奴隸又兼奴才，成了阿Q？

三

自北伐告一段落，國民黨在南京站住以後，其鞏固政權和擴大獨裁基礎的方法，一一列舉出來，計有四種，即：一、武力解決，二、利益引誘，三、分化，四、同化。這四種方法，在對付敵人之時，或採擇一種，或兼採數種；在兼採的場合，或同時做去，或分先後，務求其相輔相成；有時還能採擇了一種而兼收他種之效。其運用之妙，是真正存乎一心的。至於參考資料，一為敵情，二為我情，三為周遭環境。

這恐怕要詳細說明才好。武力解決在兩類情形之下用得最多，要末是對方力量薄弱得容易攻破；要末是對方威脅政權太甚，而另外三種方法却又一概用不通。抗戰前國民黨內部的許多內戰屬於前類，大體講來，都得到有利於南京的解決。抗戰後的對付共產黨，則屬於後一類；共黨簡直是個死敵，既不能分化，又談不上同化，若以利益誘之，估量起來却要損及政權的根本，所以軍事上雖無把握，也還是支撐一時再說，祇望周遭環境轉為有利（外國的援助和敵方外圍之來歸）。抗戰前許多內戰，其破壞性還不怎樣嚇人，加於人民的禍害也去今日遠甚，而且當時與南京為敵的又是一種更腐敗更落後的力量，故從歷史發展的觀點去看，那些內戰實還帶有幾分進步意味，不幸各次戰爭的結果每都是獨裁基礎的擴大，成為以暴易暴的局面，到最後剩下共產黨是個死敵，看來便是打它不垮，而人民也都深惡這為禍至烈的內戰。

在武力解決的場合，時常可兼用利益引誘的方法，分化對方，而收加速武力解決之效。這利益引誘的方法可以用於使用武力之前，亦可用在其後。國民黨內部，就實力說，原是個多頭分割局面，何以終能大致一統了呢？這除了南京是個中央政府所在地，擁有許多便利之外，猶得力於上述方法的運用，或離間兩個以上的敵人，使其相互傾軋，坐待漁利；或以利益引誘敵方內部的不穩份子，使其本身因分化而力量削弱。好在中央政府的勳位利祿，都是利益引誘的良好工具，只要時機成熟，就可以「虛位以待」。

可是一虛位以待，也有其限度，即不能影響到獨裁政權的根本。要「虛位以待」，而兼要保證獨裁政權維持於不墜，最有功效的方法，莫過於發揮同化力量。惟有這一項，國民黨的確上承了漢民族的偉大傳統。試看一統之後的國民黨的一幫上層人物，有幾個不是從前多少多少反一統的？發揮同化力量的結果，往往是吸收了人物，却破壞了人物的原有根基，使其服服貼貼為我所

用。一到這種境界，所謂同化亦就是奴化了。抗戰勝利以還，國民黨又由「攘外」走回「安內」的老路，其間經政協以至今日之改組政府，前前後後維護政權的方法可以歸結為：（一）以武力打擊中共，那是死敵；（二）分化心目中中共之外圍，促成民盟之兩度分裂；（三）利誘民青兩黨入京，進而同化之。

政府的改組，看似國民黨開放政權分割政權，實際上適足以奴化友黨而達到維護政權鞏固政權的目的。這又是相反相成的道理，很妙很妙的。

四

籠絡民青兩黨的用意，尙不止上述的一些，更要緊的毋寧還是為了求得美國的援助。美國退出中國內爭的調人地位之後，物資或財政援華便有一個中斷時期；但是觀察美國全面外交最近的動向，似不難再把那種援助挽回。記得馬歇爾離華之時，曾以春秋筆法，對中國各方面清清楚楚褒貶了一通，而且在皮面上看，又把褒貶鋪陳得非常勻稱，以示其公正。政府若要挽回美國的援助，就得遵照美方的條諭下些功夫，這固然為了自己，同時也是體察到美國的隱慮，必須為其中斷的援華政策架一頂橋，好讓她「心安理得」，平穩穩走來。所謂新政府，就是這末一頂橋。

馬歇爾的貶斥針對兩個方面：國民黨的反動份子和共產黨的主戰派。馬歇爾的褒揚也針對兩個方面：擁護「憲政」的政黨和國民黨的「自由份子」。所以新政府除掉容納民青兩黨和若干「社會賢達」之外，在國民黨裏又選出了以張羣先生為領袖的一幫人物。蔣主席在國民黨中常會裏提出五院院長及國府委員名單時，就首先聲明：「本黨府委等人選，應儘可能於見解相合且更能密切合作的同志中推選之」（見四月十八日大公報南京電訊）。於是這張名單裏除安置黨內三數元老之外，餘者盡是出口成文的談士。真正磨擦的各系幹部，祇得埋沒於幕後和下層裏去了。

近年在論政者中間流行一種舍本逐末的講法

，無以名之，名為「王牌論」。一般的錯覺，以為好戲演在後面，殊不知今日政事的癥結在於政策而不在於人，不在於王牌。許多人不明瞭這一點，遂一口咬定台上的不好，並寄希望於台下之人。孔在台上時，被人臭罵，下台之後，追究其罪惡的人立刻少了許多；宋上台前，多少人當他一顆「感星」，而做了行政院長後，又是如何一副情景？罵罵捧捧還不要緊；人們看錯了癥結所在，縱容了錯誤的政策，才真是危險。要說王牌，國民黨擁有諸多王牌，那還了得？還會搞成今日之破壞局面？須知太上王牌，自來就穩坐不動，祇在調遣這個，指使那個，執行他所鑄定的政策。為什麼「王牌論」者祇看王牌之末，而不看王牌之本呢？

以張羣先生為首的這一幫人，因此處限於篇幅，不能詳為介紹了。簡略言之，這一系的官僚結合有一段不短的歷史，肇基於北洋軍閥時代；但在國民黨的發展史中却是投効較遲的，死力實得最少而便宜檢得最多。其長處，善於察顏觀色，迎合時勢；又吸收了一批「自由學人」，凡遇對上上條陳，對下下條諭，都能在表面文章上言之成理，往往較之磨拳擦掌的幹部派更能點中「寡人」心竅，因此也就深為制服份子（軍裝的和中山裝的）所不喜。他們如果活在英美的民主國家，的確可望磨煉出一輩漂亮人物來，無奈中國另是一片土，此時斷乎找不着他們的用文之地。前任本是個「理財家」，可是在大雨傾盆之下，却移交下來一柄破雨傘，眼見自己也要滿身淋漓，怎不叫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套用世紀評論第十五期社論「行政院的改組」中的警句）。

總結本文：新政府產生之後，人民莫想沾得半點好處；若竟因「自由份子」的抬頭而重新招來美國的「援助」，則人民更會在長期內戰中遭遇慘重的犧牲。至於延攬民青兩黨參加政府，實是國民黨一貫策略的運用，用以幫助政權之維繫的，所以也與中國的民主前途扯不上半點關係。如果竟對人民昭告，這是向民主邁進了一步，那便等於對牛馬彈琴，人民不靈。

中國民族工業的國內市場問題

—— 李紫翔 ——

市場的大小和有無，是一國工業的興衰存亡的基本問題。現在發生了一個有趣的對照，我國工業是落後而又非常殘破的，美國工業是最前進而又非常繁榮的，可是都遇到了一個決定性的市場問題的大難關。所不同的，美國工業的市場，是怎樣向國外擴張及怎樣擴張至最大限度的問題，假如地球上沒有市場存在的話，美國也要以財政、外交及軍事的巨大力量，佔為己有。我國工業的市場，却主要是國內問題。這個國內市場問題，一方面是人民購買力繼續急遽的降低，和內戰範圍的不斷擴大，所形成的市場縮小；另一方面是外國貨，特別是美國貨大量的輸入，侵佔了縮小中的大部市場問題。市場的內部縮小，和外貨的侵佔，已使殘破的民族工業，不復無法恢復，即減產停工的苟延殘喘，亦已到了能否繼續生存的關頭了。所以我國工業雖不可和美國工業作任何的比擬，但却遇到了同樣的市場問題，而我們民族工業的國內市場，又和美國擴張國外市場有了因果關係。

我國的民族工業，原是在外貨開關的國內市場之基礎上樹植起來的。同時，國內市場上的外貨壓力之增加或減少，也主要地決定了民族工業的興盛或衰廢。前世紀九十年代前後，外貨的輸入，已由鴉片、香料及軍火等物品，進到民生日用的工業產品；如洋布洋紗的輸入價值，年達三四千萬兩，就為我國樹植製造工業供給了一個前提條件。可是接着准許外人在華設廠的馬關條約簽訂後，即在國內市場的逐年擴大中，外貨的直接輸入，和外廠的在華製造，亦使民族工業遭受雙管齊下的夾攻；艱困挫敗，即隨民族工業的初生以俱來。我們在考察我國工業發展史時，即可知道變革政治形態的辛亥革命，雖是接受現代文化影響的直接結果，可是對於民族工業並未發生怎樣值得重視的後果。反是第一次歐洲大戰，給帶來了第一個空前的黃金時代。這使我們在歷史的比較研究上，得到了一個深刻的意義的顯示，即證明外貨退出國內市場所起的作用，遠比辛亥革命的影響，直接而巨大。所以等到歐戰結束，外貨捲土重來，一時蓬勃發展的民族工業，立即曇花一現似的轉入蕭條敗落了。再一個值得記住的教訓，即是此次世界大戰對於我民族工業之正反兩面的作用。此次大戰，我國是直接作戰的一方，並是作戰最久，戰場最大的一方，所

以戰前的工業，或為敵人所掠奪，或為炮火所燬壞。損失的嚴重程度，直使敵人欣喜到認為中國再無抗戰的能力，和人民生活必需的物資了。但是，另一方面，在荒僻落後的內地——自由中國，同時却遷移並發展了相當可觀的民生和軍需工業。這些工業，在三十四年底的統計，計共有工廠五·九九八家，資本八·四九〇·九六二千元，而其設立於廿五年前的僅有工廠一一二家，或資本六〇·九五〇千元。計在廠數上增加了五十三倍，資本的增加幾達一百四十倍。同時，這些工業部門的分配，從重工業到輕工業，亦頗稱均衡，具體而微的建設了一個獨立的工業經濟體系。雖然技術上尚有許多未能解決的問題，設備及器材也有極大的缺乏，可是它已真正的解決了軍需民用的最低要求，並支持戰爭到外援物資的到來。如以廿七年作基年的工業生產指數，勝利前一年即達到四九四·〇四的高峯，其中鋼、發電機、電動機、汽油、酒精等產量更有數十倍、百倍以至千倍以上的增加。細察此中原因，因有供不應求的，甚至是獨佔的市場需要，才能促成了工業的空前發展和工業技術的迅速進步，並且引起了一般商業資本、利貸資本及土地資本轉向工業的非常興趣。亦正因這種市場關係，到了戰爭的後期，美國的援助物資剛能越喜馬拉雅山進入中國時，自由區的中國工業生產，立即由上升轉入下降；一到勝利到來，更立即停工或減產。再到國外貿易恢復，去年輸入了大量外貨後，自由區工業，除了極少數的棉紡等工業外，是以較收復區還要迅速的速度倒下去；收復區的工業，至今，多數廠礦也未做到復工或充分生產。民族工業的這種突然的興起和沒落，市場關係又是這樣的表現着如響斯應的作用，對於中國企業家及一般人民的教訓，是比任何歷史所昭示的，都要深刻得多。

從這些事實的具體經驗看來，國內市場的大小或有無問題，實是我國民族工業之存亡的關鍵，已無可爭辯。但戰前和戰時，許多經濟政策的擬訂者，都將民族工業產品市場的遠大希望寄託於國外，特別是日本戰敗後遺下的南洋市場，曾經引起了巨大幻想。許多人以為我們應該並可能繼承日本在南洋的三億萬元市場，並以為只要有了這個市場，我國的工業和工業化便可一帆風順地發展起來，代替日本而為東亞的第一個工業國。這種想法，顯然的在理論和事實上都犯了嚴重錯誤。在理論上，一國工業化，必須是從工業到農業的全部經濟基礎之澈底改造，而在經濟基礎的全部改造中，工業產品的供應國內建設需要，猶必有長時期的不足；且在國民生活的逐漸改良下，即工業化完成之後，其最大銷路亦必限在國內。從國際經濟趨勢，及我國經濟條件看，我國的工業化，可能，並應該走蘇聯型的自給路線，不是，也不可能走日本型的侵略路線。如果出於後者，則我國工業化走上自禍禍人的歧路，亦非今後的國際關係上所能容許的。在事實上，我國戰前輸出貨物中，原料約佔百分之六七，半製品佔百分之十七

，供直接消費之製成品不過佔百分之六，且其中還有一部分手工製成品在內。戰後接收的敵偽產業，亦是被編入日帝國主義經濟體系內的一個部門，其作用僅在供給她的原料和半製品罷了。我們接收了過來，尚須經過艱鉅的改造與重編，才可有利的推廣輸出，那末，仍只有向各工業國，甚至連戰敗的日本在內，輸出工業原料及半製品。至於較具規模的棉紡工業，原會寄以輸出南洋的極大希望，可是現在的事實是：一方面日本棉貨已可恢復輸出，印度棉紡工業的擴充亦漸次完成，另一方面所謂復員成績最佳的紡織業，三百萬復工紗錠的產量，猶不足以供給國內最低需要，如必縮減人民的衣料供給，以作輸出之用，亦大有背於民生主義的原則。且國內市場已成外貨的天下，那末，南洋反能留作中國貨的銷場麼？所以從各方面觀察起來，我國工業必須在保持及發展國內市場中，才有光明的前途，這應是一個堅定不變的基本原則。

當前工業危機的基本難題，亦是起於銷路的日趨縮小；而銷路縮小的嚴重問題，又是在於國內市場，不是國外市場。國內市場中，棉紡及食品工業的境遇，直至目前為止，還是較好的。但鋼鐵、機器、五金及化學工業的銷路問題，却是萬分嚴重的。這個市場問題，不單由於銷路的絕對縮小，更由於許多銷路的為外貨所奪佔，而且都有被排除於國內市場的趨勢。上面已經指出過，勝利以後，由於政府將國內廠家訂貨或國內市場的採購，改用外貨，同時官僚組織的各大貿易公司和外商的合作，以及自由商人預計到的推銷外貨的大利所在，大量的廉價外貨，已在奪取，並更將奪取國貨的一切已有市場。外貨在我國造成了一個無孔不入，且亦無可抵禦的危險形勢。民族工業祇有被迫的不斷停工減產，並被迫得不能採取任何有效的防禦辦法。例如重慶市某一頗著聲譽的鋼鐵機器工廠，始則被迫停止鋼錠的生產和機器的製造，專力製造洋釘；繼之洋釘銷路亦被舶來品所奪取，又被迫到翻鑄鑄場及家庭用的鐵鍋。又如成渝鐵路鐵軌、橋樑及附屬器材，共需鋼材十五萬噸以上，陪都工業界請將道釘、魚尾板等三萬噸鋼鐵零件交由國內工廠承製，終以價格關係，仍決定購用法國貨。因此，重慶的四百家左右鋼鐵機器工廠，除了民生機器廠尚有修理船隻的工作外，其他皆因無所事事而一致休息。至於煉油酒精等業，早已全部關門大吉，麵粉水泥等業，減產至十之二三；可見市場問題給予我國工業的打擊已至怎樣



市場與消費者 葉苗作

嚴重程度了。由此可見我國工業之國內市場的保持與擴張，是包含了這樣幾個重大問題：

第一個是國內市場的擴大，基本上係對於手工業生產之競爭的勝利，換句話說，亦即對於半自足自給經濟的改造。我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皆係農業生產者，而這些農業生產者，又係束縛於狹小的土地上，兼營家庭手工業的半自足生活者。我國農民如不能進步為農業企業經營者，即永遠不能脫離他的飢寒線上的生活，從而國內市場的潛在購買力，亦永遠不會成為有效的需求。想要提高農民生活的水準，自須進行包括土地制度在內的農業大改革。可是這樣性質的改革，如果止于擬訂宣傳性的決議及「辦法」，那是永遠毫無補于實際的。

第二是當前多數人民，包括薪資收入者及農業的直接生產者的購買力，已經十分低小，且在繼續縮小之中。此中原因，誠如某一外報所報導的，四萬五千個經濟學家都極明白，通貨膨脹實無限的剝奪着薪資收入者的最大部分購買力，而苛稅重租和攤派勒索，又迫使生產者處於毫無利潤，以至不能再生產的境地。加以內戰蔓延不已，國內市場自在加速的縮小着。

第三是市場有限的有效需求，大多為外貨所侵佔。國內市場，如上述的兩個原因，原已較戰前大為縮小；祇是交通事業及工廠設備，急需對於戰時損失有一個最低限度的補充，飢寒中的人民，對於食衣住行方面，亦保持了一個最低限度的需求。但這個縮小着的有效需求，在政府的買辦政策下，又為價廉物美的外貨所侵佔了。去年的外貨輸入價值，幾已恢復了戰前水準，即是事實的說明。以此一事實而論，巨量的外貨，對於民族工業的致命打擊，是較國內戰亂還要直接，重大的。

為什麼國內市場，幾完全為外貨所奪佔呢？從技術上看來，國貨競爭不過外貨的有兩點：一是品質，另一是價格。從品質說來，我國工業的落後技術，對於許多重要製品以至零件，或是不能製造，或是製造而不精美。這是一個工業落後國家的必有現象，也是戰前即已存在的現象。雖後，戰時的工業技術已比較前頗有進步了。這個品質問題，是屬於工業技術之發展過程上的，即使今後工業發展速度特別加快，亦需要相當的長時期，才可以趕上先進國家的水準；這並非單是設備落後的關係，還得把握技術，還需要國家有一個堅定長久的扶助政策。從技術上看品質問題，如果

忽視了應有的發展行程，則戰時的工業，固然沒有經濟價值，即戰後所得敵人賠償以及新購的外國新設備，也要較先進國家有十年或數十年的落後。至於價格，實是當前市場問題中的決定性的關鍵。外貨與國貨的價格，雖包含由技術的進步或落後所形成的成本之高低在內，但其在現行價格中的作用是極為微小的，中外貨物在國內市場之價格所以差異至數倍乃至十數倍者，純為通貨膨脹政策下，國內物價巨漲，而貿易政策下之外匯率所保持的國幣對外購買力又遠高於國內購買力之故。日外匯率的決定，既非依據國內外購買力的平價，每次官方外匯牌價又常保持數月不變，而國幣的國內購買力却隨膨脹的速度復繼續降落。這樣更使得國貨昂貴於外貨的程度，日復一日的增加着，而工業以至農業生產的條件，自然每况愈下的惡化起來。因為各種外貨之能輸入的數量不同，國貨在國內市場的境遇亦發生了某些程度的不同。一般的說來，有銷路的只是棉紡業和製車胎和膠鞋的橡膠業，其他各個生產部門都在被迫逐步減產之中，至於基本工業的部門，更已陷在完全不能生產的絕地。雖然，棉紡業的景氣，仍是依賴於廉價的外棉之輸入，而外棉的輸入，又轉入迫使棉農縮小了棉田的產量，這在國民經濟的觀點上，亦不是一個有利的政策。

現時外貨價格較國貨價格低廉多少倍的，不只是技術較高的工業產品；即是技術較低的手工業或農產品，亦是同樣的。亦不只是工業技術高的美英貨物如此，即是技術程度與中國相同或更低的印度安南等國的一切貨品，也莫不如此。還有更反常的現象，即是戰前輸出的土產，如生絲、豬鬃、桐油、茶葉等，假如再由外國復行輸入時，亦皆低廉於現在同類物品的價格。這種畸形價格的形成，除了國幣之內外購買力的高低不同一因素外，尚有其他的什麼原因可以解釋呢？當國幣對美元匯率定於二〇二〇或三三五〇對一時，固然造成外貨橫掃國內市場之價格的非常條件，即在二次改定的一二〇〇對一的現行匯率，假設國幣對國內購買力不再下降（這是決不可能的一種假設），則輸出的土產和內銷的國貨，與外貨競爭的價格條件，亦只是部分的改善，而離貨幣之國內外購買力的平價，依然是距離甚大。匯率改定後，輸出的各種土產，其國際市場的銷路，並未改善，便是一個證明。又如美國所產的鋼，以美金七十元一噸計，按新匯率不過合到八十餘萬元，而我們鋼的生產成本，却達到四百餘萬乃至五百餘萬元。這是國貨不能在國內市場上與外貨競爭的又一證明。此中的主要原因，即在國內物價指數已漲到戰前的一萬五千倍以上，換句話說，即國幣

的國內購買力已跌到戰前的一萬五千分之一以下，而國幣對美元的匯率僅較戰前放長了四千倍，即國幣對外的購買力，仍保持了戰前的四十分之一的高水準。依美國維持的美元官價匯率及我們貨幣國內購買力下降程度換算，則國幣對美元的匯率，實應定於四五〇〇對一的比率以上，才可漸達於合理的平價，而國貨在國內及國際亦可以獲得價格的平等條件。這裏，我們必須脫出黑市匯率即是接近平價的傳統觀念，因為現時的外匯黑市，並不是自然的，亦不是自由的，而是在我國及外國政府共同維持的法幣對外高購買力的影響之下所決定的。所以現在的黑市價格，絕不足以作為外匯率達到平價的證明。

現行的輸入限額制度，有人雖視為增進國內生產的武器，但其最大的可能，祇能對國貨在國內市場上起有限的扶植作用，既不能挽轉國貨對外貨之價格的逆勢，亦是不能使國內生產恢復正常軌道的。因為限額下的輸入價值，年既達四億萬元以上，同時，走私的入口，亦將更形猖獗，而同一貨品的價格，國貨與外貨長此懸殊過巨，又將迫使國內工業不能作安定的計劃生產，而陷於長期的混亂的僵局。且限額制度的實行，以我國外匯資金的枯竭，美國政府暫行保留來採取反對的行動。但這種限額制度，正與美國以全力擬在世界實現的自由貿易制度，是相反對的，美國的不能容許限額制度的長期存在，自在意料之中，只要美國政府採取某種干涉行動，欲使入口限額制度不與出口補助費辦法得到同樣的結局，真是不能想像的奇蹟。

現在的世界，是一個有無相通，彼此依賴的經濟環境，任何一國不能做到自給經濟，也不應以封鎖壁壘自安於故步自封的落後地步，使人民過着落後技術所形成的昂貴生活。這是我們完全知道的。但是無論如何，發展國際貿易的前提，總應使其國民的生產有可以生存的條件。如果國民經濟不能於存在中求前進，單靠廉價外貨，或少數高技術水準的工業之移植，却會完全墮入殖民地經濟的陷阱。所謂民族工業，不但不會發展，且是不會存在的。所以像我國現行的經濟政策、貿易政策及外匯政策，都只以限制土產的國外市場而同時又以國內市場送給外貨為目的。有人批評美國的自由貿易主義，是一「輸出失業政策」，那末，我國提高對外購買力的外匯辦法，亦應批評為「輸入失業政策」了。

新政財與舊財政

伍丹戈

最近看了兩本書，一本是英國J. Watson Grice著
的National and Local Finance，另一本是吳清友所
譯傅高列波夫的蘇聯財政制度。前者是一本老書，討
論十九世紀英、法、比、普等國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
府的財政關係問題，後者是最近出版的一本新書，它說明
建築在當前社會主義經濟上的蘇聯財政制度的特色，以
及它怎樣解決平時和戰時的財政問題——蘇聯財政在平
時推動並調整社會主義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建設，在
戰時保證供應作戰所需的財力及物資，擔當擊潰法西斯
敵人的經濟任務。

看過這兩本書以後，我所得到的最強烈的一點感覺
，就是財政的制度或本質的問題，而這種制度或本質又
必須以經濟制度為基礎，這纔是研究財政問題者必須注
意和照顧的問題。

研究財政問題的人，往往有意無意的忽略經濟制度
，將它撇開不談，這又分成兩種形態，一種是根據一些
抽象的原則來評斷財政的是非得失，一種是根據植基於
完全相異的經濟制度的異邦財政成法，漫談本國財政的
與廢存革，但無論那一種形態，在接觸到現實問題的時
候，就完全碰壁。這也並不如一般所說「理想是美麗的
，現實是醜惡的」，將理想看作是不能結實的花朵，或
者是一般經驗論者所謂「理論是理論，事實是事實」的
老套，將理論和事實分作兩截，而是因為沒有現實作根
據的理想，完全是一種空中樓閣的幻想。

假定不把經濟制度的性質作為分析研究的出發點，
那麼這種分析研究，決計不能把握住財政制度的本質，
認清財政問題的癥結。它所得到的不是枝枝節節，瑣瑣
碎碎的頭腦醫頭，頭痛醫腳的辦法，就是空疏迂闊，隔
靴搔癢，不著邊際，不得要領的空論。當前所發生的財
政問題，大部分是種因在基本的經濟制度方面，而在經
濟制度沒有澈底的變革以前，財政制度自然也不能澈底
的改變，因此，財政問題也就決計沒有完全解決，澈底
解決的希望。

例如近代財政上所發生的一個最重大的問題：政府
應該不應該有大量的支出，以及這種支出，又怎樣使人

民合理的負擔問題，就一直到現在沒有合理的解決辦法
。

這問題的提出，少說點，也有幾百年歷史了。亞丹
斯密斯就發表過他的有歷史意義的，有系統的主張。他
認為政府做的事應該愈少愈好，要錢也應該愈少愈好
；因為政府多做事，就使人民少做事，就妨礙到人民的
自由活動；政府多要錢，就使人民多負擔，多犧牲。同時
，同一的事情，政府做，不及人民自己做，對於整個社
會及他自己更為經濟，有益。這是十八世紀以來財政上
最有力最有影響的一個主張。

然而隨着經濟制度的發展，這個原則不能實行了。
社會關係的密切，擴張，複雜，一定要使政府多做事，
多向人民要錢。這並不單是為了人民的福利，主要
的也是為了滿足統治階級的要求。但事實雖然如此，亞
丹斯密斯所提出的問題却仍舊存在，並沒有解決。就是政
府做事不一定比人民做的好，政府要人民的錢，仍是人
民的犧牲，和負擔。這還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後來英國的達爾頓(Dalton)雖然提出一個解決這
問題的原則，算是繳了亞丹斯密的卷。然而這也祇是將
亞丹斯密的問題搪塞了過去，並沒有圓滿的將問題解決
。因為他所提出的原則是：政府所花的錢的邊際效用，
要和人民所付的錢的邊際效用相等，簡單點說，政府所
做的事對於人民的好處，要和人民所付犧牲的代價相等
，假定政府所做的好處不大，而人民出錢的痛苦復深
，這就是兩者的邊際效用不相等，政府就不應該做這種
事，就不應該要錢。反過來說，如果政府做事的益處極
大，而人民的犧牲有限，那這也是兩者的邊際效用的不
相等，在這種場合下，政府還應該多做點事，多向人民
要點錢。從表面上看，這應該是極合理，極圓滿的辦法
，但實際上却是一個沒有內容的空洞的抽象的原則，絕
對沒有辦法實現。

我們且不必衡量現在政府所做的事，對於一般人民
究竟有多大好處，也不必指出，政府支出和人民支出二
者間邊際效用是無法衡量的，更沒有辦法在二者之間求
得一個等號，我們就說這原則是合理的，而且我們就根

據達爾頓的邏輯去推論，我們也發覺這原則在事實上是
無法實現的。因為在這種貧富不均的階級社會裏，政府
所做的事，對於各階級的益處（也就是邊際效用）是既
不相同，也不相等的，同樣，人民支出的錢，各個階級
所感受到的犧牲和負擔程度，也是不相同，不相等的。
赤貧的人的一元錢，較之鉅富的一元錢，看得異常重要
，這一個最簡單的常識，是邊際效用經濟學派的理論根
據。所以就是從邊際效用學派的理論，也沒有辦法證明
這個原則的合理和正確。

因此，這對於亞丹斯密所提出的問題，還祇是一
個空洞的原則的答復。這就是因為這一個問題，是從現
在的經濟制度的根源上產生的，這是公經濟與私經濟的
矛盾，也就是從「生產的社會性質和佔有的個人形式」
這一基本矛盾上產生的。政府的事業縱然是為公眾的，
而政府的錢，却要從私人取得。這就使政府沒有辦法取
得極多的財源，不能使私人付出超過他能力的負擔，而
私人負擔國家捐稅的犧牲程度，各個階級又是不同的
。因此，在現在舊經濟制度上沒有辦法合理的解決這個
問題。

有之，就祇有在經濟制度完全變革之後，在社會主
義經濟建立之後，現在在蘇聯財政上，是把這個矛盾消
除，問題解決了。「因為蘇聯財政制度的結構及其功能
的本質，歸根結蒂是由社會主義經濟的結構和國民經濟
的國家計劃之任務所規定的。」

「認識蘇聯財政制度，從觀察創立社會主義財政政
的國家資源的那些基本經濟源泉開始，最為妥當。
「這些源泉，在一九三六年蘇聯憲法第一章中
完全地列舉出來了。在憲法指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以及生產工具和手段的社會所有制，是蘇聯的經濟
基礎。……

「描寫社會主義財政制度的經濟源泉，必須從國
家所有制開始。」（見蘇聯財政制度第二六頁）
因為蘇聯是國家所有制，於是在蘇聯，經濟與財政
發生了密切的結合，於是「貨幣積累的大部分，是聚集
中在國家的主要財政機構——國家預算中。」「把巨大

的國家經濟之貨幣資源吸收到蘇聯財政制度中去，以及把這些積累集中到國家預算中去，構成蘇維埃財政制度和蘇維埃預算最顯明的特徵。

同時，這種預算的擴大，不單是不影響到人民的經濟生活，而且是改善人民的經濟生活的。預算的擴大，正是表示國家從事於經濟、文化、社會建設事業的擴大，也就是使人民在經濟、文化、社會生活上的改善和提高。在蘇聯財政上，是決不會發生「與民爭利」和「竭澤而漁」以及「殺雞取蛋」等問題的。

關於這一點，也許有人要表示懷疑，就是使國家從事的事業增加，而人民的負擔並不如重，在現在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也並不可能做到擴大政府預算，而不影響人民經濟生活，並且還可以改善人民經濟生活的方法。凱因斯在理論上倡導，羅斯福在實際上施行的舉債公債，開辦公共工程，以及擴張信用，降低利率，刺激生產達到充分就業的方法，就是一個實例。這種辦法和蘇聯財政上的運用公債，調節生產，以及運用銀行信用，擴大生產的方法，在形式上頗有點相像，似乎前面所提到的問題就是一個「方法」問題，根本與「制度」無關。

然而事實却是無情的。羅斯福的「新政」，雖然一時和緩了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却沒有根除經濟恐慌。假定不是世界第二次大戰，一九三七年美國繼起的第二次大經濟恐慌恐怕也難以緩和。因為舉債公債，在當時固然不是「無價的」向人民要錢，然而將來仍舊要用更大的捐稅還債。這對於資產階級有益，他們獲得了公債的利息，而對於無產階級却有損，他們負擔了公債的本息。歸根結蒂，既然離不了捐稅，這就重新接觸到了前面所說的問題。蘇聯的無息公債，却和資本主義國家完全有別，它從人民身上取得，也從人民身上歸還，它祇產生一個擴大生產資金的作用。

至於擴張信用刺激生產的方法，雖然兩者形式上相似，實際上却完全兩樣，一則是擴張不為利潤的，有計劃的生產，一則仍舊不能不顧到利潤，仍舊不能避免無政府生產狀態，還在經濟生活上的作用，和效果，也是很顯然的。

所以凱因斯提出的解決財政問題辦法，祇是暫時盡了打強心針或嗎啡針的作用，却沒有根本的清源。除此之外，在近代資本主義財政，還有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那就是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關係問題。

在封建的經濟制度之下，根本談不到地方財政，也談不到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關係的問題。C. G. 在他的書中，開頭就說：

「由於工業民主的日益需要，由於現代生活的日趨複雜，於是，在上一個世紀之中，大多數西方國家就不得不密切注視到兩個基本問題：第一，怎樣可以使捐稅負擔比較公平地分配給社會上各個階級的人民；其次，怎樣使財政責任比較合理地分配給各級政府負擔。」

「國家活動的日益增加，舊的工作需要擴張，新的工作又要舉辦，同時也就使公家支出不斷的增加，而這種增加又必需要財政收支和行政也隨着變化。」（見 National and Local Finance 緒論）因此，發生了各級政府分「工」的問題，又發生了一個分「財」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本來應該是一致的，就是，工的多寡，應該決定財的多寡。然而事實上却是「工」與「財」之間不能配合，「工」與「財」不能相稱。國家將許多工作分配給地方去辦，而分配給地方的財源却不能負擔。這就使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之間產生了矛盾，這個矛盾不但在十九世紀沒有解決，就是到今天各國也沒有解決，假定各國仍舊保留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變，恐怕在將來也沒有方法合理地解決。

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下解決這種矛盾，祇有一個比較合理的原則，就是全國一致性事情的支出劃歸中央政府，根據「能力負擔」(ability to pay)的捐稅也劃歸中央，地方性事情的支出劃歸地方政府，而按照「受益程度」(benefit derived)的徵課就劃歸地方。但實際上這種原則是不通的，因為這樣做，收支必然的不會平衡，照這樣子的「收」與「支」，決不能恰巧符合一致。

因此，事實上這祇是一個抽象的原則，並沒有實現。在法，比等國，地方的稅源差不多都是對中央稅的附加稅。

同時，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財源有多寡的問題，在貧瘠的地方，稅源是有限的，但政府的支出，就理論方面說，却應該和富庶的地方是一樣的，也許要比貧瘠的地方格外要多一點，因為愈是貧瘠的地方，需要政府做的事也愈多。但是根據這樣的收支原則，却並不能使收支適合。

英國曾經用中央補助金制度來彌補這個缺額，然而

這個辦法却祇有「彌補虧空」的作用，並不能按照地方的需要來澈底的解決地方財政問題。因為中央財政也並不過分富綽有餘，它本身也是竭力的。

解決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的澈底辦法，是建立一個「統收統支」制度，却決不能用「劃分國地收支系統」辦法，因為這種劃分辦法，無論如何，都是不能「劃分」得恰倒好處。然而這種澈底的辦法，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下，也無論如何，是行不通的：第一，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的財政收入，建立在複雜的稅捐之上，而這種複雜稅捐的多樣性和地方性，決計不能建立一個統一的和單一的財政制度或財政系統；其次，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在現制度下，有地域間的利益和歧視，因此也產生地方和中央，地方和地方的隔閡，現在必須要產生一個「地方自治」制度。

祇有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下的蘇聯，纔能建立統一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制度。這是因為「蘇維埃制度內部固有的國民經濟發展及經濟政策基本方向的計劃性，不僅預定經濟計劃的必要性，而且也預定此種計劃的統一性」。因此也必然「要求整個財政制度有組織的統一」。在蘇聯憲法之中，規定：「批准國民經濟計劃，統一國家預算以及構成聯盟國家，如盟共和國以及地方國家行政機關預算的賦稅和收入，是屬於聯盟國家。」

「蘇維埃國家的法律，不知道通常應用於地方行政組織的法學上的術語——『自治』。蘇維埃的憲法，說到『國家政權的地方機關』；而這些『地方機關』，是民主思想真正的表現。」因為「在斯大林的憲法中說過：『勞動者代表蘇維埃，構成蘇聯的政治基礎。』」（以上引文均見吳譯）

在這種統一的財政制度之下，全國各落後區域的經濟文化建設纔有可能和比較進步的區域並駕齊驅，齊頭並進。在蘇聯第二次五年計劃年份之內，共和國及地方部分預算比聯盟部分的預算增加得高，而落後共和國的預算又比進步的共和國增加得高。這也祇有在社會主義經濟及統一的財政制度之下纔能辦到的事情。

因此，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矛盾問題，基本上也就是一個經濟制度的性質問題，說到這裏，必須要說到中國，因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到現在還停留在半封建的狀態，而政府的職能却符合資本主義經濟的要求，因此中國的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矛盾，更是特別的顯著與尖銳。也就是說，從中國財政制度，更可以看出經濟制度在財政制度上的決定的作用。

關於男女分校

碧遙

不久以前，政府公佈中等教育男女必須分校，沒有說明理由；於是大家對此重大改革，紛紛猜測。各方面猜測的理由，不外下面兩點：(一)中學生正當青春發育時期，男女同學，實非所宜；(二)蘇聯最近也有男女分校的命令。

我們教書匠平日與政府機關無緣，在大家猜測的理由之外，不必徒勞心力，再事猜測。但將個人對於這兩點理由的感想，略為一述。

關於第一點，我覺得是炒冷飯的惡作劇。三十年前，男女同校的問題開始提出到社會來，那時衛道之士，都以爲是傷風敗俗，謬妄之尤。但一部份前進人士，鼓吹男女平權，不遺餘力；有幾個開明的大學，鑑於女子教育沒有大學和專科之設，便首先開放女禁。民國七年的嶺南大學，民國八年的北京大學和南京高等師範，都開始招收女生。中國社會進步儘管迂徐，但三十年來竟有三十餘年，那時社會對於男女同校的恐懼和阻力，有非今日所能想像，然而男女同校的學生，並沒有給反對者以滿意的口實，於是日久這種阻力與恐懼，爲之淡然。等到北伐成功，連中等學校男女同校，也成了普通的現象。

中學男女同校是二十年前開始

的事，二十年來畢竟是二十年，那時社會對這事的恐懼與阻力，也有非今日所能想像，然而二十年來，所謂青春發育時期的男女少年，在他們同校讀書的期間，並沒有演出重大的傷風敗俗事項。二十年前的反對者，到今日大致已經安之若素。今日祇須指導得法，自可日臻完善；在紛亂如麻的中國教育問題中，男女同校幾幾乎不復成爲問題。不料忽然會止水揚波，舊事重提。

當然，青春男女朝夕同處一堂，在全國數十萬中等學校學生中，二三戀愛故事不能担保其必無。但數十萬青年即使不男女同校，又豈能毫無戀愛故事？那時所演的戀愛故事，或者是更不上軌道也未可知。試看那些男女不同校的學生中所演的同性戀愛，或是抑鬱自瀆的病態，或是一見傾心的盲目的結合，那是多麼地含有毒素而且危險。

一般地說：中學生因年齡較小，胆小羞怯，他們的戀愛多數是秘藏心底，很少敢於向對方表現；即使表現也僅限於精神的領域，極少發爲實際的行動。不用說中學生，大學青年尚如是。祇有良心已被染污的中年以上的人們，特別是一些市儈和權貴，他們對於異性，才動輒是以卑鄙的手段玩弄。早幾年廣西大學出了一期「戀愛特輯」，裏面

有「飛渡相思河，直搗孟婆齋」(該校前有一溪，兩岸皆紅豆，故名相思河；孟婆齋爲女生宿舍)之句；這不過是大膽的遊戲文章，不能看作真有曖昧行爲。傷風敗俗的污穢行爲，聚十個市儈或權貴，可以有十件以上；聚百個男女同校的大學生或千個男女同校的中學生，未必有一件。可以知道風化問題，在彼而不在此。

禮教桎梏中國社會已數千年，辛亥革命以來，對舊禮教總算不斷地，或輕或重地發動了攻勢，所以雖有一男女八歲不同席的古訓，民元以來的小學教育，大都是男女同校。中間祇有一度的變化，那便是袁世凱積極籌備帝制的時候，在民國四年教育部發表了一道「高等小學男女同學者須各編學級」的命令。這一段黑暗時期渡完之後，小學男女同校，再沒有發爲禁令。

經過了「五四」的猛烈的思想消毒，北伐再以炸彈摧毀封建的殘餘壁壘，於是而中學男女同校，見諸實行。中間也祇有一度的變化，那便是武漢政權消散，全國統一完成之後，民國二十年四月，國民政府有一道提倡舊道德的命令；之後在五月中國全國教育會議席上，有一「男女高初級中學，以分別設置爲原則，各地方有困難者，得於中等學校中分設男女部」的議決案。但這議決案止於留在會議錄上，不久一九一八一事變爆發，沒有見於政府的訓令。以後男女同校毫無異議地推行，在抗戰期間，學校的數目雖則銳減，而因同校之便，女生升學的

命脈，得以維持而不墮。

現在社會上的封建積習正在減輕，男女同校的效果並未惡化，此時而乃提出「正風矯俗」的分校問題，似乎是偷開的炒冷飯的惡作劇，使得大家頭昏腦漲地把二十年前的爭論，重新爭論一番；結果重要的教育問題輕輕放過，僵化了禮教，乘隙抬頭。牠那冷酷的桎梏，重新套在我們的頭上。

關於第二點，我覺得是東施效顰，不倫不類。

蘇聯識字的人數，一九三九年的統計占全公民的百分之九十；最近據說文盲已經絕跡，可以想見他們教育的盛況。根據一九四一年的統計，蘇聯普通學校的教師，有一百二十二萬二千八百人；訓練師資的高等學校，有三百四十八所；高等學校的教授、副教授和講師，約有四萬人。中學的統計，我此刻手邊沒有材料，但可由上面的數字類推。以他們的用字狀況，一旦提出男女分校，他們的用意雖不可知，但女生升學，一定是決無困難。但是中國的情形怎樣？中國的人口，多於蘇聯一倍以上。根據教育部的統計，民國二十一年全國中等學校(包括中學、師範、職業)的校數是三千另四十五所；學生是五十四萬七千二百人。二十二年的統計，高等教育(專科以上學校)的校數是一百另八所；學生是四萬二千九百五十六人；教授、副教授、職員是一萬一千三百十四人。這和蘇聯比較，相差太遠。二十六年抗戰爆發以後，大半個國土受了敵

人鐵路的路，校舍化為廢墟，教師轉填溝壑，現今的數字更遠在二十一、二年之下。現今能勉強復校的，全國果能有幾？校舍已毀，戰亂未已的地方不必說，即使校舍殘存，此刻沒有戰亂的地方，也因校舍被佔，經費無着，十九不能復原。

浙江是東南文化的重心，該省戰前僅有一所省立女中，戰爭中杭州淪陷，即歸停辦。現在勝利將近兩年，而浙中因校舍被佔，經費無着的關係，至今復校無期。該校畢業校友，曾經多方呼籲，全無效果。舉一例百，可知在此時而主張中學男女分校，無異主張女子祇許受小學教育；又因為中學教育脫了節，大學教育當然沒有她們的分兒。

即使有些省市，能有少數女子中學的存在，但分布不普遍，女生家長必因交通阻隔而放棄培植。二十一年中等學校學生的五十四萬餘人之中，女生僅得十萬三千零二十五人，不及男生的四分之一，更不及全國婦女的二千二百分之一。現在再因男女分校而減少女生升學的機會，女子教育的前途，還有沒有一綫光明？

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對她，處處是談虎色變。獨有這次他們男女分校的命令，我們便不顧事實的困難，模倣唯恐不及。我們若把頭腦略略維持冷靜，就會覺得此一舉動，是東施效顰，不倫不類。我們不忍見微弱的中國女子教育，受挫於一旦；在這命令既發，尚未見諸實行的時候，不能不全力

以爭，否則我們是放棄了天下興亡，匹一婦一有責的義務。

事有緩急，有輕重，退一萬步說，男女中等教育即令有分校的必要，也不是當前的急務。當前教育的急務，是在增加教育經費，建築校舍，培養師資，置備圖書儀器，以及恢復社會秩序，減輕國民負擔，然後才能有大量的子女入學，才能有完善的教育機關，才可望文化提高，社會邁進。不從這些急務下手，捨本逐末，貽害非小。

莊子齊物篇有狙公戲狙（獼猴）的故事。他分配芋芳給獼猴，先用「朝三暮四」的方法，羣猴皆怒；後用「朝四暮三」的方法，羣猴皆喜。聰明的人，誰都不願做這些獼猴的優事。然而不幸的中國婦女，在今日能及得這些獼猴，也就算幸運。因為無論「朝三暮四」，或「朝四暮三」，實數總是有「一七」。今日中國婦女在教育上的地位，由於傳統的重男輕女的遺毒，在中學允許男女同校，學校的數量較多而入學的機會較易的時候，女生勉強能及男生的四分之一。若男女截然劃分，以社會重男的習慣，以及男生人數較多，學校必然被男生捷足先登，女生必然向隅。那麼這一分校的改變，無異將女子的教育機會，由「朝三暮四」改為「朝零暮零」。我們婦女將獼猴之不如。此一分校令果付實行，那些升學向隅，感情激烈的少女，對於當前的政治，誰能担保她們不有「朝秦暮楚」之思？

最近讀到聞一多先生的幾封信以及紀念他的一些文字，使我想來談談學者。

怎麼樣才是學者？在胡適、傅斯年等人說來，當然只有他們才配保有這種頭銜。可是，如果學者不是賣弄智識，故示淵博，如果學者不是高談理性，競誇玄虛之謂，那末，他就必然愛護真理甚於生命，他就必然風骨峻峭，不在淫暴之前低頭。他是人民的先知，他是社會的木鐸。而我們的胡適是怎樣的「學者」呢？遠一點，在溥儀面前，「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近一點，他勸北大學生

記住「理未易明，善未易察」的庸俗的不可知論的奴才哲學，後來他之對北平美兵蹂躪女生的事件，表示只是兩國道德的觀點不同，則大大顯出了他的奴才色相。無論如何，自古以來的中外大學者，都不是這樣像過河小卒的。蘇格拉底臨死時的莊嚴風度，阮於陳蔡之間的孔子的從容守道，當非今之「聖人」者所可企及。勉強在歷史上找類似，則董仲舒楊雄倒是其先輩。

我要說，今之真正的學者，倒是聞一多先生和其他的聞一多先生們。

聞一多先生是被傅斯年「輕輕一笑」過的，但「還我頭來」的傅斯年，單就其五四以來的學術成就來說，拿「聞一多全集擬目」比一下看，高下不已可以立見了麼？

過河小卒和殺蠱芸香

于冰

我始終沒有忘記除了我們的今天外，還有那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們這角落外，還有整個世界。我的歷史課題甚至伸到歷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話，我的文化課題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會為對象的文化人類學。

這是「以學績補苴，謂足盡天下之能事」（章學誠語）的今之俗儒，如胡適之流應當慙汗愧的。

近來我在聯大的圈子裏聲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為經過十餘年故紙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們這民族，這文化的病症，我敢於開方了。……你誣枉了我，當我是一個蠱魚，不曉得我是殺蠱的芸香。

「殺蠱的芸香」，這才是學者之所以為學者！

何為美？

——善繼周——

何為「美」？這是一個意見紛歧而牽涉廣大的現實問題。更具體而微一點說，它不僅是現實的，而且是帶有龐雜的社會性諸因素底問題，故欲求得一平易近人的說明和大家首肯的答案，確是一件不甚容易的工作！

可是，如果將這一問題，放置在實際上或日常生活中來考驗的話，卻又成了衆所週知的事，差不多每一個人都能解答他對此一問題底立場和認識。舉例來說吧：乞丐對於富人們的殘羹冷飯，他認為是美的；父母對於他們底癩癩頭兒子，認為是美的；青年們對於他所追求的異性，認為是美的；資本家對於所掠奪來的財富，認為是美的；將軍們對於他底勳章和敵人底血肉，認為是美的；同樣，農人們認為

他所耕耘出來的東西，是美的；作家們認為他所創造出來的作品，是美的；婦女們認為時髦的裝飾，是美的；政客們認為他所奪取的政權，是美的；遺老遺少們認為他所搜集的骨董，是美的；帝國主義者認為弱小民族的領土，是美的；統治者認為被統治者的呻吟，是美的；虐待狂者認為別人所受的痛苦，是美的；革命家認為他所幹的社會改革運動，是美的；……諸如此類，幾乎不勝枚舉。

以上所列舉各式各樣的美，從其各自的立場看來，担保它十之八九是近乎事實的。惟此等各式各樣的美，假使將它們排比起來，並約略考察一下它們底性質的話，則很顯然地發現它們彼此之間，有着絕對相反的距離，和無法協調的對立！因此，何為「美」？這一問題，其紛歧、廣大和龐雜的諸因素，就發生在有如上述之各種美的認識上面。

這個紛歧、廣大而龐雜的何為「美」的問題，在學術界，企圖加以適當的說明和解答的人，是非常之多的。尤其是哲學家，他們甚至將它作為一種專門學程來研究，並定名為衆所週知的美學(Aesthetics)。可是，他們的收獲怎樣呢？自然，他們的收獲，是相當可觀的。今概舉其稍著者于次：

一、所謂美，必須含有倫理的成份。換言之，凡屬美的東西，必定與善同科；至少，也不能違善。倡導這種學說的人，以柏拉圖、康德、叔本華等先哲為代表，歷代各宗教家為附庸。

二、所謂美，必定要在格式上，構成一種對稱、一種比例、一種部分與全體兩者之間的調和。而且，美是精神的自由發展，是使外部事物和其觀念相似。換言之，美就是觀念感覺的表現。倡導這種學說的人，以亞里斯多德為鼻祖，黑格爾集其大成。

三、所謂美，原是生理和心理上「食、色」兩種本能的欲求和昇華。唯其如此，所以，斯賓諾塞說：「我們並不因為某物是美，而欲求某物。正相反，却因欲求此物，故名此物為美」。申言之，因為有一「食」本能的欲求，和「色」本能的渴望，所以，纔認為食物和異性為最美。再由此原始的美——食、色，擴充而及於第二性的美——自然；第三性的美——藝、文。從而，美的真面顯現無遺了。倡導這種學說的人，除上述的斯賓諾塞氏外，當以達爾文和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為首

要。

現在，依照上述的三派學說來看，它們對於何為「美」這一問題，是否說明得圓通，解答得完善呢？很顯然，它們是不夠的。因為事實告訴我們：一般人所認為的美和美的東西，有如我們上面所列舉的例證，從來就很少有合乎柏拉圖式的倫理成份。即以柏拉圖時代希臘民族的審美觀來說，尤難尋出美與善有何淵源。恰相反，希臘人所認為的美，不折不扣地作了倫理的叛徒！正如衆所週知的，希臘神話和各種造型藝術給予柏拉圖的倫理主義以一個全面的否定。誠然，柏拉圖等人將美歸併到倫理的範疇，其動機是良好的；而且是具有社會意義的，正如他所創造的「理想國」一樣。

其次，認為美和美的東西，必須在格式上，構成一種對稱、比例、調和；且須與觀念相似。自然，這種認識，在人和動物的身體上，在某一時期的建築上，或某一時期的繪畫和詩歌上，是合乎如上所說，必須對稱、比例、調和得宜，方得謂之為美；然此只不過是某一事物，某一時期的美之通則，未必放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不變。至若必須「與觀念相似」云云，這明明白白是心觀論者的觀念遊戲！誠有如我們上面所列舉底美的事實：乞丐之於殘羹冷飯，父母之於癩癩頭兒子……都是有強烈美感的，難道他們竟有如此可笑的觀念嗎？——殘羹冷飯，癩癩頭……很顯然，這不是個人的觀念，而是某一時期社會性的表

現。

又其次，認為美和美的東西，是「食、色」兩本能的欲求和昇華。這，在純粹生理和心理上，在某些單純的實際欲望上，是相對地表現出「食」或「色」兩本能的美感來。可是，人與人之在社會，究竟不同於無機物之在真空管。故人底本能之在社會，久已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因此，「食、色」兩本能，在整個文藝圈內和美感上，始終只是一個配角，一個附庸！誠如我們上面所列舉之各項美的事實，有幾件是與「食、色」有直接關係的呢？所以，達爾文和佛洛易德等人，竟強調「食、色」為美的唯一來源和唯一標準的，就因為他們過於不正視社會性的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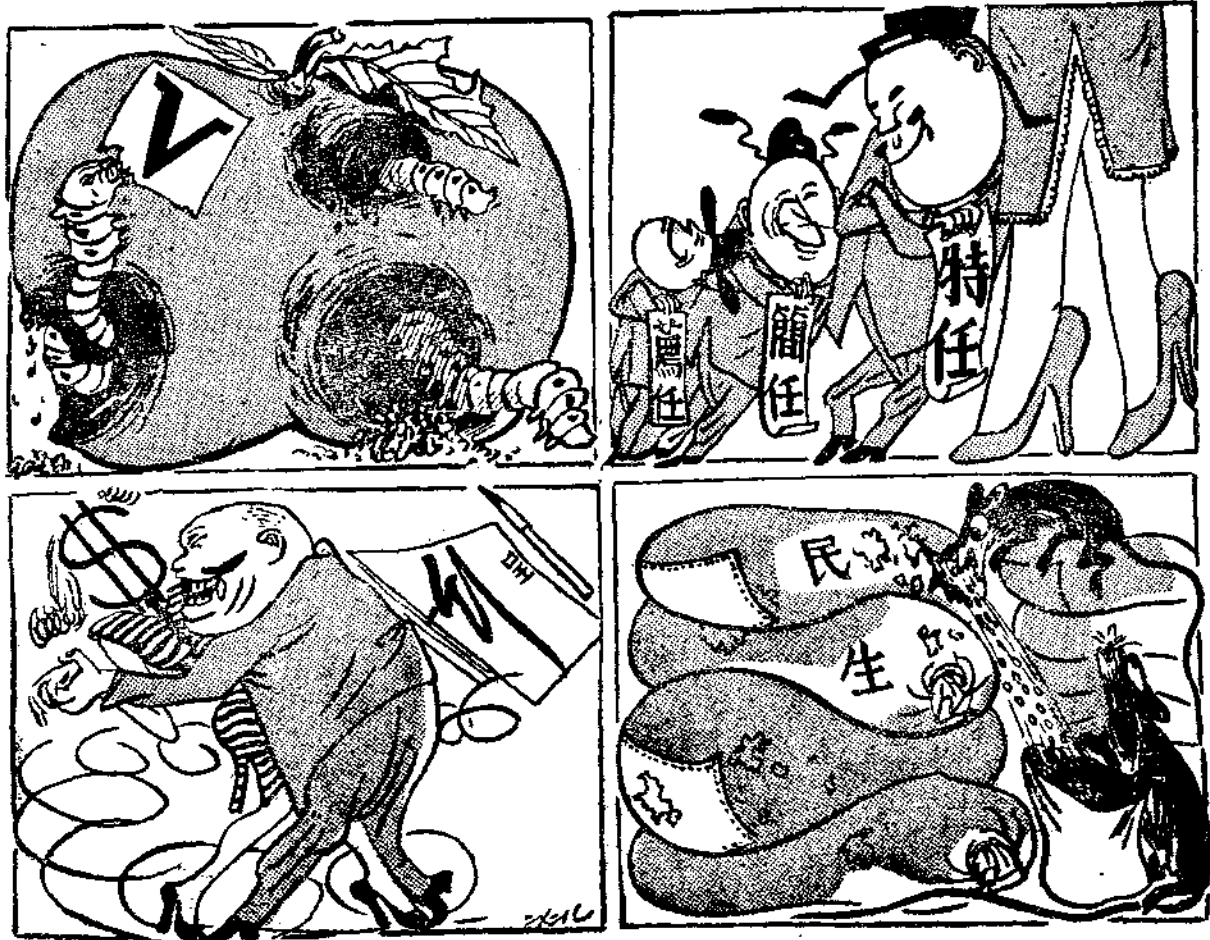
總括以上各學派所論，其所以未能求出美的通則，未能確切解答何為「美」這一現實問題，一方面固然由於時代的限制；但另一方面則由於他們觀察的偏頗，研究的支離，致使這富於社會性的美學，及其所研究的，脫離了社會。那末，他們之不能得到理想的收穫，自然是意料中的事。然則，究竟何為「美」呢？

我們的答覆是這樣的：在人吃人的社會尚未總崩潰以前，我們無法求出一個使人人首肯的美的標準和通則來！即使有那末一個標準和通則，也只能算是部分的，或柏拉圖式的。因為事實上，有如我們上面所列舉之各項美的例證——創子手所認為的美，恰好是我們所認為的醜！帝國主義者所認為的美，恰好是弱小民族所認為的醜！……此其一；在人吃人的社會過程中，凡有助於合理社會建設的一切思想、行為、品德、創作、表現等，無論巨細，我們都可以認為它是美的，並作為美的通則。此其二。過去美學家所留給於後世的遺產，如倫理範疇中的善，如格式主義中的對稱、比例、調和等，如生理和心理中的「食、色」本能之昇華，我們仍然要批判地接收它們。此其三。

因此，在現階段中，何為「美」——這個意見紛歧、牽涉廣大並帶有龐雜社會性諸因素底問題，我們謹作有如上述之原則的大胆答覆！

張文元作

「四大需要」



蛙？

依？

蛙？

依？

一提起「英雄」這兩個字來，立刻會給人以震驚的感覺，不是對於他們的「豐功烈蹟」油然而興崇敬之心，便是爲了悲慘的「末路」替他們洒淚。由於，幾千年來，世界一直是「英雄」們的擂台，供他們角逐，廝殺，以小民百姓的白骨和紅血作本錢，去滿足斗大的雄心，去決定最後的命運，不但叱咤風雲，威震當世，還想在千萬年後的歷史上牢牢的把自己嵌穩。因此，整個身心在封建泥土裏的「常人」，便以「高山仰止，景行行之」的自卑心情，把「英雄」崇成「半神」或「非常人」了。

英雄可以造時勢，一個念頭的轉移可以決定千萬人的生死，使歷史另換一副面目，不但一般人把他們高看一眼，就連他們自己也覺得不是「人」了。王侯將相，是另有種子的。秦始皇想一世二世的把天下作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劉皇叔也要把自己的祖譜追溯到什麼「中山王」；「龍王的孩子會浮水」，這個諺語是天經地義的被肯定着。

英雄不能是「人」，一成爲「人」，便不成其爲「英雄」了。他們千方百計的給自己披上一件「神秘」的外衣，叫人們看不清楚他們的本來面目，造成那麼一種氣氛，像一個人走進一座大殿裏一樣，神像隱隱而又莊嚴的半露在帳幕裏，燭火中；楹柱巍巍，堂與幽深，香煙繚繞，再加上鐘聲叮噠一響，你的身子和心就不由自主的拜倒在這一團空氣裏了。

什麼「踏大人跡有孕」，什麼「吞鳥卵而生」，什麼「斬白蛇」，「握赤符」，這種種把戲，目的只有一個：天神投命，迥非平常。生成的

樣子也自特殊，「項羽重瞳」，「關公覆眉」，……這是真是假還待考，然而朱元璋的那個「豬臉」據說是特意命畫公「歪曲事實」以示奇異的。他們深居的時候，戟戈如林，外人當然沒法一睹「虎面龍顏」，外出的時候，又須「迴避」，拒人多少里路之外，這固然是由於他們的性命寶貴，怕防範疏漏處，突然飛來個「博浪沙錐」，但我想，故意同人民之間拉一道距離，把自己「神化」起來，才是主意所在吧？就是在死後，也是這兒造一個墳，那裏堆一個塚，弄得糊里糊塗，真假莫辨。生，不平常，死，不平常，平生的所作所爲，更是轟轟烈烈，於是，完成了「英

試論英雄

臧克家

雄」的風格，給人心上留下一個永不磨滅的「影子」。

他們如此這般煞費苦心的把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僵硬化」成一個「英雄」塑像，叫我，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明明想笑，而又不敢笑；明明不想笑，又不得不做出個笑的樣子來；明明想哭，而又不敢哭，明明想叫，而又不敢叫，明明想放縱一下感情，而又不敢放縱。心理受着壓抑，情感受着壓抑，人之所以爲人的一點東西，活生生的把它壓死，這是多難受的事！如果我們有孫悟空的那套把戲，變一個小小的虫兒鑽到他們五臟六腑裏去看一看，聽一聽，一定要大吃一驚

，訝的一聲叫出來：「他們的喜怒哀樂也同常人一樣的在蠕動呀！」

「側室無英雄」，看破了不值錢；不值錢倒

是好的，倒了偶像，却豈立起一個「人」來。歷代的英雄，都是打著一支「弔民伐罪」的大旗，藉的是一個名義，要的是無條件的犧牲。聽他們英氣冲天的大叫：「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老百姓真是渺小如「沙虫」，何足道哉！他們的「人性」已經很少了，剩下的只有殘忍和「甯使我負天下人」的一點「豪氣」。漢高項羽，會約爲兄弟，爲了利害的爭奪，也可以犧牲自己的老子，說出：「我翁即爾翁，分我一杯羹」的話來！父母被殺掉，可以無動於衷，一聽到「圓圓」被擄，於是「衝冠一怒」，流血千里，完成了一「英雄美人」的佳話。長平（？）一戰，項羽一下子「坑」了秦降卒二十萬，在他眼裏這也許還不成個數目；蜀山爲之全兀的「阿房宮」，一炬三月，「可憐焦土」！殺人放火，偉大傑作完成，自稱「西楚霸王」，當此時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到了時移勢去，踴促烏江，那個好心的舟子請他登舟東渡，他慨然歎息當年：「……與八千弟子渡江而西」，今天落得僅以身還，「即江東父母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江東父老乎」？終於在「四面楚歌」中，用悽愴的聲調唱出了「力拔山兮功蓋世，時不利兮驍不逝，驍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最後哀歌。接著是一泣數行下，就是在這大勢已去的時候，他還向命運作了最末一次的抗議，表演了他最動人的一幕，完成了一個英雄的死。把僅僅剩下來的幾十個殘兵，這樣一個陳勢那樣一個陳勢的擺列開來，大叫一聲：吾爲汝取某某頭，某某的頭果然被取下來，用紅血和頭表示著自己的失敗是

天命，「非戰之罪也。」這悲劇的最後一幕，史記上有一段生動的描寫：「汝非故人馬童乎？吾聞漢王購吾頭千金……馬童面之……」「吾德汝」，乃自刎，爭項王頭者，騎相踏……」（略記大意）

這幾行眼淚，這一段真情義氣的自白，曾經感動過我，使我替這位末路英雄洒過同情的眼淚。因為這幾滴淚，這幾句話，使他從「英雄」回復到了「人」。有人說，項羽所以失敗，就是因為他失去了一個做英雄的條件，換一句話，他還保留著一點不忍人之心。「鴻門宴」上，項莊舞劍到了那個預定的當口，把它一揮，便天下大定了。可是項羽終於讓這個可怕的敵手「如廁」遁去！然而，也正因為這一點，項羽給了人一個最後的真面目，使人千百年後，帶著同情想起他來。

英雄打天下並不是匹馬單槍可以成功的。他必須有武的幫手，文的啦啦隊。漢高的一將星如雲，謀臣如雨，劉備的桃園三弟兄，擴大成一關張趙馬黃「五虎將」，另外還有一位羽扇綸巾的軍師諸葛孔明。漢高祖雖然會經拿儒冠做尿罐，但等到了覺得啦啦隊實在是必不可少的时候，於是「馬上得天下」之後，也就大量用叔孫通一流文人去訂定禮樂制度。以鞏固那個既得的政權了。這情形，就連野蠻的異族——元清入主中國的時候，也未嘗異樣。

可是，這些文武衛星們，在患難的時候，彼此相共，「安樂」一旦到來，便「飛鳥盡，良弓藏」，落到一個「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場！而面目蒼白，雙膝無骨的文人，雖然長於體察逢迎，曲意承志，啞嘴踏趾，媚態可掬，可以得寵一時，弄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顯赫尊榮，

但當失去恩眷的時候，一個失檢的小舉動，一個笑臉沒有笑得適時，適趣，或一句捧場的文字沒有做到「心」裏去，殺頭免官之禍即隨之而來。那也就只好抱著一肚子忠君愛國的牢騷和失意的懊喪去行吟，去念佛，去享受一點餘蔭，或潦倒一生了。得意或失寵，並不取決於你本領的大小或技術的高低，而全在主子——那些英雄們的喜怒好惡，偏偏這喜怒好惡，又飄忽得像天空的浮雲，瞬息就有萬變。這也難怪，他們看得太多，經歷得也太不平常了。殺人，被殺，已經成了「司空見慣尋常事」，對於一個人的黜陟又算得什麼。講感情，論義氣，談道德，固然很好，但那樣做，却不能成爲英雄了。記得有一個故事是講

小時候很喜歡看戲，尤其是真刀真槍的武戲。但武戲的結果也總是頗爲悲哀的。蝦兵蟹將的被切瓜切蘿蔔，不必說起；就是嘴裏喊着嗚嗚的好漢，也並不如他們自誇的那樣硬朗，有時不免於陣上失風，向下台棚一倒，便從此銷聲匿跡。雖然死了的，有時也會改了衣冠面貌，重新上台，這時候，也或許會變得更威武，更不可一世，把一切對手殺得一個不留，可是在我這看客的心裏，總不免念於他們上次的失風，因此他們的威武，就在我心裏多少要打一個折扣。因此我想：比武而不免於失風，固然可悲，威武無敵而仍被像我一樣的看法，看作並不威武，這從好漢們自己的立場來看，一定更爲可悲的。

進一步說，像我那樣看客的觀感，也但據這些好漢的自誇，對於他們所重視的古代好漢，也當不過是追隨而已，而對於現代活着的像我那樣的常人，大不了「萬夫」之上再加幾個，也就會吃不消的。那麼譬如在若干烏獲（編者註：烏獲是古之力士，見孟子告子篇）之外，再加若干孟說，或是在四萬個的「萬夫」之前，我們的好漢，倘使能够自量其力的話，豈不更要覺得可悲嗎？

然而自古至今，凡是好漢，總是嘴裏嗚嗚的喊着，從不肯稍稍自量的。求其原因，大抵並不在於近視，倒在於爲了給自己鼓氣，所以便故意蒙住自己的眼睛，不去打量別人了。至於大言不慚呢，也只想把別人嚇下馬來而已。所以，悲哀却還是繫在他們的心裏的。

到張獻忠的，他有一個最寵愛的文臣，每天要見他，要他陪著吃飯，要把他官升一級，有一天，突然下令把他的頭砍掉，原因在他太愛他了。這雖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也可以看出英雄們的愛是怎麼表現的。

如果不嫌唐突的話，我們可以大膽的說：英雄就是半個瘋子。設若能够起死回生，請一位心理學家給那些古代英雄們診視一下，恐怕多少的心理是失了常態的。這是時代給他們的一種病，他們得意而又苦惱的把它帶到墳墓裏去。新的時代，新的泥土，新的英雄以新的姿態出生了。他們不再站在人民的頭上，而是站在人民的擁護上了。

悲哀

魏金枝

或許並不爲威武的好漢所重視，因爲我弄不動刀槍，那還有資格品評他們的威武。

但據這些好漢的自誇，對於他們所重視的古代好漢，也當不過是追隨而已，而對於現代活着的像我那樣的常人，大不了「萬夫」之上再加幾個，也就會吃不消的。那麼譬如在若干烏獲（編者註：烏獲是古之力士，見孟子告子篇）之外，再加若干孟說，或是在四萬個的「萬夫」之前，我們的好漢，倘使能够自量其力的話，豈不更要覺得可悲嗎？

然而自古至今，凡是好漢，總是嘴裏嗚嗚的喊着，從不肯稍稍自量的。求其原因，大抵並不在於近視，倒在於爲了給自己鼓氣，所以便故意蒙住自己的眼睛，不去打量別人了。至於大言不慚呢，也只想把別人嚇下馬來而已。所以，悲哀却還是繫在他們的心裏的。

今日張家口

——塞外五日之行之二——

胡 笛

不同派系的軍區

平綏路從康莊分道，主要是由於軍政的區劃。如果說這一地區由於收復而歸統一，在表面上，也許還可以勉強說說過去，實則無可諱言，任何一個人，只要是他沒有偏見的話，就一定看得出很多不很協調的地方。

只要是我們肯細心觀察在這一塊地區分散的各種不同軍事力量，就可以按照習慣分為：北平行轅是桂系軍人，十一戰區（現保定綏署）是馮系軍人，十二戰區是晉系軍人。雖然傅作義將軍在骨子裏業已脫離關系而自成一派，但一般說來，也只有借用晉系軍人這個固有的名詞了。中間又夾雜了中央嫡系的黃埔軍人（如胡宗南將軍的第四集團軍，現由李

文軍長統率）。在這裏粗略地描繪出一個輪廓，意思是說明在不同派系的軍區內，他如政治，經濟，以至教育文化，都有兩套作風。

甲今戰場

從康莊開車是十二點廿五分。以時間計算，北平到康莊是從日出到中午，正好半天；由康莊向西行，直到張家口，正是日落西山的時候。

車過懷來，下花園，宣化時，都會停留片刻。從車窗中看出去，或者是在站台上眺望，都是觸目驚心——戰爭的破壞性，殘酷性，無人道性，一呈現眼前，不禁黯然久之。

懷來曾經有過一場劇烈的爭奪戰，為此，至今戰勝者還在鬧着爭功的醜劇，當時東綏集中重兵，吸引了共軍的主力，想來一次殲滅戰。共軍也以同樣戰略，展開了爭奪懷來的戰鬥，相互拉鋸數次，最後國軍才乘勝入城，繼而下花園挺進。據後來的傳說，當時共軍的兵力放在平綏綏東西兩段策應，不料想傅作義的輕騎部隊繞道百靈廟，從腹背奇襲張北取勝。從此國軍在平綏路才從全線失守轉而為點線控制，共軍向南退入太行山區。這已經不是軍事重提，只不過今天平綏路上戰雲又起，而原來東綏與西綏的戰功，至今還是一個爭訟的問題，東綏駐軍說：如果共軍主力不被牽制在懷來，張家口之勝就不可能；西綏的說

法，如果沒有張垣之下，懷來之圍就不能解——軍人打內戰，已經是很不名譽的了，何況爲了一根狗骨頭，爭鬥不休呢？真是太不知羞恥了！

塞外沙漠中的綠洲

下花園與宣化，恐怕是塞外沙漠中唯一的兩塊綠洲。

在日本人佔領時期，爲了開發這裏的富源，下花園有一個大規模的發電廠，現正由經濟部派來的技術人員修理中。據專家們傳出來的消息，這裏有一部首冠東亞的發電機，而修起來，由於中國的材料缺乏，還得等日本的賠償物資運達後，才能全部動工。否則，即使從美國購進，也不合用。

宣化的龍煙煤礦，更是名震一時，可是高入雲霄的煙囪并不冒煙，近代化的機器已生着一層黃色的鐵鏽。礦區很寬廣，房屋也很多，車行五分鐘，還沒有離開礦廠的範圍，其規模之大，可以想見。

再訪張家口

車到張家口，時已下午六點廿分。日光已向西山沉落，但見車站上，站立了一排穿着各種不同服飾的市民，隊尾跟着一些穿着軍服裝的男女學生，整整齊齊，衣服貼貼站在月台上東張西望。大隊的前面豎着一面白色旗幟，上書：中華同民協會張家口分會。看樣子，好像是歡迎什麼國教領袖似的，因爲在不久以前，白崇

禧將軍來這裏的時候。同民會一度活躍過。

記者到張家口，這算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十年以前，只停留過二十四小時。十年的時間，都在抗戰中消磨了，過去在記憶裏雖然還留有一點模糊的痕跡，但是新的街道，新的建築，以及新的人流，都感到陌生，好像最近考爾門所演「驚夢重溫」一影片中描繪的一個退伍軍人，從精神病院走出，在馬路上踉蹌了一跤，就把往事忘的一乾二淨了。

三個不同的時期

車站對面的一條街，完全是近代化建築，現名中山大街，在張家口未收復前，名「解放大街」，在蒙疆政府時代原名「中央大街」。從這一條重要大街之三易其名，不由自主地在腦海中，剎時泛起一個問題，這裏的人民三易其主，在三個不同的時期，所遺留在民間的東西是不是也有不同？這刺激着記者的好奇心，想來一次比較的觀察，可是由於時間的短促，只能達成部份的願望。

今天國內與張家口這個城市相類似的地方還很多，但是沒有一個地方，在勝利後兩年短促的時間內，有這樣顯著而劇烈的變化。

在飛沙走石，黃土迷漫中，走過中山大街，向右拐彎處，就是「清河橋」。橋的兩端懸着銅牌兩塊，上書：「中華民國十四年建清河橋張之江題」。

從張之江想到了西北軍，是的，在這裏關於西北軍的軼聞逸事，老實多的不可勝計。記者住的地方，原就是馮玉祥將軍的招待所。

上堡和下堡

清河橋以西，就是原來的下堡，是張家口唯一的商業繁華區，主要的鬧市如怡安街與福壽街，還是完整無缺，一如十年前的老樣子，只是街道與房舍，看上去有點腐朽破舊的樣子。

清河橋以東的房屋大部分還是蒙疆時代建造的。如中山大街，已成今日文化銀行等機關的集中地方；橫接着中山大街的是東安大街，過太平橋就是建國大街——今日綏靖公署所在地。所以，當你步入建國大街的時候，堡壘堆積，上單鐵絲網，崗衛林立，雄糾糾，氣昂昂，如臨大敵。老百姓經過時，都要經過檢查與搜索，檢查的嚴密，徹底與認真，那是記者十年來走遍各大城市，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

與下堡對稱的是上堡。整個張家口的市容輪廓是：下堡是商業區，上堡是行政機關區。如省政府與各廳均在上述，橋東的新市區則是圍繞着綏靖公署的軍事區。

張家口的地形三面環山，南面平綏鐵路平原，正好是一個缺口，大清河縱貫其中。北面有高山，長城蜿蜒，峭壁矗立，據說蒙疆時代，日本人在這裏利用長城建立了一條東方

馬奇諾防綫，專門是為了防制蘇聯的。山下有「大禁門」，門上書有「大好河山」四個大字，遊人至此，對日本人的深謀遠慮驚嘆不置！

走進大禁門，就是上堡所在，除了省政府與各廳處外，還有蒙旗文化福利委員會與蒙旗青年勵志社等等。這一條短狹的形同直筒的街道，兩旁都是些舊式的蒙古靴鞋店和皮毛茶莊，每家店舖的招牌上除了有中文字幕外，都鑲着一行金黃色的蒙文。

上堡是一個沒落的市場。據說：張庫路通車的時候，這裏也曾是一個進出口集散地。而今，因為張庫路已經截斷，所以這一帶的商人嘆息着自己的沒落，用嫉視的眼光死盯着下堡的「玻璃生意」。甚至於張家口唯一出口的口蹄，今日也同樣遭逢着窮途末路，每斤只值十二萬元；雖然這是張家口唯一准許外運的出口貨，然而戰爭與交通限制了它的出口量。

上下堡相距不到十華里。交通工具除了人力車以外，就是僅有的三輛公共汽車，但比起南京下關進城的敞篷公共汽車，還要好一點，而且管理的比北平公共汽車好，軍人也得購票，售票員有無上權力，可以執行他的任務，不像北平的公共汽車，被人呼之爲「氣車」，每輛車子軍人總佔了一大半，一般乘客多踏在車廂中間，而座位上都一色武裝人物，

售票員的態度與語言，稍一不慎，就得飽吃耳光。這也許是此間「奮鬥」精神做得澈底的一個顯着的例證。

「後套娃娃」

另外一個特點是，這裏的戰爭氣息特別濃厚。在市街中心，或是十字路口，必建一低矮圓頂的碉堡，如蒙古包然。堡內有地下室，堡上有鐵絲網，就像是一個盤絲洞。每個洞口站着警察與偵察隊員各一，前者着黑色制服，外省人居多；後者着灰色軍服操縱遠土話，人們呼之爲「後套娃娃」。這是傅作義將軍在抗戰八年中，偏安河套一隅的偉大佳作，據一個粗略的估計：傅部下有三萬五千名「後套娃娃」，不久以前解保定之圍，攻下滿城的部隊就是這些「後套娃娃」表演的成績。

如果你要是會操幾句似是而非的綏遠話，在這裏行動上是有許多方便的。因爲這些娃娃們大部份是幾代沒有離開過桑梓的，所以，背井離鄉之後總是對於老鄉們有些例外的優待。

舉例來說：張家口於每夜九時實行戒嚴，除非你有一口「奮鬥」與「特別口令」，否則寸步難行的，然而有一位北大學生到這裏探親，在晚間走過出來，因爲是後套人，把學生證拿出來，用綏遠話打一個招呼，就可以「派司」。這是一位親身經歷的人說出來的。

「同志」和「戰士」

談到軍制服，這裏有許多事物可以把你的回憶重新帶到抗戰時期去。察綏兩省的軍人均着布料灰色軍服，公教人員一律着黑色布料中山服，所以，當你走進辦公室的時候，廳長或者市長和工役並排站在一起，讓你很難分辨出來誰是官，誰是兵。在稱呼方面，一般是官與官之間稱「同志」，兵與兵之間稱「戰士」，據說這也是「奮鬥」精神之表現。但有例外，記者在同程的火車上面看到這般奉行奮鬥精神的官員到北平去的時候，車過康莊，就車廂中大換制服，或長袍，或西服，面目一新，車廂中的乘客都好奇地凝神注目，懷疑着這般作風所爲何來。

衣，食，住，行樣樣「奮鬥」，所以還有「奮鬥飯」，可惜的是記者沒有機會去嘗試。有人打趣地說，這或許是對於消化系統的調整，使胃口也「統一」起來。

配合着這一精神，表現在文化方面的，在察綏兩省都有「奮鬥日報」。這是唯一的報紙，也是僅有的精神食糧。
充滿着戰時氣氛
勝利後，從後方回到收復區的人們，習慣上總喜歡用「

復員」這個名詞。如果就復原而言復員，無論從那個角度看，今日張家口距離復員的程度，還是丈二八尺遠。從張家口的輪廓上，已經讓人們意味到這裏充分表露着極度濃厚的戰時氣氛。無論政治與經濟以及其他，都是配合着軍事，爲了軍事而動員着。

張家口的面目，我們已經有一個粗綫條的紹介。爲什麼這樣一個僻塞的地方，在民國史上，會爲軍家所爭，成爲塞上的一個重鎮呢？唯一的解釋，恐怕還是因爲這個地方四通八達，在西北國防綫上，正當衝要。以張家口爲中心，西北有張庫公路可以通外蒙與新疆，雖然這條公路在目前已經不通。東北有公路經多倫出熱河可達東北九省，東西有平綏鐵路橫貫其間，南由大同，折向同蒲鐵路，也可以出潼關或娘子關轉往各方。

所以，張家口在近幾十年來，戰前曾爲西北軍的大本營，淪陷時期，是蒙疆政府所在地，戰後又爲晉察解放區的重心。記者在一個破舊書攤上面無意中找到一張「凸版印刷株式會社」在「成紀七百三十四年十二月四日發行」的「蒙疆本部」地圖一張，記載蒙疆包括的區域爲五盟兩行政區，五盟是：巴彥塔拉盟，烏蘭察布盟，察哈爾盟，伊克昭盟，錫林郭勒盟；兩行政區是察南與晉北。以今天的行政區劃，五盟中的烏蘭察布盟與伊克昭盟均在綏遠境內，其他三盟分散在察境，所謂察南就是今日察省鐵路以南的地方，晉北即指雁門關以北的地方，如果和綏靖公署所轄區域比較來看，除了晉北是屬於綏署副主任楚溪春的轄區外，其他地方正好就是今日傅作義將軍的勢力範圍。

時與文週刊

發行人 程博洪
編輯者 時與文週刊編輯部
經理部 上海牯嶺路三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內政部總登記證京警滬字第四一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怡豐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實業
扶助

服務
社會

總行 重慶民生路二府衙二號

分行 上海江西路四六七號
電話 二〇二〇號

宏豐企業公司

總公司 上海廣東路五十一號
電話 一一四五三一五

承辦進出口業務

分公司 漢口聯保里五號
重慶林森路一二七號

上海駁運公司

地點：上海四川中路一二五弄二〇號
電話：二一三二二四

南榮記 和記 報關行

地址：上海廣東路一二三號
電話：一〇四一八號

天隆被單



經濟實惠 美觀大方

天隆染織廠出品

附冊

民主路線與中間路線……伍丹戈

中間路線與挽救危局……施復亮

從物價狂漲看經濟崩潰……龍成志

學生運動是季世現象嗎……馮契

8

英國人與緬甸……肅草

美軍是這樣撤出中國的！……辛揚火

傅作義治下的察哈爾……胡笛

新小上坟……安娥

漫畫……洪荒·石東·白木



本號創設於前清康熙元年距今已有二百餘年歷史之國藥

雷允上國藥舖

秘製六神丸

全國聞名 · 功效如神

男女老幼 四季咸宜 居家旅行 不可不備

上海北支路特設飲片部

接洽電話 送貨購藥 請撥電話 北支路 北支路 北支路

蘇州總號 閶門內 西中市 上海分號 南馬路 興法大 北支路 北支路 北支路

證券交易所第九十七號經紀人

宏業證券號

北京路河南路口 國華大樓六樓604號 電話九四九四八

上海證券交易所第四十八號經紀人

丹巴證券號

上海中山東一路(外灘)十八號 四樓四一三三號室 電話一三四四四一

本刊第七期 · 第六期 · 第五期要目

政府改組後之「施政方針」	馬敘倫
政府儼然改組了	程
中國民族工業的國內市場問題	李紫翔
新財政與舊財政	伍丹戈
關於男女分校	碧
何為美	周繼善
試論英雄	臧克家
過河小卒和殺蠶芸香	于冰
悲哀	魏金枝
今日張家口	胡笛
現階段中國之政治與教育	周谷城
武力解決抑和平變更	湯德明
徵借國外存款之商榷	趙鳳階
戰時的昆明勞工	陳達
日本政黨的新分合	林煥平
聞一多的一生	吳晗
羅曼羅蘭的道路	楊晦
叔孫通之流的業績	歐陽牧堂
中間派在政治上地位和作用	施復亮
從民主政治的條件說到來日和談	程
內戰財賦的幻術	甘祠森
呼吸英雄的氣息	陳石銘
哲學是什麼？哲學家應該做甚麼？	張東蓀
小說中的「光」與「熱」	林海
無錫二日遊	潘子農
儒術途窮	于冰
一種可貴的精神	以羣

時與文週刊

發行人 程博洪
 編輯者 時與文週刊編輯部
 經理部 上海牯嶺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民主路線與中間路線

伍丹戈

最近展開的「中間派政治路線」的討論，還是一個沒有解決，沒有得到結論的問題，然而它却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因為這一個問題，不單關係民主陣營內部的組織團結和合作等等問題，而且更關係着整個民主運動的奮鬥目標、努力方向以及工作方式等等問題，這在將來爭取民主爭取和平的前途上，自然都有極重大的影響和作用。

這個問題爭執的要點有兩個：第一，當前的政治路線，除了反動路線和革命路線之外，是否還有一條改良的中間路線？或者是現在僅僅祇有民主路線和反民主路線的存在，當中決不容許也不可能產生第三條政治路線？就是中間路線？其次，政治路線是否中間派的政治路線？還是爭取民主的各階級的共同路線？也就是全民主的民主路線？本文因為篇幅限制，單討論前一問題。——作者註

在馬敘倫先生說：「從政治協商會議五大決議案被政府黨推翻以後，只有民主和反民主的兩方面」，「不容許在民主和反民主的兩方面以外有第三方面」的時候，施復亮先生雖然強調「第三方面」的「獨立的立場」，然而他仍舊聲明：「第三方面或中間派，本來包括在民主陣綫以內，決不在民主陣綫以外。我也跟馬先生一樣，絕不贊成『在民主和反民主的兩方面以外』還有個什麼『第三方面』」。但在最近復亮先生提出的「論中間派的政治路線」之中，却說「擺在我們面前有三條政治路線，第一條是代表官僚買辦資本家和大地主的右翼黨派所走的反動的政治路線；第二條是代表工人貧農的左翼黨派所走的革命的政治路線；第三條是代表中間階層的中間黨派或中間派所要走的改良的政治路線」。這似乎和從前的意見有點出入，不過我們根據復亮先生強調的中間路線的「民主性」和「進步性」，我們仍舊可以推定他所說的中間路線，是在民主陣綫以內的。

但是，事實上，我們倘若照復亮先生堅持的中間派政治路線的說法做去，那麼，以後在民主陣營當中，就應該而且必需有兩個方面，兩條路線，假定照敘倫平心兩先生的意見，那麼民主陣營以後還祇有「一個方面」一條路線。

不過，這裏必須先作一點解釋，就是所謂「方面」我是指在同一政治

目標奮鬥下的各階級的結合，而不是指的單純的階級。必須這樣，我的說明纔有着落。假定拿「方面」作為階級或階層來解釋，那的確像復亮先生所說：「當前政治鬥爭中『第三方面』（即中間階層——作者註）的存在，是一個事實問題，不是一個名詞或觀念問題」。單單祇有一個方面，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復亮先生雖然也不承認在民主反民主以外還有什麼第三方面，然而我們就事論事，假定在民主陣綫以內，有兩個獨立而不盡相同的政治路線，那麼這兩個不同政治路線的政治集團，自然也要形成兩個「方面」，這也是「一個事實問題，不是一個名詞或觀念問題」。

因此，現在的問題是：在民主陣綫以內，是否可能，以及有無必要產生兩條政治路線，形成兩個政治集團？

這首先還要看「政治路線」這一個名詞的解釋。因為有許多問題的爭論，就都是由于名詞解釋不同的原故。但這裏却發生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復亮平心兩先生在同一定義之下，却得到不同的結論。復亮先生雖然借用平心先生的定義，認為：「所謂政治路線，乃是一個或數個階級為達到其企求目的，所確定的基本政治方向」。然而他却仍舊認為中間派應該有它的政治路線，因為我們既然不能否認中間階層即中間派的存在，那麼我們自然也就不能否認中間階層有它們自己的政治路線。另一方面，平心先生却認為每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基本的政治方向祇有兩個，因此政治路線雖然是有階級性的，然而在這朝着兩極端分化的相反的政治傾向之下，決不可能產生第三條路線，也就是中間路線。雙方的意見都有根據，在邏輯上也並沒有錯誤。因此，問題還在原來定義的內容。

這一個定義的內容，並不是錯誤，而是含混，這就使各人有各人的解釋。復亮先生着重在政治路線的「階級性」，平心先生却着重在政治鬥爭中的「基本政治方向」。于是產生了以上的歧異。

我認為，「政治路線」既然是指特定的歷史階段上的基本政治方向，那麼，這種方向雖然是有階級性的，然而它却「可能甚至必然」代表並符

合某幾個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它也並不等於其中某一階級的全部政治意見，在這種情形下，各個階級也都有它自己的政治意見和政治主張。這種特定的階級的政治主張，和它與其他階級共同努力希望實現的政治路線，當然有份量的輕重和質量的差異，但這也無妨於他們對於共同的政治路線的追求和堅持。因為祇有這一種政治路線，纔能使具有共同要求和利益的各個階級，達到他們在政治上的企求。假若是某一個階級的獨立的政治主張，那它對於本階級雖然是最有利的，然而它却得不到其他階級的擁護和支持，因此政治力量必然薄弱，決計不能贏得勝利，完成它的目的。

同時，政治路線在實際上所表現的是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鬥爭，因此，在事實上基本的政治路線就祇有左右兩條，假定在這兩條路之外，產生中間的第三條路，那它不是「偏左」，就是「偏右」，在本質上一定可以歸入前兩條路的某一條路之中，也就是說，它決不是第三條路。因此，在這一點上，我是贊成平心先生的見解，却不能同意復亮先生所說「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可能甚至必然有三條不同的政治路線」的論調。這在最近一年多來中國政治的實踐上，也是極分明的。

中間路線的特點是什麼呢？照復亮先生意見，它「在堅持政協路線這一點上雖與第二方面相同，但它堅決反對內戰，反對以武力作政爭的工具」，因為，「反戰是中間派的基本態度」，「站在中間派的立場，在任何情形之下，都非反對內戰不可」。

這裏，我們應該研究的是：左翼黨派（即第二方面）是否一定要用武力革命的手段？是否不願意走「改良的」政治路線？它的「以武力對抗武力」，是怎樣形成的？

關於這一點，我們知道，中共從抗戰開始，就表示它願意和國民黨政府合作共同抗戰，並且公開聲明放棄它過去的革命路線，而願意走「和平的，漸進的，並且是改良的」政治路線。復亮先生也認為在「去年十一月以前，中共也曾經支持過中間性的政協路線，在經濟政策上，中共更作了極大的讓步，主張保護私有財產，獎勵民營企業發展自由資本主義，實行勞資合作，並停止沒收土地。在政治上也作了原則性的讓步，即放棄蘇維埃制度，承認英美式的民主政治。這些都是證明中共傾向中間路線」。所以，中共沒有要走革命的左翼路線的企圖，是很顯然的。

另一方面，第三方面的民主同盟的二中全會政治報告也會「很公道的說，整軍方案是中共方面很大的一個讓步。當中共簽字這個協定時，確實有了與國民黨合作的誠意。第一，這個方案的名稱，就叫「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中共既願把軍隊拿出來整編與統編為國軍，中共簽字這方案的時候，已決心將黨的武力交還給國家。第二，整編與統編的數量，國民黨與共產黨是五對一的比例，到了統編時期，中共在東北方面十五個師中只有一個師，這顯然證明中共已決心放棄武力對峙的計劃」。因此，中共在能走上政協路線的場合，並沒有走「以武力對抗武力」的革命路線，並且還為了「和平」而願意放棄自己的武力。

然而為什麼中共終於走到「以武力對抗武力」的道路？很明顯的，這是因為反動派的統治集團，雖然參加政協，並且簽訂政協協議和整軍方案，但他們自始至終就沒有一點誠意，他們這一年多來的努力，就是怎樣撕毀政協協議，展開撲滅民主運動的全面內戰，回到獨裁反動的老路，到了去年十一月召開御用國大之後，是最後完成了這個工作，並使「和平的門」完全關閉了。

事實已經很清楚的擺在我們面前：當前的內戰是反動派的統治集團爲了完成它的撲滅民主運動的計劃而發動，並不是左翼黨派爲了要實現民主革命而產生的。假定左翼黨派在這時候，仍然希望走和平的路，那就祇有一個結果，放棄爭取民主的任務，束手就擒，使反動派兵不血刃的和平完成他們的反民主工作。所以在這一方面，並不是「代表工人和貧農的革命集團」的「拋開政協路線」，一定要「以武力對抗武力」，而是復亮先生所說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始終堅持這種反動的政治路線」，「逼迫共產黨採取革命的政治路線」。這正是中國人民最慘痛的命運。

然而可哀的事情，還不止此。假定革命集團爲了實現「左翼路線」而採取革命的手段，那在主張走向「和平的，漸進的，並且是改良性的」政治路線的中間派，還不至於絕望，因為像這樣的路線，也許還可用和平手段走得通，我們甚至於還可以將當前的內戰，設想爲左翼黨派爲要實行左翼革命路線，澈底威脅到統治集團的存在的原因，倘若改良性的和平政治路線，也許就可能爲統治集團接受，不至於產生內戰。然而不幸的是，革命集團所要爭取的也並不是真正的革命的「左翼路線」，也正是改良的

（下接第十五頁）

中間路線與挽救危局

施復亮

一 中國人民速起自救

最近張東蓀先生一連發表了三篇極重要的文章：一篇是「美國對華與中國自處」，發表在三月三十日的「文匯報」上；另一篇是「和平何以會死了」，發表在「時與文」第三期上；還有一篇是「追述我們努力建立聯合政府的用意」，發表在「觀察」第二卷第六期上。這三篇文章，「文匯報」和「觀察」都加以全部轉載，可見異常為人所重視，非普通政論文字可比。

總觀張先生三篇文章的中心意思，就是要喚醒全國民主人士努力建立「中間性路線」，「用聯合政府以表現中國在國際上的中間性」，藉以「挽回中國自身的悲劇」，並「消弭未來的世界大戰」。這種主張，跟我一年多來所發表的意見完全一致；現在由張先生出來大聲疾呼地號召，我很願意再作一度微力的響應。

張先生很正確地指出當前國內國際局勢的嚴重性：「本來國民黨已趨極端，共產黨亦跟着趨了極端；倘再加上一個美國的趨極端與蘇聯的趨極端，則這個世界便非人所能住了，中國便成爲一大悲劇的導演場所，而人類的末日與文化的淪亡或將從此開始。可見中國人對

於世界所負的責任實在大到無比，真是全世界的安危與全人類的存亡都繫於中國人的如何自處了。」（見「美國對華與中國自處」）所以張先生要我們「鼓起自信心，不要自己以爲渺小，要毅然決然集合力量，衝破這個難關」；「中國人必須自己起來以謀挽回這個劫運」。（同上）

目前國共兩黨的內戰正在加緊地進行，萬一因此引起美蘇兩國的直接參加（美國早已在實際上參加了內戰的一方，幸而蘇聯還沒有參加內戰的另一方）或直接或間接的，我們的痛苦悲慘還不知道比現在要增加幾十倍。一切反對內戰的人民，爲了救自己、救國家和救世界，都應該趕快挺身出來，以團結的力量去壓迫國共雙方接受人民的要

求，立即停戰，恢復和平，重新回到政協道路，組織聯合政府。在這一個爭取和平民主的運動中，代表中間階層的中間派，特別佔有重要的地位。倘使中間派不能形成一個強大獨立的政治力量，不能堅持中間性的政治路線或中間路線，便不能「衝破這個難關」，「挽回這個劫運」。

二 「調和國共」與「兼親美蘇」
我們所說的「中間路線」，簡

單說，對內主張「調和國共」，對外主張「兼親美蘇」。政協路線就是這樣的一條「中間路線」。在今天的中國，也只有這樣的路線才是真正的民主路線。

張東蓀先生對於今天中國的民主，有極透闢而很正確的說明：「我們因此遂主張各黨共存，都能發展，這就是民主。除了各黨並存合作以外，另求民主，這不是曲解民主，便是有意造成假民主。總之，各黨協商，由共同而得一致，由不同而互相制衡，這乃真是民主。」（見「追述我們努力建立聯合政府的用意」）明白點說，在今天中國政治中，倘使不容許共產黨存在和發展，決不能算作民主；反轉來說，倘使不容許國民黨存在和發展，也不能算作民主。其實，不僅對國共兩黨如此，對於任何黨派，都應當容許它的存在和發展。換句話說，當前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就是要有一個政府，保障一切黨派在同等的機會和條件之下自由存在和發展，不許任何黨派享有政治的、法律的、軍事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特權。倘使缺乏這一基本內容，不管形式如何，一律是假民主或反民主。因此，倘使國民黨不肯改變其政府的性質，即不肯放棄其「絕對政權」，即使有了「憲法與選舉」，也決不是民主。同樣，倘使共產黨也

採用了同樣的做法，那自然也不是民主。所以我們要主張調和國共，不許國民黨排斥共產黨，也不許共產黨排斥國民黨。我們要「主張各黨共存，都能發展」。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解決當前的黨派問題。自然，我們主張調和國共，決不是無原則的，也不是被動的。我們認定在當前國內和國際的情勢之下，只有中間路線才是犧牲較少的可能實行的路線，我們要根據多數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把那「趨於極端」的國共兩黨拉回中間性的政協路線，以和平合作的方式達到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經濟工業化。同時我們要以主動的態度，堅持自己的反戰立場與民主原則，努力爭取中間路線的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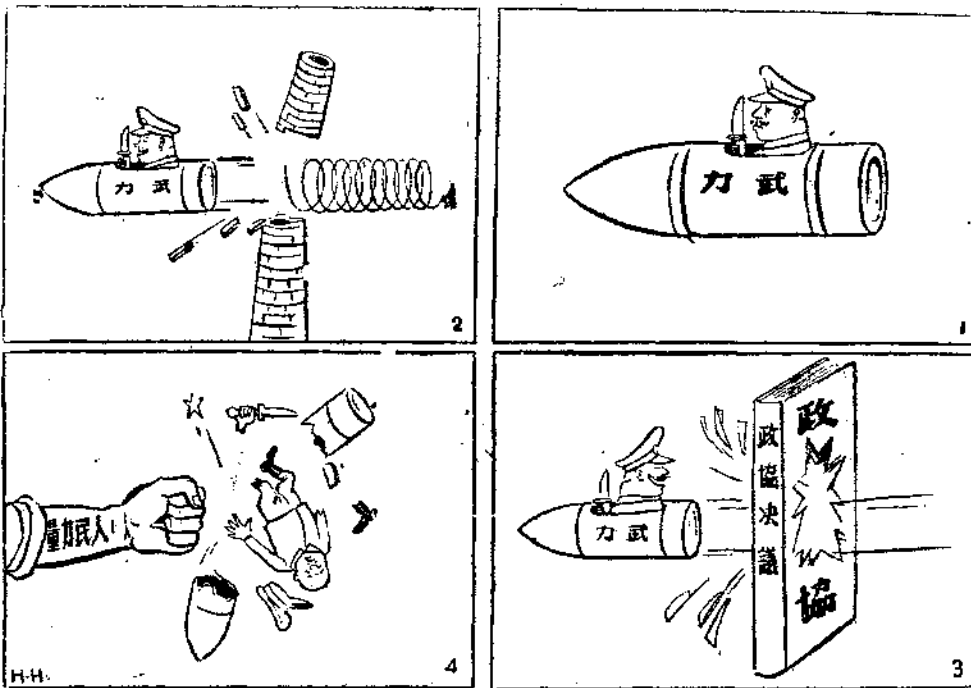
就國際情勢來看，我們也有採取中間路線的必要。只有在國內政治上採取中間路線，才能在國際關係中採取中間路線。我們的外交政策，必須兼親美蘇兩國，既不應親美反蘇，亦不應親蘇反美。這樣的外交政策，只有在那包括國共兩黨及中間派的聯合政府成立以後才能採用。錢端升先生說：「兼親美蘇，不於美蘇之中作仇友之分，對於我們利最多，害最少。」誰能執行此兼親兩國的外交政策呢？在內戰進行的國民政府能呢？不能。……共產黨消滅後的國民政府

能不能呢？不能。……國民政府崩潰後的共產黨政府能不能呢？也不能。——「觀察」第二卷第四期——唯和平可以統一論——為着實行「兼親美蘇」的外交政策，我們也只有採用中間路線。

張東蓀先生說，「我們決不是無條件的反美，……也決不是無條件的親美」，或者「親美甚於親蘇」，在原則上我都可以同意。張先生說「我們只反對美國以中國作反蘇基地這一點」；我覺得我們還應該附加一點，即我們還反對美國把中國當作殖民地看待這一點。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極端歡迎美國的資本和技術的援助，並願以相當的權益作交換，但須不損害國家的主權和國民經濟的自立。假使以中國的殖民地化，換得「美國的經濟與物質的援助」，那就必然難免「以中國作反蘇基地」。「美國當局」——根本忽視中國本身的福利，專打它自己的算盤」。在美國人民起來糾正「美國當局」的錯誤的對華政策以前，我們不能希望「美國當局」會自動消除「誤會」。只有中國人民的堅定的有條件的反美運動——反對其「片面援助」及殖民地化中國的政策，才能跟美國的民主進步的勢力相呼應，達到將來的有條件的親美。倘使「美國當局」不改變其錯誤的對華政策，要想中國人民「無條件的親美」，根本是不可能的。張先生提議組織訪美團，倘使人選適宜，活動得當，自然可以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有助於中美兩國關係的改善。

中國的對蘇關係，跟對美關係有些不同：第一，直到現在，蘇聯並不會干涉中國的內政，並不會援助內戰的一方以助長中國的內戰；第二，在共同防止日本帝國主義的再起這

一點上，我們有跟蘇聯採取一致行動的必要的，而美國目前的對日政策却正在扶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再起；第三，中蘇國境相連，一萬餘里，蘇聯又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強國，我們實有跟它修好的必要；第四，蘇聯是一個新興的進步最快的國家，其建國的精神和方法實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和參考。所以我們原則上，對蘇聯應當採取親善政策，決不可採取



反蘇政策。張東蓀先生說：「中國沒有絲毫理由反蘇，亦決再經不起另一世界大戰」。——見「美國對華與中國自處」——錢端升先生亦說：「我們實在看不出蘇聯有威脅我們

安全獨立，且甚重要，且能衝突，也是找不出。——從我們自己的利害來看，我們不能不聯美以反蘇。——我們親美，有美蘇，才能因世界的安而獲致中國的安全。——國之資助而致力國內的建設。——「觀察」第二卷第三期「世界大勢與中國地位」。對外要「兼親美蘇」，必須對內先「調和國共」。國共兩黨不能

合作，兼親美蘇便不可能。要使國共兩黨能够合作，必須有一個強大獨立的中間力量，能够強迫國共兩黨重新回到政協路線。這是中國人民挽救危亡的重要關鍵。

三「還政於民」與「聯合政府」

關於黨派與人民的關係，張東蓀先生有一段極透闢的說明：「例如主張維持專門資本的利益，雖不必盡為國民黨員，但國民黨足以代表之。又如主張土地再分配，雖不必都是共產黨員，然共產黨足以代表之。又如有些人們主張無條件的親美，雖不隸籍於國民黨，然不必在國民黨以外另成一派。更如主張調和美蘇與使國共妥協，這樣的主張實在有極大多數人，這些人不在民主同盟，但却說他們都站在民主同盟的背後。每個黨不是倚靠其黨員；倘使能有些人民與其主張相類似。恐怕所有人民的意見在大體上亦盡於斯矣」。——國民黨是代表專門資本與官僚資本的；共產黨是代表農工無產階級的利益；民主同盟是代表所有中間階層」。——如果把這些黨派都能調和在一起，便亦可說所有的人民的社會利益都包括在內了。所以各黨協商在表面上好像只是黨派的事，而實際上却正是實現民主。——像國民黨所要求的那樣主張撥開黨派，直接還政於民，好像是很漂亮，而其實乃真是想強奸民意」。——見「追述我們努力建立聯合政府的用意」。這是於「各對

黨共存，都能發展」的民主真理的最正確的具體說明。不懂得這一點，便不能算真正認識當前中國的民主，因而也就無從辨別什麼是真民主，什麼是假民主。

原來中國現在還是一個多階級的社會，各階級雖有一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意見，但也有其特殊的個別利益和個別意見。不同的黨派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是因為有不同的階級利益。任何黨派，實際上都只是代表一個或幾個利害相近的階級（或階層）的，是一個或幾個階級內部最覺悟最積極的份子的結合。否定一個或幾個黨派的存在和發展，便無異否定一個或幾個階級的存在和發展。所以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是允許一切黨派的平等合法的存在和發展，允許一切黨派有參與政治和爭取政權的同等機會。不透過黨派關係或黨派競爭，便根本無法施行民主政治。因此，倘使一個有階級的國家，不容許「異黨」或「反對黨」平等合法的存在和發展，便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不管它掛的什麼招牌，實際上是一個法西斯國家。

就當前中國的實際情形來說，儘管國民黨政府頒佈了一部御制的「憲法」，制定了一套所謂行憲法規，準備在它一手包辦（還邀請兩個「御用黨派」做陪客）之下來實行「選舉」，實際上也是一種假民主，跟真民主毫不相干。雖說協非基於「選舉」，但它包括了當時一切有力的黨派，特別包括了最有力的反對黨（共產黨），所以它在

實際上具有空前的民主內容，超過中國政治史上的任何會議。去年十一月舉行的「國民大會」之所以不能冒稱「民主」，不僅因為它根本違反政協的原則和程序，而且因為它排除了當前中國最大的反對黨和獨立的中間派（民主同盟）。今後中國任何全國性的或地方性的會議，任何全國性的或地方性的政府機關，倘使沒有民盟和中共的參加，決不會有真正的民主。這是測驗當前政治是否民主的一個最合理的實際的標準。

所以張先生說：「美國如果真以為國共兩黨在性質上絕對不能合作，只有使國民黨民主化，把共產黨擱在聯合政府以外。我敢說，這是一個勞而無功的把戲，又是一個自欺欺人的想法；須知苟無各黨一致參加政府，則國民黨一輩子亦不致民主化。不把共產黨拉到大會大城市來，則其性質不會改變，把它留在外邊終久不會得到平安。」（見「美國對華與中國自處」）這是一種極實際的極正確的見解，將來的事實一定會證明這一真理。

關於專政引起內戰的道理，劉酒誠先生在他的「現代中國政治改革的幾種原則」（「觀察」第二卷第五期）裏也有一段極透闢的說明：「專政的一部份人，要把握政權，必竭力排擠他人，使不能參與政權之行使。更爲維護本身利益起見，必不能真正提倡全民福利。反之，被剝奪權利的人，必採取一切方法，不惜出以暴動及武力抵抗，來維護他們的權利。所以，在不民

主的國家，意見或原則的衝突，往往容易釀成內戰，就是這個原因。我們中國不就是這樣的嗎？」所以我們主張聯合政府必須包括共產黨，並且「主張否決權可純粹給予共產黨」（張先生語），不是替共產黨打算，而是替整個國家打算，希望中國能够從此避免內戰，實現民主。也只有這樣的改組政府，才能真正擴大政府的基礎，改變政府的性質，把一黨的「絕對政權」改變爲民主的「職司政權」。

至於目前正在進行的所謂「改組政府」，那不過是國民黨一向所奉行的「以不變應萬變」與「以萬變保不變」的一套手法，並不會擴大政府的基礎，因而也不會改變政府的性質。據錢端升先生說：「政府改組由青年民社兩黨加入若干人，由接近政府的社會賢達加入若干人，則政府的素質並無變更」。今日中國人民，除了少數當事人以外，大都不願有內戰。不願內戰者決不願加入一個政府。（見「唯和平可以統一論」）換句話說，只有支持內戰者才願意加入這樣的一個政府，因為這個政府已經決定繼續內戰或內戰到底了。青年民社兩黨和一部分所謂社會賢達願意加入這樣的政府，就是表明他們願意支持內戰，分担內戰的責任。但是這樣的「改組政府」，除了滿足一部分人的「獵官慾」和騙取美國的一方面援助以外，並不會真正增加國民黨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有利地位。這一套把戲的欺騙作用，至多不會超過半年。這些新貴在政治

上的本領，也不會超過王雲五，甚至比王雲五還不如。

根據以上的種種說明，可見國民黨當局所耍的種種把戲，其目的都是要維持其「絕對政權」。我們敢於肯定地說：在中國目前的具體條件之下，不經過包括中共民盟的聯合政府，決不會真正實現民主，即不會真正「還政於民」。所謂「還政於民」，不在形式，而在實質；何況目前連形式都成問題呢！

四 特別政黨與普通政黨

國民黨當局常常指責共產黨爲一個「武裝政黨」，其實它自己也是一個「武裝政黨」，而且是一個更大的「武裝政黨」。國民黨憑藉武力取得政權，而且憑藉武力維持政權。拋開了武力，便不會有國民黨的「絕對政權」。共產黨之變成「武裝政黨」，是北伐時期國民黨用武力「清黨」以後的事，可以說是國民黨所逼成的。所以張東蓀先生很公平地指出：「使共產黨走上唯武力是信的路上去，乃是環境逼迫而成」。共產黨在政治方面不迫而求。有相當的獲取，則其對於軍事方面決不肯作重大的讓步。何況在「絕對政權」之下，即使共產黨肯把軍隊交出，也只有加強「絕對政權」的地位，決不是什麼真正的一軍隊國家化。國民黨決不等於國家化。只要它一天不肯放棄其「絕對政權」，就一天不會有真正的一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所以中國民主政治的障礙，不

僅因爲有一個武裝的共產黨，而且還因爲有一個更大的武裝的國民黨。實際上，武裝的國民黨之阻礙民主政治，還遠超過武裝的共產黨。別的一切理由都不必說，單拿整軍方案就可以證明這一點。整軍方案規定國共兩黨所佔的軍額爲五與一的比例，就是國民黨的軍隊比共產黨的軍隊要多四倍。這一規定，根本是一種不合理的分贓式的規定，我們真不知道憑什麼理由，依什麼標準而有這種規定。何況一個國家，同時有兩種不同系統的軍隊存在，遲早要發生衝突，即使能够避免目前的衝突，也難避免將來的衝突。不過有一點也可以從這個方案中看出，就是國民黨依賴武力的程度要大過共產黨四倍，因而我說武裝的國民黨比武裝的共產黨更阻礙民主政治。

任何民主國家，都不能容許一武裝政黨的存在。中國有兩個武裝政黨，也就是證明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我們要使中國成爲真正的民主國家，必須把這兩個有武裝的「特別政黨」變成無武裝的「普通政黨」，即我們要求國共兩黨同時解除武裝，改變性質。只有根本解除了武裝，國共兩黨才能從軍事衝突走到和平競爭。爲着永遠避免內戰，真正實現民主，以及趕快進行經濟建設，我們都只有徹底裁減軍隊，國共雙方的軍隊一同裁減，越徹底越好，甚至可以一個不要，只留少數保安隊維持地方秩序便行了。在這原子時代，我們即使保留了大量的陸軍，在國防上也沒有什麼

應用處。我們的國防力量，第一應當建築在經濟上（工業化），第二應當建築在政治上（民主化），第三應當建築在外交上（兼親美蘇），第四應當建築在教育文化（普及教育，提高文化），決不應當建築在狹義的軍事上。我們這樣主張，乃是真正認識今日國防的性質，絕不是不負責任的提議。只有這樣，中國方能成爲一個和平、民主、獨立、統一、富強的國家。

張東蓀先生說：「當前最切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必須把國民黨由特別政黨變爲普通政黨。即由民主國家所不能容許的組織變爲民主國家所能容許的組織。」今天的問題，其核心就在於使國共兩黨同時變化其性質與作風，使國民黨改去其法西斯的獨霸性質，使共產黨改去其過激黨的革命性，則莫妙於創造一個環境，這個環境對於他們雙方都有相當的壓力，以逼迫其不得不自行改變。要創造這種環境，第一必須回到政協路線，組織聯合政府；第二必須徹底裁軍，使國共兩黨無從利用武力作政爭的工具，即必須把它們從特別政黨變成普通政黨。這裏又有三個先決條件：第一，必須中間派形成一個舉足輕重的強大獨立的政治力量；第二，必須美蘇關係好轉，能够採取協調的對華政策；第三，國共雙方在軍事上保持相持不下的局面。這三個先決條件，我們認爲在不久的將來是有可能性的。

五 努力今天與創造明天

今天有許多（特別是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厭惡國民黨，同時也害怕共產黨。他們害怕共產黨有兩點：第一，害怕共產黨的作風比國民黨更不民主；第二，害怕共產黨將來還要革命，也要實行一黨專政。關於這兩個問題，張先生也有極正確的說明。

張先生說：「共產黨確有一點較國民黨爲優，就是它對於它的主張尚有誠心。它既宣布改取新民主主義，則它在民主國家便不復仍爲一個障礙了。再以共產黨在政協開會時所取的態度以及一年以來歷次和談中一再讓步的事實（特別表現在整軍方案中的重大讓步和六月談判中的重大讓步）看來，共產黨的作風至少要比國民黨民主得多。老實說，今天不僅國共兩黨的作風不夠民主，就是其它民主黨派和民主團體的作風也都不够民主。這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的原因。今天任何黨派和任何個人，都應當從行動中好好學習民主的作風。我們主張組織聯合政府，就是要創造一種環境，讓大家都不能不養成善良的民主作風。因此，在這一點上，我們沒有害怕共產黨的理由。」

關於未來的革命問題，我們更沒有害怕共產黨的必要。我們且看張先生的透關的說明：「在一個家給戶足的社會，加以中國人有愛好和平與篤守中庸的天性，而謂那時

仍必掀起社會革命，恐怕太忽略了客觀條件」。我們對於這種未來革命論實在不必認真，尤其不應該害怕。一五六十年以後的社會革命是決於從今天起的經濟措施。倘使在土地與工商業上都能用含有社會主義精神的政策，則大概可以說將來革命的避免是有可能性的。所以我認爲共產黨絲毫沒有可怕的地方。一須知我們倘想避免將來的革命，亦只有從現在起努力；決不是現在把共產黨打倒了消滅了就可了事。可見我們主張把共產黨拉入聯合政府，亦正是爲了消弭這個未來的隱患。因爲它加入了政府，便不能不自改變其性質，即把革命的政黨變爲普通的政黨。（見一）關於這一問題，我不想再有任何意見的補充。在這裏我只想說一句話：我之所以一再強調中間路線，就是要鼓起中間派的自信心，只要自己遵循中間路線不斷地進步，絕對不必害怕將來共產黨的革命和一黨專政。

「聯合政府是解決一切困難的總匙」。只有真正民主統一的聯合政府成立以後，才能「以整個兒的中國作美蘇的橋樑」。只有「以廣大與強盛並富有獨立性的第三者人們作爲國共的橋樑」，才能成立真正民主統一的聯合政府。只有這樣的中間路線，才能挽救當前的危局和未來的大悲劇。一切中間派的民主人士，必須從今天起挺身出來，加緊努力，以創造光明的明天。

卅六、四、九

從物價狂漲看經濟崩潰

——志成龍——

正當若干人仕沉溺於緊急措施方案的魔力的時候，一般物價忽再度趨於暴漲。自四月上旬開始，舉凡棉花、棉紗、布疋、食米、食油、大荳等，莫不於一二星期之間，分別昂貴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七十不等，又其他製造品及舶來品，顯然因為直接間接成本的增高，也隨之飛躍起來。至於地區方面，首先由東北、平津、漢口、無錫等地發生波動，影響所及，遂形成本埠的物價風浪。更由於本埠競購各色貨物的結果，再使外埠的物價水準作進一步的跳躍。十分明白的，此次物價狂漲的激盪不同於前次，而其嚴重性也當是勝於往日的。

首先，二月中旬的風潮的形勢，直接乃是導源於公開市場的黃金的狂漲。當時執政當局滿擬以金價控制物價，而以廉價的輸入品來解救物質的缺乏。但基本上還是因為通貨的增加既無限制，則市場上剩餘的資金勢當搶購貴金屬以保存法幣的價值。據金潮報告書所載，統計中央銀行方面明配暗售，於去年十二月份共拋出黃金七萬八千三百條，本年一月份六萬八千四百條，二月上旬則亦有一萬一千條，三項共計，就當收回法幣七千八百八十億元。可是另一方面，通貨的增發，十二月份估計約為五千億元，一月份增為六千億元，二月份上半月亦有四千億元，則顯然的，黃金的猛拋仍遠不及通貨的膨脹為迅速，整個政策的失敗在客觀上自為不可避免。何況當時全國通貨總數量的累積已在五萬五千億元之上，而各商業行莊的存款總額亦有七千五百餘億元。即就本埠而論，各種游資總數當也不致較二萬億元為少，中央銀行在金潮戰中宣告敗北，實際上正也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二月十七日緊急措施方案的實行使金價與物價之間的聯繫暫時被斬斷。復由於經濟檢查的加強，更使市場上一般交易減少，而使通貨流通的速度大為減低。據本市經濟評論雜誌所發表的統計，以民國二十五年為基期（等於一）的物價指數，本年二月第二周為一九四三六，第三周即略跌為一九一九八，第四周更低為一九一四二。三月份的停滯當尤為顯著，如第一周為一九一五〇，第二周一八三七五，第三周一七九四九，第四周降為一七九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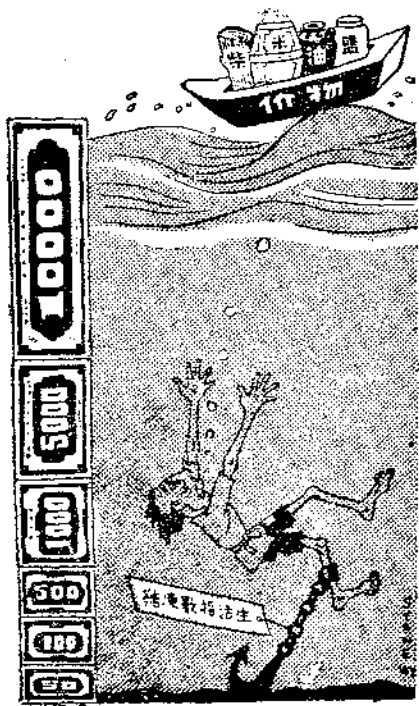
正當這個期間，通貨的增加與信用的膨脹，却反方向地以更驚人的速度累積。前者截至三月底止，一般的估計共達七萬億元，而後者全國各商業行莊的存款總額亦有一萬二千億元，至國家行局的數額，猶未計算在內。上海方面，三月份行莊存款為六千億元，四行二局大約五萬四千億元，國庫的收支，每月不足約五千億元。逐周膨脹的速度，

大約為上周的百分之二十。由此可見物價水準的一度停滯，正為下一次的波動完成客觀的條件。並由於游資的積累愈益龐大，等到觸發漲價的狂潮時，當非任何行政或軍事的當局所可控制。

果然不出所料，四月份的風潮便以更大的規模和更深的影響來表現。這不僅起始是由於各種生活必需品的騰貴和缺乏，在這裡尤必須明白地指出，中糧公司的搶購食米，後勤司令部的搶購食油，中紡公司的搶購棉花，中央信託局的壟斷大荳等，實際上都應當是最初的直接的原因，而

另一方面，金融當局全盤離開往日政略的窠臼，專以聚斂外匯為目的，藉相當可觀的信用膨脹以求國內生產力的增加以及物資周轉的便利，也不啻是形成全面的物價暴漲的最基本的因素之一。

關於前者，近日各地的通訊和專電已報導得十分詳細，自毋庸再為列舉。後者，據四月十三日商報的記載，三個月以來中央銀行購入的出口外匯即達八千萬美元，另美鈔收兌，亦有一千萬



水漲船不高 石東作

美元。反之，進口外匯的供給，却僅二千餘萬美元。這樣，進口貿易的衰落以及必需原料供應的短絀，都立刻影響到了國內的生產。同時，本月一日起央行方面復推行貼放新政策，按規定，通融總金額可達各行莊實收資本額以及存款總數扣除準備金後的總和，依目前標準估計，亦至少應有六七千億元。此種政策正當生產萎縮、物資缺乏、幣值不穩的時候加以推行，其結果，希望緩和當前經濟危機的嚴重性自屬一種幻想。

如果我們進一步對當前國庫的收支略為估計，即可發現現階段市面籌碼的充斥尤較一般想像為多。例如上海方面按月稅收各種直接稅約二千億元，貨物稅五百億元，配售各項實物約一千億元，推銷短期國庫券自四月七日以迄二十五日共約三百億元，上述各項通貨回籠不過三千八百餘億元，而另一方面，外匯及美鈔的收購共放出通貨七千億元，每月平均即有三千五百億元，政府普通預算支出每月約有四千三百億元，如有三分之一在本埠支付，即有一千四百億元，另軍務費相傳每月為一萬五千億元，本埠方面大約亦佔三四千億元，此外匯入匯款單，就商業銀行論即有三千億元，因此總結國家金融機構每個月在上海須淨放出頭寸七千至八千億元，逐月累積的結果，若干權威人士估計目前游資總額已達四五萬億元，可見在事實上頗有可靠的根據。

因此之故，如以為物價的風潮迄今已達到最高峯，將是一個錯誤的估計。如經濟評論雜誌的指數，四月第三周已昇為二一九〇五，第四周約在二七〇〇〇左右，即中央銀行以農產品為主要對象的指數亦已自上月的二二〇〇〇上騰至目前

的一七〇〇〇，平均上昇，約為百分之四十。預測今後當只有繼續暴漲，而決不致如二月中旬以後的小有回挫，且波動的程度亦將較過去為猛烈巨大，也為事前可以肯定的。

總結此次物價風潮的特色，在於第一，各色物品價格的昂貴，是依加速度的步驟進行的。最初，自外埠影響本埠，然後再由本埠影響外埠，由此激盪成爲全國性的一個浪潮。第二，由於人民對於法幣信心的日趨低落，每一次波動即蒙受一次損失，因此物資的搶購只要一開始，政府方面施以行政或軍事的壓抑，也是難以阻止的。而且正由於通貨流通速度的增加，便進一步刺激物價的跳躍。第三，游資的泛濫與物價的狂漲適成一個帶有諷刺性的對比。即是一般市場的交易極度頻繁，而政府方面不但收縮通貨束手無策，反而還乘機增加通貨以助長這種趨勢。在此，政府對於市場的完全失去控制是顯而易見的。最後亦是最重要的，當前物價的奔騰已不僅是一個純貨幣問題，正由於各種事實的證明，內戰的擴大和延長，已直接促成了物資的短絀和缺乏。這樣，經濟問題的軍事性已撥開了過去隱蔽的面幕，而明明白白昭示大家：在破產的內戰財政經濟政策之下，法幣和生產事業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這裏，我們當不得不承認物價風潮所引起的後果的嚴重。第一，幣值的跌落既不增加社會各階級的貨幣收入，則實際所得正依同比例趨於暴減，必定會降低一般的生活程度。而人民所損失的購買力，正在極隱蔽的形式之下轉入了財政當局的手袋。同時，官僚資本所經營的企業，也趁火打劫。例如當前大豆食米棉花等的經營，俱以

若干金融機構爲後盾而博得了驚人的利潤的。隨着，各色各樣的投機活動也風起雲湧。例如證券市場的華股交易，四月第一周還不過成交一萬八千八百餘萬股，第二周即增爲二萬六千六百萬股，第三周更多，達四萬四千二百萬股，第四周竟超出五萬萬股的大關而創五萬五千餘萬股的新紀錄。其次，金鈔的黑市已趨於復活，據零星的報導所得，美鈔行情已超過官價一倍又半，黃金的拋出則絕無僅有。第三，大批資金的湧入香港以套購黃金美匯，造成了廣州汕頭一帶的銀根的空前緊縮，即目前央行方面趕運萬元大鈔應急，也尚未緩和這種狂風暴雨似的情勢。第四，各地游資復轉湧入本埠市場，總計四月份共四千萬餘元，在最近一周內即達一千餘億元。

自四月廿四日起，央行正式發行五千元及一萬元面額的大票。此舉在理論上講，即是由於幣值的跌落過速，社會上各個人每經一次周轉所能掌握的現金量雖然增加，但所能代表的實際購買力則大有減退，爲應付周轉的必需，不得不加速鈔券的流通，而引起若干技術上的麻煩。央行方面以大票來收回小票，固無異增加了周轉的便利，而實際上則是向更深一層的經濟危機邁進了的。這具體表現將爲全社會通貨數量的極端膨大，而實際價值則異常萎縮，爲應付財政虧空的亟需，尤不得不追逐更大規模的通貨膨脹，結果將使通貨對於物價的刺激愈益加強，而於喪失社會信用之後，被迫退出流通過程。這樣造成整個貨幣制度的總崩潰，在世界歷史上已有先例，但却從沒有例外的。

學生運動是季世現象嗎？

馮契

在「時與文」第四期上，向曉先生寫了一篇「目前的學生運動」。該文立論，作者大部分同意。但是向曉先生說：「假如肯冷靜的考慮的話，我們誠然承認學生運動是「季世」的現象，在一個向上走有希望的「盛世」是不會發生的；因為青年們有希望有前途，方努力於自己的學業與工作之不暇，何至於從事此種奔走呼號甚至流血亡命的悲慘舉動」。——這一段話却易引起誤會，所以作者想提出來討論一下。

記得在抗戰期間的後方，有一位名歷史學者作公開演講，也會說學生運動是「季世」的現象，也舉出向曉先生文中所說的東漢黨錮之禍與宋太學生伏闕上書等歷史事實為例。於是他達到這樣的結論：中國沒有出路。言外之意，簡直認為學生是禍亂之首，如果民國也同東漢北宋似的不旋踵而覆亡，學生應該負責。

當然向曉先生決沒有這個意思。但是籠統地說學運是「季世」現象，總不免有點潑冷水的的作用。假如反過來，承認現在的中國是「盛世」，學生豈不應該埋頭讀書而無需過問政治了嗎？我們的政府，在朝黨和多數學校當局，所希望的就是這個。

誠然過去中國歷史上的學生運

動，是所謂「季世」現象。誠然目前中國，除了別有用心者外，也決不會被認作「盛世」。學運產生在歷史的轉變期，是可以斷言的。但是目前中國的轉變，却和以前朝代的更換大不相同。因此目前的學運，也和東漢兩宋的太學生運動有性質上的差別。

中國正在進行一個空前的大革命。這革命，如所周知，是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以「五四」為始的一串學生運動，正是這樣性質的中國革命的一環。並不是學運將變為革命，學運本來就是革命。自「五四」、「五卅」、「一二九」、「一二一」，以至最近的抗暴運動，就學生的行動與口號來說，不外乎反帝與反封建兩項：先是日本帝國主義直接威脅我們民族的生存，所以「五四」、「五卅」和「一二九」都提出抗日的口號。抗戰勝利後，美國代替日本來做我們的太上皇了，因此就掀起全國各地的反美浪潮。「五四」提出民主與科學，這是很顯明的反封建的旗幟。而「一二一」以來的反內戰運動，往深處看，又何嘗不是在反對封建勢力呢？因為這陷人民於水深火熱的內戰，其禍首正是代表封建殘餘的新軍閥與官僚資本家。甚至小規模的學潮，如要求改革校政和撤換不良教師之類

，其實也都有反封建的意義的。

由此可見學運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完全一致的。中國的革命儘管曲折多，却一定要成功。中國的學生運動，儘管有些時候會受壓迫，有些地方會受打擊，却也必然有出路。因為革命是新時代的契機，而且眼看著這中國的新時代在迎面而來了。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樂觀。所以雖說過去歷史上的學運常發生於一個朝代的末了，對於目前的學運，我們却須強調指出：它是一個新時代開始的信號。

說它是信號，作者的意見還在表示：學運常跑在其他各種革命行動（如工農發動的經濟、政治與武裝的鬥爭）前面。這就是普通所謂橋樑作用。常常是學生與別的知識分子搭好了橋，引導工農及各階層走上革命的道路。孫中山先生說：「必須喚起民眾。」同公雞報曉似的，學生運動一起，人民就先後被喚起了。有「五四」、「五卅」，然後有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的大革命，有「一二九」、「一二一」，然後有全面的抗日戰爭。最近的反內戰與抗暴運動，也正暗示一個新的革命高潮將要到來。

為什麼學生在中國革命中能起這樣大的作用？這就因為中國學生是一個有過數千年光榮傳統而又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的產物。

在這樣的社會裏面，學生必須做革命的橋樑，而且也能够做，因為他們有高度的革命性。

那末中國學生的革命性到底是怎麼來的呢？

第一，學生是知識分子。在半封建的社會裏，一般老百姓連識字的機會都沒有，當然比較愚昧。只有知識分子有讀書的機會。他們一方面讀外國書，就認識世界潮流，接受了民主與科學的思想，民族自決與社會主義的理論。另一方面讀中國書，又知道中國有過悠久的歷史，中華民族是個偉大的民族。這樣，就自然產生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把這思想表現為行動，在學生說來，就是學生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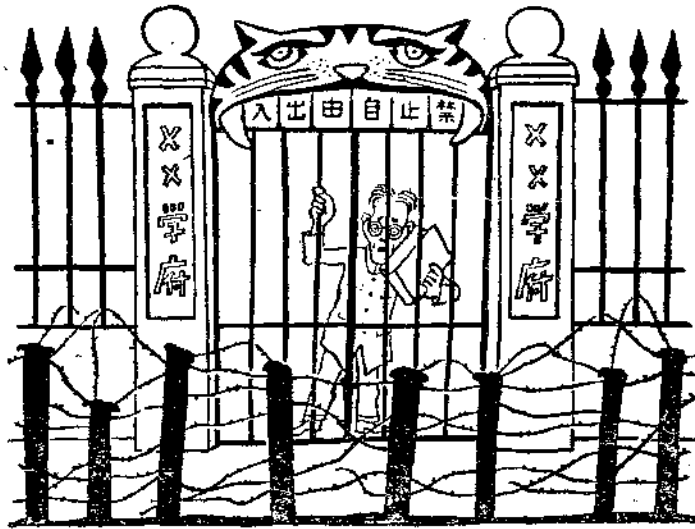
第二，中國既是半殖民地，也就已局部資本主義化了。中國現行的教育制度，是模仿歐美的。這是很有趣的事情：資本主義在壓榨落後國家的過程中，無形中就孕育出反抗它的思想，組織成反抗它的隊伍。中國學校歐美化之後，學生所受的教育就和過去大不相同。漢宋的太學，實在無法和現在的學校比擬。這差異不但在於新的教育內容，而且在於新的組織方式。新的教育內容中，就有上面所說的世界潮流的認識。新的組織方式，即指每一個學校總是數百數千人朝夕共處，很容易團結在一起，產生自治會這

類組織。而且交通比較方便了，由於行動的需要，一城，一省，以至全國性的學生組織，也易產生。有了這樣的組織，要作反封建或反帝的鬥爭，就完全可能了。

第三，中國學生之富有革命性，還在於他們多半出身於小有產者。小有產者愛看風轉舵，談革命不易澈底，向來為人詬病。但是中國的小有產者跟一般的却有些差別：首先，他們受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往下降的速度極大，往上爬的可能極小。至最近，當一切財富與權勢都如潮水般往豪門或官僚資本家集中的時候，小有產者更是普遍地瀕於破產了。其次，中國在二千年前，農奴已在開始轉化為自由農民與小市民。到後來，小有產者就成為中國社會的中堅。會有過這麼悠久的歷史與雄厚的力量的隊伍，當然有反抗的精神。有了這兩個原因，中國的小有產者就比較地能澈底地轉向革命。而學生既是大半從這個隊伍裏選拔出來的優秀分子，當然會富於革命性了。上述三端，已可表示學生必須而且也能够作革命的開路先鋒了。說必須作，那是因為在一般老百姓還不覺悟的時候，學生已先覺悟了。他們應該去搖動沈睡者的肢體，大聲叫喚。但是僅止於此，還是不夠。只有開路先鋒，沒有革命的大隊後繼，革命怎麼能貫徹呢？所以學生運動還應該往前跨一步，超過學校，到羣衆中去。

受挫折。雖說學生有上面所說的優點，這些優點却都包含着對立物——缺點：首先，學生有知識，有革命的思想；但是因此就容易犯哈姆萊特的毛病，在行動上缺乏吉訶德式的精神。其次，學生有組織；但是這樣的組織顯然還不够嚴密，何況所謂知識分子習氣，幾乎就是自由主義的同義字。又其次，中國學生多半是小有產者的優秀分子，比較富於革命性；但是這說法也是要打折扣的。因為既是有產者，總多少有點往上爬的機會。實際上，成為知識分子的小有產者，比較起一般小市民與自由農民來，是有更多的機會上升為豪門的貴客或管家的。多少「五四」和「一二九」的英雄，離開學校後，就走上這樣的道路了。甚至在今日的學府裏，也正有不少喪心病狂之徒，甘於被收買，被利用而充作走狗呢。——有了這些缺點，再加上壓力是如此強大，赤手空拳的秀才要造反，若不和廣大人民聯合起來，又怎能走出路呢？

們總不能體惜這點好意，把這批准士大夫們（他們是一代良心最後的寄托）殺的殺，入獄的入獄，放逐的放逐，於是這個朝代的命根就此斷送了。而太學生受了這麼嚴重的打擊後，不被收買，也就消極了，隱居山林，落得個明哲保身。或者也有人與農民暴動結合，去作草寇的



如此「愛護」！白木作

國革命的一環，其目標在於反帝反封建。「五四」以來的學生運動，總是有無意，或多或少地在和這個與帝國主義勾結的反動政府對峙的。因此論性質，和以前的大學生運動大不相同。而這樣性質的學生運動與中國革命，我們應該了解，本來是現階段世界性人民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中國革命必然會走人民路線，而學運也必然會和廣大羣衆聯合起來。這是歷史的必然，理論如此，事實也如此。儘管歷次的學運都免不了遭受打擊，儘管有些胆怯的退縮了，有些沒良心的被收買了，而有些英勇的作了壯烈的犧牲，但浩浩蕩蕩的學生隊伍，却由確定的道路，走向人民。他們盡了喚起民衆的任務，反過來又向民衆學習。這樣，他們就成了人民的一員，人民的幹部，終至於那點小有產者的動搖性也被克服了。「五四」、「一二九」以至目前的學生羣中，起主導作用的進步分子，所走的道路都是如此的。

英國與緬甸

—— 肅 ——

英國的口惠

一般人以為工黨執政之後，英國將對印緬採取進步的政策，讓印緬獨立起來；事實上除非大英帝國自身崩潰，英國是不會輕輕放鬆印緬的。

本年一月，在倫敦舉行了一次英緬圓桌會議。這是因為英國人見到了戰後的緬甸

甸人民較戰前更清醒了，他們要求獨立自主的運動日益激烈，英國人為適應這一環境，所以才有這一次圓桌會議的召開。我們且看這次圓桌會議得出了什麼結果。

緬甸代表的要求，當然是完全獨立自主。緬代表巴申曾經在圓桌會議的答詞中稱：「除開完全獨立之外，無法滿足緬甸人的願望」。這是如何直捷坦白的言詞！同時英首相艾德禮在開會詞中也說：「英政府當加緊使緬甸在不列顛聯合國（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以內或以外，實現其獨立，并望緬甸人民在最快與最方便的時期內，達成自治」。這樣看來，前途好像可以樂觀。

然而在會議中，巴申又猛烈抨擊英國人在緬甸的做法，他說：「戰前英國政府担負緬甸的防務，但至危急階段，英國人聽任緬甸空虛無防，淪為戰場，戰後英國滿懷怨恨歸來，採用壓制政策，違反其以前一切善意的諾言。目前之糾紛，騷擾與混亂，仍為對於承認緬甸獨立無切實保證所引起的反響」。

雙方的表示是如上所云，但是會議有了結果沒有呢？緬甸人是否完全獨立了呢？大家都知道，英緬在此次會議中成立了協定，其內容是：（一）緬甸以自治領地位留於不列顛聯合國範圍以內，抑或脫離一切關係完全獨立自主，悉由緬甸自決之。（二）緬甸應於四月間選舉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國民大會代表應完全為緬甸人。（三）在新憲法施行以前，緬甸應組織臨時政府，內設行政院，由緬甸人任之，

及總督一人由英人任之，此與印度情形同。（四）原則上承認緬甸在過渡時期得管理其財政，并得立即指揮全部緬甸軍隊。（五）新憲法施行後，英國駐軍應如何處理，由英緬兩國成立協定決定之。（六）緬甸邊界容後厘定之。還有一點很是重要，即制憲會議所決定的一切，須經英國國會贊同。由這些條文當中，我看不出有緬甸走上了獨立的象徵。緬甸首席代表烏安桑等也因此協定與緬甸人民所要求者距離過遠，而拒絕簽字。

同時在英緬圓桌會議的期中，仰光遊行發生慘劇。緬北的雅馬辛等區，有「土匪」與軍警交戰；西部的阿拉干以及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亞崩亦發生內亂。緬政府高級官員說：此項土匪大部乃共產黨的武裝部隊。可見緬甸人的內部還沒有一致的態度，緬甸還有許多政黨是反對「反法西斯自由聯盟」的。而且，最近緬甸舉辦制憲會議代表的選舉時，在仰光各選區參加選舉的人民，僅佔選區內選民總額百分之十五（最少）至廿五（最多）。人民對此項選舉這樣的不感興趣，由此可知緬甸的獨立運動是怎樣一回事情了。

民族與宗教

比如說，在英緬協定中規定了：「緬甸獨立自主由緬人自決之」。這還有問題嗎？然而實行起來的時候，問題便多了。我們要知道，緬甸的種族是非常複雜的，有掸族、緬甸族、喀欽族、泰族、泰來族、博浪族、達來斯族、孟斯族、羅愛拉族、瓦斯族、卡林族等十餘種，各族聚居，

生活習慣思想均有不同。英帝國主義者便
在他們之間挑撥是非，加深他們的裂痕，
或者以此制彼，以彼制此，或者把某一族
的待遇故意提高，而壓低另一族，使他們
互相仇恨、嫉妬、甚至仇殺。這種做法，
我在緬甸是時常見到的。緬甸人常常因處
在一個狹窄的圈子裏，自己看不清楚，上
了英國的當而不自知。比如，這次選舉制
憲會議代表的時候，便有所謂卡林斯與孟
斯兩部落提出抗議，卡林斯部落要求自立
一邦，成爲不列顛聯合國之一部。這種現
象便有英國人爲其幕後人物。所以將來履
行英緬協定，這簡單的一項條文，便對緬
甸人有極大的不利，也許就因這一條文沒
有明確的意義，英帝國會利用巧妙的政治
手腕，使緬甸四分五裂，每一個部落實行
名義上的自治，也未可知。

回溯歷史，在一八二四年至一八八六
年之間，緬甸會與英國三度作戰。戰爭的
結果，緬王失敗退位，英國人便將緬甸劃
爲印度之一省。這便是英國人以印制緬的
辦法。印度人在英國統治下，大批移民至
緬甸，印度人獲得了很多緬甸的經濟利益
。如農田的抵押給印度人等，引起了嚴重
的反印暴亂，這便是英國人方法的開始。
如前面所說，緬甸種族很複雜，彼此
之間沒有一個共同的理想，而又加上緬甸
各階層的普遍信仰佛教（小乘教尤其盛行
），人民全沉醉在這個迷信的圈子裏，便
更不努力要求改造現狀，所以驅使緬甸人
安於現狀，普遍的缺乏教育與自覺。

經濟概況

而且近百年來，在大英帝國的統治下
，大的經濟利益全部給英國人榨取去了。
礦產糧食等都是由英國人經營。又比如在
瓦城上面一點的南渡銀礦，這是記者親自
去參觀過的，便是由英人經營。說起緬甸
開礦的歷史，倒與中國有些淵源。還遠在
明朝永樂九年（一四一二年），便由中國
人正式開採；一七九六年至一八二一年爲
中國人開礦最盛時代，到一八六八年，不
幸因雲南邊境發生騷亂而放棄。約在一九
〇四年前後，英人組織緬甸礦業公司，大
規模經營各礦，終於出產銀、鉛、鋅、銅
、礦砂等九萬餘噸。

這裏有工人萬餘人。大概高級職員及
工程師全爲英人，約二百餘人。待遇方面
也是英人最優，印人次之，中緬的工人是
極受虐待的。我看到中緬工人住的只有兩
丈見方大小的房子一間，連窗戶和地板都
沒有，是如何的在過着地獄生活呵！
又如食米，緬甸是一產米之區。在戰
前，緬甸的食米輸入印度者極多，而緬甸
人却不能享受自己土地上所出產的東西。

緬籍土司與英籍行政官

英國人既然在經濟上掌握了緬甸的財
富，在政治上自然便利用在緬甸既得的利
益來統治緬甸。英國人統治緬甸的方法是
着重在各民族的分立，每一族特別看中了
做領袖的土司。土司在當地的民族當中，
是有崇高的權威的，普通老百姓即在路上
見了土司也要跪下來敬禮，無論男女都是
如此。生殺予奪一切的大權，當然落在土
司身上。一個管不到一萬人的土司，英國人

却替他建築了一座洋房子，裏面的設備有
汽車間、游泳池、以及電氣設備等等。筆
者會親自到過一個博浪族中的土司的家裏
，發現他有四個妻子，其中最得寵的一個
是瑞典人。

英國人對待土司的方法是儘量使他過
得舒適，沉醉在英國人的懷抱裏。在緬甸
中部的孟密地方，土司管的地方比較寬廣
，所以他的生活也就更爲講究，娶了一個
英國妻子。英國人是最賤視這種民族的，
爲什麼竟下嫁給此地的土司？當然她是負
有特種使命的。

每一個土司住的地域，同時有一座行
政官的別墅，多半還不及土司住的富麗堂
皇，不過這些別墅的所在地總是最富于戰
略意義而且是很幽雅的。這種行政官便是
太上土司，無形中監視了土司一切的行政
；而且土司所爲一切，都要請示於行政官
的。一切壓榨人民的手段，英國人不直接
施諸緬甸的老百姓，而假手於替英人服務
的土司。這是英國人行政上的妙用。

教育文化

緬甸人信仰佛教，尤其是崇拜偶像。
窮困的老百姓口袋中僅有的幾文，全部捐
出來做了佛廟佛塔等建築，全部的時間化
在唸佛拜佛的上面。緬甸人沒有時間去從
事文化的啓蒙工作，使緬甸人永遠停留在
中世紀的思想裏，更加上種族的複雜，彼
此磨擦，不易統一，這便是英帝國統治緬
甸最有利的條件。英國人深深的了解這一
些，所以在緬甸辦理教育，只使最少數人

受英國人的奴化教育，來做英國人的化身，進而去替英國人奴役自己的同胞。所以緬甸本身的藝術、音樂、文化、學術過去雖有過燦爛的歷史，但在英國人統治之下，却不但不能發揚光大，反而日趨衰敗。更進一步，英國又鼓勵緬人去唸佛，去迷信，倒退到釋迦牟尼時代去。

緬甸人的一切，整個都掌握在英國人手里。緬甸人想要翻身，恐怕尚須經過一陣大奮鬥，而且還要國際間有利的條件去配合。現在，人民雖然醒悟了些了，但是，畢竟是少數人。而且目前從事革命運動的份子，除開中部緬甸的農民以外，很少是真能代表人民利益的。縱使制憲會議成功，將來出現的政府，恐怕也只能代表英國人和緬甸上層社會人仕的利益。

我們分析緬甸的獨立運動，如果其結果是少數緬甸人在政府中取得一部份權力，這便等於少數緬甸人協同英國人壓榨緬甸人。這能叫做獨立嗎？現階段的獨立運動應該包括着雙重的意義：社會改革與民族自由是要相輔而行的。單獨有了民族自由，一般人民的解放依然可能落空。據我所知道，大部緬甸的農民都是怠惰而迷信的，缺乏政治意識和民族意識，他們所需要的，是緬甸人自己的教育。他們需要逃出英國人的手掌，清除對英國人的恐懼和馴服的心理。必如此，緬甸人才有普遍的醒覺，才有翻身的希望。

(上接第四頁)

政治路線。但就是這樣的路，也不能和平走通了！

固然，「內戰」無論如何是我們所要設法制止的。反對內戰的不但是「中間派」，而是全國人民，包括全國的貧農和工人在內，我相信，內戰所給貧農和工人的災難，不但不小於中間階層，而且還要超過中間階層。然而我却也不能贊同「在任何情形之下，都非反對內戰不可」的中間派的立場，因為照目前中國的事實推斷，要真正實現這目的，似乎就祇有完全放棄「政治民主化」的任務。這在事實上也已經有了證明。民社黨參加國大參加政府所標榜的理由，也是希望促進和平與民主憲政的實現，然而無疑問的，他們早已「在實際上做了右派的俘虜，完全走上反動的道路。」

當然，民社黨是「中間偏右的黨派」，復亮先生所主張的是「獨立的中間派」，並且「必然是偏左而不偏右」的。然而民社黨因為「中間」而「偏右」，于是在實際上完全變成了「右派」，根本喪失了「中間」的意味，所以「中間偏左」的中間派，假定真的「特別強調它的進步性和民主性」，「便必然要喪失它的獨立性甚至和平性」，「被迫喪失自己的中間階層的地位」，而和左翼的進步勢力合作，共同在一條路線上，就是為着民主路線的實現奮鬥。反過來說，如果中間派堅持它的「獨立性」與「和平性」，那就可能甚至必然要喪失它的「進步性」和「民主性」，也要喪失自己的中間階層的地位，而在有形無形之中中和右翼黨派沉瀆一氣，走到右翼的反動路線

。這一點復亮先生是早已料到的：「中間派的民主人士，在這種時候也很可能向左右兩端分化，有的投靠國民黨去求取「一官半職」；有的追隨共產黨去從事暴力革命；有的心灰意冷；只有極少數人纔能保持原來的中間派的政治立場。」不過這種保持原來的中間派立場的極少數人士，和「心灰意冷」的人事實上恐怕也並沒有什麼兩樣，也就是說，他們在實際政治上恐怕也並不會發生什麼影響和作用。因此，在實際政治上，恐怕也仍然只有民主路線和反民主路線，而「中間路線」却成了一個空洞的名詞和觀念。

在當前民主反民主鬥爭尖銳的情形之下，我們無論從理論上或從實踐上來考察，政治壁壘和政治路線必然也是愈來愈分明，中間階層和中間立場也必然愈來愈向兩端分化，那就是，在政治集團上，祇有民主集團和反民主集團，在政治路線上，祇有民主路線和反民主路線，在這當中決計不容許有獨立的一「第三方面」和第三條路線的存在，假定有這樣一條路線，也一定是一條走不通的路線。

當然，我並不否認，在民主陣營以內，有複雜的中間階層的存在，也不否認中間階層有它們複雜的政治主張的存在，而且，我更進一步說，中間階層由于它們社會成份的複雜，政治主張更絕對不止一種，決不能用一個「政治主張」來概括他們所有各階層在政治上的要求和經濟上的利益（同樣，在右翼黨派之內，也會包括各種政治主張）。然而祇要他們是站在民主陣營之內，他們就一定要擁護並服從統一的民主路線所規定的共同政治綱領和行動綱領，決計不應該也用不着再產生一個獨立的政治路線。

美軍是這樣撤出中國的！

辛揚火

自從美國決定撤退在華美軍後，在北平和天津，曾接連發生了一些「小小的」事件。

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北平西郊機場美兵魏斯特槍殺小學生王鳳喜，時間是上午十時，地點是電網外二百尺。美兵起先說是在打喜鵲，後來就說王是偷兒。但王却是在彈玻璃球的，他的屍身便是證明：他的膝彎着，右手還是彈球的姿勢。王鳳喜因為沒有胡適替他作主，軍事法庭審判結果，兵士魏斯特宣告無罪。事後王的母親領到了一千萬元的「賠償」金，這錢是軍調部政府參謀長蔡文治付出的，由北平警察局代為保管，原因說是怕交給王母後，她會遭到綁架！

小孩們玩這炮彈，炮彈却炸裂了，當場炸死李小六、李小麻子、劉崇元、和馬小五四個人，炸傷沈大莊、楊二丁、宋啓有三人，傷者被送到美軍醫院救治，三個人都成了殘廢，北平地方法院和警察局調查結果，認為美兵應負責任，但這次却沒有軍事法庭，連調查也不太熱心，到今天為止，我們並未看到美方對這事作任何文字的聲明。交涉也早已停止了。

但美軍確是在準備着撤出中國了。平津兩地的倉庫都打開了門，從那裏流出巨量的口糧，卡其布，零星用具；軍調部的坦克與飛機都已轉了手；近傳天津美軍營內「遺失」的吉普數字已達六百輛，這些車輛自然都找到了主顧，並且運到北平的一部分都由MP護送上火車；

在上海拋售了汽車之後的柯克，已來到天津，還不知道他下一批「運輸」是甚麼貨。皮爾遜聽說也走了。他已回到他那個「守法」的國家裏去享受徒刑。沈崇久已息影津門，她沒要求賠償，也不願再做新聞人物。胡適則忙於學術演講，對於他的女學生顯得不太關心了。

但美國兵確是撤退了。吉倫已經經過天津回國，而且在天津車站上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當MP一面咒罵一面推搡到站「歡」送的記者時，天津市長杜建時就站在記者行列的旁邊。如果不是美國領事掩護了他，他的中將領章也不能保護他不受侮辱。天津記者團去見他時，他坐在一圈記者中間掉下了眼淚，說：「國家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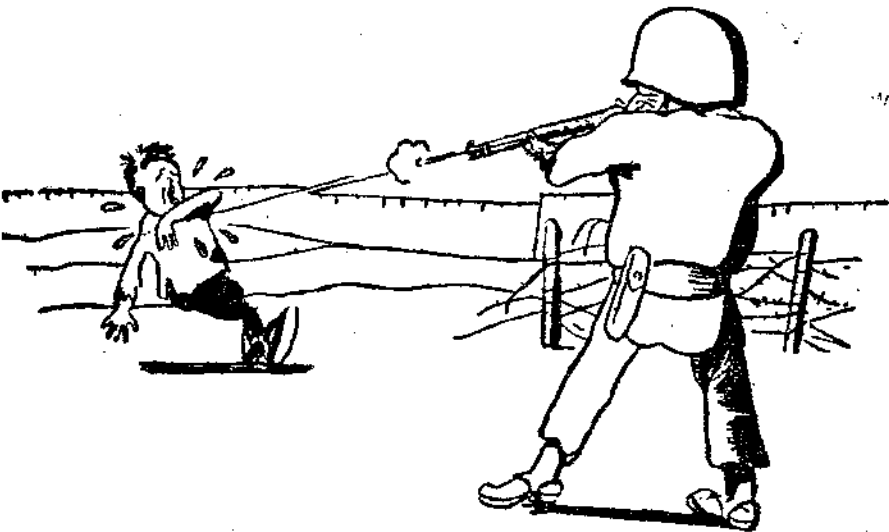
但他是暴行的目擊者，他只好替天津記者進行了交涉，結果美方道歉，再一次保證「不再有同類事件發生」。

但這並無礙於下決心與中國人民為敵的美國政策。執行這政策的在華美軍已變成瘋狗，再一次的保證提出之後，接着就是再一次事件的即時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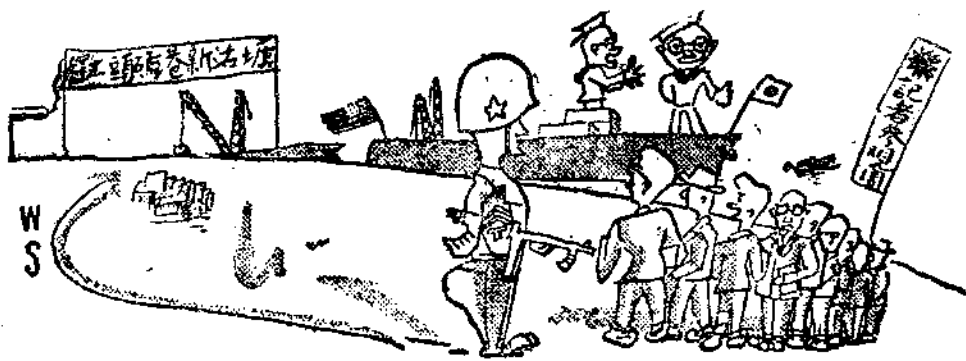
四月二十日，天津市外勤記者聯誼會聯合北平市外勤記者聯誼會組織旅行參觀團去參觀塘沽新港的工程。參觀團一行八十人，包括平津各報記者及各外埠報紙駐平津記者。這個行列攜有旗幟，佩有標誌，由新港工程局總辦公處分乘兩部卡車及一部吉普備用，先在船閘參觀並攝影，再乘汽車到第一碼頭，車停下來，行列步行，由新港工程隊朱副隊長陪同向前行進。走了二百多米，就看到一艘日本船「十日四丸」停泊在那裏。這是一艘運鹽船，來運中國食鹽回日本去武裝他們的工業的。甲板上站着十幾個日本水手，記者們的心便開始沉重起來

；再前進十餘米，就碰到了兩個美國哨兵，一個戴皮帽的同一個後生。朱副隊長上前說明參觀團身份。一個哨兵說不能前進，他說：「This is not your nation」（「這不是你們的領土」）；另一個則說：「如果攝影，就要開槍。記者團領隊想到有人是帶了攝影機來的，怕生意外，急忙回頭報告

。大家聽得奇怪，就停了下來。領隊知道新港一向允許照相，就問哨兵是否得到此項命令，他說：「當然，我已得到特別命令」。那個後生這時已推彈上膛，持平了槍支。他說：「你們如再不走，就把你們當八路軍對待了」。領隊就宣佈：全團折回原路。行列折返後，心情是更加沉重了，但走出二三



美兵「打在」喜鵲！ 範凡作（轉自文匯報）



(報晚合聯自載轉)作SW 「士領的們你是不這」

「你們要
找死嗎？」他
們像押送一隊俘
虜一樣，一直押
送到原停車處，
迫參觀團上了車
，又用槍敲打車
箱，喊着污穢的
字眼。當走過「
十日四九」時，
日本水手在船上
哈哈地笑了。
參觀團不可
能留在塘沽交涉
，他們必須即刻
返回天津，再送
北平記者當晚返
平。在火車上集
議時，竟只剩了
沉默與發抖。這
是無法忍耐的侮
辱。中國記者在
中國領土上活動
，受到了外力干涉
，不但沒有前進
的自由，而且也
沒有了退後的自
由！但這兒却有

十米後，却發現皮帽哨兵
背了槍在後面押解。領隊
覺得奇怪，就問他：「你的
警戒線在那裏？」他不加
說明，只揮手令去。這是警
戒線的無限延長，行列開
始沉默。皮帽哨兵突然問
領隊有無護照，領隊說沒
有。這哨兵便說：「你媽的
沒有護照，就滾你媽的蛋
！」參觀團裏是有四位女

記者的，沉重的心開始發
抖，但那後生却已持槍追
了上來，皮帽兵也卸鎗下
肩，推彈上膛。兩個人兇
罵着，用鎗和手推搡着。
走在後面的兩個領隊和朱
副隊長都被他們推了又推
，那個後生喊叫着一串的
「Get away」，響亮地推
動槍栓，威嚇道：「Wo-
uld you get to be shot
?」(「你們要
找死嗎?」)他
們像押送一隊俘
虜一樣，一直押
送到原停車處，
迫參觀團上了車
，又用槍敲打車
箱，喊着污穢的
字眼。當走過「
十日四九」時，
日本水手在船上
哈哈地笑了。
參觀團不可
能留在塘沽交涉
，他們必須即刻
返回天津，再送
北平記者當晚返
平。在火車上集
議時，竟只剩了
沉默與發抖。這
是無法忍耐的侮
辱。中國記者在
中國領土上活動
，受到了外力干涉
，不但沒有前進
的自由，而且也
沒有了退後的自
由！但這兒却有

着一條奇特的法律，塘沽
最早由美軍接收，牠的駐
區是沒有界限的。他的一
條無限延長的警戒線便是
這暴行的全部根據。
平津記者聯合會發表
了一項聯合聲明，原文如
下：
「平津記者聯合會聯
合參觀團，二十日正午十
二時四十分抵塘沽新港參
觀碼頭建設時，遭遇美軍
二哨兵一極不禮貌之行爲
。當兩地記者團由工程局
朱登昇副隊長說明身分後
，美軍即舉槍強迫記者團
返車，並如下流之謾罵。
時碼頭昨日輪東京第十大
陽號上之日人，爲之大笑
不已。平津記者團對於美
軍此舉，謹表示最大之遺
憾。茲願鄭重聲明，中國
記者在中國領土之行動，
不容受外力之干涉。」
這又是一次奇特的受
辱，時間是三十六年四月
二十日正午零時四十分，
地點是塘沽新港第一碼頭
，一條不能用任何條文解
說的警戒線上；人物是八
十個中國記者與兩條美國
鎗，內容是英文字典上所
不載的字眼，目的是侮辱
中國記者，而其極極意義
則是奴役中國人民。
平津記者沒有提出不
會有任何結果的抗議，而
只向全國全世界嚴正聲明
了態度。這聲明却意味了
美軍是怎樣「撤出」中國
的！
四，廿一。

爾哈察的下治義作傅

——三之行日五外塞——

笛 胡

「晉人治綏」

綏人治察

「晉人治綏，綏人治
察」這兩句話，如果流傳
到其他地方，聽起來，也
許還有點新鮮感，但在察
綏兩省却是極其平常的「
口頭禪」。
這兩句話的意義很簡
單：傅作義是山西榮河縣
人，周圍的參謀智囊難免
也有榮河人，即使不是榮
河，也可能是晉西南河津
一帶的人；而且傅又是閩
錫山的舊幹部，雖然現在
久已離開山西，另創一系
，但是在地域觀念上，人
們總是把他和晉系一而二
二而一的聯着在一起。

「晉人治綏」的口號
非自今日始，早在抗戰以
前，就與另一個口號「綏
人治察」相對抗。據說：
南京中央政治大學的綏籍
學生就有一個出版物，名
「綏遠新生」，曾在重慶
南溫泉發刊；與「綏遠新
生」性質相同的，在蘭州
還有一個「新綏遠」的定
期刊物，都是揭發「晉人
治綏」的內幕的。

至於「綏人治察」，
却還是一句新話，而且留
在張家口的綏遠人都以堅
決的口氣否認它的存在。
但是察哈爾人認爲晉
察原爲一體，所以對於晉
察省籍的人，一視同仁，
認爲傅作義就是綏遠，綏
遠更是離不開傅作義。

「整體幹部」

與察幹團

察幹團是從綏幹團翻
版的。傅將軍對於「幹部
決定一切」的信條把握的
十分堅固，既有綏幹團成
功的先例，所以在張家口
便依樣葫蘆，再翻一版。
這個訓練團的精神有雙重
的意義，一是「統一訓練
」，一是「統一任用」。
統一訓練者，就是不管文
武百官，只要你打算在察
綏任何一個機構工作，官
不分大小，人不分男女老
幼，都得在幹團團受訓。

團主任由傅自兼，下設教
育長一人，大隊長一人，
分隊編組，一面施以精神
訓練，一面施以軍事訓練
，時間的長短，完全看事
實需要而決定，多至半年
，少則兩三個月，受訓以
後，就成功一個「整體幹
部」，然後統一任用，爲
的是「避免私人結合」，
「結黨營私」，藉此培養
「奮鬥」精神。所以作爲
一個「整體幹部」後，一
定要發揮訓練團的精神，那
是無疑義的。當記者去參
觀察幹團時，見團本部的
兩根大柱子上面寫着兩行
標語，一面是「紀律高於
一切」，一面是「命令重於
生命」。走進去以後，發
現規模很大，東洋式的樓
房魚鱗櫛比，一層接着一
層，比起北平沙灘的北大
紅樓來，規模上並不示弱
。這原是蒙疆政府所建築
的高等國民小學，在中共
佔領的時期是華北聯大的
所在地，現在却又是「察
幹團」了，三個時期同爲
教育機關。

有沒有不受訓的例外
呢？答案是絕對少數；特
別是中下級幹部，假使沒
有受過「整體」的薰陶，
即使混下去，也是「吃
不開」。有幾位黃埔軍校
畢業的綏籍學生曾被分發
到察綏部隊服務，由於不
肯接受這種訓練，最後還

有幾位黃埔軍校
畢業的綏籍學生曾被分發
到察綏部隊服務，由於不
肯接受這種訓練，最後還

得退了出來，另謀出路。據說這種訓練已經收到很大效果，幹部人員儘管在系統上或者地域上，原有着各式各樣的分歧，但是大家既同屬一整體，所以即使偶而不免發生些齟齬，然而對於傅長官的推崇與敬重却是毫無二致的。如果說察哈爾人對於「晉綏一體」本有異議的話，經過時間的磨練，也就不成問題，可能成爲三位一體了。

傅長官爲了緩和一點矛盾起見，除了財、建、教三廳廳長任用察人之外，其他機關也都儘量設法引用與地方人士可以拉起關係來的人物，比方說，張家口市長便屬察籍，而綏東五縣豐鎮、集寧、涼城、興和與陶林原屬察省轄治，在綏遠劃省後，才併進去的。加之綏東五縣的生活習慣與言語，大致與察省相近。這一類人，多半與傅長官有歷史的關係，而對奮鬥精神的領會的也比較深刻，所以起用這種人，的確是一舉兩得。

人、事、行政

以上是關於人的統御辦法。談到事的方面，這裏的確是實事求是，崇尚檢樸。比方說，察省府在很短的期間內已經成立，而且重劃行政區，分設

專員公署承上啓下，察省十九縣一市也都相繼建制；十九縣包括：宣化，萬全，商都，尚義，新明，崇禮，張北，多倫，赤城，龍關，延慶，保昌，法源，懷來，涿鹿，蔚縣，陽原，懷安，康保，一市即爲張家口。因爲時間的限制，我不能到各縣都去訪問一次，但僅就張家口一市觀察，也可以舉一反三了。

張家口市長原爲周鈞，現調任綏靖公署新聞處處長，遺缺由前天津民生導報發行人秦豐川繼任。這位新任市長是書生作官，處處還想把理論用到實際上來，而事實上却有困難。比方說，省會警察局直接隸屬省府，同時又受市府的監督，所以有時候，省府與市府的職權，很難分割清楚。當記者在張家口訪問的時候，適逢其會兒童館，市府社教兩科要主持，省府教育廳與社會處也要主持，同時綏署新聞處也不甘落後，結果引起爭吵，事倍功半。類似這種行政上的錯雜，不勝枚舉，即此一例，可知梗概。

當前的中心行政工作是一「清鄉」，建立保甲制度，同時配合軍事需要，加強徵兵與採購軍糧。行政機關之外，法定的民意機構參議會還沒有

成立起來，他如省市黨部與青年團支團部等也不過都是一個雛形。

經濟政策

繼綏靖會議之後，不久以前在張家口舉行過一次察綏兩省聯席經濟會議，出席的主要單位有兩省的財廳，社會處與合管處等機關。會議的中心內容是發展兩省的生產與貿易；在生產方面，爲了開發當地的富源，已組成察綏兩省礦產調查所，對於蘊藏量最豐富的煤、雲母、石棉等礦，由一位綏籍的地質學家李士林負責主持。其他如開發水利，發展畜牧事業均受到相當的注意。生產方面希望當地人投資，對於外資的吸收，據民政廳廳長于純齋說：好像初期尚不需要。貿易方面有一句話說：「利益屬於人民」。現正籌組貿易公司或企業公司，多牛將由官商合辦，而且可能官股多於商股，因爲綏遠也有一個全省的貿易公司的組織，就是如此。自然那也就是唯一的資本。

對外貿易方面，煤是絕對禁止出口的，本來糧食也是同樣情形，後來因爲平津食糧價值靠東北供應，不敷市場上的需求，後經行轅幾度交涉，終於解禁，但是有一個限度，那就是採取四六政策，比方

說平津兩地的商人可以自到察綏兩省購運食糧，但是在採購的總數中，四成得由官方規定價格收購，六成可以運走。所謂官價，平均算起來，僅抵市價之半。官方的解釋是：這種辦法可以防止商人的暴利主義，同時還可以補償採購軍糧之不足。

採購軍糧

當傅長官於去年十月十一日到達張家口後，第一個步驟，就是減輕人民負擔，明令免賦一年。爲了使軍糧與公教人員的食糧免於匱乏，定出一個採購軍糧政策，截止目前爲止，已是第二期，第一期三萬石，已經完成，第二期由二月廿日開始，限期一月完成，總數爲三三〇〇〇〇斤，計分小麥，大米，小米，高粱，玉米六種，官價如下：（單位以每斤計）

- 小麥三〇〇〇元
- 小米二〇〇〇元
- 高粱一〇〇〇元
- 大米五五〇元
- 玉米一一〇元

市價如何呢？舉例來說，小麥每斤一〇〇〇元，大米每斤一三〇〇元。市價與官價如此懸殊，還是次要，採購之時，又並不完全以「有糧出糧」爲原則，多半是攤派，所以

新小上坟

安娥

（歌舞形式，用舊「小上坟」調，或新譜都可。）

女：今天不上別處去，一心要到劉家坟。
左手拿着千張紙，回頭來關上兩扇門。
正走之間淚汪汪，想起丈夫劉本頁；
一去當兵無音信，害得奴家守空房！
今天盼來明天想，盼得尸骨未還鄉！
把件衣裳來埋葬，立塊石碑在坟旁！
年年清明把坟上，恩愛夫妻沒下場！
正走之間來得快，劉家坟不遠在一旁。
左手放下千張紙，右手我把鐵鍬揚，
坟頭上添添土，回頭來燒紙又上香。
男：今天走來明天走，幸喜快到劉家坟。
正走之間淚汪汪，想起我妻白玉芳；
九年未曾寄鈔票，不知我妻生勒亡？
想起我妻好模樣，兩個眼睛水汪汪，
雖說她是鄉下女，

城裏小姐沒她強。
恨不一步回家去，抱住我妻哭一場。
正走之間來得快，劉家坟猛然在道旁。
走到坟前忙跪拜，啊！
碑上寫明二爹娘！
去時爹娘都還在，回來見坟不見爹娘！
哭聲丈夫死得苦！
哭聲風死劉本頁！
你本爲個去打仗，誰又爲你養爹娘？
自從去年打內戰，二弟又把壯丁當；
婆婆河邊去打水，落在河心幾無常！
今天逼捐明天稅，逼得爲妻沒法想！
鄰舍勸我去改嫁，雖忘夫妻恩愛長！
哭得心酸肝腸斷，昏昏沉沉倒坟旁！
男：哭聲爹娘死得苦！
哭聲風死二爹娘！
自從孩兒去打仗，分文沒有寄回鄉！
不是孩兒良心喪，

「辭免田賦」與所謂「採購」在實質上也不過是一個名詞的變換而已。

沙漠中的文化

這裏的文化，如果從廣義的範圍來說，真是空谷足音，只有一家國際書報社，書櫃裏陳列的雜誌有過期的「[]」，有一本「上海文化」，其他都是方塊什誌畫報，最流行的是平津出版的「國風」「太平洋」，「一四七畫報」等。京滬的出版商，只看到教育界幾個人還訂着「觀察」「時與文」「世紀評論」。這類什誌能夠行銷到這裏來，也真算是沙漠中的駝鈴了！

報紙只有一種對開的「奮鬥日報」。這是唯一的機關報，通訊社反有兩家，即中央分社與中國經濟通訊社。其他如平津報紙也可以隨時快車於當天到達，但是由於購買力與文化程度的限制，一般說來，銷路都有限。

一位官級相當高的人在談話中問起上海的報紙，那家銷路最廣，記者告訴他，如果單就銷路說，恐怕漢中兩報。這位長官繼續又問：申報是老牌，新報是什時候出版的？怎麼這個報沒有聽說過？他很感憤地告訴記者，他們跟着傅長官在大青山裏打游擊，八九年都

沒有看到外間的書報了。另外在「臨時商場」中，又發現許多書攤上大量出賣蒙難時代的破舊書籍，價錢論斤計算，每斤一二〇〇元。買一本蒙難年鑑約五百頁，也不過三斤。

這裏也有電影院與劇院。影片多為中國片，如「現代青年」等。據一位影院的老闆說，最叫座的影片是「聖誕記」，劇本多演山西梆子。另外在一個廣場上有一個馬戲團，鑼鼓喧天，生意最好。

參觀俘虜營

俘虜營的名稱為「建國青年訓練大隊」，下設四分隊，現有五四〇人。記者去參觀，走進大門後，即見牆角上橫貼着一張紙條，上書「青訓班」。裏面是一個空曠的大院子，在五開間的一棟房舍內，靠牆南北分成兩排，一個挨着一個睡地鋪，衣服都是原來的灰棉軍裝，都已油膩變成黑色，破碎的棉衣上掛着一塊塊發黑色的

僵硬棉花。青年們呢，都是蓬頭散髮，油垢垢面，瘦弱的身體，東倒西歪，面皆菜色。據管理的人說，病號佔了三分之一強，有時候被帶到醫院去診療，但是出去一趟，總有幾個開小差，所以也不敢輕易帶出去。傳染病極為流行，尤以疥瘡為甚，只見他們倒在地鋪上，時常抓癢，就可以證實管理員的話

了。俘虜們每天上操，女俘虜也不能例外。從管理員的談話中，可以知道人人都有一本念不完的經。他說，每跑一個俘虜，便要記管理員一次過，所以整日不敢疏忽一步。可是，爲什麼要跑呢？他皺了一皺眉頭，不曾回答。

致作者

編者

我們有幾件事要告訴各位寫稿的朋友：

- 一、來稿希望有一般性和現實性，如果學術性太重或者與時代隔離太遠，雖然有內容有份量，我們也不歡迎。
- 二、本刊置重點於政治、經濟及社會一類問題，希望作者在這方面多多惠稿。至於各地通訊，也很需要。
- 三、小說，詩歌，劇本，書評，繙譯以及序跋一類的文稿，暫時不收。
- 四、來稿請不要過長，最好在四千字以內，以便一次刊完；長稿即使內容好，也很難登出。短稿却可以儘先發表，而且稿酬較豐。
- 五、來稿務請用稿紙繕寫清楚，以便計算字數，且免排字錯誤。
- 六、一稿兩投，務請各位避免。
- 七、來稿收到後，一經決定採用，不等待發表，立刻致送酬金；如果文稿發表後還沒有收到稿費的，希望趕快來函查詢。又各位收到稿費後，務請將稿費收據早日投郵寄下，以清手續，且便查對。
- 八、不合用的稿件，我們很願意儘速退還，但是務請各位在稿末註明通訊處，並且事先聲明，附足退件郵票，方能照辦。

當兵的痛苦說來長！

傷了沒藥病沒湯，

狠心的官長扣軍糧！

如今又在打內戰，

弟兄心裏更悲傷。

可憐孩兒成殘廢，

一路乞討回故鄉。

哭得心酸肝腸斷，

那兒來得花姑娘？

女：玉芳睜眼望一望，

哇！

大胆強盜站一旁。

這坎本是劉家土，

我是主人白玉芳。

男：聽說我妻白玉芳，

又悲又喜劉本良；

走向前來將妻抱，

女：哇！

大胆強盜敢猖狂？

男：一見玉芳良心喪，

殘廢之人心更傷！

女：本良早就打仗死，

強盜休起歹心腸。

男：我妻不要錯思量，

我是你丈夫劉本良。

女：打鬼打鬼來打鬼！

不該嚇我女孃行。

玉芳受了九載苦，

何事難對劉本良？

男：我妻不要多驚慌，

真是你丈夫轉回鄉。

你若不嫌我殘廢，

夫妻苦守換時光。

女：果是丈夫轉回鄉，

不由玉芳喜洋洋。

幸喜你今成殘廢，

否則又把壯丁當。

走上前來忙抱住，

九年痛苦話兒長。

男：九年痛苦話兒長，

幸喜夫妻又成雙。

只要世界不打仗，

女：窮人就有好時光。

男：只要國家不打仗，

女：男女老幼樂安康。

男：做官的不來欺百姓，

女：當兵的不把民來傷，

男：柴米油鹽都不漲，

女：捐稅減輕不徵糧，

男：再不東分又西散，

女：一家大小喜洋洋。

男：唱完一段小上攻，

再和觀衆把話講。

唱的做的不像樣，

我兩本來是外行！

多蒙諸位來捧場，

實在有點不敢當。

下次倘若再演唱，

還請諸位多賞光。

內政部特許登記證京警滬字第四一八號

怡豐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實業 扶助

社會 服務

總行 重慶五路四十八號

分行 上海江西路四七號
電話 二〇二〇號

宏豐企業公司

總公司 上海廣東路五十一號
電話 一四三三—五

承辦 進出口 業務

分公司 漢口聯保里五號
重慶林森路一二七號

上海駁運公司

地點：上海四川中路一二五弄二〇號
電話：一三二二—四

南榮記 和記 報關行

地址：上海廣東路一二二號
電話：一〇四一—八號

天隆被單



經濟實惠 美觀大方

天隆染織廠出品

附刊

從馬歇爾演說

看美國動向

官鄉

今後的八九個月

程棧

經濟前途還能樂觀嗎

張西超

英美在香港的市場鬥爭

余初儉

9

精神分析的物質基礎

董秋斯

從歷史看民變

胡里

周炳琳講「南行所見」

辛揚水

張東蓀談華萊士和平運動

胡笛

北平瑣記

治秋

漫畫

洪荒·尼龍·甘草

木刻

構之



本號創設於前清康熙元年距今已有二百餘年之歷史
 號名雷允上之藥舖

雷允上國藥舖

秘製六神丸

全國聞名 · 功效如神

男女老幼 四季咸宜 居家旅行 不可不備

上海北支路特設飲片部

接洽電話 蘇州總號 閩門西中市 上海分號 南馬路法大 街內與聖 北支路天 宮橋 北支路： 橋安寺口 橋弄口

證券交易所第九十七號經紀人

宏業證券號

北京路河南路口
 國華大樓六樓S.B.號
 電話九四九四八

上海證券交易所第四十八號經紀人

丹巴證券號

上海中山東一路(外灘)十八號
 四樓四一三三號室
 電話一三四四四一

致作者

編者

我們有幾件事要告訴各位寫稿的朋友：

- 一、來稿希望有一般性和現實性，如果學術性太重或者與時代隔離太遠，雖然有內容有份量，我們也不歡迎。
- 二、本刊置重點於政治、經濟及社會一類問題，希望作者在這方面多多惠稿。至於各地通訊，也很需要。
- 三、小說、詩歌、劇本、書評、繙譯以及序跋一類的文稿，暫時不收。
- 四、來稿請不要過長，最好在四千字以內，以便一次刊完；長稿即使內容好，也很難登出。短稿却可以儘先發表，而且稿酬較豐。
- 五、來稿務請用稿紙繕寫清楚，以便計算字數，且免排字錯誤。
- 六、一稿兩投，務請各位避免。
- 七、來稿收到後，一經決定採用，不等待發表，立刻致送酬金；如果文稿發表後還沒有收到稿費的，希望趕快來函查詢。又各位收到稿費後，務請將稿費收據早日投郵寄下，以清手續，且便查對。
- 八、不合用的稿件，我們很願意儘速退還，但是務請各位在稿末註明通訊處，並且事先聲明，附足退件郵票，方能照辦。

時與文週刊

發行人 程博洪
 編輯者 時與文週刊編輯部
 經理部 上海牯嶺路三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從馬歇爾演說看美國動向

宦 鄉

莫斯科會議無結果散場之後，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於四月廿八日晚發表了一篇廣播演說，列舉美蘇之間關於德國政治制度、賠償、工業水準、東部疆界、奧境資產以及四國防德公約等問題的紛歧立場，一方面替自己拚命辯護，另一方面把會議失敗的責任歸諸蘇聯。演說原文具見各報，這裏不再贅述。

但馬歇爾演說中有一段極重要極重要的話，却是必須注意的。他說：「我希望……在未來的會議中，蘇聯代表團將有較大的合作精神。然而我們不能忽視這兒所牽涉的時間因素。歐洲的復興已出於我的意料之外，遲遲未見實現，分化的力量愈見明顯。醫師正在深思熟慮，而病人却正奄奄一息。因此，我認爲我們不應一再拖延而至無可救藥的時刻到臨時纔有所行動。新問題與日俱增。我們應毫不遲疑地採取種種可能的行動，來對付這些迫切的問題。」從這個表示裏，透露出美國今後的外交動向，將是一面聽任四外次會議研究莫斯科會議中關於各種問題的歧見，一面則立即開始推行她已經決定推行的政策。

美國的這個動向，早在莫斯科會議剛剛結束的時候，已由馬歇爾的顧問共和黨外交專家杜勒斯暗示過了。當上月廿五日杜氏離莫斯科回國的時候，他曾經發表過這樣一個談話：「吾人未能

自莫斯科帶回重要協議，固爲令人失望之事；但亦能帶回若干有價值之成就。此即美國代表團已確定一固定之政策，將來終必能使吾人之理想得以實現」。拿他這段話和馬歇爾的話對照，我們立刻可以看出，美國確實已經決定了一個新的外交政策，準備加緊推行。

究竟杜勒斯所說的「理想」——也就是馬歇爾所說的「一種種行動」——是些什麼呢？要答覆這個問題，必須從去年巴黎和會失敗以後說起。

一

去年巴黎和會失敗之後，美國獨佔資本家的代理人們，檢討這一場外交鬥爭的經過，得到如下的結論。

第一、他們估計，蘇聯的經濟復興工作需要十年到十五年的長時間，而且還迫切地需要外來資本物資（如美國借款、德國實物賠償）的協助。同時，他們也知道去年蘇聯的農業收成因天旱的緣故，不十分良好。因此，他們想利用蘇聯這些弱點，來盡量壓迫蘇聯作最大的讓步；如果不讓呢，他們就準備儘可能地不許任何外來援助流入蘇聯，以免蘇聯的經濟復興工作能早日完成。

第二、他們估計東歐那些新民主主義國家，在經濟生活上迫切地需要日用工業品的供給，而這需要又是現下蘇聯所無法供應的；在政治鬥爭上則各該國家內部都有強大的反對派存在。因此

，他們認爲可以一方面用金元來收買這些東歐國家；另一方面用種種外交攻勢來打擊蘇聯的政治威望，丟掉蘇聯的面子，叫東歐國家對蘇聯的信仰動搖——這樣雙管齊下，他們希望東歐國家能夠脫離蘇聯，重新回到西方國家的懷抱中來，使蘇聯陷入孤立。

第三、可是，如何纔能使東歐國家心甘意願地回到西方來呢？單靠上述威脅利誘的方法，顯然是不夠的。於是，美國統治階級的念頭轉到了德國頭上。他們認爲，西部德國的三個佔領區（英美法），擁有德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德國工業生產總額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戰前和戰時一直是歐洲國家日用工業品的最大供應者。如果能夠不顧蘇聯對德的意願和要求，逕自先把西部德國三個佔領區的政治經濟統一起來，再把英法比荷等國對德的關係加以確定（意指：終止各該國對德戰時狀態），那西歐的形勢就可穩定下來，團結起來。一個穩定而團結的西歐，外加天下唯一最富和工業技術最進步最強的國家——美國做後盾，還怕東歐國家不乖乖地丟開蘇聯跑過來嗎？就是蘇聯，當看到自己是孤立於大半個最富最強的世界上時，恐怕也會天天惴惴不安吧。

第四、單組織西歐還不夠，還要把中東和遠東也組織起來。這樣由歐洲以至亞洲，結成一條長堤，一方面用以防阻蘇聯勢力的可能發展，一方面把自己擺在一個有利的戰略態勢上，佔取

「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優越形勢。
這四個結論，就是美國新外交政策的核心，以去年十月的英美兩佔區的經濟合併為起點，在這次莫斯科會議中已開始實施，當然在莫斯科會議失敗之後，更要加緊推行了。

三

我們現在回顧莫斯科會議的經過，有幾件很有趣味的事情，是值得特別指出的。

首先，馬歇爾在會議中的一切言行，都是政勢的，都只有一個目的：抓緊蘇聯的弱點來壓迫蘇聯讓步，並用盡方法來打擊蘇聯威望。譬如，拿蘇聯所認為最重要的賠償問題來說，馬歇爾明知道蘇聯的要求並沒有逾越雅爾達和波茨坦兩協議的範圍，也明知道蘇聯很殷切地期待着這德國實物來幫助經濟復興，於是他就提出種種要挾條件——他允許蘇聯依照過去協議自德國現有生產中提取賠償，但要蘇聯承認四強防德公約，承認美國所擬德國生產水準，承認先行償付英美墊款然後再行提取蘇聯賠償，承認放棄若干與境德國資產，承認減少一百億美元的賠償要求，作為交換條件。這樣苛刻的要求，很顯然地是告訴蘇聯，「要末就完全屈服，乾脆接受美國的意旨，要末就只好放棄迅速完成蘇聯經濟復興的希望」。又如，拿德波疆界問題來說，馬歇爾硬不承認波茨坦協議的永久拘束性，硬要加以修改，這明明明白白是叫蘇聯難堪，丟面子，叫波蘭相信，縱令有蘇聯的支持也是沒有用的，企圖間接鼓勵波蘭反對派反現政府的高潮。這兩個比方說明馬歇爾這次到莫斯科去開會，事實上並不是誠意去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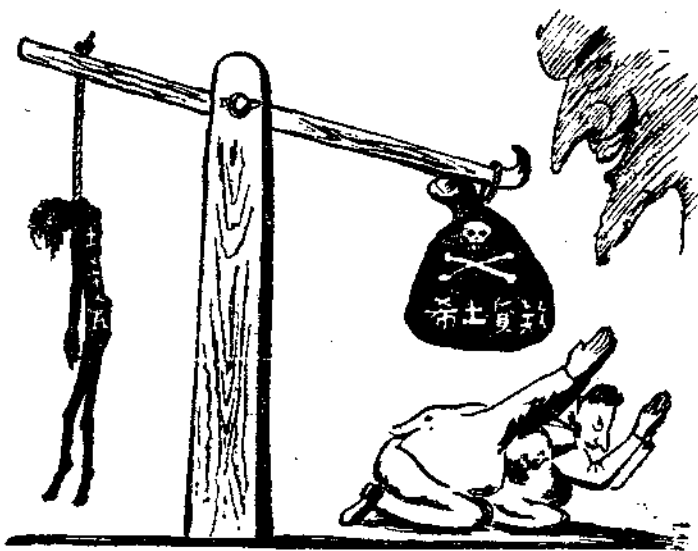
致問題的解決，而是去實行上（第二）節所述美國四項決策中的第一二兩項。無怪乎他未出國門就已十分悲觀地表示會議決難有所成就了。

莫斯科雖然不是美國對蘇魯致諒解的所在；可是，滑稽得很，它却是美國對英法求取更密切合作的地方。終馬歇爾在莫斯科的五十天，他並沒有多同莫洛托夫作私人的接觸；恰恰相反，他却經常與英國的貝文和法國的皮杜爾作相互訪晤。而其結果，在美蘇對德的整個諒解上雖然毫無成就，但在英美法的相互接近上却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假如說這次莫斯科會議有什麼成就的話，那唯一重大的成就就只有英美法煤斤協定的成立。這個協定使法國佔領區與英美合併佔領區之間的經濟依存關係頓見密切，英美報章甚至說可能是三區經濟合併的先聲。原來馬歇爾到莫斯科的主要任務，是利用英法外長密集莫斯科的機會，拉法國擺脫現行中立地位跑到自己這邊來，同時替英國和法國牽綫拉馬。反對西方集團最力的蘇聯，竟然被人家把她的首都利用來作為組織西方集團的初步談判的地點，這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今天在事後來看莫斯科會議揭幕時蘇聯突然提出中國問題的舉動，依我猜測，大概蘇聯已經知道了所謂「杜魯門主義」的勢在必行。因為如所周知，美國這個新政策的醞釀，在二月間就已開始了，在三月初就已經成熟了。所以蘇聯急於主動地展開一個外交上的威力搜索戰，希望藉以確定這個「杜魯門主義」是否會在遠東——尤其中國境內——同時推行。馬歇爾的覆函雖然對年來是否干涉中國內政的問題，避而不提，可是却會

明白說明美海軍陸戰隊將「繼續撤退」，暗示美國準備止步於對華政策的現階級，暫時無意在遠東實行「杜魯門主義」，以免過份刺激蘇聯的感情，加深美蘇之間的對立。由這一點可以看出，美國政府對於前段所述第四項決策在遠東的推行，在目前還是抱着相當謹慎的態度。這當中，各種內在外的因素自然很多，也很複雜，但美國不想在組織西歐的同時，再在遠東開闢對蘇外交的第二戰場，也是很明白的。

上面這三件事情，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美國的新政策——馬歇爾口裏所說的「一種種可能行動」，也就是杜勒斯所說的「美國代表團所已經確定了的政策」——在莫斯科會議中已經具體化了，已經逐步地在推行了。



• 龍 尼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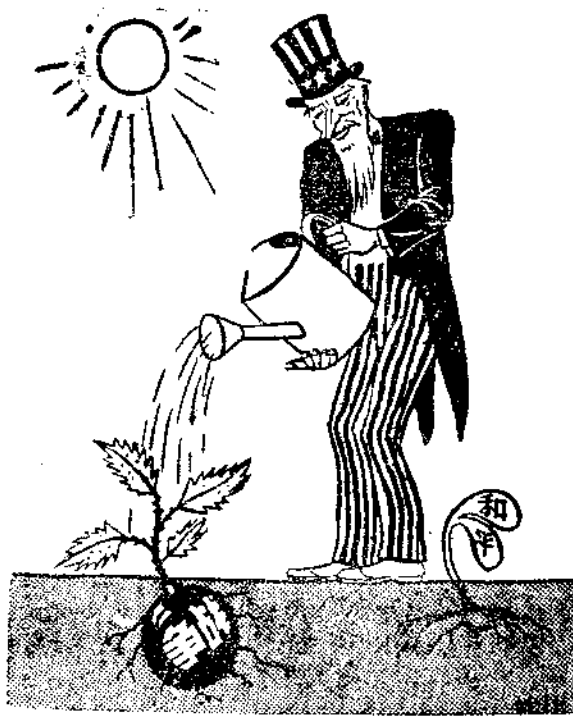
！美 投 人 殺

四

莫斯科會議結束之後，照杜勒斯和馬歇爾的論調觀察，美國自然只有更加加緊地把這上述四項決策推行下去，是毫無疑問的。

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鄧飛爾的宣佈美駐華海軍陸戰隊將於兩月內撤離中國的申明，以及對華五萬萬美元借款的遲遲不肯脫手，表示美國還不希望中國局勢發生變化，還希望美蘇關係在遠東的現狀上維持下去，既不變得更緊張些，當然也決不是把它弄得鬆弛些，等候局勢的發展。當然美國這種政策能維持多久，此刻無法預料。

壓迫蘇聯讓步屈服和誘脅東歐國家擺脫蘇聯的政策完全失敗了。蘇聯誠然有其弱點，誠然需要外來資本和物資來幫助她提早完成其經濟復興，可是蘇聯却沒有意思因為這些就在最基本最主要的



水澆錯了！

洪荒

要的那些大問題上，完全犧牲自己的利益和立場，而接受美國的命令。蘇聯還有路可走，還有信心和勇氣來自力更生。何況今年的年成預計可告豐收；六個月以後，一方面有工業產量因五年計劃第一年的過去而見提高，一方面又有充足盈餘的糧食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在這種情形之下，蘇聯自然寧願抗拒華盛頓的頤指氣使，而聽任莫斯科會議流產了。美國對於蘇聯這種態度，毫無辦法可想。今後恐怕只有繼續設法，妨阻蘇聯的經濟復興，或者儘可能延遲這個復興工作的完成期。其技術大概只此而已。

至於東歐新民主主義各國對蘇聯的關係，當然決不是美國的威脅利誘所可能動搖的。因為蘇聯鼓勵并協助東歐土地改革社會改革的舉動，已替蘇聯贏得了各國廣大人民對蘇的深厚友誼與同情，那不是金元和巨棒所可能收買或打垮的。誠然，各國現在都很迫切地需要工業品，但是這需要却不一定非靠德國實物和美金元來滿足不可。她們解決這問題的方策，一是加強她們之間的相互經濟聯繫；二是建立以貨易貨的辦法；三是與英法等國加強貿易關係。美國所希望的東歐國家對蘇離心之舉，至少在最近幾年內是幾乎根本沒有現實性的吧。

這樣，美國今後可能全力以赴的，只有兩件事了：這就是加緊對中東推行杜魯門主義，加緊組織西歐集團。關於前者，土希軍事貸款已經通過美國議院；但美國金錢物資有限，而各國需要無窮。所以如何加緊推行，還大有問題呢。

關於組織西歐集團的問題，雖然英美法煤斤協定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可是困難也還是不小。首先，美國必須進一步完成英美佔區的政治合併；而這，由於英國國內反美傾向的濃重，恐怕要受到相當嚴重的阻礙。前些時，報章盛傳英美官員加緊商談兩個佔區政治合併的消息，這兩天却完全消聲匿跡，沒有下文。足見儘管有美國的主動，有邱吉爾輩的如響斯應，然而因為工黨進步份子的強有力反對，工黨政府還不能及早就下一個最後的決斷。

其次，美國這一年多來對法國的拉攏，進行得很是積極。去年曾借給白魯姆內閣鉅額金元，最近還準備再借一筆錢給賴馬迪政府。同時，戴高樂也在最近放棄了追隨英國的路綫，改而追隨美國；據說美國政府與戴高樂之間秘談往還，已非一日。上月中戴高樂的各種政治活動，顯然有美國的背景。如果戴高樂不能戰勝法國現政府而上台，那法國佔區與英美佔區合併之舉殊難想像，而西歐集團的組織也就不大可能。但照現在法國人民的力量看，戴高樂即能上台，恐怕也不是短期之內的事。所以西歐集團還不能照杜勒斯之流的如意算盤，輕易就可實現。

不過，這一點是確定了的。無論美國新政策的前途如何困難重重，美國政府是勢將遵循着這個新路綫一直走下去的，除非美國人民的力量能够強大到足以阻止她一意孤行的程度。然而，照今天美國人民力量散漫無力意見紛歧的情形，似乎很難有效地迫令美政府勒馬懸崖。美國這種新政策實行的結果，雖然并不一定會挑起又一次新戰爭，但却會使世界長期動盪不定。

一九四七，五，二。

今後的八九個月

程 程

今年三月，國民黨三中全會閉幕的時候，蔣主席會對他的同志們說：「自現時起至本年十二月廿五日止，這九個月的時間為最嚴重時期，亦即國民黨生死存亡的關鍵。……黨內派別紛爭，殊為扼腕。本年三月至九月為國民黨最緊急時期，務須團結一致，方能應付。」（見三月廿五日大公報所載「本報訊」及聯合社電）這幾句話，出自國民黨總裁口中，即使感覺異常遲鈍的人，也要認為不比尋常，祇要聽他「生死存亡」四個字，便立刻警覺到黨難當頭。國難過去，黨難跟着就來，真要忙煞苦煞黨國要人了。

內戰既要打下去，三黨新政府便是個國民黨驅逐異的政府。同時，單就國民黨本身來講，又是個黨一致的政府。「黨內派別紛爭」雖說澄清不了，可是在應付黨難一點上說，經過這番改組，職司重新有了勻稱的分配：軍服份子擔任第一綫衝鋒陷陣的首要任務，那不必說；中山服份子除掉幫同着搖旗吶喊之外，仍然壟斷着中下層的民政幹部，而且在十二月廿五日國民大會召開之前，還要籌備「還政於民」，也就是導演「選舉」，這任務也相當重大；西服份子，亦即美國人眼中的自由主義者，以張羣先生為領袖，是這番政府改組後登場的主角，其使命，一面應酬鄰好，哀求美國的援助，一面整頓家務，致力經濟的穩定，來支持或維持前綫殺伐的繼續。所以大體說來，黨內派別確已「團結一致」，共赴黨難，不必「扼腕」的了，問題倒是在是否應付得過那「生死存亡的關鍵」，化「嚴重」為「緊急」，化「緊急」為「寫意」。

大家都把情勢看得很清楚：國民黨的策略是釜底抽薪，想一鼓作氣把共黨武力消滅；設若辦不通，至少要把它趕出主要交通綫之外，讓它到邊遠地方，與貧苦去鬥爭，這樣的趕掉一個死敵，政治便可隨心所欲的「民主化」，軍隊也可隨心所欲的「國家化」。共產黨的作法則是以太極拳術來對付少林拳術，避免敵人接近猛擊，同時要使敵方疲勁用盡，纔好輕輕「一推手」，把他打翻；設若辦不通，至少也要讓他精疲力竭，自願罷手。簡單一點說，國民黨要把共產黨打垮，使它解甲告饒；共產黨要把國民黨拖垮，使他力竭認輸。共產黨所怕的是主力被人消滅；國民黨所怕的是兵力不能制勝，財政經濟却要崩潰。

我觀察這個內戰，認為共產黨祇求不垮，不垮即不算敗，不敗即可勝。國民黨祇求速決，速決才能休兵，才能維持財政經濟於不墜，休兵方是

勝。這是需要詳細說明的。

有人認為今日之中國，彷彿一個南北朝對峙的形勢已經逐漸釀成。就目前情形說，「南朝」是有一塊完整的領域的，而且在這領域之上，已經早有它一套政治和經濟，成爲一種現狀。「南朝」固然依仗這一整塊的領域，出兵，出錢，出「食」，使征伐成爲可能；同時，不可忽略的，「南朝」所以不惜傾巢北攻，其用意也就在儘力維持現狀，鞏固那一套既有的政治和經濟。試想這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現狀呢？是怎樣一套政治經濟呢？說它本質上是一黨獨裁，一點沒有錯，但是不够澈底。借用柏拉圖的名詞來說，那是與「貴族政治」(Aristocracy)同樣由少數人支配國運的「寡頭政治」(Oligarchy)；所不同者，「貴族政治」尚是一種比較「乾淨」的形式(Pure form)，「寡頭政治」却是腐敗不堪的(即所謂Corrupt form)。世上儘有新興的國家，國運支配在少數人的手裏，但是由於社會財富的平等，有權人並不就是與衆不同的有錢人，因此，民主不民主且莫說它，政治倒是格外「乾淨」的。中國則不然，握有絕對財權的人便是絕對政權的行使者，官俸與資本合流，囊括天下之渣滓和污濁，淹沒大多數勞苦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這腐敗不堪的寡頭政治深深植基於寡頭經濟的基礎之上，給它套上一個比較新式而又合式的「帽子」，便是所謂「富翁政治」(Plutocracy)。現在「南朝」要想予以維持乃至鞏固的，便是這末一套政治經濟，這樣的一種現成秩序；可是爲了征伐，出兵、出錢、出「食」的又是誰呢？却又都是你我老百姓。如果這種情形一直綫的演化下去，便不單是維持現狀，而更是發展現狀，要使貧者無立錫之地；加以中產階級的沒落，豪門巨富的兼併，政治上的「寡頭」必然愈弄愈少。這便孕育着一種絕大的危機。黨難原是國民黨一黨之難，人民認爲不關痛癢；可是爲了應付黨難，從事征伐，凡百犧牲却是人民一肩擔負的，反倒造成人民的深痛奇癢。這便逃不出兩個結果，政府要竭澤而漁，或不免有一天，河水乾涸而根本網不出魚，即使有魚，也因無水而都已死絕，那末錢呢，兵呢，「食」呢？內戰如何繼續？此其一。第二，人民儘管馴良，馴良却是爲了戀生，你如果逼得他毫無生趣，他就寧可死；這「死」，是法國大革命時代「不自由，毋寧死」的死，也就是「拚命」，而所謂「拚命」，乃是要你死我活，乃是從死中求活。這便是民變。這一層道理簡單之至，中外史籍不知載了多少，可作教訓。

財政的紊亂，耳熟能詳，不必多說；若論一般國民經濟，也已走到懸崖的邊緣。要解救這危機，本來應該立刻「勒馬」，可是這與應付黨難的基本旨趣違悖；其次是靠軍事勝利，斬草除根，目前政府正以全力赴之；再其次是乞援「友邦」。關於這最後一節，我要趁早加以說明。「友邦」給你財政經濟的援助，原是你寄以兩大期望。第一，要你安定；安定然後可以繁榮，她也才可做買賣；如何才能安定下來呢？你既要打，打出勝利，便也打出安定來了，所以在這一方面，她的如意算盤正就是你的如意算盤。第二，要你成為防蘇基地；你既要打共產黨，打出勝利，便也打出防蘇基地來了，否則倒有變為親蘇基地的危險，所以在這一方面，你的恐懼正就是她的恐懼。美國之所以在中國甘作重大血本的犧牲，正跟你甘冒財政經濟的嚴重危險是一模一樣的，都把希望一股腦兒寄托在「打出勝利」，寄托在軍事上面。你如果老不勝利，你的財政經濟的危機勢必愈來愈嚴重，她再援助你，則血本的犧牲也愈來愈重大，到那時，她原先對你的期望漸漸顯得落空；你非但打不出安定，反而造成紊亂，這與她做買賣的打算背道而馳；她想你成為防蘇基地，你非但打不出來，反而培養出親蘇基地，那末她是否願意永遠做你的瘟大頭呢？總之，美國目前全面抵制共產主義，因而重新走回援助國民黨的老路，乃是必然的。但是正因為她援助之心極切，顯見她對你的希望極殷，希望愈殷則將來的失望可能愈大；而希望的寄托，上面說過，完全在於「打出勝利」，在於軍事上面。如果財政經濟緊隨軍事失利而愈益嚴重，那末，除非美蘇兩國正面劍拔弩張，恐怕美國就要重新效法對華政策了。她可能變為真正意義的「友邦」。

美國的援助的確可望緩和財政經濟的危機，可是倘若中國內戰繼續下去，這危機仍將一天比一天深刻，美國充其量也祇能消極地延緩危機的爆發，却無法把危機從根剷除。上文說過，經濟危機可能帶來大規模的民變，也許有人不肯同意這一說。他們會說：中國不比西洋，乃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民好在是保守的，散漫的，農村經濟好在是落後的，自給自足的，所以民變根本不易爆發，即使爆發，也是零星的，如一盤散沙，不易團結。這點，我都承認有些道理。不過，上文已經說過，農民固然馴良，然而倘若逼他過甚，他必還有一「拚命」的餘勇；而且，保守散漫的農民不一變一則已，落後而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不一亂一則已，偶一變亂，必如和尚尼姑思凡，比平常人更兇頑一些；這樣的民變固易流於零星散漫，團結不攏，然而惟其是團結的民變，也極便於聚精會神予以滅絕，倒是零星散漫的民變，還得東拉西扯去對付。一旦民變普遍發生，自然當時一般經濟社會秩序早已動盪不甯，那末政府在軍事緊急的情況之下，再要從前綫拖回兵力來「維持治安」，斷乎沒有不傷腦筋的。

歸結起來：「南朝」爲了應付黨難，便不得不從它的整塊領域搜括人

力物力，從事征伐，以求保全國有的政治經濟體制；它原是個「有者」(Those who have)，因此征伐纔是可能的事，可是它所刻意要維持並鞏固的現成秩序，却必然成爲它的累贅，它的致命傷；它因爲有了完整的領域，所以除却努力于前方的征戰外，猶須隨時照顧後方秩序的甯靖。它在軍事上須謀速戰速決，趁着後方社會經濟尚未到達窮途末路，先把他死敵解決；設若不能，它的後顧之憂就會一天一天加深，終於成了半身不遂的癱瘓，進一步還要危害前方的戰鬥力，遭到全盤瓦解的厄運。所以我說：國民黨必定要打到有一天能够勝利休兵，才算真的勝了，否則戰敗的危機總是存在着，而且還有日益加深的趨向。

「北朝」的局面就大不相同了。它幾乎沒有一塊十分完整的後方，也可以說，它的後方已與前方融成一體。它原是一個「無者」(those who have not)，雖然由於近年來實力的發展，它也蔚然自建了一個新的政治經濟體系，可是它却毋須顧慮這個體系會遭內戰破壞，影響它的戰鬥力。共產黨的力量每到一處，挾以俱來的利器就是它這一套新的政治經濟，以替代它所破壞的舊秩序。在它的控制區里，政治是否合乎理想，是另一問題，可是社會財富經過強制的或非強制的手段，重作了比較均勻的分配，總是事實；統治者也並不會與資本台流，侵蝕民間的脂膏。我們想像得到，共產黨控制區內的大多數人民，是依附着那一套新的政治經濟體系而生存的，加以在內戰中處于防禦之一方，越發容易萌生「相依爲命」的感覺，因此不但免却共產黨前綫的後顧之憂，反而增加了共產黨戰鬥力量的堅韌性。共產黨可以一心一意應付戰事，祇求主力不被國軍消滅，祇求不垮；不垮則力量依然存在，可不斷與國軍周旋，使它不能勝利休兵，使它精疲力竭。所以我說：共產黨不垮即不算敗，不敗即可勝，以國民黨之不勝爲勝。

歸根結蒂，勝敗繫於軍事。政府重視今後的八九個月，實有它一整套的做法，先是改組政府，好讓美國的援助恢復過來，好把後方的經濟穩住，才有力量攻打共黨。政治、外交、經濟的佈置，無一不着眼於軍事，就希望在今年十二月廿五行憲的國大召開之前，努力打出個有利的結局來。

那末我們再略論軍事。作戰所仗的，一是人，二是武器；把人和武器作有計劃的配合，來從事戰鬥，那便是戰略。現在國共兩方士兵的訓練，恐怕都不很够；傷亡既多，補充上去的，還不是糊裏糊塗？所以要緊的還在一個士氣。我在另外一篇文章裏曾經說過：「士氣是無法振作起來的，綁一個兵來，除要他送死之外，還使他家裏缺掉一個有力的耕者。抗戰期間，逃避兵役本也是普遍得很的，但在那時，政府的敵人便是兵的敵人，還說得上「敵愾同仇」。打內戰呢，農民再無知識，也知槍砲是向同階層的同胞射發的」。現在的問題就在國共兩方士氣，究竟那方更不振作。關於這點，我在上文已經提過一些。大約在目前這內戰場合，若論士氣，總

是防禦方面佔點便宜，進攻方面吃點虧。進攻方面的士兵必然感到進攻之無謂，防禦方面的士兵却認為防禦可以保全身家性命。還有一點，由於國共兩方政治經濟體制的不同，共軍跑東跑西，兵士們相依為命，反正他們早成了一無一的；國軍南調北調，兵士們疲於奔命，他們原是屬於「有一」的。我們知道共軍特別能打遊擊，不容易潰散，縱在極惡劣的情況下，也還是小股小股的凝結一處；而國軍呢，萬來幾千人集體繳械的事，已發生過好幾度了。這難道都出於偶然？

其次是物。無疑的，國軍有美式配備，自然佔點優勢，不過我以前也會這樣說過：美式的配備的「優勢」倒祇能說到一個限度打止。第一，士兵的知識和訓練不夠，好的武器發揮不出大的威力；第二，裝甲和重炮是「固定資本」，還需要「炮彈子彈」這「流動資本」去週轉，但是政府偏又少了這些美式的頭寸，不能自造，供應不上；第三，美式的配備還要仰賴美式的交通的配合，否則真是笨重難移，試想我們的交通設備是怎樣的？在陣地上遇到微妙時節，放棄了美式的配備吧，委實可惜；不放棄吧，人便受了物的控制，中國「人」受了美式的「物」的控制，因而喪失了機動性，往往人被俘去了，物也齊散了，落得個人財兩空。山東的戰事三番兩次證明了這一點。

國軍要找共軍主力，有人喻為「捉迷藏」，很妙。要捉到手，有些前提：這捉迷藏要在一定的圈子以內，而且這圈子不能太大，須是捉者走三兩步，攤開手來就可以觸及的。捉者對於圈子的中點固然要隨時把握得穩，庶不致退失據，但是又不能老在中點盤旋，否則一輩子也捉人不到。我們研究國共戰爭形勢，不禁慨嘆圈子太大，戰場之過於遼闊。國軍為使共軍力量不能集中運用，為使共軍控制區不能聯成一氣，會奮力打下幾個重要據點，如張家口、長春、和延安，想把一個大圈子攔成幾個較小的圈子，分頭以外綫包圍的形勢，找其主力，施以猛擊。照自己的算盤，圈子可以愈圍愈小，包圍愈來愈緊，諒必敵人逃不掉。可是要包圍，便要有足夠的兵力，不能有特弱的一環，否則「突圍」的事即不可免。不幸由一個大圈子攔隔而成的較小的圈子，面積依然不小，要合圍起來，兵力仍嫌不夠。現在國軍採行的辦法，是在各戰場上站穩圈子的中點，亦即重要交通綫，庶不致退失據。可是國軍要搶據點，共軍却不要據點；把兵力集中在據點上，來挨國軍的毒打，共軍是決計不幹的。那末國軍勢須又從交通綫上展佈開去，搜索共軍主力。照自己的算盤，共軍散佈到面，分整為零，則它的兵力自然更小，那末我也散佈到面，分整為零，既不能以大整吃小整，便以大零吃小零，把共軍逐一擊破，亦不失為穩當的一法。可是這又可能發生兩種後果。國軍若從點綫上散佈到廣大的面去，點綫上自然不免空虛起來，又為共軍造成空隙，此其一。第二，國軍若也分整為零

，把兵力分散在廣大的面上，共軍此時却又可以化零為整，專找國軍較弱的「零」的麻煩。國軍一到這步田地，據點固然到手了，却還把握不穩；要滅共軍主力吧，反而挨了冷拳。今天拿下張家口，明天捉去李仙洲。戰報誠然輝煌，無奈共軍主力健在不垮，還是速決不了。複雜錯綜的戰爭形勢，它的輪廓實在無非就是上面說的一點小把戲。

我們固然是痛恨內戰的，可是我這整篇文章，自認不會含有什麼「願望式的想法」(Wishful thinking)，並不蓄意要長那方面的志氣，要滅那方面的威風。我也並非存心要以危言聳聽，只是確實替今人擔憂。事實是無情的，道理是無情的，所以我的分析也不能多情。

政府重視今後的八九個月，實有它一整套的做法：政治、外交、經濟，無一不著眼於軍事，就希望在行憲之前，努力打出個有利的結局來。它所處的環境，使它必須速戰速決，渡過黨難，才能維持現狀，但依上面的分析，迅速解決共軍武力，看來是無望的。然則八九個月之後，既不政治解決，又不加緊征伐，來個短期休戰，暫時休養生息，解救一下社會經濟危機，是否做得到呢？做不到。北方是個國共犬牙交錯的局面，不死不活的狀況無法形成；更重要的，短期休戰之時，還得備戰，依然是個戰爭狀態，根本解救不了社會經濟危機。那末，只有重開和談一途了嗎？但願如此。必如此，整套不合理的政治、外交、經濟才能更弦改張，走上有利於人民的道路。我們可以說：

今後八九個月的時間為最嚴重時期，亦即人民禍福災慶的關鍵。

五月六日深夜。



北國風光 之樹

經濟前途還能樂觀嗎？

張西超

新政府的行政院長張岳軍先生在四月三十日招待中外記者的鷄尾酒會上，一方面承認目前的經濟問題因受內戰的影響確屬嚴重的，一方面却又說：「余本人對此是樂觀的，希望他人亦不必悲觀。」樂觀的根據何在，他沒有說。也許他是將希望寄托在兩種方案上，即所謂「治本與治標」的辦法：「治本在增加生產，治標在縮減不必要的支出，力求預算平衡。」這一方針和張氏在就職廣播中的說法是一致的。在廣播中他說：「治標方面，當繼續切實執行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治本方面，今後的措施，必須特別謹慎，着重於根本之圖，少作枝節之計，凡是無關於預算平衡幣制整理，無關於國計民生的迫切重要事項，絕對不輕率行動。」

此外，張氏在答覆記者關於向美貸款的問題時表示，他個人對貸款並不重視，「因為中國需要自力更生，行政院現正以全力領導全國人民發揮潛在力量，以求自力更生，自足自給。」

如果時間能退回兩年，張院長

在抗戰時的重慶發表這些意見，一定能够博得人民的信服並擁護。在抗戰時期，只要政府真能以全力領導，全國人民的潛在力量，確實能發揮出來；這種力量，確實也能使戰時生產增加，戰時資源不虞匱乏，就是為赤字預算增加人民一些負擔，也還能口無怨言。可是現在的環境和兩年前完全不同了。全國人民對於可恥的內戰是不會擁護的，遍地烽火，殘酷內戰只會毀滅全國人民的潛在力量，只會破壞全國人民的生產力量，只會消耗國民經濟的泉源，將國家的元氣磨損以盡。如果內戰繼續下去，我們實在一點也找不出經濟上可以樂觀的前途。

也許張院長所說的樂觀，是另有所指。也許他認為「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將繼續推行有效，「縮減不必要的支出」，或「整理幣制」足使預算平衡；換句話說，經濟上還有辦法拖過未來七八個月的難關。如果這樣看法是對的，那末張院長所領導的新政府，必然以全力爭取對美貸款，因為祇有向美貸得了巨款，才可能進行幣制的整理，設法使預算平衡，才可能減輕今後經濟嚴重的程度，才可能拖過幾個月

的難關。所謂「對貸款並不重視」或「自力更生自足自給」云云，恐怕只是張院長對中外記者（特別是外籍記者）的外交辭令吧？

「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是否能繼續推行有效，只要正視目前經濟現實的人，誰都明白，「緊急措施」將金鈔和物價斬斷，然而物價的四月漲勢已充分說明物價之上漲自有其本身的規律，禁止金鈔自由流通後，物價還是要上漲。而且，隨着物價之四月漲勢，金鈔的黑市最近也活躍異常。四八〇萬的黃金官價和二〇〇〇的美鈔掛牌，早已成為黑市金鈔護謄的數字了。有一位報紙編輯說：「緊急措施」所收的唯一效果，就是禁止各報登載金鈔黑市的消息，然而到黑市泛濫成爲公開的秘密時，報上禁載消息還濟什麼事？

平心而論，宋院長下台以前雖鬧了一次金鈔大風潮，可是當時金鈔究竟還吸收了一部分游資，游資泛濫在物資市場的危言，還不甚嚴重。在此次物價的四月漲勢



替一個人打算

甘草

歇期間愈來愈短，最後甚至沒有開歇，變為一直線的上漲。只要看四月間米、麵粉、生油、紗、布、肥皂等各種日用品都一致上漲百分之五十到八十，就可推測今後漲勢的嚴重。「緊急措施」希望將金鈔與物價的連繫拉斷後，使物價能夠穩定於某一點上。現在這個希望顯然是幻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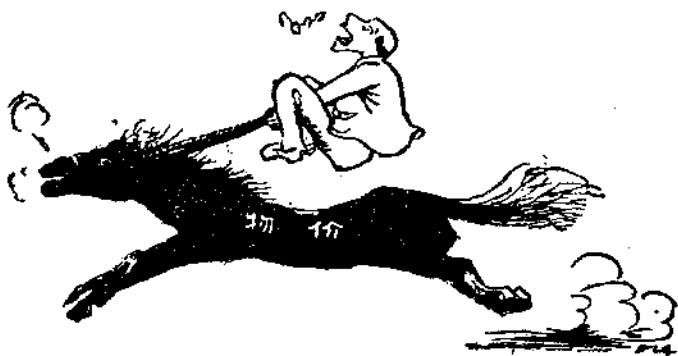
政府今年度九萬三千億的預算，本來已經是鉅額的赤字，現在物價比擬訂預算時漲了兩倍有奇，而且現在還只過了一年的三分之一，未來三分之二的歲月，物價究竟還要上漲多少，我們固無從推測，但就以目前的物價水準而論，九萬三千億的預算已經要增加兩倍，才能應付。預算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軍費，能縮減分文嗎？縱使把其他百分之三十的支出完全「縮減」，也無法使「預算平衡」。所謂「力求預算平衡」，恐怕也只是說說而已！

在「緊急措施」之下真正遭到「緊縮」的，恐怕要算公教人員和職工的生活。四月底的批發物價指數已是戰前的二萬五千倍，而公教人員的薪水收入還不到戰前的五千倍。以五千元收入應付二萬五千元物價，問題還不够嚴重嗎？「緊急措施」對於金鈔物價早已失去效用，而討論到公教人員調整待遇問題時，張院長却表示「此點

與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相抵觸」，還在「縝密研討」之中，這種看法，豈可謂公平呢？

至於職工們的新工，自生活指數凍結後，實際收入（貨幣收入對物價上漲之比）三個月來已比一月份減少了一半，雖有變相的所謂「差額補助金」，但由於計算方法的不合理，使職工們蒙受損失，「緊縮」了日常的生活，降低了工作的情緒，影響到生產的效率，這又與張院長「增加生產」的治本辦法背道而馳的。如果生活指數不解決，職工生活不安定，勞資糾紛迭起，則罷工、怠工、懶工、慢工等種種不幸現象，將日益發生，影響生產，更為嚴重。

中央銀行新總裁上台以後，一改過去信用緊縮的方針，成立貼放委員會，放寬貸款的頭寸，其用意也說是要扶助生產事業，增加生產。將來究竟能否有助於民生生產事業，而不再為官僚資本「錦上添花」，就要讓事實來證明了。其實，一些資力薄弱的民營工廠，早在去年



外貨傾銷、物價高漲、以及高利貸的剝蝕之中倒下去了，今日能繼續生產的工廠，不是靠自己資力雄厚，就是些和官僚資本混血的產物，很難代表中國富於進步性的民族資本。幫助這些資本，除掉支持政府內戰經濟的體制，或於政府拖過難關有所助益外，對於建設民主經濟的意義我們是懷疑的。何況政府的貼放政策，是否真能對於工業生產有幫助，也還是問題。最近上海工業協會對於輸入限額分配表示了激昂的抗議，可見他們與政府之間，還是有若干矛盾存在的。

！師騎的憐可

至於農業生產的前途，更是漆黑一團。聽說政府今年對於農貸額將大大增加，據徐柏園氏最近在聯合徵信所談，今年「棉花

• 龍 尼 •

生產約一千四百億，普通農業貸款約較去年增加三倍，約一千億，農田水利一千五百億，尤其是對綏遠區農貸」，將特別注意。農貸的擴大，是不是說明政府對農業增產以及農民經濟的改善抱有決心呢？我們也要待事實來證明。但有幾點可供參考：第一，政府今年農貸的對

象，主要是棉花、煙草、絲、茶等特產，這些特產，都是可以換取外匯或減少外匯支出的。政府擴大農貸的目的，顯然是從爭取外匯出發。從這些特產上爭取到的外匯，自然可以多輸入一些別的外貨，這對於內戰經濟是有幫助的。第二，對綏遠區農貸特別注意，則經濟以外還有政治的目的。第三，近年農貸的趨向，一般說來是對物不對人，對農民直接的幫助很少。就是對物，也並沒有達到增加生產的目的，大部分幫助了在流通過程中的商人。因此，對於農貸，我們不存多大希望。何況全國農村這麼廣大，這些農貸數字就是完全放到農民頭上，也等於「滴水車薪」，無濟於事。

在內戰不停，通貨惡性膨脹，物價繼續高漲的前提下，固然談不到治標的「平衡預算」，更那裏談得到治本的「增加生產」？

然則張院長所謂樂觀的前途將寄托在那裏呢？除掉將希望寄托在他「並不重視」的向美貸款身上外，恐怕不會再有其他的「奇蹟」了！然而借外債以打內戰，難道又是中國民族經濟光明的前途嗎？

（附言）今日打開報紙一看，聯合社南京一日電稱：張院長昨天在立法院報告施政方針時，居然也認為「緊急經濟措施不足以應付經濟現況」，而且也公然承認「緊急措施」性質之苛刻，人民不能永久忍受，所以正考慮加以修改或廢止。前天還主張切實執行的方案，昨天已動搖了信念。如果不是放煙幕，那就表示政府經濟政策之舉棋不定，或完全處於被動地位。究竟如何修改？能否廢止？且待事實來說明罷！五，二，農。

我國過去處置精神病人的態度是頗為殘酷的；大致不外關鎖起來，等他死掉就是了。防範的寬緊，由發病的狀態來定。遇有帶危險性的病人，那手段的嚴厲是不下於對待殺人犯的。唯一與處置瘋狗不同的地方是不至於提到立即打死而已。即使擱開瘋狂病人生前的痛苦不說，一個延期執行的死刑，在被執行者的感受上，是否好過「就地正法」，恐怕是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

不待說，精神病人與死罪犯人不能相提並論，因為前者並沒有應當受刑的罪過。所以精神病人是非常令人同情的。同情而沒有有效的行動，則同情不免成爲浪費。到現在爲止，人類對精神病人所能給予的援助，尤其是在中國，難着有效

精神分析的物質基礎

董秋斯

程度，似乎還遠得很呢。不錯，若干瘋人院是設立起來了，現代醫療方法也多少多少地採用了。不過病人一經入院，便很少病愈出院的希望，這事實不就表明現有的醫療還未達到應有的效能嗎？

多謝外科手術的進步，不等待結核病特效藥的發明，結核病已經不僅可以治愈而且可以速愈了。想不到這似乎無法下手的精神病，也要從外科手術方面尋出得救的希望了。

據最近一本美國雜誌記載，兩年前一個美國少女患了很嚴重的精神病，經過了一次腦部外科手術，她現時已經恢復了正常生活，先前的病象完全消失了。這一種精神病外科手術的名字是

的 Prefrontal Lobotomy (前腦分割術)，大意是把前腦割開一部分。這手術自身並不是很新的。十二年前，一個神經系外科醫生，E. 蒙尼茲 (Egas Moniz)，在葡萄牙試行過。華盛頓大學的神經系學者弗利曼 (Walter Freeman) 和神經系外科專家華茲 (J. W. Watts) 把這手術介紹到美國來，並加以改進。一開始，這手術僅施於別種治療方法失效的幾乎絕望的病人。所得結果是很可觀的：受過前腦分割術的病人，約有百分之三十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另有百分之三十病情大見減輕。餘數大致無甚變化。在精神方面反見退步的爲數甚少。死者不過百分之二而已。

到目前爲止，美國受過前腦切割術的病人已

有兩千名。趨勢是一天比一天推廣開來。但還有一些醫生認爲，這種手術並非萬靈的，不能代替其他精神病治療方法。事實上，因爲這種手術是比較晚出的，人類精神也是比較難於把握的，需要繼續研究的地方，當然甚多，所以在實施此種手術時，總是比較慎重的，如前面所說，大

致施於幾乎失去痊愈希望的病人罷了。我不是學醫的人，對純醫學的問題，不能抱更多的興趣。我所關心的却是精神分析學家對這手術所作的說明，便是說，爲什麼這手術可以奏效？

據精神分析學者說，人類精神具有三種不同的作用，用比較易於瞭解的名詞來說，便是：基

從歷史看民變

——里胡——

這裏不打算研討中國歷代民變的性質，發展過程與最後的結果，而僅僅在於說明一種事實——在內戰中打得火熱而爲「勝利」沖昏了頭腦的將軍們所忽略的事實，告訴他們歷代的王朝寶座都是怎樣的倒台的，是倒於那些人之手的。

在古代，讀過歷史的人都

知道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的故

事，從而殺死了蚩尤，取得了天下；而對

是當時蚩尤虐政下一個民族的領袖，那麼，

蚩尤政權的垮台，不正是當時民變的結果

嗎？在夏代，商湯不也是一個民族的領袖

嗎？夏桀也是這樣倒於商民族之手的；而

周武王之起也是由於商紂的荒淫無道，作

罪多端而豎起「吊民伐罪」的旗幟的；至

於周厲王之被放逐，戰國之紛爭與夫秦民

族之興起及周代之滅亡，不正也都是橫徵

暴斂之下的官逼民變的結果嗎？

這是遠古的事情，也許還不足徵信，

雖然，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那麼，

請再看看有書可稽而也爲大家所相信的自

漢代起以後的史實吧。

中國第一個大獨裁者秦始皇早就做過

爲今天許多英雄所幹過的愚民政策，焚書

坑儒，盡取天下銅鐵器以消滅民間兵器的

存在等一套把戲了，但是，結果還有陳勝

吳廣的「揭竿而起」和一個小小甲長（亭

長）劉邦的出現，一個自封「傳之萬世」

的王朝遂由此而消滅。而王莽的興起，黃

本衝動，實際判斷力，道德意識。基本衝動要求無條件的滿足，主要的是性慾的滿足，而實際判斷力和道德意識總要加以限制，所據的理由則各不相同。當這三種作用能維持一定的平衡，可以折衷相容時，那便是正常的精神狀態。一旦道德意識佔了絕對的上風，使得基本衝動沒有絲毫活動的餘地，實際判斷力也不再能起任何作用，這時便造成瘋狂的精神狀態。假如這說法是對的，精神病的主要根源自然就在病人曾經發展過度的道德意識了。因此，治療的方法必然是減弱以至除去這種道德意識。前腦切割術的目的便在這裏，它所以能奏效的理由也便在這裏。

近來西方學術界有不少人想用精神分析學構成一種人生觀或宇宙觀，因而引起很多爭論。關於這問題，不能在這裏多談（請參考拙譯「精神分析學與辯證唯物論」）。我們但要知道，精神分析學者，從創始者弗洛德數起，原來都是醫生。精神分析學所 能風靡世界，也是以治療精神病作出發點的。治療的原理，大致如上所說，但斷乎不是這樣簡單的。

一種理論的發展過程，必然是先有若干具體事實和經驗，由以引發某一個或幾個在那問題上具有一定修養和天才的人的注意，他或他們因而作出若干假設，便是所謂學說，此後隨着他們及其信從者繼續不斷的努力，使得他們過去所作的假設一一得到事實的證明，這才成爲堅定不拔的理論。自然，並非一切假設都可以得到事實的證明，有的不免要爲後來發見的事實所修正，有的甚至完全被推翻了。精神分析學，除了在醫學上確定不夠的成就外，有一大部分（尤其是他的門徒和私淑者引伸的部分）依舊未脫離假設的階段，需要發見更多的事實來加以證明，加以修正，或至加以推翻。前邊所說的前腦切割術，雖然

推行還不算很廣，要不失爲重要事實之一。

我前面所說精神的三種作用，是精神分析學創始者弗洛德的重要發見。但他所用的名詞並不如此。爲了尋找一套不引起誤解的名詞，他確乎費了很大的苦心。他最初定名爲意識，前意識，無意識（或稱下意識）。後來他覺得這一套名詞會使人得到一幅靜止的精神圖，因爲它們太多地域的意味，而不是精神自身所具的一種性質了。他於是改名爲愛德（Ego），自我（ego），超自我（super-ego）。

現代思想界凡以唯物論者或辯證唯物論者自命的人們，一看到「精神」或「心」等類的名詞，便容易聯想到哲學上的唯心論或觀念論，因而懷有一種先天的惡感。不管精神分析學在醫療上已有的成就，也不管弗洛德一貫的唯物主張，竟有人說，精神分析學主要的概念是觀念論的，不是唯物論的。假如弗洛德能用具體的耳目可接的事實來加以答辯，對於他這學說的建立，自然是再好沒有了。不幸，在他有生之日，並未作到這一步。他只能含着無限委屈說，「對於描摹像人類精神這樣不可捉摸的一種東西的嘗試，不要責備得太嚴吧」。

現時，前腦切割術出現了。假如精神分析學家對這手術所作的解釋不錯，那末，所謂精神這東西，不再僅是一種抽象的作用，而是具體的耳目可接的物質了。此後精神分析學這個名詞不妨改爲腦筋分析學，愛德、自我、超自我不妨改爲腦系上的一些特定名詞。專就精神分析學而言，這實在是一種飛躍的進步了。

誠然，前腦切割術的歷史還太淺，我們不能過早地根據它來作結論。不過人類知識進步的方向，總是由觀念的變爲具體的，例如原始時代以及後來許多宗教的迷信的觀念，逐漸都爲人類對自然界的具體知識所代替了。假如精神分析學能成爲一種真正的科學，必然在陸續發見它的物質基礎上表明出來。

巾賊」與漢末三國的紛爭，晉代的覆滅，六朝的興亡，窮奢極慾的隋代的垮台，唐明皇的馬尾坡之難，五代的演變，趙匡胤的陳橋兵變，金元的入侵，與農民朱元璋的起來，崇禎皇帝的煤山上吊而死等，都不是被壓迫得無法活下去的時候的變民們所一手推翻嗎？他們不又都是由變民中而站起來的嗎？

這還是一點比較遠一點的事情，而只被我們看作歷史的事件，好像與現實沒有多大關係的；那麼，這裏再來看我們有很多吧，尤其是那些口口聲聲說着實行遺教的內戰專家們一定更清楚：

孫中山先生是痛感滿清的政治腐敗，民生凋敝，喪權失地而揭起革命旗幟的，他之被滿清政府稱爲「四大寇」之一而逮捕捉拿，不正也說明他是當時民變的首領嗎？而滿清政權到底就喪於這「四大寇」之手了；中山先生一再地在遺教裏告訴他的信徒們，革命是順應世界潮流，適合國家需要，爲人民所搞起來的。換句話說，誰逆了潮流，誰違背了人民，誰就有遭受到被革命的處分。中山先生是從人民當中走出來的，他這些話正是至理名言，必然會實現的。而今天，在苛捐雜稅抽丁征夫大打內戰之下的各地如兩後春筍一般的武裝民變的騰起，甚至於在南京附近也發現有民變武裝的存在，不正是歷代末年的歷史重演的序幕嗎？而這齣戲的結果如何，分曉的時候還會太遠嗎？假如有人一定要打下話的話。

南行所見

周炳琳四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大學講演

今天我講的題目，是對這次南行往返兩個月中眼見的與接觸到的事物的不鮮的印象。我這次返回浙江原籍，是為先母營葬。先母在戰時一直住在浙江，勝利之後，我想回去省視而未能，到北平來了一個多月，就接到噩耗，所以我這次是在極大的哀痛中旅行的。兩個月來，國內發生了不少事情，處處都使人想到國內政治經濟是在怎樣的情況中，我們又是生活在怎樣的氣氛之下的。我這次的行程如下：二月十三日大雪中出發，火車走到蕪湖，前面有類似地雷的聲音，火車不敢前行，折回塘沽過夜；至秦皇島，坐煤船去滬，船在冰中行三日，始放洋入海；二十一日抵滬，另乘小船返籍，一路平安；在家住到三月十八日，返滬後爲了等船，乘便去南京杭州看了看；四月十二日返抵天津；前一日平津線魏善莊發生戰事，又在天津等了兩天才回到北平。算來整整兩個月。我這樣敘述，是爲了這中間都有與現實相關的事實穿插着。在天津看到小劉莊一帶添了不少新的工廠，但除「中紡」外均未開工。這些都使我們感到了今天是在怎樣的社會中，你對它便會有一種看法。這兩個月中間的大事情不少。當我離開北平的時候，正是政治解決的口號已經收起來，全國在大打了。我在報上看到了軍調部撤消，各地中共人員撤退，後來又看到通州事件，及北平二月十八日大搜捕和十三教授宣言。我看得很奇怪，據報載被捕的有三個人，不知都是甚麼人？已經釋放了沒有？到了南京，又看到英國劍橋牛津兩大學教授十餘人來函抗議中國政府任意逮捕自由份子。何思源市長的聲明中說是因通州事變後，市內感到威脅，所以搜查，並未逮捕自由份子；但是符定一、王之相又放到甚麼地方去了呢？到上海後見到的是各地中共人員及新華日報勒令撤退，上海市內失踪者甚多。去問和軍統有關的警備司令宣鐵吾，他說人是中統捉去的，結果大家都不敢聲張。我想，上海並沒有發生通州事件呀，所以北平的搜捕也不過是藉口，事實不過是軍調部撤消了，

爭鬥場市的港香在美英

——橋初余——

(一) 戰後香港市場的情勢

香港是遠東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要控制中國甚至遠東的市場，首先要掌握香港的市場。在戰前，香港市場主要是英鎊集團控制的；但戰後，英國由於工商業受創過巨，遲

遲不能復原，英帝國金融經濟的力量也漸次走向依附金元國的道路，此時若不努力掙扎，將來在國際間更將處於劣勢地位，於是反映在香港一隅，美失便也展開遠東市場的商戰，英國對於美貨侵入一向被不列顛帝國視為禁錮的殖民地市場，祇能維持防

禦的守勢的局面了。

香港光復之後，英政府曾竭盡一切方法從英屬地區運輸必需品來供應這座孤島；但那也僅僅限於必需品，如糧食燃料，少量的建築器材而已。因爲那時候主要的供應地區如澳洲，生產力一樣處在未能復原的景況下。而且必需品的供應也距市民需要極遠，使政府的配給制度受到打擊，不易進行，無物可配；另一方面，黑市物品又價格奇昂，香港仍處在日用品供不應求的嚴重狀態之下。而戰後的英倫三島又無力供應這主要的殖民地港口的迫切要求，於是香港市場便被迫開放了，一般香港商人轉而希望與美國發生商業往來。英政府的美匯統制雖然至爲嚴格，但是由於香港陷入日用必需品極度的貧困中，也不能不局部允許商人向美訂貨了。這被允許的部份，不言而喻，是必需的日用品和建築器材，因爲救濟糧食恐慌和重建香港的樓宇，於港政府都是急不容待的事情。

在這種情勢下面，美國商船大約於一九四五年聖誕前後第一批駛進香港來了。貨物主要是燃料、糧食、罐頭和化粧品。這之後，美貨來港就絡繹不絕，第二批商船十餘艘於

一九四六年一月中旬到港，第三批二十餘艘二月底三月初又來，……香港這大英帝國的藩籬，漸次被拆卸下來了。

但衰老的英資本主義及其殖民政府對於這種趨勢的危險性，是十分警惕的。她很清醒地知道美國佔得了遠東市場，就等於佔得了遠東的中國人發生了貿易關係，間接就造成了和中國貿易的好機會。何況英國無貨可來，根本無法與美貨競爭呢！

上面說過，由於英鎊集團的衰疲和落後，對於美貨的侵入，她祇能作防禦守勢的鬥爭。這些鬥爭是以多種方法進行的，終極的目的在於限制美貨在香港的市場，爭取時間，以便在英國恢復元氣之後，進一步把美貨在香港的優勢商業地位推倒，規復戰前英鎊集團在香港的天之驕子的地位。

(二) 英國在香港是怎樣防禦美貨的？

以下，要分別說到英國所採取的各種防禦的方法。

(A) 外匯統制政策
在香港，外匯是受政府統制的。香港外匯統制

以後不再要中共了，甚至從前給他們醫過牙的人也要捉去問一問。這都告訴我們和談的一幕已經過去，今後是要用武力了。這之後就是上海的黃金美鈔風潮，政府採取緊急措施，宋子文去職，張嘉璈重回中國銀行做總裁。金鈔風潮並不新奇，內戰大規模地打，通貨膨脹，大家當然要把不值的法幣安頓在法幣上。過去用黃金吸收法幣回籠，雖有些效果，但這一次他們却估計錯了。由於法幣價值過低，金鈔價錢再高也有人買，再加上官商不分，大家都要撈一把，遂造成風潮。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中雖有許多條文，但其要義不過是停止金鈔的交易。政府一向慣用「緊急措施」，結果總不過如此。宋子文因措施不當而去職，我說他的罪過是不能停止內戰，不能阻止通貨膨脹，但在這樣的國家中，管財政的人不過是個賬房先生，主人要錢，他就得去籌，去印鈔票，現在單單責備賬房，而不責備指揮賬房的人，是很不對的。只要內戰繼續，誰來做賬房都是一樣。宋去職前後，輿論界大大熱鬧了一場，但不責備主張內戰的人，仍正抓不住癥處。某些學者的言論也大可不必。中國一向對上的人不肯批評，而只品評他所指揮的人，於事並無所補。我回到家鄉時，正值台灣事件爆發，原因是長官部的專賣政策與民爭利。對於陳儀的批評，也毀譽參半；有人說他很想做事，也很廉潔，我們看來也許陳儀是想做些事業，但他未能擺脫祖國懷抱這多年來的台胞，而急於事功，是很可以指摘的。政府對台變已有處置，但如不能使台民有生路，問題仍難解決。另外一件事是：四國外長會議之初，莫洛托夫提出將中國問題列入議事日程，於是中國各地紛紛發生愛國護權運動。我看了只是皺皺眉頭。回想在重慶時，中蘇協定簽訂了，政協之後也曾有過大遊行。這次的事情出自一轍，只是令人不快而已。國內軍事形勢，在山東，國民黨曾一度失敗，李仙洲及所部數師被俘，其後攻下延安，又有互相抵消之勢。我到南京時，三中全會尚未閉幕，全會的召開，意思是要結束一黨專政，擴大政府基礎，拉攏各黨派參加。會內辯論很激烈，對於另外一系的熊式輝陳儀要求撤換，又有清算孔宋財產的口號。這是國民黨內部的擾攘。當時還有人提出經濟方案，但準備做經濟部長的人，在改組後沒有列入名單。另外就是：爲了收編政府，奔走京滬拉攏各黨派的人甚多，也甚辛勤。我只能說這次改組是「拉攏」，如果說「聯合」那是有些牽強的。兩個月來變化大致如此。下面我要說

的目的，主要是限制美匯。據港政府的公佈，統制辦法是這樣的：無論何人持有美元，須向外匯統制官申報，由統制官規定一公價，兌換港幣，並且指定由上海匯豐銀行辦理兌換手續，由該銀行逐日報告統制官。

但是商人若要申請美匯呢，却多半碰壁。因爲商人的申請書是必須經過統制機關批准的；而據港府方面的解釋，則「港府將活用美匯，以便供給認真幫助港政府運入重要物資，如建築材料等」的商人；「凡復與香港所必需，而確實用諸本港而不外運者，統制官將酌予考慮批准其外匯。」這就是說，商人申請外匯，除非用來購買英政府認爲極必需的物品外，便無獲得批准的希望。換句話說，英政府先要考察什麼貨物是英鎊集團無法供應香港的，然後准許美貨來填補這個真空。

商人要能比較自由的購運美貨，唯一的辦法只有購買黑市美匯了。黑市美匯是儘有的，可是比公價美匯要高得多。商人經由黑市美匯去購辦美貨，無形中要將成本提高，因此貨到來後，須將售價提高，來彌補黑市匯水的損失。但香港政府與這外匯統制政策相輔而行的另一

物價統制政策，却是按「公價匯率」來規定每種貨物「合法利潤」的。這當然使取不到公價美匯的商人叫苦連天了。相反的情形呢？申請英鎊地區的外匯却是極易獲准的，不受嚴格的統制。

一九四六年二月，當局宣佈放寬貿易金融統制，法蘭西及其屬地，荷蘭及其屬地，乃至捷克和希臘，都在放寬之列，只有美國是除外的！這當然因爲荷法希臘是不須防禦的。大英帝國主要的「防禦」對象是金元國。同時又嚴禁攜帶美元出口，如有私運美元者，一經發覺，除強制向銀行照公價兌換港幣外，並處以五千元以下之罰款或一年以下之監禁。明顯地，這個法規是補外匯統制之不足。因私藏美元而被罰的事情，也發生了。

(B) 物價統制政策 與外匯統制政策相輔而行的是物價統制政策。光復以後的香港，從軍政到民政，政府對於物價統制，非常重視，物價統制的範圍，天天擴大，統制的辦法，愈來愈嚴密，從糧食布疋到西藥，從西藥到書籍水果，真是無微不至。

港政府的統制物價，表面上似乎爲居民消費負擔着想，不讓物價不合理地提高，可是實際上，却是給了美莊辦貨商人絕大的打擊。

因爲統制局對於美貨，乃是先依「公價匯率」計算其成本，再規定其利潤，來限制其價格的。而利潤的規定，又視貨物的種類而異。譬如西藥，便規定批發商照來貨成本加百分之廿的利潤，零售商照批發價加百分之卅的利潤，美其名曰「免除中間商人的剝削」，實則是難爲了進口商人，使他們視購辦美貨進口爲畏途。當局公佈的西藥公價，比市面的西藥黑市價平均約低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美貨入口商人因了黑市匯率的損失，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尚不足補償。這種統制物價的政策，據說星加坡執行得更加嚴格，所以香港的

美貨是無法轉星的。而星加坡則根本很少容許美貨入口。物價統制既是美對美貿易鬥爭的一種重要手段，所以香港政府對於這個法令是十分重視的。凡售價超過公價，就要受到嚴厲的處罰。有售西藥超過公價一毛五仙判罰一千元，黑市金山橙一枚罰三百五十元的例子。香港的報紙每天都幾乎有一取締黑

市商」一嚴懲黑市商販」之類的報導，有時一天內被罰的竟有一百餘宗之多，可見港當局對於公價的執行如何徹底了。

(C) 凍結 香港政府又藉口「入口貨價格管制」，不使貨物到港有流入黑市市場之弊端，作了一項選擇的規定：凡屬美國輸入之貨品，如屬須受統制者，貨到後不能擅行出售售賣，須待政府釐定公價，發給提貨單，始能出售。英政府是按照什麼來決定發給提貨單的呢？實際上，要看那是什麼貨物，如果那屬於英鎊集團無法運到的貨物，可以較快的發給提貨單，要是與英貨類同，即有英貨可以代替的，提貨單的發給，就遙遙無期了。所以美貨在倉裏爛掉，是很平常的事。

(D) 徵購 香港政府不但用政治力量，而且用經濟力量去控制香港市場，一方面由政府直接輸入大量重要物資，公價配售；一方面就徵購物資，以應政府配售之需要。這種徵購是帶強迫性的，通常乃按成本酌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利潤，向商人收購。有時爲了收購英政府

一說這次旅途所見所聞中比較深刻的幾件事情。

第一，我感到的南方和北方的不同，南北人民生活的旨趣也不同。我離開北平時正下大雪，船行冰港中凡三日。到江南却已草色青青，回來時，正是大家紛紛去杭州遊春的好季節了。在北方乘車時嗅到的火藥氣味，在南方是沒有的。在京滬路上走，彷彿覺得戰事的損害已經過去，只要有一些和平與秩序，人民是可以過活了。北方則仍在炮火中，春耕能否下種很成問題。上海雖無繁榮的新興工商業，但只要有些辦法，就能賺到錢。北方則不同，內戰所及的地區與炮火幸未損害的地區，都一例艱苦，人民的痛苦不能不說是由於內戰，使人不能不阻覓內戰，不能不感到內戰是一切禍害的根源。在通貨膨脹中，有一件事情似未注意到，在南方，農工生活水準相對地提高了，上海工人的生活指數是六千倍；農民因二五減租和穀價上漲，收入尚好。在我的家鄉，零工每日四千元，還要供酒飯，比我們這些收入降低到戰前的十分之一的公教人員好得多了。通貨膨脹意味着財富的重新分配，是值得注意的。

第二，上海這個地方，人口增到四百萬，大大超過了容量，到處都是擁擠不堪，不像在北平可以在馬路上邁八字步。工商業受通貨膨脹的傷害，我不詳知，但他們是水漲船高，而且官商不分，有電訊等等一切方便，所以只要自己有些辦法，元寶仍然在馬路上滾。市政的最大困難是房屋，因為房屋只有二房東賺錢，無人肯投資建築房舍。上海仍然是投機者的樂園，而且仍是東南的樞紐、重心。去年國大雖有人主張遷都北平，但在政府的生命綫樞紐在上海時，這是不可能的。離開上海，便感到失了活氣。上海雖然藏垢納污，但似乎是有其生氣的。

第三，我要談談政府改組。這次拉攏了民青兩黨及社會賢達。青年黨是相當的徹底，從國府到地方以及軍隊，只要有地位，他們都要。民社黨張君勳的意思只參加國府委員會而不參加政院，但黨內人士却不甘心。他們自己也知道這是不符政治原則的，但做黨魁的人也有困難，因為下面的人實在熬不住了。苦了這麼多年，好不容易有了一官半職，是不肯放過的。——大家不要笑，我並不是小看他們，做政治活動的人總希望有一天能當政，但他們的毛病在於不能為一個主張奮鬥，所以梁漱溟張東蓀問他們對內戰問題如何解決的時候，他們就只好避而不答。政府改組成功後了，我們不能對它有太大希

最缺乏之物資，弄到市面此貨絕跡。例如煉奶及奶粉，英國境內是異常缺乏的，港政府為了駐港英軍牛奶的供應，曾大量收購，達萬箱左右，前時對於麵粉的收購，也是囊括所有的。入口商行每每突然接獲當局「柯打」，只好轉知其客戶，所有以前向該行訂購貨物者，退回其定單，由該行發還其按頭。

(E) Can not be found

有時候，凍結了很久的美國貨，雖然准予提取了，但當商人拿提單向管倉人提取時，他却會很滑稽地說：「Can not be found」；總而言之是不見了，這就完了。

(F) 課稅

香港是自由港，一般貨物是無稅的。但烟酒兩項都有稅，而非英產的稅額遠較英產為高，這也可以看出英國對美貨的限制來。

(G) 鼓勵英屬製

品予以特惠輸出
港政府規定，凡屬於一定分量的英屬原料製成品，可享有特惠稅，輸出於一切英屬集團地區。這利用關稅與美國作貿易鬥爭的另一方法。

(H) 用有利的對日貿易以減縮美貨銷場

一九四六年九月間，香港政府就派副統制官葛路榮氏飛去日本，商洽以香港政府的剩餘物資（例如橡膠鞋）交換日本的棉紗布疋。香港由於棉紗的缺乏，紡織工廠幾全部陷於停工狀態中。葛路榮氏十一月底飛返香港，他的任務圓滿地達成了！日本已允將大量棉紗，人造絲及布疋運港，港政府以之配給各製織廠，停頓已久的織造業，才又重新開工了。

顯然地，這是於英帝國極其有利的買賣。棉紗一項，雖然過去一年間主要並不仰給英國，但棉織品的不振，是造成美貨中的布疋在港大量傾銷的好機會。

(I) 電影片子的競爭

在香港影片市場上，英片是無法與美片抗衡的。本來自香港光復後，英片運港放映，比美片還早

了三個月，但其後竟是一蹶不振，現在的幾家影片商中，英商只佔其一，慘況可以想像。這種情況，英人的電影前報也發出哀鳴了。該報曾發表「英片之真像」一文，就說英製片家如今後不能「對廣大羣衆之需要作廣泛考察，必仍然遭沉悶之滯銷局面」云。

但在英政府又可運用政治力量來謀補救。據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港府公報載：「本港立法局將通過法案，規定英國電影片在本港之撥配數額，及規定每一享有「首輪」之放映權之戲院，須於每七十日內，撥出七日，放映英製影片。」

按理說，戲院商應當有權選擇其認為有利可圖的影片，今政府既規定每七十日須放映英片七天，那麼戲院商便喪失十分之一的自由選擇的機會，倘因配映英片不能叫座，勢必有損於戲院營業收入。但香港政府却有一種救濟法，即出面干涉，減低影片

的租金。據報載：「某一影院於放映某一國之英片，如其收入低於某種限度時，當由政府轉知片商，於分賬時，酌予減低影片之租金，至達影院不至損失之數目為準。」

在英國有計劃地排擠，限制之下，美貨在香港市場是受到若干打擊的。雖然有九十月間的海員大罷工，美貨隔了一個長時期不能來港，但香港的美貨却仍是一跌千丈，價錢越賣越便宜，這一方面固由於戰後購買力普遍的低落，但主要地說，英帝國執行的種種政策，是發生了相當作用的。

(三) 美國及美貨入口商的努力

美貨在香港市場雖然遭受極多的限制，但它一直還是採取着攻勢的姿態的。一九四六年八月間，美當局為防止出口貨漲價，曾由華盛頓的物價調整處宣佈修正出口貨定價之章程，防止國外市場上美貨售價之上漲，出口商售

望，但也不要小看牠，或吹毛求疵，因為它總還是有進步性的。這次內閣出來的人究竟還是黨內的自由份子，譬如提經濟方案的人便沒有出來。孫科做副主席，他主張過民主，用他來緩衝，別把問題弄僵，也多少有些用處。我是說它進步了。再看着山姆叔叔是否贊成呢？這就很難說，美國所要求的中國的民主，內容不致說，但看美國國內的情形，目前調子已經很低了。我的看法是覺得美國可以滿意了，因此政府希望美國的經濟援助也有了希望。張羣「內閣」——因為張羣說過行政院是「負責」的，而且提出名單，所以可以加個引號，叫它做「內閣」——面臨着兩個問題：對國內政治問題，張「內閣」是否能重開和談的門呢？我說這是不可能的；張內閣對外應付雖可以開明些，但自己却不能有主張，內戰仍要打下去。新聞又怎樣應付財政金融問題呢，基本上說，這一位張房先生和上一位不會有區別，只看美國貸款能否成功；張嘉璈重回中國銀行後，發行了美金公債庫券，以此吸收游資，是否成功雖不敢說，但如果游資沒有更好的出路，投向公債庫券是有利的。但孔系的央行與陳系的農行交與信託局是否肯與新聞合作，液過難關，是很成問題的。如果替新聞算算命，他一定要遭受另一派的攻擊；而致命傷也就在這裏。但我並不希望這樣，無論如何，比起另一派來，它還是比較進步的。

還有一件事，今年將是選舉之年。在充滿火藥味的北方雖還未意識這個，但在南方，選潮已漸高漲了。自然道不過是黨內的安排，或者是由政學系扮戲，另一派導演，但今年却仍要成爲選舉年。

我是主張民主的，對政府的改組，我的看法覺得它一方面要騙人，一方面也有些進步性。而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能等待，只能爭取。譬如目前有了提審法，輿論爲什麼不替失蹤未釋的人呼籲？那就會助長了不民主。中國人還差的很，有了條文不知道爭取，還需要大的勇氣，不管壓力有多大。

末了，我還想說一件事。最近組織之風甚盛，我個人一直主張中國應有第三力量組織第三大黨，但目前我却要問組織的人兩個問題：他們對內戰如何主張？又他們是否做政府的反對黨？如果只是想現在現狀下沾點便宜，我是不參加的。中國人愛和平，但對人雖應該和平，對事却要徹底，否則就會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的。（辛揚火筆錄。全文未經講者寓目，如有錯誤，由筆者負責。）

予外國之貨物，僅依國內之限價酌加手續費及保險費而已。另一方面，貨運交通也在設法積極擴展，據美總統論船公司遠東總經理威爾遜氏談稱：現美國商行已開始盡力將各項貨物運來遠東，每月來往三藩市、紐約及香港間之巨輪，顯有增加。再有就是美國特別留意傾銷遠東的貨物的勢頭，除取美觀之外，並全用中國文字解釋，及用中國名稱，據入口商表示，謂係美商對華商業政策。

亦願與本港華商取得接觸，故美領事署早經印就表格，凡欲與美國商人聯絡或已聯絡者，可到該會境表，並存該署備今後調查。

美國貨在上海轉駛來港，較由美直接來港，事雖間接，仍比直接爲捷。

（四）匯款赴菲律賓轉匯：「馬尼拉方面，因爲那裏經常大量僑匯經港回國，而出口貨很少，故許多馬尼拉莊收了僑匯，就大可以做美匯黑市生意。從香港匯款到馬尼拉，……從馬尼拉匯款赴美，絲毫沒有限制，因此，而香港買了美匯，指電到馬尼拉去，再由馬尼拉匯款赴美，時間也不過一個星期左右。這樣的做法，聞說近來很普遍」（華商報）。

（四）能否把破船修理好

當前的香港市場，對英帝國說，已是一張破了的船，把它修理好，是急不容緩的事。港政府的一切貿易政策，就都是根據這目的來擬訂的。

但這隻破船是否能修理好，換言之，英國的國際市場能否恢復，主要還是要看英國生產力是否可以很快地復原，以及在今後的漫長歲月中的市場爭奪戰，英鎊集團力量能否加強。

對於前一點，倫敦無疑是極其努力的，而且自信在一九四七年，英國便可能一躍而爲世界第一位的輸出國家。英美貨款已經簽了字，英國拿了滙豐巨款，完全投在大規模的生產設備上。目前英帝國的經濟情況十分蕭條，英國人深知倘不是儘速恢復生產規模，儘量向外國輸出，必更無法平衡帝國的

而香港的美領事館，對於溝通港美貿易，替美貨莊口打關係，更是不遺餘力。據報載：「本港商人之擬採辦美貨者，多感與美國廠家或出口商人隔膜之苦。同時美國商人，

（一）美國直付：目前美貨雖有運港，多非由港直接往訂者，而由美國運寄而來，即由在美國之商人所購運者，毋須由本港商人匯款購買。

（二）以貨易貨：外匯問題，迫使香港對美貿易陷於停頓，於是商人探行以貨易貨之辦法，以冀逃避結匯，但此方法，本港商人，認爲力有未逮，因由港付出貨物一批，交通商時日，商人不論週轉與維持，以及壓下貨款等問題，資本均須頗大，估計至少須三套資本方可。

（三）上海轉運：由於外匯困難，及存倉凍結

張東蓀談

華萊士和平運動

胡笛

張東蓀先生自
從上海回到北平，
翫影燕園，專心教
學，很少過問外事
。不久之前，他在
無可如何中應北大

學生之
請，公
開演講
過一次
「哲學
是甚麼
？哲學
家應該
做甚麼
？」一
戰「時
與文」
第五期
「題旨
雖然專
門，然
而由於
他的演
詞通俗
，而且
能夠配
合現實
，那種
響亮的
聲音，
並無聲

的北平得到不少共鳴。後來報
紙傳出消息，說他還要繼續
在北大演講「時事分析」，不
知怎的，中途又停頓下來，當
記者問到東蓀先生的時候，他
說：還要舉行，可能就在最近
幾天。在未公開「時事分析」
前，記者要求他先談一談目前
國際與國內的政治形勢，重點
特別放在目前政府改組的問題
上面。他答應了，而且就在民
盟華北支部開會之後，他抽出
了僅有的時間，從國外談到國
內。

響應華萊士的和平運動

首先他說學世矚目的西外
長會議，已經閉幕，這次會議
，當然不算成功，但是也不必
太悲觀，從種種新的跡象看來
，美蘇關係未始沒有改善的可
能。譬如最近美國努力增進對
蘇輸出，美蘇同意對朝鮮問題
重開談判，以及美國人民不願
意再有戰爭，都可以說明這一
點。
最近華萊士旅行歐美，呼
籲和平，「全國人士尤其知識
份子應當特別注意，大家一致
起來響應華萊士的號召。」東

蓀先生認為這是一次新的和平
運動，可能新的和平就要到來
，原因與根據，他舉了一個例
：不久以前，一個美國人和他
談到當前國際的暗流，那位美
國人很有卓見，他說：「美國
人沒有一個人不怕打仗，杜魯
門採取強硬的外交政策，對人
民說，愈強硬，愈可避免打仗
。如果蘇聯嚇唬不倒，杜魯門
的強硬政策，就會退讓的」。

東蓀先生認為這個看法是
有一部份道理的。
講到這裏，他強調中國今
天的道路，就是要走法國的路
，對內要建立聯合政府，對外
要作美蘇的橋樑。同時他說法
國的聯合政府也有共產黨，但
法國的內政還是有個共同綱
領，並不是拉幾個小黨作花瓶
，換湯不換藥，依舊「一黨主
政」。

「政府改組」後的民青兩黨

政府在形式上是改組了。
他很同意周炳琳先生在北大講
「南行所見」一段話中的部份
看法，如同全國言論沒有自由
，人身沒有保障等。周炳琳先
生南行後，才知道不僅是北平

財政預算和解救英鎊集團的經
濟衰落。

據倫敦來客談，英國目前
人民的生活水準，並未比戰前
提高，因為英國把百分之九十
以上的消費品運銷國外，以謀
出口的增加。在英倫無法買到
奢侈品，甚至連絲襪、水筆、
錶，都要香港的商人航郵寄返
英國，贈送親友。

但對於即將到來的市場角
逐戰，英國還是具有信心的。
商務訪華團團長伊爾團長在一九
四六年十二月十日華商總會時
招待席上，就預言說：「至有
謂英國貨來港的數量不多，余
謹加以解釋，英國於戰爭開始
，即徵集人力物力比別國為多
，勝利後復員工作雖積極進行
，但可能影響工廠生產速率，
此為英貨來源短少之原因，但
英國加緊復員，加緊生產，各
方協力一致從事對外貿易，短
期內英貨大量輸出當可預卜也
」。

而且他又預告，到了那樣
的時候，香港出入口統制便可
以撤銷。可見英國還是充分自
信，在未來的自由貿易競爭中
，仍然可以跟美國抗衡的。
另一方面，要看英國是不
是能徹底擺脫她政治上經濟上

依附美國的惡運。現在似乎已
有兩個因素顯示着英國人已
開始覺到這種依附的危險：

第一是地中海的商業霸權已由
美國取而代之。英國儘管極盡
能事在聯合國裏支持美國的立
場，但爭來的利益屬於美國而
沒有落到英國人的手上。而在
美國驕翼下的日本，又將加入
美國領導的貿易集團，起而奪
取英國的遠東市場。這很使英
國朝野寒心，所以近來不但工
黨中的反對派排擊貝文的外交
政策，連保守黨份子也表示不
滿了。第二，倫敦方面對於
蘇聯經濟學權威瓦爾加氏所預
言的必將到來的美國經濟恐慌
，是有所認識的。在英國的國
會辯論中，已有人警告說：「
鑒於美國經濟恐慌必將到來，
美貨將大量向世界各地傾銷。
英國將於最急需世界市場之時
，失去世界市場，故英國應重
新考慮，和美國政治聯繫過於
密切是否有利。」

這一趨勢在發展中，前途
如何，要看今後數月內倫敦方
面的變化，尤其是工黨執委的
選舉，如果「叛黨」份子獲勝
了，英美關係是會重新加以檢
討的。

抗戰期間，住在四川的時候，那日子真夠膩的。出門，不是上坡，就是下坡；房子當然也有好的，可是我們住的所在：在鄉間，就是與「豬兒」為隣，在城裏，則比鴿子籠還不如。談起天氣來，那霧季，恨不要把人窒死，偶爾太陽出來一曬，就躲走了，讓那灰的

大北房「照滿了陽光的房子；……我終於費了不知多少心力，也算做「飛來的」人，飛到北平了。
說是「飛來的」，實在是很抱歉，虛佔了這麼一個地位。沒有錢，沒有勢，更沒有黃金煙土，「五子登科」的任何「子」都說不上，我想，怕



北平瑣記

治秋

彷彿又黏的霧擠來擠去，一會薄了，一會又弄厚了；看着那樣的天，覺得這歲月糟踏的可惜。

在那樣的日子裏，我時常想到北平，想到那一望無際的平原，想那萬里無雲的晴朗的太空；想那冷就冷一下，熱就熱一下的天氣；想那磚牆的「

是在飛來的人物之中最寒酸的一個了。

大地仍是廣闊的，山川仍是渾厚的，敵人統治了許多年，牠統治不了這大自然。我從那飛機的小小的圓窗向下看，好像憑吊什麼遺跡。我彷彿看見一羣在重慶常見的禿耗子在打算吞食世界的大象，至多在

捕人，而且上海也有同樣事件，以至英國牛津與劍橋兩大學的自由份子也提出抗議，其實這已經是一件公開的事實，不足為奇了。

對於政府改組與民青兩黨參加政府，「民盟」已有聲明，認為與政協不相干，故改組不能引用政協。以政治方式解決中共問題，參政各黨又并無統一的講法。譬如新政府施政綱領十二條中，要堅持全國鐵路交通恢復，然而張君勱答覆梁漱溟的文件中，只說兩條鐵路恢復就行，所以很不一致。民青兩黨儘管說不負戰爭責任，但既然同意執行這綱領，就難逃其咎。」

「民青兩黨參加政府的人數過少，在表決時不能有大作用，表面上雖是三黨政府，實際上仍是一黨主政。但他們損失很大！以後，如果永遠沒有和平，也就罷了，一旦再有和平，民青兩黨就不能算是第三方面，而是和國民黨並排在一起的的第一方面了！」
政府改組，是不是符合馬歇爾離華聲明中所強調的自由份子當朝呢？東霖先生以極堅定的口吻說：「除非馬歇爾曲解，否則，我們可以說，這與

馬歇爾所說的樣子離的很遠。

歸根結蒂，政府改組的目的，還是要向美國借款。他很肯定地說：「和平後，為建設而借款，本人向來不反對，如果借款騙來，完全用於內戰，美國有識的人士等於白費心思，這樣更加深了中國的危機。借了錢來，扔在水裏，是一筆不可補償的損失。美國有理性的人，把洋錢白費了！」

最後，他說：「五億美元已經存在那裏，或者可能拿出來，十億美元則不可能」。同時他有一個很大的假定：「如果借款拿不到手，政學系很快地就要坍台，」只消從當前物價的空前大波動，就可以看出在背後興風作浪的是政學系的對頭。至於張君勱投降政學系，尾巴都不如，只是政學系的花瓶。他說：「民社黨內部的分裂是沒法調協的，因為和張君勱作對的主要是一個怕檢舉的漢奸湯壽銘為首起哄，有人在後面搗鬼，那是一脈相傳，不難想像到個中的把戲」。
對於副主席孫科的看法，那是一個預備役，先豎立一個偶像，等到和平再來的時候，免的臨時抱佛脚。

當記者告辭的時候，他又連續地說：「今天的內戰形勢又和延安攻下的時候不同了。如果政府聰明的話，最好懸崖勒馬，還可有救，要不然把這點點僅有的軍隊打光了，到那時就失失了和談的資本，其前途之黯淡，恐怕遠非今日所能想像了！」

東霖先生走出院子，沉思片刻，說：「梁漱溟先生在八月間到滬，那個時候，我也要去上海」。他稍停後，仰視屋簷，繼續又說：「我想全面的和平到今年秋季應該到來了！」
今天主要的任務，他向全國青年呼籲：「趕快起來，具體地響應華萊士的全世界和平運動」。

(四月卅日寄自北平)

來電節登

時與文社台鑒：查……貴刊第四期所載「大局逆轉以後的昆明」一文內末尾涉及潤蒼部份，全非事實，且關係重大，應請迅予更正，……是所至禱。昆明周潤蒼辰冬。(編者按：原電冗長，且電碼不明，特為節要刊登。)

怡豐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實業
扶助

服務
社會

總行 重慶四五路八十四號

分行 上海江西路四六七號
電話 二〇二〇號

宏豐企業公司

總公司 上海廣東路五十一號
電話 一一四五三一五

承辦 進出口業務

分公司 漢口聯保里五號
重慶林森路一二七號

上海駁運公司

地點：上海四川中路一二五弄二〇號
電話：一三二二四

南榮記 和記 報關行

地址：上海廣東路一二二號
電話：一〇四一八號

天隆被單



經濟實惠 美觀大方

天隆染織廠出品

新附

10

論貨幣的「二重政策」……………郭大力

今日法
賴馬迪內閣的危機……………沈鍊之

法國經濟的蛻變……………費正

關於高中畢業會考的討論……………施克

關「法利賽人」對於

「五四」的曲解與蒙混……………夏康農

木刻藝術的前途……………李樺

董·吉訶德哲學……………于冰

「五四」在北平……………辛揚火

「這是美國」……………會昭掄

漫畫……………米谷·拱荒



證券交易所第九七號經紀人

宏業證券號

北京路河南路口
國華大樓六樓606號
電話九四九四八

上海證券交易所第四十八號經紀人

丹巴證券號

上海中山東一路(外灘)十八號
四樓四一三三號室
電話一三四四四一

電話一三五六五

地址上海四川中路125弄20號

間辦理過磅量尺等

為輪船公司與客貨

業務：

「公正」「標準」

中國衡量公司

經濟部登記

本期刊第九期 · 第八期 · 第七期要目

從馬歇爾演說看美國動向.....	宦鄉
今後的八九個月.....	程程
經濟前途還能樂觀嗎.....	張西超
英美在香港的市場鬥爭.....	余初僑
精神分析的物質基礎.....	董秋斯
周炳琳講「南行所見」.....	辛揚火
張東蓀談華萊士和平運動.....	胡笛
北平瑣記.....	冶秋
民主路線與中間路線.....	伍丹戈
中間路線與挽救危局.....	施復亮
從物價狂漲看經濟崩潰.....	龍成志
學生運動是季世現象嗎.....	馮契
英國人與緬甸.....	蕭草
美軍是怎樣撤出中國的！.....	辛揚火
傅作義治下的察哈爾.....	胡笛
新小上坎.....	安娥
政府改組後之「施政方針」.....	馬敘倫
政府儼然改組了.....	程程
中國民族工業的國內市場問題.....	李紫翔
新財政與舊財政.....	伍丹戈
關於男女分校.....	碧遙
試論英雄.....	臧克家
過河小卒與殺蠶芸香.....	于冰
悲哀.....	錢金枝
今日張家口.....	胡笛

時與文週刊

發行人 程博洪
 編輯者 時與文週刊編輯部
 經理部 上海牯嶺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論貨幣的二重政策

郭大力

當我們標示一個目標，聲言要向這個方向走時，設我們在實際上竟採取相反的政策，以致這個目標不但沒有可能達到，且反而益和我們背離，我們就說這是一個二重政策。近年來這個性質的政策可以說已經成爲慣例了，雖然我這裏說的，只與貨幣的問題有關。

大約在一年前，對於開放外匯市場方案，有一些人曾一度寄與莫大的期望。這種期望是極自然的。貨幣問題的解決當然不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但必須是經濟問題的解決的起點。在幣值仍不斷下落的條件下，復興民族經濟繁榮的計劃，都只會是空談。就這點說，目前成爲人們攻擊對象的黃金政策，其本身，也不是毫無理由。在今日，貨幣和黃金間的聯繫，還是沒有被斬斷。不僅如此。這種聯繫的加強，從某方面說，還正好是大部分世界的努力的方向。以黃金爲手段來穩定幣值的嘗試，從某種意義說，原是無可非議的。貨幣遲早是應由國家紙幣的範疇，復歸到信用貨幣的範疇的。那就是不能購買黃金和外匯的紙幣，遲早必須變爲可以購買黃金和外匯的。

然則，這一切何以都成了錯誤呢？開放外匯市場所獲的結果，除了替美國開放一扇進口的門，那就只造成了外匯基金的枯竭。黃金政策，除了供給國人一個新的投機對象，又就只造成了黃金的枯竭。這是爲了什麼呢？

這就是爲了一個二重政策！政府既要開放外匯市場，拋售黃金，想以此爲手段，來達成貨幣價值穩定的目的，却又實行通貨膨脹，使這個目的絕對沒有達到的可能。

通貨膨脹何以會發生這樣可怕的抵消作用，是要由一個相當複雜的理論去說明，並不是單純的貨幣數量理論可以說明的。但只要知道商品的總量不變，商品的價值不變，貨幣的價值不變，貨幣的流通速度不變，流通上必要的貨幣量就可以計算出來這一點，我們已經可以明白，何以紙幣（

即使是不兌現的國家紙幣）的發行額在不過過這個必要量時，可以依照發行者的意志，代表一定的價值，而在它的發行額超過這個必要量時，它所代表的價值就會開始下落，並且超過的程度越大，其所代表的價值的下落程度也就越大了。那就是，如流通中現實的貨幣量，指示出這個必要量爲十萬億（那是由物價只有暫時的僅小的變動這件事推知的），紙幣的發行額也不超過十萬億，它們代表的價值就能穩定下來。反過來，也就是，如其發行額超過了十萬億，它所代表的價值就會開始下落，物價也就會開始上漲。

何以在紙幣的發行額超過必要的貨幣量時，物價必定會開始下落，其實是一個容易說明的問題。流通界既能容納這樣多的貨幣，多餘的貨幣，自然會要尋找一個出口。這個出口，在金屬制度和信用貨幣制度下，是儲藏。那無論是經貨幣所有者自己的手，還是經銀行的手，都有一種作用使貨幣的流通量，復歸到它的必要量。當然，在實行國家紙幣制度的國家，起初也可能是有儲藏的。不過，當這種儲藏被證明必將成爲或被相信必將成爲損失時，儲藏就絕跡了。每一枚多餘的貨幣，即所謂游資，都將到市場上來，成爲一個搶購有實在價值的貨物的競爭者。貨幣是一個十足的平等主義者，貨幣的多餘如果會發生影響，那一定是平均影響於每一枚貨幣。這樣，貨幣價值會下落，物價會上漲，就是必然的了。

被期望可以使國家紙幣轉形爲信用貨幣的開放外匯市場政策和黃金政策所以不能獲致預期的結果，而只能帶來禍害，不外就因爲由通貨膨脹引起的過剩貨幣，在有外匯和黃金可以搶購的時候，將成爲搶購外匯和黃金的力量。當政府想用外匯和黃金來使法幣回籠時，通貨膨脹却使外匯基金和黃金大量出籠了。並且，因爲通貨膨脹是愈來愈烈，這個籠不久就顯得虛空。外匯基金和黃金的漸漸枯竭，寧說是這一個二重政策應有的結果。

這時候，如能立即停止通貨膨脹的過程，那還未嘗沒有辦法。貨幣的價值雖然已經下落了，但不會無止境的下落。物價雖然已經上漲了，但不會無止境的上漲。但我們沒有要——或者說沒有可能——採行這樣的路。通貨仍是膨脹。膨脹的程度，還因各方面迫切的需要，而更加強烈了。外匯的供給於是感到不足。跟着，黃金也有了漲價的理由。但黃金雖然漲了價，官定的外匯率，在一個時間內，仍是沒有改變。所有的改變，不過是買賣外匯的限制更加嚴格而已。

因之，貨幣的二重政策，在這裏，取得了一個不同的形態，不過其本質還是一樣的。我們一方面要穩定匯價，另一方面又把穩定匯價的基礎完全抽去了。通貨仍是膨脹。

這個二重政策，必致引起並且曾經引起如下的結果：外匯黑市。法幣的外匯價值開始二元化。官市之外，有了黑市。貨幣的二重政策，引起了法幣的二重價值。

在這種情形下，將是官市範圍黑市，抑將是黑市領導官市，是一件再明白沒有的事。如果通貨膨脹的過程停止，官市是能夠並且會範圍黑市的；反過來，如果通貨膨脹的過程不停止，黑市却必然會領導官市。理由是明白的：一種政策，只能在它有成功可能的前提下獲得成功。如果通貨不斷膨脹，穩定外匯價值的政策，便沒有了成功可能的前提。

這個二重政策引起的貨幣二重價值，是極有害的。在外匯買賣極端嚴格的限制下，外匯的政府供給，只對於那種享有特權的商人是有利的，而對於一般人，必將成爲痛苦的源泉。財富將發生不合理的再分配。合法的生產事業和商業將被推折。當特權商人的售價可低於一般生產者商人的售價時，將會發生何種結果，是不待我們去說明的。實在說，這正是一年間官僚資本得以迅速發展的原因之一，也正是一年間民營事業益趨於困難的原因之一。

這時候，如能立即停止通貨膨脹過程，也還不是沒有辦法。但這又被證明只是空想。通貨膨脹還是無法停止。外匯買賣的限制，因之，不能不更形嚴格。外匯黑市必致更形猖獗。黃金價格從而一般物價必致更形上漲。這時候，青備游資，實在是無益的。這種游資是貨幣政策所造成的，現今竟被認爲是貨幣政策不能貫徹的原因了。寬於責己而厚於責人的財政當

局，竟會有這樣顛倒的看法！

結果是一個緊急方案。

緊急方案不是沒有成功的可能。但這種可能，不能建立在執政者堅強的意志上，而只能建立在它和經濟法則的一致性上。緊急方案要使工資不漲，物價不漲。那是必須除去工資上漲和物價上漲的原因，才有可能的！

在這裏，又是一個二重政策：要平定物價，同時又造成物價激切上漲的原因。通貨不但沒有收縮，反而更膨脹了。

這個不斷的膨脹過程，到何時才能終了啊！

當然，這個二重政策，是沒有可能長此維持下去的。不過，如果真的嚴格執行下去，那就必致引起不堪設想的後果。生產將被萎縮，因爲再生產將受阻礙。物價上漲的趨勢固然有害，但在促使物價上漲的前提下限制物價上漲，應當是更有利的。我們且等着，看結果會是怎樣罷。



荒洪 久多持支能還

賴馬迪內閣的危機

沈鍊之

在西歐的立憲國家中，法國的內閣向來是以「短命」出名的。翻開第三共和國的歷史，我們看見不知多少次「閣潮」的記載。第四共和國成立以後，這種情形還沒有改變。賴馬迪拜命組閣，迄今不過三個多月，而他的內閣已經過幾次危機，最近這一次的閣潮，幾乎使他的內閣整個坍塌，便是一個最顯明的例子。

法國內閣所以短命的原因，是它的政黨除了極少數如共產黨等以外，都是組織太散漫。法國的很多政黨實際上只是一種編訂政綱的選舉委員會，它們受少數政客的操縱，而這些人是專為自己謀利益的，所以一般民眾對於政黨漠不關心，甚至加以蔑視。大多數的政客都不服從黨的紀律，他們可以在各種不同的政府裏面充任閣員，可以在議會裏隨意投贊成票或反對票。在法國的議會裏，不是在朝和在野兩大黨的爭雄，而是許多小集團的角逐。平常沒有一個政黨能得到絕對的大多數，所以必須彼此聯合，勉強湊成一個臨時的大多數。在四年一度的議會中，每個政黨的黨魁都有出任內閣總理的可能，甚至在一年中間更換五次內閣；而政治的重心突然從極左轉到極右，也是常見的事情。

賴馬迪的聯合內閣也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產生的。去年十一月法國議會選舉的結果，共產黨得到空前的大勝利，獲得了一百九十席，其次是皮杜爾領導的人民共和黨，得一百六十一席，再其

次是社會黨，得九十六席，急進社會黨得五十九席，右派各黨得八十二席，還有其他各小黨分得若干席，總共議員六百七十七名。依理，共產黨是得票最多的黨，應該出來組織內閣的，但是因為他們單獨的力量太薄弱，即使得到社會黨的幫忙，也不能在議會裏得到絕對的大多數，這樣勉強組成的內閣，是決不能持久的，一個小小的風波就馬上可以使它夭折。人民共和黨也有組閣的資格，但因為共產黨對於他們表示強烈的反對，所以不敢冒險嘗試，因為他們知道很清楚，他們的內閣如果沒有穩固的基礎，壽命是不會長久的。所以，組閣的責任便推到社會黨身上，因為牠可以同時取得共產黨和人民共和黨的合作。歐禮和總統便任命他的朋友賴馬迪組織一個聯合內閣，以社會黨為中心，包括共產黨，人民共和黨及其他左派各小黨。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賴馬迪所担的任務顯然是非常艱巨的。這位五十八歲的總理，雖則沒有雄辯的口才，他的過去的政治生活，也不怎樣輝煌，但是他的態度謙和，恰是一個最理想的和事佬。他目前主要的工作，就是調和人民共和黨和共產黨的衝突，使他的包括各黨各派的內閣能發揮最大的力量，完成法國戰後的復興工作。但是這種衝突有時候是無法調解的，結果往往實力不討好，不是共產黨不滿意，便是人民共和黨不滿意。處在左右作人難的環境之下，賴馬迪內閣必然

地是多災多難，所以成立以來為時僅三個多月，已遇到幾次危機，而最近發生的閣潮，可算是最嚴重的了。

這次閣潮的導火線是政府的物價和工資政策。四月三十日，賴馬迪內閣商議解決巴黎近郊雷諾汽車工廠工人要求加薪的罷工風潮，連帶討論到政府所推行的平抑物價和凍結工資的政策應否繼續維持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社會黨和人民共和黨的意見是相同的，他們都認為普遍增加工資，勢將引起許多困難，尤其是出口貿易，勢必大受影響，因為工資增加，出口貨的價格就跟著提高，法國貨在國外市場上定受排斥，結果外匯的獲得更感困難。所以他們不主張增加工資。共產黨的意見和他們相反，他們認為目前法國一般工人所獲得的工資，和一九三八年下半季比較，減少了百分之六十，可是廠主的利潤却增加了許多倍。所以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訓令共產黨議員擁護工會所提出的加薪要求。

在雙方僵持之下，五月二日，賴馬迪要求國民議會對政府的工資政策舉行信任投票，他聲明如不能獲得議會的信任，即宣布辭職。五月四日，國民議會舉行投票，結果以三百六十票對一百八十九票，贊成賴馬迪的凍結工資政策，共產黨議員全體投反對票，其他議員棄權者六十二人。投票以後，社會黨執行委員會即開會討論應付辦法，他們認為共產黨已與社會黨決裂，所以以十

二票對九票通過主張賴馬迪內閣總辭職。但社會黨領袖勃魯姆立即召集社會黨議員舉行緊急會議，並對他們發表熱烈的演說，竭力主張排斥共產黨，結果以五十六票對九票，主張賴馬迪內閣繼續執政，並請共產黨退出內閣。五月七日，法國社會黨全國委員會開會，經過十二小時的激烈辯論，卒以二千五百二十九票對二千一百二十五票，議決支持賴馬迪總理，使已無共產黨的聯合內閣，繼續執政。被迫辭職的五個共產黨閣員，內閣副總理多萊士的職務由人民共和黨戴德香接管，勞工部長由社會黨梅友繼任，公共衛生部長由人民共和黨普利香繼任，復興部長由人民共和黨商務部長勒都納兼任，國防部由社會黨貝夏繼任，已由總統歐禮和簽字任命，於五月九日公布了。同時雷諾工廠的罷工風潮也平息了。

這次鬧潮的起因表面上是爲了增加工資的問題，但這不過是賴馬迪總理的一種藉口，來改組他的內閣，將共產黨閣員排斥於門外。如果稍微深刻一點的來觀察，我們很容易看出這幕戲的背景是另有牽線的人。據聯合社巴黎五月五日電，美國官方高級人員宣稱，美國可能加緊援助法國解決經濟危機，但以賴馬迪能夠團結他的無共產黨參加的新聯合內閣爲條件。華萊士在其主編的最近一期「新共和雜誌」中說，他這次在巴黎會獲得印象，即目前美國之政策，係向法國作「政治上之貸款」，而以法國「自前進精神中退步」爲交換條件。事實上自莫斯科會議失敗以後，皮杜爾和法國內閣的其他閣員更明顯地傾向於英美方面。「杜魯門主義」對於法國的壓迫和引誘，是不難想像的。雖則美國國務部的發言人對於「

法國賴馬迪內閣若能將共產黨排斥在外，則美國準備增加對法之經濟援助」的「謠言」，鄭重予以否認，可是事實勝於雄辯，這位發言人的否認發表後不到三天，國際銀行即以借款二億五千萬美元貸予法國，在三十年內償還。這一筆大借款不啻是杜魯門總統給賴馬迪總理作爲驅逐共產黨出閣的酬勞金。在美元外交的打擊之下，法國的共產黨做了犧牲品，而成立僅三個多月的賴馬迪的聯合內閣被弄成殘缺不全了。

這次法國的鬧潮表面上雖然平息了，但是賴馬迪內閣的危機依舊存在。這次共產黨閣員被迫退出內閣之後，仍保持着雍容大方的政治家風度，並沒有像法國人所說的：'Caquet les Portes'，一怒而去，共產黨領袖杜克洛斯並且表示對於新聯合內閣仍予以支持。但是，這不過是暫時的局面，對於當前的許多重大問題，社會黨和共產黨隨時可以發生意見衝突。今年三月底的時候，共產黨對三千四百萬法郎的越南戰費拒絕投票，會引起賴馬迪內閣的嚴重的危機，現在越南的和戰問題仍未解決；現內閣對於馬達加斯加島的叛亂所採取之鎮壓政策，也是共產黨所竭力反對的。誰能說共產黨在最近的將來不撤回他們的支持，給賴馬迪內閣一個致命的打擊？在另一方面，賴馬迪這次拉攏了右派政黨，總算幸免渡過了這個很嚴重的危機。但是他一旦做了右派政黨的俘虜，便不得不遷就他們的意見，採納他們的主張，伺候稍不周到，他們就會翻臉。今日投贊成票，明朝投反對票，這是法國議會裏演慣了的把戲，所以賴馬迪內閣的前途，仍然是很難樂觀的。

其次，這次賴馬迪內閣的危機，雖然平安渡

過，但它所付的代價實在太大。它播下了社會黨內部分裂的種子。固然，法國社會主義者左右翼的鬥爭，並不自今日始，它已有五六十年的歷史。但社會黨仍能維持它的統一，實賴這兩種勢力的均衡。目前社會黨右派當權，他們以一時的優勢壓迫左派分子。他們主張和資產階級的政黨聯合，來保護法蘭西第四共和國，以免野心家的覬覦。「余倫簽署辭呈，余將感覺正在簽署共和國之退位書」，賴馬迪這句話是不是指戴高樂領導的「法國人民團結運動」對於第四共和國的威脅？即使爲保護受威脅的共和政府，一脚踢開共產黨而和右派政黨更密切地合作，這對於社會黨本身實在是一種很大的危險。社會黨究竟是代表勞動階級的，一旦放棄了他們的立場，它的黨員，它的工人羣衆，自然會走到共產黨那方面去。這樣，社會黨便名存而實亡了。去年十一月的選舉，社會黨已失去了許多選票，下屆的普選，他們的損失一定是很驚人的。賴馬迪內閣雖則可以苟延殘喘，但社會黨內部的危機，却一天比一天嚴重了。

五月十三日

本刊增開「讀者之頁」啓事

本刊應讀者要求，決于短期內增開「讀者之頁」，以便讀者發表意見，或對本刊有所建議。來件字數限六百以內，內容愈具體愈好，敬希讀者注意。

法國經濟的變遷

· 正 費 ·

「法蘭西在蛻變中」，這是戰後全世界一致的觀感。這無疑是事實，而且不僅在法國社會政治外交上的表現是如此，在法國經濟上，表現得尤為深刻，並且具有歷史的世界性的意義。

法國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重要一員，戰前在歐洲的地位，與英、德兩大資本主義勢力鼎足而立。但經過這次劇烈戰爭之後，英國還在資本主義舊套中掙扎着，德國的命運在未定之天，而法國却已逐漸衝破着資本主義的樊籠，走向艱苦而曲折的蛻變過程中了。這一蛻變過程的每一新的變化和演進，都受着世界各國無論敵或友的目光的熱切注視，因其成敗前途，對於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的前途，具有一種嚴重的啓示和影響的作用。

蛻變的必然性

整個二十世紀上半期的歷史，是世界資本主義急劇衰退，腐化和混亂的歷史，它曾在某一時期和某一地區發生破裂，突然的崩潰下來，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事。今日的法國，即是這一裂口之一，其資本主義經濟的蛻變也可說就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角的崩潰。

但法國資本主義經濟

蛻變的必然性，也有其特殊的另一方面。這就是法國敗亡和新生，促成了法國資本主義經濟加速的走向蛻變的過程。法國的敗亡，是法國資本主義極度腐敗與腐化的結果，而其敗亡又動搖了法國資本主義的根基。法國的新生，也就不能使法國資本主義獲得重建。在這次歐戰初期，法國與英國並肩作戰，但結局竟有如今日的大區別，其根源即在於此。法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最主要的特點

煤的開採量(百萬噸)

英	1890年	1900年	1913年
德	1890年	1900年	1913年
美	1890年	1900年	1913年
法	1890年	1900年	1913年

鐵礦的熔量(百萬噸)

英	1890年	1900年	1913年
德	1890年	1900年	1913年
美	1890年	1900年	1913年
法	1890年	1900年	1913年

鋼的熔量(百萬噸)

英	1890年	1900年	1913年
德	1890年	1900年	1913年
美	1890年	1900年	1913年
法	1890年	1900年	1913年

棉花消費量(百萬辛特尼)

英	1890年	1900年	1913年
德	1890年	1900年	1913年
美	1890年	1900年	1913年
法	1890年	1900年	1913年

第一次大戰後，法國工業發生了質的變化，重工業及軍需工業開始急劇的發展起來，工業的集中化和獨占過程，也極迅速。但是比較起英美德等國來，還是略乎其後。尤其是自一九二九年以後，落後的趨勢特別顯著。下面的一張表，即說明了歐局劍拔弩張之時，主要國家生產率發展的消長情形。法國不能與希特勒德國等量齊觀的拓展它的工業生產，對於它的國防組織發生了嚴重的惡果。

法德英義四國工業生產指數表(以一九二九年為一〇〇)：

法國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德國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英國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義國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是在一方面，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史，曾經歷了對封建政治經濟體制的徹底破壞，在現代政治上，貫穿着足以炫耀世界的革命鬥爭的光榮傳統，在作為資本主義的範疇上，它也達到了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能達到的高度發展的頂峯；但在另一方面，法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先天的不足，後天的失調，及其腐化傾向的特別嚴重，却又把法國一直就拖到不可自拔的迅速沒落的泥淖之中。

在阻礙法國工業發展的各種原因裏，主要的有三：一、是石煤的貧乏；法國工業上所必需的石煤和焦炭，大部份都需仰賴外國的輸入，這大大限制了法國電力和冶煉業的發展。只當第一次大戰後，法國收回了亞爾薩斯和洛林，取得了薩爾煤層內讓子權，才改善了法國重工業及一般工業的狀況；二、是法國農業的小有產者性質，限制了法國工業勞動力和原料供給，以及商品銷售的市場；三、是法國資本高利貸活動及寄生腐化過程長期巨大的發展，使法國資本的絕大部份流出國外，流出生產領域，破壞了法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有生力量。其中以第三個原因，最為重要，他是法國資本主義內在危機發展中最大的致命傷。

法國財政資本與財政寡頭統治，也如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達到了最高峯。同時，法國還擁有僅次於英帝國的廣大的殖民地，對殖民地地勢力圍施行了最殘酷的榨取。但是「法帝國主義」和英國的殖民的帝國主義不同，它可以

法國工業的整個發展過程，和先進資本主義各國比較起來，是帶有緩慢而落後的濃厚色彩的。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法國城市人口僅佔全體居民的百分之四十四，大多數企業，都是中等和很小的規模，且以消費資料的生產(特別是紡織工業)的建基於手工業勞動上的奢侈品生產)占著優勢。在煤的開採量，鐵礦及鋼的熔鑄量和棉花的消費量方面，與英美德美的比較，有如下表：

叫做「高利貸帝國主義」。在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係以小的高利貸資本開始，而以巨大的高利貸資本為終結。一切經濟生活條件，因資本主義的這種蛻化，而發生了深刻的變更。在人口、工業、商業、海運等停滯之下，一個國度竟可以藉高利貸而致富。」這是對法國資本主義特徵的最確切透澈的說明。正由於這一高利貸的帝國主義性質，表現在法國財政經濟上的，是經常不穩定性和危險性。例如法國對外貿易，就其流通總額而言，占有世界的第四位；而其出入口情形，與英國頗相類似，即需大量輸入原料和糧食，經常是輸入多於輸出，而主要靠著國外投資的收入來彌補差額。但法國的整個對外貿易趨勢，遠不及英國的健全，而是一年的年在急劇的衰落下去，入超亦日在增長之中。其次在安定時期，法國的對外投資收入足以補償入超而有餘，但週期恐慌和上次戰爭業已大大的縮小了這些收入，曾在一九三一至三三年造成了收支不平衡的巨大赤字。除此之外，法國投機

和逃避資本的猖狂，資本進出的頻繁，又經常釀成法國財政金融及政治的巨大波動，嚴重的打擊了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法國在這次戰爭中的猝然敗亡，即與其財政經濟上的這種寄生性投機性和脆弱性，有着密切的關聯。因此，法國新生後，這種高利貸性質的帝國主義經濟之將受到清算，也是自然不過的事。

蛻變的根據

法國資本主義蛻變的現實根據，一、是金融寡頭統治，隨法國的敗亡，而受到絕大的搖撼；二、是人民的民主政權，隨法國的解放，而建立了起來。法國人民的民主力量，不斷以其漸擴大和鞏固的政權，防止和摧毀金融寡頭統治的重建，從事政治經濟民主的改造工作，這就是保證法國走上嶄新前途的最主要的前提條件。

法國金融寡頭的事業，在淪陷時期，仍然在與德國的合作下，繼續着和發展着。二百家金融貴族都通過由最大的工業家和銀行家組織的各種委員會，參加「維琪政府」，與德國實行經濟合作。為了實行殘酷的榨取掠奪，希特勒竭力保全法國金融寡頭的特權和利潤的獲得，「維琪政府」則以捐稅，公債和法蘭西銀行的獎金等等，來償付承製德國的軍需定貨和履行定貨的投資。因此，法國金融寡頭無不利市百倍，比較淪陷時期以前猶有過之。例如三十三種最重要的法國有價證券的總指數，竟從一九四〇年五月的二七〇，提高到一九四一年四月的六二八，其中同期化學工業有價證券亦由三七五提高到八一五。法國最大的銀行家，化學工業托辣斯的首領和地主特·波古埃，通過他管理的煤業公司，化學工業公司和電氣冶金公司，在一九四一—四二年間，因履行德國定貨而得到的純利，將近二億五千萬法

郎。此外，資本的集中化，在淪陷時期，也被強制的實行着。計到一九四二年底止，被實行所謂「合理化」而清算的小型工商業機關達百分之五十，這些資本無疑的也落到了承接德國定貨的企業托辣斯的叛國者手裏。

但這不是顯示法國金融寡頭佔資本的生命力的增強，而是顯示法國金融寡頭佔資本在自掘着坟墓。因為，顯然的，法國金融寡頭的叛國通敵，已使其在國家的地位宣告破產，同時，它依賴德國征服者繼續和發展着的事業，亦將隨德國的崩潰而受到法國人民的清算。

法國解放以後的事實即證明了這是必然的邏輯。

法國敗亡後，法國人民並沒有屈服，他們英勇的愛國戰鬥和復國運動隨即展開，直至解放勝利為止。而同時隨着這一解放鬥爭的進行及其勝利，基於民主基礎上結合起來的政權，也建立起來了。到了去年十二月廿四日，法國第四共和國，正式誕生了。雖然現在第四共和國的基本基礎還不十分鞏固，右翼政黨正與一切反動勢力勾結起來，以戴高樂為首企圖推翻它，但根據戰時及戰後的經驗，法國人民的民主力量是能夠粉碎這個企圖，並保證法國經濟蛻變工作的完成的。

自法國人民的民主勢力取得政權以後，社會經濟的改造工作，便告展開。為着復興和發展法國經濟，它們發現最首要的任務，是挖掘那阻止法國經濟發展和剝奪國家利益的獨佔資本統治的根基，將龐大的生產工具，共同勞動的果實，原料和勞動力的泉源，以及所有龐大規模的企業組織，完全解放出來。這就是實行獨佔資本的國有化。一九四五年三月二日共產黨和社會黨曾發表聯合宣言，提出國有化的主張如下：

「一、消除私人資本的股份公司或

企業的支配；

「二、同時對奪它們參加管理的一切權利；

「三、將領導權交給工人，職員，技師和社會機關（政府各部，國會或市議會）的代表，由全國推選出來的人物管制；

「四、將廣泛的自治權——行政，商業和技術的自治權——授予那由上述方法或立的各部各機關。」

這個國有化的主張，後來就成了法國民主政府改革國民經濟的目標，逐漸的在實施起來。而合於上列國有化主張而應被剝奪的企業，將包括所有重要工業部門的大企業，大銀行，保險公司以及運輸業等在內。等到這個國有化的步驟完成時，那顯然的，獨佔資本的基礎，就會被摧毀，法國新民主主義就會在鞏固的基礎上建立起來，法國經濟也就會迅速的恢復和擴展起來，並漸漸的過渡到嶄新的制度上去。

蛻變的艱苦性

但一年多來法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蛻變過程，却顯得異常的曲折，複雜和艱苦，至今還沒有達到決定性的階段。這主要的原因，是法國的新政權還是屬於新民主主義的範疇，三大政黨中的社會黨右派和人民共和黨的政治路線，與共產黨還保持着頗大的距離，尤其是人民共和黨，現已成為反共之勢力的支持者。「國有化」政策實行極不徹底，對叛國者的清算亦然，法國二百家金融貴族的社會經濟基礎並未受到過大的動搖，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能力也還很大。不僅如此，金融寡頭勢力，並公開實行怠工與破壞，無時不利用戰後國家經濟的困難，企圖造成混亂，以打擊民主政權。同時，國際反動勢力和獨佔資本集團，對法國的拉攏威迫利誘，也無所不用其極

，以圖促成法國金融寡頭統治的重建。

要了解法國經濟蛻變的艱苦性，首先便不能不考慮到戰爭和亡國對法國經濟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法國曾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和損害，但顯然是一次甚於一次。自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期間，法國總計損失了一百四十萬人口，還有幾千萬熱鍊工人被驅入德國。資產方面，在一千萬座建築物中至少有二百萬座已被毀壞，大半的鐵道車輛，幾乎全部的駁船及運貨船也都不知去向。這些損失估計起來總要超過十二兆美元的鉅。此外，德國還曾徵收了九兆美元的稅，搜括價值兩兆美元的存貨，最後所剩留的機器設備，都已陳腐破碎得不能適用。總計資本損失約有二十八兆美元，等於一九三八年國庫歲入的兩倍有餘。因此，法國生產的低落，至足驚人。在一九四四年底，決定性工業部門（冶金工業、機器製造業、化學工業和紡織工業等）的生產，還不及戰前水準的一半。一九四四年的農業生產總額，也比一九三八年低落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尤以農業商品生產為甚，計一九四四年比一九三八年酒類、肉類和菜蔬生產減少了百分之六十五，馬鈴薯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五。法國一般國民就業和消費狀況的惡化，由此可以見之。

在這種經濟情形之下，法國民主政府的當前急務，當然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及解除生產上的障礙，以求增加生產，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法國民主階層對於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有着充分的自信和遠大的見地。他們認為復興法國經濟，絕不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樣，依靠對人民榨取的加重和海外投資的擴張或向外借款等方法來求達到，而應以經濟民主的增進，國內市場的發展，人民購買力的提高，工農業生產的解放來創立不拔的復興基地。同時，他們

還堅決自信，法國的自然，勞動和金融資源，完全足夠使法國在最短時期內變成最進步的工業國家之一。事實證明，他們的努力方向，是正確的，並有了重大的成就的。

法國工業生產，在解放後的初期，復甦頗速。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底，工業生產品的平均水準已提高到了二九三八年數字的百分之五十或六十。自後，增加率便驟然減緩，並逐漸降低下去。但在收歸國有，由政府直接領導和已得工人團體協助的生產部門，則仍保持長足的進步。例如煤礦收歸國有後，一九四六年五月份的產量便比一九三八年的一月平均開採量多出一七四、〇〇〇噸。電力的生產，最近也提高到戰前水準了。其他鐵、鋼、汽車、火車等生產，雖因托爾斯，尤其是著名「冶金獨佔公司」的統制，迄未能達到戰前的水準，但鐵和鋼的產量，去年秋已較一九四五年三月高出百分之二百九十七和二百八十八，汽車和火車的產量，也顯著地增加了。

財政狀況的改善，是法國經濟最迫切的問題，而又是最困難的一環。如在一九四五年，國家支出為五、三二〇億法郎，支出中祇有百分之三十七是以正常的來源彌補的。一九四六年入不敷出計達三、〇九〇億法郎。法國實著五億於戰前的債務（公債發行已近四十七兆美元，依貶值後匯率計算快到六十兆法郎之鉅），同時，又還需大量輸入原料糧食和機器等，故平衡預算，實非易事（據估計，需至工業生產能超過一九二九年水準時，才有可能）。但法國政府改善財政金融的措施，亦有顯著成果。如削弱軍費以求平衡預算（曾引起數高築的去職）；擴大對富裕者的課稅；將外匯收歸公有；實行法郎貶值，以鼓勵輸出，刺激生產；發行八百億法郎的內

債；減少發行，制止通貨膨脹等等。凡此進步的民主的財政措施，無疑的已使法國財政赤字獲得相當的改善。

但法國金融寡頭勢力的掙扎，也極劇烈，它們竭力保存其地位，並以各種無所不用其極的破壞手段，來阻止法國經濟的民主改革。如與德人合作開名的「法蘭西士敏土公司」的各製鐵廠，在淪陷時期士敏土的產量，曾由一九四〇年七月的三噸，突增到同年十一月的二五、九八七噸，但解放後立即驟減至每月僅生產數百噸。在四十二行省和殖民地內公佈活動的「工業力能」托爾斯各瓦斯廠，竟將燃料局撥下的燃料存儲起來，以缺乏煤斤為藉口，而把企業停頓。各托爾斯和各銀行無不殘酷地反抗征發各叛國者所有的企業。各銀行拒絕放款給那些從叛國者手中剝奪下來的企業管理處。壟斷的批發商和供應機關大群的收買食物，抬高價格，使糧食危機更形深刻。金融寡頭銀行家無時不企圖引起金融恐慌，使法郎破產。總之，金融資本和托爾斯在一九三七年為打擊人民陣綫政府所實行的經濟高壓破壞戰術，無不施之於今日，來削弱民主力量。

無疑的，法國金融資本和托爾斯的這些愈工和破壞手段，是收到了相當的效果的，整個國民經濟復興的阻滯不前，即主要是根源於此。但是，誰實為之，孰令致之，法國政治上右傾勢力對應本的租稅縱容，及其政策的反動性大還負最大的責任。「國有化」的實施，還僅限於少數屬於叛國者的企業，將部份的煤礦業，鐵道和法蘭西銀行收歸國營，以及僅僅對一般銀行投資信用實行消極的控制等等，而且在國有化的企業和銀行中，大資本及其代理人仍獲管理之權，並可得到優厚的補償和分沾紅利。所有反抗國有化的階層，都竭力想以拖延或不損及金融資本特權的方式來實施

國有化政策。基督教民主黨曾主張「國有化」的方式，「應該不從企業國有化開始，而從經濟國有化開始」，即限於「管制」和「計劃」私有企業的活動。

「自由共和黨」首領之一朱爾·拉馬羅尼更公開的說：「我們認為，國家是一個不好的管理員。它的作用是要領導工業和保護它能夠踏上國際舞台」。對於銀行國有化問題，爭執尤烈。在第一次制政會議財政委員會上，委員們提出的不同修正案，有一〇六種之多。基本的爭論，是關於商業銀行國有化後，如何補償股東的範圍與形式問題。有許多民主團體提議將商業銀行國有化，以國債代替一切國有化銀行的股票，剝奪附逆大股東的補償；另一方面，右翼團體則竭力想破壞政府的「過分」的計劃，如「共和統一」派提議祇限於法蘭西銀行的國有化，和設立特別委員會對於其他銀行的管制。

還有一點，右傾勢力認為復興和改造經濟的主要源泉，應該是向外國取得借款，而不是以向大資本課稅和沒收淪陷時積聚的非法財富的方式累積資金，及解放勞動大眾的生產來取得。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底戴高樂和皮杜爾直接與杜魯門總統談判，獲得五億五千萬美元清付租借輸入物資的貸款起，至去年五月廿八日由法國經濟特使白魯姆與美國訂立的法美金融協定止，都是右傾勢力遺一主視願望的一步一步的實現。誰都知道，美國對法貸款，是全國外交的一個重大運用的場面，對於法國金融寡頭重建統治的企圖，是一種有力的呼聲。

法國新的社會政治經濟體系的現狀，如果不能對內挖除金融寡頭統治的根基，對外不上國際獨占資本勢力的圈套，那是不可想像的事。而在目前，這一段奮鬥的過程，顯然還很遙遠，有待擁有光榮的革命傳統的法國人民的繼續努力。

蛻變的前途

因此，在目前來判斷法國資本主義蛻變的前途如何，就還太早一點。

不過，根據上面的分析，有幾點却是確不移的事實：第一、今日法國的人民民主政權，絕非一九三七年時的人民陣綫政府所可比擬。作為政權的主要支柱的民主階層的勢力，是在不斷的高漲着，他們所堅持的一切改革計劃的實施，也一天有了堅實的基礎，不管法國資本主義蛻變的過程如何曲折，複雜和艱苦，他們的奮鬥的堅韌性和冒險性，是不容懷疑的。第二、法國資本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敗性，已在這次戰爭的考驗中，悲慘的作了歷史的定命。金融寡頭的誤國叛國，業已完全喪失了人民的信任，並掘毀了自己在國家的統治地位。右傾勢力也只能藉國外的壓力和國內的混亂，以爭取廣大的中產階層及所有的動搖沒落份子，來阻止政府「過份」的計劃的施行，和民主主義的急劇發展，而不敢公然的重建金融寡頭統治，遵循金融寡頭所採取的方向，而一意孤行。第三、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的命運，也在這次戰爭中受到嚴重的考驗。歐洲大陸上的帝國主義的均勢關係崩潰了，替之起的是人民的民主力量的普遍高漲，由東歐，沿北歐，西歐，以迄南歐的大範圍之內的任何地帶上的情形，都是如此。世界資本主義的「救世主」，雖然已在東歐以外的許多地區，以強制威迫手段，挽救或重建了腐舊的反動的統治政權，但也還不能做得非常圓滿。譬如在法國，「救世主」就很難如願以償。法國作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強大的一環，今後可能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作世界性崩潰的一個永遠不可填補的缺口，這恐是必須承認的事實吧！

關於高中畢業會考的討論

施克

自從教育部公佈中學畢業會考決定本年度恢復之後，學生和輿論界都有許多的反對意見，京滬兩地學生，並曾向該部請願，申述反對會考的理由。但是教育部仍然堅持「政府法令」不容更改，不予採納的行動，其他各地，亦在醞釀之中。這件事原不是十分嚴重的，但是教育部如果不能善予處置，恐怕會引起全國性的學潮。綜觀目前情勢，教育部絲毫不會有意重新考慮這個法令的應否實行，實在不能不使人慨嘆。

五月十日，教育部中教司曹司長在京招待記者，闡述會考制度的優點，大要為（一）全國中學程度參差不齊，欲使其逐漸接近於部頒之課程標準，會考實為最理想之辦法。（二）公立學校認真辦理者固不少，然亦有濫竽充數者。部方經常派遺督學至各地區督導，再藉會考，以使社會人士明瞭其優劣，使青年學生有所抉擇；認真辦理之學校，部方予以各種獎勵，辦理欠完善者，再嚴加督促。（三）會考之成績，可使主管教育者發現教育方針之缺陷，而謀補救之道，（見五月十一日申報）。

曹司長在招待記者時，闡述會考制度的優點，大要為（一）全國中學程度參差不齊，欲使其逐漸接近於部頒之課程標準，會考實為最理想之辦法。（二）公立學校認真辦理者固不少，然亦有濫竽充數者。部方經常派遺督學至各地區督導，再藉會考，以使社會人士明瞭其優劣，使青年學生有所抉擇；認真辦理之學校，部方予以各種獎勵，辦理欠完善者，再嚴加督促。（三）會考之成績，可使主管教育者發現教育方針之缺陷，而謀補救之道，（見五月十一日申報）。

曹司長在招待記者時，闡述會考制度的優點，大要為（一）全國中學程度參差不齊，欲使其逐漸接近於部頒之課程標準，會考實為最理想之辦法。（二）公立學校認真辦理者固不少，然亦有濫竽充數者。部方經常派遺督學至各地區督導，再藉會考，以使社會人士明瞭其優劣，使青年學生有所抉擇；認真辦理之學校，部方予以各種獎勵，辦理欠完善者，再嚴加督促。（三）會考之成績，可使主管教育者發現教育方針之缺陷，而謀補救之道，（見五月十一日申報）。

曹司長在招待記者時，闡述會考制度的優點，大要為（一）全國中學程度參差不齊，欲使其逐漸接近於部頒之課程標準，會考實為最理想之辦法。（二）公立學校認真辦理者固不少，然亦有濫竽充數者。部方經常派遺督學至各地區督導，再藉會考，以使社會人士明瞭其優劣，使青年學生有所抉擇；認真辦理之學校，部方予以各種獎勵，辦理欠完善者，再嚴加督促。（三）會考之成績，可使主管教育者發現教育方針之缺陷，而謀補救之道，（見五月十一日申報）。

曹司長在招待記者時，闡述會考制度的優點，大要為（一）全國中學程度參差不齊，欲使其逐漸接近於部頒之課程標準，會考實為最理想之辦法。（二）公立學校認真辦理者固不少，然亦有濫竽充數者。部方經常派遺督學至各地區督導，再藉會考，以使社會人士明瞭其優劣，使青年學生有所抉擇；認真辦理之學校，部方予以各種獎勵，辦理欠完善者，再嚴加督促。（三）會考之成績，可使主管教育者發現教育方針之缺陷，而謀補救之道，（見五月十一日申報）。

議，則初中畢業會考又是為何不予恢復？因為我們感覺到，凡事應從基礎着手，初中程度不齊一，高中程度斷不會齊一，猶之遺尿，基之不穩，而苛求於整個建築之堅固，決無可能。照如此的推論，目前首先應該測驗的實在應該是初級教育了。

(二) 高中職業科會考，在過去是與普通科一併舉行的。但詳開法令，今年是否恢復舉辦，迄無明文。據五月十日文匯報載，上海市各助產學校學生，曾疊向上海市教育局詢問，均答以「未獲部令。」不能不使人對於恢復高中會考這個重大決策的周密性，有更進一步的懷疑。因為高中普通科學生畢業之後，升學時必須經過大學的入學試驗，程度過份低劣的學生，自然會遭受淘汰。而職業科的學生，畢業之後，立刻要為社會工作，在致核上似應比高中普通科學生更加注意，但是這個問題的結論，却是適得其反，實在令人不解。

(我必須聲明，這裏提出的兩個疑問，目的不過在說明「法令」不一定合理，絕不是純粹站在高中普通科學生立場說話的。在理論上說，會考制度，本身就是一件一無是處的制度，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應反對的。)

關於會考制度是否合理這個問題，理論上可待商榷之處太多。這個問題，已有很多人

討論過，試綜合各方面的意見，約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 會考根本不能提高學生的智識水準。
(二) 會考加重學生精力上的負擔，直接摧殘了學生的健康，間接的阻礙了教育程度可能的提高。

(三) 會考制度未能杜絕舞弊，反而促使學校當局與學生之間，為爭取會考優秀成績，通同或個別的進行舞弊，在青年訓導方面，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四) 會考養成學校及學生投機取巧的心理，使其企圖僥倖在會考獲得成功，而忽略平時應有的努力。

(五) 會考本身不能代表學生真正成績，而施之過嚴，將使一部份會考失敗之青年人喪失自信，沮喪了求進步的意志。

(六) 所謂會考的標準，是一個無從合理決定的標準，不能當作評量學生成績的尺度。

(七) 會考使中等學校，倒因為果地把考試當為教育的最終目的，而忽略教育青年培養健全公民的責任。

(八) 會考可使一般中等學校擱置了或是忽視了必須兼顧的「德」、「體」、「羣」三育。

(九) 會考制度使教師在教授法上，祇能墨守成規，不能有所創見，而減低教師從事教育的興趣，因此又使他們忽

略了進修的必要。

當然，會考制度的缺點，決不止此，這裏不過略舉數端而已。有這許多缺點的「會考制度」，定要堅持恢復，不能不說是教育行政當局的錯誤。

「上海反會考聯」的代表反駁曹司長的話中有一段，「曹司長說『決不能視國家法令為兒戲，否則教育部形同虛設。』從這裏我們就可以看到教育部要堅持會考的根源，會考祇是為了點綴教部的空虛而設的。」(見五月十二日文匯報)。

這裏，我們意味到教育當局的苦悶。表面看來，這是理正辭嚴的調令，但是仔細玩味，教部的空虛却是更深一步的自行暴露無遺。試看今天的教育界：國立大學的設備充實了沒有？學校的經費足夠維持學校嗎？全國各級教育工作人員的生活能夠安定嗎？罷教、罷課，請願在目前的報刊上，已是不刺激人的字眼。教部不去根本解救這當前教育的危機，一味提出「男女分校」，「專科改制」，「恢復會考」這一套並不能針對現有癥結的法令，若不算是虛張聲勢，那麼教部這一套措施，不能不令人懷疑到是另有作用。

我又想起前些時教部發言人在解釋會考的優點時拖下的一點尾巴：「有些人說會考是科學的變像，目的在統制思想，實屬不值一辯。」但是上海市教育局和「大專校長聯席會」的討論會上，某些校長却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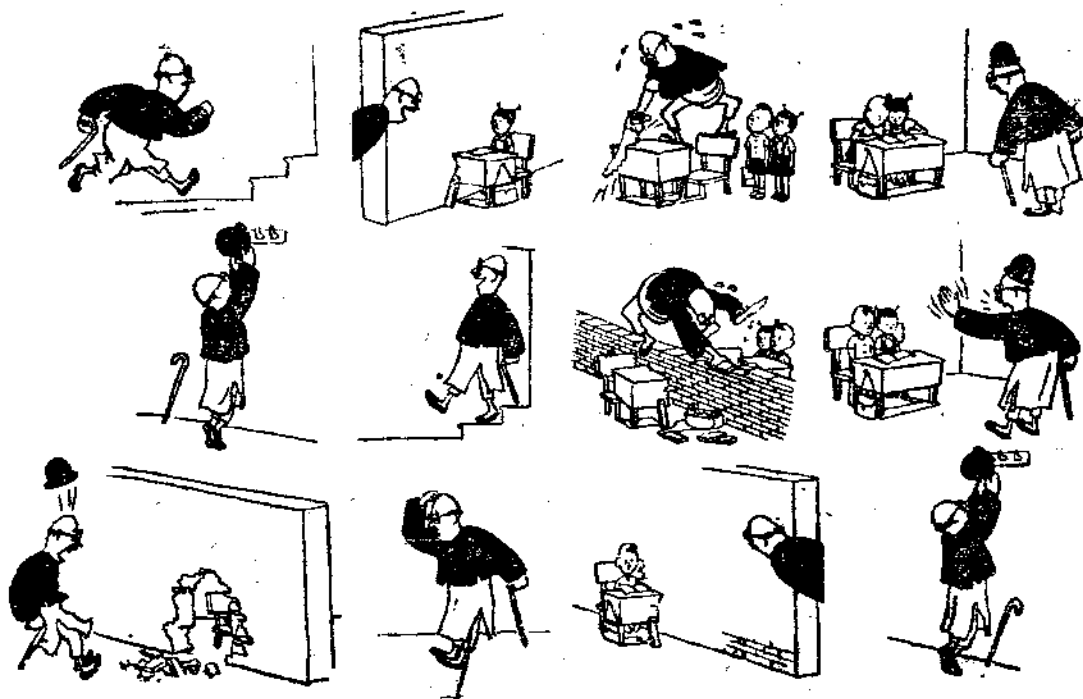
開提出：「思想有問題的學生，不予收錄。」有的竟說：「我們已經在附中注意學生的思想問題，有問題的學生不能升

入大學……」却正是一個不打自招的明證。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自然也不必再為費辯了。

五月十二日晨

多此一舉

米谷



今年「五四」之受到空前熱烈的紀念，是值得思考的事情。中國從曲折矛盾的發展上推進，今天面臨着一個新的階級，事實需要它回顧到這個劃時代的，而却是啓蒙性的日子，加以檢討與再認識，庶幾乎好辨認前路的方向。我說「事實需要」，是的，正惟其是事實的需要，這樣使得今天的紀念成爲血肉生命的問題，而並不是「告朔之餼羊」，「我愛其禮」的空洞儀式而已。

「五四」過去了的二十八年以來，這個日子很少有像今天這樣地受到普遍而熱烈的紀念。這是容易理解的，因爲從前事實沒有像今天這樣的需要。例如，五四啓蒙了北伐機運的一面，進步的中國就正準備着推進着北伐，這道路是正確的，於是事實也就不怎樣需要回顧「五四」。又如，更大的抗日戰爭，更是舉國如沸如揚，誰也不再想到「五四」那顯得渺小的日子。至於間隔在這中間的若干波折的歲月，亙古長新的中國青年又逐時進展地補足了其他可紀念的節日，以與五四相輝映。

今年，情形不同了。有如五四精神最光榮的發揚人聞一多教授所說，中國命運裏背荷着的「借刀殺人」與「狗仗人勢」的雙重包袱仍然沒有解除，而積累爲歷史上空前未有過的壯闊場面，這場面又恰正糾纏着五四時代顯然達到了的，與朦朧提出了而却爭取未得的目標。

那就無怪乎今年紀念的盛況空前了。

比方說罷，今日的朝廷之上，有誰數得清到底有多少個「曹、章、陸」來？中國主權之遭受侵害，何只是一個青島問題？五四當年以千百個青年幾十年的呼號奔走之勞就完成了的助業，今天青年加以千百倍的鮮血賠補上去還只能撼動這國運重負的一部份。艱苦誠然是更艱苦了，然而撼動也就異乎昔日的撼動。

至於當年提出了的民主與科學的呼聲，今天更獲得了進一步的明確的認識，那就是必須有民主纔能有科學的健全

日來所見到的說說我的意見。

這曲解與蒙混的公同特點是強調「五四」乃是一種文化運動，是玲瓏剔透，「純潔高超」的精神文明，不可與濁世播糝的要求混爲一體。

所以，照他們的說法：第一，「五四」運動是自發性的，是「偉大」青年冥思冥想出來的，因之，是「不受外界任何政治的影響」的。（見文匯報五月四日第二版某君談話）——「不受外界任何政治的影響」，而却又又要算作「愛國運動」，那麼，難道愛國運動並不是一種政治生活麼？抑或這批「偉大的」

並不是出於什麼神祕的「自發性」——

也從可想到，那些真在幻想着奇異的「自發性」的人，當年本就是熱昏鬼混，趨利避義的傢伙；要不然就是煞分忿分的觀念論者，「精神至上」，「文化第一」這樣的人。

第二，他們又認爲五四只該當作單純而架空的文化運動看待，這是「高超」而又「純潔」的，不能混雜到「醜陋的」民族政治生活在一齊。假使這看法也符合當時事實的一面，這正說明這個運動在中國現代解放史上的啓蒙意義。也正是這個啓蒙運動機啓發了中國廣大

關於「法利賽人」對於「五四」的曲解與蒙混

夏康農

發展，必須和人民結合纔有真正的民主，這是邏輯嚴謹的層次，不容含混理解，而却又是五四當年所未喻的真理。

然而，「法利賽人」看法却不同了，於是今年偏多了各形各色的曲解與蒙混。這也是一種邏輯的必然；但是製造這曲解與蒙混的，偏又正是「五四」當年的運動參加者乃至思想的領導者，這就頗有點教青年人陶陶然，昏昏然，迷失方向的功用，須得加以辨別。

惟其這曲解與蒙混是這樣的來源，所以內容與障眼法也就來得令人眩目，而且花樣多端，不易梳剔。我姑且就幾

青年自愛其國，享有愛國的專利，這纔和外界毫無關係的呢？再不然，這竟是一羣學宮裏面的俠客，像黃天霸保鏢施大人似的，運動一通之後退回學宮，等待施大人欣賞？

巧就巧在這裏：偏偏就是那些強調五四是自發性運動的人，今天一個個都是施大人招撫了的黃天霸！

事實是，依傅許德珩教授的回憶，「五四是有組織，有遠因的」，（見大公報五月五日「許德珩回顧五四」）而許教授却正是當年奔走熱烈，三十年來一直沒有忘記國步艱難的人；「五四」

樣的啓蒙階段，永遠向那階段寄託「靈感」。

然而，「法利賽人」的看法却不同，他們甘願永遠神遊於當年那樣啓蒙的「聖境」。於是，難得動筆的胡博士發表文章了，這鴻文就見於今年五月四日那一天的大公報。高論具在，不必多所徵引，我所感覺與味的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之後，「卒子」業已「過河」不少時候了，而槍法還是這樣的圓渾模稜？看他那一餘音繞梁的煞筆，「我們在二十八年後紀念五四，也不能不仔細想想我們今日是否已「收革命之功」？是否還「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

「仍然看不出「卒子」之意向所指。中國的「革命」也許真的還沒有成功，「思想」又該有賴於怎樣的變化呢？是大家都忘記了「五四思想」感思的這種思想都變成「化」了，應該轉回頭來再「化」了不是呢？——「五四」嬰兒已離二十八歲了，叫他怎的還能穿得上那時候的娃娃衣服？何況古已有之的兩晉「校事制度」於今還正算在這二十八歲青年的頭頂上，就連「五四思想」有的也都成了「左道旁門」（那裏當年本來含有猛烈的反封建成份）偏偏向達教授又點破了這制度記在當時人口碑裏的是一狗一制，那麼「思想」究竟應當如何「變化」法呢？

上引胡文裏面那兩句如履引號的話，是胡博士引用「寫在五四之後的第八個月」的孫中山先生的話；可見胡博士到今天纔服膺了孫先生知難行易的哲學，「知」道說出這樣的話還是很「難」，而「行」着照抄這樣的話却是很容「易」的呵！

胡博士也抬出了孫先生的牌，稱道五四時代一二覺悟者之所為無一不是「有價值之事」；誰知道遠在孫先生說這些話的時候以後，胡博士還唱過「知難行亦不易」的調頭在諷刺孫氏之徒呢。直到今天，孫先生留下的產業教他的不肯門徒敗壞無餘的時候，我們纔第一次聽出胡博士贊揚這位「深思遠慮的政治家」來，可見「馬後砲」的奉承正要到這種時候纔肯「借光」一用。

孫先生誠然是一個曠代偉人，前進的與倒退的思想都要抱他的佛脚。胡博士永遠是那五四時代的「一二覺悟者」，而對於孫先生却到今天纔甘稱「後天」的「深思遠慮的政治家」了，胡博士是不是想到推行「校事制度」呢？——

孫先生在世時，原來也是滿洲鞭子和袁世凱的「校事」網眼裏度過他的大半生的呵！

第三，緊接在胡文發表之後的第二天，大公報不愧是「自由主義」大報紙，關心的方面真寬，社論裏面皇皇載着鞭策中國文藝界的鴻文了。談五四而抓緊了這是「文藝節」，專就「文藝範疇」發抒宏論，異乎人之所云。避重就輕，把問題引到小角落裏去，此「大」之所以為「公」也。（但我又頗感覺這文氣是從北平吹來的，大有健兒「遠征」意味？）

「大文」（大公報社評之簡稱，下同）劈頭就抬出了「五四文學革命元勳」這一尊金剛佛來，真是威鎮四表，格於上下，實在堂堂之至。胡拾孫，而「大文」拾胡，道統嚴明，煞是冠冕。「五四文學革命」聯作一辭，恕我孤陋還向來少見，大概創立此辭者之用意，以為「五四」只此一功可錄，其餘都不足道。精神文明之孫邦古國，理當如是。

至於說到「文學革命元勳」，我却想到了那淺埋埋骨在江津城外的另一位元勳來了。而且依我的愚見，即使就「文學革命」來說，那一位元勳後來回憶這一場革命的意見還更為公允。他說過：

「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得煙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科學與人生觀」頁四十四）

這話由陳仲甫先生本來自任元勳者

辭其功績，聽來教人感動佩服，本來「我手寫我口」已經是黃公度作詩的警辭，清末多少革命志士的著書通信（例如陳天華）也都是應用的白話。一到進步先驅者念及人民時，本來就自然容易想到用人民的語言，無如人民整個生活都在壓迫之下，雖有白話創寫者，也不能成爲風氣。我們的「文學革命元勳」適時出馬，水到渠成，而且這內容還有許多是從外輸入的，例如意大利的但丁，英國的喬叟之類，根本帶有從外而內，從上而下，代表了資產階級革命要求的一面。這所以陳先生有那近近謙沖而實乃道出真理的說法。

我這裏寫作的文體，本也是選用五四啓創的路數，我心裏本來時刻不忘「元勳」的恩德。但是我們也還有旁的要作的事情，不能一輩子就教道「恩」壓死；果然，那真是「恩重如山」了！「大文」的作者可不是這樣地想法，他是最能知恩的人，所以他全文的精義都在開導我們紀念五四就要懂得毋忘恩。

可惜全文所論，都是那麼高深的義理，我讀只能下風參拜，捉摸不透那裏面的玄妙。而且「聖潔的」中國文壇，我本來就不想多所曉舌。祇還看出了幾點小小的意思，想提出說說，以見「法利賽人」和我們是怎樣不同地去看五四。

「大文」作者也是九斤老太太的同志，太息「中國文藝」是一代不如一代。當其五四開了風氣以後，照他說來，那時是何等燦爛，多少論戰，儘管「看來似是瀟灑」，「然而却一面代表當時作家對事的不苟，一面也可以表徵中國文壇盛極一時的民主」；而如今是墮落到作家五十歲都「大張齋筵」的確可怕得令人毛骨悚然！——這裏我有一

點不懂，怎麼這些變成了「文丐」的人，那裏「丐」了那些錢來祝壽的呢？總之，叫喊民主都是枉然的，最好是「文丐」們自己天天打些「派別主義之不同」的筆墨官司，這樣纔顯得「對事不苟」，纔能討得「大文」作者的憐憫，「在無助的心情下加以安慰」。

「大文」作者說，「五四初期……文壇上還有所謂精神內容」；就是「反侵略，反法西斯」，也還馬馬虎虎過得去；至於「歌頌公路」呀，「以熱愛和感激舉繪飛將軍」呀，自然更是文丐可嘉。說到「隨着五卅慘案，反帝成爲全國作家的課題」，那可就是沒有「民主的雅量」，「缺乏信念，缺乏熱情」的「精神危機」了。總之，「反帝」就是胡鬧。

「大文」作者推荐了「阿Q正傳」。「子夜」等等，却忘記了這正是出於「文丐」夥伴們的手筆，而尤其是「阿Q正傳」的作者本是該報曾經放過患腦膜炎的消息，詛咒他的早死，而換得了一無如臣臆故如冰」的酬答的。

最妙的是「十九世紀帝俄的社會並不如我們好，然而却產生了陀斯多也夫斯基，托爾斯泰等大師，前者不但貧，而且病。」怎的我們的「文丐」們生逢沙皇盛世，就沒有「寫作的馬達」呢？這裏我就想起前年愛倫堡論陀斯多也夫斯基的一篇文章來了。（大約載在前年五月號（？）的「國際文學」上面）愛倫堡在開頭引用了一位納粹理論家的高見，說是陀斯多也夫斯基的國度是一個歌頌痛苦的國度。所以，（愛倫堡替那作者轉語）侵略這樣的國度正是給它精神享受！

我們的批評家也在這裏開導「文丐」們歌頌痛苦呢！是貓頭鷹繼續唱黑時，是「法利賽人」繞給五四以曲解與蒙混。

卅六，五，六。

木刻藝術的途徑

——從「觀衆測驗」看第一屆全國木刻展覽會

· 李 樺 ·

（第一屆全國木刻展覽會，舉行的日期是今年四月四日至十三日，地點在上海大新公司畫廊。本刊爲了滿足讀者對這一種新興的藝術形式的急迫需要，特從那次展覽會陳列的作品裏，精選了六幅，列爲「第一屆木刻展覽會佳作選輯」，刊登本刊第四期。本文涉及及各幅作品，凡是註有△號的，都已列入我們的「選輯」；註有×號的，則因當時限於篇幅，後來又在第五期中補登了。）

社會之間劃出一道鴻溝，如果我們不否認大多數觀衆的意見是衡量藝術價值的最好一種表尺，那麼，我們這次在復員後第一屆全國木刻展覽會中所舉辦的「觀衆測驗」，便是一件意義深長的事了。在過去，我們雖然很注意觀衆對每次木刻展覽會的批評，但有計劃地搜集觀衆的意見，這還是創舉。在這次八天的展覽期中，共發出了「觀衆意見測驗表」六百三十五張，截至閉幕後的第三天，我們收到了填好寄回的七十四張，約合發出總數十分之一強。自然還有多數的觀衆對於此舉並不發生興趣，但是填表的十分之一的觀衆，可說都是木刻的眞誠熱愛者；這些熱愛着木刻的觀衆的意見，自然是值得整理出來供大家參考的。觀衆填寫測驗表的時候，就我們的觀察，是非常認真的，有些爲了要把自己喜歡和不喜歡的作品填寫上去，在會場裏，徘徊不知多少時間，經過縝密的比較和研究然後決定的。而在「綜合意見」一欄內，又絕少恭維敷衍的客套，更足表現他們對木刻藝術的眞心熱愛了。

3) 綜合意見，和(4) 請你答復幾個問題；表後署名，性別及職業。

首先我們就填表者的身份來作一個統計吧。收到的表雖是七十四張，却有四張連署兩個名字，一張連署三個名字的，那麼填表者實際應是七十九人。這七十九人中，男性六十一，女性十八；就職業分類，學生教員四十四，文化自由職業六，公務員五，工商界十三，軍界三，政界一，不填職業或填無職業者五，百分之九十是知識份子。

現就表上的第一欄「你最喜歡那幾幅畫」作統計，很可以看出怎樣的畫才是今日所需要的。在這裏，爲明瞭起見，我把觀衆最喜歡的畫的一部分（最凸出的十六幅），依內容分爲三類，作個比較。

第一類：帶啓示性或反抗性的描寫現實的作品

怒潮(李樺作)三十二人
× 沉獄是最高抗議(楊訥維作)三十人
裏外同心(李樺作)十八人
爲了生存(刃錄作)十五人

五人

擇扎(王樹藝作)十三人
征糧(李樺作)十二人
△ 工廠隊的騷動(楊訥維作)七人
報復(陳烟橋作)六人
第二類：消極暴露現

實的作品

夜闌人靜(克萍作)二十八人
抓丁(李樺作)二十五人
△ 征兵大員到了村裏(阿楊作)九人
賑濟員下鄉(陳田作)五人
往何處去(徐甫傑作)五人
第三類：一般生活的描寫

入市(濛兮作)九人
迎親團(阿楊作)八人
修臉團(麥梓作)五人

從這個統計裏，我們看出了觀衆最喜歡的，是對現實作啓示性或反抗性的描寫的作品；其次是消極的暴露，再其次是一般生活的反映。又從相反方面，就表的第二欄「你最不喜歡那幾幅畫」看，雖有五分之四的填者留着空白，似乎爲了客氣不肯表示否定的意見，但就十五個填表者的意見再作統計，也可看出個大概：

花開時節(荒原作)十一人
春的消息(西雁作)八人
月季花(唐英偉作)八人
划龍船(黃永玉作)四人
人民的要求(仇宇作)四人

四人

女販(裘榮堂作)四人

這六幅作品不是脫離現實，就是把握不住現實，因此不爲觀衆所喜歡。似乎今日觀衆欣賞木刻，

主要是以內容來決定自己的好惡。這也是反映，生活於目前水深火熱的黑暗時代中，人民對藝術所要求的是什麼了。

測驗表裏的第三項是「綜合意見」。幾乎每個填表者都填上詳盡的意見，真是值得興奮的。現在把這些意見擇要分成五類，節錄如下：

一、一般印象

一個商人：我認爲這一類作品的展覽應該常常有，現在不是吟風詠月的昇平時代了，是一個被壓迫者向壓迫者鬥爭的時代。

一個機器工人：我認爲木刻也是替我們說出心底裏的話，所以我愛它。

一個店員：我喜歡木刻，因爲它將人民欲訴的意見用木刀表現出來了，而且那是那樣眞實的。

一個學生：在這樣的時代裏，我反對一切山水花鳥的寫意畫，這是有閒階級的裝飾品；我們不需要它，我們需要的是與人民大眾血肉相連的現實的反映。

一個公務員：我喜愛藝術，但是我却不愛那些專給貴人們欣賞消遣的作品，尤其在道政敗民窮，內戰遍地的今天。

二、關於創作路線

一個作家：與現實脫離的作品，如某幾幅以春爲題材者，不僅違背了木刻藝術的戰鬥任務，而且對觀衆發生癡癡作用，破壞全部展覽工作的戰鬥效能。

另一位作家：有的畫，不看畫題就不懂意義，太脫離現實了，走上了唯美的路。

又一位文化工作者：這次展覽的藝術性已被過去提高，惟須嚴防唯美主義的傾向。

三、關於題材

一個商人：現在社會中的家庭婦女還受着封建的茶毒，也未能獲得深切的同情與解放，請作家們及時揭穿它的殘酷性。

一個銀行練習生：缺少對工人階級及知識份子，尤其是學生抗暴運動的寫實。

一個自由職業者：題材還不夠多方面，如學運、抗暴、反特工……等尙少。

四、缺點

一個學生：對於勝利後民間的疾苦反映得似乎還不夠。戰鬥性和教育性的作品也欠多。

一個作家：綜觀全部作品，多能忠實的反映現實，惟取材局限於統治者所造成的現實情況（統治

「五四」在北平

辛揚火

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民主牆上出現了幾十丈長的壁報行列，夾在壁報中間的是標語，寫著「紀念五四要廢除中美商約」，「爭取人民世紀的民主」與「科學服務於人民」。

這是歷史的再現。二十八年前的口號再出現於今天，却已有了更豐富更廣大的內容與更堅強更有力的力量。從「一二九」到「一二一」，再到「一二三〇」，是一串血與火的燄煉。學生的手膀已粗壯，智慧已豐實，力量已不可侮。去年五四，官方發動過大遊行，今年他們不敢再提五四了，北平學生却如火如荼地紀念了五四之週。

從城內到城外，到處是壁報，到處是講演，到處是歌咏助誦與篝火。清華大學在「五二」有「大家唱」與新詩社的詩歌晚會，演唱「黃河大合唱」和「民主大合唱」；「五三」有文藝晚會，朱自清馬彥祥出席演講；「五四」與燕京合辦紀念會和篝火會；「五五」「五六」是戲劇晚會，演出「戲劇春秋」，青春舞曲和秧歌。燕京大學在五月二日舉行文藝音樂晚會，焦菊隱等作講演；「五三」戲劇晚會，演出燕大同學改編的「第四十一」與「最後的童話」；「五四」是與清華合辦的篝火。師範學院五四上午舉行紀念會，有向達講演；下午講演會，聞

家駒俞平伯葉鼎彝主講，晚間的五四晚會是一長串歌咏與期誦，「古怪歌」、「茶館小調」、和何其芳的「快樂的人們」，田間的「她也要殺人」與「我們反對內戰」，一齊登台，是古老的師範學院中空前興奮的晚會。五四發祥地的北京大學循例紀念五四週：一日科學晚會，理學院教授都參加講演；二日文藝晚會，適遇天雨，北大只有一個容五百人的禮堂，聽眾擁塞在過道裏，擴音器也要裝到過道裏，朱自清講「五四文藝」，馮至講「五四以來的詩歌」，馬彥祥講抗戰戲劇，葉鼎彝講小說散文，朱光潛被熱與擁擠弄得頭昏了，但仍講了譯譯；五月三日歷史晚會，五四人物胡適之、許德珩、周炳琳追憶了過去，樊弘則從五四的「內除國賊外抗強權」運動談到今天的反對官僚政治與反對「領袖有錯，錯在幕僚，幕僚有功，功在領袖」的做官哲學；五四上午有校友返校節目，下午詩歌會演唱「黃河大合唱」，晚間篝火會有集體秧歌舞，江樓操場集聚了萬餘會眾，火焰一直燃燒到午夜以後，牆頭樹梢都擠滿了瘋狂了的觀眾；「五五」經濟晚會，秦瓚、陳振漢、楊西孟分別分析了目前中國的財政經濟；「五五」至「五七」北大劇藝社在三院露天劇場演出「一個女人和一條狗」

者對人民的關係），使觀衆離開時，除了沉重的悲憤外，終覺得陰氣慘慘。如能進一步表現出（一）如何造成這種悲慘的狀況，（二）將發生何種後果，則木刻藝術的戰鬥作用，將更進一步的鼓舞人民的反抗情緒，使其得到樂觀自信的勝利的感覺。

又一位文化工作者：

照我的印象說，還覺得氣壓沉重一點。當然現實是沉重的，我們沒有方法輕鬆，不過我以為在戰鬥中的人，常常是健康而愉快的；對於苦難僅覺得苦難，其實不是真正能夠支持長期鬥爭的人。過於陰鬱的氣氛是否會激發鬥爭呢？

五、希望

一個學生：多創辦些木刻研究所。

一個商人：希望喚請還不平社會的另一面的愚弄人民的野心家、大腹賈、及位高權重的先生們，來參觀一下，不知他們作何感想！

一個工人希望木刻更能普遍，多公開展覽。
一個女性希望堅忍勇毅地繼續奮鬥下去！

在測驗表裏，最後我們提出了五個問題：

（1）你是不是贊成藝術上的現實主義？

答「是」的六十四人

「否」的三人

不表意見的七人

（2）你是不是喜歡山水花鳥的寫意畫？

答「否」的四十七人

「是」的十二人

不表意見的十五人

（這十五人中，有以為承平時喜歡，革命時不喜歡；又有以為少看無妨，但不必提倡。）

（3）你是不是贊成藝術應該與社會發生關係？

答「是」的七十一人

不表意見的三人

（4）你是不是認為木刻是當前爭取民主的武器？

答「是」的七十人

不表意見的四人

（5）你是不是認為木刻應該大眾化？

答「是」的六十九人

不表意見的五人

我們從上面的整理中，獲得綜合意見如下：為什麼大家這樣熱愛木刻？

是因為木刻是一種「與人民大眾血肉相連的反映現實」的藝術，今天我們所需要的就是這種藝術，因此大家一致認為「專給貴人們欣賞消遣的作品」不必提倡。但是大家指出這次木展是還有缺點的：第一，作品的表現尚未能深刻而普遍；如學運、工運、抗暴、反特工、及商人、知識份子、家庭婦女等的苦痛與希望等題材，有的描寫得太少，有的根本沒有接觸到。第二是整個木展所留給觀衆的印象未免太陰鬱，因此缺少健康的鬥爭情緒。第三，隱約看到有唯美主義的傾向，有兩位作家苦口婆心地提示着，警告我們。

觀衆的意見是值得寶貴的。在這次展覽會以前，我們還沒有過像這次的寶貴意見的綜合紀錄，所以更應該珍視這首次的收穫。我們認為它將在精神上給予我們很大的鼓舞，它不但足供木刻界的參考，而且在整個新藝術領域裏，也可以作為借鏡，而發生更大的影響的。

「飢餓線上」、和反內戰街頭劇「凱旋」。北洋工學院北平分院也不沉寂了，五月五日他們舉辦了講演會，請到了文協的作家，並且舉行營火，天主教輔仁大學也在五日舉行營火，點燃了向所未有的火燄。

中學生循迴集體參觀，他們爲這狂潮所鼓舞，沒有言語，只有發亮的目光。青年的與中年的公務員四出遊獵可能參加的晚會，好萊塢的電影或東安市場的燦爛救不了他們心頭的重壓與飢渴，沒有言語，他們也只剩了發亮的目光。一位中年記者晚上給一些青年記者們通電話，發現他們都不在家，他擔心是出了甚麼大消息，後來才知道他們都去追尋晚會去了。——這確是一樁大新聞，它報導了一批新的人，一個新的力量，一個新運動的開始。

應該說說文協。文協的新理事會剛剛在四月底產生，選出焦菊隱、馬彥祥、徐盈、闞家駟、朱葆光、王冶秋、葉鼎彝、俞平伯、沈一帆、吳晗、彭子岡十一人。他們的第一件工作便是五四文藝節的紀念。四日文協印出特刊，發出「公啓」，向民主的人民組織，進步文化社團提出六項建議：第一：發動紀念，組織紀念道

個反帝反對封建的神聖節日；第二，檢討本身，與廣大人民的民主要求、民主鬥爭結合；第三，爭取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學習自由、集會自由，把自已的前途放在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前途上；第四，五四的爭取人民解放與民族解放的偉大思想已經取得了無數的勝利，而且就要取得最大的勝利，紀念五四的一切活動要貫穿這主線；第五，發揚五四的革命傳統，使文藝運動前進，加速奴役人民的勢力的必然崩潰；第六，紀念方式盡量活潑，從座談講演朗誦歌詠一直到農村調查工廠參觀和被捕者失蹤者的家屬訪問。文協忍受了反動勢力對文藝節的侮辱，因爲沒法舉行一個正式的紀念會，文協會員分派到各處去講演，發動並組織了紀念，又爲加強作家的聯繫，恢復了每週一次的文藝茶座。文協北平分會是在冰電中舉步邁進的，我舉一個劇人的例子。正當演劇二隊上演焦菊隱導演的「夜店」的時候，葉餘劇人在五月四日舉行一個座談會。他們決議進行一次「保衛戰」，向侵入劇壇的惡勢力與下賤的黃色勢力進攻，並且着手推行在冰電中劇人們的「新立志運動」。他們揭發出必不能違反的信條，一面，着手排練一齣「歲寒圖」。

「五四」的「革命精神」是怎樣地被發揚又怎樣地與「人民解放事業」密切結合起來的呢？朱自清的講詞也許是最好的例子。他說：「白話文學由來甚早，唐朝以後士大夫文藝與人民文藝一直交流，人民也一直接表現自己的東西，「五四」時代胡適的「八不」與陳獨秀的「國民文學、真實文學、社會文學」，都是說用人民的語言寫人民的文學，總括一句便是「人民文學」；因爲時代的不同，那時候不能說得這麼乾脆，但已經很乾脆了。「五四」時代「拿出證據來」的是魯迅，「孔家店」便是指的封建社會，魯迅則是肩起開門放出孩子去的。怎樣救救孩子呢？當時請的兩位先生是德先生與賽先生。那時如此，現在也仍然如此的。這是很「乾脆」的了，但還有經濟晚會：趙酒樽檢討一般情況，指出中國經濟是（一）腦充血的經濟，集中在只會「五子登科」的豪門之手，須提防遲早的中風；（二）顯微鏡式的近視經濟；（三）部落藩鎮，地方各自爲政的經濟；（四）官僚資本的經濟。秦瓊說救治的辦法很多了，但都行不通，治不好，劉大中的「臨時貨幣」太微妙，張羣的「正在研究中」雖有「研究氣算」，都是更微妙；唯一的辦法便是用甘地的精神和中共的精算辦法；開源方面不必用徵稅，而簡直就清算資本，節流方面要淘汰一切冗廢的院部。楊西孟用他精謔的統計數字，說明通貨膨脹已至「崩潰期的後段」；他說：一九二三年的德國，三年間物價漲至一萬億倍，還是在國內和平的狀況下，中國已經拖了七年，也許不會漲到一萬億倍，因爲印票子的條件還不夠，但也離這個時期不遠了；他建議立法院制定法律，依薪俸計算官吏的財產，超出者就以貪污治罪，沒收財產。陳振漢統計中國家門收入佔全國國民收入六分之一，而分配這一億美元收入的頂多不過一萬人，佔全國人口四萬分之一。他說種種救治的辦法應該考慮實行社會主義。實行社會主義，有人顧及兩種困難：一是中國已極不安定，這樣會更不安定；二是經濟民主，要換來政治不民主。他答復這兩個問題：中國現在是用戰爭求改革，不如用改革來停止戰爭；民主的意義是「公衆基於共同的利益，以共同意志推行行政務」，這個「公衆」的意義是「大多數」，從邏輯上並看不出社會主義與民主的不能相容。

五四週在北平的初夏中度過。這一週，有過風，有過雨

，但更多的是晴朗的天與火熱的太陽。在四日下午五時，夏空裏響了今年的第一聲雷，那正是各個會場上鼓掌歡呼得像雷鳴一樣的時候。雷帶來一陣雨與沁涼，二十分鐘後，晚空澄藍，赤霞一直看青年們在廣場上點燃起熊熊火堆後，才笑着離去。

反動勢力在五四的火炬前戰慄而蒼白了。五月五日北大劇藝社上演「一個女人和一條狗」，當那條狗在舞台上被鞭撻得「比死屍還蒼白」的時候，坐在台下的真正的狗受不住了。下一齣戲是「凱旋」，一番傑作的反內戰街頭劇；在昆明，觀衆不說去看「凱旋」，而普遍地說成「去哭一次」。在觀衆的眼淚湧流着的時候，一個狗用鼓掌和嬉笑破壞了寧靜，一個含淚的觀衆氣極了，喊道：「簡直沒有人性」。狗們一下找到了對象，要拖他出去行凶，但更多的同學站了出來，狗們退出會場，說：「明天來算賬」。第二天訓導長陳雲屏找到了劇藝社的人，要他們停演「凱旋」。「凱旋」於是被禁演一天。但七日民主牆上貼滿了「重演凱旋」的要求，理由是「陳雲屏不能保障自由，就應該自動辭職」。「凱旋」七日勝利復演，五四週便結束在這勝利聲中。

五，七。

今日美國

(一) 「這是美國」

在一個陰雨的七月天，我們跨上了停泊在黃浦灘的麥格斯將軍號。雖然那是將近一年以前，當時上海的生活，也就够貴了。這條美國總統輪船公司的客輪，還有好幾天纔開，可是旅客住在上面，有吃飯不要錢的權利，所以我們也就樂得呆在上面不下來。

第一頓飯，就是由一位舊金山住家的華僑侍者招扶。住慣中國的人，免不了什麼事都是慢吞吞的。侍者把菜單拿來，我們吃了一樣叫一樣，結果他便火了。他說：「這是美國，在美國，人工就是錢。你們要吃什麼，一次一起點好，不要一個一個的點。」這位青年出乎意外的唐突，並不會使我們生氣，大家樂得都笑了。我們當時想得不錯。這位青年，絕不是瞧不起我們，或者故意來開罪客人。只因大家生長的環境不同，所以許多思想和看法自有歧異。後來和他弄熟了以後，證明此種推想不錯。他原來是一位很可愛，很有志的青年。幸虧我

們當初沒有把人家的善意當成惡意。

來到美國十個月了。「這是美國！」這句話時常環繞在我的心中。每逢看到一些驚人成就，或者令人愉快的事，我便會想起「這是美國。」偶爾碰到不順眼的事，也會警告自己說，「這是美國」。

美國究竟怎麼樣？如果要一句簡短的答案，就是今日美國，與中國完全不同；不但不同，而且在許多方面，正是處在相反的地位。更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美兩國的差異，物質上誠然很大，精神上更要大些。

就拿我們所坐的那條將軍號來說吧。這條船原來是戰爭將完以前完成的一條運輸艦。運過幾次兵以後，在我們坐的那次，第一回改成客輪。雖然是客輪，上面還載着有幾百名自遠東撤回的美國官兵。船上的頭等艙，差不多全給軍官佔滿了，小兵都住在三等。除掉以頭等艙位優待軍官（這當然是合理的）以外，在美國制度下的丘八爺，並沒有享受任何特殊權利。軍人自己

雖不付船票，美國政府，却是按照船票數額，不折不扣付給輪船公司。

任何人想揩商人的油，這是美國制度所不許可的。我們感覺，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全船沒有一個勤務兵，軍官們也沒有帶着許多行李。美國兵只管打仗，不管伺候上司。軍官老爺們，全是自己招扶自己。雖然因為地方大小的限制，官兵不得不分開住。可是偶爾看見他們在一起，確是比我們軍隊情形民主得多；彼此之間，不大十分感覺階級上的差別。還有一點，人家軍人與老百姓之間，毫無隔閡，大家玩在一堆。

要在中國，運兵的輪船，何等嚴重。至少在進門的地方，站上崗位，套上刺刀，是必不可少的現象。相反地，美國人却根本不擺出門禁森嚴的樣子。上船的門口，只坐着有兩三位下級軍官，沒有武器，沒有衛兵，偏生秩序很好。客人上下，當然拿一個通行證；可是手續非常簡單，發通行證的軍官非常客氣，令客人一點不感覺麻煩。美國人的服務精神，實在可佩。

麥格斯

麥格斯號距離黃浦灘不過咫尺，真有點叫人難信，我們的行李放在房間以後，根本門就不鎖，也沒有人看行李。要在戰後中國的都市裏，那還不早給小偷偷光。但是放在這黃浦灘的輪船上，絲毫不生問題。頭一天我們還有點優，要緊東西，抓在手裏，死也不肯放。現在看來，真是太傻，因為「這是美國！」

一個流行的故事，說是馬歇爾元帥，第一次到重慶，頭一天就把自己的公事皮包丟了。這件事中國人覺得很滑稽，怎麼一位名震一時的大將，會這樣不當心。在另一方面，從美國人的眼光來看，連公事皮包都會被偷，也真太奇怪。大將們的機密文件，根本就不會放在公事皮包裏；而從價值來看，美國人覺得皮包是值不得偷的。

上海物價的狂漲，不會影響到泊在黃浦灘的輪船。美國人向來是有備無患。船從舊金山出發往中國開以前，早就將來回旅程中客人與船員所需糧食種類與數量，精密地估計好了，再加上些富餘以作安全

保障，如此一次裝好，放在冰箱裏，然後出發。這樣雖然有時魚肉不太新鮮，沿途却没有絕糧的危險，到碼頭也沒有添購糧食的必要。

美國人什麼都講究統計與精密計算，這可說是美國文化的一條基幹。在航程當中，閒得無聊，我們隨時去看每天走了多少路。船上掛有一張大圖，上面把要走的航線早就畫好了。每天走了一段，就往上面積，一面把實際所走距離記下來。結果從頭到尾，分毫不差。到舊金山的時間，較事先公佈的，還早到了三個鐘頭。一條普通的客輪，橫渡北大西洋，全程走了十三天，時間與船線走得這樣準，實在是叫人佩服。到了美國以後，時常有機會坐飛機旅行。我們的經驗，是每次飛機總是準時間，到的時候非常準，有時會早幾分鐘到。當然沒有航檢所的麻煩，這也是在中國難以想像的幸福。每逢我們想起在中國坐飛機，常常一早四五點鐘就奉命到機場，到那裏結果連鬼都沒有，一個，冷板棧坐了好幾個鐘頭，往往弄到九十點鐘纔開，我真真是一天呀！在美國，做生意的人，是竭力把客人伺候像老祖宗一般；在中國，客人變成了孫子。

物資豐富，的確有想不到的好處。

處。麥格斯將軍號的三等艙，因為客人太多，不能排定坐位吃飯，只好輪班各人自己去拿。吃咖啡用的白糖和牛奶，整筒地放在條桌上，有時成天不收，讓客人隨便自己去用。此等情形，要在目前中國，糖和牛奶，就不偷光，也早就吃光了。可是在這船上，一點沒有問題；這些食品，永遠是有剩的。船上的客人，大都是在物資缺乏，經濟艱窘的上海住了很久的，但是並沒有人過分濫用自己的權利。由此足見，未來中國的建設，如何使物資能快點豐富起來，乃一首要條件。人類本來不是要往下走的。貧乏與不公平的分配，逼得人往下走，也逼得人走極端。到了美國，方知一直到现在，糖是美國最缺少的一樣物資。然而船公司仍然如此大方，足見他們有遠見。如果把糖一囤積起來，恐怕大家就忙着要搶糖了。

在船上過了兩個星期天。到那天美國人大部分都做禮拜。天主教和耶穌教，把時間錯開，免得彼此衝突。美國人信教，確是相當虔誠；不像普通想像，以為他們不過是例行其事，敷衍了事。尤其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信教的誠篤，在二次大戰期間以及戰後，不但未曾減低，反而更加提高了。此種情形，和

中國有很大的差別。中國人的信教，一般說來，是不太認真的（當然有例外）；戰後許多都市裏，更有純粹走向拜金主義的傾向。

對於麥格斯將軍號，至今還有一個謎，就是麥格斯將軍究竟是誰。關於這些，船上凡能交談的美國人，全問遍了，沒有一個人能回答。美國是一個歷史短短的國家，對於過去的事情，他們大都不大發生興趣。

(二) 踏上新大陸

七月十八號一清早，我們的船到了舊金山。船是半夜三點鐘就到了，清晨方纔擱岸。因為等着要看進港時走過金門大橋（Golden Gate Bridge），大家興奮得一夜不會睡覺。金門大橋——這座工程上偉大的成就——的確是名不虛傳。到今日我還記得那晚上到達新大陸時興奮的情緒。我們的興奮，主要當然不是因為崇仰這壯偉的工程，而是因為感覺到了一個新的世界。現在回頭想想，那晚上走過金門大橋的一瞥，也許是我一生對於美國印象最好的片刻。那時候自己對於美國，是抱着無窮希望，下了決心來虛心學習的。可是後來看到，聽到的許多情形，都與當初預想大相逕庭，所以不免有些失望。當然對於美

國社會的某些方面（例如美國學術界的治學精神），至今覺得能與來美以前的預料相符合，或者甚至有超過的地方。但是一般說來，美國距離烏托邦的理想，實在太遠。這種情形，當然怪不得美國。只怪自己當初認識太不夠，把美國估計得過高。

實在說來，上岸第一天，就給我們一個不好的印象；因為舊金山的碼頭上，真是亂糟糟，亂得和中國差不多。行李到處亂丟，根本就沒有人管。許多同船來的朋友們，找自己的行李，許久找不到。擱岸以後，辦入境手續，找行李，查行李，足足費了十二個鐘頭，連午飯都沒有吃。我們想，平時美國人引以自誇的效率，現在都到那裏去了。

在舊金山住下幾天，有一位在美國住了好些時候的中國朋友，開車子帶我們出去玩。路上他偶然問起，我們對舊金山的印象如何。我說一個印象，是地方非常清潔。這位朋友，一聽此話，大為驚奇。他說，美國情形，和中國完全不同。因為鄉村電氣化的結果，在美國是鄉下比城裏乾淨；而在都市當中，舊金山又是最髒的城市之一。話雖如此，大概是因為中國太髒了，當初我們的確覺得舊金山異常乾淨。後來纔發現果然不錯，有些僻靜的街道，路旁仍然有時丟着有垃圾。

董·吉·訶·德·哲·學

——冰 于——

中國的舊式士大夫從孔子那兒取得了儒術，糅合了道家的柔道，精煉出一套幫閑的手法，二千年來，中國的智識份子，不會越出雷池一步；積極的挾內聖外王之道爲帝王師，消極的懷曳尾塗中之術作隱逸士。崛起爲人民大眾的「狗頭軍師」的，乃是歷史的例外。「歐風東漸」，舊式的士大夫乃又擷取了美國文化傳統中的市儈主義，蛻變爲新士大夫階級：上焉者有意或無意的成爲董·吉·訶·德，下焉者便自甘爲「過河卒子」。

「過河卒子」之不足齒，我們且吝惜一些筆墨了，董·吉·訶·德却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盧那卡爾斯基在其名著「解放了的董·吉·訶·德」一劇中，給我們深刻的指出了董·吉·訶·德道路之不足取。董·吉·訶·德，他以惡爲善，以邪爲正，作了承認和保衛現狀的功臣，而他却不免謾爾却公爵的惡毒卑下的愚弄。然而，這個「慈悲相的武士」最後又做了什麼事呢？他放走了謾爾却公爵！下面是巴勒塔薩對他的

深刻批判：

唉，董·吉·訶·德，我並不要加重你的罪過，但是，你在這裏起了很壞的作用。我不能不直說。嚴厲的德與戈爲着要教訓一般軟心腸的人，——這種人的慈悲只會來搗亂嚴重的複雜的要十分負責的實際生活——，所以他想要把你交給嚴

厲的審判委員會。……我勸德與戈不必怎樣辦。可是，董·吉·訶·德，你不能同我們在一塊了。誰知道你，不要又起了什麼最慈善的最仁慈的念頭，……

今天的中國新士大夫階級，悠久的薰染了仁義哲學和人本主義的氣息，因而他們免不了董·吉·訶·德的哲學：

王位是神聖的。對於兇惡的王上，應當用好話去勸他，說服他。無政府比任何壞的政府還要壞。……怎樣才能夠聯合那對於別人的信仰的容忍和對於自己的信仰的熱烈的宣傳呢？這兩件事都是必需的，都是高尚的。怎樣才能夠做自己的口號的號召者，同時不要傷害別種口號的戰士？這是很難的。……我們是些可憐的人。然而，我們要直接的做好事，不管別的。

要我給你們辯護，我是不能夠的；要我罵你們，我也不能，我不能夠替你們禱告。我只能夠和你親個嘴，表示我們一般人都應當承認自己的弱點，表示我們的親愛，（對巴勒塔薩說的話）。可是，謾爾却公爵却說他：

你不過是一無成就的詩人，吃草的幻想家。……你這副吃長齋的臉……

「一副吃長齋的臉」，有良心的士大夫階級應當記住這句雖是挖苦却入木三分的話的。我們今天不是時常聽到一些好心腸的對現狀指責而又忠恕的話麼？花費一百億法幣的國大，製成了憲法；擾攘四個月由政府改組，也完成了。而烽烟四處，誰能肯定的說：三個月內能够完成軍事的統一？相反的，「已見萬民齊斬木，且看二丑獨搖旗」而已。但是，早些時，對於「二丑」之一，不也有致其原情略跡之論的麼？——這只是董·吉·訶·德之例之一耳。

致作者 編者

我們有幾件事要告訴各位寫稿的朋友：
一、來稿希望有一般性和現實性，如果學術性太重或者與時代隔離太遠，雖然有內容有份量，我們也不歡迎。

二、本刊置點重於政治、經濟及社會一類問題，希望作者在這方面多多惠稿。至於各地通訊，也很需要。

三、小說、詩歌、劇本、書評、翻譯以及序跋一類的文稿，暫時不收。

四、來稿請不要過長，最好在四千字以內，以便一次刊完；長稿即使內容好，也很難登出。短稿却可以儘先發表，而且稿酬較豐。

五、來稿務請用稿紙繕寫清楚，以便計算字數，且免排字錯誤。

六、一稿兩投，務請各位避免。

七、來稿收到後，一經決定採用，不等待發表，立刻致送酬金；如果文稿發表後還沒有收到稿費的，希望趕快來函查詢。又各位收到稿費後，務請將稿費收據早日投郵寄下，以清手續，且便查對。

八、不合用的稿件，我們很願意儘速退還，但是務請各位在來稿末註明通訊處，並且事先聲明，附足退件郵票，方能照辦。

怡豐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實業 扶助

服務 社會

總行 重慶五四路八十四號

分行 上海江西路四六七號
電話 二〇二一〇號

宏豐企業公司

分公司 漢口聯保里五號
重慶林森路一二七號

承辦

進

出

口

業

務

總公司 上海廣東路五十一號

電話 一一四五三一五

上海駁運公司

地點：上海四川中路一二五弄二〇號
電話：一三二二二四

南榮記 和記

報關行

地址：上海廣東路一二二號
電話 一〇四一八號

天隆被單



經濟實惠 美觀大方

天隆染織廠出品

對時文

和平呼籲與國民參政會……程程

最近戰局鳥瞰……葉辛

學潮壓制得了嗎……周天行

簡論當前經濟政策……周伯棟

電影批評的真實性與人情味……洪深

略論娼妓……汪靜遠

胡適的昨日與今日……伯迦

「三一八」的重演……尹行六

沙汀樓雜文(二則)……張帆

記成都搶米風潮……陳納

四季如春的加州……會昭掄

漫畫……葉苗

木刻……南堡·豫存



和平呼籲與國民參政會

程 程

五月廿日，南京又要舉行一個盛會，那就是第四屆第三次國民參政會。它是戰時應運而生的一個機關，首都有此盛會，還是第一趟。同時，政府現方積極籌備行憲，大局若照政府的如意算盤演進下去，或像目前情狀僵持下去，那末新的國民大會勢必要在今年年底召開，政壇上便會出現更新奇更堂皇的點綴品，毋須參政會再來擠趣；從另一方面假設，大局若照民主份子的願望發生變化，那末一種真正具有代表性或代議性的（Parliamentary）決策機構，不管它叫什麼名稱，總也須建立起來，參政會依然要講終正。說來說去，它又將是應運而死的一個機關，首都有此盛會，恐怕是最末一趟了。

回憶參政會在漢口成立的時候，國共兩黨重修睦誼，聯合抗戰，參政會確實算得上當日一種團結的徵象，恰如周炳琳、許德珩、錢端升三位先生所云：「自其創始，即以促成團結爭取勝利為素志」（致邵力子先生書）。彼一時也；反顧今日國事，又是什麼景象？於是緊隨三參政員的呼籲之後，立法院中有了「緊急動議」，民主同盟也正式表示要向參政會提出和平主張，各地學潮同時又醞釀着反戰要求。北方震天動地的聲鼓，畢竟罩蓋不了全國人民渴望和平的呼號，好戰者的口舌也啞喝不住黨內本諸良知的言論。

冷靜地觀察一下接二連三的呼籲，可以發覺這次和平運動的兩個特點。第一，截至現時為止，呼籲止於呼籲，大家祇喊出一個原則，要和平，要恢復國共談判，却不會提出具體主張或計劃。分析此中原因，首先是我們自來沒有一個好讓人民代表經常論政的決策機構，大家把一個天大的願望悶在心坎，太久太久了，此刻突然找到喊叫的機會，便只顧先忙着東響西應，趕上參政會揭幕的這個當口；次之，必需原則為人接受了，纔談得上具體計劃，否則一切都是空論，無補實益；最根本最重要的一點，今日的局勢實在弄得太僵，交戰兩方的意見距離過遠，中間人要提出一個折衷方案，作為和談基礎，實在極不容易，因此暫時只求抓住發表願望的時機，而對大局的實際發展還不敢空懷幻想。熱烈的呼聲下面隱然藏着一顆顫抖的寒心。人民在悲慘冷酷的境遇中過慣了，把執迷不悟的玩火者徹底看穿了。

第二，此時談和，顯然觸犯政府的尊嚴，政府必定認為這是跟它搗蛋，其實滑稽就在這裏：呼籲和平者雖然未必都對政府懷有好感，可是和平

如果真能實現，平心而論，倒是對於政府有利的。政府要達到連勝連決的目的，是任何稍識戰局真相的人斷然不敢相信的；就連恢復平漢津浦兩路的交通，看來失敗的成份也佔十之七八；可是財政經濟及一般社會情狀，現在已經險象畢露，倘不趕快息兵言和，將來真要不堪收拾。物價亂跳，漲，城市居民的生活首先受到震盪，久而久之，難免波及及鄉村，引起普遍的騷動。我們的工業特別落後，尚無強固的工人組織，教育不能普及，一般人民缺乏知識，所以青年學生天然成了社會運動的前驅。說來真慘，國事須待學生奮臂主張，社會改革須待青年挺胸倡導，環顧四海，祇數得出兩類國家：一類是被壓迫的殖民地或準殖民地，如印緬，如埃及；還有一類便是採用獨裁體制的，如西班牙，如中南美的若干國家。前一類對外爭主權，又當別論；後一類則是反抗專制腐敗的政治，跟我國一樣。例如中南美的那些國家，從政者履踐的都是一種所謂「私利主義」（Personalism），甲倒乙起，乙倒丙起，川流不息的以暴易暴，政治擾攘了幾十年，從來不會讓人民安居樂業，於是青年學子便義無反顧，不得不挺身而出，說話不生效力，還得繼之以行動。前一陣玻利維亞發生革命，那腐敗的專制政府，就是一羣學生響應了幾個軍人將它推翻的。這幾天，北平和京滬沿綫遍地發生學潮，名為「吃光運動」；可是今日一切禍害起因於內戰，已是家喻戶曉的常識，學生們盤根追究下去，勢必正面提出和平要求。政府起初因怕事態擴大，似把自己的胸襟也「寬大」了幾分，不會使用高壓手段，然而十八日的臨時國務會議，却通過了「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因此使我想到了：學潮的根源——內戰——沒若消弭不掉，司法行政部倒有變為行政院最忙一部的可能，說一句笑話，學生儘可做效印度的國民大會黨員，自動請求入獄，果真如此，中國的監獄恐有不敷分配之慮，到這時，前後方軍憲警的鎗法亂成一片，國民黨就要慌手慌腳了。國民黨只在今後的八九個月之內，或把共黨力量消滅，或退一步將它逐出華北平原和濱海區域，一面克服了政治上的死敵，一面挽救經濟崩潰和社會動亂，但據我們估量大勢，這是很難做到的。照現在前後方的情形發展下去，國民黨的優勢地位可能倒退，共產黨的劣勢地位却會好轉，雙方力量的對比經過這般的推移，由漸而驟，我們便不難揣想將來大約是怎樣一個結局。共產黨，就其政治目標來說，是十足的理想主義者，就其政治手法來說，却又是十足的現實主義者，近年審時度勢，以理想遷就現實，就因為在現

實的道路上，步履艱難，目標不可一蹴而幾；可是若有國民黨替它鋪平道路，製造出適於傳播主義擴張力量的現實環境，它又何嘗不願邁開大步，更逼近理想一步？到此田地，國民黨縱想回返政協，恐又是那時的「現實」所不許了。即使仍然出現一個聯合政府，其領導地位却可能由左翼力量取而代之。大多數人民固然不會惋惜國民黨的衰敗，可是對這一段長期內戰的煎熬，又委實忍受不起，因此便有和平呼籲；和平呼籲誠然爲了人民自身的利益，然而和平如果真能迅速實現，倒的確有助於國民黨今後的政治地位。

替政府打算，今天真是它改變對內政策的良好機會。如果倡議和平有礙於面子，有礙於「尊嚴」，也正可借仗參政會來撐持面子，維持尊嚴。參政會本來算不得什麼「代議機構」，但是政府却不妨將錯就錯，就說體念到民生艱苦，服從民意，倡議和平。可是和平必須是永久的，真正的。說是永久的，就不可重操故技，嘴裏「和平」，轉背又去磨煉用鈍了的刀子，等牠鋒利之後，準備再戰。說是真正的，就得消除戰爭的根源，切實開放政權，與其他黨派團結起來，切實替中國的民主政治打定基礎。短暫的和平，虛偽的和平，不是人民所希望的，也必然不是其他黨派所能接受的。可是大家這樣爲政府苦心打算，好戰者却偏要閉戶空想。他們仍然迷信武力萬能，認爲「修言和平實無補於現局。政府對於完成統一民主所取之途徑，絕不有所變更。」（五月十五日大公報載新聞局董顯光局長談話）換句話說，還是要打。所以我們可以預想，參政員談的是停止內戰，向國共兩方同時呼籲，政府却會把議論凍結在戰爭責任一點，要共產黨一肩去負，真所謂「牛頭不對馬嘴」；尤有甚者，參政會終究是國民黨控制得了的，主戰派的參政員還可能製造出正式討伐的空氣，以與和平空氣相抵消。這樣一來，不是我存心要潑冷水，參政會將在怎樣一種情景下散場，就不難預卜了。

參政會這個機構，自從出世以來，人民就不認爲它是屬於人民的，政府也不把它看作政府的。然而在人民眼中，它至少是政府可以隨意擺佈的；在政府口中呢，當然是所謂「民意機構」，但實際上又千方百計，把它擺佈得穩穩妥妥，保證不出大亂子。爲要製造爲「民意機構」，必須在會中羅致若干異黨人物；爲要保證不出大亂子，又必須安插許多黨內間員（即無官銜的國民黨員）與甘聽調度的社會賢達，使能控制會場。參政會彷彿就是這樣一種奇異的「雜合品」(hybrid)。這還不够，更要使牠的功能力止於在會場上（包括駐會委員會的會場）說話，專門說話；至於說過之後如何，是政府一家的事情，倘有什麼不滿，下次開會再說。

參政會組織條例有過好幾度的修正，但都不會改變它的本質。以現時

參政員的產生方法而論，一部份出於中央政府的遴選或圈定，一部份出於各省市參議會的選舉。關於前一種類的，完全聽憑政府的意旨（當然裏面要羅致若干異黨人物），那不必說；就是後一種類的所謂「選舉」，大家也知道，也祇是一個幌子，政府可在省市參議會裏發揮「黨團作用」，包辦得乾乾淨淨。

其次論到職權。第一是聽取施政報告。這照例是議事日程爲首的節目。大多數參政員對於這個節目，是不容易感覺興趣的。論其內容，中國的部長無不自誇政績，往往扯上一長串的數字，一整套的計劃，把與會者弄得耳昏眼花，越聽越糊塗。可是儘管這是一幕接一幕的疲勞報告，部長們却又無不懷有戒心。道理很簡單，參政會究竟不同於國民黨的中央全會，與會份子不同，會場空氣也就不同。開中央全會，大家關起門來說話，多發生一些派系間的攻訐，最後總有領袖仲裁「是非」。開參政會呢，數字和計劃，都是在辦公室裏依照「辦事程序」擬定的，經過部長最後判行便送出去了；至於實施狀況如何，來自全國各地的參政員，實比方步不出都門的部長清楚得多。因此，部長所怕的就是緊接在「報告」之後的「詢問」。

「詢問」(Question)與「質問」(Interpellation)不同。「條例」上所規定的職權，本來是「詢問」，足見訂法者的謹慎與戒懼；不幸實際上這已逐漸蛻變爲「質問」了。孔祥熙長財部時，每逢參政會集會，便要害一次質問病，命政務次長代爲受過，可見這一關的確不好應付。不過政府的一貫作風，就是在會期內拚命敷衍，笑罵由人笑罵，會後依然我行我素，對於參政員的意見總還是漠視的；參政員彷彿也自滿於會場上的嘻笑怒罵，平日只得漠視由人漠視，一到開會，我言我素。在會外人看來，歷次參政會的精彩多半就在這質問上面。

第三是討論政府交議的施政方針，依條例，應「於實施前」提交大會。上月政府改組時簽訂的「施政方針」，此次必定列入議程。可是我們知道那「方針」早已「實施」在案，最近政府還根據它來制定「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打算用來撲滅學潮。那末條例上的「於實施前」，又如何解釋呢？可見政府凡百「施政」都不把參政會看眼裏。我們可以預測本案提付討論時，必然牽涉到和戰問題，許多參政員都會提出修正意見，然而由於政府有辦法控制會中的多數，最後仍舊可依原案通過，除非政府自己看風轉舵，願意加以變動。

第四是提出建議案。「建議」不是法律，對政府不特絲毫沒有拘束力，還須送交國防最高委員會（現在則是國務會議）核定，通過後，才分轉行政院執行，或立法院去制定法律。不用說，參政會的這一項職權也是淒涼之極的。

一句話：參政會不過是政府一個諮詢機關，它的組織不含民主意味，它的職權又窄小可憐。但這並不是說，參政會以往在政治上毫無作用。上文說過，「自其創始，即以促成團結爭取勝利為素志」；政府假手於它，總與其他黨派有了一個溝通意見的媒介，對於團結一致堅決抗戰，不能說它毫無貢獻。其次，參政會的組織形式雖不符合民主主義，却歷來是一黨獨裁之下官治主義的對頭；趾高氣揚的部會長官，在會場中大都嚐到過一些低聲下氣打恭陪笑的滋味，這是民國成立以來罕有的事；舉些實例，孔祥熙的稱病，徐堪的道歉，盛世才的去職，都可以傳為佳話，——我們如果說，參政會是由獨裁轉變到民主的過渡時期中的產物，也許不算過份。再其次，這一個機關由於先天不足，限於職權，誠然不會導致積極性的改革，可是它在道義上精神上所發揮的力量，倒也不該全盤抹煞；譬如陳紹禹與李聖五關於「德義路綫」之爭，傅斯年對於蒙門貪污的攻擊，張治中林祖涵分別報告國共商談經過，……都把秘密的或醜態的政治內幕，揭露在國人眼前，進一步使當事者明瞭，天下事不是一手所能掩蓋的，因而有所警惕，稍微懂得點分寸。

也就因為參政會過去還能發生一些小小的作用，這次人們才對它懷有一縷希望，終於把恢復和談的天大願望呼喊出來。

和平問題成為這次參政會的中心議題，是必然的。政府凡百措施，既一概着眼於軍事，只想勝利，那末一切的失調當然也只能歸咎於內戰。內戰使一切成為僵局或「死鎖」(Deadlock)，因此，要使一切恢復正常，就祇有和平纔是唯一的鑰匙了。舍此而言他，皆為胡扯。

要聽取施政報告，應該聚精會神聽取國防部部長的，因為「國防」是施政中心，其他都是因它而存在的。其他各部所陳述的施政困難，不用說，又都是受了一「國防」之累。參政員若要提出質詢，祇須問一句為什麼要發動內戰（這可又不是國防部長所能答覆的了），其他都是枝節之間，枝節之答。討論「施政方針」的時候，不妨先把第四條關於「中共問題」討論清楚：為什麼須待「鐵路交通完全恢復」，才求「政治解決」？要提出建議案麼？那就只有和平，永久的和平，民主與和平統一起來！舍此而言他，皆沒有抓着國事的癥處。

五月十九日

關於此次學生運動，許德珩氏十九日在參政員茶話會中曾經痛切陳詞：

「此次全國學生要求免於饑餓，其動機可謂極端純正，如云此次學潮有背景，吾誠不信，如政治毫無缺點，任何背景亦不能發動此巨大之學潮。……今日讀報，知政府對學生請願已公佈一嚴厲措施之法令，復聞明日南京學生有請願遊行之舉，如用武力鎮壓，其後果將難想像，切盼政府能愛護青年，對學生因勢利導，以免重蹈「三一八」覆轍，在大會開幕之日釀成流血慘案」（見二十日文匯報南京專電）。

但是，不幸得很，流血事件果真發生了。二十日南京學生遊行請願時，大批軍警出動彈壓，寫下了一頁新的慘史：

「學生受傷甚眾，鮮血漂浮於地面澆水上，中外記者目睹若干學生被石塊木棍打倒，以脚踢踏，倒於地上之學生，甚至有骨折腿斷者，有三位女學生亦不能倖免。有一美聯社外籍記者，奮勇排除軍警包圍，將四五女生及一受傷男生救出，并冒險以開麥拉攝取真相，一部民衆觀狀，感動垂淚」（見二十日文匯報南京專電）

想不到二十年前段祺瑞在北京的故事竟然重演於今日的南京！——而且恰是在「新政府」成立後不久，行政院通令保障人權自由，和國民參政會開幕的時候！

這裏，我們需要重溫一段不愉快的歷史。魯迅先生在「無花的薔薇之二」一文中這樣寫道：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槍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爲，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會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哥薩克兵擊殺民衆的事，僅有一點相像。」

然而，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尼古拉二世的結局怎樣呢？他在革命中被人民誅戮了！段祺瑞政府的命運怎樣呢？它在「三一八」慘案後僅僅三個禮拜（四月九日）就垮台了！一個專門和人民作對的政府，還能維持多久？

最近戰局鳥瞰

葉辛

從「兩安之戰」(延安泰安)以來的近兩個月中，內戰局勢已演進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這個新的階段顯然不是證明「主要戰事不久就可以結束」(陳誠將軍向參政會駐委會報告，據聯合社三月二十八日南京電)，而是內戰的烽火燃燒得更熾烈了，國軍在主力集結的個別戰場上的攻勢已經達到了飽和點，隨之而起的是共軍在廣大戰場上的不斷的攻勢。

一 山東和陝北

首先，讓我們觀察一下舉國矚目的山東戰場

如所週知，山東是國軍主力集中的地方，使用於第一線的兵力(即直接參加所謂沂蒙山區圍攻戰的部隊)約為十二個整編師，以每師三萬五千人計算(師轄三旅，而其直屬部隊普通均在三個團上下)，應有四十二萬人，加上青島、濟南、徐州、臨沂附近的防守兵團，一般傳說總兵力幾達七十萬，是可信的。這數字約合國軍投入內戰的總兵力(二百二十三個旅)的四分之一，因此，純就兵力上說，國軍是有着絕對優勢的，國軍統帥部一直希望迅速結束這一戰場，好抽調兵力使用到其他迫不及待的戰場上去。但是進入山區之後的戰鬥却和平原上幾進幾出(泰安大汶口等地)的爭奪戰大不相同了，進攻的軍隊陷入了為羣衆所全力支持的山地的一面中，找不到

對手的主力，而山地運動的困難也減少了優勢兵力的作用。於是一個半月多的戰爭中，進行了三次「捉迷藏」式的戰役。

第一次，在四月中旬，當國軍四大兵團(兩王湯歐)向蒙陰新泰推進的時候，共軍主力大踏步南下，一度攻入臨沂，威脅台棗，贛榆，使湯恩伯兵團不得回師應援，因而攻勢中綴。

第二次，在四月下旬，國軍採取了龐大的「新行動」，「自魯南及膠濟線入手，造成一對魯西的鉗形攻勢」。但這計劃實是在國軍兵力所不能達成的，於是，王耀武兵團在明水普集首先遭受了挫折，接着共軍攻下泰安，席捲魯西，損折王敬攻兵團逾三個旅。兩王兵團在這一戰役中都受到了致命的打擊。最近的新聞報導中似乎已透露着兩王兵團或者已經過整理，而合併由王耀武指揮了。

第三次，在五月中旬，當共軍主力由泰安撤回之後，國軍由蒙陰新泰和臨沂以北展開了對山區的新進攻，企圖打通由萊蕪到淄博和由沂水到益都的兩條平行線。但在國軍預計可以遭遇共軍主力的地方完全撲了一個空，而主力戰鬥却在後方的沂水蒙陰之間展開了，因而造成了三個整編師被圍，進攻博山的國軍星夜馳援，而終不能逃脫七十四師(抗戰期間最早受美式裝備的四個攻擊軍之一)大部被俘的命運。

這三個階段的戰役，一次比一次規模大，國

軍的四大兵團每一個都遭受了或大或小的損折，戰爭的主動權始終掌握在中共手裏，山東戰場已經不是一個國軍佔絕對優勢的戰場，而變成一個消耗主力的捉迷藏的大操場了。

和山東戰場近似的是陝北戰場。當胡宗南將軍挾其十六個旅的主力浩蕩北進的時候，國軍是有着兵力上的巨大優勢的。但是，由於共軍的迴避正面主力決戰，胡部佔領延安及其以北的若干縣城，主力逐漸分散，戰爭在側後爆發，於是有了金盆灣、清化砭、瓦窰堡以南、和蟠龍鎮四次戰役，損折了約四個旅，這一支國軍的精銳竟因此凍結在陝北的高原上了。由於中共堅壁清野的徹底，國軍每月九千袋麵粉的軍需補給成了一個異常沉重的負擔，而偏就在這個時候，由延安到西安的這一條唯一的補給路線又隨時遭受共軍嚴重的襲擊，由中部縣境的佔領龍坊鎮、宜君縣境的佔領焦坪鎮，和一度攻入同成支線上的耀縣，到日昨的佔領三原(聯合社十八日電)，發展的方向日益向南，這不僅標誌着延安國軍的補給線遭受經常的威脅，而且可以想到，如果西安空虛的話(胡部北上陝北，連青年軍都有一部增援普南去了)，連它也在威脅之下呢。

山東和陝北，這是國軍會保有軍力優勢的兩大攻勢戰場，但一個多月戰爭發展的結果，說明這種優勢已經在開始失去了，也許國軍還可以再度努力集中主力，以便開始一些新的進攻，但整

個的主動權已不握在他的手裏了。

二 山西，平漢北段，豫北

緊接着兩安之戰以後開始的另一戰爭，是以山西戰場為中心的共軍的攻勢。

山西共軍的攻勢是四月三日在五台山麓開始的，隨後又展開於晉西北晉察冀各區，戰火遍燃全省。一個半月的戰鬥中，在國軍兵力雖然居於劣勢的這個地區中，起了三個重要的變化：第一，胡宗南部留在晉南的一部分兵力被吞食了，造成了十餘縣城的易手，閻錫山的部隊也被消滅了一部份。第二，迫使國軍只能退守運城、臨汾、太原、忻縣、大同等少數城市，同蒲鐵路被共軍控制了，而晉西北、晉東南、晉察冀三區共軍也因而聯成一氣，而運用自如了。第三，北起河曲偏關南至永濟風陵，再東而至平陸垣曲，所有黃河渡口都落入中共的控制中，無形中構成了對豫西陝中的威脅。

平漢北段的石門和豫北兩戰場是應該和山西戰場台起來看的。石門戰役是四月八日開始的，共軍佔領了石門外圍的大多數據點之後，相當地損折了國軍第三軍的兵力，又揮戈西向，佔領娘子關，陽泉煤礦，壽陽，直至榆次近郊，構成了對太原圍攻的一翼。豫北戰役以劉伯承部的包圍湯陰開始，而當四月中旬國軍由新鄉北攻以解湯陰之圍時，在淇縣東北進行了一次大規模野戰，據說國軍有兩個旅被消滅，其中之一旅是僅存的一個第二快速縱隊，造成淇、滑、滑三縣的易手。而湯陰也終於為劉伯承攻破，孫殿英被俘。緊接着的便是安陽圍攻戰的進行了。

山西、平漢、豫北三大戰場，是國軍兵力上居於劣勢的地區。豫北戰場因為主力調動一部分

去山東（邱清泉部第五軍），僅能保持黃河北岸至新鄉的一線；山西胡宗南部調入陝北之後，更是遍地鏖戰；而平漢北段，也只在平津三角地區中，國軍不顧一切而集中兵力時，才能造成有限的局部優勢，（如對津西勝芳鎮的進攻），但那是必然顧此失彼而且戰力並不強大的（如石門戰役之後國軍企圖打通保石段的停滯不前），而自從這一個多月的戰事之後，中共已控制了山西全省，匯合了賀龍、聶榮臻、劉伯承三大兵團，東向可以威脅平漢北段，北向則隔黃河視視海路南，晉邊境可受撼動，南向則隔黃河視視海路南，那裏李先念的部隊一直潛存發展中。更向遠一點看，以呂梁太行兩山為柱石，這個廣大地區東西兩面均隔黃河和國軍兩大主力所在的山東陝北戰場遙相呼應。因此，以山西戰場為重心的共軍攻勢，是着眼於改變整個華北的戰略形勢，它與山東陝北兩戰場上的消耗主力的戰事，同為中共高呼「準備進入總反攻」的兩大步驟。

在這種了解之下，對於太原的圍攻戰是值得用另一種眼光去加以觀察的。共軍大約不會立刻集中全力來進攻太原，那裏還有著憑藉鞏固工事達五千的日本軍隊。反之，却會把兵力移向外圍，迎擊以解圍太原為目的的國軍兵力。因而，目前值得注意的不是太原附近的戰事，而是冀西北傅作義將軍進攻涇源阜平的戰役，和可能重啓的平保保石段的戰事。

三 東北戰場

在關內軍事形勢已經轉變的形勢之下，共軍在關外的攻勢又已經開始了。

東北又是形勢不同於關內的另一種戰場。這裏是國軍另一個主力集中的地方，最精銳的美械

師集中在這裏的至少有七個軍以上（新一、新六、新八、七十一、六十、五十八、二〇七師等），這一點不同於山西戰場；但即令如此，比起林彪部的共軍來依然處於兵力上的劣勢，始終只能保守北寧、濟海及長春鐵路至松花江岸為止的這幾處鐵路線上的狹長地帶，而且自去冬以來，已遇到共軍四次演習性的攻勢。由於：一、經過了去秋以來的整理訓練，二、經過四次的「演習」的經驗，三、經過最近軍力的繼續消長，（四月初旬安東省柳河戰役，據說消滅國軍八千人），共軍是有力量進行大規模的攻勢的在另一方面，國軍是自知防守力量薄弱的。（有杜聿明只答應負責到五月的傳說），而眼前顯然沒有從國內獲得有力增援的希望。在這種情形之下展開的東北之戰，實在是值得我們密切注意的。

在目前，詳細地分析東北之戰的形勢這是不可能的，但幾日來發展的經過有幾個特點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共軍攻勢的範圍空前的廣闊，除了長春外圍的主力攻勢之外，有瀋陽路上的另一主力攻勢，（據新聞報十八日專電：清原有共軍五萬，西豐、新賓、通化、海龍電訊均不通），有遼河西岸的攻勢（同上電傳法庫被佔）。甚至有國軍遠後方共軍騎兵一度到達錦州郊外，山海關一帶風聲甚緊的消息（據大公報十八日專電）。同時，由於國軍以一部增援東北，熱河共軍便發動了廣泛的攻勢，圍場被佔，冀東也有昌黎被攻入的報導。東北大戰的確已經有一發燎原的跡象了。

第二，雖然攻勢的範圍如此廣大，但主攻的方向似乎仍放在長春鐵路東西兩側的鉗形攻勢上。進攻長春的右翼部隊在佔領懷德之後，已經到了長春近郊了。不過這種鉗形攻勢的目標，並不是完全指向長春一地的，如果前引的戰報是確

實的，那麼我們將發現在東西豐與遼源兩區，潛存着一個對四平街的鉗形；甚至在清源和法庫兩區，還潛存着一個對開原鐵嶺的鉗形。這一攻勢的規模雖然不是過去東北歷次戰役所可比較的。

第三，爲了達到上述的作戰目的，共軍似乎避開着以主力進攻國軍堅強據點的戰術，而採取極端機動的迂迴包圍戰，例如德惠農安等據點都是被繞過去的。這種戰術與日本進攻徐州時的戰法頗有其相同之處。

總之，東北的大戰已經展開了，這一次的規模是遠不同於過去的演習性的戰役的。雖然東北看起來似乎是一個獨立的戰場，但他的發展終不能不關內戰場以巨大的影響，而關內現在已無兵可調了，傘兵總隊改編爲四個快速縱隊，準備投到東北戰場上去，不正是打出最後一張王牌姿態嗎？

四 局勢改觀

放眼看戰場，局勢與去年張家口會戰以前的情形已經完全不同了。就戰略形勢上說，過去國軍在重要戰場上多能保持優勢，而現在，多數戰場上的優勢已掌握在共軍手裏，而僅有的一二主力集中的戰場也至少是拉平了。因此，在過去國軍握有主動權的地區，如今主動已握在共軍手裏了。在戰術上說，共軍經過十個月的作戰之後，在火力和機動力方面都有了飛躍的進步，過去牠多半是在誘敵伏擊中制勝對手，現在則已能不斷地進行反攻和攻勢了。而在國軍方面，雖然採取了放棄支戰場集中主戰場的補救辦法，乃至採取了集中兵力輕裝急進的突擊戰術，依然沒有挽回他基本上的劣勢。這完全是十個月來軍事發展的結果，而且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這種發展的趨向會有什麼重要的變化。而正相反，今後的速率恐怕還會增加呢。

從沂蒙山到長白山，戰火燃燒得更熾烈了，今後兩三個月中國局發展的结果將是更具決定意義的。

五月二十日晨

學潮壓制得了嗎？

周天行

五月真可謂多事之月了，繼米潮，工潮之後，學潮像海濤般此起彼伏前後擁擠，愈激愈烈，愈延愈大。學潮在我們這個多難的國家，本來並不新鮮，然而却有幾點值得我們深省的是它蔓延之廣，持續之久，影響之大。截至目前為止，它似乎並沒有終止的跡象，相反的，且有匯百川於一流之勢，這和過去一些因個別的事件所引起的學潮是並不相同的。

曾經有人說過中國的學生運動是政治變革的一個測量器；我們不能否認歷次的革命運動都是學生在打先鋒的。他們熱情，勇敢，不幸的是我們這個社會偏偏賦予他們以民族憂患的敏感，我們如果僅僅責備他們荒廢學業，受人利用，這是不公平而又有危險的。

這次的學潮是在最近內戰益烈，物價飛漲，社會極度混亂的環境下產生的，導因約可分爲三類：一、反對罷考。由個別的學校開始，逐漸形成上海的一反會政聯，再由一個地方蔓延到其他地方，以至於遍及各省城市。二、院校改制及遷校問題。例如英大要求醫學院復院，遷校，福建師專請求改院，交大的護校，藥專要求提高藥學地位，滬江、之江的要求廢除積點制，東大先修班的反對更名……等等。三、爭取自由與改善生活。例如：「五四」事件上海法學院、光華大學等校同學貼標語與憲警的衝突，大同的爭取校內自由，北平各校與青年軍衝突而發動罷課，京市各大學的要求增加教育經費及副食費所引起各大學響應的「吃光運動」，以及天津各大大學「教授貧苦，學生飢餓」的罷課醞釀。這種種醞釀因不一，然而他們感到不能安心下去繼續讀書，對現實感到苦悶則是一致的。這些問題推究原因就必然會歸結到內戰不停，政治腐敗上去。因此學潮就有一種趨向：由個別學校的問題，牽連到整個教育經費問題，再由經費問題，牽連到反飢餓，一搶救教育危機一以至於反對內戰，要求和平；這與其說它是在變質，不如說這是一種很自然的邏輯發展。而華北各大學因爲接近戰區，內戰的慘象接觸更深，因之反對內戰的口號也喊得更爲響亮與明確。正因爲他們喊出的是全國人民所要呼喊的聲音，也就愈益獲得人們普遍的同情。我們只要看北平、南師、中大、同濟以及其他各校教授最近對學生所發的同情言論，就可以看出這將引起多少正義人士的共鳴。這是一個事實：學潮正在逐漸轉向深入與普遍，罷課之風正在全國各地醞釀中。

對於這樣一個如火如荼的學潮，當局是怎樣處置的呢？當局的處置是：始則阻撓、拖延，繼則禁止，高壓。前者例如：力阻英大、交大的晉京，對大同、之江等校無政府狀態的不聞不問；後者例如明令開除英大學生以及最近國務會議通過的「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與蔣主席最近宣佈整飭學風的談話，我們會對於這消弭學潮的辦法，不能不深深感到憂慮。

前面我們已經指出學潮的基本原因主要是他們的生活不能安定，對現實感到苦悶，即連國民政府自己，也承認「邇來的物價波動，影響民生」（見國府十八日命令）其實這種不安與苦悶早已存在於全國人民的心中，不過學生比較坦率，不太一世故，敢於用行動訴說自己的苦痛罷了。我們要找類似的例子也並不困難，例如：中大劉慶雲、吳世昌、賀昌羣等十二教授發起聯合各校向教育部要求解決生活問題，東湖大教授的罷教，上海大學教授會理事劉大杰響應中大、山東、河南、湖南各大大學教授會呈請要求合理待遇，清華、廈大、浙大以及京滬小學教師的請求調整待遇，青島公教人員發起的活命連鎖，聯合總請假，交大教授的響應中大教授宣言等等，這些不過是同一問題

兩種麻木

張帆

——沙汀樓雜文之一

經由長時期的專制統治過來的中國人民，經由變本加厲的法西斯式的反動統治所統治着的中國人民，必然地有了一種近乎天賦的驚人的忍受欺壓和折騰的能力，他們已經把無盡的剝削和迫害家常便飯地打發着了。在第三者看來，這簡直是奇蹟，但其實卻只是麻木而已。

但，另一方面，那些騎在麻木了的人民身上的統治者，也往往是麻木了的。祇是，他們的麻木，不是由於痛苦的忍受而來，而是他們殘酷的統治政策執行的結果。他們簡直已不把欺壓，殘殺等等看作一回事，甚至把欺壓，殘殺等等視作一種習慣或嗜好了。在旁人看來，這是瘋狂，但其實也不過是另一種麻木而已。

這兩種麻木，是互相滲透着，互相影響着的。

由於統治者麻木地執行他的反動政策，給予人民更多的痛苦，更大的折騰，使人民陷於更深沉的麻木狀態；而人民這種愈趨愈深沉的麻木，也同時助長了統治者肆無忌憚的殘酷行為，亦即助長了統治者的麻木。

可是在這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過程之中，有一點是非常顯然的，而必須指出的：那愈趨深沉的人民的麻木，發展到最後，卻會突然轉化而為清醒和警覺，而終於爆發而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而統治者的麻木，卻永無轉化的可能，因為殘酷與麻木同在，而要統治者放棄殘酷的統治政策是不可思議的。但這不是說統治者的麻木是不可能消滅的，祇是，它必須隨着統治者本身的消滅而消滅吧了。

人民的麻木，因此，是一種力量的蓄積，當它一旦爆發，則無論是多麼頑強的統治者也必將崩潰無疑，而於此，歷史也必然將展開新的一頁。

的多種表現。如果我們說學潮是受共黨直接、間接之策動，難道這些「為人師表」的大學教授們也是受人利用，存心搗亂不成？如果社會動盪的基本原因依然存在，而當局不能作有效的措施與改進，恐怕這不是一紙文告，幾條辦法所能安定得下來的。

但是「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終於由國務會議通過，國府十八日明令公佈施行了。這辦法與其說它是在消弭學潮，勿寧說它是在激動更大更烈的學潮，因為這辦法除了標榜出觸犯刑法將用刑法治罪以外，實際內容祇有兩點：一，除了以十人為限的代表可向主管機關陳述意見外，禁止罷課、罷業、罷工。二，賦予各主管機關以「緊急措施」或解散的權力。這辦法是不是違反今年一月一日公佈的憲法第十六條「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我們姑置不論，但是這是一種硬性的壓制政策大概是看得出來的。然則壓制就可以消弭學潮了嗎？

公佈這個辦法以前，當局想必考慮到公佈以後的後果只有兩種可能：一，就是學生就範，從此掩息旗鼓，不再行動。然而在這樣一個情緒激動，範圍廣大的浪潮高峯，目的未達不能立刻止住，是個問題。二，萬一不能止住，那麼如果不是當局再一次威信掃地，就是採用所謂「緊急措施」造成更大規模的衝突與流血，這是維持社會秩序，抑或是破壞社會秩序，筆者深感懷疑。

根據過去的教訓：「學生運動所遭到的壓制愈凶，則反抗愈烈。因為有熱情有正義感的學生往往因此而同情被迫害者，而對迫害者便由憎惡而仇視。倘再予以嚴酷的處置，則學生的行動愈堅決，愈高明。例如：昆明西南聯大會遭到刺刀與手榴彈，死傷多人，而其運動愈見蓬勃。」一見（時與文）第四期向曉「目前的學生運動」同樣，我們也想到北平「一二九」的學生運動。事實告訴我們：學潮不能用槍桿去鎮壓，如果槍桿可以永遠壓得住學潮，那早就天下太平了。

學潮的發展既有它客觀原因與時代背景，賢明的當局，似乎不宜用「紅帽子」輕易亂套，這，只能收到一個效果：就是把大多數的純潔青年驅向更極端的路上去。如果說政府還要爭取青年，那末應該想一想過去這許多處置學潮的辦法究竟有多少收穫，還不够令人深省的嗎？

不幸得很，寫到這裏，獲讀晚報載：「首都學生七千人為搶救教育危機聯合大遊行，遭軍警暴力衝擊，演成流血慘劇，學生被毆傷者達十餘人，被捕亦復不少，中大一學生且已致死。」不禁令人心寒。如果這就是當局公佈「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的初意，我們只有慨歎：「夫復何言！」



生活守望

甫堡刻

簡論當前經濟政策

周伯棣

一、引言

我國目前的經濟，已到了狂風暴雨的緊急階段。每一風潮的襲來，總是驚心動魄，震撼整個社會，其強度一次強似一次，其週期一次短似一次。在這狂濤巨浪之中，不知有多少人慘遭沒頂，有多少企業陷於瓦解。

自然，一切病態，發源於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又發源於財政上的失去平衡；財政之所以失去平衡又由於內戰之未能停止。但內戰爲什麼不能停止呢？這却由於社會經濟本身，孕育着內在的矛盾，保有不可調和的利害衝突。

我們只希望在經濟政策上，能消除若干內在的矛盾，能解消對立的利害衝突，那麼戰爭也許可以消弭於無形，和平也就可以不求而自致。茲就其重要者論列數點。

二、土地政策

中國還是一個農業國家，最大的產業是農業，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業人口，所以確立土地政策，藉使耕者有其田，實在是最重要的基本國策。但我國的土地多集中於地主，「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錫。」，有田的地主，不自耕種，於是租賃於人，坐收租息，在此種情形下，土地不克改良，地不能盡其利。無田的農人，欲耕無田，於是只好向地主低頭，出極大的租息，馴

致威脅到最低限度的生活。

國民黨的政策，是以地價稅，稅去地主，以二五減租節制地主，并以保護佃農。又以徵借徵實重課地主。在這種情形下，中小地主確被打倒了。大地主却還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是得益的，却並不一定見佃農，在許多省份，却還是永佃權者，這種永佃權者，雖沒有土地所有權，但有永久耕種權，地主除非兼有那個永佃權，則雖有所有權，也不能自己耕種；而永佃權者有了永佃權，即使自己不耕種，也可租給佃農耕種。

在上列的情形下，土地的所有權可與土地的使用權分離買賣。地主有收租之權利，有納稅完糧之義務。至永佃權者，有使用土地之權利，有繳納地租之義務，但其地租可轉嫁於佃農，於是佃農受兩重之負擔（地主的與永佃權的），而永佃權者却坐收漁翁之利，對國家却並無租稅的負擔。地主因二五減稅而受損，因徵借徵實而陷於貧困，永佃權者却因轉嫁而豐足了。所以打倒了地主，並沒有扶植了佃農。在這種情形下，仍不能達到耕者有其田，或地盡其利的目標。

筆者之意，以爲今日之土地政策，在都市應儘先實行累進的土地稅，藉以稅去地主，使普通的市民也可買得起土地；在農村，一方面須實行二五減租，他方面還須限制永佃權，使永佃權者只能自耕，要是轉租與佃農耕種，其地租應歸公

有。這樣消滅了中間階級，又控制了地主階級，那麼佃農的利益自然得到保障了。

做到了這一步，地主逐漸出賣土地，土地必逐漸流入於佃農。在這過程中，自然需要土地金融以扶助佃農；佃農進而爲自耕農，土地集中的趨勢，日益緩和，土地的利用自然日益促進了。消滅大地主，扶植自耕農，地盡其利，耕有其田，該爲土地政策的中心目標。

三、財政政策

講到財政，因爲是內戰的關係，目前是一個大赤字。填補赤字的方法，可能有三大政策：（一）是租稅政策，便是靠增加舊稅或舉辦新稅以彌補赤字；（二）是公債政策，便是靠發行公債，一方面以彌補赤字，他方面以灌溉實業。（三）是膨脹政策，就是實行通貨膨脹，藉印刷機來籌集國用。

在上列三大政策中，租稅政策的運用，極爲有限，這因爲近年以來，租稅收入的比重頗不重。民國二十五年租稅收入占歲出總額的百分之七十，自抗戰以來最高不過占百分之三五，最低占百分之二十，普通是占百分之廿五。所以實行租稅政策即使如願以償，亦是無濟於事。況在此惡性膨脹時期，「物稅」愈增，物價愈高，經濟將愈益失衡，而工商企業將愈益蕭條，失業問題將愈趨嚴重。反之，如增加「人稅」，則薪資所

得稅的收入有限，營利事業所得稅，則自查定到納稅，滯納堪虞，且近年以來，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以簡化稽征，已由事後稅變質為事前稅，更由直接稅轉化為間接稅，則其加稅之結果殆與間接稅（物稅）無異。於是有的學者主張征收財產稅。此處所謂財產稅為指一般財產稅（General property tax）而言，則一般財產稅之弊，久為美國試驗所證實，一般財產稅是一個惡稅，我們不宜採行。如為臨時財產稅（Capital Levy）則祇宜征收一次。宜用以整理債務，不宜用以補充國用，且宜行於戰事完了之後，不宜行於內戰方殷之日。財產稅是最善於逃稅的稅，尤在租稅技術幼稚，干戈擾攘的我國，徵收起來，所化的費用很大，所得的效果不多，而其流弊與紛擾恐怕是特別重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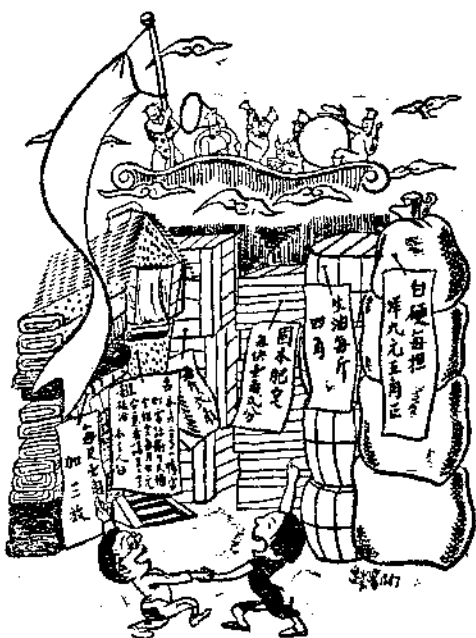
第二個是公債政策。要實行公債政策，必有賴於公債之消化，申言之，近世因金融市場的發達，公債的發行，不用公募法，而用銀行承受法。政府以總預約券交給中央銀行，中央銀行便撥給政府一個存款，政府有此存款，然後逐漸開發支票，提用存款，在逐漸提用的過程中，政府存款減少，商業銀行在央行存款增加，後經商業銀行開出支票提用存款，於是商業銀行在央行之存款減少，而企業家在商業銀行之存款增加。及至企業家在商業銀行提取存款，於是存款減少，鈔票流出。與設定政府存款（在央行）相先後，央行必以公債逐漸行銷於市場。於是先之以商業銀行在央行存款之減少，終之以市場鈔票的回籠。故因承受發行，創造信用，墊發鈔票；因公債消化，收縮信用，收回鈔票。如公債能盡數消化，

則通貨決不膨脹；但按之實際，公債消化有個限度，超過了限度，便不能消化，於是公債便得沉澱，那沉澱的公債，便成為膨脹的原動力。

第三個是膨脹政策。公債政策超過了公債消化的限度，固然還可用人為的方法，例如發行強制公債，發行外幣內債，統制金融，統制資金等方法，以促進公債的消化，但這些方法，亦仍有一個限度，超過了一定限度，便不能不由公債政

小市民狂想曲

葉苗



策以趨於通貨膨脹，便是直接膨脹通貨（不必經由公債），以濟國用。

膨脹政策是最易走，却最不可走的一條路。但「飢不擇食，渴不擇飲」，「飲既止渴」，在所難免，德國一九二三年的財政收入有百分之九十靠通貨膨脹，馬克的價值跌至一萬億分之一，其流弊之大，是盡人皆知的。

在我國當前的財政政策上，租稅政策效力已不大，目前整理租稅，與其為了收入的目的，將

毋寧為了公平的目的。公債政策亦已到了陸地行舟的階段，費力甚多，消化則難。至於通貨膨脹，為我國實際上的收入中心。但這是流弊太多的政策。

我國承着勝利之後，出賣敵偽產業，以及出賣黃金，曾經為一個重要的財源，但在目前這些收入，亦已枯竭。目前惟有出售公營事業，當還有些收入，但這亦是不能持久的政策。

總而言之，在我國目前財政政策上，殊無適當的出路，惟一的出路，只有停戰。停戰裁兵，減去百分之八十的支出，財政始有辦法。

四、金融政策

我國歷年以來，走着膨脹財政的路。於是通貨大量的發行。這些增發的通貨，以行政費軍事費的形式，灌注於消費者之手，於是生產不增，游資泛濫，投機激烈，物價狂跳。政府為收縮通貨，一面訴之於黃金的拋售，一面緊縮生產貸款的給與。在這種的金融政策下，膨脹於消費，緊縮於生產，整個社會陷於不景氣。

自近月以來，黃金之拋售停止，而膨脹於消費依舊；所不同者，政府對於生產貸款的貼放，已較為熱心。但這些生產貸款的來源仍有賴於通貨膨脹，至此通貨膨脹分兩路發展了：一為財政的膨脹，一為產業的膨脹。兩路膨脹，膨脹自然更烈。但產業的膨脹須與國民所得相配合，那麼多生產多消費，經濟均衡，社會繁榮。無奈目前物價的上漲率與所得的上漲率相去太遠，購買力薄弱，於是產業亦早已達到充份就業的程度，過此以上灌注以生產貸款，無非是競購原料，抬高原料

胡適的昨日與今日

伯迦

在去年十一月滿天烽火瀾漫中召開的國民大會裏，過主席的胡適之先生，從小民們的眼裏看起來，更是顯得炙手可熱了。

國民大會裏，胡先生以「社會賢達」、學者名流、文壇宿將的姿態出現，所以他是更扮演得有聲有色，而且更特別令人注目的。我們且不去談關於他另行組織的「論言」，就單看他那一首「過河卒子」的詩，無疑的，胡先生對於實際政治還有很大的興趣；並不為他「偶有幾根白髮」及「心情微近中年」，而放棄他五四運動時竭力提倡的實驗主義的一點一滴的政治改革，或許他也還沒有放棄他在民國十一年那套「好人政府」的主張，所以他對今天的政府，仍然天眞地懷着熱望；他曾經這樣表示過：「雖不贊同用憲法來統一，但是憲法却是建設好政府的必要前提」。現在一部憲法已經爭到手了，他還不應當稱心滿意？

零六天，在當時的胡先生說來却是「差強人意」的。今日的情形又何嘗不然，全面性、真正代表人民的聯合政府沒有組織成功，換了一個三黨聯合訓政的政府，在胡先生看來也是「差強人意」吧！當「五四」這一個各階層的聯合爭取民主自由的潮流奔騰澎湃的時候，胡先生以一個新維新派的學者的身份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他將杜威的實驗主義搬到中國來，成了道地的改良主義。他是反對根本改造的。這種脫離了以人民為基礎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與康梁的維新運動實際上並沒有多大的差別。他所謂的立憲雖與康梁所主張的君主立憲不盡相同；但是，他們的目的在根本上不會有多大的差異的。康梁的維新，一方面是幻想就此打破滿清萬世一統的奴役漢人的統治權；再一方面，又恐懼國內革命潮流蓬勃興起，取締了士大夫們在社會中的地位。胡先生，我們知道，在他主辦的努力週報中，是對民國十一年上海八團體的國是會議的制憲表示恭維的。這完全是當時想用「法統」一自治」一類的法寶來

削弱軍閥們的政權的主張，他們一方面是妄想衝破軍閥們的武力統一；而另一方面，又是害怕爭取民主的人民革命的興起把他資產階級的身份在大革命中沖掉。所以他說：「大革命——民主主義的大革命——是一時不會實現的，希望用大革命來統一，是畫餅充飢」。又說：在今日唯一正當而且便利的方法是從速召開一各省會議，集各省的全權代表於一堂，大家把袖子裏的把戲都攤出來，公開討論我們為甚麼不能統一，公開議決一個實現統一的辦法」（胡適文存）。康梁的維新運動還找到了一個傀儡式的光緒皇帝為依靠，可憐的胡先生，在反動軍閥們因國際帝國主義的支持而形成割據的局面之下，是一籌莫展的。他拜見了滿清皇朝留下的孽種——溥儀。而且他得很得意的說過：「他（指溥儀）稱我為先生，我尊他為皇上」。但更可憐的，他又演不出一幕像張動式的復辟的怪劇。胡先生是善變的。復辟的醜劇既不能演出，他又看準了安福系的國賊頭子段祺瑞召集的善後會議。這一個會議是孫

的價格，從而是抬高製品的價格。至於生產量却因受消費量（消費量受制於所得量）的限制，不可能增加，如要增加，必須降低其價格，則邊際生產者無利可圖，仍會放棄其生產。所以生產貸款在物價、所得、消費量、生產量不均衡的狀態下，仍不易有助於生產，結果生產貸款，很可能以低利得之，以高利轉貸之，這一轉貸的結果，又轉加了游資，流入於投機市場了。

依據上述的理論，要緊縮，必須緊縮於財政，尤其必須緊縮於軍費，要膨脹，與其膨脹於財政，毋寧膨脹於產業，但膨脹於產業須注意到生產與所得之均衡。如生活指數凍結，產業工人的所得低落；公教人員的待遇菲薄，白領工人的購買力薄弱；在這樣的情形下，過份擴充生產貸款，只是抬高物價（因原料貴物價貴），並沒有助於就業與生產。

寄語政府，要擴充生產貸款，同時還得解凍生活指數，與改善公教人員的待遇。

五、物價政策

一般說來，物價隨着膨脹以俱漲，而且物價騰貴的速率，大於通貨膨脹的速率。德國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通貨膨脹率為一五〇〇億倍，而其馬克價值，則跌至一〇〇〇〇億分之一。我國的物價如以戰前為基期，平均上漲二萬倍，而通貨的膨脹率，據估計還不到一萬倍。這兩種速率的剪刀差，便說明了大眾生活的苦難。他們淪陷在貧窮線下，掙扎在飢餓線上；印刷機的後面，埋伏有斷頭台，社會的危機，實一天深似一天。

因此，政府為壓平物價，實行過種種的物價政策。例如平價政策，政府以第三者的立場平定市場的價格；議價政策，政府與商人協議價格；限價政策，政府定一個最高價格，禁止其上漲。平價政策，發生黑市；議價

中山先生拒絕參加，而且爲全國革命人士所猛烈反對的，然而胡先生却以他資產階級改良派的面目參加了。這一些史實完全表現出當日自由資產階級的矛盾心理和自私自利的性格。歷史是無情的，胡先生的「好人政府」「聯省自治」等等改良主義形式的主張終歸失敗；而且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聯合統一陣線所發動的大革命的成功，對胡先生又是多麼大的一個諷刺？

在胡適文存的一這一週一上，胡先生充分發揮了他改良主義的一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調子：「我們因爲不信根本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不談主義，只談問題」。自然，對於問題，我們應多多研究，但是我們却不能忘記，從主義創造出來的理論應當爲我們行動的目標。我們應當從一個理論的基礎出發，去觀察和解決實際的問題。徹底的革命性的改造的工作是艱鉅的。但歷史證明，這並不是不可能。而歷史上却常常表示出：妥協性的點滴式的改造，常會變爲反動的統治階級的俘虜，被利用，被支配。當然，胡先生在語言運動上，乃至在反對封建舊禮法的鬥爭上，却會以革命的雄姿出現的。在胡適文存一

不老一上，他會用新的辭令喊出了譚嗣同在幾十年前就喊過的口號：「一，養成一種歡迎新思想的習慣，使新知識，新思想可源源進來；二，極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養成一種自由的空氣，佈下新思潮的種子」。他對第一個揭破專制政治及家族制度的血緣的吳虞先生，非常讚賞，舉爲「四川省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在他寄吳又陵先生的書裏：「先生廿年來與惡勢力宣戰，惡勢力現在借刀報復，自是意中之事。但此乃我們不可避免的犧牲，我們若怕社會的報復，決不來幹這種與社會宣戰的事了。……自由不是容易得來的，自由有時可發生流弊，但我們決不因爲自由有流弊，便不主張自由。……這些話都是當日青年學子們的指箴。但是胡適，他究竟是傍徨於革命與保守之間的自由資產階級的典型人物。他也反對當時封建貴族專制下的舊社會的文化，他也熱情地表現出戰鬥精神，但爲了他政治上妥協性的限制，他總不及當時急進的小資產階級陳獨秀的徹底，陳的攻擊孔教，把它看作專制政治的基礎；他又不及吳虞的深刻，吳的攻擊孔教，把它看作腐敗禮教的基礎。陳獨秀與吳虞都動搖了封建勢

力最古老的精神，而胡先生的政治上的改良性及偽裝的文學上的革命性的兩重矛盾，却實實在在反映了當時軟弱的資產階級的兩重性格。海外九年，帶着三十一個學位榮譽歸來，胡先生爬得更高了，一會北大校長，一會又國大代表。當胡先生歸來的時候，也是國內民主運動高潮洶湧的時候，胡先生對於這些事情似乎淡忘了，漠視了。他兩年以來，一方面向國內反動的統治集團盡力鑽營，以謀在國民大會中「接受」和「呈獻」那一部所謂民主憲法；另一方面，却有意地在知識界中，以一個「活寶」的身份，阻抑對外反帝國主義對內反專制集團的民主運動的發展（如去年底胡適忽略了政治性及社會性，而單自法律方面對沈崇案的解釋）。這一大堆不可掩飾的事實，給我們替胡先生評定了身價：胡適就他那一點改良主義的精神，也已慢慢喪失了；他的弱點已經完全暴露出來；況且他所謂的改良主義，也即是機會主義的代名詞。他只知道與統治階級的反動政權合作。胡適拋棄了人民大眾，走上腐化的資產階級壓迫人民的道路，在今天文化界正提出一向人民學習，爲人民而文藝，及來自人民大眾的思想才是革命的新思潮一時，他更顯得被拋於牆外了。他已成爲民衆的敵人，應予打倒的對象。

政策，價廉議漲；限價政策，因全面限價無法實行，乃用局部限價，但局部限價的結果，使受限價之物資，匿不上市，結果是有行無市，使消費者發生恐慌，結果還是賴黑市以濟其窮。

如上所列，可知在通貨膨脹下，要實行物價政策，是極難奏效的。不過雖沒有絕對的效果，却也不無相對的效果。要是重要的物資完全沒有限價，那麼重要的物資將成爲囤積的對象，結果價格飛漲，因亦領導物價飛漲了。

所以限價還是需要的；不過限價不能太硬性，限價能與議價相並行，較爲合理。

平定物價的方法，最好輔之以配給政策，庶可減殺囤積，限制消費；但配給政策，須有高度的技術，如技術不佳，則流弊至多。我國配給政策之遭人詬病，並非由於配給制度本身之不良，實因在行政上在技術上有不少的缺點之故。

六、結語

關於經濟政策，方面甚多，此處只說了重要的幾點。此外如貿易政策方面，對重要原料品（我國不能自產的原料品）不應採取嚴格的進口許可制，此類原料，進口杜絕，價格騰貴，因此其製品亦隨以漲價，例如外棉進口減少，國內棉價暴漲，於是紗價亦隨以漲價。出口貿易則不能嚴格的採行結匯制，出口外匯結匯制下，輸出商無利，輸出自然銳減。次之，外匯政策方面，法價與自然水準相去太遠，則出口貿易受阻，進口貿易促進，國際貸借愈益逆調，外匯資金隨以涸竭。但匯價提高，却影響物價高漲。匯率應定於那一點，亦爲一不易解決之問題。

要而言之，在經濟政策的各方面，遇着種種困難問題，值得我們研究。 三六年五月十六日完稿

娼妓是男性中心社會私有財產制下交換經濟發生後的產物。

娼妓在人類社會中，沒有身體的自由、生活的自由、意志和感情的自由，沒有人格的平等以及凡是一個人應該享有的一切平等。它雖然具備

著人的形象，但僅是「人的形象」而已，在社會上被視為「商品」或「洩欲器」；它的作人的條件和對社會的權利義務，已經被剝奪罄盡了。

它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污點，也是我們社會中一個嚴重的問題。

娼妓論略

汪靜遠

在人類社會中為什麼會有娼妓存在着，而且現在它的數量還在不斷地、「加速度」地增加？這是否像許多「老古董」所說的她們是「賤骨天生」的原故？或者是宿命論者說的冥冥中有命運之神支配了她們的原故？不！決不是這樣的，這種現象是不合理的社會的政治、經濟所造成的，她們是不合理的政治、經濟制度下的犧牲者！

現在讓我們來翻閱人類的歷史吧。

母系社會隨着氏族社會的崩潰而解體，代之而興的是父權、父系、父治的男性中心社會，從此女性被帶上了奴隸的枷鎖。

封建社會給與女性的侮辱，不僅是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束縛；而且壓根兒就沒有把女性認為是人（社會的），祇把她們當作是一種「物品」，可以把它佔有的數量來表現社會地位的高低。在這種社會意識形態之下，因着交換經濟的發生，原始商業資本的出現，商人離鄉背井得不到性的解決，娼妓就應運而生了。中國春秋時代的齊國，在大理財家管仲執政的當兒，就首先實現了公娼制度（女閭）。這是因為當時齊國的商業資本相當發達，爲了適應商人的需要而產生的。以後

商業資本更形發達，娼妓在社會上的數量也日見增加；娼妓和商業資本成了分不開的聯繫物。可以說，娼妓的產生，雖然有它的社會、政治的背景，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建築在商業資本上面。中國東南沿海娼妓特別發達，就是因爲那裏是財富之區，資本集中、商賈薈萃之地的緣故。

人權宣言發表了，自由、平等的歌聲響徹寰宇，資產階級的革命結束了封建社會的過程（相對的）；社會的矛盾，轉入資本家和勞動者的對立。這時人類在形式上雖然算是自由了、平等了，但在實質上却有更不自由、更不平等的事件發生——資產階級挾其優越的經濟地位加緊並擴大了對無產階級的榨取。世界上除了少數的資產階級外，大多數的人都免不了匱乏的威脅；沒有經濟的自由，形成極端貧富不均的現象。因而使娼妓更形發達，而資產階級無恥荒淫的需求，更刺激它的數字上漲。

到這裏我們已經明白了：娼妓是以男性爲中心的資產社會中私有財產制度派生出來的，她們

是不合理的政治、經濟形式下的犧牲者；我們還能相信她們是天生的「賤骨頭」或者是命中注定了要爲娼的嗎？

中國經過鴉片戰爭以後，閉關自守的藩籬，被帝國主義的炮艦政策所衝破；百年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使中國社會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階段——封建的色彩既未完全消除，又淪爲帝國主義列強的「附庸」、「尾巴」。在這種變重壓榨之下造成了農村破產、民生凋弊、文化落後、政治腐敗、社會風氣澆薄和社會秩序紊亂的各種慘景；加以帝國主義資本的輸入，和中國的買辦資本相勾結，狼狽爲奸，使經濟集中於都市，不管在商業上、工業上均形成壟斷的形式，因而加速了農村經濟的崩潰和工商業的破產，以至成千成萬的工人失業，無數的農民流離失所。因爲經濟集中都市的結果，引得失業和破產的工人、農民，羣集都市謀生；可是容量有限的都市各種職業，又不能夠完全容納下這麼多人的數量。於是社會上的乞丐和盜匪增多了；然而在傳統的重男輕女的社會習慣之下的女性，作乞丐、作盜匪的機會都沒有男性那麼自由。因之，在廣大的失了生活保障的工人、農民羣中的女性，多數被迫不得不走上賣淫的道路（私娼大量出現）——以肉體和精神供給別人蹂躪的犧牲，來換得最低限度的溫飽。

中國是一個文化落後、教育落後、知識水準低下的國家，一般人均缺乏知識。娼妓的存在，不過是供給官僚、地主、資本家、士劣、流氓的玩弄、消遣和唾罵而已；很少人把它認爲是社

會的嚴重問題而思澈解決它，而且還下意識地默認了它的存在；又因娼妓本身對於社會的副作用，甚或使一部份人不知不覺地跟着它的道路走上。

戰時及戰後的通貨膨脹和官僚資本肆虐，使得物價高漲，生活困難，從經濟總崩潰的跡象。這時娼妓的數量不但激增；就是「質」的範圍也跟齊擴大，包括了各階層的女性——自無知無識的農村婦女以至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或因生活的逼迫，或眩惑於虛榮，或意志不堅定，都被捲入了旋渦；而且這種現象還在不斷地發展。

人的思想、意識是被客觀實踐所決定了的；娼妓的生活過得久了，使她們的思想、意識也起了變化；不但不覺得這種非人生活是可恥、是苦惱，反而覺得非常輕鬆。不用多大的勞力，可獲得相當的「代價」。這種現象，也會加速它自身體積的膨脹。

近年政府申言禁娼，初步是管制，最後完全禁絕。可是事實告訴我們，娼妓的數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愈禁愈多。因為娼妓是有它的客觀的社會背景的，決不是一紙法令所能禁絕，除非是根除了它的客觀原因——不合理的政治、經濟制度。

中國古代的政治家管仲曾經說過：「倉廩實而知禮義，衣食足而知榮辱。」漢代的晁錯也會說：「飢寒至身，不顧廉恥。」要使娼妓絕跡，首先必須改善社會的經濟生活，使她們沒有匱乏

的威脅；不然要叫她們餓着肚子、凍着身子來「講道義、說仁義」，等於「緣木求魚」，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現在要改善社會的經濟生活，必須要先改善現存的經濟狀態——徹底消滅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以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但這又必須要民主政治真正實現了以後才會成功。因為不民主的政治，就是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的保母！

其次，喚醒娼妓本身的麻木，改正一般人對它的認識，也屬必要。假使祇有客觀的條件，而缺乏主觀的努力，還是不會成功。這又非提高文化、普及教育莫辦了。

不過，這些都是暫時性的辦法；最根本的策路，還是加速男性中心社會和私有財產制度的死亡。在生活民主化、一切共有、共享的社會裏，娼妓才不會產生！

自人禮宣言發表到今天，百餘年來，許多志士拋頭顱、灑熱血所爭取的，不過是人類的自由解放。所謂人類的自由解放，應該不是一

部份人的解放，而是整個人類的總解放，娼妓的存在於現社會，即表示了佔全世界人口二分之一的婦女還沒有達到完全解放的目的，也即是整個人類還沒有真正的解放。

卅六、四、廿六、于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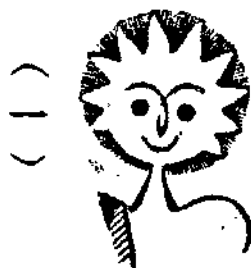
人市

諷刺



電影批評的真實性與人情味

洪深



有一個時期，我們大家寫抗戰劇本，幾乎是千篇一律地描寫那正規軍的作戰，或那遊擊隊的襲擊，或那偽軍偽警的及時反正，或那受害人民的自發的與有組織的抗爭——總之，從公開的作戰，到地下的鬥爭，都是以正面的直接的抗戰行動為題材的。劇本的結局，有些是寫那作戰襲擊反正抗爭的成功；有些是寫那至死不屈的成仁；並有一部份寫述剛良的人民，最初懷着幻想，以為在敵偽統治之下，仍可委曲求全地過着他們的生活，不公開地反抗，而內心也不投降屈服，在可能的範圍內保持一點正氣正義，但逐漸地由於身受或目覩敵人對於我們的不斷的殘酷的迫害，終於覺悟敵我不能並存，遂

不辭犧牲地毅然參加直接抗戰的陣營了。這樣題材與這樣結局的抗戰劇本，在當時所發生的教育作用，是不可埋沒的。它們堅強了衆人的抗戰必勝的信念；它們啓發了人民對於敵偽的多樣鬥爭的方式；它們透澈地告知了敵後以及大後方的人民，抗戰必須是澈底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一日不倒，中國人民一日不得安寧，當然不可能有幸福，甚至不被允許生存。

(一)

如果後來我們大家對於這類劇本，不再起勁多寫，當然絕不是因為主題本身不正確，也還不是因為演出效果的單調，而是由於它們的不够反映整個現實。它們的範圍，太狹隘了——抗戰是全面，全民的；但這些劇本未寫全面，未寫全民。祇拿一個兵來講，要使他能够在火線上有效地作戰，是否應該他至少吃得飽，着得暖，手中有武器可用？

如果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武器敗壞缺乏，是否會得法不利地影響抗戰？那麼，耕田，織布，製造武器，是否也為有效抗戰的絕對不可少的部分？那麼，凡是鼓勵人民，在工場里，在田里，在家庭里，努力生產，增加生產，儘管劇中一點不表現在前線或敵後，殺漢奸殺鬼子的，是否還是很好的非常須要的抗戰劇本？再之，當兵的人是否會有父母妻子兒女？父母妻子是否仍得生活？兒女是否需要教養？不當兵而在家里田里或工場里生產的人，是否可以停止一切正常的人事，如結婚生子之類？這些是否也是有效抗戰的絕對不可少的部份？如果沒有獲得合理的處理與解決，是否會得甚不利地影響抗戰？那麼，男女相悅，結婚成家，生育與教養兒女，學習手藝，勞力營生……如是種種，一日二十四時中，每一人的每一行動，是否都與抗戰的成敗有關？每一人的每一行動，是否有某些方式，可

能有利於抗戰的；而另外某些方式，可能有害於抗戰的，儘管它們的影響是細微而間接？那麼，凡是劇本，在這些方面，鼓勵與指點大家，合理地處事，好好地做人，使得大家的任何行動，都在無形中有利於抗戰，而不致間接地有害於抗戰的，是否也真是極好的抗戰劇本？不從多方面去教育觀衆，而老是一套正面的直接的抗戰行動，這樣創作的態度是不現實的；這樣寫成的作品，倘使再是由於怕人責備爲什麼不寫抗戰戲劇而勉強從事——請注意這個「倘使再是」——那便難免要成「八股」了。

(二)

抗戰八年中大多數的劇本不曾成爲八股，我以爲當時的戲劇批評的真實性與人情味，是有莫大的關係的。更具體的講，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北京人」，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都僅僅要求觀衆合理地處事

，好好地做人；但因為它們的誠懇，真實，動人，批評者們給與了適當的讚揚，並不因它們不涉正面的直接的抗戰行動而不予抹殺。戲劇批評的不頑固堅持凡是不寫正面直接抗戰行動的都不是抗戰劇本，這是它的真實性。戲劇批評的能夠顧到作者的甘苦，創作的環境——有些話，當時的環境不允許你說，譬如抗戰中軍事上的若干不良現象，作者們都是知道得多，暴露的少，這是自動的；有時當然更有外來壓力——曉得他在委婉地苦心地在可以說話的方面說幾句有利於抗戰的話，而不是脫離現實地唱高調地責備一個作品不敢更正而更積極，這是它的人情味。這樣，作者們纔會真正地得到鼓勵。抗戰以來，我們已經有過這種經驗了；我甚爲不解，何以近來我所看到的批評電影的文字，似乎又在走相反的道路。隨便舉一個例。關於「不了情」影片，我看到與聽到

幾種不同的論調。一是主題不夠積極，二是題材不夠重要——（封建的良心責備，不是積極的；有配偶者的三角戀愛，在目前生活中，比這重要的事，更多得多！大意如此，我這樣的簡化，對於原文可說是不公平的）——而寫這些批評文的人，我對於他們的學識與見解，公正與誠懇，一向都是信託與尊重的。另外一個論調：這部影片雖然寫的身邊瑣事，而編劇與導演，都沒有強制劇中人的情感與心理發展——（沒有要求劇中人做出在情理上他不會做的事；這是對於技術的不易得的讚揚）——而說這話的人，在抗戰中編寫與導演過不少抗戰的舞臺劇與影片，他的作品與議論，至少同樣，如果更多的，一向為我所傾佩與尊崇的。我因為有病，至今還未看過「不了情」；我就是看了之後，也決不會狂妄到自名為最高批評者，從事一番覆判。我感到不安而不能已於言的，是「批評不應在題材上責備作家」這一原則！

我的見解是，即使我們正在進行一個社會革命吧！那麼，革命的要求與抗戰的要求，性質上不會兩樣的。每一人的每一行動，有某些方式，可能有利於這個革命；另外某些方式，可能有害於這個革命。凡是劇本，使得大家的行動，都在無形中有利於這個革命，雖然所描寫的不是正面的直接的推翻那不合理社會制度的革命行為，還可能是一部有積極性的好劇本的——這倒不是說「不了情」，而是說任何劇作——批評者如果說題材不重要，於是主題便不可能積極，全劇亦遂一無可觀，這是不公道的，亦是不妥當的。我不能說服我自己，題材本身能够分得出重要與不重要；要看作家如何處理！

我還有個見解。技術熟練與主題準確，都不是太容易的成就。批評者似乎也得珍惜一個在技術上已有成就而在見解上尚有問題的作者。批評對於一個有希望的作者，當是一與人為善，而不是一頓無情打擊，使得他或者對於自己完全失去自信，竟至擱筆；或者想欲改善自己，而因批評所言過於抽象宏闊，遂茫然不知所措；或者引起極度反感，索性自行其是，以批評者為敵；或者至少在不愉快與懷疑中，時時感覺到批評者的難伺候；這樣，無有影響他的創作的情緒，使得他的作品更不能合於理想；有時一頓打擊，甚至會得趕走一位很好的可以合作的友人的。固然有些頭腦頑固的作家，充滿了偏見——譬如始終是技術至上主義者——無論批評文如何有真實性與人情味，他還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但是那真正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感動人民，能够有益世道的作家，他會關心於那珍惜他的批評的。我們須要友人；我們須要合作者；我們須要那有獨當一面的能力的工作者，去描寫去表現他所熟悉的人生的一面。我們今天够寂寞的了。

話說冒險

——沙汀樓雜文之二——張帆

如果說，做凡百事情，非得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預知不會有什麼艱險，不會有多大挫折，這才放手幹去，那末世界上可以放手幹去的事可實在絕無僅有了。因此，凡欲有所成就，有所進取，冒險實在有其必要。尤其是打算在人生舞臺上成就新的偉業，開闢新的道路，更非有出色的冒險精神莫辦。

從來，偉大的創業者，往往同時是一個出色的冒險家。

雖然真正的冒險者，往往敢向不可知的情境挑戰，敢作一般人所認為不可為的事業，走一般人聞所未聞的道路，但冒險，決不是無原則的狂妄的瞎撞亂闖。真正的冒險者，他有堅定的信念，他依循一定不變的道路，他面向着一定的目標。

這一定不變的道路，是歷史；這一定的目標，則是真理。正惟其依循歷史的道路，面向真理的目標，真正的冒險者，雖不免經歷千險萬難，但終於能開闢新的道路，成就新的事業。

因此，這也是很明白的：真正的冒險者，他的出發點，是愛，是創造，是全人類的利。於此，他們得到了成功的保障，也於此顯出了冒險的高貴的價值。

可是，現今卻有一大批新的冒險家，站在極端反動的基點上，進行着人類空前的冒險事業：他們企圖扭轉歷史的方向，企圖扼殺真理，企圖奴役萬億人民，企圖搜括一切的財富。

不用說，這種以破壞，以私利，以保持或爭取統治寶座的野心為出發點的冒險行為，是可恥的，並且顯然必將落空，為周圍的風險所吞沒。因為他們背棄了歷史，背棄了真理，亦即背棄了人民的意志。

如果不信，混世魔王希特拉便是明證。雖然他會稱心快意地與風作浪過一時，但終究淹沒在他自己所播弄的風浪裏。何況，現今的某些冒險家，有希魔的野心，而無希魔的才能！

今日美國 (二)

四季如春的加州

全世界現在把美國看做享福的地方，美國人又把加利佛尼亞(California)州看做享福的地方。暑天休假的時候，不少人由東部或中部，開車到舊金山來避暑。可是常在舊金山住家的人，又嫌此地夏天太冷，有辦法的儘量往南去，到洛杉磯去避涼。人類真是有趣。大家跑來跑去，忙來忙去，不知爲的是什麼？

在加州過夏天，確是福氣。和中國的昆明一般，舊金山有時在七八月間的確相當冷；冷到一種程度，連到海邊都怕下水去游泳。不過有一點大不相同，就是昆明之所以冷，是因爲夏天是雨季；而加州之所以涼，乃是因爲多霧的緣故。這地區之所以四季如春，低垂的霧，爲主要因素。九月間霧比八月少些，所以反而比較熱起來。無論如何，在舊金山一帶，偶爾寒暑表上超過八十度，報上就會大登特登，說是打破紀錄。在這肥沃的加州，雨季一年有兩次，一次在春天，一次在秋冬之間。因爲這樣，此地一年草有兩次綠。夏天全是晴天，曠野上草都枯黃了。住戶人家門前的草地，主人天天用機器龍頭澆水，所以永遠是保持着綠油油的。

加州的天氣，的確是名不虛傳，

四季如春。終年沒有熱的時候，也沒有太冷的時候。除開雨水較多以外，和我們的昆明有點彷彿。不過欣賞好天氣，過舒服日子，究竟只有少數有閒階級，能有此清福。對於多數美國人，加州的引誘，是此區物產豐富，地方大，機會多，農工商礦都有發展的機會。當然加州早就不是處女地了。但就謀生的機會而論，此處今天仍然要比美國的東部或中部容易，無怪許多人都想往西部跑。在今天加州人口雖然不少，仍然是人工非常稀貴的一處地方。舉例來說，寶報的報販或報童，在美國別處都市還時常碰得到，在舊金山却是異常希罕的人物，在街上走，多少天也難碰到一位。報紙普通是插在街角報盒子裏，要買自己丟錢去買。送牛奶的人也很少。平常住戶人家都是自己到附近的菜市或小店去拿。

看到加利佛尼亞州此刻情形，就不能不佩服美國人建設的精神與努力。這片好地方，前後已經換過四次主人。據歷史上的考證，和別處美國地方一樣，此地最初的主人翁，是紅印度人。一五三三年，西班牙探險家Cortés，由海路來，發現此處，從此便成爲西班牙領土之一部。西班牙人，用武力及其他方法，把紅印度人的地方，逐步予以侵佔。三世紀以後，一八二二年，墨

西哥發生革命，脫離西班牙的統治而獨立。加州南部毗鄰墨西哥，於是成爲墨西哥的領土。一八四六年，美國與墨西哥發生戰爭，把墨西哥打敗了。一八四八年，墨西哥以戰敗乞和，結果將加州割讓美國。一直到這時候，主人雖然換過幾次，加州的產業，始終未曾發達起來。不但物質文化頗低的紅印度人若千世紀掌握此地，始終未能征服大自然；三百年的西班牙統治，除開設少數的傳道會以外，也可謂是毫無進展。

一到以盎格魯撒格遜人種爲主體的美國人手裏，事情却完全改觀。在美國掌管下的第二年(一八四九年)，加州境內，發現了大金礦，於是一般般發財的，由東部或中部飛奔而來，造成美國史上有名的「爭趨黃金」(Gold rush)。中國人平常稱三藩市(San Francisco)爲舊金山，亦由此而來。這次歷史上的事件，可說是偶然。也可說不是偶然。地方一到美國人手裏，就發現大量金礦，不能不說多少是運氣。可是在「爭趨黃金」中所表現的勇氣與毅力，除開美國人以外，世界上大概是很少看見的。那些在距今一世紀以前去西部尋金的開路先鋒，發了大財的誠然有，破產的和死在路上大致多得多。大多數的人，即令到達目的地，也不過是勉

曾侯編

強糊口。他們的成就，不在於自己發了多少財，而在於成爲先驅者，去開發美國這荒野的西部(Wild West)。他們的長征，是拖娘帶子，全家男女老少一齊去的，沿途不但要通過千里無人烟的地區，隨時糧食有發生問題的危險，而且時常會受到紅印度人與野牛(這二者是北美原來的主人翁)的襲擊。他們的史蹟現在成爲文學與電影的材料。知道這段歷史的人，在今日看見當時那次大移民所經過的驛車路線(Wagon trail)與站頭，想起這首史詩，覺得比瞻仰紐約最新式的摩天大樓，更感覺美國民族的偉大。無怪美國人一提起荒野的西部，仍然覺有一種特別的感情。

加州每年產金的數量，在美國各州中，此刻仍居第一位，在世界上也依然相當重要。可是世界第一產金國的地位，早被南非奪去，加拿大產量也超過了美國。就加州而論，在十九世紀中葉的蓬勃一時以後，去加州尋金，久已不復具有何等了不起的引誘力。許多從前盛極一時的金礦區，早因礦源枯竭，予以放棄。剩下來的，只有一些「鬼城」(Ghost towns)，供人憑吊。雖然如此，加州似乎始終是一處上帝祝福的地方。在金礦業漸趨下乘以後，又發現了可寶貴的石油礦。美國是全世界油礦最集中的地

方，加州又是各州中後起之秀。現在加州一年石油產量，在美國各州中居第二位，僅次於德克薩斯(Texas)州，而且略多於蘇聯全國產量。

農產品的豐富，也是加州的特長。讀者總記得「憤怒的葡萄」吧。那有名小說的作者司坦因培克(Steinbeck)，是在加州長大的人。小說的內容，大部是很真實的。我們曾經開車走過那小說中描寫的加州桃園地帶，也和本地人談過這問題。像那書中所描寫的勞工被壓榨，誠然叫人憤怒不已。同時看那些菜園，却不能不叫人驚嘆美國天然資源的豐富，與人工開發成就的偉大。幾十里，一兩百里一望無際的菜園，在任何國家，都認爲是非常可羨慕的。在美國實在也不過兩區。主要是西部的加州，另外一處是東南角上的佛羅利達(Florida)州。

當然加州也不全部是肥沃的土地。它的東南部，乃是一片很大的沙漠，一直西展到逼近海岸的地方。但是它的中部和北部，土壤極肥，農產品十分豐富；而且各地氣候不同，從次熱帶以至比較冷的地方的出產都有。水菓和價錢較大的蔬菜如生菜(Lettuce)等，是出色的產品。此外麥，稻，豆子等等都有。水稻出產，限於舊金山以東的薩克拉門多(Sacramento)河流域，以前種稻的，大都是日本僑民。二次大戰發生時，因為怕他們靠不住，被集中移在別處去了。二次大戰，又給移民到加州一

線，一向是由東往西。因爲歷史的關係，東部發達最早，後來伸到中部。在二次大戰以前，西岸已經有了一部分工業；可是比起中部和東部來，西部工業一直是落後。珍珠港事變以後，美國認識，太平洋大戰絕大部分責任，需由美國負擔。爲減少運輸負擔起見，一部分造船與軍需工業，不得不在太平洋海岸建設起來。受着二次大戰的恩賜，幾年之間，各種工業，尤其造船業，在西岸突然興起。加州在西部各州中，海岸線最長；主要海軍根據地，亦在加州南部。新興工業，因此大部集中在此州。爲着應付此項工業上的需要，原住此州的人口，過嫌不夠。結果許多工人，自東部或中部，隨工業而來。其中有一部分，是由南方來的黑人。戰爭停止以後，一部分與軍事有關的工業，停頓起來，或者縮小範圍。但是許多工廠，仍然繼續工作。同時因軍事工業縮減而裁下來的工人，也大都各自在這肥沃的土地上，另覓生活。

。正巧加州至今仍可說是相當程度的地曠人稀，人工希貴，無論在鄉下或在城市裏，找職業不成問題。所以戰時西來的人，多半在此安居下來，不再回老家。二次大戰結果，使太平洋上的霸權，大部操之美國之手。如果將來中國安定下來，太平洋方面的貿易，勢將較大西洋更爲重要。以此在商業上，加州亦大有前途。未來發展，未可限量。過去加州境內，黑人不多，所以不受歧視，比南方好得多。戰時因做工關係，大批黑人擁來。他們

因此處工資高，社會上岐視程度亦較輕，自然在此安居樂業。可是這樣就引起了白人的反感。在一次快意的旅行當中，我們路過一處，看見一家相當考究的館子，門上寫着「不歡迎黑人顧客」的字樣。

說到美國人由東往西發展的歷史，自然是一段令人興奮，令人景仰的故事。不過此事也有悲慘的一面；因爲在此事經過當中，白種人所征服的，不止是大自然，亦有別的民族——即是紅印度人。美國一直通用的五分錢銀幣，一面鑄的是野牛，一面是紅印度人的像。這兩位北美洲原來的主人翁，大致在美國主要就留下這麼一個紀念。前幾天看過一個電影片子，內容是勸人愛惜動物。其中有一段，映出野牛的主人翁，快絕極了；有人問，我們將來會不會忘記野牛的樣子，答案是會忘記的，因爲它的像鑄在五分鐘的銀幣上面。一聽這話，我便想起紅印度人來，他們將來會如何呢？我們不知道在紅印度人以前，是否曾有別種人住在美洲。現在所知道的，大致紅印度人原來是由亞洲來，經過當時亞美兩洲的陸地橋(即現在白令海峽的地方)來到美洲。在人類中成爲美洲最初的主人翁。一直到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美洲的時候，沒有人擾亂他們的恬靜。美洲被白種人發現了，跟着就是殖民地的開拓。用購買，欺騙，與武力威脅，白人幾乎將美洲全部土地，自紅印度人手中奪過來。他們幾乎像野牛一般被消滅(當然不是

整批被屠殺，而是從一處地方趕到另一處地方)。歷四百年左右，紅印度人不但失掉了地盤，連人口也大大減低。或許這是優勝劣敗的必然結果；然而就紅印度人的立場來說，這結果確是够悲傷的。最近幾十年來，美國對於紅印度人，比較仁慈得多。不但未曾繼續予以摧殘，而且由政府劃出一些區域，指定作爲紅印度人居留區(Indian Reservations)，不許白人在裏面買地產(同時却禁止紅印度人在外面買地產)。據說實行此種制度以後，紅印度人的風俗，已稍有增加。現在他們的汽車，住洋房，辦工廠，不像從前那樣過原始生活。這一切當然都很好，可惜來得太遲一點。有些美國人，對於此事，不免感覺憐然。有一次和一位美國青年談到這問題，他說，「我們當然應該優待紅印度人，因爲他們是美洲原來的主人翁。像這樣的態度，實在是很開明。但是我想，如果今天紅印度人還是從前一般的勇猛，或是人口衆多，也許問題會大大不同。試看黑人在美國之受排斥，便可了然。無論如何，紅印度人和野牛，現在都在「Reservations」來保存了。美國一處風景最爲奇特與美麗的公園，是加州東部的約瑟密特國家公園(Yosemite National Park)。約瑟密特是原住此處的一支勇猛紅印度人的族名。後來白人來此開金礦，有點受他們騷擾，遂用壓力強迫他們搬走。據說那支人的首領，以此憂憤而死。當我們遊那公園，在恬靜與美麗的環境中散步，我想，如果當初有把那些紅印度人教育起

好，此氣他們還留在這裏，豈不很

行銀豐怡

務業切一行銀業商營經

實業 扶助

社會 服務

號四十八路四五慶重 行總

號七六四路西江海上 行分
號〇二〇二一話電

宏豐企業公司

總公司 上海廣東路五十一號

電話一一四五三一五

承辦

進

出

口

業務

分公司 漢口聯保里五號

重慶林森路一二七號

時與文週刊

發行人 程博洪
編輯者 時與文週刊編輯部
經理部 上海牯嶺路三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南榮記 和記 報關行

地址：上海廣東路一二二號
電話一〇四一八號

天隆被單



方大規美 惠實濟經

品出廠織染隆天

廠一一路西大 廠造製 室五三號一五路東廣 行行發
五六〇三二話電 五五四一話電

大學潮與真民意……………蔡尙思

今日的捷克……………殷懷遠

張東蓀先生的思想……………林布

華北人民的苦難……………陳際雲

烽火中的東北……………上官北斗

張東蓀講「最近時局」……………辛揚火

近事雜感……………甘笑

大時代的小感觸……………孔瑞明

是誰破壞了社會秩序……………吉人

舊金山……………會昭掄

漫畫……………余所亞

木刻……………趙延年

證券交易所第九七號經紀人

宏業證券號

北京路河南路口
國華大樓六樓604號
電話九四九四八

上海證券交易所第四十八號經紀人

丹巴證券號

上海中山東一路(外灘)十八號
四樓四一三三號室
電話一三四四四一

電話一三五六五
地址上海四川中路126弄20號

間辦理過磅量尺等

為輪船公司與客貨

業務：

「公正」「標準」

中國衡量公司

經濟部登記

目要期九第 · 期十第 · 期一十第刊本

和平呼籲與國民參政會.....	程 程
最近戰局鳥瞰.....	葉 辛
學潮壓制得了嗎.....	周天行
簡論當前經濟政策.....	周伯棟
電影批評的真實性與人情味.....	洪 深
略論娼妓.....	汪 靜
胡適的昨日與今日.....	伯 迦
「三一八」的重演.....	尹行六
記成都搶米風潮.....	陳 納
四季如春的加州.....	會昭掄
論貨幣的二重政策.....	郭大力
賴馬迪內閣的危機.....	沈鍊之
法國經濟的蛻變.....	費 正
關於高中畢業會考的討論.....	施 克
謝「法利賽人」對於「五四」的曲解與蒙混.....	夏 震
木刻藝術的前途.....	李 樺
董·吉訶德哲學.....	于 冰
「五四」在北平.....	辛揚火
「這是美國」.....	會昭掄
從馬歇爾演說看美國動向.....	宦 鄉
今後的八九個月.....	程 程
經濟前途還能樂觀嗎.....	張西超
英美在香港的市場鬥爭.....	余初僑
精神分析的物質基礎.....	董秋斯
周炳琳講「南行所見」.....	辛揚火
張東蓀談華萊士和平運動.....	胡 笛
北平瑣記.....	冶 秋

時與文週刊

發行人 程 博 洪
編輯者 時與文週刊編輯部
經理部 上海牯嶺路三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大學潮與真民意

蔡尙思

我對於過去的學生運動，最近發表了兩篇長文（「中國學生運動述評」一文見五月五日、十二日、十九日大公報，「劃時代的五四運動」一文見五月四日、五日、六日文匯報），話已經說得很多了，現在對於這「五四」以後二十八年發生的五月學生運動，只想就最被少數人作歪曲宣傳的一點，加以分析證明，這是忠實於歷史的我們應有的職責。

據少數人的看法：這次的學生運動，全是中共無因無故煽動起來的。這如據我們人民的觀察，所得的結論就大不同了！我以為：這次學生運動的真相，從下列任何一方面都可以看出；換句話說：這次學生運動的合理，是有下列各方面做證明的。

一 過去歷史的公例

就一部中國歷史來看，政治的腐敗、經濟的崩潰、和學生的運動、人民的革命成正比例：例如東漢末年太學生的請願與黃巾的起事，北宋末年太學生的干政與宋江方臘的民變，明末東林黨的清議與張李的暴動，清末戊戌維新的運動與黨人的革命，北洋軍閥時代學生的空前運動與國共的合作北伐，無一不是由於政治的腐敗與經濟的崩潰。就這一方面來說，政治的腐敗與經濟的崩潰是原因，學生的運動與人民的革命是結果；而就另一方面來說，學生的運動與人民的革命就是舊政府舊社會「壽終正寢」的先兆。學生的運動與人民的革命是愈壓迫愈強大的，有時學生的運動被阻止，而政府的壽命也就告終了；有時是運動還在進行，而政府已先垮台了。

二 當前問題的中心

現在中國政治的腐敗與經濟的崩潰，更是中外朝野所公開承認而為有史以來所罕見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學生的羣起要求和平民主、反對內戰飢餓，真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而絕對不是少數人所謂「有背景，有作用」所能曲解加罪的。一般學生答得好：「有人說我們有背景，是我們的我們有背景，我們的背景便是飢餓；有人說我們有作用，是我們的我們有作用，我們的作用便是要飯吃。我們只是要把殺人的火藥，變成使人活命的白米」。「六個大學生的公費，抵不上一顆美式砲彈」，「我們向砲口要飯吃」。（詳五月二十日文匯報）。這可見凡是自己「有背景有作用」的，才會動輒拿「有背景有作用」去誣指他人；凡是自己「有背景有作用」的，便沒有資格來痛斥他人的「有背景有作用」。但現在這少數人又藉口道：「這次的學潮，何以起先只喊「吃光」的口號，要求增加「公費」，「結果却成爲「反內戰」，要求和民主？這還不是變了質嗎？」這在我們看來，却覺得他們是向前進步的而非中途變質的。當學生喊「吃光」的口號，要求增加「公費」的時候，已經同時喊出「人瘦砲肥」的一個口號了，「人瘦」就是「吃光」，「砲肥」就是「內戰」，「人瘦」是果，「砲肥」是因，所以如要免受飢餓就要實現和平。這少數人又說：「這點就算有道理吧！再問「搶救教育危機」運動呢？這點在我們也以爲：是一件事而非兩個問題，例如現在國家的支出，軍事經費竟佔百分之八十多，而教育經費却只佔百分之三多或四多（各教育長官報告有些出入）。養一師兵的費用，可以維持三十九座大學。這分明是軍事第一。

如內戰進行，就把教育經費移作軍事經費；如內戰停止，就可反而把軍事經費移作教育經費了！這少數人又說：「這事也可以不再提及；但還有一件事，你們總答不出了吧！就是許多純教育的問題如會考、聯考、總考，……這和內戰，無論如何是風馬中不相及的。」殊不知：這何嘗獨能例外？在內戰進行中，中產者變成無產者，無產者變成餓死者，其子女的入校求學，再也沒有從前那麼容易了；在生活極度困難之下，如再加上上述各種無謂的枝葉的困難問題，那就只好中途失學了。所以從前不成問題的，在這空前內戰進行期中，也就大成問題了！不要說旁的，從前升學轉學就比現在容易得多。要提高教育水準，絕對不是單注重考試所能生效的。這些都是鐵一般的事實，誰也無法否認的。這少數人最後又問：「那麼像交通大學的反對政府變更校名之類，又該作何解釋？難道也有理由嗎？」不知在學生們看來，也以爲目前急待政府解決的重要問題多着呢！何必在這些枝葉上大做文章？就使連這些問題都沒有，而在學生們也還會起來運動的。因爲政治經濟的根本問題不但未嘗解決，而且日益嚴重，他們極度苦悶，再也無心讀書，以爲「國」都沒得「救」了，還有一書「可一讀」嗎？政府要學生只管「讀書」不必「救國」，學生是不會接受的。

總之，就整個的社會來說：根本的政治經濟問題不先解決，枝葉的教育問題是無法單獨解決的。就教育問題來說，整個教育問題不能解決，部分的教育問題也是不易單獨解決的。所以這次學生們由部分的教育問題，進到整個的教育問題如「搶救教育危機」運動；又由整個的教育問題

，進到政治經濟問題如反內戰運動（即和平民主問題），這種「溯源而上」，「鞭辟入裏」的看法，是最為正確的，非常寶貴的！

我最後要問：現在政府的當局和學校的當局，有不少是清末，「五四」、「三一八」、「二九」各次運動的過來人，如果當時政府的當局和學校的當局也多像你們現在的態度，硬說你們當時全是被人利用，你們能心服嗎？現在已經是什麼時代？不要再被人譏笑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二 立法院和參政會的響應

立法委員和參政員雖然全是政府任命或指定的，但到了現在，却也羣起反對內戰了！這次學生的反內戰運動是在立法院與參政會二者開會的中間發生的，所以也可以說是互相響應的。儘管軍事長官說：「立法委員諸君表示和平意見，對士氣將有嚴重的影響。」行政長官說：「要用兵來達到政治方法解決之目的；」但在許多立法委員却都力主和平，如鍾君說：「政府目前應以最大之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以政治解決糾紛，政治問題如不得解決，經濟問題亦解決不了。……現中共有兩種心理：（一）放下槍桿即不能生存，（二）政府如此腐敗，必能拖垮牠，目前單純從軍事上決無法解決此問題。必須從政治上改革，以消除中共此種心理，與中共競賽民主，和平統一方可實現。」譚君說：「如和平不能爭取，經濟上亦無法解決，過去統一放在和平前面，現在應該把和平放在統一前面。」周君說：「現在應該先求和平，再恢復統一。」孫君說：「即使把八十二萬共產黨軍打完，共產黨還是消滅不了的。譬如蘇北收復了，鄉下到處還是共產黨，究竟前方如何，大家莫明其妙！這樣的現狀發展下去，政治上決無辦法。」（五月二日大公報）。這是五月一日的立法院例會，立法委員公開向出席報告的政軍長官呼籲和平的情形。隔了二十多天

，一般參政員在參政會裏更紛紛提出和平方案，至二十六日已達十九件；並有參政員一百人於同日提出臨時緊急動議，舉行審查討論和平方案，當經全體無異議通過。還有參政員當教育部長出席報告時，對於學潮，作口頭的詢問，如張君認為：「學潮與和平有關，應詳加檢討，不可枝節應付。」韓君請當局「勿以有色眼鏡來看學生運動。」黃君大聲疾呼：「政府對於學潮不應徒事高壓而不反省，並謂「各部門長官應切實負責，不要把元首當作擋箭牌。」（五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同報）。此外如福建省議會開會時，全體參議員以勝利以還，社會不安，民生凋敝，特一致議決，電請國民政府及國民參政會速採有效措施，恢復和平，實行民主，以慰羣情，而紓民困。（同上二十四日）。從上述看來，連立法委員參政員參議員都反對內戰，要求民主，可見這個問題確是嚴重到了極點。學生的反內戰，正和這般立法委員參政員參議員一樣；何以在學生就獨被痛斥為「有背景有作用」？難道做了學生就連「反內戰」的資格也沒有了嗎？這到底是什麼邏輯！

四 學界輿論的同情

有些人士把這次的學生運動看做「新五四運動」；而另有些真有背景真有作用的人士，一聽見這話，就大發脾氣的說：「什麼新五四？連舊五四也不如！因為我們有好領袖，有好政策，現在國際地位這樣高，而又得到世界第一強國的幫助，怎樣還會產生新五四運動？」這不要說旁人，連近來已和政府打成一片、至少也是非常接近的胡適先生，也會不以為然的，他說：「像今日的美國英國，因為有了正當合理的機構來提倡改革政治，監督政治，所以他們的青年人就可以享受青年應享受的福，也就無所謂學潮的發生了。而中國的現狀，不要說青年人不同意，就是我們中國人也是感到不能滿意的。」他主張「對於青年

人應該給予合理的自由」，他認為：「到現在，還有不合法逮捕的故事，是一種遺憾！」「青年人的政治意識，不是壓力所能壓下去的！」又如大公報的總主筆王芸生先生，對於這次的學生運動，也大膽的說：「二十八年前的五月發生過「五四」大學潮，今年五月南北各地又鬧學潮。……五四學潮是由外交刺激而起，迅速波動全國，那場面是雄壯的，可歌的；今天的學潮，在全國悲苦的情況下發生，這情景是悲淒的，可泣的。」「由京滬的搶米到平津學潮，使人人覺到我們的社會的動盪與不安。在這時青年學生發出反內戰反飢餓的吼聲，這不單是青年學生的要求，實是全國善良人民的共同呼聲。」「我們要飯吃！」「我們要和平！」「這是今天最沈痛的、最切要的要求。」（均見五月二十五日大公報）。胡先生是現在教育界的領袖，王先生是現在新聞界的領袖，而且是誰也無法硬拿紅帽子戴到他倆的頭上，而痛斥為「有背景有作用」的！他如最有名的國立大學如北京大學，最有名的教會大學如燕京大學，以及大學尤其是私立大學最多的上海，都有教授聯名發表宣言，對於此次的學生運動，深表同情！（見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同報）！這些教授中，有年紀很大、與平時最厭惡活動的，任你怎樣的誣他們「有背景有作用」，結果也是沒有一人會相信的！

五 一般民衆的意向

在不久的過去，上海文匯報「讀者的話」欄發表過一次關於時事的測驗，當時在少數人便把紅帽子給它戴上，而痛斥為不合事實，表示絕對不能相信；好了！最近上海大公報也在「時代青年」欄發表一次時事測驗，結果與文匯報相似；這很可證明兩報的比較一致與相當正確！據大公

今天的捷克

—— 遠懷殷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許多被解放的國家如希臘波蘭等，都鬧着嚴重的內政與外交問題，獨有靜處中歐的小國捷克，能在這風雲詭譎的戰後國際政治舞台上，埋頭於療治戰時所受的創傷，積極從事重建的工作。也許是爲了這個緣故，捷克在戰後的世界中好像扮演了一個不重要的角色，而容易給人們忘却了。

在美元外交和到處干涉的政策之下，美國未嘗不想插手到捷克。去年年初美國即開始對捷貸款的談判，但是當它發覺捷克不是一個像希土那樣的國家後，就在去年十月取消了對捷貸款。英國本也擬以一千萬美元貸與捷克，使捷克得以購買美國所讓與英國的剩餘戰爭配備。後來美國政府向英國外務部施壓力，英國也就不得不拒絕了對捷貸款。從此美英對捷一改以前拉攏的政策而爲不理會的態度，並硬把捷克當作是一個在「鐵幕」之後的國家。儘管英美一些人士曲解着捷克，說捷克不民主，是蘇聯的傀儡，然而事實到底是事實，捷克並沒有給蘇聯牽着鼻子走，國內充滿了民主的空氣，人民在過着自由的安定的生活。新聞自由也是不少於任何一國的，外國駐捷的記者都可以自由採訪自由發報消息。

在德軍佔領下度過了七年辛酸的歲月後，捷克並沒有像若干其他國家那樣的發生內戰，把自己驅上毀滅的道路。相反的，戰時流亡英倫的政府及國內以共產黨爲主的抗敵遊擊隊，在一切爲了祖國的前提下，攜手合作起來，去年七月舉行了普選後，捷克又踏上了憲政之路。

捷克目前政局的穩定，並非一朝一夕之功。在捷克政府流亡英倫的期間，捷克的領袖如馬薩里克、貝奈斯、史拉米克，便與捷共領袖哥特瓦爾，成立了一個協議，大家同意爲了使捷克能在戰後的世界中安穩而有進步，一定得接受高度的社會主義化。通過了與國內地下工作者的秘密聯絡，他們的計劃在國內得到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贊成和擁護。所以當捷克被解放後，它就能立刻實行完善的計劃，避免了歐洲許多國家所不能避免的內爭。

除了蘇聯以外，捷克要算是實行社會主義計劃最快和最澈底的國家了。事實上蘇聯今日在捷克的勢力，是凌駕在英美之上，捷克人民一般的是較親蘇聯而不喜歡英美，這也許是西方民主國家對捷克態度所招致的結果。

捷克人在復興的工作上，並未感到有十分難於克服的困難。他們的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元氣，幸未大傷，只要有決心，是不難恢復舊觀的。他們的教育水準，不論在學術方面或政治方面，都是很高的。由於受德軍蹂躪七年的苦痛，由於歐洲現實政治的教訓，捷克人民的國家意識加強了，他們狂熱的愛着他們的祖國。也許是慕

報的統計，我們可以看出如再不和平民主，人民對於政府的信心便會日益動搖。例如內戰問題：相信國軍能勝者九十三人，相信共軍能勝者一六八人。平抑物價問題：主張「停止內戰者佔絕對多數」。對於改組後的新政府，完全滿意者約佔一半，四百二十四人；完全滿意者只有十四人。對於青民兩黨的參加政府：認爲不應該者佔三分之二。對於美蘇的友誼：最喜歡美國者二八五人，最喜歡蘇聯者三三六人（詳五月十二日同報）。這幾點都是人民不滿現實的逐漸露骨的代表。這次學生們的反飢餓反內戰運動，既合乎此種民意，所以是正確的、純潔的，不是事出無因的，別有作用的。

六 多數學生的進步

這次的學生運動和「一五四」、「一二九」那幾個大運動都是全國性的，其特色確如錢端升先生所說：「今天的學生，比我們的學生時代進步多了！第一、現在的學生瞭解人民痛苦，已與人民痛苦連在一起；第二、現在的學生無領袖慾，羣衆化了，無個人風頭，所以組織力強。第三、學生的見解進化，老實說已走到我們的前頭。」當然我們也知道尚有一部分學生是反對和平民主的。但這只是極少數，不能代表羣衆心理。不過就是這一點，已可令人想到現在學生的沒有「五四」、「一二九」那幾個大運動的純粹、一致。所以我們應該略加辨別的說：沒有背景沒有作用的最大多數的學生，是比以前進步的；有背景有作用的極少數的學生，是比以前退化的。進步與退化是很容易辨別的，只要一看它的是否合乎民意與潮流就得了！

一九四七、五、二七。

尼黑協定把他們教訓得太够了，捷克人覺得近隣蘇聯是歐洲唯一可親近的強國。

捷克人對於民主政治都有深切的認識，在過去國父馬薩里克和現在貝奈斯的領導之下，捷克人民過着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和蘇聯式社會主義經濟的生活。它在解放後一年所實施的整頓交通恢復工農繁榮的兩年計劃，已快完成，成績且比預期的好得多。

攪雜着馬克斯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捷克，決意取社會主義及資本主義之長而去其短，以不犧牲政治的民主和自由為原則，來達到經濟的民主。蘇聯對捷克的漸進的社會主義計劃，絕無意加以干涉。貝奈斯總統會告美國記者稱：「蘇聯承認，捷克的自由民主政治往前蛻變到社會主義化的民主政治，不是馬上可以實現，是應該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實現。」假使英美保持不干涉捷克內政的政策，又假使捷克能保持它內部的團結，那麼它的有遠見的試驗是不難實現的，同時也可以給世界證明，在世界兩大各趨極端的思想主流之外，還有一條走向新天地的道路。

戰後捷克雖以全力從事重建的工作，但是它對於外交却沒有忽略。它深知要使重建工作迅速完成，要使捷克避免捲入動盪的歐洲政治漩渦，便非但要獲得蘇聯的同情與援助，更須獲得英美及四隣的歐陸國家的諒解。所以在外交上捷克不會參加任何歐洲的極端集團。

捷克與英美的關係雖一時無法改善，它却積極的與歐陸各國建立友好關係，並解決若干懸案。

法國與捷克曾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簽訂法捷文化條約。兩國在今年二月又開始談判同盟條約，後因故一度停頓；最近法國外交部宣稱：法捷兩國談判即將重開，援依法蘇、英法盟約的方式，訂立法捷同盟條約。初步談判，依照捷外長斐林格在巴黎接洽的結果，將在捷克普拉格舉行。

捷克與波蘭間多年的懸案，也已得到了具體的解決。今年三月九日，捷克內閣總理高德華率領代表團抵達華沙，十日就簽訂了兩國友好與互助條約。其主要目的乃在確保兩國之安全與防衛，以抵抗德國的威脅。捷波雙方代表除簽訂條約之外，並簽署附錄一件，其要點有三：一、雙方同意在二年之內解決現行領土糾紛；二、兩國在最近的將來，締結經濟協定與文化協定；三、雙方提供諸言，在互惠的基礎上，確保波捷克少數民族及捷境波蘭少數民族的權利與自由發展。兩國的友好與互助條約，有效期限為二十年。

捷奧兩國現正在普拉格及維也納兩地談判。雙方在普拉格的談判，旨在締結商務條約；在維也納的談判，則為討論捷克對奧國的領土要求。捷克方面要求取得多瑙河沿岸勃拉蒂斯拉伐對面的一小塊奧國領土，希望將來奧得河與多瑙河間開闢運河後，在該處建築港口設備。捷克願予奧國經濟上的便利，以賠償其領土的損失。以目前的情形來看，這個談判很有成功的可能。

捷克除了與幾個與本身有密切關係的國家締約外，最近又擬與比利時、保加尼亞和羅馬尼亞等國開始談判，締結友好互助條約。

捷克在戰後能以嶄新的姿態出現，絕不是偶然的，它能毅然跳出黨爭，並在強國間不作任何的賣身投靠，實在是主要的原因。

是誰破壞了社會秩序？

吉人

近來官方對維持社會秩序似乎特別有興趣起來，君不見左一個談話，右一個命令，東一個辦法，西一個措置乎？我倒奇怪：究竟是誰才破壞了社會秩序？

我想三尺之童也該知道破壞秩序的莫過於內戰了吧！我們放眼看看，戰地千里，田園荒蕪，今天抽丁，明天徵糧，鬧得雞飛狗逃，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秩序破壞得還不够慘嗎？

然而，有人現在却要來「維持社會秩序」了！他們不去阻止今天你一刀，明天我一槍的內戰，不去阻止那些為內戰而橫征暴斂，亂發鈔票，讓物價飛漲的人，而來阻止那些手無寸鐵，奔走呼號，爲了要安定、要大家能溫飽，故而反對內戰的學生！這真是天下的大怪事了。退一步講，如果反對內戰就是破壞秩序，爲了飢餓而請願就是破壞秩序，那麼擁護內戰，自願滅亡，自然就是「維持社會秩序」了。這個秩序是個什麼樣的秩序，大家還不够明白嗎？

再退一步講，就算反內戰、反飢餓遊行是破壞秩序，那麼，學生——其實是全國人民——所要求者，僅只反內戰，反飢餓而已，要維持這個秩序很簡單，只要停止內戰，讓人民不再飢餓，那不就完了嗎？

張東蓀先生的思想

林布

張東蓀先生近年出版了三本著作「知識與文化」「思想與社會」「理性與民主」，都是講他的知識論和政治思想的。「時與文」的第五期又登載了一篇他在北大的講演詞：「哲學是甚麼？哲學家應該做甚麼？」也是講的知識論，一定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

(一) 知識社會學

先生在政治上應該算作進步份子，因為他是不滿現狀，希望社會進步的。他研究幾十年哲學，原是一個讀書人，假如政治清明，社會安定，他可能一輩子關在書齋裏，研究他的哲學。無如書齋外面的世界太不平靜。一方面國共分家，大打其仗，一方面日本人又在東北造成九一八事變。當其時，執政黨還在那裏實行一黨專政，大談其「黨外無黨」，這才激起先生組織，搞政治。

「至於到九一八事變以後，忽然和張君勳先生組織國家社會黨，乃純是爲了國民黨的「黨外無黨」一句話而激成。我既相信民主主義，當然是反對一黨專政。國民黨不許另外有黨存在，我們民主主義者便不能不另立一個黨，以表明我們的思想是自由的。目的不過如此。當時張君勳先生會與我明白相約，說他日如國民黨有一天放棄了一黨專政，我們的黨便自動宣言解散。我對於這個誓言始終留在心上，張君勳先生以後的行動如何我不敢說，至於我自己卻早已自知是不適宜於黨派生活的。」（「理性與民主」四—五頁）

他主張對外要民族獨立，對內要實行民主及社會主義。

「一個是民族國家主義，用以對外，俾立於國際間，得平等而自立。一個是內部的自由，就

中尤以經濟的自由爲最要。」（「知識與文化」四頁）

凡進步份子必有一套進步份子的知識論。從前中國講君主專制，這在從前是需要的，現在不需要了。從前講家族主義，現在也不需要了。從前沒有民主，現在需要講民主。從前沒有社會主義，現在要講社會主義。可見沒有千萬年不變的思想，理論，或主義。新的社會需要新的思潮。

「理論的產生是基於文化要求，社會要求，時代一變，要求一變，真理也就跟着變了。以前的真理，便不再是現在的真理。」（「時與文」第五期）

只有頑固份子，反動份子才會死死抱住舊社會中的思想意識，奉爲天經地義。進步份子則不然。他問：社會既是不變，那麼應該怎樣變呢？應該提出怎樣的主張，理論，思想才能適合新的社會需要呢？

「哲學家應該做的是：文化到了不能不變時，就要出來做思想領導。」（「時與文」第五期）

這就是先生的知識論的基本精神。研究各種思想、意識的社會背景，這種學問他叫做知識社會學。

「我是研究知識論的，讀康德最多，後來改從社會學去研究知識論；興趣漸漸轉到社會研究上去，而不專講形而上學的奧妙的那一套，於是就變爲社會學與知識論的合併，把文化發達與社會學配合起來看。我的這種轉變一般人很少知道，總還根據以前的書來研究我。知識社會學現在已成了一種學問，但還幼稚，在歐洲致力於此的，也沒有幾個人，最早的當推卡爾馬克斯，他很開闢了一個新的方面。」（「時與文」第五期）

但是先生的知識社會學和馬克思的知識社會學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二) 真理與階級

先生雖不滿專制反動，但並不主張造反。他認爲暴力革命很難達到目的，因爲行動愈激反動愈大。

「著者研究中國歷史得到了一個教訓，就是任何激烈的改革，其後必有反動，足以將改革抵消，使其仍復原位。反而倒是所餘留的影響或能經久一些。故我們可以說：只有平和的改革其效果比較經久些；愈激烈的改革其退消亦愈快。」（「理性與民主」一八四頁）

而且暴力革命一定演成互相殘殺。

「凡有改革的主張，倘必動輒以武力求貫徹，殺人不厭其多，恐怖愈大愈好，則其結果必把對方亦激起來反抗而後已，且其結果止有互殺。」（「知識與文化」二三四頁）

因此惟有和平手段求進步。社會本是由各種利益不同的集團結合起來的。利益不同，主張自然也就不同。地主想世世代代做地主，收地租；農民想打地主，分田地；資本家不容許任何人侵犯他的神聖的私人資本；工人也不願意老讓資本家剝削他的剩餘勞動。假如每一個集團都要各行其是，那就只好大家打一場了事。誰有力量誰就來專政，獨裁。這是要不得的。與其動手，不如動口；與其用武，不如講理。任何一方面都不可一意孤行。把大家的意見拿來，每方面的意見都打點折扣，求個折衷，豈不大家和和氣氣；而社會照樣可以進步。

「我們必須承認社會是一個「異質的結合」

。在此種結合中各分子有共同的地方，復有各異的地方。即有共同的利害亦有各別的利害。既然在一個社會中利害不能完全一致，即其中的思想自然亦不一致。因為思想無論如何公正，總不能免法為利害所牽制的影響。因此我們必須承認任何思想都包含有若干偏見，而偏見則根據於利害而起。我們在這個前提之下，必須主張任何一種思想，若求實現，必須有所「折衷」，因為一種思想而絕對不稍加以折扣，使之實現，便無異於完全打倒其相反的其他思想。（知識與文化二二五頁）

所以各個階級根據自己的利害所提出來的主張，理論，都不免是偏見，不會合乎全社會需要。我們的思想，理論，應該受環境的決定，但環境不限於階級利害，整個的社會結構都是決定的因素。

「照馬克斯說法，所謂環境只是經濟上的階級，你屬於那一階級，你的思想就為那個階級利害所左右。我名此為「階級利害」。須知這個卻與「社會結構」不是一個意思。究竟我們的思想為階級利害所決定呢，還是為社會結構所決定呢？由後之說，不僅是主張那一個階級中的人會有與其階級相一致的利害觀念，並且整個兒的社會結構決定全社會中的人們思想。質言之，即在資本制度中無產階級勞動者不但必會有階級自覺，並且必會把整個資本制度的形態都映入腦中，以決定其思想。二者之不同在於後說為全社會決定其中各個分子的思想，而前說則為各階級決定其中分子的思想。二者固然可以並行不悖，然在意義上卻是有些不同。我以為馬克斯似乎只看見前者，忽略了後者。」（知識與文化九四頁）

因此不屬工人階級的人也可以有社會主義的思想。

「即馬克斯本人亦是想作大學教授而不成，遂入了新聞界（報界），可以說是自由職業者，屬於中等階級，亦不是工人。他的摯友恩格斯更

是從富有的工廠東家出身的。所以從學者的出身與職業來推定他的思想，不如從他所受的教育及其時代流行的思潮來測知其思想的大勢。」（思想與社會八五頁）

總之，先生由於主張和平改革，階級協調，遂認為一種主張可以是屬於全社會的，而不是由任何一個階級的利害來決定的。現在把這些意見討論一下。

只動口，不動手，這是誰都贊成的。那怕動口的時候面紅耳赤，總比真刀真槍好些。可是這並不是說任何時期都不許動手。近時常有人說，請民主自由當學英國人，他們只在議會裏嚷嚷，決不用暴力。殊不知英國人為了爭民主自由也砍過國王的頭，打過內戰。英國拉斯基總不能算是提倡暴力革命的吧，但是他說過，英國議會政治行了這麼許久，只因為議會中兩黨一向只在枝節問題上對立，根本上利益一致，若爭端至於觸及社會制度的根本，他也不能保證不由動口演變為動手。可見能動口的時候大家都願意動口，到了不能不動手的時候，才會動手的。假如在當動手時也反對動手，那就是幫助反動者，不是進步份子的態度了。

武力革命以後會造成反動，確有許多事實可作例證。例如資本家和工農聯合革命，後來資本家看見工農勢力壯大了，害怕起來，轉過來和封建勢力妥協，鎮壓工農，這情形很多。中國國民革命便是一個例子。但並不能說一切革命都是如此。革命陣營本身沒有嚴重裂痕，反動便無從發生。而且即使國民革命最初目的未能實現，但其推進社會的作用依然存在。中國在將來如能實現民主，則民主決不會成為少數階級的特權，會成為大多數工農的普遍權利，這便是國民革命的一個影響。

至於折衷意見，以求真理，政協似乎是一個好例子。政協表面上是一個妥協，國民黨讓了步，共產黨也讓了步，每方面的主張都打了折扣；

其實這是表面的看法。政協是進步勢力的一個勝利。反動派對這一點看得很清楚，因此才要拼命破壞它。現在擁護政協的有幾個階級，這幾個階級所要求的都只限於政協決議，恐怕沒有一個階級要求立刻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因為這是客觀條件所不許可的。這幾個階級的主張不能打折扣。假如打折扣，那就變成了民青兩黨，替反動派幫兇了。所以把社會上各個階級的主張打個折扣，調和折衷，這樣得出來的並不是真理。真理是進步的階級依據客觀的條件所規定的主張。

先生以為大家生活在同一個社會裏，即使各人階級利害不同，對整個社會的看法仍可相同。殊不知在階級社會裏是很難做到的。即如社會主義是工人階級的主張，因為這是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的。資本家決不會真正談社會主義。談談不是騙人，便是騙自己。先生雖然也談社會主義，但究其實際主張，不過是「最少限度的統制，即金融統制、交通統制、勞力統制、對外統制。這也算不了甚麼社會主義，而且大部分是現政府早已實行了的。馬克斯恩格斯都談社會主義，這不表示工人階級以外的人也可以談社會主義嗎？是的，可以的。但是馬恩是擺脫了原來的階級，參加工人運動，反抗資本主義的。我們怎麼能希望所有的資本家也都參加工人運動，來反抗資本主義制度呢！工人階級為了本階級的利害倡社會主義，一定要把「整個資本制度的形態映入腦中」，否則馬克思便不必花幾十年工夫來研究資本主義的發展了。

（三）文化主義的決定論

先生認為中國歷來就是個官僚專制國家，農民歷來受壓迫，壓得透不過氣時，往往揭竿而起，把社會秩序搗個稀爛。但從孔子以後有一種讀書人（即所謂士）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大力量。他們在朝則以諫諍的態度糾正治者的錯誤，在野則抨擊暴政，阻止它的發展。他們在專制政體下

盡了三種任務——「滅毒」，「防腐」，「洩氣」，即減少專制政體的毒素，防止它腐化，替社會宜洩鬱氣。他們不願看見有一天農民起來革命，使社會大亂，但他們知道讓反動派胡搞下去，勢非激成革命不可，所以爲了維持社會秩序，使之不崩潰，便不能在政治上與暴虐腐敗的政權對抗。

「中國在辛亥革命以前，政治狀態數千年如一日，始終只是君主的權力政治，而輔以士階級的防腐滅毒作用。……在這種情形，儒家的思想是最相宜的。因爲儒家主張維持，反對破壞，貴秩序，尊上下。……所以士階級在政治上是好像一個通風穴，一個清血針，比較上近於對抗，不近於維持；而在社會上卻正相反，乃是社會的一種維持力。」（知識與文化一一〇至一一一頁）

他們既是讀書人，要和暴政對抗，只有兩套武器，一是講氣節，一是講道理。

「士就有這兩種長處：一是代表理性主義；二是代表道德主義。」（理性與民主一七七頁）

目前中國情形與過去仍很類似。一方面有反動腐敗的專制政權，一方面有農民的暴動，因此先生認爲要維持社會秩序，還是要讀書人出來說話，只有他們才一方面不滿暴政，一方面不主張革命。他們只動口，不動手，最合乎民主精神。所以中國不談民主則已，要談則非讓讀書人作民主運動的中堅份子不可。

「所以我以爲中華民族數千年所以有文化，其文化所以不墮者，大部分是由士在那裏負擔之。到了今天，如果以爲固有文化有缺點而另須搬來新文化，恐怕這個負擔者仍不能舍士以另求。故農工專制的議論在中國由歷史證之是有無益的。」（理性與民主一七七頁）

「儒家的士，講修養，講道理，匡救時弊，維持秩序，這是中國文化的「道統」，西洋文化的「道統」是民主及社會主義。」（思想與社會第五章至第八章）中國的出路是讓士發揮傳統的精神來擔當實行民主及社會主義的工作。這才是

中西文化合流的正當途徑。

由此可見傳統的文化影響很大。解決中國問題的理論，主張，不能不注重傳統的士階級的儒家精神。也因此單是根據現社會的需要來作主張，不顧固有的傳統，這樣的理論不會是真理。

「因此，我所說的境况不僅謂當前的境况，乃是兼指歷史所造的境况而言。不僅是空間上的一個地位，乃含有悠久的過去。這些過去卻都活在現在，因爲我們想時總是使用概念，已如上述，而概念卻免不了受這些有歷史性的東西的影響。傳說 (Tradition) 不僅影響及於我們的思想內容，有時且左右我們的如何「想法」(Way of thinking)。民俗亦然。」（知識與文化九五頁）

「我所注重的尤在於一個民族的有歷史性的那些東西，如傳說，制度，民俗，言語，甚至於時代精神等等……我願名我此說爲文化主義的決定論，以與馬氏 (馬克斯) 相分別。他只是社會主義的知識論而已。」（知識與文化九四頁）

我們且把這些主張檢討一下。首先看所謂士是甚麼人。先生認爲讀書人要發揮防腐，滅毒，洩氣等作用，絕不可去做官，最好是教書，或是「躬耕」。

「今後士之出路必須大改，我以為只有兩途，其一是以教育爲終身職業……另其一則是與農打成一片……讀書人躬耕本是分內事。」（理性與民主一七八頁）

當然，所謂「躬耕」的讀書人大抵都是所謂「在田的地主」。因此先生的土地政策不主廢除在田地地主，而只主張廢除不在田的地主。

「鄉村所以能自治必須先去不在田的地主……至於在田間的地主則爲惡較少。」（理性與民主一八二頁）

因此先生所謂讀書人並非指資本主義社會所造成的有專門技能的人才，如醫生、律師、工程師、事務官等，也不是參加農運的知識分子，而是那些講儒家思想學思想的讀書人。現在學校的教育只是授與以知識即專門學

術，畢業後得成爲一種有技能的人才。……這樣一辦，於是士乃漸漸真絕跡了。現在存在的人中，除了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等尚有士君子風度的結果，但最近左傾思想之傳入又加重其影響。……是以後起的讀書人信奉了唯物論以後，更沒有自勉爲士君子的了。」（理性與民主一七八頁）

這種儒家的讀書人在過去及現在多數是地主，可見先生的政治主張確是繼承傳統的開明地主的態度。今日進步的民主陣營中有此一代表地主的意識的勁旅殊不足怪。因爲執政黨的專制腐敗的政治把農民逼上梁山，假如不阻遏這種趨勢，提倡民主與進步，則階級鬥爭愈演愈烈，社會秩序大破壞，這也是地主所不願的。所以開明的地主也需要民主。

但是這種傳統的儒家的讀書人在未來民主政治中不會成爲主力，這一點說來話長，姑置不論。先生所以主張中國文化有其特殊的道統，其實即在主張士在中國民主政治應起領導作用。其實中西文化之非兩種根本不同的文化實顯而易見。若謂中國讀書人講修養爲中國文化的傳統特色，則歐洲中世紀亦復如此。若謂民主及社會主義爲西洋文化的傳統特色，則西洋古代只偶然有過自由人的民主，中世紀無民主。社會主義也是至近代而始發生。先生爲了證明社會主義是西洋的傳統，至謂社會主義出自宗教，這更是牽強之至了。這一點後面還要談到。

因此今日的社會思想仍須由今日的社會生活來決定，中國的傳統的儒家思想能否適用於今日，也要看今日的社會生活對它是否需要。這一點很明顯，如歐洲古典文化在中世紀埋沒數百年，至文藝復興時期然後爲人重視。大學、中庸、甚至孟子，至宋朝理學興盛，而後爲人推崇，與論語並稱四書。可見傳統文化之影響一代思想，必須當代社會生活對它感到需要。起決定作用的仍是社會生活。先生的文化主義的決定論是頗有問

題的。

(四) 理想與科學

讀書人的任務是講理。講理的目的是要社會團結，使之不因階級對抗而瓦解。所以理論和理想都是使社會平定，團結，減少衝突的。

「我以為思想之主動的影響及於實際社會只在於使社會歸於穩定之時，換言之，即只限於把社會使之平定化與秩序化。」（思想與社會八二頁）

「可見利他與團結是社會存在的要件。……所以一個社會必須靠有少數的『道德家』出來以身作則，來提倡此義。……我所說的道德家也就是對於理想的熱心家。這些人在社會上卻有很大的功用。不但一個社會的團結方面要靠有這一類的人，即社會內的一切不安的除廢與改良都要靠他們。我常說他們是一個社會內的防衛素……。」

（知識與文化八二頁）
中國的士修談大同之世，堯舜之治，就是這一類的道德家，理想家。他們的理想多為空想，但對社會是有用處的。

「我以為所有的空想都是出於上文所說的那個對於理想的熱心道德家。這些熱心道德家具有宗教性的熱忱，努力於理想，卻很足以把社會提高。……所以我們只能承認空想家有促進變化的力量，而決不能承認其空的理想有實現的一天。」

（知識與文化八二頁）
先生所贊成的就是這類的空想家，過去的儒者和理學家即多數是空想家，因此他認為一切理想都是空想。

「我很重視空想，遂不名之為空想，而稱之為理想。」（理性與民主一一三頁）

馬克思主義自稱科學的社會主義，以別於他以前的空想社會主義的，但先生認為也還是空想。因為假如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便應該可以全部實現，空想的主義應該不能實現，但事實並不如此。

「例如穆亞(Thomas More 1476—1535)自名其書為『烏托邦』，然其中所言有好多不僅可以實行，且有已經實現的，但其理想之全體仍不能實現的。反之，如馬克思主義雖自命為科學的社會主義，以別於空想的社會主義，即意在表明其主張完全可以實現，並且將來必然實現。但迄至現今為止，即以實施馬克思為使命的俄國亦未曾照馬氏所說的原樣一一實行出來。」（理性與民主一一二頁）

然則為甚麼要自稱科學的社會主義呢？也無非是為了堅定信心，提高熱情。

「馬氏(馬克斯)因為要極端注重客觀，於是又預言資本制度必自行崩潰，其所以作此預言之故，不外乎想堅人們的信心。我在前書中曾提出凡抱了革命的熱望而不願訴諸宗教式動化辦法，勢必想在客觀中找根據。就是想發現客觀的必然性以代替主觀的期望。須知這個客觀的必然變化未必真是客觀的，乃依然只是內心的熱望，而硬設法推到客觀上去。他們愈是口口聲聲講客觀，我們卻愈見在其內心具有宗教式的熱烈情緒。」

（思想與社會一一二頁）

由此我們不難了解先生何以認為西洋的社會主義出自宗教。既然一切社會理想，主義都是空想，都不是科學的。那麼怎樣的社會理想或思想才是真理呢？怎樣才不是真理呢？先生回答說：凡是能夠團結，安定，和推進社會的，即發生了社會作用文化作用的，便是真理。這是和自然科學上的真理標準不同的。在自然科學上凡合乎客觀事實的才是真理。

「在即物的具體的知識(科學知識)上確是有(和客觀事實)一對一與一對一。在離物的理論知識(社會思想)上亦確有對於其時的文化境况能滿足與不能滿足之分(即能否發生社會作用)。對照即謂之為真；滿足亦就謂之為真，固然亦未嘗不可。不過二者卻非一義。至少我們便有兩種真了。」（知識與文化一四二頁）
現在把先生這些意思來研究一下。照先生的

意思，過去的儒家講仁，講大同，講堯舜，這固然是空想，但有了這個空想作標準，便會設法推動社會現狀使之接近它。但是儒家的空想是否盡了改革社會推進社會的作用呢？須知離事實根據的理想就叫做空想，離實際愈遠，空想愈高。孔子還喜歡談管仲，孟子及以後的理學家便言必稱堯舜，不道桓文之事了。理學家大都缺乏實際而具體的改革社會的主張，有之，即為恢復井田一類的迂闊之談。宋朝一個王安石有些改革社會的實際辦法，即大受當時及後代的理學家的攻擊。可見儒家或理學家的崇高的空想在防止專制政府腐化，保持社會秩序上固有其作用，但在改革社會上則未見其功。他們本是要穩定社會，不是要改革社會的。要改革社會終非有切合實際根據事實的科學的理想不可。

理想與空想之別原不在乎理想之能完全實現。科學家的理想也可能不完全實現。因為科學家腦中的理想實行起來，往往會發現有許多地方需要修改和補充。空想也不是完全不能實現的。封神榜與西遊記上的一些空想便有許多在今日可算是實現了的。然則分別在那裏呢？科學的理想是科學家研究了客觀事實的法則做出來的。例如物理學家研究了原子分裂及其他物理法則以後，才做出製造原子彈的理想來。這種理想是具體的計劃，能指導你怎樣去把原子彈造出來。空想則不然，它是純粹根據主觀上的願望造出來的，不能指導你的行為。封神榜上的空想之實現不是靠空想本身的力量，還是靠科學的力量。科學的社會主義與空想的社會主義的分別亦在此。科學的社會主義不是僅僅描繪一未來社會的遠景，它把社會發展的法則具體地分析出來，讓我們在每一個社會發展的階段上都能根據這些分析，研究當前形勢，作出行動的計劃。空想即決無此作用。所以無論在自然科學上或社會思想上，真理的標準都是一樣。凡合事實的才是真理。因此我寫此文抱着很敬慎的態度。但理解膚淺，批評失當之處仍恐不免，幸先生及讀者有以教之。

張東蓀講「最近時局」

辛揚火

五月十七日在北京大學演講
張先生演講的一天，正是清華大學反內戰反飢餓抗議罷課的第一天，也是北京大學決定響應反內戰反飢餓抗議罷課的那一天。（記者註）

我上一次應邀來講哲學，沒想到講一個專門的題目：「哲學是甚麼？哲學家應該做甚麼？」（載「時與文」第五期——編者）聽衆有那麼多。今天又來談一談時局。大家現在都對時局關心，原因是時局太嚴重了，經濟危機也已臨到最高峯。今天諸君在校讀書，到九月間下個學期開始，就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失學，那時同學的伙食問題就要更嚴重了，就要嚴重到今天不能推測的程度。我今春去滬，人們已經普遍地喊「活不了一」，現在比那時物價又漲了三倍，如果時局再無變化，三個月以後學校開學，沒有人能想得到學生要成了甚麼樣子。以前都認爲只有熱心政治的人才談政治，今天任何人腦子裏都要想到政治，生活逼人非想不可了。大家願意對時局多有了解，原因便是大家都「過不下去了」，像大石頭壓在背上，想喘一口氣。這是普遍存在的苦悶。

得日本的問題解決後，國內的事情如果處理不好，人民必定更痛苦，所以我們首先致力於國內的團結和平統一，但到了今天，所有的努力已經完全落空。今天我很慚愧於過去的努力沒有獲得甚麼效果。大家是想知道未來的變化的，我來談談我自己的意見。

現在是天下下一家的世界，任一國家的事情都與國際局勢有緊密關係，中國問題要靠中國人孤立起來單獨解決，是不可能的，何況中國主觀上已沒有了自己解決的能力。國內問題的解決，要取決於複雜的國際國內及世界趨勢諸因素。我們不能說完全靠國際因素決定，難就在配合上。國共兩方條件的差別太大，就不能成功。政協便是極難得的配合，國共兩黨作戰十餘年，仇恨甚深，想自動合作極不可能。當時是已經搭配起來，只要敲緊筍頭，便成功了，但現在却要從新再搭並且還要有好機會，有主觀的覺悟，才能搭得起來。政協時，國際環境與今日不同，後來波動一來，環境變了，搭成了的東西便散了架。今春我去南京，曾向政府人士講，仗打下去，只有政府方面吃虧，越早和平，對政府是越有利；政府自然很不高興，以爲我是幫共產黨

講話。現在事實證明了，我回來後，幾個月，政府軍攻下延安，却不再能打綏德，把兵撤了回來，所不得不過陝北四五個縣，但在山西却失去了三十幾個縣，可見我當時的話不是幫共產黨而實在是幫政府說的。我也說過經濟絕對支持不下去；政府說是一爲人民平亂，但人民却吃了更大的苦，人民是不感激政府的，「亂」還未平，人民先餓死了。這一段時間證明經濟確是支持不下去了。原則上仍然是越早和平，越對政府有利。現在有句流行話，說「處處不留爺，老子去八路」，豈不是逼得人都跑了？所以政府應該盡量做最大讓步，因爲大讓步後，還是有便宜的。這些話我已經對清華燕京的同學講過了。中國不走運，明明一條路擺在面前，許多人却看不見。這條路不是對少數人有利，而是對大家都有利的，如果一定不肯扭轉來，大家就都不會幸福。有人至今以爲如果不打，自己就要被打倒，殊不知如兩車相遇，撞下去就全毀，讓一讓路，就都過去了。只是看這些人的腦子能不能轉得過這個灣。從這裏，我們現在推測一下國際與國內情勢的發展。

在國際關係上，政協失敗，與美國政策改變有關。今天美國政策更加改變了，已經產生了杜魯門主義。你們諸位是要消息登到報上才會知道，政府中的人，消息却靈通得很，早就知道了美國政策會有改變。有了杜魯門主義，於是簽了字的契約性的政協決議可以不算數，因爲事實讓它不算數了。據我看，在美國的新總統（政策不同於杜魯門的）未登台之前，美國對蘇政策是不會變的。美國對蘇採取包圍政策，到處豎立鐵壁銅牆，已是很明顯的了，譬如在希臘、土耳其，又譬如在日本和朝鮮。美國包圍蘇聯的政策不變，對中國有甚麼影響呢？有人以爲只要美國想建立中國爲反蘇基地，她就會幫助中國政府解決共產黨，無論中國共產黨與蘇聯有無關連，只要是「共產黨」三個字就值得消滅。如果杜魯門真的這樣主張，中國會有人歡迎極了，這豈不等於「天上掉下餡餅來」，但不幸這只不過是一種 Wishful thinking，因爲就事實來看，美國是否要在中國建立銅牆，至今還未決定，希望「天上掉下餡餅來」的朋友先不必太樂觀。美國舉棋未定的原因，據我看，是因爲在中國建立牆壁的工工程太浩大了。中國是一堆爛泥，須要挖掘乾淨，從頭建築，五億美元恐怕連牆脚都打不起來，如果錢要用到百億千億，那美國是要考慮慮腹色的，時間和金錢都不允許，所以美國舉棋不定，所以中國前途並非完全決定於美蘇衝突上，不值得我們悲觀。

再看國內的情勢。改組後的政府，無人寄以希望。新政府登台之日，就是物價高跳之日，這就說明新政府是要老百姓的命的政府。我已經說過中國前途有一條路，但有些人便是瞎了眼睛，看不到它。民

青兩黨便是整個瞎了眼瞎的黨。他們參加政府，如果想去貪污，也還不够資格，頂多不過拿那點死薪水，只够用半個月，還要賠本；中國整個的是一人「破了產，不知爲什麼一下要登台，一下又不要登台了，扭扭捏捏，不知道是幹些甚麼。今天的第三方面主要應該取得雙方的信賴，但民青兩黨參加政協，只是爲了改組政府後有我一份，而且腦子裏只想這個。所以今天中國並不是無路可走，實在是做政治的人都不够料。

近來和平又在醞釀了，參政會、立法院之外，上海的民衆也有和平運動。現在大家都活不得了，爲了要活，不得不要求停戰，這是天經地義的要求，但我看這也只是人民意見的反映，只能到此爲止，真正的和平還有距離。國內的和平運動和國際和平運動是合拍的。我認爲美國對華政策的前途，可能有四種：（一）整個放棄中國，連買賣也不做了（美商現在也叫苦連天呢），任中國自生自滅；（二）使用大規模的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強迫中國安定，代中國政府「平定內亂」，這就是建中國爲反蘇基地，在經濟和軍事上都要花極大的本錢，而且還要派個大員如麥克阿瑟者來坐鎮，指揮一切，代辦一切；（三）先不決定棋子的着法，就是馬歇爾對張羣的批評，叫做「以觀後效」；（四）恢復政協，重新調處。我以爲第一條路美國決不會走，因爲那樣就要犧牲了以前下過

華北人民的苦難

陳際雲

在打得火熾的內戰中，徵兵徵糧，愈逼愈緊，只此兩事，已可鬧得一般人民簡直無法生活下去，華北各縣爲徵糧徵兵而發生的慘劇，已經不算是聳聽的新聞。而尤其可怕的一件事，還是地方攤派。各縣自修築工事以至供應地方團隊，需費浩繁，而大抵出於攤派，這攤派，無一定手續，無限制，亦無止境，真壓得老百姓絲毫喘不過氣來。

攤派發生的原因，由於地方財政收支不敷，爲彌補短絀及應付臨時支應而起，內容又頗爲複雜。以前國家財政收支系統爲兩級制，省級財政附屬於中央，鄉鎮財政附屬於縣。省級財政本身無收入，一切支出均編入國家歲出項下，鄉鎮預算亦概由縣級統籌統支。省方遇有臨時支出，或事出緊急，來不及向中央請款，只好分配於各縣市攤籌款項，故從省級起，已發生了攤派的事實。縣級攤派更是勢所必至，除了臨時軍公支應不及列入預算發生溢支的現象之外，即在地方預算本身，各縣歲出歲入根本無法平衡，先天的就已發生了問題。賦稅方面如營業稅、所得稅、貨物稅、印花稅等大宗稅收已完全收入國庫，即向來視爲地方最大宗收入的田賦，亦因改征實物而貢獻了國家，縣級稅只剩下屠宰、房捐、娛樂、筵席、牌照等幾項零星的地方稅捐，此外更加上少數的地方公學產收益，便再無其他的收入。而在歲出方面，簡直是無底洞，預算絕對無法平衡。但在省級核定縣市預算的時候，努力設法將歲入核增，歲出核減，削足適履，勉強製成一個預算，等到執行預算案的時候

早已不切合實際。而況物價步漲，開支倍增，公教人員須不斷調整待遇，支出益大，收入支出發生了極大的差額，爲彌補地方不敷款項，就只有出於攤派之一途。這還是固定的，有限度的；最不固定的，最無限度的，爲各種軍事供應。

軍事供應大別之又可分爲三項：（一）軍事工程，如修機場，修碉堡，築防禦工事之類；（二）軍事補給，如軍糧採購、軍需運輸、副食補給（柴草蔬菜馬乾）之類；（三）軍事臨時征發，其性質、名目與數額，情形隨時變更。這些軍事供應都不在預算之內，當然須就地籌款。至於鄉鎮保甲經費及中心學校與保國民學校的教育經費，在縣級編列預算的時候，原已定得極少，連買筆墨紙張都不够，再加以鄉鎮本身又有臨時支出，又須担负軍事供應，不得已，還是就地設法，還在鄉鎮一級又發生了攤派。

現在財政收支系統又回復三級制，省級亦自有收支，雖然中央仍是加以貼補，但預算不敷的情形照樣嚴重，攤派仍所難免，縣級與鄉鎮更不必說；在軍事狀態存在的地區，軍事供應的情形亦仍如戰時，發生攤派的原因亦依然存在。

地方財政靠攤派來維持，已經是畸形現象。與攤派同時存在的還有勒索。勒索就是貪污，就是劫掠。攤派是增加人民額外負擔，勒索更使負擔不合理，不公平。於額外負擔之外再加上額外勒索，人民最爲難堪。接近或處於軍事衝突地帶的人民痛苦最深，吏治不上軌道，

的本錢。舉棋不定也不能拖得長久。剩下來只有兩條路。第二條路花費太大，如果美國想不花費而建立起牆壁，也許會用恢復調處來達到目的。所以，如果國內戰場再有大的變化，像山西一樣的情況再在其他省內發生，物價再騰貴，美國可能要考慮重新調處一途的。你們知道，中國政府並不是中國人的政府，它只肯聽美國人的話，如果美國有一天要它不再打了，以免影響遠東和平和世界安全，它就會聽話的。所以今天這只能是和平的先聲或序幕，最後還要靠國際情勢的變化，實際上施用壓力，才能有所改變。拖也不會拖得太長，可是回往政協却需要一些條件，就是時機要成熟，人要有常識。譬如我向政府說的話，他們能聽得進才算有常識，正像勸人戒毒一樣的。常識加上時機，和平仍會到來，大可不必悲觀。做一個國民，應該說本份話，對今天的和平運動，也要說該說的本份話。中國古語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就是一時機」。總結一句，中國前途悲觀因素雖多，但仔細分析下來，仍然是樂觀的。共產黨沒有消滅國民黨的意思。國共之爭，如同爭取一個股份公司中的比例，只要雙方不負氣，問題終能解決的。（辛揚火筆錄，未經張先生寓目，如有錯誤，由記者負責。）

攤派勒索便更加浩繁了。

一年來冀北冀中一帶，老百姓噙着眼淚，賣耕牛，賣農具，多方變錢以繳納僅憑所謂「副官處」或「傳達室」一紙潦草字條的種種攤派。就是若干縣政府，其實際收入，十之八九也仰賴攤派。現在向省府造報的各縣預算，收入項下不是滿紙填着「獻納」、「贈與」種種離奇的名目嗎？至於抓車輛，拉牲口，其事尤屬司空見慣。只此已足說明人民痛苦到了什麼程度。所以許多地方的人民，因此投河上吊，或棄田離鄉。保定一帶農民連自鑿的井與吸水車，都甘願奉送公家，忍淚吞聲，逃亡在外。其不能逃亡的農民，坐困鄉里，愁苦待死，對於耕種已根本失掉熱心與興趣，因為播種已大難；即能播種，自己未必能收穫；即能收穫，自己也未必能享受，經過了徵購徵借和捐獻，層層剝削，一石糧難得剩下二斗。試看今天鄉間號稱最幸運的農民，至多也是：「人吃的，僅比豬吃的多了一把鹽。」更以作戰雙方，大規模進行着「物資撤退」和「食糧封鎖」等等無情的鬥爭，尤使戰區以及非戰區的人民同遭苦難，大家的生活一齊走入絕境。還有若干地方，喘息在雙方的夾板之中，出了納糧，肩荷着雙重負擔，更是求生不能，欲逃無路。尤其在地方移轉管轄之際，上月被徵人民胼手胝足剛剛拆掉的城牆，這個月又要拆掉民房，獻磚去修築。而此進彼退，往復拉鋸，多少副良老百姓，無辜喪命，這樣糊塗的犧牲，真創造了慘絕人寰的血淚紀錄。

據由魯東各縣逃來的難胞說，今年並沒有春耕，原因是壯年們跑得出的都跑到都市作了難民，跑不出的便被徵去當了兵，剩下來的只是老幼婦孺。沒有耕牛，不能耕地，播種也就成了問題。其勉強能播種的也只好用「不耕而種」的辦法，但是「不耕又不種」的地方大約要佔半數以上。即使播下種去，能不能收穫，當然仍成

問題。眼見山東普遍的飢饉已在眼前，普遍的挨餓也就在眼前，正臨一個空前未有的難關。局勢這樣的下去，山東四千萬人民惟有死路一條。

關於豫北方面，也有類似的報道：目前砲火連天，人民紛紛逃難，麥未成熟，百穀新苗多被鐵蹄踏碎，將來收成銳減，亦可想象了。民間豬雞幾將絕種。

北方人民，在打得火熾的內戰當中，就這樣的被折磨，受苦難，以至餓死、病死、顛沛流離而死。其幸免於死的老百姓，縱然偷活，苟延一息，然而經此人世的奇變，生死界限早已模糊，既毫無生人之趣，也不敢自信有生存之福。這真是史前例的人間悲劇！

北方人民的苦難將隨內戰之繼續而增長，成千成萬的難胞亟待救濟。但因為內戰而交通困難，使行總救濟物資不能合理分配，行總晉綏察分署重副署長近鄭重呼籲：善救物資須公平分配，勿令北方偏枯。這些話極坦率，正可代表一般人民的呼聲。

行總的物資在各區之分配，迄今尚無確切統計數字公布，然據權威方面估計，運來北方的善救物資，僅佔全國分配總額百分之二十。更如重副署長所說：聯總新運來的大批農業物資，大部分已配於江南各省，而晉綏察各省所得數量極微；果如此說，豈不大令北方人民失望嗎？

就原則言，善救物資分配標準，須視各地區受災情形及其需要程度而定。北方淪陷最早，殘破最甚，被壓榨受掠亦最久，故北方人民生活最苦，求救最為迫急。那麼善救物資分配，揆以「周急」之義，理應特別看重北方，而斷不應聽其偏枯，失却平衡。

舊金山

我是二十六年以前到過舊金山。在古老的中國，二十六年，比起幾千年的歷史來，是很簡短的時間。可是在這新興的中國，四分之一的世紀，那真是十分悠久。在此期間，美國物資建設，進步非常快，當然舊金山完全變了樣子，這次真是完全不認識了，惟一相同的印象，是許多街道，坡度很大，坐汽車兜圈子，常常要爬高坡。第一次到舊金山，不過住了一個晚上，在城裏略為兜了一兜。如果我的記憶力不錯，那次所得印象，似乎舊金山很少高樓，房子大部不過兩三層，街兩旁大都種得有樹，街道一部分是彎曲的；整個空氣十分恬靜，不像一座喧嘩的都市。這次來看，完全不同。高樓很不少，美式的摩天樓風景線，已經造成了。馬路兩旁，看不見樹木，也找不到一點草地。初來幾天，住在一家考究旅館的十五層上，一天到晚，彷彿就像做夢一般。當時一個志願，就是恨不得找一片有樹有草的地方，在草地上

滾一滾，在泥土地踏幾脚。近代化的都市，無論弄得怎樣考究，總是愈來愈變成完全人工造成的環境，和大自然更加隔得遠了。許多住慣都市的人，大致非此不可。我却不一樣。也許因為自己生在鄉下長大的關係，雖然一生以職業所在，不得不長年住在城裏，總覺得在鄉下接近大自然，心神要怡曠得多。像此刻的舊金山，我真不知道，應該說它是壯麗還是醜陋。朋友們說，二十五年前的紐約，就和現在的舊金山一般。這樣說來，再有二十五年（或者不需這樣久），舊金山必然變成此刻的紐約。人們生活在人工建造的環境中，和大地愈隔愈遠了。

舊金山現在是一座徹底近代化的城市；與其他美國大都市相比較，一眼看去，沒有什麼區別。城區中心，酒吧間和夜總會（night clubs）特別多；有一段大街上，每隔幾家店舖，就有一家。最有趣的，靠近「中國城」附近，有一小段街，錫以「國際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的名稱。那裏兩旁全是夜總會，招牌用的是各國地名。偶爾去看了一看，這些組織，實在想不到怎樣會引誘那許多人。到那些地方的顧客，當然全是男子，一個個把酒喝得醉醺醺的。一位半裸的歌女，站在那裏唱歌，既不覺得美，唱得也並不好，可是客人似乎很欣賞。據我看來，那位女郎，從上燈的時候，一直要唱到半夜人散時，疲倦的樣子，簡直爬到臉上來，為着吃這碗飯，真是怪可憐的。據說此地酒吧間和夜總會之所以特別多，乃是昔日尋金時代遺留下來的風俗。當時西來尋金的冒險家，許多固然是帶着家眷，但是其中單身漢也不少。這些單身人，找到一點金子，沒有地方花，便去賭博、喝酒，和找女人。舊金山這城最初之所以興起，便因此地是這麼一個消費的處所。時代變了，舊金山早已不是礦工尋樂的中心，而是美國對外貿易的一個商港。但是當初那種習氣，至今多少仍然存留下來。同時因為是商港的緣故，水手們照例是喜歡光顧這一類的地方。二次大戰當中，派

遣到太平洋戰區作戰的部隊，又時常集中在此處，所以這類地方的生意更加發達起來。

美國境內大城市，許多都有「中國城」(China town) 為華僑集中居住的地方。原因是當初來美的華僑，大都是勞工階級，英文不大會說，風俗習慣也和美國差別太多，不願和白人住在一起，於是因集中居住的結果，自然造成了所謂「中國城」。所有美國各處的「中國城」以紐約與舊金山為最著名。美國人由別處來遊舊金山的，首先就要去遊「中國城」。當然在這區域裏，他們可以看見一點中國建築和中國服裝；但是他們心目中，以為隨時可以看見械鬥，而結果看不到，多少不免有點失望。因為華僑在此較多，我們的同胞們，在加州備受歧視與排斥。有人說，其受排斥的程度，有過於黑人。這些華僑，不但在社會上被排斥，甚至法律上都給他們難堪。例如加州法律，不許中國人與白人結婚，此法至今未變。最近報上還載過一件事，有一立中刻女那

，要嫁給一個美國人，男方去請結婚許可證，被法庭駁下來，說是此事違背加州法律。結果這一對情人，祇好跑到另外一州去結婚。美國所謂平等，一直到現在止，實在主要是指白人而言。東方人和黑人。多少都受着一種不平等的待遇。例如我們所坐的船，靠岸以後，辦入境手續時，凡是中國人或日本人，不管他們是不是美國公民，都要和外國人在一起辦手續。所謂辦公民入境手續的地方，專管白種公民。

在舊金山美國人感覺中國人太多，其實也不過兩萬華僑。但在美國各城中，以此處為最多。美國一般人，一提到中國人，就會聯想到洗衣作；因為開洗衣房和中國飯館，事實上是在美華僑的主要職業。為何會這樣呢？主要還是受排斥的結果。據說最初來的華僑，大部是做礦工。幫礦工洗洗衣服的，只不過少數人。但是中國人窮苦慣了，會得聚錢，以此招人忌妒。同時那些初期華僑，教育程度低，語言又

一起，又不肯加入他們的工會，結果自然被排斥出去，不能再做礦工，只好退到洗衣作與飯館以謀生。後來美國頒布移民律，禁止華工入境。幾十年來，在美華僑人數，沒有什麼增加。一直到經過二次大戰，方將此項不平等的法律取消。此刻中國人和歐洲人享受同等權利，每年可按一定比例數額入境。不幸近年來我國大局始終不安定，不少人利用各種名義擁到美國來。最近大半年以內，就來了好幾千人，有時一船來一千。這樣一來，美國人又急了。報紙上發出譏諷的論調來，辦入境手續的移民局官吏也越來越沒有禮貌。奉勸許多想來美國的朋友們，動身以前，最好多考慮一下。國內情形不安定，大家搶着想出來，這種心情，誰都能了解。但是出來又怎樣？對於許多人，恐怕最多不過是一種暫時的逃避，也許連逃避都不一定逃避得了。大概國內許多人，以為中國留學生在此很享福。其實除掉少數例外，在美留學生，大都想快快回國；而在中國許多同學們，則千方

百計地想方法來。

舊金山的「中國城」，不過幾條街，面積並不大，裏面中國味倒不輕。房子雖然大都全是美國式的，可是有幾處外面布置有一點中國建築的樣子。在這裏不但出版有幾家中文報紙，還有專為華僑設立的郵政局、電報局、與電話局；電話接線生，說的是廣東話。華僑們自己養雞、種蔬、做腐乳。凡是吃的，幾乎各種中國東西，都買得着。還有一點，是美國人守禮拜，星期日各種店舖（除藥店及一部分飯館外）都關門，華僑却不管這一套，星期天照常做生意。因此，禮拜天來逛中國城的特別多。這裏的東西，賣得比外面貴些，顧客並不少。舊金山市區相當大，比上海要大些；但是城中心的商業區，面積頗小。大部市區，為住宅區域。新興的工業區，位在南郊。全城人口，不過八十萬左右，比上海少好多。這點一看就是很顯然的，因為即在週末街上人最多的時候，也還沒有像中國城市那樣街上到處擠滿了人。以人口而論，西岸城

市中，洛杉磯近年來業已超過舊金山；不過以商業上的重要性而論，舊金山至今為美國太平洋海岸最重要的商港。二次大戰結束以後，中美間航輪，大都是來往於上海與舊金山之間。中國物資太缺乏了，回國的同胞們上船以前，在舊金山往往買了大批東西帶回去。以此舊金山的商人，都覺得中國人相當豪華。戰爭剛停不久，有一位中國商人，到一家店裏去買西服。店員拿出一套，問明價錢是五十五元美金，那中國商人說，他要買一百五十套。美國店員一聽大為詫異，連忙說，因為物資不富餘，政府規定，每人只許買一套。另外一次，一批中國政府派出來的人員，在舊金山上船回國以前，大家一人買一兩隻手錶，結果一下子把舊金山街上各店的手錶幾乎買光了。這些情形，使美國人非常迷惑。說是中國人民窮得快要餓死，為何這些人如此有錢。

對於專講享受的人，舊金山或者任何美國城市，並沒有什麼了不起。舊金山當然沒有像上海那樣可憐的貧民窟；但是上海的講究房子和闊人家裏的陳設，絕不在美國之下，有些方面甚至要超過些。我們來美後不久，有一位朋友新從上海來，頭一面便對我們說，美國汽車為何如此破舊；上海街上現在跑的新車，全是一九四六與四七式的新車，像美國這樣的老爺車，早就沒有人坐了。的確不錯，上海街上跑的車子，要比舊金山新得多。不過人家是講平均幾個人一部汽車（在西部現在大約是平均三個人一部），在我們坐汽車是特殊階級的權利。同時人家是講究造汽車，我們是講究坐汽車。這樣，無怪雖然美國人認為他們的西岸最富庶，有些特殊華人還是看不上眼。

美國都市最了不得的物質建設，當然是在於若干巨大的工程。舊金山最可驕傲的工程，在於兩座橫跨海灣上的大橋。舊金山海灣，進口的地方，是一條狹窄的海路，名為「金門」(Golden Gate)。橫跨在這東西行的狹窄海路上，築有一座全世界最長的單孔大鐵橋，名為「金門大橋」。凡由太平洋來到舊金山的船隻，都要在這「英里長的紅色大橋」下走過，令人對美國工程事業的高度進步發生深刻印象。「金門」以東，舊金山海灣展寬。在市區範圍以內，另有一道由東北到西南，四英里半長的跨海大橋，名為「海灣大橋」(Bay Bridge)者，引到奧克蘭(Oakland)城。這兩座大橋，全是在羅斯福總統行新政時期先後造成。據稱海灣大橋，於一九三六年造成，費去美金七千五百萬元；金門大橋，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完成，費去美金三千五百萬元。為着收回建築費，每部汽車駛過此兩橋，一次收一點錢。海灣大橋上，交通非常頻繁。上面來往六條跑道，還嫌不够分配，車輛擁擠不堪。在橋上車子拋了錨，是要罰五塊錢的。築成以後，不過十年，海灣大橋的建築費，大部已由通行稅（每部車子過一次，收美金二角五分）收回。再過幾年，全部收回，過此橋便不需再收費。因為交通太繁，海灣大橋眼看不够應付，

近來舊金山市政府，又在籌畫建築一道新的十條跑道的海灣大橋。美國人的建設氣魄真大。要在別的國家，也許這些橋根本就不會造。由舊金山坐渡船到奧克蘭，實在也不過半點鐘，沒有什麼太不方便。但從美國人看，走海灣大橋，只需十分鐘，而且自己的車子可以過去，又何必等渡船，這種便利與時間上的經濟，費此浩大工程，一勞永逸，是非常值得的。

金門大橋，現在成爲羅斯福公路的一部分；由舊金山過道橋往北，沿此路開車一直就到西雅圖（Seattle），由該處再向北行，經加拿大境到阿拉斯加。這有名的羅斯福公路（在美國境內亦稱一〇一號國道），南由美國與墨西哥接界的地方，北達阿拉斯加，一直沿着太平洋海岸走，是一種非常浩大的工程；在珍珠港事變以後，方纔趕着將全路貫通，以作重要軍事運輸線。羅斯福時代，建設成績，到處可以看見。小至有些地方的小公

園，也是那時候的公共工程。然而反對他的頑固份子，一直到今天，還在詆毀羅斯福的新政。

舊金山一處值得留戀的地方，是「金門公園」（Golden Gate Park）。中國的公園，是預備遊人去散步的；美國的公園，則非坐汽車去遊不痛快。較大公園，大都離市區有好幾英里，最好是自己開車去。雖然市內也有電車和公共汽車，可以坐到公園門口。但是走到裏面，公園很大，步行看不了多少東西。合式的方法，是自己開車進去遊，一下子可以兜許多地方。

金門公園，位在舊金山市區西北角，鄰近太平洋濱，驅車半小時可達。全園東西長三英里，南北長約半英里。橫貫該園的大馬路，長約四英里半。從那與自然界隔絕的大都市，來到這一片綠的園子，心襟立刻舒展起來。園內有水族館，美術陳列館，音樂亭等等。不過最好的一點，還是一看滿目花草樹木，覺得自己又和大自然接近。本來我們以爲此園不過是保存原有的茂盛樹木。後來問美國朋友，纔知此處園址，原係一片海邊沙土，完全不毛之地。後來經一個人提倡，闢成公園，栽植樹木，乃一變而成遊息勝地。人工建設之偉大，真可佩服。

然而人力不一定能勝過大自然。到金門公園的遊客，都喜歡走到一座小湖旁，去遊覽一處名爲「Portal of the Past」（「昔日之門」）的名勝。此門乃舊日舊金山大富豪 J. N. Topore 氏住宅的大門。二十世紀初年，此君任南太平洋鐵路經理，喧赫一時。不料一九〇六年四月十六日，舊金山發生空前大地震，全城半遭毀滅。這位富豪，全宅震滅，僅留這座大門，露有斑痕而未倒。事後其夫人恍然大悟，乃將此門捐贈公園，移立園內，供人憑吊，並作劫後紀念。舊金山的都市，早已在地震故址，更大更好地復興起來。然而這點殘蹟，令人警惕於人類之渺小。

（一）一販狗者日必殺狗逾千
 （二）拋棄狗骨堆積如山
 （三）爲一狗所發現
 （四）傳至衆狗，大嘆口福難得
 （五）一天屠狗者死，衆狗痛哭悲悼
 （六）衆狗建墓以誌千古，狗文曰：慈善家之墓
 （七）狗也良莠不齊，有一狗總在碑前撒尿

余所亞作

墓碑



- （一）一販狗者日必殺狗逾千
- （二）拋棄狗骨堆積如山
- （三）爲一狗所發現
- （四）傳至衆狗，大嘆口福難得
- （五）一天屠狗者死，衆狗痛哭悲悼
- （六）衆狗建墓以誌千古，狗文曰：慈善家之墓
- （七）狗也良莠不齊，有一狗總在碑前撒尿

東北大戰又起，這一次會戰是具有決定性的戰鬥。共軍從普蘭店起，經清原、梅河口、永吉、外圍德惠、農安、長嶺、團場，一直到秦皇島，長達三千華里的陣綫，用七十團廿餘萬的兵力，全面出擊。從月初開始到現在，三週光景，迫吉林、圍長春、下懷德、公主嶺、康平、雙山、郭家店、團場、昌黎，其勢洶洶。目前吉長被圍，四平緊急，局勢發展到這一地步，並不是偶然的。

東北國共軍的地區是一與三之比，國軍區有共軍，共軍區無國軍。國軍佔東北之西南一隅，一切「軍事第一」；行政機構疊床架屋，談不上效率，飛來大員不諳東北民情，抱定「此地未可久留，先撈一筆再說」的心理。東北被敵偽蹂躪多年，一旦光復，如此黑暗，人民對中央懷抱不滿，形成南方人壓迫東北人的觀念。他們由失望而灰心，由灰心而憤恨，以至走上梁山，助長了今日共軍的燎原之勢。

在政治上如此，在經濟上也一樣。東北使用流通券，在幣制上另成一天地；國軍開支龐大，戰線漫長，不下於關內地區，而農村破產，共軍到處游擊，飢荒之「面」，精疲力竭，所賴「一點」一線，又消費大於生產。駐軍要糧、要豬、要豬、徵稅，各地早已不勝負担。東北人民主要食品之高梁米，偽滿十四年最高價亦僅兩元一斤，「八一五」迄今，不足兩年已達一百七十元一斤，且漲勢正猛，人民無以為生，就只有挺而走險了。

至於軍事，國軍約廿萬人，在普蘭店、安東、通化、吉長、赤峯，這東北四分之一的地區，要守交通綫，要鞏固大據點，要防備共軍攻擊，要顧及後方擾亂。拉丁困難，以瀋陽為例，每次壯丁抽籤，參加者不及十分之一。兵源補充遲緩，關內抽調不來，當地又沒有辦法。武器雖屬美械，用之過久，以吉普車論，零件缺乏，無法修理，任其破爛，形成新兵舊武器。加以兵士待遇太少，士兵厭戰；每次作戰之目的，不外剿滅「奸匪」，然而如何之「奸」如何之「匪」，引不起共鳴。反之共軍，其地區雖廣，却無後顧之慮，政治經濟類能與軍事密切配合，以人民解放戰爭為號召，將士共甘苦，完全日械裝備，大規模發動一參軍運動。兵源廣，老兵未損失，新兵已成老兵，形成老兵新武器。每次作戰，將士用命。國軍雖有空軍助戰，力量有限，凡在人民聚集地區，又不便任意投彈，否則反易引起人民與共軍之敵愾同仇，實得不償失。

共軍初出關時，根基未定，退至松北一年光陰，一切就緒。四次渡江，雖無極大戰果，但主力未損。此次南進，復有朝鮮軍隊十萬，蒙古騎軍兩師助戰，遂改變戰略，迂迴長春之背，公主嶺下後，又佔領梨樹。尤以共軍在普蘭店六旅，清原、梅河口七旅，吉林三師，長春八師，熱境兩師，各地國軍俱被牽制。公主嶺共軍正構築工事，醞釀大戰，長春安全可慮。去歲國軍佔領四平，一年於茲，演成今日惡劣形勢，已在一般意料之中。

現時東北軍事長官，如杜聿明雖懂軍事，但兵力不足，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副長官四人，鄭洞國僅為杜之助手；孫渡係雲南部隊長官而居副座；馬占山乃十年前英雄，乾巴老頭子，毫無作用；孫立人新一軍將才，兵權取消，乃悲劇人物。吾人縱觀東北大好河山，遍地骸骨，春耕絕望，想想內戰的殘酷，真是悲慘萬分。（五月廿四日寄自瀋陽。）

北東的中火烽

斗北官上

大時代的小感觸

孔瑞明

「不得了」

五月二十六日上海市參議會開幕，吳市長致詞：「現在市政當局十分之七精神，消耗在安定社會之設施上。」（見同日華美晚報）同日下午吳市長接見各報記者，報告處理學潮之經過後，「當有記者詢以學潮未息，而米潮又起，市長作何處置？吳市長聞言後，即皺眉搖頭不已，并長嘆曰：「不得了！」繼稱：渠連日為學潮風波，致對米潮無暇兼顧……」（見二十七日申報）

「不得了」，這倒是一句真話，道出了此時每一個中國人的心聲和感覺，而且由一個特別市的市長公之於口，也可見事態的嚴重了。吳市長消耗了十分之七的精神來安定社會，可是社會愈來愈不安定，先之以搶米風潮，繼之以工潮和學潮。尤以最近各校學生罷課遊行，愈演愈烈，同時米價由十餘萬飛漲到四十多萬，白色恐怖咄咄逼人，這局面真是如何得了！

內戰和饑餓

財政部長俞鴻鈞於五月二十三日在參政會中報告：目前財政經濟仍未能脫離濃厚的戰時色彩，三十五年度實際支出超過二萬七千餘億，本年度收支差約計三萬餘億，如何彌補差額，規劃極費苦心（見二十四日大公報南京專電）。俞部長口中的數字到底有幾分真實性，且不管它，但於此已可看出幾個無可爭辯的事實：第一、赤字鉅大，有十三位數字，真可以說是「天文學

一、慚愧

本日報載交通部俞部長出席參政會，報告交通工作，當說到了航空部分，他說：「民航機歷次失事，實在內心慚愧」。俞部長居廟堂之上，又不親自駕駛飛機，而他竟以飛機失事為己任，引為慚愧；這慚愧是爲了對國家太負責任，人們聽了是非常同情的。

又報載北平通訊：北平行轅李主任爲關切學潮，約請平津專科以上院校校長及主要教授在勤政殿開茶話會，李主任致開會詞之後，胡適校長立起說話，說到學潮時，他說他感到很慚愧，他對於北大學生會加勸導。胡適校長鞠躬盡瘁，整頓教育，服務國家；學生們沒有遵守他的勸導而掀起學潮，這在他毫無過處。但他竟引爲己任，引為慚愧；這慚愧是爲了對社會太負責任，人們聽了也是非常同情的。

若至我們這種手藝匠（粉筆匠）之微，對國家社會無所負其責任，宜乎慚愧較少；然而這幾天我覺得慚愧萬分，置身無地。

事情是這樣起的：我在學校是一個零做小工，一星期難得去兩三趟。所以我對學生全不擺面孔，裝深沉的，學生也就可以隨便發言。前天我去上課，一個學生問我：

「先生！現在許多地方的學生都因反內戰，反飢餓，罷課遊行而挨了打了；我們明天也要罷課，你贊成不贊成？」

我被他這一問問得楞住了，隔了半天，我說：「我是接受了聘約，來學校上課的。」

另一個學生接着說：

「先生！我們是奉父母之命，來此讀書；你是奉校長之命，來此教書。我們來共同讀死書，教死書；別管一切的死活黑白，好罷？」於是全堂鼓掌。

我呢，站在教師的地位，對一個十幾歲的少年都無話反駁，祇覺得一股慚愧的熱流，從兩頰直衝到心底，從心底又衝到耳根；上上下下往返不絕，簡直是無可告訴的苦痛；這苦痛持續到了今朝，也許還要持續一個時候。

小百姓是沒有辦法的，連他自己的心理狀態也難得輕鬆解放。

二、真理與奮鬥

梅雨把天蓋拉下了不止萬丈，鴉雀都無聲無息，人們臂着腰喪魂失魄地走着，沒有一個影子跟着他們。忽然一陣嘶啞的呼聲，淒厲地響在晦暗的空中。跑到窗前一一看，原來是大隊學生遊行。他們沒有傘，沒有雨帽，「反對內戰」！「增加教育經費」！喊一聲伸一下赤手空拳；冷雨從他們的袖管直流到他們的腋下，他們淋濕的程度可算到了絕點。而領導的幾個學生不斷地揮着拳頭，其餘的人也就不斷地跟着。他們不知是從那條街走來，也不知將向那一條街走去；梅雨卻老是那麼淋個不止。

一個領導者忽然喊道：「奮鬥」！「爲真理正義奮鬥」！於是一片「奮鬥」！把天蓋衝出個小洞，從那裏鑽出來一股白光。這個領導者的喉嚨非常響亮，他那身段，遠看去活像「三一八」時學生領隊的朱家驊——現今的教育部長。

上的數字」；第二、平衡困難，連財政部長本人都公開承認「問題的嚴重性」，而感覺大傷腦筋；第三、戰時財政，當然軍費第一，一切爲了前綫了。

打內戰，既然非錢莫辦，然則錢從那裏來呢？或者向老百姓榨取，或者乞靈於印刷機。在「印刷機財政」之下，通貨膨脹，物價高漲，民不聊生，就只得挺而走險了。這是目前社會一切動亂的共同原因。

更因爲軍餉緊急，把老百姓的米都搜括盡了，米的存量稀少，來源斷絕，又那得不一漲再漲？那得不發生搶米風潮？

或更因爲軍費龐大，侵佔了國家歲出的絕大部份，迫使教育經費縮減到很小很小的一個數目。據教育部長朱家驊於五月廿五日在參政會中報告：本年度教育文化部門的支出，只佔國家總預算的百分之四。〇七九（見同日中央社南京電）。結果，學校設備簡陋，教授待遇微薄，學生生活艱苦，在饑餓錢上掙扎，又那能安心學業？那得不發生學潮？凡是略具常識，稍有良心的人，都決不會否認一個鐵的事實——饑餓是內戰造成的！由反饑餓而發展到反內戰，那是邏輯的必然。

因此，要安定社會，平息學潮，米潮，工潮，民變，以及其他可能發生的種種風波，只有停止內戰，才是一釜底抽薪一的辦法。否則「揚湯止沸」，只會使社會秩序愈弄愈糟的。

蠻力不能解決問題

大美晚報在最近的一篇社論中寫道：「在南

「奮鬥！」——為真理正義奮鬥！——這時這口號正響在我的窗下；我猛然一驚，希特勒的「我的奮鬥」鑽上心來。希特勒！這一個奮鬥而沒有成功的魔王！十年或五年前他是多麼地煥發！不必看他同黨的宣傳，就是他的反對派的描繪，也就够你尋味。「動亂時代」一書，是出於他的反對派的手筆，裏面有一節描寫希特勒玉座下的五月勞動節：

「一切勞動節都取消了，五月一日改名為全國勞工節了。這天各工廠的工人，每人發一張券，上面印着自己的號數，以便入場時作為一種證明，因此每人都必須去。」

「這天天氣非常燥熱而多灰，我睡在小平台上，凝視天空往來飛翔的飛機。鄰近各屋的窗戶都打開了，許多架無線電的聲音從裏面播出來，戈貝爾的聲音，希特勒的說不完的演講，然後一個兒童唱歌：

「五月到了，今年有這樣可愛的春天，並不是偶然的，……」

的確，上帝自己也是一個國社黨員。

成千成萬希特勒信徒的熱狂的歡呼聲，在空氣中震蕩着；音樂隊奏着；歌聲頌揚着；無線電將牠們從但波合非大場傳到全國各處。」

看這排場！好一幅「上帝自己也是一個國社黨員」的排場！

「權力就是真理」，「強者的獨裁成為最弱者」，這些話是希特勒口裏說的。由此推下去，他還可以說「權力就是上帝」，「強者的獨裁就是上帝的父親」；然而他沒有證實這些話的可能。

他常說過：

「大理論家很少能成為領袖，而煽動家卻大都具備着大領袖的才具——煽動家雖然不過

是一個狡黠的政客。」

他又說過：

「凡是一種理想所寄託的無論甚麼組織，牠的偉大，就是在於牠的宗教的熱狂，和那不能容忍的固執的精神；他們攻擊其他的組織，並且堅信着人家都是不對的，祇有我是對的。」

這大概就是牠不能證實那些話的理由。「煽動家不過是一個狡黠的政客」，他——希特勒，不折不扣正是一個煽動家。真理決不會伴隨一個狡黠的政客；同樣的理由，他縱有宗教的狂熱，也休想見得到上帝。

另一個被希特勒逼走了的科學家愛因斯坦，他倒是找到了真理的。他相信「科學家有一種特殊的宗教性」，可並不是主觀的，瘋狂的，「堅信人家都不對，祇有我是對的」；而是非常客觀，非常冷靜，非常民主地虛心研究。當希特勒高唱「日爾曼民族是上帝的選民」而大大地排猶的時候，愛因斯坦毅然退出德國國籍和最榮耀的「普魯士科學院」。他退出德國國籍時這麼聲明：「我不願生存在個人沒有法律平等的担保，沒有言論和教育的自由的國家。」而在辭退「普魯士科學院」的信裏是這麼寫的：

「你要我作愛戴德國民族的見證，這將等於一切公理和自由的否定。」

他顯然離了德國，手中握着他的「相對論」的科學原理和他的公理、平等、自由的真理。不比希特勒離開德國之時，權力一倒，一切都不再屬於他，手中僅僅握着一個毒殺自己的酒杯。

人們信仰的真理真有各色各樣，為各色各樣所信的真理而奮鬥的人們也真有各色各樣的下場。

話轉得遠了，學生的隊伍也去得遠了，祇有那個身段活像朱部長年輕時的青年，留在隊伍的後面保衛。

我不禁肅然起立，走到霖雨的窗外，探着手祝福世間為所信的真理而奮鬥的人們。

京學生遊行示威中，在眼前上海緊張局面中，我們都感覺到政府的重要領袖們多少有點孤注一擲的情緒……有一件事對中國的領袖們是重要的。那就是他們應當明白……對於政府的政策和行動之抗議絕不是武力能夠消滅的……現在也不是他們孤注一擲而至於企求以蠻力解決問題的時候。（譯載五月廿七日大公報）這是美國朋友給我們的忠告，值得當事人深切反省。

蠻力不能解決問題，是一再給事實證明了。抗戰結束以來，中國內戰斷斷續續打了兩年，打出了甚麼結果沒有？沒有！前此台灣民變，當局用武力鎮壓，結果迫使事態擴大，幾乎不可收拾。這次學生運動，因經軍警彈壓，反而日趨激烈。最近上海文匯，聯合，新民，三家報館被封，也是一件可能產生不良影響的事。

總之，蠻力是可咒咒的。和平却為人人所需要。「和平奮鬥救中國」，是中山先生的遺教，也是全國人民的箴言。三六，五，二七。

憤怒的人們

趙延年刻



怡豐銀行

經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扶助
實業

服務
社會

總行 重慶四五路四十八號

分行 上海江西路四六七號
電話 二〇二〇

宏豐企業公司

總公司 上海廣東路五十一號
電話 一一四五三一五

承辦

進

出

口

業

務

分公司 漢口聯保里五號

重慶林森路一二七號

上海駁運公司

地點：上海四川中路一二五弄二〇號
電話：一三二二四

南榮記

報關行

地址：上海廣東路一二二號
電話：一〇四一八號

天隆披單



經濟實惠 美觀大方

天隆染織廠出品

上海四川路一二五弄二〇號 電話：一三二二四
上海廣東路一二二號 電話：一〇四一八